

第5卷 教化与礼仪学术
第6卷

第7卷 科学技术

第9卷 宗教与民俗

第10卷 中外文化交流

第1卷 历代文化沿革

第2卷 地域文化

第3卷 民族文化

第4卷 制度文化

中华文化
通志

第 8 卷

【艺文】

典籍志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致忠
周少川 撰
张木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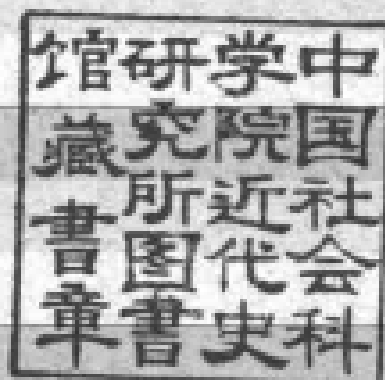
中华文化
通志

第 8 典

【艺文】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典籍志



7684/17

K203
Z669
:B(9)

中华文化通志·艺文典 (8—079)

刘梦溪 主编

典籍志

李致忠 周少川 张木早 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 200020)

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70毫米 32开

字数 374,000

印张 15.375

插页 1

版次 1998年10月第1版

印次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7-208-02332-8/K·551

141617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萧 克

编 委 李学勤 宁 可 王 尧 刘泽华
孙长江 庞 朴 陈美东 刘梦溪
汤一介 姜义华 陈 昕 朱金元
张国琦

办公室主任 张国琦

办公室副主任 王科元

策 划 姜义华 张国琦

典籍志

作者简介

李致忠,1938年生。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现任国家图书馆业务处处长、研究馆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古籍版本研究分会主任委员。著有《古书版本学概论》、《历代刻书考述》、《宋版书叙录》等。发表论文150余篇。

周少川,1954年生。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副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秘书长。著有《古籍目录学》、《汉书选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点校)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张木早,1962年生。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同年到北京图书馆工作。著有《文献与文献收集》等。发表论文多篇。

总 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宕；哺育着差不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灿烂辉煌。它坦诚似天，虚怀若谷，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的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以直，健以稳，文而质，博而精，大而弥德，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勿论东西，不分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己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准乎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文化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种优点，来推动自身发展；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点，来保证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便是我们为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做出的奉献。

《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唐人杜佑著《通典》，罗列古今经邦致用的学问，分为八大门类，“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务求做到“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通典》的这一编纂方法，为我们所借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按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排列。

宋人郑樵《通志·总序》有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志者，宪章之所系。”指的是，史书的编纂关系到发掘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纂者不能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而应在驰骋于遗文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所归”，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以概括为“类”与“通”二字。

“类”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十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个方面；每志中的“编”“章”“节”“目”，亦或各成其类。如此依事立类，层层分疏，既以求其纲目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由道以行，俾著者、读者都能于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骊得珠，自在悠游。

“通”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其始终，察其源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由几及显，自微至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弄清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了它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决定观念的，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质的；而介乎二者之间的制度，固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临天下，使制之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间，也互相渗透，左右连手，使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派斑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境外许多不同种的文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爬梳剔理，还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通”。

“通”者会通。“会”字，原义为器皿的盖子，引申为密合；现在所说的“体会”、“领会”、“会心”、“心领神会”等，皆由此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悟，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依以架构旨趣之所在。是耶非耶，知我罪我，恭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中华文化通志》由萧克将军创意于1990年。1991年先后两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了论证。1992年组成编纂委员会。十典主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主持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1993年1月和1994年2月，全体作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研究全书宗旨，商定典志体例，切磋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编委会更多次就全书的内容与形式、质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作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行了创造性构思和奋斗式劳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本书出版任务，并组织了高水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使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得以现今面貌奉献于世人面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能给祖国精神文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光彩，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不足之处给予指正。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典籍志》以中国典籍产生、发展、兴旺的历程为经，以典籍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为纬，勾勒了中国典籍的纵横画面和发展轨迹。

全书共分八章。第一、二章阐释了典籍的概念，典籍产生的时代。并透过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对典籍的影响，描述了战国时期典籍的创作情况和初步繁荣。第三章叙述了学术传统和学术演变对典籍创作与发展的影响，分析了各类学术文化典籍的内容特征和编纂方式，揭示各类典籍在学术传递系统中的地位，以及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第四、五章，系统描述了历代典籍载体的演变，典籍的自然形态，即文字、文字载体、载体材料、材料形状等的发展，以及典籍生产方法的变化，特别是典籍装帧艺术的演变。第六至八章描述了历代公家和私人藏书家收集整理典籍的方式方法和成就，记录了中国典籍分类体系和典籍编目传统的发展，叙述了中国公家、私人、书院、寺观四大典籍收藏系统的演化过程，以及典籍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政治劫难、战争劫难、自然劫难，将典籍聚散及编目整理的画卷呈现了出来。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典籍与典籍的产生	7
第一节 典籍的概念	7
一、典籍的构成	8
二、典籍的本质	11
第二节 典籍的产生	13
一、早期典籍的产生	14
二、正式典籍的产生	17
第二章 百家争鸣与典籍初兴	21
第一节 学在官府与学在四夷	21
第二节 士阶层的形成与百家争鸣	24
第三节 战国时期的典籍初兴	30
第三章 学术文化发展与典籍迭兴	34
第一节 独尊儒术与经学典籍	35
一、经学的确立与经学典籍的发展	35

二、经学典籍的主体——“十三经”	39
三、经学的解经典籍	46
第二节 佛教传播与佛教典籍	51
一、佛教的传入与佛典的流行	52
二、中土撰述的佛教史籍	59
三、汉文《大藏经》的编纂刊行	64
第三节 道教方术与道教典籍	70
一、道教的流传及其典籍的累积	70
二、《道藏经》等道教丛书的编纂	77
三、道教典籍的分类和内容	80
第四节 史学传统与史学典籍	84
一、以时为纲：编年体史籍首开风气	87
二、以人为纲：纪传体史籍的“正史”地位	91
三、以事为纲：纪事本末体史籍兼采二体之长	98
四、各具功能：其他体裁的史学典籍	102
第五节 文学传统与文学典籍	105
一、诗歌的创作及其典籍	106
二、散文的创作及其典籍	111
三、戏剧的创作及其典籍	114
四、小说的创作及其典籍	118
五、诗文评论及其典籍	123
六、文学典籍中的诗文总集与别集	125
第六节 兵法传统与兵家典籍	127
一、古代兵法的形成与兵书的产生	128
二、古代兵法的发展与兵书的完善	132
三、古代兵法的创新与兵书的繁荣	137
第七节 科学传统与科技典籍	142

一、古代科技的产生与科技典籍的出现	142
二、古代科技发展期的科技典籍	145
三、古代科技延伸期的科技典籍	150
四、西学东渐与科技典籍的变化	154
第八节 小学传统与文字、音韵、训诂典籍	159
一、小学创立时期的传统语言学典籍	160
二、小学发展时期的传统语言学典籍	165
三、小学鼎盛时期的传统语言学典籍	171
第九节 类书传统与类书典籍	176
一、类书典籍的起源	176
二、类书典籍的发展	178
三、类书的种类和利用	187
第十节 丛书传统与丛书典籍	190
一、丛书的起源及其种类	191
二、丛书典籍的发展	194
第四章 典籍的生产材料与生产方法	207
第一节 典籍的生产材料	207
一、纸书出现前的典籍生产材料	207
二、纸书的出现和流行	217
第二节 典籍的生产方法	222
一、印制书籍出现前的典籍生产方法	223
二、印制典籍的出现与发展	226
三、活字排版印制典籍的出现与发展	230
四、套版印制典籍的出现与发展	243
第五章 典籍的装帧艺术	249

第一节 典籍的版面设计·····	249
第二节 中国古代典籍的插图版画·····	254
第三节 中国古代典籍的装帧形制·····	264
一、简策·····	264
二、帛书卷子装·····	266
三、纸书卷轴装·····	267
四、经折装·····	270
五、梵夹装·····	272
六、旋风装·····	275
七、蝴蝶装·····	278
八、包背装·····	279
九、线装·····	281
十、毛装·····	283
第六章 历代典籍的收藏·····	286
第一节 历代典籍的公家收藏·····	286
一、典籍公家收藏的起源·····	286
二、历代公藏典籍的收集·····	289
三、历代公家藏书处所及管理机构·····	298
四、公藏典籍的利用·····	317
第二节 典籍的书院和寺观收藏·····	322
一、典籍的书院收藏·····	322
二、典籍的寺观收藏·····	330
第三节 典籍的私家收藏·····	337
一、典籍私家收藏的起源·····	337
二、私人收藏典籍的原因·····	338
三、历代著名的典籍收藏家·····	344

第七章 历代典籍的整理、编目和分类	367
第一节 历代典籍的整理	367
第二节 历代典籍的目录编制	397
第三节 典籍分类的发展与演变	425
第八章 典籍的流散	443
第一节 典籍的政治劫难	443
第二节 典籍的战争劫难	455
第三节 典籍的自然灾难	465
参考文献	471

导 言

“典籍”一词最早盖出于《孟子》。《孟子·告子下》曰：“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赵岐注曰：“谓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可见那时典籍的概念还泛指文献，未必指书册典籍。《尚书伪孔序》则谓：“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后汉书·崔寔传》谓：“少沈静，好典籍。”可见汉朝人关于典籍的概念便是泛指典册书籍、载籍。所以这里的《典籍志》，实则也可以称为《书籍志》或《载籍志》。

中国典籍起于何时，实难详考。《尚书伪孔序》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其意是说早在伏羲时就已懂得以文字记事，以代结绳之政了。伪孔还进一步论列“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意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其意盖欲说明早在三皇五帝时，中国就已产生了《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类的典籍。但这毕竟是传说，谁也没有见过，难以置信。伪孔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故又说：“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

芟夷烦乱，翦裁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原来是传说中的《坟》、《典》、《索》、《丘》等书，经孔子删繁就简、弘扬罢黜而失传了。这些话虽也难以置信，但孔子确实整理了古籍而成六艺，用以课授生徒。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以前，中国确实产生了典籍。但这些典籍乃长期蓄积而成，内容重复，文辞烦浮，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且未成体系。孔子则以教育家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欲广泛行教，宣传古道，“举其弘纲，撮其机要”，因而不得不整理那些已有的典籍以成新籍——《易》、《书》、《诗》、《礼》、《乐》、《春秋》。如果真是这样，则中国典籍的起源似可这样概括：生于孔子前，成于孔子后；兴于孔子前，盛于孔子后。

进入战国以后，奴隶制社会急剧向封建制社会转化。奴隶制的堤岸已被冲决，但还没有全线崩溃；新型的封建制社会已经萌生，但还极不成熟，尚未定型。如何维护旧的堡垒，使之苟延残喘，或东山再起，这是奴隶主阶层及其代言人终日思考和要解决的课题；如何培育新型封建社会这棵幼苗，如何塑造这个社会的形象，则是新兴地主阶层及其代言人终日思考和要解决的课题。两军对垒，各自都想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于是在思想界便形成了一种非常活跃的局面：各抒己见，各申主张，各扬观点，各献治国之策。这就是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伴随“百家争鸣”而来的，是产生了大批的私人著作，使我国的典籍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典籍生产的高潮。早期的儒家、道家、墨家，战国中叶以后儒家又有孟子、荀子；道家又有尹文子、慎子、庄子；新生的法家商鞅、吴起、申不害、韩非子；名家公孙龙、惠施；阴阳家邹衍等等，他们都有自己的著作。与此同时，科技方面也出现了医书《内经》、药物书《本草》，文学方面则出现了不朽的名著——屈原《离骚》。此外在天文、历法、农业、畜牧、历史、地理等方面也出现了专著。

此后虽有秦始皇焚书坑儒、三武灭佛、元人毁道、清廷禁书,以及兵燹回祿之灾,典籍曾屡遭厄运,但自两汉以来,中经盛唐、两宋,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特别是在纸张广泛应用、印刷术通行以后,中国典籍旧有新传,代有新作,多如丘山,浩如烟海,将中华民族的睿智思维物化了出来,凝结成为灿烂的华夏文化。

真正的典籍,是学术发展的结果。换言之,学术发展的结果和表现,是产生大批的典籍。中国的学术起源较早,并且一脉相承,赓续不断。先秦就已萌生的史学、文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农桑种植以及儒、墨、道、法、名等诸子学,在后世的两千多年中,不但赓续发展,有的还不断拓宽和深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以降,则经学独占学坛两千年,直至宋明理学、清代汉学,愈发展愈辉煌。史学自司马迁创纪传体《史记》以降,则中国正史始终沿着此路发展。虽然此前有编年体、此后有记事本末体等大量史书问世,但终未列为正史。自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土,佛学渐染,非但大量佛典被传译,中土著述亦不断丰富佛藏。道教自东汉崛起,渐与先秦道家相结合,成为中土自生自长的宗教。其教义学术,亦千年不衰,递相发展。至于文学,无论诗歌文赋、词曲小令、戏剧小说,都各自有过辉煌的历史。我们必须放眼这些学术发展的大背景,并努力到这种学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探索典籍的源流派脉,才能理清典籍发生、发展的轨迹。

典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它既具备物质形态,同时又具备意识形态。凡是典籍,无论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还是科学技术,都是人们某种意识的反映。而人们的意识,任何时候都要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影响;受时代的局限;受阶级、阶层及个人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的制约;受社会风尚、地域习俗的浸染。所有这些,反映到人们的头脑里,折射到典籍中,就使典籍带上了时代特色、阶级特色、地域特色和个人特色,因而也就使典籍具备了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这

种形态,不论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是美好的还是丑恶的,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影响着旁人与后人。

人的意识传播媒介不外两个方面:一是靠说唱演讲传扬开去,一是靠著书立说物化出来。而当着人们的某种意识物化成一种独立的形态时,同时也就具备了相应的物质形态。因为典籍无非是人的意识用文字表达出来的逻辑有序的载体而已。典籍的物质形态,包括文字、文字载体、材料形状及装帧形制等。几千年来,中国典籍的制作材料,用过龟版兽骨,用过玉石铭器,用过版牍竹简,用过缣帛。待到纸张出现并广泛应用,则是典籍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是典籍生产的一次解放。

由于典籍生产材料的不同,典籍生产方法也有很大区别。用龟版兽骨、金石等材料,其制作方法只能用刀刻或浇铸;用竹简缣帛,其制作方法只能用笔写,而绝不可能用来印刷。当纸张用作典籍制作材料之后,则不但可以笔写,同时也给印刷术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当印刷术产生并广泛行用之后,则典籍发展史上又经历了一次伟大的革命,典籍生产又一次解放。

典籍的装帧形制,取决于典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甲骨金石的书籍,难谈装帧艺术。而竹木简书便只能是编简成册,故称为简策。帛书可折可卷,故有帛书卷子之称。纸书可卷,故有卷轴装。卷子可折,故有经折装。印制典籍其叶可作各式装订,故又有蝴蝶、包背、线装等册叶装。探讨上述典籍的这些演变形式,显然是《典籍志》不可推卸的责任。

典籍是人们为了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扬思想、宣传主张,经过创作编撰,用文字书写、刻印在一定形式材料上的著作物。因此,典籍的价值首先是能够供人查检和阅读。历来的知识分子,为了不断地获取知识、思想、经验和理论,就要不断地读书。而为了读书方便,就要

不断积累和藏书。“惠施多方，其书五车”^①。此为先秦人藏书的范例。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并用金帛重价收买天下遗籍，因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故献王“得书多，与汉朝等”^②。此为汉代藩王藏书的范例。唐京兆李泌受封邺侯，家富藏书。韩愈诗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③此为唐朝官员藏书的范例。此后，随着雕版印书的盛行，得书较易，藏书家更多。宋朝的王洙、晁公武、尤袤、陈振孙、贾似道，以及明朝的周藩、晋府、天一阁、汲古阁，清朝的也是园、传是楼、士礼居、拜经楼、抱经堂、爱日精庐、海源阁、八千卷楼、皕宋楼、铁琴铜剑楼等等，不一而足，数不胜数，都以藏书而名家，构成了中国书文化的重要方面。而历代政府为表示自己的稽古右文，亦不断溥益册府，充实公藏。自汉代的兰台、石室，直至清朝的内阁大府、天禄琳琅，历朝都有皇家的藏书。而有藏书，必有整理、著录与编目。公藏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校理中秘而成《七略》首创公藏目录以降，直至满清，历代都有国家藏书目录问世。私藏自南朝任昉撰有私藏目录，中经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降，直到清朝各大藏书家，亦无不编制藏书目录。而无论公藏、私藏，有书便录，以记一代藏书之盛的史志目录，则自《汉书·艺文志》开其端。此后有数部正史亦立此志。即或是有的正史未立此志，后人亦几乎全部补齐。而自《明史·艺文志》起，世间积书甚丰，已难以在正史艺文志中著录，故改为著录一代著述之盛。所以就中国历代产生的目录典籍而言，亦可说是浩如烟海。记录描述中华民族对典籍的收藏、整理、编目，以及随之而产生的目录学和目

① 《庄子·天下篇》。

② 《汉书·河间献王传》。

③ 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

录专著,显然也是《典籍志》所应涉及的内容。

在中华文化百部通志中,《典籍志》被列入艺文典,开初非常使人费解和畏难。中国典籍浩瀚无际,无从下手。既属艺文典,是否就可仿艺文志体例,将现存中国典籍简明开列一目,便可成为中国《典籍志》呢?这不堪想象。因为文化志不可能包含一本目录。且就是一部目录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编成。须知编一部现存中国古籍目录,其工程之浩大,其著录之复杂,也是极难想象的。显然《典籍志》绝不是旧有的艺文志。

是写一部书籍发展史?似乎也不是。中国古代书籍史所要揭示的内容,偏重在书籍的外部形态,即书籍的物质形态。而透过书籍物质形态方方面面的分析,找出不同阶段不同物质构成之间的特性与联系,从而描摹出作为物质产品一面的书籍发展演变的轨迹,那顶多叫做书籍史,而绝不就等于典籍志。

志者记也。《周礼·春官》谓小史之职“掌邦国之志”。东汉郑玄注“志谓记也”。故志书便称为记事之书。中国历来的志书向与史书不同。今人区分,形象地说是史者竖排横写,志者横排竖写。虽未必尽当,但却抓住了它们的本质区别。《典籍志》也是志,即志典籍也。如何依志书的体例撰写一部《典籍志》?按历史上的朝代,一代一代地写,那是写史的手法。按典籍的传统分类,依经史子集逐类描述,那会变成说书。既不是编制目录,也不是撰写书史;既不是顺时介绍要籍,也不是依类评介要典。推究再三,试依中国化学术传统而志典籍的迭兴;依中国典籍的物质构成而志典籍的制作材料、制作方法和装帧艺术;依中国典籍的藏庋而志典籍的整理、分类与编目;依中国典籍的厄运而志典籍的劫难、散佚。这样是否就是中国《典籍志》的最佳体例?不敢自持。奈前无借鉴,后无参考,冒昧托出,待批评与来者。

第一章 典籍与典籍的产生

中国的典籍浩如烟海，源远流长，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炎黄子孙承继文化传统的重要依据。

第一节 典籍的概念

典籍之“典”，甲骨文作“𠄎”（《殷契拾粹》四五〇）、“𠄎”（《殷契释编》七八四），会意造字，作双手或单手捧册之状。金文的“𠄎”（见“召伯虎敦”）与《说文解字》中的小篆“典”比较相似，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兀上，尊阁之也。”兀是放书几案，将册置于几案上或以手捧册，皆有尊奉之意。《尚书》中有《尧典》，记述了古代君王尧训示臣民的言论和治国的法度，可知“典”是指记载法则、制度的重要文献。“籍”字出现较晚，未见甲骨文和金文，《说文解字》的小篆作“籍”，曰：“籍，簿也，从竹藉声。”即簿册、书册之意。

典籍两字联起来并作为一种名称大概始于战国时期。《孟子·告子下》曰：“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左传·昭公十五年》曰：“昔尔高祖伯廙，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这里的典籍，或指先祖法度，或指国家法则。典籍的合称仍然包括了

“典”的含义,指记载法则、制度等重要的书籍。只是到了汉代以后,典籍才用作各种书籍的统称。《后汉书·崔寔传》称崔寔“少沈静,好典籍”。《三国志·蜀志·谯周传》记载谯周耽古好学,以读书为乐,“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这里所说的“典籍”,便与当今泛指一切图书的意义相同了。

典籍仅仅依靠辞义的诠释自然是远远不够的。要揭示典籍的实质,还必须深入探讨我国古代文献中,典籍这一文化载体的具体构成;认识历史文化发展长河中,典籍这一文化产品所具备的特征。

一、典籍的构成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它既存在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也存在于大量的文化遗存中。而文化载体是多样的,石器、玉器、甲骨、青铜器、秦砖汉瓦、竹简木牍、缣帛纸张都是形态与内涵各异的文化载体。典籍这一文化载体的构成必然具备若干基本要素。

典籍是用文字书写的,因此文字的形成是产生典籍的先决条件。近代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各民族在自己产生繁衍的过程中,储存交流信息的手段大致经历了实物记事、图画记事、符号记事、文字记事等几个基本阶段。当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信息传递与储存的手段已日新月异,不可限量。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来看,汉文字产生以前,也大致经历了以上所说的几个基本阶段。结绳是我国远古先民实物记事的主要形式。《周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周易正义》引东汉郑玄的注释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这些记载说明远古初民曾以结绳作为实物记事的方法来记载史事,传递信息。近代民族调查

报告也表明,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如云南的傩傩族、哈尼族等,仍保留下结绳记事的一些实物。此外,云南佤族还保存了刻木记事的例证,就是在一些长木板上,刻下深浅不同的缺口,表示历年发生过的大小事件,以帮助记忆,再由族中耆老负责解释,代代相传。

我国古代学者很早就认为在文字产生之前,图画曾经起过类似于文字的作用。《易·通卦验》曰:“伏羲方牙、苍精作《易》,无书,以画事。”这就是说,在文字产生之前,伏羲作《易》,是以图画的形象来表达他的思想的。1987年以来,我国考古学者在西北贺兰山东麓发现了岩画一万多幅,刻画上限定在商周时期,其丰富的内容反映了古代贺兰山游牧民族在文字发明之前运用图画记载社会生活和宗教习俗的情况^①。民族学研究成果证明,云南纳西族就使用过图画文字,他们用图画文字书写的典籍至今还有大量遗存。这也证明图画曾是很多种文字产生的前身。

某些图画为更多人所熟悉所共识之后,其笔画结构开始简化,出现了符号。在河南舞阳贾湖地区出土的八千年前的龟甲,其上有契刻的符号;在仰韶文化早期的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一批六千年前的土陶器,表面刻划有几何形符号;在属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遗址出土的一批四千年以前的土陶器,则刻划有象形符号,它们都是我国原始文字的先驱。

在文字产生以前的实物记事、图画记事及符号记事,虽然也能表意,但由于每一独立表意单位的构成繁琐,包含的信息量少,很难表达复杂的事物;更由于实物记事、图画记事和符号记事表意的不稳定性,所以它们不可能成为记录知识信息的理想手段。只有相对成熟的文字,才能准确地代表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为人们共同理解和接受,因此,文字是典籍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① 见《光明日报》1993年8月21日。

记录信息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是构成典籍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文字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典籍的产生。起初,文字写刻在各种材料上,往往只是对一事一物的简单记录,这样的记录材料只能统称之为文献,因为它并未形成某种知识体系。比如,一片龟甲上镌刻的卜辞说:“乙巳卜彀贞,王大令众人曰耆田。其受年?十一月。”^①它的意思是:“乙巳这一天占卜,史官彀问道:商王下了命令,叫平民们一起去种田。有好收成吗?”十一月是占卜的月份。这是一条有关农业生产的卜辞,有时间、人物、事件的记载,可以看出商代对于农业的重视及当时农耕采用了“耆田”即集体耕作的形式。但由于它仅仅是对一时一事的零散记载,所以只能是单篇文献,还不能称之为典籍。这种单篇文献只有在成批汇集、形成有逻辑性的档案时,才具备典籍的性质。

典籍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逐步积累,通过有目的地总结,形成一定的知识体系以后,典籍的产生才成为可能。因此,典籍凝聚知识信息的系统性是与单篇文献的零星记载有根本区别的。

编连成册的形式是典籍构成的第三个重要因素。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引用庄都的话说:“典,大册也。”指出典籍的外部形状是册。“册”在甲骨文中作“冊”^②,象形造字,如甲骨联缀之形。这些都说明自古典籍就有编连成册的形式。

典籍的形式是与内容相互联系的。随着人类对自然与自身认识的深化和发展,文字记录的内容由简单到复杂,独立单位的载体材料已不能容纳逐渐增多的记录内容,于是必须产生集合形式的载体材料来记录有关内容;或者,独立单位的载体所记录的内容必须有意地排列组合,形成有系统的记录内容,这就产生了编连成册的典籍

① 《殷契粹编》八六八。

② 《殷契遗珠》一二〇八。

形式。

特定的事物总是具有特定的形式,典籍正是依靠编连成册的特点而区别于其他文献材料的。单片的甲骨文献与典籍的差别,不仅可以在内容体系上区分,也可在载体形式上区分。

二、典籍的本质

典籍的本质特征是双重的,既有物质属性的一面,又有精神属性的一面。

对于典籍物质属性的规定,来自于记录知识内容的物质载体。文字记录需要能够承载文字的物质,系统的知识存贮、固化在物质载体上以后,再经过编连成册的加工,才能形成典籍。典籍是物化了的思维,凝固的知识,其物质属性是很明显的。作为物质产品,中国典籍的生产随着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典籍的载体材料由最初的龟甲兽骨发展到竹木材料、缣帛材料,再由于纸的发明,大大丰富了典籍的生产;典籍的记录方式由镌刻到书写,再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促使典籍生产有了新的飞跃;典籍的装帧方式也由简单编连到卷轴装,继而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方式的相继演变。典籍作为一种物质产品,其生产与保藏又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安定统一的社会环境,必然会促进典籍的生产、保藏与流传;动乱、分裂的社会环境,必然要影响破坏典籍的生产,造成典籍的流失。

典籍所记录的思想 and 知识,是人脑存贮的外化,因此典籍又具有精神属性的一面,也是精神产品。典籍精神属性的规定,来自于典籍的内容。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的发展是随着人类对自然与自身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展的。我国早期的典籍,大多是“记言”、“记事”一类档案材料,随着古代先民认识自然与社会实践的发展,典籍内容逐渐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丰富,典籍的学科

性和专业性也更为明显，知识的更新，社会的变革，无一不反映在典籍的内容中，影响着各类典籍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的典籍，从诸子书的出现，到儒学著作上升为经学典籍，到史学典籍从经学典籍中分离出来；从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起，到佛道宗教典籍的产生和流传；从《诗》三百到各种体裁的文学典籍；从农、工、商、学、兵到医学、科技等各领域的典籍。只要人们的实践所及，认识所及，就有相关的典籍产生和发展。

然而，典籍作为精神产品，也有其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指的是典籍内容相对实践活动的超前和滞后特征。其超前性表现在有些典籍中记录了有关人类征服自然的预测或幻想，虽然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是不能实现的，但却为后来的科学发展所证实；典籍中也有大量滞后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容，这些内容表现在对于自然现象的幼稚或错误的认识，以及封建思想的糟粕。这些思想和认识，虽然被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证明是谬误的，但作为历史的记录，这些谬误仍随着典籍被保留下来。

典籍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双重本质特征表明，典籍是人类思想认识与物质载体的统一，是人们将系统的思想和认识用文字着附于一定形式材料的产品。

作为人类思想认识的结晶，典籍对于社会进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从典籍的物质属性看，它可以将人们的知识记录下来，提供客观的视觉对象；可以将人们的思维 and 知识凝固在物质载体上，长期保存；可以通过抄写或印刷，不断再现人脑思维的成就，扩大保存和交流的时空余地。从典籍的精神属性看，典籍具有表达思想、交流经验、宣扬主张和传播知识的作用。典籍作为文明发展的结晶，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对同时代的人们来说，是互相表达思想、交流经验的重要工具，是获取知识、陶冶情操、娱乐生活的重要来源。对于后人来

说,典籍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向他们提供了认识历史、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从而获得新发展的借鉴。因此,典籍对于人类文明与进步,有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第二节 典籍的产生

中国典籍浩如烟海,源远流长。《汉书·艺文志序》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所起远矣。”汉朝人认为,伏羲时有龙马出于黄河,身有纹路,伏羲照样描画下来而成八卦。夏禹时有神龟出于洛水,背有文字,大禹据此演为《洪范》,所以《洪范》也称《洛书》。以“河图”、“洛书”来解说典籍的起源,只是古人的一种传说。

关于我国最早的典籍,还有三皇五帝时代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说。《左传·昭公十二年》曰:“楚子狩于州来,左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段文字记载楚王夸奖倚相,说他是个人有学问的史官,能读懂三坟等远古的典籍。西汉孔安国《尚书序》曾解释说,《三坟》是伏羲、神农、黄帝三皇的典籍,“言大道也”;《五典》是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五帝的典籍,“言常道也”;《八索》是八卦书;《九丘》是九州志书。但孔安国并未说他见过这几种书,记录西汉时典籍的《汉书·艺文志》中也无这些典籍的记载。流传至今的古籍中,虽然也有名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典籍,但早已被考定为伪造之书。至于我国远古的“三皇五帝”时代,目前文献考证及考古发掘还不能证明其真实存在,“三皇五帝”时代只是关于我国原始社会军事部落制度的传说。因此,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作为我国典籍之始也是不可信的。这种传说只不过反映了我国典籍产生的

久远而已。

我国典籍的产生是古代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典籍并非某位圣贤的独创,更不是天赐神书,而是古代先民在长期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它的产生是一个过程。由于远古文明初创,记载缺乏,这一过程的具体史实尚不清晰,因此,探寻我国典籍产生的轨迹,还有待于对各种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深入研究。

一、早期典籍的产生

典籍产生的基本条件是要有成熟的文字。在汉字产生的各种说法中,“仓颉造字”说在古代比较流行。《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这里的“书”,指的是文字。东汉许慎进一步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说文解字》序)也只是传说而已,并不一定可信,文字绝不会是由个别人创造出来的,文字产生也有一个过程。当然,不能否认会有个别人在文字产生中起较重要的作用。《荀子·解蔽》中说:“古之好书者众矣,仓颉独传壹也。”荀子认为古来喜好文字的人很多,但都没有传下来。仓颉的字之所以传下来,是因为他对文字进行了统一。这恐怕比较符合历史事实。我国大汶口文化晚期(约前 2800—前 2500 年)出现的一些象形符号,可能已是原始文字的先驱。根据这种推测,公元前 2500 年我国的汉字便进入了形成阶段,但还是不成熟的原始汉字。目前已知最早的较为定型的汉字,是从河南安阳发现的大批甲骨文字。

河南安阳是商王朝后期的都城遗址,这里出土的甲骨,上面刻有文字,这些文字被称之为甲骨文。甲骨指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

骨,有时也用羊、猪或鹿的肩胛骨。这些甲骨多是殷人占卜的遗物。殷商时代,崇拜祖先神和自然神的原始宗教占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因此殷人有疑难事情或进行重大活动都要占卜求神,烧灼龟甲、兽骨以卜事件的凶吉。甲骨上所刻的文字是对占卜的记载,这些甲骨卜辞为后人研究上古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图 1)。

图 1 商代祭祀狩猎的牛骨卜辞

一片甲骨上的文字少则几个或几十个,多则达一百余字。这些卜辞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征伐、狩猎、畜牧、农耕、祭祀及灾害、疾病、气象、地理等方面。全面反映了商代社会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科学史面貌。从实地发掘的情况看,殷人对于某些甲骨的存储是

堆置有序的,有的是以一个朝代的卜辞存于一个窖穴,这说明当时从事记言记事的丞、史在记录占卜情况后,是将卜辞作为档案进行保存以备查检的。这些累积保存的甲骨卜辞可以提供系列的档案材料。

在考古发掘中,还发现有记载卜辞的甲骨数版编连的情况。例如,在安阳小屯村 YH127 坑出土的商王武丁时期的占卜腹甲上,记有“三册,册凡三”一辞,说明这批龟甲原来是有九版集合在一起的^①。董作宾先生在《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中说,有一次他在整理发掘的甲骨时,发现有两块龟版粘在一起,揭而视之,见龟版的尾右角处,有“册六”两字,甲尾的梢上断处有孔,孔已断缺。据此发现,董氏推知此甲是全册的一版,其孔正是为贯穿编连所用。^②

甲骨文书的记录内容与编连痕迹表明,这些档案材料已经基本具备了典籍构成的三要素。这说明在商代的中后期,我国早期的典籍已经产生了。

西周初年,周王室将殷朝遗民强行迁移到洛阳附近的成周进行监管,《尚书·多士》记载了周公对殷民的训话。在这篇诰词中,周公向殷民解释西周灭殷是秉承天命,就像当初殷商灭夏一样,所以殷民不必怨忿反抗。其中有一句话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周公特别强调殷的先人有典册记载殷商灭夏的事迹。按照这段材料推测,商代前期已有典籍,且甲骨文中也出现了“典”、“册”两字,但目前尚无考古实物材料可作确证。商朝开始于公元前十七世纪后期,商王武丁时期约为公元前 1250 年。既然商朝前期便“有典有册”,武丁时的甲骨文又有编连成册的痕迹,据此可把早期典籍的产生定在公元前 1600 年至前 1250 年之间。

^① 李学勤:《关于甲骨的基础知识》,《历史教学》1959 年第 7 期。

^② 见《安阳发掘报告》第 1 期,1929 年 12 月。

二、正式典籍的产生

西周灭殷后,我国古代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活动日趋频繁、政治制度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周公旦制礼作乐,大倡文治。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这是对西周尚文重礼文化氛围的高度概括。

从载体材料上看,西周时期仍有沿用甲骨记录卜辞的习惯。自五十年代以来,相继有周代甲骨的发现,最大的一次是1977年在今陕西省岐山、扶风两县的周原出土甲骨17000多片,其中有刻字的甲骨292片。除甲骨刻字外,青铜器铭文是西周时期文字记载最显著的特点。青铜器的制作,起源于夏商之际,商代前期的青铜器铭文极为少见,如有铭文,一般也仅一两个字。商代后期有铭文的青铜器渐多,但铭文内容仍很简单,主要是记载族名或先人称号,以示纪念。发展到西周,青铜器铭文的字数开始增多,记史的性质逐渐增强,其内容大多有关祀典、策命、赏赐、征伐、记功、法律、契约等。以“大盂鼎”、“大克鼎”、“虢季子白盘”、“毛公鼎”等铭文较长,其中记录周宣王任命毛公为执政大臣的“毛公鼎”铭文最长,共497字。

从文字形态的角度看,西周的青铜铭文,已进入大篆字体的阶段,字形渐趋方整,笔画横竖都较甲骨文更为整齐。根据许慎《说文解字》的记载,西周末周宣王和史籀一同发明了籀书,《说文》中记录了许多籀书的字体,籀书的形成自然受到甲骨文、青铜文字的影响。总的说,随着记载的增多,汉文字在西周时期虽未形成统一使用的字体,但在同源多流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表达功能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足以为正式典籍的产生奠定基础。

从记载的内容上看,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表明,西周时期文字记载的内容已更为丰富。在我国现存最古的典籍《尚书》中,学术界认为

可确信为西周作品的有 15 篇。其中周初八诰(《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记载了西周征服东土、加强对殷民统治的历史事实。这些记载成为学者们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材料。

由于文字记载的频繁,西周时已建立起古代早期的史官制度。《周礼》记周朝设置的史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各有所掌。验以青铜铭文,也有“作册”、“内史”、“作册内史”、“内史尹”等史官。从《尚书》中可看到一些史官的活动,如《洛诰》篇曰:“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这是有关周成王命令史官将祭祀祝词写于典册上的记载。此外,《洛诰》中还有关于周成王对周公后代封赐,由史官“作册逸诰”,进行记录的内容。《顾命》篇中也有“命作册度”之说。《汉书·艺文志》更把周代史官的职掌描述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具体分工。并认为周有采诗之官,负责搜集民间诗歌以备王者“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这些记述虽然未必确切无疑,但如结合《尚书》等文献材料,则可推知西周的文事制度已在逐步完善,这也是早期典籍向正式典籍发展的一个标志。

另外,从有关史料中还可看到西周已有专门负责收藏典籍的史官。《左传·昭公十五年》提到籍谈的九世祖孙伯黶是掌管晋国典籍的史官,以九世一百八十年推算,孙伯黶当是西周后期的人物。《史记》称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谓守藏室之史,也即负责保管周王室典籍的史官。

自周平王东迁洛邑,我国历史进入春秋时期。随着这一时期政治变革的频繁,原来集中在周王室的文化中心开始下移,通过各诸侯国逐渐传递到士阶层之中。日益扩散、活跃的学术文化空气推动了典籍从形式到内容的进步。从孔子整理典籍的事实可以推断,被后世奉为“六经”的《易》、《书》、《诗》、《礼》、《乐》、《春秋》等重要典籍的主体内

容,至少在春秋前期已经形成。

孔子是生活在春秋后期的文化名人,史载孔子创立私学,“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了编写教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对当时已有的文化典籍进行了一番搜集和整理。以“六经”中的《诗》、《书》、《易》、《春秋》来说,《诗》作为一部诗歌总集,在孔子之前就出现了,其中的“周颂”、“大雅”、“小雅”等篇多作于西周,反映了西周的社会生活状况。墨子见过《诗》,他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论语》中,孔子也常提到“《诗》三百”,认为《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生》)。《尚书》的大部分内容也都形成于孔子之前,孔子对《尚书》的整理是“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易》的内容也很古老,相传经的部分是春秋以前产生,传的部分为孔子所作。《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春秋》经,则是周室和诸侯国史书的汇编,它虽按鲁国的历史年代编年记事,但却涉及当时周王室与许多诸侯国的历史。孔子之前,周室和各诸侯国都有史书,这些史书常称为《春秋》,与孔子同时的墨子曾见到百国《春秋》,如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墨子·明鬼》)。晋国的大夫韩起到鲁国见到了《鲁春秋》(《左传·昭公二年》)。《国语·晋语七》曰:“羊舌肸习《春秋》。”《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提议对太子要“教之以《春秋》”。至于“礼”、“乐”,也是在孔子前就已有记载的。《论语·为政》记载孔子比较了夏、商、周三代之礼,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八佾》记载孔子比较了舜的《韶》乐和周的《武》乐,认为《韶》乐尽善尽美,《武》乐尽美而未尽善。

以上事实表明,在公元前 571 年孔子出生之前,古代正式典籍已经产生。如果西周时期是早期典籍向正式典籍过渡的阶段,那么正式

典籍应产生于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570 年之间。所谓正式典籍，除文字、内容、编连方式三要素比早期典籍更为进步之外，主要是指典籍在社会功用上已经脱离了早期典籍简单记录的档案性质，而充分体现了典籍在精神属性上具有表达思想、交流经验，积累和传播知识的作用。

在春秋前期产生的正式典籍，由于文字内容的增多，其载体已不再是早期典籍所用的甲骨材料。《周礼·太史》称：“太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周礼·司民》称：“司民掌登易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礼记》称：“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左传·隐公十一年》曰：“灭不告败，克不告胜，不书于策。”这些记载都间接说明，产生于春秋前期的正式典籍的书写材料是竹质的简、策和木质的版、方。从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记载看，当时正式典籍的载体材料当是编连的竹木简。

第二章 百家争鸣与典籍初兴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变革时期。在历史变革的进程中，学术文化从王室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得到自由争鸣；“士”阶层崛起之后，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宣传各自的学说和思想，开拓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大大推进了先秦学术的繁荣。

伴随着学术文化的繁荣，作为文明记录载体的典籍，必然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一个空前的飞跃，这就是我国古代典籍在战国时期的初兴。

第一节 学在官府与学在四夷

“学在官府”，是春秋以前我国古代学术文化和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清代学者章学诚对于“学在官府”的特征作了详尽的总结和阐述。他在《校讎通义》的《原道》篇中说：

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

他认为古代自从文字和书契产生以后,延自春秋战国之前,我国学术发展史存在一个学术官守,官师合一,私人无著述的特殊阶段。当时“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同的职官掌握不同类别的典籍,因而官守的区分便是各种典籍的自然分类。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也多处阐明了以上的观点,他说:“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文史通义·诗教下》)这些分析虽然缺乏从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角度作多方考察,推理颇为简单,但其立论却是大致正确的。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上看,“学在官府”的形成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我国夏、商、周奴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明当时的土地占有形式不是私人的土地所有制,而是以奴隶主“国有”形式出现的。以天子为首,诸侯、卿、大夫逐级层递的统治集团垄断了社会的生产资料,为了支配劳动力生产,调动国家机器的运转,统治者需要有一定的法规和典章,这便是“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的由来。从掌握国家档案、法典法规这些最初的典籍,到占有其他的社会的文化资料,垄断文化教育。由于奴隶制社会的国家形态还处于较低级的阶段,社会文化还不甚发达,所以奴隶主垄断生产资料的结果,必然导致学术官守的局面。

春秋以前生产力较为落后的状况,也大大限制了学术文化的流传,影响了私人著述的创造。由于“官有其器,而民无其器”,“故在官者以肆习而愈精,在野者以简略而愈昧,此学术之所以多在官也”^①。

^① 黄绍箕:《中国教育史》卷四,清光绪二十八年本。

礼乐器具的缺乏,限制了私家学术研究的开展。另一方面,“策”、“简”、“牍”、“版”等典籍繁重的制作工艺也使民间不敢问津,而“惟官有书,而民无书”^①的状况,则必然窒息民间私学的萌生。

奴隶制的宗法制度,也为春秋以前“学在官府”的不断延续提供了维系的纽带。宗法制度是在血缘关系掩盖下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所谓“明等级以导之以礼”(《国语·楚语上》),实际上是为了明等级、别贵贱,确立和维护奴隶主贵族集团世代相袭的尊贵地位,以加强对平民和奴隶的统治。宗法制度导致在政治上为官者世代为官,世卿世禄;在学术上,官守学业,子就父学,依然学术官守。至于其他阶层的平民,则“其庶人力于农穡,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左传·襄公九年》),世代劳力,无由问学仕进。

从典籍发展史的角度上看,“学在官府”的症结,在于“官守其书”,典籍为官方所垄断而不能流传于民间。章学诚依据《周礼》的记载,在《校雠通义·原道》中进一步描述了春秋以前官守其书的具体情况。他说:“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夫子自谓‘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师弟子之传业,于是判焉。”他指出:孔子以前,我国最早的典籍已出现,并为官府所掌,因此“六经”非孔子所作,而是“官司失守”以后孔子对周官旧典的整理和传述。这种说法,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我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时期。此期,周王室的权力日益削弱,名义上是天下共主,实际地位已形同诸侯小国,《国语·吴语》记载:“周室既卑,诸侯失礼于天子。”在周王室衰微的同时,各国诸侯纷纷超越礼的规范,称王称霸,甚至掠夺周天子的土地和人口,拒绝纳贡。随着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下移,学术中心也

^① 黄绍箕:《中国教育史》卷四,清光绪二十八年本。

开始由周王室分散至各诸侯公室,这是学术下移的第一阶段。此期周王室虽然还掌握着一些典籍和礼乐,但是一些大的诸侯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典籍,控制了学术和教育。“学在官府”由一个中心分散为若干中心。《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观书于太史氏,读《易象》和《鲁春秋》,不禁感叹曰:“周礼尽在鲁矣。”昭公十七年(前525年),邾子给鲁昭公讲少皞氏以鸟命官的典故,于是,孔子向邾子请教官制,“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邾子虽然来自附属鲁国的一个小国,可他却深谙古代典礼。从邾子身上,孔子深切感受到周王室的学术官守终于被破坏,而学术礼制已经流散于四方。

由春秋以前的“学在官府”到春秋中后期的“学在四夷”,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经历了一次变迁。从这一阶段的变迁中可以看到,由于学术中心下移,不仅典籍的数量逐渐增多,而且官守典籍的封闭格局也被逐渐打破,周王室和诸侯公室的藏书开始对他国贵族和学者开放。典籍流传范围的拓宽,推动学术下移不断向纵深发展,昭示着我国学术文化繁荣和典籍初兴时期的到来。

第二节 士阶层的形成与百家争鸣

学术下移的第一阶段,只是由周王室下移诸侯公室,尚未彻底摆脱官守学术的格局,还没有引起当时学术文化和教育的突变。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学术下移进入突破性的第二阶段,“礼下于庶人”,学术文化从王室公侯彻底解放出来,为士阶层所掌握、推广和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波澜壮阔的文化变迁中,士阶层既充当“学术下移”的先锋,又是百家之学兴盛繁荣的社会基础。

“士”原是西周奴隶主贵族中最低的等级,他们没有丰厚的家产,

但却受过“六艺”的良好教育，他们有的依靠武艺充当军队的下级军官，有的依靠知识作为卿大夫的家臣。春秋之际，由于奴隶制度的逐步瓦解，士原来的地位也被动摇，他们失去了“食田”和原来的职守。《论语·微子》记载当时鲁国一批宫廷乐官流散四方的情况说：“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这些丧失世袭特权、流入平民阶层的士，不得不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位置，有的参加政治活动，投靠新的主人，谋得一官半职；有的凭借六艺知识兴办学校，成为私学的教师。在齐国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便是由贵族没落为士，在“贫困”的情况下投靠齐桓公的。齐国在春秋时期最早选士用士，齐桓公采用“三选”之法，主张“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之”，他养“游士八十人”（《国语·齐语》），充分利用士的智慧和才谋，成为春秋的第一个霸主。参政从政，这是春秋时期士阶层谋求出路的一条途径。

另一方面，一些经过“六艺”熏陶的士，则利用自己的知识，聚众讲学，成为一代名师，他们直接推动了官府学术下移和私家学术的兴起。孔子就是这批人物中的杰出代表。他生活于春秋后期，祖先本是宋国贵族，曾祖父因避难，从宋国逃到鲁国定居，至孔子的父亲孔纥，已没落为士阶层，孔子自称“吾少也贱”（《论语·子罕》）。他虽然没有资格进入官学，却到处寻师求教，通晓了诗、书、礼、乐等一整套文化知识，在私学——包括私家学术和私人教育这两个方面作出了非凡的贡献。他三十岁左右开始讲学，中途虽然也寻找机会参加政治活动，但却不甚得志，六十多岁以后专力从事讲学和整理古代文献，成为春秋时期伟大的学者和教育家。春秋后期，士阶层中兴办私学的人不止孔子一个，例如当时郑国的邓析，据说他“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荀子·非十二子》），他写了一本叫《竹刑》的法律书，专门教人“学讼”。还有鲁国的少正卯，他和孔子一样在鲁国办学，由于博学善辩，

曾多次把孔子的学生吸引过去,以至于“孔子之门,三盈三虚”。^①

进入战国时期以后,我国奴隶制逐步向封建制过渡,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士阶层获得了新的发展。在列强纷争的形势下,各国诸侯从巩固自己政治权力的需要出发,纷纷“招贤纳士”,养士之风形成高潮。当时的秦穆公、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梁惠王、燕昭王等国君,都曾广招天下之士;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秦国的吕不韦等卿相,养士皆以千计。所谓“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说明当时社会舆论已经以“士”的聚散来衡量一国政治的得失兴衰。特殊的历史条件,为士阶层的崛起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他们思想解放,少有顾忌,敢于“说大人,则藐之”(《孟子·尽心下》),敢于公开表示“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畏彼哉!”(《孟子·公孙丑下》)养士用士制度,给士阶层的智慧和才能提供了驰骋的机遇。于是“处士横议”,学派蜂起,诸子之学骤兴,他们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思想倾向,阐发各派学说,既互相辩论,又互相补充,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大大推进了战国时期学术文化的发展。

“诸子百家”,通常指春秋战国时思想领域内代表各学术流派的思想家及其著作。《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五蠹篇》都曾对诸子百家进行过论述。西汉初司马谈作《论六家要指》,将诸子百家概括为儒、墨、法、名、道、阴阳六家;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和东汉班固,则总结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除外,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这便是所谓的“十家九流”,应该说,九流确实是代表春秋战国时学术文化的重要流派。

其中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他总结整理了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化

^① 王充:《论衡·讲瑞》。

典籍：《诗》、《书》、《易》、《礼》、《乐》、《春秋》，这些典籍后来成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孔子创办私学，一生四处游说，他的学生把他的言论汇集成《论语》一书。孔子的全部哲学思想体系中，有许多言论含义深刻而光辉，但其思想倾向是比较保守的。他十分向往周礼，虽然社会向前发展而使周礼崩坏，他仍主张“克己复礼”。除礼之外，他讲得较多的是“仁”，“仁”是一种道德，他谆谆告诫各阶层的人们要遵循这种道德，完成仁和礼的结合，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孔子以后的儒家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的孟子和荀子。孟子一生也是在游历和教学中度过的，《孟子》一书记录了他的主要言论。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主张王道和仁政，抨击当时一些诸侯的暴政和霸道。孟子比较注重民众的力量和地位，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较晚于孟子，他的学说保存于《荀子》一书。荀子的思想已突破了孔孟思想体系，虽然仍以儒家为主，但已吸收了法家、道家的学说。他讲仁义、王道，但不反对武力和霸道；他讲礼义，但也注重法度。儒家学说是当时较大的一个流派，东汉班固承西汉刘向、刘歆之作，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孔孟、荀子著述及《晏子》、《曾子》、《子思》等先秦儒家著作 33 种。

墨家是当时另一个大的学派，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的创始人墨翟生活于战国初期，他的《墨子》是墨家思想的代表作。墨子和他的学生都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他提倡非礼、非乐、节葬、节用、兼爱，与儒家思想形成对立。墨子还主张尚贤，选举能人管理国家；主张尚国，建立贤人统治的政权。墨子学说反映了当时手工业劳动者的思想和要求，他们的著作在天文、物理、数学方面有较突出的成就。《汉书·艺文志》保留《墨子》及《尹佚》、《田俅子》等 6 种先秦墨家著作。

道家的创始人是春秋中期的老子，反映老子思想的著作是战国时人编纂的《道德经》。老子首先提出了“道”的概念，他还认为事物矛盾对立的双方“相反相成”，可以互相转化，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道家学派在战国中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子，他的《庄子》一书发展了道家学说。道家的思想体系十分博大，但主要是“道为万物本源”的观点和“清静无为”的观点。道家的“道”是一个很玄妙的概念，老子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就是道。道家的无为观对后世也影响很大，有的用它来规劝那些好大喜功、挥霍民力的统治者，有的把它作为清高无为、孤芳自赏的精神支柱。《汉书·艺文志》中记载老庄著作及《伊尹》、《鬻子》等先秦道家著作 34 种。

法家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时的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商鞅讲法，著有《商君书》；申不害讲术，他所著的《申子》已经失传；慎到讲势，其著作《慎子》仅存四卷；韩非著《韩非子》一书，洋洋十万余言，集法家之大成，主张法、术、势三者并用，以达到强权富国的目标。韩非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以法为教”，“明其法禁，必其赏罚”等，主旨是要加强君主的集权统治，以便控制国家机器的运转。《汉书·艺文志》录入商、申、慎、韩的著述及《李子》等先秦法家著作 9 种。

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的邹衍，《汉书·艺文志》著录他的著作《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今已失传。邹衍将我国早期的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在一起，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来说明事物的构成，以“相生相克”来说明万物的运动。阴阳五行学说中包括某些科学的思想方法，成为推动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积极因素，尤其是表现在中医学方面。但阴阳五行学说也有其怪诞荒谬的一面，比如用“五德终始说”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又如后世不少迷信观念，也可以从阴阳五行中找到它们的思想根源。《汉书·艺文志》中保留了先秦阴阳家的著作 16 种。

名家的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的惠施和战国后期的公孙龙。名家强调“指名控实”，注重讨论名与实即概念与事实的关系问题，他们对古代逻辑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惠施主张“合同异”，认为一切差别、对立都是相对的，他的著作《惠子》已经失传；而公孙龙则认为“离坚

白”，强调概念的规定性和差别性，以区分个别与一般，他的著作《公孙龙子》流传至今。《汉书·艺文志》中还著录了其他5种先秦名家的著作。

纵横家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时的张仪、苏秦。纵横家多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他们分别主张“合纵”或“连横”。流传至今的《战国策》有不少内容反映了纵横家的思想，近二三十年来考古发掘了一批有关纵横家的材料，已编成《战国纵横家书》，集中了先秦纵横家的一些思想和言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苏子》、《张子》等5种先秦纵横家著作，都未能流传至今。

农家是战国时反映农民思想和农业生产的学派，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的许行。他主张君民同耕，反对不劳而获，表达了古代社会中农民的理想。《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神农》、《野老》两种先秦农家著作久已失传。

杂家指战国末综合各家学派的一些学者，他们“兼儒墨、合名法”。杂家的出现，体现了诸子百家争鸣交汇的动向，也反映了政治上诸侯割据走向全国统一的趋势。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是杂家的代表作，《汉书·艺文志》还著录了《尸子》、《由余》等7种先秦杂家著作，但已大多亡佚。

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运动中，士阶层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们胜利完成了双重的历史使命，一方面将紧锢于官府的贵族文化和典籍彻底解放出来，通过对原典的整理和传播以及聚徒讲学等形式，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持续发展准备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对当时庶民阶层及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各种精神文化进行科学的总结和提高，他们著书立说，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和哲学思想等各个领域奠定了理论基础，形成了各门学科的雏形，他们在我国典籍发展史和学术发展史上都占有光辉的篇章。

百家争鸣的文化运动,为典籍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知识源泉;活跃的学术气氛,诱发了士人学者著书立说的巨大热情;而典籍的不断产生和流通,又反过来推动了学术思想的传播和繁荣。这种不断的相互促进,势必带来战国时期我国古代典籍的初兴。

第三节 战国时期的典籍初兴

战国时期,我国古代典籍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在典籍的整理、编撰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跃进。

典籍从“学在官府”中解放出来之后,经过当时学者的整理和加工,得以广泛流传。孔子在整理古文献的工作中贡献颇大,早期的《诗经》和流传至今的《诗经》相比,有不少差异。考查《墨子》书中所引的《诗》十首,不见于今本《诗经》的有四首,基本相同的有一首,其他几首各有不同。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诗经》是孔子从“诗三千余篇”中“去其重”而编成的。原《诗》有三千余篇,不免夸大,但是原《诗》也确实不止现有的三百余篇。《墨子·公孟》篇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还说儒者“弦歌鼓舞以聚徒”(《墨子·非儒》)。可见原《诗》的数量本来多于三百篇,现存《诗经》是经过孔子及战国时期的儒家整理、编辑以后流传下来的。

春秋战国时的《书》,是指自古相传的历史文献总集。流传至今的《尚书》,由西汉初儒家伏生所传授。司马迁说《书》出于孔子“编次”,但是看来自孔子之后战国时期对《尚书》仍有不断的整理补充,因为其中的《尧典》、《禹贡》等篇章无疑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六经中的《礼》书,主要指《仪礼》,《仪礼》十七篇,是春秋以前贵族主要礼仪的汇编。唐代学者孔颖达、陆德明等认为《仪礼》是周公所作,清代学者邵懿辰、皮锡瑞认为是孔子所订,而另一位清代学者崔

述在《读风偶识》卷一中则认为是“作于战国之世”。从近世考古发现的器物和反映的制度上来看,《仪礼》上所记载的丧葬制度很多属于战国初期的制度,尽管在此之前该书已有一些内容产生,但可以认为它是在战国时期经学者编辑加工而成的。^①

《周礼》也是一部重要的礼书,它记载了周代职官和有关典章制度。郭沫若先生从考察西周青铜器铭文的角度,杨向奎先生从分析《周礼》中经济制度、政法制度、学术思想的角度,都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代。《周礼》的内容比较复杂,其中也有一些早于战国的有价值的古代史料,它是战国学者以西周、春秋时的制度为基础,经过编辑加工成书的。

此外,“六经”中的《易经》、《乐经》、《春秋》,也是经过春秋末期、战国时代的学者整理加工而流传下来的。古代典籍的整理和传播,仅仅是战国时期典籍繁荣的一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有大量新著述的出现,诸子百家在学术争鸣过程中撰写了大量代表各种学派的著作,从《汉书·艺文志》记载中看,先秦诸子流传至汉代的典籍已有一百一十多种,而当时出现的诸子著作必然还不止于此。

除了诸子著作外,战国时代还有大批史书问世。史官制度远在商周时代已经出现,战国时各国诸侯沿用过去的史官制度,都设有史官记载史事。晋代在汲县战国魏墓中发现的《竹书纪年》,便是当时魏国史官的著述。西汉司马迁著《史记》,曾利用秦国史官著作的《秦记》编《六国年表》,他说:“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史记·六国年表序》)《竹书纪年》和《秦记》都是编年体史书,其他各国也应有这类史书出现。除了编年体大事记,各国还有一些专门记录贵族言论的史书,叫做《语》,《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论述教导太子应“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此

^① 参见陈公柔:《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载的丧葬制度》,《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外,又有一种记录贵族宗谱的史书,叫做《世》,《国语·鲁语上》说:“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史记·赵世家》集解引《世本》有“今王迁”一句,赵王迁是赵国末代国君,这说明《世本》中有战国时赵王的《世》。《世本》是当时各国《世》的汇编,西汉刘向曾作校定,后来散佚,流传至今的辑佚本《世本》,其中有的内容已不真实。

战国时编写的史书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三书最具代表性。《左传》本称《左氏春秋》,后称《春秋左氏传》,这是汉代人将它和《春秋经》结合起来的成果。其实《左传》的本来面目是《左氏春秋》,它是与《春秋经》有联系、又独立的史书,并不是专对《春秋经》的解释,只是在汉代尊经的条件下,才被改定为《春秋经》的传。以前传说《左传》为春秋末期的左丘明所作,唐代以后,不断有学者考证反对这种说法,当代学者童书业、杨伯峻、刘大年皆认为《左传》的作者不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其成书年代应在战国前期。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一书,从《左传》表现的社会生产、政治制度、文化形态、作者的学识观点及书中对史事的预言,对《左传》的成书年代作了研究和推断,认为《左传》多预言,“最晚一事为僖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僖三十一年(前629年)下数三百年为魏惠王后元六年(前329年),此时正有子南劲取卫之事,余所为预言亦多应验于春秋末至战国前期,然则本书当即在战国前期大体写定。”这是很符合实际的,因为生活在战国前的人不可能预言战国之事而屡屡应验。《左传》在战国时已流行,《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都曾引用《左传》的史实和文字。《左传》全书约十八万字,记述了春秋时期前后二百五十余年间周王室和各国诸侯的历史,是一部重要的史书。

《国语》是各国语书的合编,由八个部分组成,即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主要记录上起周穆王征犬戎(约前967年)下迄智伯灭亡(约前453年)约五百年间八国君臣谋议的对话。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认为

左丘明是《国语》作者。现代学者根据《国语》所反映的思想及记载有些诸侯国的疆域,认为其形成时期不能早于战国中期,同样是战国时成书的一部重要史著,可与《左传》的春秋历史研究互补。

《战国策》明显为战国时人所著,它以收藏战国时期游士的说辞书信为主。由于当时游说之风盛行,游士需要掌握一定的材料以供揣摩学习之用,于是有人便集合有关说辞书信编成各种形式的书录,“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①,西汉刘向整理典籍时,将这些性质相同的书策编定为一书,称之为《战国策》。这部书记载了战国时代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互相辩论时所提出的主张和策略,反映了当时各个重大历史事件和各国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时的文学创作也很发达,许多诸子著作都是优秀的散文,《左传》、《国语》在叙述事件、描写战争、记述人物对话时,也有很高的文学技巧。战国时楚国诗人屈原首创楚辞,他的《离骚》等优秀作品流传至今。屈原以后,楚国又有宋玉、唐勒、景差等诗人继起创作楚辞,他们都有作品流传后世。战国末年的大思想家荀子还创造了“赋”这种文体,他的《成相篇》、《赋篇》对后来的汉赋有不少影响。战国时还有许多故事、寓言的创作,诸子百家在争鸣的过程中,往往引用当时流行的故事或寓言来证明自己的学说。晋代从汲县战国魏墓中出土的《穆天子传》,就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方面也产生了医书《黄帝内经》、药书《本草》等医药著作。此外,在天文、历法、农业、畜牧等领域,也有专著出现。

综上所述,战国时代我国典籍事业在各个方面已初具规模,战国时典籍的初兴,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也为后世留下大批宝贵的文化遗产,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① 刘向:《别录·战国策叙录》。

第三章 学术文化发展与典籍迭兴

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可以上溯四千余年，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朝的建立；中国的学术发展如从西周“学在官府”算起，也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

这三千年的学术传统，宛如滔滔长江，源远流长而接续不断；犹似浩瀚大海，汇集百川而兼容并蓄。因历史的悠久和强大的兼容力，使我国的学术文化博大精深，集中反映我国学术文化的典籍也浩如烟海。

继春秋战国学术繁荣发展之后，汉代刘向、刘歆曾将古代典籍概括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略”。此后，学术文化典籍的分类历经各种新的组合与分化，逐步形成了以经、史、子、集四部为主导的分类体系。

为叙述方便，本志从现代学术文化概括的角度，将数千年学术文化与典籍大致归纳为经学、史学、文学、佛教、道教、兵家、科技、小学、类书、丛书等十个方面，概述各类学术文化传统的发展及其典籍的迭兴。

第一节 独尊儒术与经学典籍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思想,视儒家学说的一批代表性著作作为指导一切政治思想、文化学术和社会意识的经典,因而把这些重要的儒学典籍称为“经”,把研究和阐发儒学经典的学问称作“经学”。

形成儒家学说的《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部典籍,是儒家创始人孔子在整理古文献的基础上编定的,它们作为孔子私学的教材流行于春秋战国之际,这就是后来人们盛称的“六经”。“六经”之名在战国后期始见于《庄子·天运篇》:“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战国时期,“六经”代表儒家全部思想内容的地位已经形成,但当时儒家学说还未成为全社会所承认的统治思想,“六经”也未成为社会意识所尊崇的经书。儒家的“经”被解释为“常”,即天经地义、永不改易的常道,是从经学确立以后才开始的。

一、经学的确立与经学典籍的发展

经学确立于西汉前期。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秦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经济政策上注意休养生息;文化政策上注意百家并存,讲求黄老刑名,无为而治。这种政策后来导致吴楚七国之乱。武帝雄才大略,要求在政治上大一统,有为而治;思想上要求集中,积极治世。儒家思想正适合他的需要,所以他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儒家学说奉为官学。武帝时“独尊儒术”的主要措施是在太学中设立精通儒学经典的经学博士,向各地推荐来的“博士弟子”和“如弟

子”传授儒学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这些学生每年经过考试,学习合格者均被委以官职。由于统治者的竭力提倡,再加上有利禄为饵,于是天下之士闻风而起,阐释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由此确立,儒家经典也成为代表永恒真理的经书,高居于各类典籍之首。春秋战国时的“六经”,历秦代焚书之劫,其中的《乐经》已亡佚不传,汉代虽然仍有“六经”、“六艺”之称,但《汉书·艺文志》中“六艺略”所载仅是《乐记》,已非《乐经》。所以汉武帝立于学官者,仅设“五经”。

儒家经典被立为经书以后,由于传本各异,引起了经学的一些纷争。当时立于官学的五经博士,所授经书均是口耳相传后在汉初用通行的隶书写成的,故称“今文经”;另外,民间又流传一些从地下或墙壁中挖掘出来的古本,是用先秦六国文字书写的,称为“古文经”,如鲁恭王从孔子宅壁中发掘出来的《礼记》、《孝经》、《尚书》、《论语》,河间献王挖掘出的《周官》、《礼经》等。这两种传本原只是记录文字的不同与内容的稍异,后来却形成两个学术上互相对立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他们各立师法,标榜门户,在对孔子和“五经”的看法上,在经书内容的解释上,在研究原则和方法上都有很大的分歧。一般说来,今文经学较注重于阐发经书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注意对经书的文字训诂。今文经学在西汉立于学官,故盛行西汉。古文经学在东汉则由于贾逵、服虔、马融、许慎等古文大师的推行,终于压倒官学而兴盛起来。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独树一帜,他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贡献颇多,成为汉代经学集大成者,世称“郑学”。郑学的出现,结束了今古文水火不容的局面,而使今古文的纷争暂时平息下来。

汉代经部典籍在经学确立后便得到迅速发展。首先,两汉今古文经学家都从各自的角度阐经、解经,各种注经著作的出现,大大丰富了经部典籍。其次,从西汉开始,除列入学官的“五经”外,古文经学者

发掘了一批重要的儒学典籍,如《春秋左氏传》、《周官》、《逸礼》、《古文尚书》等等,为尔后经书范围的扩展及各经的补充奠定了基础。此外,在东汉,由于统治者“尊孔”以及标榜“以孝治天下”,在“五经”之外又加入《论语》、《孝经》,于是经书系统便由“五经”扩大为“七经”。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战乱,使经部典籍蒙受不少损失。西晋永嘉之乱后,西汉五经博士所传今文经几乎全部散亡,只有自东汉兴盛起来的古文经流传下来,南北朝通行的《毛诗》、郑注“三礼”、杜注《春秋左传》都是古文经。在经学领域,由于长期社会动乱的影响,文人士大夫中滋生了悲观厌世的情绪,他们把老庄道家的虚无思想同儒家的孔孟之道糅合在一起,宣扬无为而治,以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出现了所谓“贵无”的玄学。曹魏时的何晏作《道德论》、注《论语》,王弼注《老子》、《易经》,就是提倡这种虚无思想的代表。魏晋南北朝的经学玄学化,是当时经学发展的重要倾向。

唐朝统一全国后,为了解决南北朝以来儒学多门、经分南北、既不利学者又不利考试的问题,在唐太宗时,诏令孔颖达与诸儒对过去的各种经说进行整理、划一的工作,编撰《五经正义》一百八十二卷,作为明经考试的依据。孔颖达的《五经正义》调合了今古文学和南北朝的南学、北学,其中《周易正义》十六卷用曹魏王弼注,《尚书正义》二十卷用西汉伪孔安国传,《礼记正义》二十卷用东汉郑玄注,《毛诗正义》四十卷用西汉毛公传、郑玄笺,《春秋左传正义》三十六卷用西晋杜预注,最后孔颖达等再以所撰“正义”对经书及旧注作进一步的解释。由于唐代科举的需要,在《五经正义》的基础上又加贾公彦疏的《周礼》、《仪礼》,杨士勋疏的《春秋穀梁传》,徐彦疏的《春秋公羊传》,形成了由唐人义疏的《九经正义》。唐“五经”、“九经”扩大了经书的范围,一些原来作为经书“传”、“记”的典籍,如《春秋》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仪礼》的《礼记》都升格为正经;《周官》也从一般儒典改称《周礼》,加入了经书系列。到唐文宗时,经书范围又有扩大,太和

七年(837年),唐文宗下令将九经及《论语》、《孝经》、《尔雅》都刻在石碑上,这就是保存至今的“开成石经”。至此,经书系统发展为“十二经”。唐代统治者对经书范围的扩充,唐代学者对经书的义疏,使汉以来对诸经的看法和解说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进入宋代,传统经学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宋儒抛弃汉唐以来传统的训诂、义疏,直接从经书原文中阐释义理性命,因此宋学被称为“性理之学”,简称“理学”。理学的创始人是北宋的周敦颐及程颢、程颐兄弟,而南宋的朱熹则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看作是理学的经典,合称“四书”,并为各书章句集注。他的《四书集注》在后世影响极大,元明清三代皆以此作为科考的标准答案。有宋一代理学盛行,但科考仍奉行传统经学,因此秉承汉唐经学的义疏仍有发展,经书系统在唐代十二经之后,又有扩充。北宋仁宗时镌刻“嘉祐石经”,又加入《孟子》一书,从此儒学经典形成“十三经”。南宋光宗时,有人将十三经及当时认为较好的注、疏、正义合刻在一起,成为《十三经注疏》,它包括:

《周易正义》十卷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二十卷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七十卷 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四十二卷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五十卷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六十三卷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 晋杜预集解,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穀梁传注疏》二十卷 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二十卷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九卷 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十四卷 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尔雅注疏》十卷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十三经注疏》凡四百十六卷,汇集了全部儒家经典,保存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汉晋古注和唐宋义疏,因而自形成以后便受到重视。明清两代,皆曾由皇帝敕版刻于太学,民间也有多种刻本流传,清代阮元的校刻本可谓各本中的善本。经学发展到宋代,经部典籍中的核心——“十三经”已经形成。这些经书,是垄断两千年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纲领,是封建文化的主体,十三经经典地位的最后形成,既是历代统治者的需要,也是经学不断发展的结果。

宋代兴起的理学,在元明两代的经学领域中一直占统治地位。明代的理学极盛,永乐间胡广等奉敕编《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特别是《四书大全》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因而在经学著述中对“四书”的注释、辨订、讲章之作也越来越多。宋明理学到明后期逐渐流于空疏,清初自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起,就一反明儒束书不观、寡学空谈的弊病,大力提倡实用之学,于是考据学兴起,清代经学盛行继承汉学、注重训诂考证之风。清代考据学在考订经书、名物训诂、音韵字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不仅对前代注经典籍作了大量整理工作,同时遍注群经,“十三经”在清代皆有新疏一种或数种,清代经学方面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道光间,阮元编的《清经解》一千四百卷,选书一百八十多种;光绪间王先谦编的《续清经解》一千四百三十卷,选书二百零九种,可大致反映清儒治经的成果。

二、经学典籍的主体——“十三经”

经学研究的核心是被历代儒者奉为经典的“十三经”,宋明理学虽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为重,但《大学》、《中庸》终归是《礼记》中的篇章,《论语》、《孟子》也在“十三经”之内,因而经学的主要典籍仍为“十三经”所包括。两千余年的经学史,大致是围

绕着这十三部经书的确立、考订、阐发和注解不断延深、反复纠辩、曲折发展的。十三部经书是经部典籍的主体,其他浩繁的经部书籍,都是由此而派生的著述。因此,了解“十三经”是把握经部典籍的关键。“十三经”中各经的大致情况如下:

(一)《周易》

全文二万四千余字,原称《易》,又称《易经》,本是占筮书,后被儒家奉为讲究哲理的经典。相传古代占卜用的易书本有三种:一种是夏代的易,叫《连山》;一种是商代的易,叫《归藏》;一种是周代的易,就是现存的《周易》。前两种已经失传,而《周易》则流传至今。《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把这两种符号迭列三层,如☰(乾)、☷(坤)等,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称为八卦;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迭,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每卦又有六爻。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分别阐述各卦各爻的意义,卦辞和爻辞是《周易》的经文。许多研究《周易》的学者认为卦辞、爻辞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因为它所记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初的史实,但无后代任何色彩。

除卦辞、爻辞外,还有《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解释经文的传,合称“十翼”。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十翼对《周易》经文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原意,因此不能依赖它们去理解正文。

研究《周易》的“易学”历来有两派,一派重象数,卜筮灾异,如汉代的易学;一派重义理,阐发思想,如三国时王弼的易学。

(二)《尚书》

全文二万五千余字,原称为《书》,是夏、商、周时代一些历史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后来成为儒家宣扬二帝、三王及周公、孔子治道的圣典。《尚书》的内容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尚书》为西汉初山东伏生所传,共二十八篇。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用周秦六国

文字书写的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在汉朝未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賾根据一些散逸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他又吸收了原今文《尚书》，将其离析为三十三篇，两者拼凑，以符合刘向、郑玄校注的古文《尚书》五十八篇之数，向朝廷呈献。梅賾所献的古文《尚书》，收在如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合并的。因此，现传《尚书》，只有今文才是真本，古文则是梅氏伪造的。《十三经注疏》中还有梅賾伪造的《尚书孔氏传》十三卷，说是西汉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梅氏编选的这些伪书，直到清代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时才被彻底揭穿。古代对《尚书》的研究，除了《十三经注疏》中的注疏外，宋代蔡沈的《书集传》也是《尚书》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诗 经》

全文三万九千余字，原称《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类，其中有庙堂之诗，卿大夫之诗，也有民歌，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叶。春秋战国时，诸子各家都曾习《诗》用《诗》，但各家相比，以儒家对《诗》的整理水平最高，传授最成系统，《诗》渐渐成为儒家专门的经典。《诗经》在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传授，前三家属于今文诗学，立于学官，但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亨、毛萇所传的毛《诗》属于古文诗学，流传至今，共三百十一篇，其中六篇仅存篇名而无诗文。历代《诗经》学研究的成就，除《十三经注疏》中的毛传、郑笺、孔颖达正义外，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清代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王先谦的《三家义疏集》等，成就也较突出。

（四）《仪 礼》

全文五万七千余字，原称《礼》，汉代又称《士礼》、《礼经》，晋代以

后称《仪礼》，它是现存最早记载古代礼仪的书。《仪礼》成书于东周时期，但书中所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在此书之前就存在了。孔子办私学时，通过对古礼的整理编辑形成了《礼》的教材，礼是孔子讲学的重要课程，也是儒学的重要内容。

西汉初，由鲁高堂生传下《仪礼》十七篇，在西汉中分为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立于学官。1959年在甘肃武威发掘出汉代抄在木简上的《士礼》多篇，属庆普传本，为研究《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流传至今的《仪礼》是由东汉郑玄注释的刘向《别录》本，其篇目与西汉学官的《仪礼》相同，都是十七篇，包括士冠礼、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覲礼、丧服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五十六篇，是古文《礼经》，其中有十七篇与今文《礼经》基本相同，另外三十九篇汉代称为《逸礼》，已经失传。《仪礼》研究，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贾疏外，南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释》、清人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凌廷堪的《礼经释例》、胡培晕的《仪礼正义》，都是较重要的著作。

（五）《礼记》

全文九万九千余字，又名《小戴礼记》。先秦礼学家们传习《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是对《礼》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和补充。西汉时《礼经》立于学官，礼学博士在讲《礼经》时也选用一些“记”作为辅助教材。东汉中期，注讲《礼经》的“记”只存两种：一是戴德选辑的八十五篇本《大戴礼记》；二是戴圣所编的四十九篇本《小戴礼记》。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于是传习它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礼记》。由于郑玄也给《仪礼》、《周礼》作注，所以三书并称“三礼”。

东汉以后，《礼记》的地位逐步上升，这是由于《仪礼》仅仅记载了

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的意义和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更利于统治者发挥和利用。于是到了唐代,《礼记》从原来经传的地位升格为正经,并代替《仪礼》进入唐代“五经”。

《礼记》作为一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有不少内容是专门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等,这些篇章探讨了制礼的深义,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有些篇章谈到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王制》、《礼运》;有的篇章讲人生哲学和道德修养,如《大学》、《中庸》和《儒行》;有的篇章借孔子之名阐述儒家理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还有讲教育的《学记》,讲音乐的《乐记》。此外,有不少篇章是杂记各种礼制、礼仪规则及丧服丧事的。除《十三经注疏》中对《礼记》的郑注、孔疏外,注释《礼记》较有名的著作还有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孙希旦的《礼记集解》。

(六) 《周礼》

全文四万五千余字,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述政治制度的书,由战国时期的儒者以周王室及春秋各国的官制为基础,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论,设计了一套理想化的制度作为全书内容。《周礼》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部分,其中“冬官司空”已亡佚,汉人用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全书记载三百多种职官,并对其职掌作了介绍,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周代政治制度的如实记录,因此《周礼》仍是研究古制的重要典籍。

据《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记载,西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在民间搜集到古本《周官》,因此《周礼》属于古文经书,汉末立于学官。《周礼》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和贾疏外,清代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研究此书的重要著作。

(七)《春秋》及三传

“春秋”曾作为东周各国国史的通称,现存《春秋经》是东周时鲁国国史的专称。它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二百四十四年的鲁国历史。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修订和整理,列为“六经”之一,作为在私学传授历史知识的教材。《春秋》经文对史事的介绍十分简短,全书不过一万六千余字,所以分别出现了一些解释《春秋》的“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解释《春秋》的有五家,即左氏、公羊、穀梁、邹氏、夹氏。但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实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著,在司马迁《史记》中称为《左氏春秋》,东汉班固作《汉书》才使用《春秋左氏传》的名称。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它和《公羊传》、《穀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事实上,《左传》是参考《春秋》经而作的史著,并不单为解释《春秋》。西汉时,《左传》作为古文经,一直在民间流传,未立于学官,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汉书·刘歆传》),并力争将《左传》立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博士的反对,理由之一就是它不传《春秋》。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后,才将《左传》拆开附于《春秋》各条经文之下,合为一书。两书合并后,可看出《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经多出十七年。合并后的《春秋左氏传》中还有不少“无经之传”,则原《春秋》不载而《左传》有文。以隐公元年为例,经有七条,都有“传”;“传”有十四条,其中七条是“无经之传”。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叙事为主,而《公羊传》、《穀梁传》则以释经为主,叙事极少,因此后两传不能作为史书,而只能作为纯粹的经书来读。汉代《公羊传》和《穀梁传》都立于学官,属今文经,汉代以后儒者常利用此两传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这两部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经学史、思想史上也具有很大影响。

(八) 《论语》

这是一部记载孔子和他少数学生的言论行事的书。“论语”一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说明《论语》在西汉以前就已流行。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论语》是在孔子身后由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将平时的记录汇集而成的。它在西汉时还被看作是传、记一类著作，只作为经书的辅翼。东汉以后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论语》全书一万二千余字，分二十篇，书中保存了孔子大部分丰富的思想内容，是研究孔子及孔门弟子的必读书。西汉流行的《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三家，前者属于古文经学，后两者属今文经学。自汉代开始，《论语》就受到高度的重视，历代研究著述层出不穷，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集解和邢昺疏，还有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刘恭冕的《论语正义》。

(九) 《孟子》

这是一部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门人弟子相互问答的记录。《孟子》一书主要由孟子的门人万章、公孙丑两人所记，孟子本人亲自润色过，成书于战国晚期。全书三万四千余字，分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每篇又分上下。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凡十一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篇》说：“孟子著书十一篇，七篇为中，四篇为外。”与应劭同时的赵岐认为外书四篇文义肤浅，怀疑是后世伪作，因此他作《孟子章句》只作内书七篇。后来，赵岐作注的七篇流传下来，而外书四篇则逐渐亡佚了。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样，仅被看作是传、记类著作，直到宋代，才被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之中，《孟子》一书是最后进入“十三经”的。它反映了孟子系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观，其中“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重民思想非常可贵，而明太祖朱元璋则对此极为不满，他下令删节《孟子》中有关重民内容的章节八十五条，书称《孟子节文》，并不准士人学习这些删掉的内容。

对《孟子》的研究从汉代就已开始,《十三经注疏》中赵岐的章句和孙奭的正义是重要成果。此外,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则被推为清代注《孟》书中最高水平的著作。

(十)《孝经》

今传《孝经》一千七百余字,分十八章,是“十三经”中最短的一部。基本内容是讲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等各类人如何行孝,由讲孝进而劝忠。《孝经》在东汉时被列入“七经”之一,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

经学者考证,发现《孝经》的内容有些是抄袭《左传》、《孟子》、《荀子》的。又根据《吕氏春秋·察微篇》中引《孝经》之文,可知《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汉代曾有古文《孝经》,但在南北朝时亡佚。

(十一)《尔雅》

《尔雅》是“十三经”中较特殊的典籍,实际上它本身不是“经”,其内容并无经义可言,只是一部古代训诂资料的汇编。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十二经”,才把它上升为“经”的地位。后世经学家只是利用它的训诂知识来解释经书。《尔雅》共十九篇,全文一万零九百余字,从它所涉及的文献和利用的制度、史实来看,它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杂采几代诸家的训诂材料汇编起来的。此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汉代经典传注发达起来后,经过增补才成为现在的状况。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郭注、邢疏外,清代又有两部研究《尔雅》的重要著作,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重在对郭注的证实和补充,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则从经学的角度对《尔雅》进行发挥。

三、经学的解经典籍

经学中的正经仅十三部,总计字数不过六十五万,一部《十三经注疏》才四百十六卷,而历代解经典籍的数量则要超出数百倍。仅据《四库全书总目》与《贩书偶记》正续编收录的经部典籍就有三千九百

余部,近五万卷,这是大致流存且经著录的经部书籍,未见著录者当不止此数,历代散失的经学典籍更无法统计。因此,绝大多数的经学著述都是解经典籍。

古代解经典籍的体例最为多样,居各种典籍之冠。一部儒家“正经”,经过历代学者以各种体例和形式的注解、发挥,产生几百部乃至近千部著作,是不足为奇的。我国注经典籍繁富的体例,在唐以前就基本齐备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传、故、笺、注、说、微、通、章句、条例、集注、集解、集释、集义、音、解、解说、解谊、通解、疏、讲疏、义疏、训、释、撰等著作体例在当时都已出现,唐以后基本沿习,少有改变。

传 “传”有传述之意。据说《周易》中十篇解释经文的文字,就是孔子写的传,因此又称《易大传》,这是注释正经最早的传。后世采用“传”这一体例注解经书的著述极多,就一部经书来说,由于注解的角度不同,各种传的内容差别也很大。如《春秋左传》主要在于论证本事;而《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则主要在于阐述经义。传的形式也有多样,有的是照经文一字一句解释的,如《毛诗诂训传》;有的是杂引他说,借经义以证事理的,如《韩诗外传》。

注 “注”的本义是用水灌注,使之畅通。引申为对古书中难解字句加以解释、疏通。东汉郑玄曾遍注群经,今存尚有《仪礼注》、《周礼注》、《礼记注》。这种体例经郑玄推扬光大,成为后来最常见的一种解释、疏通文义的形式,经部中以“注”而称的典籍也较多。

说 “说”是释讲的意思,大致以阐说大义为主。“说”的体例起源也很早,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易》有《五鹿充宗略说》,《书》有《欧阳说义》,《诗》有《鲁说》、《韩说》,《论语》有《齐说》、《鲁夏侯说》、《燕传说》,《孝经》有《长孙氏说》、《江氏说》。清人惠世奇撰《礼说》,不载经文,但按经文顺序编列,对古音古义疏通说明。

笺 “笺”是表识的意思,这种体例由郑玄首创。郑玄治《诗》尊崇

《毛传》，如《毛传》有隐晦不清之处，便记下自己的见解，标识其旁，成为“笺”。在郑玄《毛诗笺》之后，以“笺”解经的著述历代不绝，仅清代就有胡永珙的《毛诗后笺》，会钊的《周官注疏小笺》，万斯大的《礼记偶笺》，俞樾的《礼记异文笺》，刘逢禄的《公羊何氏解诂笺》，赵坦的《春秋异文笺》，潘维城的《论语古注集笺》等。

解 “解”是剖析解释的意思。“解”这种体例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诸子著作中就有解，如《韩非子》中的《解老》，便是解释《老子》的名篇。后人沿用这一体例来解经，或称“解谊”，或称“解诂”，如东汉服虔的《春秋左传解谊》，贾逵的《周官解诂》、《左氏传解诂》，保存至今的是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

疏 “疏”即疏通之意。这种体例最早起于南北朝时的“义疏”，梁朝皇侃在《论语义疏》的序中分析其特点是“引取众说，以示广闻”。到唐代，对于汉人的经解，唐人看起来已不甚明瞭，于是出现“疏”这种新的注解形式，疏不仅给正文作注释，而且还给前人的注解作注释，形成了经、注、疏三个层次。一般来说，疏不违反注的意思，所谓“疏不破注”。唐代官修的义疏称为“正义”，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后来的《七经正义》。私人的注释之作仍称“疏”，如贾公彦的《周礼疏》、《仪礼疏》。

章句 “章句”主要是分析经文的章节，盛行于西汉，为经师讲经所习用。先秦古籍，整篇直述，既不分章，也不断句，后来儒生进行分章断句，在分章断句中也表述了对内容的理解，汉人的“章句”保存至今的有赵岐的《孟子章句》，可以从中看出章句的特点。这种著作体例后代也有所沿用，如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都很著名；清代则有焦循的《易章句》，任启礼的《礼记章句》等。

集解 “集解”这种体例是汇集诸家之说来进行注释。《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论语集解》、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是这种体例的代表作，而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则不属这种体例，其注释仍是杜氏一家

之言。集众家之说荟萃一处的方法,不仅有集解,还有集说、集注、集讲、集要、集意、集传等等,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注释领域之中,数量甚多。以“集传”而言,宋代较有名的著述就有朱熹的《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苏辙的《春秋集传》等。

丰富的解经典籍是随着经学的发展逐步积累起来的。春秋时只有“六经”。战国以后,儒家著述中解释“六经”大义的传、记开始兴起,《周易》的彖辞、象辞等“十翼”就是《易传》;《礼》所附的“记”以及《春秋》各传,都是早期的解经著作,只是到了汉代才升格为“正经”。西汉时经学家所写的传、注等,以阐述经义为主,如《尚书大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但这时有些解经著作则开始出现了繁琐的弊病,东汉桓谭在《新论》中就记载说,《书经》大师秦延君竟然用十多万字来解释“尧典”两字的含义,这种流弊在以后的解经著述中时有出现。东汉以后,注经典籍逐渐转向通训诂、究名物的方向,主要是解释字义和考证名物制度,发展了章句训诂之学,出现了像许慎、马融、郑玄等有名的注经学者。流传至今的有《毛诗传》、《三礼注》、《公羊传解诂》、《孟子注》等,后世称为古注。

魏晋以后,随着音韵学的发展,解经典籍中的音注著作大量增加,晋代的徐邈对“五经”都作了音训,成为当时诸经音注的典范。为经书作音注声训的传统,到唐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为经文注音的解经典籍,其中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成就最大,他的音训做到音与义结合,注一不同的音,即表达一种不同的解释。全书三十六卷,搜采汉魏以来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而遍注群经,“十三经”中仅缺《孟子》,是因为唐时《孟子》还未进入“正经”。后来宋儒刊刻《十三经注疏》时,将《经典释文》内容散于各经注释中,称为“陆德明音义”。

宋代注经典籍的数量迅增。在南宋时,经学学者将汉以来注解“十三经”的一批重要解经典籍确定下来,刊成封建时代通行的《十

三经注疏》。这套注疏典籍中,古注除《孝经》为唐明皇所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义疏部分是由唐宋人完成的。大体而言,其内容注多宗汉,疏多宗唐,倾向于训诂名物的汉学,与当时理学诸儒注经的方式迥异。宋儒的解经典籍虽然进入《十三经注疏》者很少,但有不少著述的成就是为历代学者公认的。例如,《易》注方面,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皆有新意,尤以程颐的《易传》为清代朴学大师顾炎武所推崇。《尚书》注方面,蔡沈的《书集传》、宋末元初金履祥的《尚书表注》不亚于《伪孔传》和孔颖达的“正义”,后来学者多所利用。《诗》注,则有欧阳修的《毛诗本义》,往往能探本诗人之旨。《三礼》方面,朱熹晚年所作的《仪礼经传通解》,就《仪礼》分章分节,眉目清楚,并引《礼记》内容进行注解,溯本追源。朱熹的《论语集解》和《孟子集解》,虽然重在义理的阐发,但词句简明,便于初学,可与何晏的《论语集解》、赵岐的《孟子章句》配合起来阅读。明代的解经典籍虽然数量不少,但多承宋学,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清代解经典籍成就辉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许多经学领域的研究超越了汉唐。择要而言,首先是在对经书的辨伪上意义重大。清代学者万斯同的《周礼辨非》、《仪礼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胡渭的《易图明辨》,都是当时疑经辨伪的力作。特别是《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引经据典,共列一百二十八条,一一陈述《古文尚书》的矛盾,彻底揭穿东晋梅颐对《古文尚书》和《尚书孔传》的伪造,使遗留千年的问题成为定案。其次,清儒的解经典籍几乎遍注群经,“十三经”中除《礼记》和《穀梁传》外,每部经书皆有数种新注新疏,这些著述对经文经义的考证和注释,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全新水平。清末学者章炳麟曾对清人解经典籍加以研究,从中选出一批著作定为“群经新疏”,颇有代表性意义。其所列举:《易经》有惠栋《周易述》,江藩、李松林《周易补述》,张惠言《周易侯氏义》;《尚书》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

文注疏》；《诗经》有陈奂《毛诗传疏》；《周礼》有孙诒让《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翬《仪礼正义》；《左传》有刘文淇《左传正义》；《公羊》有陈立《公羊义疏》；《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孝经》有皮锡瑞《孝经注疏》；《尔雅》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这些著述可以大致反映清代经学研究的水平。此外，清人还对经书注释典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康熙年间由纳兰性德刊刻的《通志堂经解》一千八百六十卷，由徐乾学、何焯主编，编者收集了唐、宋、元、明人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等解经典籍一百四十六种，其中尤以宋元诸儒著述居多，收罗宏富，颇多罕见之本。此外，清儒还对当代的解经著作进行总结，如阮元所编《皇清经解》和王先谦所编《皇清经解续编》。

第二节 佛教传播与佛教典籍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它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五世纪的印度，在汉代传入中国后，得到广泛的传播。佛教虽然是外来文化，但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中，经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消化、吸收和融合，逐渐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形态产生重大影响。

一千多年来，随着佛教在中土的不断流行和发展，产生了大量的汉文佛教典籍，这些典籍应包括两大方面：一是汉译佛教经典；二是由中土佛教徒撰述的论著、章疏和佛教史籍。这些典籍不仅是认识、研究佛教教义的基本材料，同时也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诸多领域，它们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因而也是中华文化典籍宝库中不可缺少的珍贵遗产。

一、佛教的传入与佛典的流行

从公元前三世纪印度阿育王时期以后,印度佛教逐渐传播到印度西北地区,并沿着丝绸之路在西汉末年传入我国内地。在裴松之所注《三国志》中,引用了曹魏时鱼豢的《魏略·西戎传》,其中有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载^①。所谓《浮屠经》实际就是《佛经》,它主要讲述释迦牟尼的故事,以及一些佛教的基本教理,但是这部当时口授的佛经未能流传下来。

现存最早的汉文佛经是《四十二章经》。据东汉《牟融理惑论》等书记载,传说汉明帝永平七年(64年)时夜梦金人飞行殿廷,于是派遣使者12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永平十年(67年),他们同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了经书、佛像,翻译了《四十二章经》。这部经书由四十二段短小的佛经组成,因此有关学者考证,它不是直接的译经,而是一部辑译多种经书的“经抄”。汉译《四十二章经》主要阐述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由于它内容质朴平实,在佛教刚刚传入我国时比较适合佛教初学者的需要,所以在当时社会上非常流行。《四十二章经》现在流传三种版本:一是《高丽藏》所收本,它又缘于北宋初年的《开宝藏》;一是北宋真宗时的注释本,收入明代《永乐南藏》中;还有一种是宋代守遂的注释本,流行较广,明清两代僧人都给它作过注疏。

东汉末桓帝、灵帝时,西域的佛教僧徒相继来到我国内地,佛经翻译渐盛。汉末传入的佛教有两个系统:一是小乘派的安息系统,以安世高为代表,他到洛阳不久就学会了汉语,并开始译经,共译佛经

^① 见《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三十余部,其中较重要的有《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经》等,多为小乘佛教一切有部的经典。安世高传布教义,重在“禅数”之学。“禅”指禅观,即通过禅定静虑而领悟佛教之道,其法多种,其中如“安般守意”法,指有意识地控制气息出入,守持意念,专心一境;“数”是用数字把佛教中名目繁多的名词概念归类论述,从而达到阐述佛教理论的目的,如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十八界等。这给初学佛教者带来很大方便,所以安世高传教很有成效。另一系统是月氏系统,以大乘派的支娄迦讖为代表。他在中国译经十余部,其中确实可考的是《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般舟三昧经》三部。其所译佛经数量虽然不多,但却有很大影响,如《道行般若经》是反映佛教般若学的较早经典,主要宣扬大乘佛教“诸法性空”、“诸法如幻”的思想,在魏晋时曾形成大的研究高潮。其他两部佛经也都是讲大乘禅观的经典。又如《般舟三昧经》宣传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后来净土思想的流传实以此为开端。以上代表大小乘佛教的两个系统,汉末与魏晋时期在中国皆有影响,只是后来由于大乘佛教的学说更适合中国的社会思想和文化环境,才得到更充分发展而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继续向中国内地传播,由于统治者的支持,这一时期有大量佛经被翻译、介绍到中土,并出现了一批成就显著的佛学家和译经家。

在西晋武帝太始二年(226年)进入内地的竺法护,原是月支国人,因世居敦煌,又称“敦煌菩萨”。他先后在长安、洛阳等地居住四十余年,翻译了《光赞般若经》、《贤劫经》、《正法华经》等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大乘佛教经书。他的翻译不仅范围广、内容丰富,译文也比较忠实。

后秦弘始三年(401年)进入长安的鸠摩罗什,出生于龟兹,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译经家。他在短短的八年时间内,与弟子们一起译

出了《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成实论》等经论，系统地介绍了龙树中观学派的学说。据《出三藏记集》著录，其译出经数为三十五部，三百八十四卷。他所翻译的佛典，有不少成为后来佛教宗派的经典和理论根据，在中国译经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佛驮跋陀罗也是一位杰出的译经家，他出生于古印度，东晋义熙四年（408年）到达长安，弘传禅数之学，翻译佛经。后又到庐山与慧远合作，到建康与法显合作，共同译经。先后译出《达摩多罗禅经》、《摩诃僧祇律》、《大般泥洹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新无量寿经》等十三部、一百二十五卷。其中所译《华严经》六十卷，以及关于坐禅、持戒的经类，在中国佛教界广为流传。

菩提流支，亦译“菩提留支”，北天竺（今阿富汗一带）人。据唐《开元释教录》记载，他从北魏武帝永平元年（508年）到洛阳从事译经，至天平二年（535年）止，所译经论共三十部、一百零一卷。其中主要有《金刚般若波蜜经》、《入楞伽经》、《弥勒菩萨所问经》、《无量寿经论》、《金刚般若经论》、《法华经论》等。

真谛，也译为“波罗末陀”，是当时又一位杰出的译经家。真谛为西天竺优禅尼国（今巴基斯坦一带）人，南朝梁代中大同元年（546年）应梁武帝邀请来到南海（今广州）译经，先后翻译了《十七地论》、《金光明经》、《唯识论》、《摄大乘论》等，较系统地介绍了大乘瑜伽行派的思想。特别是所译《摄大乘论》影响最大，后来南朝学者以此为理论依据，形成了摄论学派。真谛的翻译，大都保存佛经的原来面目，文字虽有些艰涩，间或夹杂一些他自己的解释，但从其师承来说，大体是正确的。

中国译经史上的翻译家，除了从印度和西域来的僧人以外，也有中土的高僧，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译经家有道安和法显两人。道安俗姓卫，祖籍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他不仅是东晋时博学的译经

家,还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佛教宣传者和组织者。道安在组织僧众宣讲佛法的同时,制定了沙门以释为姓,以及僧尼赴请、礼忏等行仪规范。他晚年在长安主持翻译了《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三法度论》、《毗昙心论》等十部经书,共一百八十卷、一百余万字。他还注释佛经并为佛经作序,对阐明经义及流传源流发挥了很大作用。他整理当时所能见到的佛教典籍,编成《综理众经目录》,这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部佛经目录。法显俗姓张,山西人,也是东晋时著名的译经家。他不仅在中土译经,还不辞辛苦,西行求法,前后凡十五年,游历近三十国,从印度、斯里兰卡带回一批梵文经律。回国后又译出《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戒律》等,著有《历游天竺记》一卷,记载了游历诸国的见闻。

佛教传入我国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广泛传播,到了隋唐,正式走向独立发展时期。特别是唐代,在统治者的扶持下,佛教寺院经济不断发展,僧众大量增加,具有不同特点的各个宗派都在此期相继形成。佛教的流行,在唐代呈现出繁兴景象。唐代对佛教经典的全面整理;各宗派对有关经典的深入研究、阐释和奉行,是此期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唐代对佛经的全面整理,表现在对梵文佛典的全面收集以及译经事业的真正成熟。玄奘的西行取法和长安译经,是唐代整理佛经最重要的事件,也是中国佛教史最辉煌的一页。他从贞观三年(629年)出发西游,孤征十七年,行程五万里,历经一百一十余国,忍受了千辛万苦,终于取得了印度佛教的最高成就,带回梵本佛典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回到长安后,玄奘立即投入译经工作,先后历时二十余年,译出大小乘经律论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其译籍之富空前绝后。玄奘译经,克服了前人零散抽译的缺点,注意抓住重点,对各家学说的来龙去脉作完整的介绍,人们从他的译籍里可以了解到当时印度佛教的全貌。他既不主张专在取意的意译文风,又反对诂

屈聱牙的直译文体,由于他通晓佛典,又精通梵文,所以所译佛经不仅文意正确,文词也斐然可观,后世将他的经译称为佛教史上“新译”阶段的开端。继玄奘之后,又有义净渡海西行印度,他带回梵文佛经近四百部,回长安后译出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

唐代经玄奘、义净等人的努力,使中土具备了齐全的佛典梵本,这就为当时译经事业的繁荣和中国佛教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许多重要佛典在唐以前虽有译本,但或篇幅不全,或文义不备,不能令人满意,唐代译家大多致力于重译佛经,使之益臻完善。在汉文《大藏经》中,许多重要的经典都有唐代的重译本,如《瑜伽师地论》、《楞伽经》、《首楞严经》、《俱舍论》、《大般若经》等等,与前代译本相比,自然以唐译本更为精善。唐代译经事业的进步,还在于翻译组织发达完备,国立译场继隋之后在唐代规模更大,翻译人才精萃汇集,分工细密善巧。整个译经过程,除主译之外,还有证义、证文、书字、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专人负责环节,从而保证了翻译经文的正确和通畅。

隋唐之际,由于佛典的广泛流传,中国佛教内部摄取了一些重要经典的思想学说,相继形成了一些不同观点的佛教宗派。各家在形成思想和宣讲教义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一批重要佛典的研究和传播,同时也撰著了一批宣传宗派教义的佛教典籍。例如:

最早产生的天台宗,由智顛在天台山创建。此宗以《法华经》为主要经典,所以又称法华宗。《法华经》又称《妙法莲华经》,此经说三乘方便、一乘真实和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等内容,为天台宗据以立说。智顛为《法华经》作《法华玄义》二十卷、《法华文句》二十卷两部注疏,又根据《法华经》的思想撰写了《摩诃止观》,提出了“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等天台宗的基本学说。

由隋代吉藏所创立的三论宗,因依印度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等三论立宗而命名。吉藏曾为“三论”注疏,并作

《三论玄义》，论述三论的概要。三论的中心思想是诸法性空的中道实相，也即“一切皆空”的思想。《中论》开宗明义，则以“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的“八不”，阐发了这种基本的观点。

由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创立的慈恩宗，又称“法相宗”或“唯识宗”。此宗奉行的佛典为《瑜伽师地论》。这部经典以玄奘所翻译的一百卷本最为全面详尽，该书强调客观世界是人们根本心识——阿赖耶识所假设的现象，论述禅观渐次发展过程的精神境界及修行瑜伽禅观的各种果位。玄奘在此基础上，还糅译了大乘唯识宗的经论，编成《成唯识论》十卷，宣传唯识宗的思想，即认为不是外境引起人的意识活动，相反，是意识的活动生出类似“外境”的表象。

由法藏创立于武则天时期的华严宗，以推崇阐明《华严经》而得名。《华严经》汉译本有多种，各译本中，以唐代实叉难陀所译八十卷本品目完备，最为流行。该经中心内容是从“法性本净”的观点出发，阐明法界诸法等同一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无尽缘起等理论。华严宗对《华严经》注疏极多，法显之前的杜顺撰有《华严五教止观》一种，智俨撰有《华严搜玄记》等三种，法藏则撰有《华严经探玄记》等十种。《华严经》及华严宗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思辨范畴，对后来程朱理学的学说有较大的影响。

唐代道宣创立的律宗，是一个以研习及传持戒律为主的宗派。印度的五部律传到中国有四部，它们是《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祇律》和《五分律》。律宗以《四分律》为主要依据，《四分律》原是小乘佛教昙无德部的律典，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中，被用大乘教义加以解释。道宣对《四分律》作了许多注疏和阐发，他的《四分律比丘念注戒本注》、《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是律宗教义的主要基础。

净土宗是以“净土三经”为主要经典而建立起来的宗派，正式奠

基者是唐代的道绰和善导。“净土三经”是《大无量寿经》二卷、《观无量寿经》一卷、《阿弥陀经》一卷，这三部经主要是赞美阿弥陀佛的宏大誓愿，描述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美丽以及往生西方净土的修行方法。其中的《阿弥陀经》简单易懂，全经仅二千余字，净土教徒把它作为早晚课诵的经典，在一般民众中影响也较广。

唐玄宗开元时期，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先后来到中国，创立了密宗这一宗派，因此这三个人称为“开元三大士”。密宗奉行《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和《菩提心论》、《释摩诃衍论》等。其中又以《大日经》为主。《大日经》全经七卷、三十六品，一品《入真言门住心品》，二品《入漫荼罗具缘真言品》为全书纲要。

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一大宗派，也是对中国文化传统最有影响的宗派。一般的说法，认为禅宗创始于南北朝时印度僧人达摩，而实际以唐代禅宗南宗的创始人慧能影响最大。禅宗奉行的佛典有《楞伽经》、《金刚经》，而慧能所作的《坛经》则是禅宗思想的代表作。《坛经》内容分两部分：一是叙述慧能得法传宗的事迹；一是记载他启导门徒的言教。后一部分反映了禅宗的思想，其主要观点则在于“直见心性”和“顿悟成佛”两方面。禅宗把一切归之于心性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相契合，因此禅宗得以长期流传，而宋明理学中的程、朱、陆、王诸家也都从禅宗思想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理论学说。

中国的佛教在唐代达到鼎盛，宋元明清几代，渐入式微。从佛教各派的流传来看，宋元两代愈来愈多的人皈依到禅宗门下，其余义学各宗逐渐衰落。此后，随着佛学自上而下逐渐走向民间，简单易行的净土宗又日益盛行，明清两代不但提倡禅净一致，而且禅宗也流归净土行了。在佛典翻译方面，除了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重建译场，译出五百余卷经论之后，未见有其他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宋元明清几代对于佛教典籍的整理和传播，主要表现在对佛籍大型丛

书——汉文《大藏经》的编纂和刊印。

中国的佛教典籍是伴随着佛教的输入、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历代中外佛教翻译家,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翻译了大量佛经,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时,汉译佛经已达二千二百七十八部,七千零六十四卷之多。仅以汉文《大藏经》现存的翻译佛经来说,也仍有一千五百二十部,五千六百二十卷。此外,历代中国佛学家,也为佛教的传播编撰了大批注释佛经的著作,以及传布各宗派教义的专著和语录。这些宣传佛教教义与思想的经典,是中国佛教流传发展的根本依据。

二、中土撰述的佛教史籍

中国的佛教典籍除了宣传佛教教义的各种经典和著作外,还有大量的佛教史籍,这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久由中国佛学家或佛教徒陆续记载、积累起来的。在现存汉文藏经中,各类佛教史籍则有近百部之多。从体裁形式上看,佛教史籍不仅继承了一般史籍中的传记体、纪传体、编年体、志乘体、纲目体、目录体等体裁,还发明了佛教史籍特有的经传体和灯录体。体裁多样、卷帙浩繁的佛教史籍不仅记载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历史,同时也为传播佛教思想发挥了作用,是研究中国佛教文化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贵史料。

如按体裁来区分,中国佛教史籍的体裁有十二种之多。

传记体是佛教史籍最早产生的体裁,晋代就出现了一些专记僧人行状的专传,如季颙的《竺法乘赞传》、王珉的《高座别传》、竺法汰的《安法师传》等,可惜这些早期传记因篇幅较短,很多未能保存下来。传记体佛籍又可分为总传、类传和专传。“总传”以梁朝释慧皎的《高僧传》为早,这部书记载了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至梁天监十八年(520年)间的高僧 524 人。全书体例分译经、义解、习禅、明律、遗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十种。这种写作形式为唐代释道宣的《续高

僧传》、宋代赞宁的《宋高僧传》、明代如惺的《明高僧传》、明河的《补续高僧传》所继承。“类传”则是专记一地一寺或某一宗派、某一类型僧人的传记。如梁代张孝秀的《庐山僧传》，唐代释道宣的《天台六祖略传》、明成祖敕撰的《神僧传》等等。“专传”的流传也很多，较有影响的有隋代释灌顶的《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唐代释彦琮的《法琳别传》、崔致远的《法藏和尚传》，而最为成功的应属唐代慧立、彦琮合著的《三藏法师传》。该传十卷，八万字，前五卷记玄奘早年生活及西行求法，后五卷记玄奘归国译经的情况。全书资料丰富，行文典雅，堪称名人谱传的力作。

南宋宗鉴的《释门正统》八卷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纪传体佛史，也分本纪、世家、志、列传、载记等体例。这部书产生于天台宗与禅宗争夺佛教正统地位之际，作者借修史将天台宗初祖与释迦牟尼同列于“本纪”，以示天台宗是“正统相承”于释迦牟尼的宗派，而将禅宗等其他宗派的祖师置于“载记”，以达到贬斥异宗的目的。《释门正统》的身土志、弟子志、塔庙志、护法志、利生志、顺俗志、兴衰志、斥伪志等八志，充分反映了佛教史书的特色。在宗鉴成书之后不过三十年，天台宗僧人志磐又撰成另一部纪传体佛史，他的《佛祖统纪》五十四卷，在前书基础上增加了大量材料，征引教内外典籍近二百种，使之内容更为丰富。《佛祖统纪》的九志，也是此书中分量最大、最具特色的内容。该书在体例上还比前书增设了“历代传教表”、“佛祖世系表”两个史表，增强了史书的直观印象。

佛教编年史首创于南宋沙门祖潋的《隆兴佛教编年通论》，该书二十八卷、附录一卷，所记佛教史实始于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终于五代后周显德四年（957年），共893年。较为重要的编年体佛教史籍还有南宋本觉编集的《释氏通鉴》十二卷，此书记载自周昭王甲寅迄后周恭帝庚申间共1930年的佛教史实，采取每年必录的体例，有佛事则记，无佛事则仅标甲子、年号。全书采用佛、儒、道典籍一百零

三种,凡引用史料皆注明出处,不同记载则用注文辨析考证。元代释念常又撰有《佛祖历代通载》二十二卷,此书有关佛教史实虽多抄自《景德传灯录》和《隆兴佛教编年通论》,但在编撰体例上也有特点,记事以世俗历史为经,以佛事为纬,不仅反映了佛教史实,而且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也都有明了的交代。此外,元代觉岸的《释氏稽古略》、熙仲的《释氏资鉴》也是较有价值的编年体佛籍。

志乘体佛教史籍包括一地之志、一山之志和一寺之志。现存最早且最著名的佛教地志是北魏杨衒之所作的《洛阳伽蓝记》五卷。洛阳自东汉明帝建白马寺始,到北魏时寺庙曾多达 1367 所。《洛阳伽蓝记》从城内到城外,以东西南北中等方位分五卷记述了一些重要寺庙的地理位置、寺内的布局和文物、寺庙的兴废和有关人物事迹。唐代的《大唐京寺录传》和明代的《吴都法乘》也属于这类佛教地志。较早的佛教山志是唐代慧祥所作的《古清凉传》五卷,专记五台山佛教史实,包括寺庙兴废和有关人物故事。关于五台山佛教胜地的记载,还有宋代的《广清凉传》和《续清凉传》,以及明代镇澄所作的《清凉山志》。佛教寺志以明清为多,清代德介的《天童寺志》颇能反映这类寺志的情况。该书十卷,分山川、建置、先贤、感典、云踪、法要、塔象、表贻、辖丽、余考等十考,详细记载寺庙创建与沿革、文物与诗赋、历代住持及云游高僧的事迹,包括历代帝王对天台寺的封敕和寺庙的庄园经济等,具有各方面的史料价值。

佛教史籍中的“经传体”和“灯录体”是佛史独创的体裁。经传体佛史专记某一佛经的传习源流。影响较大的有唐代慧禅的《弘赞法华经》、法藏的《华严经传记》、僧祥的《法华经传记》。以僧祥的《法华经传记》十卷为例,可知经传体佛籍一般记载该经的部类卷帙、隐显经过、传译年代、派生经典、有关论注、诸师序记以及僧俗因讲解、讽诵、咏读、书写、听闻此经而获感应的事迹。这类经传,对于了解佛经的内容卷帙及授受源流等状况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但其中一些充满神秘

色彩的感应事迹则用处不大。后来出现的一些感应记、持验记等,如宋代的《法华经显应录》、明代的《法华经感应略记》和《金光明经感应记》、清代的《观音经持验记》和《金刚经持验记》等,都是对经传体中感应内容的发挥。

灯录体佛籍是禅宗历代传法世系的记载。“灯录”是介于“僧传”与“语录”之间的一种体裁,与僧传相比,它偏重于记言,主要内容记载了传法的机缘语录及赞、偈、箴、颂等思想材料。与语录相比,它又是按照传承世系来编排全书体例的,除记言外,它还记载传主的生卒、师承、世寿、僧腊和谥、塔等情况。禅宗传法世系的记载可上溯到唐代惠矩的《宝林传》,五代后梁惟劲的《续宝林传》及南唐静、筠两人的《祖堂集》。真正的灯录始于宋代道原的《梁德传灯录》三十卷,该书记禅宗世系源流共52世,1701人。《梁德传灯录》引出的续作有:北宋李遵勖的《天圣广灯录》三十卷、惟白的《建中靖国续灯录》三十卷、南宋悟明的《联灯会要》三十卷、正受的《嘉泰普灯录》三十卷。以上“五灯”共一百五十余卷,内容多有重复。于是南宋普济删繁就简,将它们合编为《五灯会元》二十卷。《五灯会元》出现后,前五种灯史渐少流通。元、明、清三代陆续有多种灯录问世,甚至还出现了地方性灯录,如《锦江禅灯》、《黔南会灯录》,以及专记俗弟子的《居士分灯录》等。各类灯史为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保存了许多原始资料。

游记类佛教史籍是古代高僧对于求法或游历所见所闻的真实记载。这类著作尤以西行求法的游记影响更大,如东晋法显的《历游天竺记》一卷,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和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法显的《历游天竺记》记述他西行求法,游历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的所见所闻,所记年代和事实简明准确,是研究古代中亚、南亚各国史地、风俗、宗教的重要著作。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不仅是佛教游记中最重要的著作,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该书详细介绍了印度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宗教盛衰。近代印度等国的考古

学者根据此书记载,对当地的古城、古刹和石窟遗迹进行探查发掘,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该书不仅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宝贵史料,也是研究中国西北史地的重要依据。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是他在旅行途中于南海宝利佛逝托人带回的一部著作。此书以记述印度和南海诸国僧人的日常行仪法式为主,也带述了当地的佛教部派、寺院制度及一般的社会风俗。以上几部游记均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受到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

佛经目录是佛教史籍的重要著作,它们不仅反映了各个时期佛经的流传情况,在我国目录学史上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一部有确凿编纂年代的佛经目录是东晋武帝宁康二年(374年)释道安所编的《综理众经目录》,其中所载经典有六十余种,这部目录虽无抄本传世,但对历代影响深远。现有最早的佛籍目录是梁代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十五卷,是记集中土所出翻译经、律、论的佛籍总目录。全书体制分撰缘起、铨名录、总经序、述列传等四部分。此后各代皆撰有佛籍目录,较著名的如隋代费长房的《开皇三宝录》(又称《历代三宝记》)、唐代释道宣的《大唐内典录》和释智昇的《开元释教录》、明代释智旭的《阅藏知津》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释智昇的《开元释教录》二十卷,该书分总录、别录两大部分,总录十卷为“总括群经录”,以译人为主,著录了由汉至唐所译出的诸经书目,并有译人小传;别录十卷为“别分乘藏录”,以经书为主,著录各种有译有本和有译无本的大小乘经、律、论。别录的最后两卷称“入藏录”,是智昇搜集、整理的存经目录,其收佛籍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分作四百八十帙。唐代“会昌废佛”之后,佛籍流散,人们纷纷以《开元释教录·入藏录》来整理本地佛经,使得这一“入藏录”成为全国性的标准目录。晚唐五代乃至宋、辽编纂大藏经,都是以此“入藏录”作为依据的。因此《开元释教录》对于研究古代大藏经的情况至为重要。其对诸经阙漏讹误的考订也有极高价值。

佛教史籍除了以上提及各种之外,还有纲目类佛籍,如明代朱世恩的《佛祖纲目》,清代纪荫的《宗统编年》、徐昌治的《高僧摘要》等。有笔记类佛籍,如唐代《冥报记》、《释门自镜录》,宋代《林间录》、《罗湖野录》,明代《山庵杂录》,清代《现果随录》等。有类书类佛籍,如唐代道世的《法苑珠林》,宋代道诚的《释氏要览》等。有文集类佛籍,如梁代僧祐的《弘明集》、唐代道宣的《广弘明集》等。中国佛教史籍保存了大量佛教史和文化史的宝贵资料,近人陈垣先生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是研究佛教史籍的开创性论著。

三、汉文《大藏经》的编纂刊行

佛教经典主要包括经、律、论三大部分,又称为“三藏”。“经”是释迦牟尼宣讲的教义,“律”是释迦牟尼为弟子所订的日常行为规范,“论”是由佛弟子们阐述理论的著作。《大藏经》在古代称为“一切经”,是将印度、西域传译到中土的大小乘经、律、论及中华撰述的各类佛经章疏、各类佛教论著、各类佛教史籍汇编而成的大型丛书。在雕版印刷未曾发明的汉至隋唐时代,一切经都靠手写流传,因此写经之风大盛,出现了以抄经为生的行业。据统计,自陈朝武帝下令抄写“一切经”十二藏起至唐高宗显庆时西明寺写“一切经”止(即557—661年),皇室和民间写经多达八百多藏,二百余万卷,惜现存已微乎其微。到九世纪,才有佛典单经的刻本,现存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王阶所刻的《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较早又首尾完整的成熟雕印品。

由于佛经翻译数量渐增,中华撰著的佛籍也有了积累,东晋以后则产生了许多著录佛教典籍的佛籍目录。随着佛籍目录的发达,各地开始依据一些佛籍目录整理汇集佛经,形成互不统一的《大藏经》。唐代智昇的《开元释教录》博采各家经录的优点,考订佛经,编定了较为

完整准确的经录。唐武宗“会昌废佛”的浪潮过去后,各地陆续以《开元释教录》来恢复本地、本寺的《大藏经》,这就客观上使各地《大藏经》的内容逐渐趋向统一。尤其是有人利用《开元释教录》的“入藏录”编成了《开元释教录略出》一目,把当时已经流传的佛籍编集为五千零四十八卷,采用《千字文》五百四十八字顺序编号,每字一帙(或称函),每帙约收佛籍十卷,共编五百四十八帙,使人便于寻检,这就具备了汉文《大藏经》的规模,为以后雕印《大藏经》所遵循。

汉文《大藏经》整藏的雕版印刷,始于北宋开宝年间敕命在四川成都雕刻而后运到开封印刷的《开宝藏》。此藏始刻于开宝四年(971年),完成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雕版十三万块。《开宝藏》以《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为依据,编为四百八十帙,五千零四十八卷。《开宝藏》刻成后,经过不断修订,增入新译本,先后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版本,即宋端拱二年(989年)到咸平年间(998—1003年)校订的“咸平修订本”;天禧初年(1017年)校订的“天禧修订本”;熙宁四年(1071年)校订的“熙宁修订本”。可惜至今全藏各本已佚,仅有极少数零卷。《开宝藏》刻成后,手写佛经逐渐减少,私人或寺院募刻的风气渐开。据佛教文献记载,宋、元、明、清,朝野所刻《大藏经》共有二十余次。大致有:

《契丹藏》,又名《辽藏》。约于辽景福年间(1031—1032年)开雕,清宁九年(1063年)完工。它在《开宝藏》天禧修订本的基础上增入了当时流行于北方的经论译本。此经已经失传,但存于北京郊区的《房山石经》中有辽太平七年(1027年)至保大元年(1121年)所刻大量石经,即是《契丹藏》的部分复刻石本。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内陆续发现了一批《契丹藏》残卷,它是研究辽代佛史和文化状况的重要文献。

《崇宁经》又名《福州东禅院本大藏经》。由该寺住持冲真发起劝募雕印。宋元丰三年(1080年)至崇宁三年(1104年)刻成。全藏五百

八十函，一千一百四十部，六千一百零八卷。现全藏已佚，仅有少数零本存于日本。

《毘卢藏》，又名《福州开元寺本大藏经》。由该寺僧人发起劝募刻印，于北宋颐和二年(1112年)至南宋绍兴二年(1151年)完成。全藏五百九十五函，一千四百五十一部，六千一百三十二卷。此藏已不传世，仅存零本。

《圆觉藏》，又名《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大藏经》。由北宋末年至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刻成。由密州观察使致仕王永从全家发愿捐助，僧人梵净、宗鉴、怀深等负责劝募雕造。全藏五百四十八函，一千四百三十五部，五千四百八十卷。

《资福藏》，又称《安吉州思溪法宝福禅寺大藏经》。开雕年月不详，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刻成。全藏五百九十九函，一千四百九十九部，五千九百四十九卷。

《赵城藏》，又称《赵城金藏》，因1933年首次在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发现而名。此藏是金代由民间劝募雕造的，发起人为潞州崔进的女儿崔法珍。金大定十三年(1173年)刻成。原刻版式基本上依《开宝藏》刊刻，金末元初，该藏版片因战火而有所损，元太宗八年曾由耶律楚材发起补雕。赵城广胜寺发现的《赵城藏》计四千九百五十七卷。抗战期间，日本侵略军曾想抢走此藏，后经中共山西省委派游击队抢救，得到保护。1949年，这部藏经被护送至北京图书馆，当时不少卷册毁损不堪，几乎难以修复。在国内一批高级工艺师的努力下，经十三年精心修补，终于恢复了原貌。在《开宝藏》、《契丹藏》亡佚的情况下，由于《赵城藏》保存了《开宝藏》的原貌，吸收了《契丹藏》的优点，因此有十分重要的价值。1935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和北京三时学会曾影印其中罕见佛典四十六部，题为《宋藏遗珍》，装成一百二十册发行。

《磻砂藏》，又称《平江府磻砂延圣院大藏经》或《延圣寺藏》，南宋

绍定四年(1231年)在平江碇砂(在今江苏吴县)延圣寺由僧人劝募开雕,后因寺院火灾和南宋垂亡,刻事中断。元大德元年(1297年)接续雕刻,至治二年(1322年)最后完成。先后历时九十余年。全藏共五百九十一函,一千五百三十二部,六千三百六十二卷。1935年上海影印碇砂版大藏经会以方册本将此藏影印五百部,每部六十函,五百九十三册。

《普宁藏》,又称《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至二十七年(1290年)刻成,计五百五十八函,一千四百三十部,六千零四卷。《普宁藏》的主体部分是依据《圆觉藏》复刻的,但版式略小于《圆觉藏》,刻工精美,有元代风格,是现存较为齐全的元刻大藏经。

《洪武南藏》,明代最早的官刻本,故又称《初刻南藏》。明洪武五年(1372年)至三十一年(1398年)在南京敬山寺刻成,全藏六百七十八函,一千六百部,七千多卷。永乐六年(1408年)敬山寺火灾,版片全部焚毁,印本也很少流传。1934年曾在四川省崇庆县上古寺发现仅存孤本,已有残缺,并有部分抄补本及坊刻本夹杂在内。

《永乐南藏》,通称《明南藏》或《南藏》。明永乐十年(1412年)至十五年(1417年)刻成,全藏六百三十六函,一千六百一十部,六千三百三十一卷。基本上为《洪武南藏》的复刻本,但编次有所改动。万历年间,又添刻了《永乐北藏》的续刻部分四十一函,三十六部,四百一十卷,随同原印本一起流通。传世本流传较广。

《永乐北藏》,通称《北藏》。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至正统五年(1440年)在北京刻成。全藏六百三十六函,一千六百二十一部,六千三百六十一卷。万历十二年(1584年)又续刻各宗著述四十一函,三十六部,四百一十卷并入,传世本不如《南藏》多见。

《嘉兴藏》,又名《经山藏》。明末清初私版藏经。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在山西五台山开刻,后又迁至浙江余杭经山续刻,清康熙

十五年(1676年)由嘉兴楞严寺完成。全藏分《正藏》、《续藏》、《又续藏》三部分,共三百五十二函,二千一百四十一部,一万二千六百卷。康熙十六年又抽去《续藏》、《又续藏》共九函,存三百四十三函,二千零九十部。《嘉兴藏》改变历代藏经折装本的传统,采用方册本装帧。每卷末页刻有施刻人的施刻原文及写、校、刻工姓名和雕版时间地点、用工银两等,对研究明清社会经济有一定价值。

《龙藏》,全称《乾隆版大藏经》。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至乾隆十三年(1738年)在北京以明《永乐北藏》为底本刻印,但内容较《永乐北藏》略有增减。全藏七百二十四函,一千六百六十九部,七千一百六十八卷。完工后曾印刷一百部,1935年又曾印刷二十二部。《龙藏》版片共雕刻七万九千零三十六块,虽略有残损,至今基本完好,是我国历代木刻藏经中唯一尚存的版片。

除此以外,近年来又陆续发现了几种失传多年的大藏经。其中如:1979年为山西省宁武县文化馆收藏的《万历藏》,现存六百六十函,一千五百六十三部,五千九百九十七卷;1982年发现的《武林藏》,仅残存十七卷;1982年12月发现的《元代官刻本大藏经》,仅残存三十二卷等等。以上为木刻版本藏经,另外还有刻在石版上的经典,举世闻名的北京《房山石经》就是刻在一块块石板上的大藏经。

近代以来,又有一些铅印的汉文《大藏经》出现,例如:

《频伽藏》,全名《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1913年由上海频伽精舍以日本的《弘教藏》为底本,删去部分日本著述和原页上的校勘注,用活字排印。全藏装为四十函,四百一十四册,收经、律、论一千九百一十六部,八千四百一十六卷。该藏校勘较粗疏,错误较多,但有《总目》一册,便于检索;《总目》中每一题目附有《资福藏》、《普宁藏》、《嘉兴藏》、《龙藏》和《高丽藏》的千字文编次,有利对照。

《普慧藏》,上海普慧大藏经刊印会私版铅印。该会由盛普慧出资,成立于1943年,原以汇集南北诸经、校正前代印本漏误、订正历

代译名同异、搜集各藏遗佚为目的。但后来只印出一百册，流传不广。纸型现仍藏于南京。

1982年，我国成立了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开始编辑并陆续出版最新的佛教大藏经——《中华大藏经》，简称《中华藏》。《中华大藏经》编辑的汉文《大藏经》拟分为三编，第一编为历代汉文藏经所收之编有千字文编号的经典，第二编为历代汉文藏经所收之未编有千字文编号的经典，各拟收录二千余部，一万余卷。第三编为新编入藏，准备采集历代大藏经未收经典及近现代新出现的佛教著译。这项工作的开展，对于佛教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图2）。



图2 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藏经》

汉文《大藏经》以它的丰富内容和宏编巨制，以它版本的众多及历史的久远而闻名世界。世界上现存的各类佛教典籍虽然为数众多，但自成系统且具代表性的仅有巴利语《大藏经》、藏文《大藏经》和

汉文《大藏经》三大体系。梵本佛经固然十分重要,但现存已不成系统,在上述三大佛藏中,汉文《大藏经》规模最大,资料也最为全面,它的编辑和印行不仅是中华文化史上的光辉业绩,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伟大壮举,其文化价值必将在国际范围内不断引起重视,并在人类重建新文化的进程中大放异彩。

第三节 道教方术与道教典籍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产生于东汉中叶。道教信仰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的神灵崇拜与巫术。战国时期齐燕沿海一带有宣扬神仙方术的方仙道,两汉时有托黄帝而言的神仙之术、有托老子而言修道养寿的黄老道。在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道教与佛教并称为两大宗教,是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之一。道教对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同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宗教神秘主义体系。道教思想和方术的传播,产生、积累了大量经籍和文献资料,它们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道教的流传及其典籍的累积

早期道教的产生,是以东汉社会流行的黄老道为重要背景的。西汉武帝以后,虽然由于“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垄断了思想领域,但是各种思潮和信仰仍然或多或少地流行,神仙方术迷信在两汉就有很大的势力。东汉时期,以黄老之术为修炼思想的黄老道兴盛起来。黄老道方士奉太上老君为教主,以长生养性之术诠释老子的《道德经》。还编撰了《太平经》一类道书,宣扬神仙方术。经过黄老道长时期的酝

酿发育之后,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陵奉老子《道德经》等为经典,于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年)在四川创立了五斗米道;河北钜鹿(今河北宁晋)人张角奉《太平经》等经典,于汉灵帝建宁年间(168—171年)在中原创立了太平道。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道教的正式产生。

早期道教典籍为宣传道教思想、促进道教的产生与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张角所奉《太平经》,即东汉顺帝时方士于吉所传《太平青领书》。在此之前,还有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①。甘书今已不存,但前后两部《太平经》思想内容相近,应有渊源与传承关系。《太平经》原书一百七十卷。今存六十七卷,收于《道藏》。全书的主要思想是天、地、人三道合一的“三一为宗”理论。书中以神仙信仰、修仙方术及太平理想社会的设计构成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张角以《太平经》的思想宣传修仙秘术,用符水咒语为人治病;又以太平安乐世界的设想宣传平均主义,反对聚敛财物而不救穷周急,故深受下层民众的欢迎。公元184年,张角以太平道组织为基础,发动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瓦解了东汉政权。

张陵祖孙三人为五斗米道前三代宗师,张陵为第一代天师,其子张衡为嗣师,其孙张鲁为系师,世称“三张”。五斗米道奉行经典为老子《道德经》和《正一经》。《正一经》最主要的内容为《正一盟威箴》,此箴出于张陵,依托为太上老君所授,现存《道藏》中为《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箴》六卷和《太上正一盟威箴》一卷。道教认为箴具有神力,持箴者会受到鬼神的保佑。五斗米道通过授箴的方式来巩固道徒们的信仰,开展宗教活动,维持教团的秩序和团结。张陵等人还向教徒讲授老子《道德经》,张鲁将《道德经》定为五千字,称《老子五千文》,令教徒诵习。为了阐述教义,张鲁还为老子《道德经》作注,称《老子想尔

^① 见《汉书·李寻传》。

注》。《想尔注》的主要内容论证道为天地万物之本，道即一，即神，即老子。它宣传天人感应，符瑞灾异，注重修炼养生，行善积德，向往太平安乐社会。《想尔注》是第一部站在宗教立场上用神学注解《老子》的著作，它开创了道教系统改造利用道家著述的传统，因而在道教发展史上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该书不存于《道藏》，今人饶宗颐的《老子想尔注校笺》保存了该书的敦煌残卷。张鲁以五斗米道教义施政理民，在汉中建立了三十年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后被曹操收降，五斗米道也随着传入北方和江南。

进入魏晋南北朝，道教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大批道教新经典的撰作和传播，是此期道教发展的重要标志，其中对后世道教发展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三皇经》、《灵宝经》、《上清经》这三组经典。

《三皇经》是以《三皇文》和《五岳真形图》为主的一组道经。葛洪的《抱朴子内经》和《神仙传》称《三皇经》为魏晋时帛和所传。此经在帛和之后，又由方士左慈传葛洪从祖葛玄，玄传弟子郑隐，隐又传葛洪。《三皇经》今传世者不多，其中《三皇文》在唐代曾遭官方禁止，已经亡佚。不过现存《道藏》中的《洞神八帝妙精经》尚保存其部分道法。从中可以看到，所谓“三皇天文”实即九十二枚篆书符箓。这些符文分别代表某些天地神祇、仙官兵将、五岳四渎神君和魂魄精灵的姓字，修道者如所依法书符佩带或吞服，即可召来天地神灵，辟除邪精。至于《五岳真形图》，则是一类形似印章的图版，按五岳山渎盘转曲折之形状绘制，据说道士执此图版径行山川，可得山神护佑。

《灵宝经》的传播也与葛洪家族密切相关，道书中对于《灵宝经》的出现假托了许多神话，称此经由太上老君遣真人于三国之际传与葛玄，此皆不足信。但据有关文献记载，可知东晋以前已有《灵宝经》的一些经典，如《灵宝五符经》等流传。东晋末年，葛洪的族孙葛巢甫创立灵宝派，他引伸附会，造作了更多以“灵宝”标名的道经，使这一系统的典籍丰富起来。总的来说，《灵宝经》诸书，前期以《灵宝五符

经》、《灵宝赤书真文》等为代表,后期以《灵宝度人经》最重要。《灵宝五符经》即现存《道藏》中的《灵宝五符序》三卷,是道士养生求仙的方术书。此经的道法在《灵宝赤书真文》中又有所发展。《灵宝赤书真文》即现存《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所谓“赤书真文”,指五方帝君掌录的五篇篆字天文及“五帝真符”五枚,“五帝符命”五枚,它们是五种道教的符咒文字。据说按一定方法书写吞服,或佩带胸前肘后,或安放五方设坛祭祀,则能以符篆神咒召神弄鬼,度灾成仙。此经在灵宝诸经中最为重要。《灵宝度人经》在灵宝诸经中较为晚出。今存《度人经》以南齐严东所注为最早,全书由前序、中序、后序、二章经文及大梵隐语等五部分组成。大梵隐语内容隐晦,供人讽诵及写文服佩,其他内容的中心思想是普度天人,其济度不分富贵贫贱、阳世阴间。《度人经》的“普度”思想,容易满足所有信徒不同的精神需要,对下层民众更有吸引力,因而其影响范围很广。

《上清经》的出现、流传与上清派的创立紧密相连。据陶弘景的《真诰》卷二十记载,东晋哀帝时,道士杨羲自称魏夫人等众仙降临,授他《上清经》三十一卷。于是杨羲先以隶书录出,又以经师身份传许谧、许翔父子,二许又另行抄写,转相传授。在《上清经》的授受过程中,由杨、许等人逐步创立了当时道教的上清派。《上清经》原有三十一卷,以后不断增益,成为卷帙浩繁的一类经书。上清诸经中最重要的是成书较早的《黄庭经》和《上清大洞真经三十九章》。《上清经》的主要发明是内视存思术的修炼方法。这些经书认为,人体内部各部位关节也跟外界一样,各有神灵把守,学道者如果能知道这些神灵的名号、形象等,坚持在心中思神念真,与诸真精神交感,配以诵经、念咒,咽液等方术,便能感降神灵,入镇体内,得以安魂和神,长生延年。其精上者甚至可以飞升上清,成仙成神。《大洞真经》等上清经典的问世,使道教修炼方术更加丰富。此前道术修炼多以服饵金丹大药为仙道至极,而尊奉《上清经》的上清派则以诵读《大洞真经》、存神守一为

至道。这种存思术在后来进一步发展,吸收外丹术的理论,遂形成道教中的内丹一派。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发展离不开一批著名道士的突出贡献,他们的撰述和活动推动了民间道教向成熟的官方宗教演变的进程。此期著名道士,首推东晋时道教理论家葛洪,他的《抱朴子内篇》是道教史上一部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包罗多种方术的著作。其中的《畅玄》、《道意》、《明书》诸篇对道教哲学的道、玄、一等最高观念作了系统论述,有关神仙实有、人可成仙的思想长期影响着后世道教。《金丹》、《黄白》等篇继承了《周易参同契》的丹术理论,记载了大量炼丹术资料。书中还对符、图、隐形变化、守一、房中等道术有深入研究。在道教理论方面,葛洪通过他的《神仙传》、《枕中记》等著述设计了一套神仙谱系,为后来道教以三清尊神为首的神仙体系奠定了基础。葛洪对东晋时道经的传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曾搜集、传授过《三皇文》、《灵宝经》等大批道教典籍;他的《抱朴子·遐览篇》曾著录所传习道书、神符二百六十种,赖此可略窥当时道籍的梗概。

南朝刘宋的著名道士陆修静,也对道教的正规化和制度化作出了重要贡献。陆氏早年便注意搜集道书,曾撰成《灵宝经目》,对灵宝系统的道书进行考订;后来又对《上清经》、《三皇文》等进行整理,编成《三洞经书目录》,著录道教典籍一千二百二十八卷,首创了对后世道教影响深远的“三洞”分类法。陆氏还整顿天师道组织,制定了一系列道教科戒制度和斋醮仪式。他在《灵宝经》斋法的基础上,融合上清、三皇和五斗米道斋法,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六斋十二法”斋仪体系。他一生著述甚丰,惜已大多亡佚,但现存仍有《道门科略》、《洞玄灵宝五感文》、《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等六种,这些著作阐述了道教灵宝派的教义及有关的科仪制度。

除葛、陆之外,北魏的寇谦之和梁朝的陶弘景也是此期道教的重要人物。寇谦之早年在华山、嵩山修道,后伪托老君所授,编著《云中

音诵新诫》(即今存《道藏》的《老君音诵诫经》)及《天中三真太文录》、《录图真经》等道书,制订乐章诵戒、礼拜及衣冠仪式等新法。他创立北天师道,促进了北方道教的发展。陶弘景则继续陆修静综合上清、灵宝、三皇诸经学的事业,发展了道教义理;他编撰的《真灵位业图》,组成了以元始天尊为首的七级道教神仙体系。他对道教教义和理论的发展,完成了自葛洪以来南朝士族道教徒对民间道教的改造。他对医药学、炼丹术也有深入的研究,其著述多达七八十种,留下来仍有《真诰》、《登真隐诀》、《养性延命录》等重要著作。

道教在魏晋南北朝完成了一系列成功的改造后,进入了唐宋的繁荣时期,唐代皇帝为了借神权以加强统治,自称老子是李姓始祖,奉道教为李姓宗教。唐高祖规定道教在儒、佛二教之先。唐高宗追赠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设崇玄馆,置崇玄博士,在科举中增设老、庄、文、列四子科,并规定士庶须家藏《道德经》一部。他不仅给老子加封“大圣祖玄元皇帝”等一连串封号,还封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为“四真人”。由于统治者的扶植,老庄思想被不断抬高,同时也为了对抗理论较为完整严密的佛教,唐代道教在义理和斋醮仪式方面均有较大进步。许多道士著书立说,利用儒、释学说从道教的角度阐发老庄思想,促进了道教理论的发展,其中如王玄览的《玄珠录》、吴筠的《玄纲论》、杜光庭的《道德真经广圣义》、司马永祯的《坐忘子》和《天隐子》,都对推进道教义理化发挥了重大作用。杜光庭还综合道教各派斋醮仪式,整理成《道门科范大全集》八十七卷,他所统一规范的道教科仪,至今仍然沿用。随着唐代道教的兴盛,道教典籍也大量增加,唐玄宗时,广为搜集道书,编成了道教历史上第一部道藏《开元道藏》。唐玄宗御撰的道藏目录《琼纲经目》,著录了道书三千七百四十四卷。

宋代诸帝也多尊崇道教,宋太宗时曾访求道经七千余卷,令人删重校正。宋真宗大兴道教,认道教神灵赵元朗为宗室,封其为“保生天

尊大帝”，封老子为“太上混元皇帝”。宋徽宗信道最笃，他自称是昊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下凡，号为“教主道君皇帝”。他还排斥佛教、焚弃佛经，并下诏将寺院改为道观，让佛教归服道教。由于雕版印刷的盛行，宋代道教典籍得到大规模编刻，宋真宗时编辑《大宋天宫宝藏》，张君房撮其要，辑成道教类书《云笈七签》。宋徽宗又在崇宁年间整理道书，并在政和年间编成了《万寿道藏》。在道教理论方面，宋初道教理论家陈抟作《天极图》等图式及《九宝指玄篇》等著作，阐述宇宙生成理论，发明了炼养内丹的五个境界，使内丹炼养术更具有哲理色彩。神宗时的张伯端撰《悟真篇》等著作，进一步阐明炼养内丹的方法并描述炼养内丹过程中的种种表征。他们所最后确定的内丹炼养术使道教的炼养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为后世道教所宗本，他们的学术思想对宋代理学思想也有较大的影响。

金元时期，道教的流传出现了分衍宗派、各行教义的重大变革。这些教派经过一番分化组合，最终形成了沿袭至今的全真道和正一道两大教派。全真道于金大定七年（1167年）由王重阳在北方创立，主张以道为主，兼融儒释，它不尚符篆，不事释忏斋醮，注重内丹修炼。全真道为清修派，其教规比较严格，入教须出家蓄发和吃素。正一道由原龙虎山天师派、茅山上清派，阁皂山灵宝派及净明派等符篆派融合而成，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被授为正一派教主。正一道以《正一经》为主要经典，不重修持，主要宗教活动是符篆斋醮、降神驱鬼，其教规不甚严格，道士可以不居道观而有家室。金元时期，道教的发展曾有起伏，元初宪宗和世祖曾两次焚毁道经，打击道教，全真道受到较大挫折，至元成宗之后才逐步得到恢复。

明代道教继承宋元传统，在明中叶之前仍能持续发展，特别是正统、万历年间编纂刊刻的正、续《道藏》，对保存和传播道教典籍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世宗更是迷信道教，重用道士，使道教兴旺一时。明中叶以后，官方道教日趋衰微，正统道教的声势和教团势力日益减

弱,道教开始转入民间发展,为许多民间宗教所利用。明清道教虽然逐步衰落,但仍有大批道教典籍问世,许多著述对以前的经典进行诠释注疏,另有一些新书对道教教义进行演化。如明初创立武当派的张三丰有阐述武当道教义的《三丰全集》,晚明伍守阳有综合南北宗丹法的《丹道九篇》、《金丹要诀》,清初王常月有倡导全真道严持戒律的《龙门心法》,以及正一派道士娄近垣总结清代斋醮仪文的《黄箓科仪》等。这些道书对反映当时道教的内容和特征皆有重要价值。

二、《道藏经》等道教丛书的编纂

魏晋以后,道教典籍逐渐增多,一些著名的道士开始注意对道教典籍的搜集和整理。南朝刘宋的陆修静对当时道书的整理尤为全面和系统,他将所见道书分为三大部类,称“三洞”,编成《三洞经书目录》,共收道教经典、散方、符图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陆修静对当时道教典籍的整理和编目,奠定了后世编纂大型道教典籍丛书的基础。

总括道教典籍的大型丛书世称《道藏经》,或称《道藏》。南北朝时期,各地虽有一些道教经书的结集,但未能形成这种全国性流行的《道藏》。到唐玄宗时,先是下诏命令诸宫观高道和昭文馆、崇文馆学士研究、讨论道经,编写了《一切道经音义》和旧经目录《一切道经目》。在此基础上,玄宗又于开元年间发使搜访道经,飭令群臣校刊编修成藏,收道教典籍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并依陆修静三洞之法,编目为《三洞琼纲》。天宝七年(748年)诏传写以广流布。这是道教史上第一部《道藏》,因编成于开元年间,后世遂称为《开元道藏》。

唐末五代由于战乱,这部《道藏》已散佚不全,虽有唐肃宗上元年间对道经的整理,以及五代时杜光庭和天台山桐柏宫对《道藏》的搜集,但仍错伪杂乱。北宋建立后,宋太宗开始注意对道书的搜集,曾得道书七千余卷,命徐铉、王禹偁校正,删去重复,得三千七百三十七

卷。真宗大中祥符初年,汇集所藏道书,命王钦若领校,撰成新目《宝文镜录》。但是这次对道书整理和编目的质量未令人满意,于是由戚纶、王钦若等人推荐,续由张君房专领其事。张氏收集各处《开元道藏》残本和新出道书,与道士商校异同,前后费时五年余,于天禧三年(1019年)编成了第二部《道藏》,共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四百六十六函。以千字文为函目编号,始于“天”,终于“宫”,故称《天宫宝藏》,全书抄录七部。张君房在《天宫宝藏》完成之后,又从宝藏中撮取精要万余条,辑成道教类书《云笈七签》一百二十二卷。“云笈”指道家的书箱,“七签”指囊括道书的“三洞四辅”。这部类书的内容极其丰富,征引道书甚多,或节录、或取全文,间有佚书,且分类编次比较合理,便于检索和利用。此书是研究道教的重要资料,素有“小道藏”之称。

宋徽宗作为历史上热烈崇奉道教的皇帝,在即位之初就很重视对道经的搜集和整理。崇宁年间,徽宗曾诏示天下访求道教遗书,并令道士校定。崇宁间所收道教典籍,在《天宫宝藏》的基础上增加了八百二十二卷。据《宋史·徽宗本纪》记载,政和三年(1113年)徽宗再次“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此后又设经局,令道士校勘,并于福州闽县万寿观雕版,刊成《万寿道藏》五千四百八十一卷。这是第一部雕版印刷的道藏。

宋、金交战之后,北方道藏多毁于兵火,南方道藏也损失不少。南宋孝宗曾于淳熙二年(1175年)征集福州闽县所度《万寿道藏》,在临安(今杭州)抄录数部,题为《琼章宝藏》,分赐道观。《琼章宝藏》实际上只是《万寿宝藏》的副本。由于北方道藏多已残阙,金世宗于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下诏将南京(今开封)的《万寿宝藏》经版交付中都天长观(今北京白云观)校理,准备再印新藏。金章宗即位后,又于明昌元年(1190年)命天长观提点孙明道补齐经板,分遣道士到各地搜罗藏外遗经,并筹办板材,招募刻工,前后历七年,编成《大金玄都道藏》六千四百五十五卷,六百零二帙,分送各处。

《大金玄都道藏》刊刻后,原经板于金泰和二年(1202年)为天长观大火焚毁,各处道藏也多损失于金末兵燹。元初,道士宋德方遵其师丘处机遗命,于元太宗九年(1231年)倡刊新道藏,命其弟子秦志安于平阳(今山西临汾)玄都观总领其事,据管州(今山西静乐)所存金藏,搜罗遗逸道经,校讎付刊,成《大元玄都道藏》,凡七千八百余卷。元初佛道相争,元世祖于至元年间继宪宗之后再次下令焚禁道书,该藏版、经书皆毁。

明代对道经的整理始于明初,永乐四年(1406年)成祖就敕命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纂校道书,编修道藏。宇初羽化后,其弟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继续主持,因成祖崩而未成,修藏之事就此中断。至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复诏通妙真人邵以正督校,增其未备,重加订正,于正统十年刊成,总计五千三百零五卷,四百八十函,以千字文排列,称为《正统道藏》。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又命五十代天师张国祥校刊《续道藏》一百八十卷,三十二函,称《万历续道藏》。正统藏合为五千四百八十五卷,五百一十二函(图3)。明版《道藏》曾刊



图3 明版《道藏》

印多部颁赐全国各道观。明以前所编《道藏》皆毁于水火人虫，唯明版《道藏》硕果仅存，故弥足可贵。明刻《道藏》经版清代藏于京城内大光明殿，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大光明殿被烧，道藏经版也荡然无存。1923年10月，康有为、张元济、梁启超、傅增湘等十三人发起重印明《道藏》，1926年由上海涵芬楼以六开线装本影印发行，每部一千一百二十册，共印三百五十部，从而使明版《道藏》广为流传。

除《道藏经》外，明清以来，还出现了一些卷帙不等的道经丛书，保存了大量藏外道经，为道教典籍的流传发挥了作用。其较为重要者有：清代由蒋元庭、贺龙骧、彭翰然先后编辑刊行的《道藏辑要》，共收道书二百八十七种，其中藏外道书一百一十四种。民国年间由丁福保编的《道藏精华录》，收道书一百种，分十集，其中藏外道书约占三分之一。台湾道教学者萧天石于1953年开始主编出版的《道教精华》，已出版十七集，收入道书六百七十五种，其中新增藏外道书较多。美国学者苏海涵(Mhiael Raleigh Saso)与台湾道士庄登林合编的《庄林续道藏》，于1975年出版，分四部共二十五册，一百零四卷，所收为藏外道教科仪经书。此外，四川巴蜀出版社还将出版《藏外道书》，计划收明万历至1949年新出藏外道书六百余种，一千一百余卷。

三、道教典籍的分类和内容

道教典籍的分类是在六朝定型的，它在道教典籍的发展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道籍旧来皆以三洞、四辅分类，这是道教传统的七分法。“三洞分类法”创始于刘宋陆修静的《三洞经书目录》。“三洞”指洞真、洞玄、洞神，梁朝孟安排《道教义枢》卷二称：“通称洞者，以通同为义。”也就是说，洞有通、同两层意思。《道教义枢》具体解释了三洞的具体含义：所谓洞者通也，“真”谓纯粹不杂，通向真仙之道，故名“洞真”；“玄”谓不凝不滞，通向玄妙之道，故名“洞玄”；“神”谓神

秘莫测,通于神灵,故名“洞神”。所谓洞者同,即指三洞皆能“通凡入胜”、“通凡入圣”,使人成为神仙。由此可见,三洞各名表达的仅是较为空泛的宗教教义,与所辖诸经内容无关,与各经所代表的宗派名称也无关,仅是一种神学境界的象征。陆修静用这种神秘的“三洞分类法”将两晋以来流行于江南的三派经典统一起来,“洞真”收上清经,“洞玄”收灵宝经,“洞神”收三皇经,从而调合了上清、灵宝、三皇等三个教派的矛盾。

陆氏《三洞经书目录》只包括了上清等三派经典,三洞之外,其他流派的经书尚多,如汉末的《太平经》、《正一经》等。由于三洞分类法还不足以统辖各种道教经典,因此又很快设立了新的类别,即太玄、太平、太清、正一等“四辅”。以三洞、四辅七部分类的目录,最早见于南朝孟法师的《玉纬七部经目录》。孟法师等解释了四辅命名的意义:“太玄”取“玄之又玄”的重玄之义,辖《道德经》等,太玄部辅洞真部。“太平”以《太平经》为首而名,太平部辅洞玄部。“太清”取体大气清之义,令人升入太清仙境,太清部辖金丹诸经,辅洞神部。“正一”表示“正以治邪,一以统万”,正一部包括《正一盟威妙经》等。《正一图经》谓正一“宗道德,崇三洞”,所以正一部遍辅三洞。以上四辅中,“太平部”和“正一部”之名与所辖诸经有联系;而“太清部”和“太玄部”之名,表达的仍是神学意义,与三洞之名性质相同。由于四辅分类比三洞分类后出,有补充之义,故称辅。其实这种辅与被辅的关系,在诸经内容和地位上并不能体现出来。比如,老子《道德经》一贯作为道教所尊奉的权威经典,在道教典籍的分类中却处于辅助的地位。又如,从道教神学理论来说,洞神部有“召制鬼神”之义,应将符篆一类经典归于此部,但四辅又规定以统辖金丹类典籍的太清部辅洞神部,这也是自相矛盾的。因此,虽然七部分类法在道教历史上曾起到囊括各派经典、纲纪群经的作用;但由于道教神学理论不如佛教发达,有“杂而多端”的特点,必然引起道经分类和统属上的一些混乱,造成后人对于

《道藏》检索的困难。

三洞之中,每洞又分为十二类,也称十二部。第一本文,指道经的原本真文;第二神符,指以符箓咒语为主的道书;第三玉诀,是注解道经的文字;第四灵图,是以神灵图像为主的道书;第五谱录,记神仙谱系;第六戒律,收道教的清规戒律及功过格一类典籍;第七威仪,记道教各种礼仪制度,如斋醮、祀神、请经等仪式;第八方法,记修行与招魂制鬼之法;第九众术,记炼丹及变化之术;第十记传,指道史及神仙传记;第十一赞颂,是以赞词、颂偈为主的道书;第十二表奏,列斋醮、祭祀所用的章表、奏疏等程式。由于三洞各十二部,合为三十六部,故“三十六部尊经”也成为一切道经的代称。十二部分类比三洞、四辅较为切合道书的实际情况,特别如戒律、神符、威仪等目是根据道书特点而确定的部类,切实可用。但也有不足之处,如“本文”和“玉诀”,将道经正文和注释分为二目,既不便查阅也不便利用;“方法”与“众术”分为二目,也界限不明,容易混淆;“赞颂”与“表奏”是从文体上区分,又与按内容区分的各类体例不一。

道教典籍卷帙浩繁,除了正续《道藏》收入一千四百二十七种道书外,还有大量道教典籍未收入藏内。《道藏》作为一部大型丛书,其中又包括一些小丛书,如《修真十书》、《太上三十六部尊经》等;还有一些类书,如张君房的《云笈七签》,马总的《意林》,王悬河的《三洞珠囊》、《上清道类事项》,孟安排的《道教义枢》,以及北周武帝时编的《无上秘要》等。

道教典籍内容极为丰富,包罗万象。道教的经、论、戒律类经典,以及法术、符诀类典籍,有《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道法会元》和《太上洞玄灵宝索灵真符》等;斋醮科仪类典籍,如《太上黄箓斋仪》、《灵宝领教济度金书》、《九幽忏》等;内外丹养炼类典籍,如《周易参同契》、《古文龙虎经》、《金丹大要》、《胎息经》、《悟真篇》等。这类道经构成了道教典籍的主体,是研究道教教义、流派、仪式和道术的基本资

料。其中有关炼丹、修身、法术方面的道书,包含有大量古代化学、医学知识,具有很高的科技价值。

大批儒家著作和诸子著作被道教列为道书。有儒家易类典籍,如焦氏《易林》,李贽《易因》,周敦颐、邵雍的《周易图》等;诸子类典籍,如先秦的《老子》、《庄子》、《列子》、《墨子》、《孙子兵法》、《公孙龙子》、《韩非子》等,汉晋至唐宋的《太玄经》、《刘子新论》、《天隐子》、《素履子》、《无能子》等。此外,还包括了许多对诸子书的注释和研究著作,如有关《老子》的注释和研究专著便有五十余种。

道书中有大量史籍记载道教的发展历史。这些道教史籍有历代道教传记方面的《列仙传》、《神仙传》、《洞仙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有属于道仙、真人谱录的《汉天师世家》、《清微仙谱》、《七真年谱》等;有属于山志、宫观志的《南岳总圣集》、《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茅山志》、《天台山志》、《宫观碑志》等;有属于碑传集的《甘水仙源录》;有属于游记的《长春真人西游记》等等,种类繁多。

道书还收入许多医药类典籍,仅《道藏》中此类书籍就有二十种,如《黄帝内经》、《养性延命录》、《千金要方》、《本草衍义》、《石药尔雅》等。

历象、占卜术数类著作也在道书中占有一定比例。天文历象方面的,如《太上洞神五星占》、《盘天经》、《甘石星经》;占卜术数方面的,如《黄帝龙首经》、《玉匣记》;堪舆类书,如《黄帝宅经》、《堪舆完孝录》等。

道教典籍还包含许多艺术方面的内容,明《道藏》中便保存有两部道教乐谱,一是南宋谱《玉音法事》三卷,另一部是《大明御制玄教乐章》一卷。除《道藏》外,散见的道教乐谱还有不少。在绘画方面,许多道经都附有插图或辑有绘画作品,如《太平经》中就有卷八四的《大人存思六甲图》,卷九九的《乘云登龙图》,卷一〇〇的《东壁图》,卷一〇一的《西壁图》。道经中的符箓书也有字、有画。在书法方面,画

符书篆与书法就有很多联系,如《洞玄灵玄门大义》说三元八会六书之法和八体六文等,述苍颉造字、蒙恬制笔及汉字字体演变等,论述了一些书法理论。此外,有些道经还记载了道教对于修建宫观、雕塑神像和缝制冠服的种种规定,如《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等书,都涉及到古代建筑、雕塑和服饰方面的艺术内容。道教文学典籍也极为可观,历代高道都为后世留下他们富有道教色彩的作品集,如陶弘景的《陶隐居集》、吴筠的《宗玄先生文集》、杜光庭的《广成集》、王喆的《重阳全真集》、张宇初的《岷泉集》等等,不胜枚举。道教文学创造了一些独特的文学形式,如步虚词和青词,这些文学创作形式也常为教外文人所采用。道教文学典籍不仅丰富了古代文学宝库,其神话传说等美妙想象和斋醮奏章表文等创作手法,也对古代文学的内容、形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道教典籍的内容如此丰富,其保存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应该指出,道教典籍还有较高的版本价值,残存的敦煌道经及一些宋、元版道经均很珍贵;现存完整的明《道藏》源于宋版道藏,其版本价值也早为清代学者所重视,被用来进行校勘、辑佚和考证。

第四节 史学传统与史学典籍

我国的史学传统极其古老。利用文字记载历史,始于古代史官。《吕氏春秋·先识》说:夏桀无道,太史令终古劝谏无效,弃而奔商。终古就是夏朝的史官。商代甲骨文中称史官为“史”、“作册”、“尹”、“史”。西周的史官,沿用商代的称号,金文里也有“作册”、“内史”、“内史尹”等。周代史官的人数大大增加,《周礼·春官·宗伯》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之称。春秋以后,不仅王室有史官,各诸侯国也有史官的设置,《左传》里就记载了许多史官的活动和言论,鲁国有太史

固、太史克,晋国有史苏、董狐、史龟,卫国有华龙滑、礼孔,齐国有南史氏,楚国有倚相、史皇,赵国有史墨,就连小小的虢国也有史囂。

夏、商、周三代的史官,负有双重使命,一方面,他们掌管天文历法、祈祷、祭享、贞卜等活动;另一方面,他们又负责记录时事、起草文书、保管典籍等工作。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西汉,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仍兼管着天象星历、祭祷等事项。司马迁以后,随着史学地位的逐步提高,史官职掌分为二途,一则仍称太史,职掌天时星历,隶于太常(《后汉书·百官志》);此后逐渐发展为司天台、司天监,至明清两代为钦天监。一则开始以别职而专任史事,如东汉明帝时便召集班固、尹敏等史官在兰台、东观专门从事史书的编纂。三国曹魏开始设著作郎为史官专职,南朝齐、梁设撰史学士和撰史著士(《隋书·百官志》),北齐始置史馆,以宰相监修国史。史馆制度自周隋沿袭至唐,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唐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设史馆于禁中,专修国史,由宰相任监修,又以他官兼任纂修,下设修撰或直馆等专职(《旧唐书·职官志二》),统称史官。宋承唐制,设史馆于崇文院中,负责保管典籍,纂修国史;后又设国史编修院,专职修史。辽金的史馆制度仿照唐宋,略有变通。元代史馆别具一格,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九月立翰林国史院,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下设修撰、编修、检阅等官(《元史·百官志三》)。翰林学士除应奉文字外兼有史职,这种史官制度为明清两代所秉承。

中国史学不仅有史官修史的古老传统,更有私人修史的优良传统。自孔子修《春秋》以降,历朝历代都有一批自觉自愿肩负述史资鉴重任的史家,私人修史的传统数千年绵延不绝。因此德国哲学巨匠黑格尔感慨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①

^① 《历史哲学》(中译本),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6页。

中国史学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来自中华民族“察古而知今”、“鉴往而知来”的自觉意识。《易经》早就告诫人们要“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大畜》)。因此上自君王“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下至童稚,要“读诸史,考世系”,接受“通古今,知始终”的历史教育。

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史学传统造就代有新出的史家,产生了浩如烟海的史学典籍。因此西方学者不仅赞叹中国层出不穷的史家,而且赞叹中国浩繁的史籍。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也许不用多说,中国所能提供的古代原始资料比任何其他东方国家,也确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要丰富。”^①中国史籍的丰富,不仅表现在数量,而且表现在记载的连续性和体裁的多样性。

在中国史学的童年时期,史官的记载多为文献档案,形成撰著不多;撰著的形式也比较简单,主要有记言、记事两种,因此史书从属于经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史籍没有形成独立部类。魏晋南北朝以后,史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大量的史书编撰形式,有编年体、纪传体等等;史籍的数量、体裁蔚为大观,有了独立部类的雄厚基础。于是,西晋荀勖在他的《中经新簿》中设丙部收“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书,其中除“皇览簿”为类书外,其余皆为史书。史书自成部类,说明史籍数量之多,流布之广,已在各类典籍中占据了较为重要的位置。继荀勖之后,南朝梁人阮孝绪又在《七录》中根据史书的体裁内容进行了分类,唐初完成的《隋书·经籍志》,在阮孝绪《七录》的基础上将史部典籍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十三类。《唐六典》卷一〇解释史部十三小类说:“一曰正史,

^①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中译本,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

以纪纪传表志；二曰古史，以纪编年系事；三曰杂史，以纪异体杂记；四曰霸史，以纪伪朝国史；五曰起居注，以纪人君动止；六曰旧事，以纪朝廷政令；七曰职官，以纪班席品秩；八曰仪注，以纪吉凶行事；九曰刑法，以纪律令格式；十曰杂传，以纪先贤人物；十一曰地理，以纪山川郡国；十二曰谱系，以纪世族继序；十三曰簿录，以纪史策条目。”这段话表明史学典籍多姿多采的编撰形式和各种体裁形式所著述的内容。距《隋志》不久，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又以《史通》确定了史评体的形式。此后，在中晚唐又有典制体、会要体史籍的崛起；在宋代，又有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史书的创立；在明清，又有学案体史籍的发明。古代史书以其多种多样的表达形式，蕴含丰富的内容，全方位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侧面。因此，多样性是中国史籍的一大特征。

中国史籍还有连续性特征。这种特征，一方面源于历代史家自觉总结前代历史、察古知今的传统，一方面由于史书体裁的不断改造和创新，使史家产生了以新形式表述历史认识的冲动，激发了史家的创作热情，因此各类史籍往往连续性累积，形成了上下贯通的宏伟系列。

一、以时为纲：编年体史籍首开风气

中国史籍最早的编纂形式是按年月编排史事的编年体。按时间顺序记载史实，是编写历史最基本的手段。

孔子编次的《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史学著作，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籍。《春秋》一书是孔子在春秋末期依据鲁国国史——《鲁春秋》，兼采列国史料，以鲁国十二位君主世系为序整理编纂而成的，所以它不单纯是鲁国一国的历史，而是把春秋一代天下大势的演变做了全面记载。《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

时系年”^①的编撰方法,初步创立了编年体史书的规模。它通过人物、地点、时间、事件等要素有机结合的记述,反映了历史的发展过程。《春秋》是一部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史书,具体表现在孔子用“春秋笔法”来贯彻他的思想主张,讲究“属辞比事”,字里行间渗透“微言大义”,蕴含褒贬意图。这种写史方法影响了后来两千年的史家,也反映了史籍由低级向高级渐进发展需要有一个过程。

继《春秋》之后出现的编年体史著是流传于战国中后期的《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左传》本是一部独立的史籍,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左氏春秋》;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它和《公羊传》、《穀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今存《左传》是西晋杜预按《春秋》经文重新编排过的,因此是一部按鲁君十二的次序记载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春秋历史的史籍。《左传》无论在编撰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编年体史籍不断完善的一次飞跃。从编撰方法上看,《春秋》记事非常简略,《左传》在叙述历史活动时则有概述、有详述,对主要历史事件必交待其前因后果,给人以完整清晰的印象;在叙述事件的同时,还重视记述人物的言行,反映生动的历史情状。可以说,《左传》已突破了此前史书分别记言、记事的格局,做到了“言事相兼,烦省合理”^②。从内容上看,《左传》的取材比《春秋》更为广博,其记载范围也不仅限于政治、军事、外交活动,而是涉及到经济、学术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现象等许多方面。《左传》还创造了“君子曰”等史评形式,表述作者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看法,这种“史论”的方式为后代许多史著所继承。

早期编年史,还有《竹书纪年》。其记述自夏、商、周三代至战国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的历史,突出记载魏国的史事。《竹书纪年》是

① 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

② 唐·刘知幾:《史通·二体》。

西晋人在汲郡发掘魏王墓所得的古书，流传至宋亡佚。今本《竹书纪年》已非原书，但清代有学者对古本《竹书纪年》作了辑校。

自西汉司马迁的《史记》问世以后，纪传体史籍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但是史家对编年与纪传两种史体孰优孰劣，仍一直存在争议。这期间，也有一些史家以自己的著述努力完善和恢复编年史的地位，其中值得一提的有东汉荀悦所作的《汉纪》。

东汉末，献帝以纪传体《汉书》文繁难省，让荀悦依《左传》体例改写《汉书》，略举其要。荀悦经三年而成《汉纪》三十卷，十八万字，仅为《汉书》五分之一，“辞约事详”，于是大行于世，以致“历代褒之，有逾本传”^①。《汉纪》在编纂学上对编年体作了改进和完善，采用类叙、追叙、补叙的方式使记事相对集中，并顺便将与之有关的政事、人物、典制、少数民族等内容加以介绍，扩大了容量，克服了编年体流水记事的缺陷，增强了可读性。《汉纪》作为典型的编年体断代史，又一次激起史家对编年史的兴趣，于是魏晋南北朝期间又先后有一批编年体史籍问世，如东晋袁宏的《后汉纪》，孙盛的《晋阳秋》，干宝的《晋纪》，梁朝裴子野的《宋略》，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等。直至唐初官修八部前朝史，纪传体史书体裁得到充分发展，编年史才退居次要地位。

但是编年史这种古老的史体并没有由此消寂，而是在宋代由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简称《通鉴》）达到自《左传》以后的又一个发展高峰。《通鉴》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含《通鉴目录》、《通鉴考异》为三百五十四卷），记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的历史。它网罗宏富，体大思精，是我国一部成熟完备的编年体通史，可与纪传体通史《史记》相媲美，因此后人将两书的作者司马迁和司马光并称“史学二司马”。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北宋陕州夏县（今山

^① 唐·刘知幾，《史通·二体》。

西夏县)人。仁宗时中进士甲科,任职于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他编撰《通鉴》的目的有二:一是为皇帝便览资治;二是为重振编年史的优长,成一家之书。他认为“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竟其篇第,毕世不能举其大略”(《资治通鉴表》),因此“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通鉴外纪自序》)。由此可见他改造纪传体、重建编年史的立意。《通鉴》的编撰始于仁宗嘉祐年间,司马光首先编了一部上起战国下至五代的大事年表,名为《历年图》,分五卷;接着又写成《通志》八卷^①,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止秦二世三年。英宗对此很重视,便于治平三年(1066年)命司马光自选馆阁英才,共修《历代君臣事迹》。此后神宗又将书名定为《资治通鉴》。协助司马光修史的史学家有刘敞、刘恕、范祖禹等人,他们将编写的过程分为三步:第一步编写丛目,即按年月日顺序标出事目,再选出史料附注于事目之下;第二步是组织长编,即依丛目撰写正文,这实际是全书的草稿;第三步是笔削定稿,这一步由主编司马光负责进行考辨异同,删繁就简,统一体制,最后成书。《通鉴》编修长达十九年,其组织方法在史书编纂学上堪称集体合作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典范。

《通鉴》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它的材料来源除纪传体正史外,还有杂史、谱牒、文集、碑状等不下三百三十种。它取材严谨,考证精详,建立了优良的考史方法。《通鉴》融会多种史体,发展了编年体裁。它以正史的本纪为经,列传为纬,析志之大端入相对之年,又充分运用追叙、插叙和附叙、带叙等方法交待人物或事件之本末,以系年为主,兼取诸体之长,从而使编年史臻于完善。它在历史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作者独运匠心,将千古史事,“叙之井井”,尤其赤壁、淝水等大战的场面描写,虽为记史而独成名篇佳作。

^① 即《通鉴》前八卷。

《通鉴》的成就,体现在作者所撰与本书相关的姊妹篇中。这类著作有《稽古录》二十卷,《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通鉴举要历》八十卷。《资治通鉴考异》原与《通鉴》别行,宋末元初胡三省作《资治通鉴音注》,将“考异”散入所考之文下,但今仍有单行本。《通鉴举要历》则已亡佚。

《通鉴》的划时代意义,在于整整影响了编年史后期的全部发展。《通鉴》的问世,重新掀起撰写编年史的高潮。尤其在南宋,出现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熊克《九朝通略》与《中兴小历》、徐度《国纪》、陈均《宋九朝编年备要》、蔡幼学《宋朝编年政要》、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及宋元间无名氏所作的《宋季三朝政要》等一大批当代编年史书。其中以李焘、李心传、徐梦莘三家较为突出。《通鉴》的问世,还引发了编年史变体——纲目体史书的出现。纲目体史书创始于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后续著作有明代商辂的《资治通鉴纲目续编》、南轩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清代康熙的《御批通鉴纲目》、乾隆的《御批通鉴辑览》。《通鉴》对后世最重要的影响,是治史者群起效法,补作续作,形成了“通鉴学”。例如刘恕的《通鉴外纪》十卷、《目录》五卷,元初金履祥的《通鉴前编》十八卷,都是补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以前史事。续后者,则数量较多,如宋代有刘时举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五卷;明代有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六十四卷、薛应旂《宋元资治通鉴》一百五十七卷;清代有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及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清代还有夏燮的《明通鉴》九十卷,则是因《通鉴》义例而续记明史。

二、以人为纲:纪传体史籍的“正史”地位

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记载中心,是继编年体而兴的史书体裁。编

年体史籍虽然有脉络清楚、时间明确的优点,但每一时间单位则不可能容纳太多的内容;纪传体正是克服了编年史这种缺陷,以多种史书结构囊括了各方面史事。这种综合布局的史书体裁覆盖面广,历史内容丰富,很符合封建帝王的“大一统”思想,所以得到提倡,被视为“正史”,在各类史籍中处于主导地位。

纪传体是由西汉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编撰《史记》所创造的。司马迁(前145—前90年),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他三十八岁时继承父志,开始撰著《史记》,凡十七八载,加之删削改订,历时约二十年。《史记》原称《太史公》^①,又称《太史公书》、《太史公记》,三国以后才有此名。

《史记》一书,共一百三十篇,526500字。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长达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庞大的结构,宏富的内容,适应了汉代大一统的繁荣气象。它对汉以前历史文化的整理和记载,符合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回顾、总结历史文化的需求。司马迁曾将《史记》的编撰宗旨概括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究天人之际”,是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之间的关系;“通古今之变”,目的在于“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总结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成一家之言”,则是司马迁根据自己的历史观认识,在史实基础上,总结反映当时逐步形成民族文化价值观和理想人格。

《史记》在史学上的主要成就,首先是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编撰体例。纪传体的一些体例,虽然在《史记》之前有些史书已经有过,但是司马迁不仅有所独创,而且最早将这些不同的体例有意识地组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一杰出的创造前无古人,后传百世,为纪传体史书在史籍中的权威地位打下了基础。其次,《史记》是

^① 见《汉书·艺文志》。

一部信史。在写作中,司马迁除了搜求大量古史经传、诸子杂著,还周游各地,亲身考察,“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对于丰富的材料,又作一番排比考订;对不能审定的史实,就“疑者传疑”或“疑者阙焉”,而不虚构滥加。所以班固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史记》载史有详近略远的原则,全书贯通三千年,而重点则在汉代,全书一百三十篇,专记汉史的有六十二篇,兼记秦汉的有十一篇。不仅篇章比例如此,在写通贯的史事时,也把重点放在汉代。这种详近略远的记史原则,更利于现实的参考借鉴,成为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史记》的魅力,还在于以动人的文采传神。举凡大如攻城掠地、金戈铁马的战斗场面,小如一颦一笑、举杯投箸的细微动作,都能给以生动的描写,再现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

《史记》问世以后,纪传体史籍得到了连续不断的发展,首先是东汉班固,他继承《史记》的体例,进一步完成了纪传体的正统化和规范化。《汉书》一百卷,专记汉代历史,纪传体由《史记》的通史变为《汉书》的断代史,由于断代史具有起迄断限分明、兴衰过程清晰的优点,所以成为后世纪传史遵循的成法,自《汉书》以后,断代史成为纪传体史籍的主流,并获得正史的地位。“正史”之名,首见于《隋书·经籍志》,其“正史类”小序曰:“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纪传体史籍被定为“正史”,说明统治者利用纪传史来宣传正统史观的明确指向,因此自唐代开始,官修断代纪传史成为改朝换代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历代继作,前后相续,形成了一套系列纪传史丛书——“二十四史”。它包括由《史记》至《明史》等二十四部纪传体史籍,凡三千二百九十四卷,约四千万字。“二十四史”是清朝乾隆皇帝“钦定”作为正史刊行的。所以《四库总目》说:“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令法典,莫敢私增,所由稗官野记异也。”“二十四史”的地位被提高到类如经书,被认为是记载古代历史最权威的史著。

“二十四史”的形成,有其历史过程。最初人们把《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称为“三史”,三国时的孙权就劝导他的将军吕蒙要读“三史”^①。刘宋范曄的《后汉书》问世后,人们又把《史记》、《汉书》、《后汉书》和西晋陈寿的《三国志》称为“四史”。这四部史书都是私人修撰,没有官修史书的某些弊病,再加上历久成书,千锤百炼,无论是史笔还是文采,都堪称一流,在“二十四史”中水平最高。“四史”之后,唐代有“十史”的说法,宋代有“十三史”的说法,而尤以南宋文天祥回答元丞相的那句话:“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更为著名。“十七史”即“前四史”加上唐代房玄龄的《晋书》、梁代沈约的《宋书》、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唐姚思廉的《梁书》和《陈书》、北齐魏收的《魏书》、唐李百药的《北齐书》、唐令狐德棻《周书》、唐李延寿《南史》和《北史》、宋代欧阳修《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到了明代,国子监在“十七史”的基础上再加元代脱脱主编的《宋史》、《金史》、《辽史》和宋濂主编的《元史》,刊刻为“二十一史”,世称“监本”。清代张廷玉主编的《明史》完成后,乾隆皇帝诏命刊行“二十二史”;不久,又令将后晋刘昫《旧唐书》补入,形成“二十三史”;修《四库全书》时,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代薛居正的《旧五代史》,乾隆又诏令将它刊入正史,于是形成了“二十四史”。

除“二十四史”外,还有两部重要的纪传体史书。一是清末学者柯劭忞所作的《新元史》,曾被北洋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定为正史。另一部是民国初由赵尔巽、柯劭忞等人编修,专记清代历史的《清史稿》。

“二十四史”的体例虽然各有变化,但是基本一致的。人物记载是纪传体的中心,由于“本纪”和“列传”是其不可缺少的内容,所以才称之为纪传体。“二十四史”都有“本纪”和“列传”,其中记载帝王事迹的“本纪”被看作是纪传体史书的骨架,位于其他内容之首,成为全书的

^① 见《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

纲领。刘知幾在《史通·本纪》中解释“本纪”体例时说：“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本纪”是按编年体的形式记载的，叙述的虽以各朝帝王的言行政迹为中心，但系以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大事，所以犹如一部简明的编年史。自司马迁《史记》创立“本纪”这一体例后，各史相沿不变，但不同之处在于谁应该入本纪，则帝王的正统问题。在《史记》中，项羽没有当过一统天下的皇帝，不过是号为西楚霸王的一方诸侯而已。但司马迁为了肯定他灭秦的功绩，将他列入“本纪”。《晋书》为开国皇帝司马炎之前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立纪，为史家所讥；《魏书》别立《序纪》，追记道武帝先祖，则为《金史》所仿。每当列国分立相争之后，本纪中以何方为正统就是一个大问题，往往争议不休。元初修宋、辽、金三史，就因为正统问题争论了十几年，迟迟不能开修，最后决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争议才算罢休。总之，对于“本纪”记载对象的安排，可以看出作者的历史观倾向。

“世家”一体是用来记载诸侯历史的。司马迁立世家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特点。在秦以前，诸侯割据，专制一方，他们既与天子有别，又不同于一般大臣，所以必须立“世家”以示区别。实际上，世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史通·世家》）。它可说是诸侯的本纪。《史记》立世家以记诸侯，但实际撰写中又有新意，如以孔子学术贡献之大，尊为世家，皆有独到之处。班固《汉书》取消世家，尽入“列传”，为后代史家所仿效。但有些史书也承袭《史记》立世家的作法，或稍作变异，如《晋书》立“载记”以记十六国史，类如世家；《新五代史》以“世家”记十国历史，《辽史》以“外纪”记西夏、高丽的历史，也可看作是世家的变体。

“二十四史”中的“书”或“志”是记载典章制度的，《史记》称“书”，《汉书》称“志”，以后各史皆称“志”，只有《新五代史》称“考”。“二十四史”中《三国志》、《南史》、《北史》无“志”。梁、陈、齐、周、隋五史合“志”，归于《隋书》之中，这是避免重复的好办法。“书”、“志”所记的内

容非常广泛,具体地说,“礼志”或“礼仪志”记国家典礼仪式;“乐志”记音乐和乐器;“历志”或“律历志”记历法;“天文志”记天文星相;“郊祀志”或“祭祀志”、“封禅书”记祭祀天地、祖宗之事;“河渠志”或“沟洫志”记水利工程、江河变迁;“食货志”或“平准书”记农业、工商业制度和政策的沿革变化;“刑法志”记法律制度;“五行志”记自然灾害,其中有不少天人感应的内容,也有一些自然科学史料;“地理志”记物产、地理沿革与行政区划;“艺文志”或“经籍志”记本朝和历代图书;“百官志”或“职官志”记官吏品秩和职权范围;“舆服志”记皇帝、王公大臣的车马服饰制度;“符瑞志”或“祥瑞志”记灾异和祥瑞与人事的关系;“选举志”记学校、科举制度,以及官吏的选拔、考核和管理;“兵志”或“兵卫志”记军事制度。此外,《魏书》还有“释老志”记佛、道二教。这许多志书的名目,《二十四史》中并不是每史都具备的,有多有少,有的即付阙如,其中最多的是《宋史》,有十五志;最少的是《新五代史》,只有“司天考”和“职方考”。

“列传”,主要是指人物传记。它在“二十四史”各史中占有较大的篇幅,“列传”在《汉书》以后各史皆称“传”。“传”的类型分几种:一是“专传”,即一人一篇传记,用来叙记一些较重要的人物,如公卿将帅或大奸大恶者;二是“合传”,二人或数人合一篇传,《史记》的合传较多,如《老子韩非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等;三是“类传”,把同一类人物合记在一篇传记中,多者可达百数十人,各史常有的《循吏传》、《酷吏传》、《儒林传》、《孝义传》等即是;四是“附传”,即一篇以一个人的传为主,在后附载同一家族或事迹相近的人物传记,一般主传内容多,附传内容少。

“表”的作用在于省简文字,便于检寻。“二十四史”中有九部史书有表,其中《史记》十表,《汉书》八表,《新唐书》三表,《新五代史》有一份年谱,《宋史》二表,《辽史》八表,《金史》二表,《元史》六表,《明史》五表。这些表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以人为主,表列世系,如《史记》的

“三代世系表”、《汉书》的“诸侯王表”；二是以国家和部族为主，表列重要事件的，如《史记》的“六国年表”、《辽史》的“部族表”；三是表列制度沿革变化的，如《汉书》的“百官公卿表”、《新唐书》的“藩镇表”。

纪传体史书除本纪、列传、世家、书志、表五种主要体例外，“论赞”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内容，自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太史公曰”引发史评后，“二十四史”中大都有这类评论。或曰“赞”、或曰“评”、或曰“论”。以论赞为名义的史评，大都附在本纪和列传篇末，世家和书志也有一些，它们与所在的篇章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史文中的论赞，不仅以使读者加深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认识，而且也是研究作者史观、史法的重要材料，因此值得重视。

“二十四史”中各史的版本很多，宋以前的抄本今已不存。“十七史”有南宋刊本。明代南、北监分别刊刻“二十一史”，明代毛晋也有私刻的汲古阁本“二十一史”。清代有武英殿“二十四史”刻本。民国时期有百衲本“二十四史”。本世纪七十年代由中华书局出齐的“二十四史”标点铅印本，是最完备、最精善、最实用的版本(图4)。中华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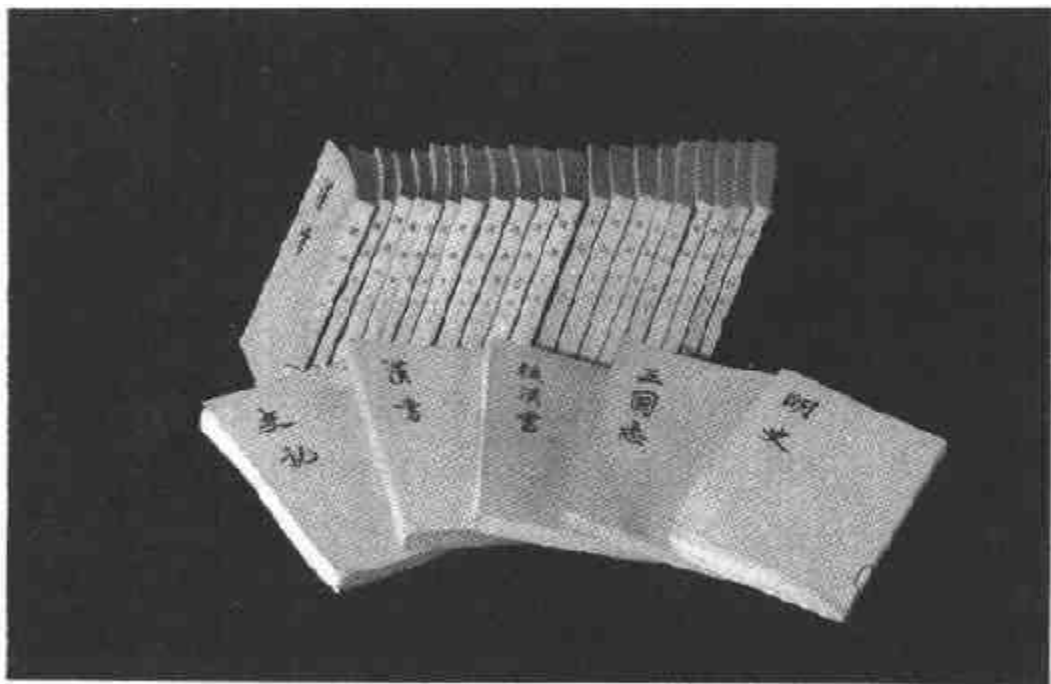


图4 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部分)

同时也将《清史稿》标点出版。

纪传体史籍虽然不少,但以“二十四史”和《新元史》、《清史稿》最为重要,价值最大。

三、以事为纲:纪事本末体史籍兼采二体之长

纪事本末体是继编年、纪传体之后出现的第三大史书体裁。它以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为起端,是一种以记事为主,每事一篇,独立标题,自具首尾的编纂形式。因为它专记一事,始末了然,故称之为“纪事本末”。

在纪事本末出现以前,编年、纪传二体已流传了很长时间,这两种史书体裁虽各有优点,但也有不足之处。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评论二体优点后又指出其各自的缺陷,如编年体对人物“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而纪传体则将相同的一事“分在各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史通·二体》)。又有人认为阅读编年、纪传史书不容易看到完整的历史事件记载,编年是“年不一事”,纪传是“事不一人”,“欲求一事之本末,原始而要终,则编年者患其前后隔越,纪传者患其彼此错陈”^①。袁枢创造的纪事本末体,正是以记事为特长,解决了编年体将一事分载数年而纪传体则在本纪、列传、书志中反复叙述一事的缺陷。

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县)人。他于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试礼部词赋第一,出任温州判官,后为太学录,因与宰相不合,在乾道九年(1173年)出为严州教授,《通鉴纪事本末》就是在这个时期编写的。此后他又历任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做过工部、吏部郎官和常德、江陵知府等。《宋史·袁枢传》说:

^① 闵萃祥:《汇刊七种纪事本末序》。

“枢常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袁枢的本意原来是想通过精简《通鉴》帮助读者解决阅读这部浩博史书的困难，但却因此创造了一种具有重要意义史体。

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将二百九十四卷的《通鉴》，剪裁改编为四十二卷；将《通鉴》所记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总括为二百三十九个题目（另附相关事件六十六项），每题一事，每事一篇，详记始末，使“根干枝叶绳绳相生，不待反复它卷而了然在目”^①。全书将秦以前历史分立为“三家分晋”、“秦并六国”、“豪杰亡秦”三目；两汉分立为“高帝灭楚”至“袁绍讨公孙”四十三目；三国魏晋分立为“曹氏篡汉”至“魏灭仇池”六十二目；南北朝分立为“刘裕篡晋”至“隋灭陈”四十三目。隋唐分立为“隋易太子”至“朱温取缙青”六十五目。五代分立为“朱温篡唐”至“世宗征淮南”二十三目。《通鉴》全书约五百万字，袁枢书仅二百万字左右，其选录材料不及《通鉴》一半，但其书行世以后，却从未有人指责它遗漏了《通鉴》什么重要史实。可见袁枢选录剪裁具有敏锐和严密的眼光，其因类排纂、组织零碎史料为一完整事件的才能更是不可埋没。清代学者章学诚称誉袁枢的创造是“化臭腐为神奇”，他赞扬纪事本末的体例是“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文史通义·书教下》）。从实际效果来看，纪事本末体以简练的文字，克服了编年、纪传的弱点，将各个历史事件的全貌集中反映出来，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章氏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自袁枢创造纪事本末体裁以后，续作的纪事本末体史籍接踵而来，这些续作继承、发展了纪事本末的体例，其进程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① 赵与峕：《通鉴纪事本末序》。

第一阶段仍属“抄撮它书”的旧法,但取材的范围有所扩大。在宋代,继续从编年体史书改编成书的有杨仲良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百五十卷,此书全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每事一篇,共三百四十五篇。此外,还有章冲依《左传》编成的《春秋左传事类始末》。明代陈邦瞻编写的《宋史纪事本末》一百零九卷和《元史纪事本末》二十七卷,依纪传体史书《宋史》、《元史》改编,扩大了这类史书的取材范围,使纪事本末体史书中有了“礼乐仪”、“正雅乐”、“治河”、“学校科举之制”、“道学崇黜”、“佛教之崇”等反映思想文化、典章制度方面的专题。当然这些专题也是作为事件来叙述的。

第二阶段的进步比较明显,此期的《明史纪事本末》摆脱了对它书的依傍,独立创作,走在正史的前面。《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清初谷应泰撰,凡八十目,记事始于元朝至正十二年(1352年)朱元璋起兵,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该书比官修纪传体《明史》早八十多年成书,当时遗留的明代史料较多,可供写作时采用,因此其史料价值较高。书中有些内容是《明史》没有的,有些史实又是两书不同的,所以《明史纪事本末》可以补《明史》之不足,也可以发挥考史的作用。此前的纪事本末史书,仅在体裁上发挥优势,简明易读,便于普及历史知识,而《明史纪事本末》又兼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它对于推动纪事本末史籍的发展,影响巨大。

第三阶段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具有考辨史实、进行体裁形式改革的特点。这类史书的代表是清代高士奇编的《左传纪事本末》五十三卷,李有棠编的《辽史纪事本末》四十卷、《金史纪事本末》五十二卷。《左传纪事本末》按周、鲁、齐、晋、宋、卫、郑、楚、吴、秦等十一国排列,在各国下又选取大事标目成篇,分国标举大事,更容易让人在春秋列国纷繁的史事中把握事件发生发展的头绪。然而更重要的是,编者在正文之外,博采《公羊传》、《穀梁传》、《国语》、《史记》等二十多种先秦、西汉典籍,以“补逸”、“考异”、“辨误”、“考证”、“发明”等五种形式

增加了考辨内容。所谓“补逸”，是利用其他典籍的内容补《左传》之不足；“考异”是编撰者考出其他典籍与《左传》记载的不同，以便读者参考；“辨误”是以《左传》的记载去证明其他史书的错误；“考证”是利用其他史料为本书提供进一步的佐证和补充；“发明”是用来阐明《左传》内容的含义或表达编撰者对史实的评论。《左传纪事本末》的考辨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五十，正是这些内容保证了自《明史纪事本末》以后这类史书在考史方面的参考价值和学术风格。稍后的《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的“考异”内容更丰富，分别占全书的一半以上，各书的参考引用书都多于五六百种。“考异”的范围十分广泛，有同名异名考、地理沿革考、史实异同考等。

纪事本末发展到最后一个阶段是涌现出大量的专题性著作，并逐步向近代史籍过渡。专题纪事本末不同于记叙一个朝代的断代史本末，也不同于记叙几个朝代的通史性本末，它是专就一个历史问题编撰成书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如清代杨陆荣的《三藩纪事本末》四卷，专记“南明”的历史活动，分“三藩僭号”到“杂乱”等二十二个标题，一一叙事。清代编写的专题性纪事本末很多，它们是后世专史研究的先驱。其中有两大类较为突出，一类是记清朝武功的“方略”、“纪略”书，如《平定准噶尔方略》等二三十种；另一类是记清王朝与列强交往的屈辱史，如《中法兵事始末》、《筹办夷务始末》、《各国立约始末记》等等。

如以朝代性纪事本末体史书来说，举其较有代表性的十二部著作，按所记时代先后排列，便已通贯古今、在史籍编纂学上自成系统了。如：《绎史》一百六十卷，清代马骥编，辑录上古至秦末史迹，每事一题；《左传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清末李铭汉编，据毕沅《续资治通鉴》改作，记北宋至元一百一十件史事、《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清代张鉴撰；《元史纪事本

末》、《明史纪事本末》、《清史纪事本末》八十卷，清代黄鸿寿撰。

纪事本末体史书为我国史籍的多样性、连续性特征增加了新的内容，是继编年、纪传体史籍以后的一大流派，值得重视和加以利用。

四、各具功能：其他体裁的史学典籍

除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等三大体裁的史籍外，典志体史籍也是自成系统的重要史籍。它专记数代或一代典章制度，创始于唐代杜佑的《通典》。《通典》的问世，既由于杜佑本人的史观和史才，也是史学发展的客观需要。因为《史记》、《汉书》虽创立了专记典志的书志，但《汉书》以后，正史中的志或有或无，极不统一，对秦汉以来形成的典章制度无法系统记载；又由于断代史体例的局限，使后人不能了解制度的沿革兴废。典制体史书的出现，不仅解决了以上问题，而且大大扩展了正史书志的记载范围。杜佑所撰《通典》共二十卷，分食货、选举、官职、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门又分若干目，有的还有子目，目下以朝代先后为序，依次记述上起黄帝、尧舜，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的典章制度。每一朝代，又以时间为序，记述各种制度的沿革兴废和历代的评价。

杜佑之后，典志体史书相继而出，先有“三通”，后有“九通”，最后形成“十通”。“三通”指《通典》、南宋郑樵《通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郑樵的《通志》本是通史性纪传体史书，但人们往往只利用其精华，即专记典章制度的“二十略”。《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记载史实由上古到南宋宁宗嘉定末年为止，门类扩充为二十四门，对通史性典志体史书有较大的发展。“九通”指“三通”之外，加上清代乾隆敕撰的六部典志体史书。仿《通典》体例的有《续通典》一百四十四卷，记事上起唐肃宗至德元年下迄明崇祯末；《清通典》一百卷，记事起于清初，终于乾隆五十年。仿《通志》体例的有《续通志》六百四十卷，内容

与《通志》相衔接,纪、传从唐初到元末,“二十略”从五代到明末;《清通志》三百卷,记事起于清初,止于乾隆末年。仿《文献通考》体例的有《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二卷,记事上接宋宁宗,下迄明崇祯,取材多根据明代王圻编撰的《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二百六十六卷,记事起于清初,终于乾隆五十年。“十通”是“九通”外加刘锦藻编撰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四百卷,较《清文献通考》增加“外交考”、“邮传考”、“实业考”、“宪政考”等内容,记事自乾隆五十一年至宣统三年。

受《通典》的影响,还产生了“会要”这种专记断代典章制度的史书体裁。“会要”初创于唐德宗时苏冕撰写唐代九朝典制的《会要》四十卷。唐宣宗时又命人撰成《续会要》四十卷。北宋初,王溥将以上两书重新整理,合成《唐会要》一百卷,这是专记一代典制的第一部会要体史籍。不久,王溥又续撰了《五代会要》三十卷。宋朝对会要的编修非常重视,设“会要所”专司其事,可惜后来散佚,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宋会要”的有关材料,经后人整理成今本《宋会要辑稿》,史料价值甚高。此外又有一批会要体史书,是根据已有史书整理编撰的。如清人姚彦渠的《春秋会要》,孙楷的《秦会要》,宋人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清人杨晨的《三国会要》、朱铭盘的《西晋会要》、《宋会要》、《齐会要》、《梁会要》、《陈会要》,龙文彬的《明会要》等。“十通”和“会要”等典志体史书都形成了一套贯穿古今的典章制度史系列,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此外,元、明、清三代,朝廷都组织人编修过断代典章制度史,如元朝编有《经世大典》、《元典章》两书,《经世大典》今已亡佚,现存辑本所得甚少。明有《明会典》,清有《清会典》,这些都是记载一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典籍。

在我国古代,地理志是史学的一部分,正史中有“地理志”,典志史中有州郡或輿地。地理类史书作为专门记载地理沿革变迁的典籍,在魏晋南北朝就发展起来了。此期关于地理的著作有三百种之多,最

著名的有裴秀《禹贡地輿图》、陆澄《地理书》、任昉《地记》、顾野王《舆地志》、阚骃《十三州志》、酈道元《水经注》，这些历史地理典籍已大部分亡佚，仅《水经注》流传下来。隋唐以后，舆地书续作不断，较著名的有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欧阳忞的《舆地广记》、祝穆的《方輿胜览》、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王存的《元丰九域志》，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

传记体史籍的主要内容是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可以说是传记体史籍的起源，而纯粹的系统的人物传记，是从司马迁《史记》的列传开始的。自刘向编《列女传》、《高士传》以后，传记类史籍才独立成书，并逐步发展起来。至唐代，传记体史籍已十分发达，从《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下，已可见到先贤、孝友、忠节、列藩、良吏、高逸、科录、文士、仙灵、高僧、鬼神、列女等不同类型的传记。

传记体史籍发展到明清，有一支流演变为记载学术思想史的学案体。学案体本质是记载学术人物的传记，由于广泛介绍其思想流变和师传，成为别具一格的学术史专史。学案体创始于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此书六十三卷，记明代学术流派，对一代儒学名流及其言行、宗派无不备载。此后黄宗羲又作《宋元学案》，未成而卒，由全祖望、王梓材等人续足一百卷。王梓材又撰《宋元学案补遗》一百卷，再作补充。清代相继而起的学案体史籍有唐晏的《两汉三国学案》十一卷，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八卷、《宋学渊源记》二卷（附记十卷），唐鉴的《国朝学识小案》十五卷，徐世昌等所作的《清儒学案》一百卷。

史部著作中还有不少独立体裁的典籍，如与地志相关的方志书，可看作是专记一地史实的典籍；与传记相关的谱牒类典籍，是专载一家一族繁衍过程的史书；与典志书相关的职官类典籍，是反映历代官

制沿革的专史；还有专记帝王言行动止的起居注、实录；有汇编皇帝诏书、臣子奏章的诏令集、奏议集；有记载各代典藏或著述的目录书。史部典籍范围甚广，数量极多，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对史学家和史籍进行评论的专著——史评体史籍。其代表作是唐代刘知幾的《史通》二十卷，原五十二篇，亡三篇，现存四十九篇；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九卷。这两部重要著作对于古代史学的评论和总结，对于古代史书体例的许多论断，至今仍然为史学界参考和借鉴。

第五节 文学传统与文学典籍

我国文学的起源极早，上古的神话传说和先秦的诗歌、散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绚丽的文辞、严谨和谐的结构与韵律创造了我国文学的光辉开篇。此后，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杰出的创造。两汉的文章辞赋、魏晋骈体散文、唐诗宋词、元杂剧戏曲、明清小说等等，都曾在各自的时代闪耀过艺术的光辉。积累的典籍也是浩如烟海、满苑奇葩。

除戏曲、小说、诗文评等作品能够独立成书外，几乎所有诗词曲和散文、骈文作品都是以“集”的形式汇编成书的，因此在古代目录书中，文学典籍归于“集部”。集部书大都带有汇集、综合性质，个人作品的综合集称为“别集”，诸家作品的综合集称为“总集”。总集中，有的以文学体裁归类结集，如诗总集《诗经》、《全唐诗》，散文总集《全唐文》、《宋文鉴》等，有的则是诗文合编，如《文选》、《文苑英华》等等。以个人作品结集的别集，多数也是诗文合编的，这种诗文多体合编的别集、总集，在文学典籍中占有很大的分量，需要在各文体之外进行专门分析。以下仅从诗歌、散文、戏曲、小说、诗文评、诗文总集与别集等，阐述我国文学的悠久传统及各类文学典籍的产生和发展。

一、诗歌的创作及其典籍

我国古代诗歌早在史前时期的口头创作中就产生了,它是各种文学形式中最早出现的。商代甲骨文中记录的诗歌已有节奏,周代金文中记录的歌谣已经开始押韵。早期的诗歌大都是四言诗,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基本上是四言诗。《诗经》产生于春秋时期,本称《诗》,后因儒家尊其为经典,才称《诗经》。这部诗歌总集收入三百零五首诗,代表自西周初至春秋之间约五百年的诗歌创作,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这段时期的社会生活和艺术风格。《诗经》按作品内容性质和乐调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有十五国风,绝大部分是民间诗歌;“雅”分大雅、小雅,大部分是贵族士大夫的作品;“颂”全是贵族士大夫的作品,是用于朝廷、宗庙的乐章。由于《诗经》被尊为儒家经典,因此自汉代以来传授、注释和研究《诗经》成了一门专门的“诗经学”,仅注释《诗经》的著作,今存便有近千种,较通行的是西汉毛亨作传、东汉郑玄作笺、唐代孔颖达正义的《毛诗正义》,以及南宋朱熹注解的《诗集传》。

战国时期,南方的楚国人创造了一种“书楚语,作楚声”的特殊形式的诗歌,后人称为“楚辞”。我国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生活于楚国的屈原,以他卓越的诗篇《离骚》、《九歌》和《九章》等作品构成了“楚辞”的新形式,完成了“楚辞”的创造。“楚辞”比之《诗经》中的诗,不仅有不同的风格和情调,而且篇幅大为扩充,句式增长,由四言句式变为大部分六言句式,因而可以容纳更为丰富的思想和内容。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及汉代一些诗人撰拟的作品,汇编成《楚辞》这一部诗歌总集,收入作品十六篇。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时,又增入他自己作的《九思》,共十七篇。《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深远而巨大,因而自汉代以后“楚辞学”的研究持续而深入,有关流传、注释

的著作达二百余种。其中,王逸的《楚辞章句》十七卷,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楚辞》注本。此外,朱熹的《楚辞集注》八卷,克服了汉儒说经的习气,批评了王逸的错误与附会之处,颇有独立见解。清代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六卷,注重对屈原生平的考订及对作品中神话传说的阐释。清代戴震的《屈原赋注》七卷,附《通释》二卷,《音义》三卷,对于山川地理、草木鸟兽虫鱼的释名及音读、训诂,皆有可取之处。

汉代除了文人诗坛的辞赋创作外,民间出现了一批以五言句式为主,形式比较自由的民歌。这些民歌往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所以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性。汉武帝时设立乐府,采集民歌,同时收集文人士大夫仿照民歌形式创作的歌辞,形成了汉代的“乐府诗”。两汉乐府诗直接影响了南北朝的诗歌创作,南北朝的乐府民歌篇幅较短小,抒情的成分也渐渐多起来。汉魏六朝乐府诗在流传过程中有很多散佚,特别是汉乐府,仅存五六十首。宋代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一百卷,是收罗乐府诗最完备的一部总集,包括汉至唐五代的乐府诗作。魏晋南北朝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重要阶段,东汉末的建安时期就出现了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及孔融、陈琳等“建安七子”为代表的许多诗人,他们的诗歌在汉乐府中吸取营养,反映出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体现了要求统一的愿望。作品情调慷慨,语言清新刚健。曹魏后期有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的诗歌,作品多用隐晦手法吐露忧国刺时的不满情绪。东晋时出现了善于描写田园生活和景象的杰出诗人陶渊明,南朝时诗歌作品较有成就的是以山水诗见长的谢灵运和善于反映现实的鲍照。以上诗人的作品多收录于各人的别集中,仅有陶渊明的《陶靖节诗注》四卷独立传世,由宋代汤汉作注。这个时期的诗歌总集,有明代梅鼎祚编的《汉魏诗乘》二十卷,清人周负亮编录的《汉魏六朝诗三百首》,近人丁福保编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五十四卷。

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进入了全面繁荣的高峰,涌现出许多伟大

的诗人和优秀的作品。比如,初唐的“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盛唐时期的“田园山水诗人”王维、孟浩然,“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王昌龄等。而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自然归于李白和杜甫。李、杜各以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认识和博大精深的艺术造诣,运用不同的创作手法,把古典诗歌的艺术推向了高峰。他们不仅是唐代,而且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杰出的代表。继李、杜之后,还有中唐的白居易、刘长卿、韦应物、孟郊、李贺、刘禹锡,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聂夷中等著名诗人。这些诗人的作品,大多收入各自的别集中,而唐诗诗集则从唐代就有人编选了。现有最早的唐诗集是唐代芮挺章编选的《国秀集》三卷,此书原收录诗人 90 人,作品二百二十首,但现存只有 85 名诗人的二百一十八首作品。此外,又如殷璠编选的《河岳英灵集》三卷,收盛唐诗人 24 名,作品二百三十四首。元结编选的《篋中集》一卷,仅收诗人 7 名,作品二十四首。中唐诗集如高仲武编选的《中兴间气集》二卷,选“安史之乱”后肃宗、代宗时期 26 位诗人的作品一百三十四首。唐以后编选的唐诗集在题材和编辑目的上比较明确,如五代时韦毅编的《才调集》十卷,每卷录诗一百首,题材偏重于男女闺情,风格艳丽。南宋洪迈编的《万首唐人绝句》一百卷,专选唐诗的七言、五言绝句,末附六言绝句一卷。元代方回编的《瀛奎律髓》四十九卷,专选律诗,但兼采唐宋各家。至明清两代,开始大规模收集唐诗,编辑广采无遗的唐诗总集,明代胡震亨编的《唐音统签》一千零三十三卷,辑录唐五代诗,取材丰富,卷帙浩繁。清代彭定求等人在《唐音统签》及清人季振宜《唐诗》的基础上,对唐诗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整理,编成《全唐诗》九百卷,共收二千二百余名诗人的作品四万八千九百余首,成为研究唐诗的主要典籍。此外,清人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六卷,作为唐诗的通行读物,流传极为广泛。

唐以后,诗歌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形式——词,并在宋代兴盛起来。词萌芽于南朝,形成于五代。最初的词是要配乐来歌唱的,有的

按词制调,有的依调填词,后来主要是依调填词,填词用的调名,如“满江红”、“念奴娇”等,称为“词牌”。调与词内容不一定有联系,而且大多数词已不再配乐歌唱。从晚唐开始,文人大量写词,温庭筠现存的词就有七十余首,五代时南唐后主李煜是当时重要的词人。宋代重要的词人,婉约派的有晏殊、晏几道、秦观、李清照;豪放派的有苏轼、辛弃疾、陈亮等,还有范仲淹、欧阳修、柳永、周邦彦等著名词人。词集自宋代以后大量出现,南宋黄载万编的《梅苑》十卷,所收尽为北宋人咏梅之词,目录标有五百零八首,现已缺九十六首。何士信编的《草堂诗余》四卷,共录词三百六十七首,以宋词为主,间有唐、五代的作品。周密编的《绝妙好词》七卷,收南宋张孝祥、陆游、辛弃疾至宋末仇运等132家近四百首词,清代李为仁、厉鹗曾为此集作笺注。明代毛晋编的《宋六十名家词》六集,九十一卷,汇录了宋代主要词家的作品,流传甚广。今人唐圭璋编的《全宋词》三百卷,附录二卷,辑宋代词人千余家,词二万余首,集宋词之大成。另有一些续录宋以后作品的词集,如明代陈耀文编的《花草粹编》十二卷,选录唐五代、宋元人词三千余首。清沈辰垣等人编的《历代诗余》一百二十卷,所录唐至明代词九千余首。与唐代诗人不同,宋代著名的词人几乎都有个人的词集,仅《四库总目》所著录的专人词集就近六十家。如晏殊的《珠玉词》一卷,收词一百七十余首。柳永的《乐章集》一卷,苏轼的《东坡乐府》二卷,黄庭坚的《山谷词》一卷,秦观的《淮海居士长短句》三卷,周邦彦的《片玉词》二卷、补选一卷,李清照的《漱玉词》一卷,辛弃疾的《稼轩长短句》十二卷,陈亮的《龙川词》一卷、补选一卷等等。

诗词发展到宋金对峙时期,又逐渐形成了散曲这种新诗体,并在元、明两代盛行起来。散曲可以说是词的别体,它在长短句歌词的基础上又吸取了一些民间俚曲和少数民族乐曲。散曲又分小令、套数两种体裁;按南北风格不同,又分北曲和南曲。词变为曲是一大进步,因为散曲可在本调的正字外添加“衬字”,使之语言更接近口语化,增强

了表现力。元代散曲作家二百余人,前期的有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等人,中期有张养浩等,后期又有张可久、乔吉等。元代散曲家留给后人的个人散曲专集很少,仅有张养浩的《云庄休闲自足小乐府》一卷,张可久的《小山乐府》六卷,乔吉的《梦符散曲》和汤式的《笔花集》等四种。元代散曲较重要的总集有元人杨朝英先后编成的《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九卷和《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九卷。前者收小令四百九十二首,套数四十七套;后者收小令一千零六十二首,套数一百四十一套。今人隋树森在“杨氏二选”的基础上,广为搜罗,编成《全元散曲》一书,共收小令三千八百五十余首,套数四百五十余套,是有关元代散曲的重要典籍。明代散曲作家有三百多人,但流传的作品不多,内容、风格未能比元曲有更大的发展。明散曲家的个人散曲专集也不多,仅有王九思的《碧山乐府》一卷,《拾遗》、《续稿》、《新稿》各一卷。朱有燉的《诚斋乐府》二卷等数种。明代散曲作品主要保存在一些散曲总集中,如明代无名氏所编的《盛世新声》十二集,兼收元明散曲套数和戏曲曲文四百余套,小令五百多首。无名氏编的《乐府群珠》四卷,收元明散曲家所作小令一千八百余首,但以元人作品居多。陈所闻编的《南北宫词纪》十二卷,所选多为明人散曲,材料比较丰富。

在词和散曲发展流行的同时,原有的诗歌形式在宋、元、明、清各代依然流风寝染,流传下来许多宝贵的作品,这些诗作主要保存在各代编辑的诗总集里边,以宋诗而言,其数量要比词多得多。清代厉鹗《宋诗纪事》中著录的宋代诗人多达三千八百多人。清代学者对于宋、元、明、清的诗歌结集作了大量工作。如张景星编的《宋诗别裁集》、《元诗别裁集》,前者收入宋代诗人 137 名,各体诗六百四十首,后者收入元代诗人 152 名,诗作六百一十九首。沈德潜编有《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前者收明诗一千余首,后者收清初至乾隆间诗作三千余首。此外,顾嗣立编的《元诗选》四集,收录了大部分元诗。朱彝尊编的《明诗综》一百卷,收入了明诗人三千四百余家的作品。

我国诗歌创作的传统源远流长,诗歌典籍的数量极其丰富。本世纪以来,文学界对于诗歌典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除注释、研究外,还进行了一些大规模的搜集编辑工作,比如目前由北京大学古籍所整理的《全宋诗》,由复旦大学古籍所整理的《全明诗》,由陆峻岭主编的《全元诗》,由程千帆主编的《全清词》等,正陆续或即将出版,这些大型诗词典籍的问世,将更会全面地展现我国诗词园地的丰富多采和绚丽多姿。

二、散文的创作及其典籍

我国古代的散文创作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口头文学最先起源于诗歌,书面文学最初当是散体的记录,这些成文的记事作品从文学形式上看,就是散文或者历史散文。《尚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古史,也是第一部集记叙文和论说文的散文典籍。在春秋战国这个学术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中,散文创作也有突出的成就,这就是“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的出现。此期产生的《论语》、《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都是优秀的诸子散文典籍。《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学名著则属于历史散文典籍。历史散文在汉代得到划时代的发展,其代表性著作是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政论文在汉代发达起来,西汉初贾谊的《新书》、东汉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等都是典型的政论文典籍。诸子散文在汉代则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刘安等编的《淮南子》等典籍。自魏晋南北朝开始,散文逐渐向清新挥洒的方向发展。三国时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的散文具有代表性,反映了这一时期散文侧重于抒情的特色。晋代陶渊明的散文,更发展了这种风格,在叙事、写景中结合抒情。

从总体上看,魏晋前的散文偏于叙事,魏晋后的抒情散文逐渐多了起来。魏晋前以作家的个人散文专集较多,魏晋后的散文作品则多

归于总集和作家个人的别集。入唐以后,散文创作进入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唐中叶的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古文运动,反对六朝以来日趋僵化的骈体之风,使散文在写景、抒情、言志、叙事、论理等方面真正发挥了散文的文学性质。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文天祥等人,继承和发扬唐代古文运动的成就,写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元代散文未能取得明显的成就。明清两代的散文则有持续的发展,明代散文中成就较大的如归有光,他以抒情散文见长。晚明以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和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提倡文学改良主义,他们擅长抒情的短篇小品散文,提倡文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文笔清新流畅。明清之际,顾炎武、归庄、屈大均等人的散文作品洋溢爱国主义的激情,各有成就。清代中后期,出现了以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为代表的桐城文派,他们致力于古文复兴运动,提倡作文“义法”,风行一时,垄断了清代文坛。早期的桐城派散文结构严谨,语言精炼,在写作艺术上具有较高的技巧。

我国散文文体种类繁多,百花竞放,前人对文体的分类虽然各有出入,但总起来说可归纳为辞赋、诏令、奏议、公、书启、赠序、序跋、论说、杂记、箴铭、传状、颂赞、碑志、哀祭、祈谢等十五大类,细分又可析为一百多小类。各体散文作品,除收入历代作家的诗文集外,许多作品收录于散文总集典籍之中。

通代散文总集有清人严可均编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该书收录上古至隋代的单篇散文,计作者 3497 人,除佚名作者外,皆有小传。全书按代汇编,分为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全汉文、全后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全宋文、全齐文、全梁文、全陈文、全后魏文、全北齐文、全周文、全隋文,后又以不明朝代的散文汇为“先唐文”,共十五集。本书的特点在于“全”,搜集面相当广泛,唐以前的单篇散文绝大部分已收入此书。该书的优点还在于一一标明文章的出处,便于读者查对。由于全书篇幅浩大,因此也有错收、漏收、

重出等缺点。1958年中华书局曾将此书影印,并对明显错字作简单标记;1965年中华书局再版重印时,增编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

清代姚鼐编《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姚鼐是桐城文派的集大成者,他编的这部总集体现了桐城派要求语言雅洁的主张。该书按“论辨”、“序跋”等文体分为十三类,选录上起战国、下至清初的散文七百余篇,校订比较精审。

继姚鼐之后,曾国藩编了《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也是一部散文总集,曾氏认为姚鼐所编不选六经,史传选用也较少,取材太窄,因此杂取经史百家,分十一类,选文着重“经世致用”,希望以此补桐城文派之不足。

清代陈元龙编的《历代赋汇》是一部专门收录赋体作品的典籍,正集一百四十卷、外集二十卷、逸句二卷、补遗二十二卷,共一百八十四卷。所收内容上起先秦、下迄明代,阅览历代赋作,以此书最为方便。

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观止》十二卷。全书上起先秦,下迄明代,选文二百二十二篇,以散文为主,间收骈文。这是一部古代散文的精选本,入选作品不仅精彩,而且篇幅较小,便于初学阅读记诵,因此这部短小精致的散文总集编成以后流传最广,影响甚大。

断代散文总集以《全唐文》规模最大,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董诰等人奉敕所编,共一千卷。该书以清内府所藏旧钞《唐文》为蓝本,并从《永乐大典》、《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中采辑唐人散文而成,共录唐五代文一万八千四百余篇,作者三千余人。《全唐文》编成后,清人陆心源又编有《唐文拾补》七十二卷,《续拾》十六卷,补《全唐文》之阙。在《全唐文》之前,明代茅坤编有《唐宋八大家文钞》六十四卷,选录唐宋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等“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清代储欣在此基础上又

增入唐代李翱、孙樵两家散文，编成《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五十一卷。清乾隆年间又“御定”《唐宋文醇》五十八卷，以储氏书改订而成，增录各家评语，为之品题。

辽金散文总集，有今人陈述编的《辽文汇》，后增辑成《全辽文》十三卷。有清代张金吾编的《金文最》一百二十卷，除收金代散文外，间收骈文。

明清散文总集主要有四种：《明文海》，清初黄宗羲编，原书六百卷，《四库全书》收为四百八十二卷，删去有关明末清初的内容，明代文史篇章，赖以保存者颇多；《明经世文编》，明代陈子龙等人所编，收录内容，多涉及时政要务于治乱相关之文，共五百零四卷，载文三千一百四十五篇，作者430人，登录的论文、奏议、尺牍、杂文多不加删削，保持了原貌，有较高史料价值，清代列为禁书，今有影印本；《清文汇》，近人沈粹芬、黄人等编成于清末，共五集，二百卷，收清代作家一千三百余人，清文一万余篇；《皇朝经世文编》，清代魏源编，凡一百二十卷，收清初至中叶作品，分为八类，大多为文书、论著、奏疏、书札等，清末盛康又辑成《皇朝经世文续编》一百二十卷，收道光至光绪间奏稿、论文等一千九百余篇。以上两书作品虽多涉及时务政事，但也反映了清代散文的一些情况。

与诗歌典籍一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对于古代散文典籍的整理、注释、编纂成绩斐然。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已在国内先后开展《全宋文》、《全元文》、《全明文》、《清文海》的编纂及《全唐文》的重编工作，其中《全宋文》的编纂工作已经完成，正由四川巴蜀书社陆续出版。

三、戏剧的创作及其典籍

我国传统的戏剧特点是歌、乐、舞合一的歌舞剧，是一门综合的

艺术,而其基本内容,则依赖于文学范畴的剧本文词。

我国戏剧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巫覡,即祭祀、祝颂祖先或神灵时巫师的歌舞。周、秦之世,已有专职的俳优存在,他们以幽默诙谐的语言和表演为宫廷贵族取乐,这是戏剧胚胎。汉代以角抵、竞技为主的百戏里,也有称为“散乐”的歌舞演出,其中便演过如《东海黄公》^①之类的戏剧性故事。始自南北朝而盛行于唐代的歌舞戏有“代面”、“拨头”、“踏摇娘”等^②。在俳优演出方面,唐代发展成为“参军戏”,一般是两个演员表演,一个机智,一个愚笨,通过戏弄达到调笑娱乐的目的。宋代将参军戏发展成了宋杂剧和后来的金院本,它们都是戏剧的雏形。

元杂剧是在宋杂剧、金院本和说唱诸宫调直接影响下,融会过去各种表演艺术而形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形式。早期的剧作家在唐宋传奇小说、话本、词曲、说唱文学的基础上创造了成熟的文学歌剧剧本,开创了戏剧创作史上辉煌的一页。元杂剧最杰出的作家是关汉卿,他是元杂剧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国戏剧的奠基人。他一生创作戏剧六十三种,今人吴晓铃等编校的《关汉卿戏曲集》收录了流传至今的《窦娥冤》、《蝴蝶梦》、《救风尘》等十八种完整剧本及失传剧目。其中尤以《窦娥冤》一剧最为成功,是元代杂剧的代表作。

元杂剧的另一优秀作品是《西厢记》,作者王实甫共创作杂剧十四部,保存下来的有《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个全本及个别残曲。《西厢记》的传本很多,明清单行旧刻就有四十种左右,流传甚广。该剧描写了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故事,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追求自由恋爱、反抗封建礼教的斗争精神,此剧历代相传,影响很广。

元杂剧中还有不少成功的剧作,据元人钟嗣成《录鬼簿》所载,共

① 见东汉·张衡《西京赋》。

② 见唐·段安节《乐府杂录》。

有四百余种,流传至今的仍有一百六十余种之多。在元代前期杂剧中,较有成就的还有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白朴的《墙头马上》,马致远的《汉宫秋》;后期有郑光祖的《倩女离魂》,乔吉的《两世姻缘》等。

元朝末期,产生于南宋时的“南戏”由于杂剧的衰微,乘时而起,得到了复兴。元末南戏成就较高的作品是高明的《琵琶记》。南戏在元末明初基本定型,许多元末南戏又经明初人改造而流传下来。今存元末明初南戏中,影响较大的还有《拜月亭》、《荆钗记》、《白兔记》、《杀狗记》四大传奇。

《琵琶记》及《拜月亭》等几部剧作是元末南戏到明代传奇的过渡性作品,传奇比以前的剧作篇幅增长,故事更曲折,人物刻画更细腻,曲调也更丰富,分“出”或分“折”的格式固定下来。明代戏剧以传奇最为繁荣,其地位有如元代杂剧。明清的传奇大多是用昆腔表演的,明代梁辰鱼首先用改革后的昆腔编写了传奇剧本《浣纱记》,这个剧本以春秋时越国的范蠡和西施的爱情故事作为线索,写吴越战争及其兴亡,作者热情歌颂了为祖国利益而牺牲个人幸福的范蠡和西施。在写作艺术上,语言华丽而富有诗意,曲词流畅动人,情致婉转而新颖蕴藉。明中叶以后,随着传奇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的戏剧流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和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沈璟撰写传奇十七种,现存有《义侠记》等七种。汤显祖是明代最杰出的剧作家,他以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结合的剧作,扭转了“吴江派”专讲音律的形式主义作风。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有:《紫箫记》、《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等五部传奇。其中最著名的是《牡丹亭》,该剧全名称《牡丹亭还魂记》,写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歌颂这一对青年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的精神。这部剧是我国戏剧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充分发挥了创作的艺术想象。全剧曲词优美动人,说白也句句精彩。《牡丹亭》自明代以来,各种版本,包括点评本、改本极多,流传甚广。

清兵入关以后,改朝换代的重大历史变迁及南方时起时伏的反清斗争,使得戏剧作品中描写历史变故以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内容增多了,单纯描写爱情生活的剧作少了。比如清初李玉的《清忠谱》、朱确的《十五贯》都是较有现实意义而又艺术水平较高的剧作。稍后的洪昇和孔尚任,则各以《长生殿》、《桃花扇》的杰出创作将清代传奇推向了高峰。洪昇创作的剧本共九种,现存杂剧《四婵娟》和传奇《长生殿》。《长生殿》以唐代“安史之乱”作为历史背景,描写唐明皇李隆基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作品富有浓厚的抒情色彩,也有极其壮丽的场面,曲词充满诗意,在音律上也非常讲究。孔尚任的《桃花扇》,则是一部真正通过爱情故事描写国家兴亡的历史剧。它以明末弘光王朝覆亡的历史为背景,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歌妓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线索,集中反映了明末腐朽、动荡的社会现实及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斗争。《桃花扇》也有多种版本,流传甚广。

我国古代的戏剧典籍,除了以上提到的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单本流传的剧本以外,很多保存在戏剧总集之中。《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是现存最早的南戏剧本总集,明《永乐大典》共收戏文三十三种,《永乐大典》散失后,其第13991卷所收《小孙屠》、《张协状元》和《宦门子弟错立身》三种南戏被重新发现,得以刊行。

保存杂剧的剧本总集有明代臧懋循编的《元曲选》,这是现有流传最广、内容也最多的元人杂剧总集。全书一百卷,每卷一剧,共收九十四种元人杂剧和六种元末明初人的杂剧,共一百部剧本,有明刻本和中华书局标点本传世。今人隋树森又从其他一些总集中辑录了《元曲选》未收的元人杂剧六十多种,编成《元曲选外编》,以补前编之不足。《脉望馆古今杂剧》是明代赵琦美所藏元明杂剧剧本的总称,其实可看作是一部自成系统的总集,收入元明杂剧二百四十二种。这批剧本清初为藏书家钱曾收藏。1938年在上海发现后,经整

理,1958年收入《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是现存元杂剧的最早刊本,是研究元杂剧的珍贵文献,1958年商务印书馆收入《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影印刊行。徐沁君以此为底本,又作了《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由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息子机元人杂剧选》由明人息子机编刻,收元明杂剧三十种,现存残本二十五种。《古名家杂剧》和《新续古名家杂剧》由明代陈与郊编,两集共收杂剧五十余种。《阳春奏》由明代王正位选刊,收元明杂剧三十九种。以上四部总集收入《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此外,又有《盛明杂剧》,明代沈泰编辑,分一、二集,每集收明杂剧三十种,共六十种。《杂剧新编》,清代邹式金编辑,是《盛明杂剧》的续编,收剧本三十四种,皆为明末清初作品。以上两部作品有诵芬室刻本传世。

保存传奇的总集有明代毛晋编刻的《六十种曲》和清人编选的《缀白裘》。《六十种曲》全书十二集,每集收五个剧本,共一百二十卷。除少数元人作品外,绝大多数为明人传奇。《缀白裘》所选,也多数为明清传奇,但所选并非全本,而是当时在戏台上流行的单出,共选四百八十九出。初集为清玩花主人编选,清人钱德苍续编至十二集。

四、小说的创作及其典籍

小说是与诗歌、散文、戏剧并称的一大文学形式。从上古到秦汉为古代小说的萌芽时期。上古的神话传说是古代小说的源头之一,我国古代没有系统记载神话的专书,许多神话故事保留在早期古籍之中,如《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淮南子》等。春秋战国时期兴盛的寓言故事对古代小说的孕育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大量的寓言故事保留在《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等一些先秦诸子之中。今人

对古代神话和寓言作了不少辑录、注释工作,如袁珂的《古神话选释》^①、兆文等人的《中国历代寓言选》^② 都值得参考。

魏晋南北朝时期,古代小说初具规模,出现了谈鬼神怪异的志怪小说和记人物轶事的志人小说两种类型,这些小说的内容大抵得自民间传说,少所生发和创作,同后世小说仍有距离,但已有小说的雏形。东晋干宝所著的《搜神记》是当时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宋以前目录著录为三十卷,宋以后目录著录为十卷,原本在流传中已亡佚,今本二十卷为明代胡元瑞所辑,共包括大小故事四百五十五条,其内容大多为鬼神怪异,这部典籍对后世小说的故事题材和艺术形式皆有深远影响。刘宋时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是当时志人小说的代表。原书称《世说》,唐代称《世说新书》,今存有唐代写卷残本。唐代分八卷本和梁刘孝标注十卷本,宋代分十卷本和三卷本两个系统,明清版本也很多,今通行本为梁代刘孝标注本。全书分三十六门,主要记载汉末至东晋士族阶层人物的轶事琐语,反映了当时士族阶层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这部书艺术成就较高,描写人物生动而有性格特色,语言简炼,善于以极少的笔墨进行诙谐的讽刺,对后世笔记小说影响甚大。刘孝标所作的注引书达四百余种,内容丰富,也很有价值。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同属于记人物轶事类的小说,全书记载一百二十九条,多为西汉官僚阶层的轶事、掌故、传说,一般还缺乏完整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但有些传说、琐闻故事性强,文笔曲折生动,如写王嫱出塞、秋胡戏妻、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恋爱等。现代作家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是一部古小说总集,共收三十六种,是研究汉魏六朝小说的重要典籍。

古代小说发展至唐代渐趋成熟,唐代小说,通常称为“唐传奇”。

①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②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唐代传奇小说的发展有三个阶段：隋唐之际至开元是初期，产生了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张鷟的《游仙窟》，逐步由六朝志怪而转向人事。开元到元和之间为唐传奇的全盛期，此期作品已完全脱离志怪的范围而成为独立的小说体裁，其中最具有光彩的是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如李朝威的《柳毅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作的《霍小玉传》、陈玄祐的《离魂记》、元稹的《莺莺传》、李公佐的《谢小娥传》等。此外，也有一些传奇小说写人生梦幻、消极出世，如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也有一些历史题材的传奇，如郭湜的《高力士传》、姚汝铭的《安禄山事迹》等。晚唐至五代为后期，此期作品虽多，但成就不高，较有特点的是杜光庭《虬髯客传》、裴铏《聂隐娘》、《昆仑奴》等写侠义英雄的传奇。这些传奇由于多为短篇，故少有单书流传，大都保存在《异闻集》、《虞初志》等唐传奇集中。后期出现一些传奇专集，即作者以自己的作品结集成书而流行，如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等，皆流传至今。鲁迅编辑的《唐宋传奇集》，收唐传奇三十二篇，收集较丰。

宋元时期“话本”兴起，使古典小说又有了重大的发展。话本是说话艺人所用的故事底本，话本有的取材于现实生活，内容新鲜活泼，或取材于历史，情节曲折起伏，且用通俗的白话文叙述，因而深受群众欢迎，逐步取代传奇而占领小说领域，白话文由此也逐渐成为小说的文学语言的主要形式。话本内容不一，可分小说类和历史类。小说类话本影响最大，宋元小说类话本总数不下百种，但现存仅四五十篇，保留在《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等小说话本集，明代冯梦龙编的“三言”中，也有一批宋元小说话本。《京本通俗小说》是现存最早的宋元小说话本集，编者佚名，现存九篇，其中的“错斩崔宁”和“碾玉观音”较有影响。《清平山堂话本》是明代洪楸编的宋元话本集，原书收六十篇话本，故又名《六十家小说》，今存二十七篇，书中所收的“快嘴李翠莲记”、“董永遇仙传”、“羊角哀战死荆轲”等都是著名的

话本。讲史类话本也很有成就,这些话本篇幅较长,大都分篇立目,成为明清长篇小说的源头。现存讲史话本主要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十卷,概述梁、唐、晋、汉、周兴亡历史。《大宋宣和遗事》,叙述北宋衰亡和宋江起义经过,书中的梁山故事,多采民间传说,略具《水浒》故事轮廓。《全相平话五种》是元代至治年间由新安虞氏刊印的讲史话本集,内收《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等五种平话,对后来的《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有一定影响。宋元话本是古典小说发展到此期的主流,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传奇和笔记小说问世。另外,宋代还出现了几部通代小说总集,如北宋李昉等人奉诏纂集的《太平广记》五百卷,采录汉至宋初小说、笔记五百多种。南宋曾慥编的《类说》六十卷,摘录汉至宋笔记小说和传奇汇编而成。又有北宋刘斧摘编的《青琐高议》,是一部包括杂事、志怪和传奇小说的集本,共收作品一百四十六篇,对于保存传奇小说价值较大。

明清时期,我国古典小说的创作达到高峰。明代短篇小说的成就,除了对宋元话本的总结整理外,较突出的是“三言两拍”五部拟话本短篇白话小说集的问世。所谓“拟话本”则是模拟宋元话本的创作,明代中叶冯梦龙编选拟写了《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白话小说集,通称“三言”,每部包括小说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这些作品,有一些是对宋元话本的加工,而大部分则是明代的民间创作或由冯氏自己创作的。“三言”题材广泛,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社会生活和反传统势力的精神以及追求自由、平等的意识。“三言”在艺术上,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描写,都比前代的小说创作大大迈进了一步。继“三言”之后,明末出现了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通称“二拍”。“初刻”收小说四十篇,“二刻”收小说三十九篇,杂剧一出。“二拍”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虽不如“三言”,但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二拍”之后,直至清代,还有不

少文人创作拟话本短篇小说,出了一些专集,乾隆以后拟话本才渐趋衰落而绝迹。今存者有明代《石点头》、《醉醒石》、《西湖二集》、《人中画》、《三刻拍案惊奇》等等。清代有《照世杯》、《豆棚闲话》、《西湖佳话》、《十二楼》(又名《觉世名言》)等等。明末清初由署名“抱瓮老人”编选的《今古奇观》,是一部话本小说选集,共四十回,它从“三言两拍”中选录四十篇小说而编成的,数百年来流传甚广。除了白话短篇小说外,明清两代还出现了大批文言短篇小说,如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四卷,李昌祺的《剪灯余话》四卷,赵弼的《效顰集》三卷,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二十卷等,但成就最大的是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这部优秀的短篇小说集收入作品四百九十一篇,其内容大都采自民间传说和野史轶闻,经作者艺术加工成为大放异彩的文言小说。小说通过谈狐说鬼的形式,表达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愤懑,反映了作者的爱憎。全书作品构思巧妙,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各篇情节曲折动人,语言精炼,确为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艺术高峰。《聊斋志异》的流传极为广泛,现有手稿本、抄本、刻本及各家评注本传世。

我国古典小说,经过长期的孕育、演变和发展,到明代终于产生了长篇章回小说,并在明清两代大为盛行,许多长篇小说杰作大放光彩,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章回小说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其特点是分回标目,情节连接,段落整齐,它是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末明初出现的《三国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平妖传》、《水浒传》等长篇小说,是用过去的讲史话本改造演变的。明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活日益丰富,小说所反映的现实更复杂,内容更广阔,于是出现了《西游记》和《金瓶梅》等非历史演义的神话小说和社会小说,它们的内容已主要是作家的艺术创作了。随着长篇章回小说的发展成熟,到清代终于出现了《红楼梦》这样伟大的文学巨著。明清长篇章回小说的创作数量较多,其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优秀的长篇章回

小说已家喻户晓,甚至翻译成外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明清长篇章回小说以其篇幅宏伟、结构精密、情节曲折、人物众多、典型突出及反映社会生活面广阔等特点,成为我国古典小说最高成就的标志。

五、诗文评论及其典籍

“诗文评”是我国古代特殊的文学批评论著。古代诗文评论著述,最早散见于“六经”、诸子之中,其内容是零星的、片面的。随着文学的发展、作品增多,才有了文学批评的专论。如魏晋时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但这些还不是专门的诗文评典籍。南朝梁代出现的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文心雕龙》十卷,分上下编,各二十五篇。上编前五篇是该书总论,其余二十篇为文体论;下编前二十四篇探讨系统的创作理论,最后一篇是全书总序。《文心雕龙》是我国古典文学批评的奠基性著作,所以千余年来盛行不衰,有许多人为之评点注释、研究阐发。南朝梁代还出现了钟嵘撰著的《诗品》,这是我国文学评论史上第一部诗论典籍,也是一部文学批评的杰作。《诗品》分上、中、下三卷,专论五言诗,品评由汉至梁一百二十二个作家。它作为诗歌评论的开山著作,同样引起历代学者的重视,流传甚广。在《文心雕龙》和《诗品》的带动下,我国古典诗文评典籍层出不穷,代有所继。在诗评方面,唐代有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一卷,将古代诗歌创作风格分为雄浑、冲淡等二十四类进行评论,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过郭绍虞的集解本。宋元以后,诗词评论多以诗话、词话的形式出现,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一卷,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诗证五类,提出较系统的诗歌批评理论。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是一部诗话集,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收宋以来各家诗话,间附己见,对前人诗作进行具体评论。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除论诗外也记述文坛掌故和诗人轶事,全书十六卷,补

遗十卷。以上三部典籍除有刻本流传外,也有经今人整理校订后出版的铅印本。清人何文焕编辑的《历代诗话》,是一部历代诗话总集,收录自钟嵘《诗品》至清代的诗话共二十八种;近人丁福保又编《历代诗话续编》一书,补录由唐至明诗话二十八种;丁福保还辑有《清诗话》,收清代诗话四十二种。以上三部总集保存了古代诗话的大部分著作,利用起来比较方便。我国古代还有“诗纪事”一类书籍,兼具诗歌评论与诗歌史料的性质,这类书首创于南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后人仿作接续,于是由唐至清,诗纪事类典籍也自成一个系列。

宋以后出现的词话是评论词作的专门典籍,其内容或评论词人、词作,或品评词派,或记载有关词的本事。南宋王灼的《碧鸡漫志》五卷,张炎《词源》二卷,清代张宗棣《词林纪事》二十二卷,都是研究我国古代词人及其作品的重要参考书。今人唐圭璋先生编有词话总集《词话丛编》一书,收宋以后历代词话六十种。

相对诗词评论来说,古代文论的专门典籍较少,许多对文章的评论散杂于作者的文集、题跋或笔记之中,有些专门的文论典籍则兼论诗文文体或论修辞句法。如南宋陈骥的《文则》二卷,则是一部修辞论著,书中评论文章体式句法,对修辞学的研究颇有贡献。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内集五十卷,外集五卷,着重解说文体,杂以论评。明代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八十四卷,也是文体论典籍,在《文章辨体》的基础上加以修订,有所发挥。近人周钟游汇集文评类著作,编成《文学津梁》一书,所收文评著作自梁代任昉《文章缘起》至清代薛福成《论文集要》,共十二种。值得一提的还有清代梁章钜的《制义丛话》二十四卷,是一部八股文论集,对于了解八股文的宗旨、源流、体裁、典制颇有用处。

在戏曲评论方面,重要的典籍有明代徐渭的《南词叙录》及何良俊的《曲论》。此外还有许多关于戏曲、小说的评论内容散见于文集笔记或作品的序跋传叙之中,当代学者对这些材料的辑录和选编作了

不少工作,值得重视。

六、文学典籍中的诗文总集与别集

我国古代文学作品,除了一些篇幅较大的小说、戏曲、诗文评可独立成书刊行外,许多作品,尤其是诗文作品需要结集才能成书。我国文学总集起源很早,《诗经》就是一部诗歌总集,但它是一体总集;诗文总集即各体综合性总集,始于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但此书已佚。挚虞以后,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了一部《文选》,这是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它选录了先秦至梁代近八百年的各类诗文,收录诗歌四百三十四篇,辞赋九十九篇,散文二百一十九篇,按文体分为三十八类,所选作家一百二十九人。《文选》保存了先秦至梁代大部分优秀作品,为后人研究这一段文学发展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此书对后世影响极大,研究、注释著作很多,形成专门的“文选学”。《文选》之后,有《古文苑》二十一卷问世,编者不详,为北宋孙洙所传,收周代至南齐诗文二百六十余篇,分二十类;清代孙星衍作《续古文苑》二十卷,补收周至元各类诗文。此外,明人张溥编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一百一十八卷,也是唐以前又一部通代诗文总集。北宋李昉等人奉敕编纂的《文苑英华》一千卷,上续《文选》,辑梁至唐诗文,但其中唐代诗文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故实际上是一部唐代诗文总集。《文苑英华》卷帙浩繁,不便通读,因此宋初姚铉从中选录十分之一,编成《唐文粹》一百卷,形成断代诗文总集,也颇便学者利用。宋代诗文总集,有南宋吕祖谦编选的《宋文鉴》一百五十卷,原名《皇朝文鉴》,此书仿照《文选》体例,选录北宋诗文,共分六十一类。清代庄仲方为接续《宋文鉴》,编成《南宋文苑》七十卷,外编四卷,作者考二卷,选录南宋诗文,分为五十五类。元代苏天爵编选的《元文类》七十卷,原名《国朝文类》,是一部元代诗文总集,后人因与《唐文粹》、《宋文鉴》并称,书中选录元初

迄中叶的主要诗文,分为四十三类。反映明代诗文概况的断代总集,主要有《明文衡》、《明文在》两书。《明文衡》原名《皇明文衡》,明代程敏改编,九十八卷,补缺二卷,选录明人辞、赋、乐府、琴操、散文,没有古体、近体诗,内容较芜杂,且多台阁体作品,反映了明初文风。《明文在》一百卷,清代薛熙编选,仿《文选》体例,录明代诗文二千余篇,多选唐宋派古文,所选亦不全面。清代诗文,虽有《清文汇》、《清诗释》、《全清词钞》等分体总集问世,但未编成综合体诗文总集。

“别集”是汇集个人作品的综合集。别集中有的是诗集,有的是文集,但多数是诗文合集。别集的编纂始于东汉,《隋书·经籍志》曰:“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唐以前的别集,由于年代久远,大部分已散佚,流传下来的极少。明代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时,所见唐以前作家文集已不足三十家,于是他着意搜罗各家作品,再按人编集。因此《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既是唐以前诗文总集,又是汉至隋各家文集的汇编,求唐以前各家别集,当以此汇编为渊薮。当然,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名家别集通过其他刻本、翻印本流传下来,如蔡邕的《蔡中郎文集》、曹植的《曹子建集》、嵇康的《嵇中散集》、陆机的《陆士衡文集》、陶渊明的《笺注陶渊明集》、《陶靖节集》等。唐以后别集,由于雕版印刷逐步兴起,所以保存传世较多,唐代别集现存二百八十种,千卷以上^①。唐代著名诗人王勃、骆宾王、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李贺、李商隐等,古文家韩愈、柳宗元等皆有别集流传。宋人别集见于著录的有七百余种,较通行的有三百四十七种^②,两宋的著名作家如王禹偁、范仲淹、柳永、欧阳修、苏洵、司马光、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李清照、陆游、杨万里、朱熹、陆九渊、辛弃疾、陈亮、叶适、文天祥等等,皆有别集传世。辽金别集不过

① 据《中国丛书综录·子目·集部》统计。

② 昌彼得:《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中华书局1989年重印本。

百种。元代时间虽短,但存留下来的别集数量不少,据陆峻岭《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统计,收录别集共三百二十一种。明清别集留存极多,据各种书目记载,明代传下来的别集约二千种。清人别集见于《贩书偶记》正、续编著录者四千二百四十二部,据王重民、杨殿珣《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统计,清人别集有四千种左右。清人张之洞在《輶轩语》中对清代别集作过一个总体评述,他说:“国朝文集有实用,胜于古集。方苞、全祖望、杭世骏、袁枚、彭绍升、李兆洛、包世臣、曾国藩集中,多碑传志状,可考当代掌故、前哲事实;朱彝尊、卢文弨、戴震、钱大昕、孙星衍、顾广圻、阮元、钱泰吉集中,多刻书序跋,可考学术流别、辞籍义例;朱彝尊、钱大昕、翁方纲、孙星衍、武亿、严可均、张澍、洪颐煊集中,多金石跋文,可考古刻源流、史传差误。此类甚多,可以隅反。”张之洞的这段评述,从学术意义上看到了别集的价值。从文学的角度上看,别集是保存作家的作品、著作最基本的典籍,对于后人了解作家的思想、艺术风格与成就具有重要意义。别集也是编辑总集的主要依据,现存大量别集类典籍是研究我国文学发展演变的第一手材料,是文学宝库中珍贵遗产。

第六节 兵法传统与兵家典籍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中国历来重视对兵法的研究,素称“兵法之国”,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影响广远。历史上频繁激烈、规模巨大、空间广阔、形式多样的战争实践,为古代兵法研究提供了动力。数千年高度集中的政权体制,以农业为主、游牧为辅的经济结构,尚武、重谋、爱国、爱和平、民族自尊和凝聚力极强的心理素质,平原沙漠、江湖河海、崇山峻岭兼具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气候条件等等,也不同程度地决定了中国兵法传统的

发展趋势和特色。

历代兵法思想的主要载体是兵书,我国的兵书不仅历史悠久,卷帙浩繁,而且绵延两千年从未间断,这就为研究和利用古代兵法思想和军事学术准备了系统、完整的资料。种类众多、内容丰富的兵书典籍,记录了历代军事家对于军事和战争的理性认识。各个时代的兵书根据所处时代的特点,提出了许多特殊的和一般的作战指导原则,以及将帅修养、士卒训练、阵法布列和大量的兵制及兵规。历代兵书还记载了军事家们对于天文、地理、交通等作战条件的分析,兵器军械的制造和利用,军需粮饷的筹备以及城防、边防、海防等具体问题。提供了大量将帅传记及战争战例等军事史实。古兵书不仅包括了古代军事学各门类的理论和知识,还具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的多方面学术价值。

一、古代兵法的形成与兵书的产生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我国历史上就产生了部落间的战争,人们对于兵法问题开始有了一些初步的思考。大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王朝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成为国家机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夏、商、周三代,随着私有制和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经常的社会现象。此期发生的著名战争,有夏启讨有扈氏、商汤灭夏、武王伐纣、周公东征等,作战形式有步战、车战,多为“堂堂之阵”的正面交锋。商代,青铜兵器逐渐应用于军事;周代,军队组织已有师、旅、卒、两、伍等编制。作为观念形态的兵法思想,通过许多战争实践,在此期已经产生,这些思想在甲骨文、金文和《尚书》等古代史料中都有反映。

西周时期,随着长期战争经验的积累和我国典籍制作条件的具备,最早的兵书应运而生。《军志》、《军政》两书是见于记载最早的兵

书,这两部兵书今已不存,但是在《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宣公十二年、昭公二十一年都记录了这两部兵书的书名,并保存了一些佚文。此外,在《孙子·军争篇》及唐代杜佑《通典·兵典》中,也保留有这两书的零星佚文。从现存的佚文内容上看,《军志》、《军政》二书已不是战争活动的简单记录,而是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其中“有德不可敌”,揭示了政治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地利为宝”,是对作战条件的分析;“欠当则归”,“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先有夺人之声,后人有待其衰”,“攻不足而守有余”,“穷寇勿迫,归众勿追”等,则都是可贵的战争谋略思想。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和大发展,为兵书的逐渐成熟提供了有利条件。春秋以降,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争霸兼并。战争日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用兵数量逐渐增多,铁兵器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步、骑、车多种形式地配合作战,使战争更趋复杂,对将帅的要求更高。此期的大小战争以数百计,其中春秋时齐国等国与楚国的“召陵之战”,晋楚的“城濮之战”;战国时魏齐的“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秦赵的“长平之战”,皆以规模巨大、变化复杂而著称。战争的客观要求,强烈刺激着兵法思想的发展。诸侯列国或为生存,或为争雄,广揽军事人才,鼓励新说,为兵家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一批新兴地主阶级的兵家人物应运而生,曹刿、子鱼、伍员、魏舒、子元、孙叔敖、孙武、吴起等都是当时杰出的代表。他们在战争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在百家争鸣、互相辩难、学术气氛活跃的社会环境中,撰著了大量理论性较强而又富有理性色彩的兵学著作。此期以《孙子》为代表的一批兵书,奠定了古代兵学的基础,标志着兵书的成熟。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法,共得一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流传至今的仍有《孙子》、《吴子》、《司马法》、《孙臆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六部。

《孙子兵法》共十三篇,约六千字,孙武撰。孙武字长卿,齐国人,

活动于春秋末期,是先秦兵家的始祖。《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简称《孙子》。它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也是现存最早的兵书,被称为“兵经”,已译成多国文字流传国外,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孙子兵法》反映了孙武的战争观,“兵者,国之大事也”,直观地看到了战争的重要性。他注意到战争与政治关系,把“道”列为战略内容首要因素。《孙子兵法》有大量关于战略战术的分析。它把战略上的胜负判断归结为“道、天、地、将、法”五大因素,强调战术的灵活性,提出“兵无常势”、“因敌而制胜”、“避实击虚”、“攻其必救”等有效使用兵力的原则,以及“兵以诈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出奇制胜的方法;它十分重视战争的客观条件,“兵贵胜,不贵久”的速胜思想就是从战争对人力、物力、财力的依赖关系出发的;它提出先知敌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的主张及“治乱”、“勇怯”、“强弱”、“劳逸”等对立转化的观点,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还提出了一些治军理论。它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揭示了战争的重要规律,成为历代兵家的座右铭。

《吴子》是战国时重要兵书,作者吴起,战国时卫国人。今本《吴子》共六篇,约五千字。《吴子》的内容可归纳为几点:一是朴素的军事哲学思想,它把战争起因总结为“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因饥”五方面,分析了战争的性质,注意了战争的两重性及其发展变化;二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思想;三是随机应变的战术方法,总结了在作战中“击之无疑”或“避之无疑”等各种情况,提出新出现的骑兵兵种与车、步兵配合作战的各各种战术;四是“以治为胜”、“教戒为先”、“进有重赏,退有重刑”等一系列治兵原则。《吴子》继承发展了《孙子兵法》,反映了战国初期的实战经验和兵法的特点。

《司马法》,旧题司马穰苴撰,穰苴为春秋末期齐国人。据《史记·司马穰苴传》记载,《司马法》是战国齐威王时群臣汇集古兵法与穰苴兵法而成,故此书内容不独为穰苴所撰。《司马法》在流传过程中已有

散佚，今本仅五篇，清人又辑有《司马法逸文》一卷。此书的主要内容为：“仁本第一”，论述战争观；“天子之义第二”，记君臣之礼，治国、治军的方法及古代一些军事制度；“定爵第三”，讲战争准备、布阵原则和战时法规等；“严位第四”和“用众第五”，主要讲战略战术和将帅指挥。

《孙臆兵法》，孙臆撰。孙臆为战国时齐国人，孙武的后世子孙。《孙臆兵法》又称《齐孙子》，曾广泛流传于战国末和秦汉时期，《汉书·艺文志》曾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其后失传。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一批孙臆论兵的竹简，经专家整理为《孙臆兵法》，由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分上下编，各十五篇，一万一千余字。其后又对1975年版《孙臆兵法》作了重大调整，移出原尚难肯定为孙臆或其弟子作品的下编，修正了上编，补入《五教法》一篇，定为十六篇，近五千字，编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今本《孙臆兵法》虽远非《齐孙子》原貌，但仍有丰富内容，如“战胜而强立”、“乐兵者亡”的战争观；“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战略思想及“必攻不守”的战术等。书中还有对桂陵、马陵之战的一些记载，可补史书不足。

《尉繚子》，作者尉繚，《隋书·经籍志》著录为“梁惠王时人”。存世最早刊本为南宋《武经七书》本，五卷，二十四篇。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尉繚子》竹简六篇为最早版本，虽然残缺严重，但解决了长期以来认为《尉繚子》是后人伪造的问题。《尉繚子》继承发展了《孙子》、《吴子》等军事思想，它反对用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它认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主张“王者伐暴乱”要以“仁义”为本；“兵者凶器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它对于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有精辟的论述。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权敌审将而后用兵”，提出“正兵”与“奇兵”灵活运用的作战方法。此外还有许多治军的言论。《尉繚子》杂取法、儒、墨、道思想而论兵，

在先秦兵书中独具一格。

《六韬》，旧题周吕尚撰。吕尚为西周军事家姜子牙，所题显系托名，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详考。《六韬》成书于战国末期，以前人们对此有种种怀疑，但1972年在银雀山汉墓出土了竹简本《六韬》和《太公》，证实了此书确是先秦兵书。《六韬》现存最早刊本为南宋《武经七书》本，共六卷，六十篇，二万三千字。《六韬》总结了先秦兵家和诸子论兵的精华，通过对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对话的形式，探讨、阐述治国治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及方法。前二卷“文韬”、“武韬”主要阐述战略问题，后四卷“龙韬”、“虎韬”、“豹韬”、“犬韬”重在阐述治军和作战指导方法。《六韬》是先秦兵书中集大成之作，在政治和军事理论方面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军事史料，如编制、兵器和通讯方式等，具有重要理论和史料价值。

二、古代兵法的发展与兵书的完善

秦汉至唐宋时期，是古代兵法、兵书的发展、完善阶段。西汉王朝建立之后，经历了平灭吴楚七国之乱、反击匈奴、镇压农民起义等大规模的战争。西汉政权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很注意对兵书的收集和校勘，曾三次对兵书进行较大规模的整理：第一次是汉初张良、韩信的“序次兵法”；第二次是武帝时，军政杨仆对兵书的整理，并在此基础上编成了第一部兵书专科目录《兵录》；第三次是成帝时刘向校书，由步兵校尉任宏负责对兵书清理和校勘，这次校理兵书的成就反映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上。《兵书略》不仅著录了当时整理出来的兵书六十三家，一千一百九十一篇，图四十三卷，而且保留下来古代对兵书最早的分类，即“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的四分理论。从各类小序可以看到，“权谋类”收录战略方面的兵书，“形势类”收录战术方面的兵书，“阴阳类”收录天候、地理、阴阳卜筮方面的

兵书，“技巧类”收录军事技术及其运用方面的兵书。汉代对先秦兵书的普查、整理和总结，对兵书的发展和流传发挥了积极作用。

汉代不仅整理兵家典籍，而且流传下《黄石公三略》这部重要兵书。此书又称《黄石公记》或《三略》，是一部专门从战略上论兵的军事著述。它托名为授张良兵书的黄石公所撰，实际上是汉末兵家的著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长期的分裂割据和群雄相争刺激了兵法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民族大融合也使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些作战技巧和武器装备等传入中原，丰富了兵学研究的对象和素材。此期战争频繁，波及地域广，水战已提到战略地位，人马披甲的重装甲骑兵逐步成为军队的主要力量。在大大小小的战争中，三国时的袁曹官渡之战，曹吴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和十六国时前秦、东晋的淝水之战，都是著名的战例。动荡的局势和丰富的战争实践，造就了曹操、诸葛亮、孙权、周瑜、司马懿、崔浩、宇文泰等著名谋士或将帅。此期产生的兵书见于后世著录者数十种，但大都亡佚。留传下来有曹操的《魏武帝注孙子》三卷、《兵书接要》辑本一卷，晋朝司马彪《战略》辑本一卷。还有许多题为诸葛亮撰著的兵书，如《将苑》、《武侯奇书》、《武侯奇门遁甲例》、《武侯兵略》、《十六策》、《武侯兵要七书》等等，这些兵书究竟哪些确实是诸葛亮的著作，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隋唐五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在军事制度方面，唐代府兵制得到充分完善，同时为了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还出现了府兵制补充形式的募兵制；武举制度作为军官的选举制在唐代也得到确立；此外，轻骑兵逐渐代替重骑兵，对作战的战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些都成为隋唐五代兵法思想发展的重要条件。根据历史记载，此期发生的战争多达数百次，其中规模大、影响深的，有隋初、唐初的统一战争，隋唐守边拓边战争，唐中后期平叛、削藩战争，隋末、唐末农民战争以及五代王朝更迭战争等。规模空前、类型多样的战争造就了杨

坚、李世民、李靖、柴荣等智勇兼具的军事家，产生了百余部兵书，这些兵书尽管因年久战乱而大多佚失，但仍留下来二十余部。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问答体兵书《李卫公问对》，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三卷。此书以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论兵的形式，汇编了一批兵法理论。全书一万余字，既有对古代兵制、战争、兵学的总结和评述，又兼论治军和用人，但主要内容是讲训练和作战。其中关于“奇正”的阵法理论尤为重要。《李卫公问对》是《武经七书》之一，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此书虽未必为唐代李靖所亲著，但其成书时间应不晚于五代。有关李靖的军事思想，还有清人汪宗沂从《通典》、《太平御览》中辑出的《卫公兵法辑本》三卷。

唐代李筌所撰的《太白阴经》是一部综合类兵书，全书十卷，一百篇，它辑录了古代许多军事资料，搜罗广泛，内容丰富，涉及人谋、筹策、攻城、器械、屯田、战马、营垒、阵图以及治军用人和军仪典礼等，同时还有唐代许多山川地理、关塞的记载，其前五卷价值更高。李筌的著述，还有由其作注而流传下来的兵法书《黄帝阴符经》一卷，三章。

题为唐人撰著的兵书，现存还有李靖的《白猿经》三卷，王琚的《射经》一卷，赵蕤的《兵权》不分卷，李淳风的《乙巳占》三卷。唐代还出现不少注释《孙子》的著作，其中以杜牧《孙子注》最为重要。

宋辽金元时期，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火药和指南针的应用为军事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特别是火器在战场上的使用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战争频繁，刺激了兵书的整理和武学的兴办，我国第一部由官方颁布的军事教科书《武经七书》在宋代问世，从而确立了《孙子》等古兵书的经典地位。在宋辽、宋夏之争和抗金、抗元战争中，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沈括、岳飞、陈亮等都阐述过富有新意的兵法理论。辽金夏元统治者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元昊、成吉思汗、忽必烈等关于战争和军队

的论述,也都为中华民族兵学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据各种书目记载,宋辽金元出现的兵书有五百多种,而现存仍有七十余种,其中尤以两宋兵书为多。两宋兵书的编撰和整理不仅数量大大超过前代,而且编撰形式多种多样。北宋官方颁定的《武经七书》是一部兵法丛书,由宋神宗于元丰三年(1080年)四月下诏校定,收《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等古兵书七部二十五卷,集中了中国古代兵法的精华。《武经七书》传世版本很多,今存最早为南宋刻本(图5)。此书注本也极多,存世注解不下数十种,宋朝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为最早注本,对明清注家起到发凡体例的作用。

图5 宋版《武经七书》

《武经总要》是一部官修的军事类书,由曾公亮、丁度于庆历三年(1043年)奉敕编撰,历时三年半而成,共四十卷,分前后两集。“前集

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①。其所辑的兵法理论和历代战例相当丰富,书中附有大量插图,不仅记载了当时各种兵器和作战器械,还记述指南针、火器的制作方法,记载了三种火药的配方。《武经总要》在中国军事史和科技史上都有很高的价值。

宋代出现的重要兵书还有军事人物专论《何博士备论》,作者何吉非为元丰时武学博士,此书专论战国至五代有关军事人物统军用兵之得失。全书原有二十八篇,现存二十六篇,各篇独立成章;以朝代或人名目,按时间顺序加以编排。该书将作者的军事思想融于对古人用兵的评论中,颇具特色,褒贬人物也不囿旧说,有其独立见解。

北宋张预的《百将传》是我国第一部名将传记专书,全书十卷,辑录自西周太公至五代刘词共一百名将的传记,每卷十人,传记内容重在记述传主的用兵谋略和作战方法,传后各有评语,以论名将的用兵得失,也反映了编者的军事思想。《百将传》是一部可读性较强的兵书,它寓深刻的军事理论于生动活泼的人物故事之中,因此读者面较为广泛,深为后世兵家将帅所重视。

南宋的城防专著《守城录》四卷,陈规、汤琦撰著。全书由《〈靖康朝野金言〉后序》、《守城机要》、《建炎德安守御录》等三部分组成。该书在火器已用于作战、攻城手段有新发展的历史条件下,集中阐述和反映了守城战斗的指导原则与城防体制改革的思想,对后世城防理论有较大影响。

由南宋陈傅良所撰的《历代兵制》八卷,是我国第一部军制通史。全书依朝代顺序引录或综述文献史料,记述了西周至北宋诸朝的军事制度及其沿革,评论优劣得失,对汉、唐、宋军制论述尤详。此外,大型综合性兵书《虎铃经》、集解类兵书《十一家注孙子》也都有重要价值。以上所列兵书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① 《四库总目》卷九九。

三、古代兵法的创新与兵书的繁荣

明清两代处于封建社会后期,古代的兵法思想在此期得到不断的总结和创新,兵书的编纂达到最为繁荣的阶段。明清两代战争爆发的频率高、规模大,为兵法思想的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期大大小小的战争中,有属于王朝更迭的战争,如努尔哈赤、多尔袞的灭明之战;有反抗外族的战争,如明代抗倭战争和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清代的雅克萨之战和鸦片战争等;有国内的统一战争,如明攻灭夏蜀之战,明攻取云南之战,清平定三藩之乱,清与准噶尔部之战等。农民战争则有李自成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等。频繁战争为军事学的进步提供了新的素材,尤其是兵器的改进和兵种的变化,更对兵法思想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明清时期的武器装备比前代更为精良,火器经过改进,杀伤力大大提高,其种类不断增多,并且逐渐在战场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武器的更新引起了军队编制、后勤供应、战略战术和作战指挥方面的诸多变化,军队中也出现了炮兵、火枪队、工兵等新的兵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适应新型的战争,明清两代兵法思想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了创新,一批关于火器、火药以及新战法、新军制的兵书应运而生,形成了明清兵书种类繁多、数量骤增的局面。据有关书目记载,明清两代产生的兵书有二千余种,今存仍有一千零五十九种。这些兵书反映了明清时期兵法思想和军事知识的普及和提高。

明清兵书的编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其中三个方面值得分析和总结:

首先是此期兵学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重视,不仅领兵将帅注意兵书的编写,而且文臣幕僚、山野隐士以及农民起义军首领也都加入了著述兵书的行列。例如,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亲自动手总结自己

的练兵和作战经验，著有《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两部重要兵书；另一抗倭名将俞大猷也撰写了《韬铃续篇》。一些政府大员则招集幕僚谈兵著述，如清代湖北巡抚胡林翼便延请幕僚汪士铎等撰写了《读史兵略》。不少文人学士也常常以笔代剑，深究兵法，发愤著述，以求有济于时局。明代的茅元仪、清代的陈澹然则是文人书生撰著兵书的典型。茅元仪纂辑的大型军事类书《武备志》，专为明末兵备废弛、辽东告紧而作。陈澹然的《权制》，则有感于清末中法甲申之战、中日甲午之战中清军败绩而作。此外，如明代作《孙子书校解引类》、《续武经总要》的赵本学，作《草庐经略》的黄启瑞，清代作《读史方輿纪要》的顾祖禹等，都是隐居山野、终生不仕而撰写兵书力著的代表。清代太平军将领、东王杨秀清的《行军总目》，以及太平军所颁布的《太平军目》、《太平条规》和《武略》，也都为此期兵书增添了新的内容。

明清兵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种类齐全，既表现了此期对古代兵法的全面总结，也反映了当时新的兵学成就。择其要者而言，百科性军事类书有明代王鸣鹤的《登坛必究》四十卷和茅元仪的《武备志》二百四十卷，两书皆为博览群书、辑录各代兵书材料而成。《登坛必究》下分七十二目，附图五百六十余幅，所辑材料大多注明来源或原作者，便于核查。《武备志》附图七百三十八幅，全书由“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等五部分组成，其下分类编排材料，每类前有序言，中有眉批、旁批、夹注等大量内容，是我国古代篇幅最大的军事百科性兵书。它以丰富的史料和较为科学的编排方法，赢得后世的赞誉和推重。

专述军事理论的兵法类著作有明代何良臣的《阵纪》，尹宾商的《兵羸》，王鸣鹤、何仲叔的《兵法百战经》、清代揭暄的《兵经百篇》，陈澹然的《权制》，刘璞的《将略要论》等。值得一提的是佚名兵法著作《三十六计》。“三十六计”之说由来已久，但未见有专

书具体记载，此书对三十六计的计名和内容作了详细解释，并附以事例。全书分三十六计为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等六套。

军事地理类专书有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李培的《灰画集》二十卷。《读史方舆纪要》中，包括历代州域形势九卷，南北直隶十三省方舆一百一十四卷，山川源委六卷，天文分野一卷，另附《舆图要览》四卷，全书实为一百三十四卷，附图三十六幅，沿革表三十五份。此书既是一部军事地理名著，又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它在军事学术和地理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灰画集》是一部辑录体军事地理著作，所采原著共三十多种，它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经国用兵方略，对天下大势和各省形势历陈诸家之说，同时也提出了编者一些颇有价值的见解。此书的缺陷是没有西藏、新疆等省内容，又不附地图，这些都是明显的不足。

关于军事训练方面的专书，有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十八卷、《练兵实纪》九卷，吕坤的《安民实务》不分卷，徐光启的《兵机要诀》六卷。《纪效新书》分束伍、操令、阵令、谕兵、法禁、比较、行营、操练、出征、长兵、牌笏、短兵、射法、拳经、诸器、旌旗、守哨、水兵等十八篇，每篇一卷，是戚继光带兵实践的经验总结。《练兵实纪》成书于《纪效新书》之后，它既注意吸收南方练兵的经验，又结合北方练兵的实际，其练兵思想在前书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

阐述火器配合车战方面的兵书有明代孙承宗的《车营叩答合编》五卷，全书由“车营图制”、“车营百八叩”、“车营百八答”、“车营百八说”四部分组成，集中于108个军事问题的问答和解说，是一部系统论述明代车、骑、步兵编组列阵以及与火器配合作战的兵书。

专论冷兵器制造和使用的兵书有《耕余剩技》六卷。此书是一部丛书，由论述棍法的《少林棍法阐宗》三卷、论述弓箭的《蹶张心法》一卷、论述长矛的《长枪法选》一卷、论述单刀的《单刀法选》一卷等四部

子书组成。

专记火药、火器的兵书有明代焦玉的《火龙神器阵法》、赵士禎的《神器谱》和明代佚名《火龙经》。《火龙神器阵法》不分卷，全书由总论火攻、记述各类火器、记述各类火药等三部分组成，并配图四十七幅，它记载的四十多种火器无论在性能和用途上都比宋元火器有很大进步。书中所记载的火药配方也很详细，既有歌诀，又有用量和炮制方法，这些配方与宋代《武经总要》的配方相比较，成份减少而效能增强，反映了明代化学研究水平的提高。《神器谱》专论火器的制造和使用。《火龙经》成书稍后，其记述火药、火器的内容多辑抄自《火龙神器阵法》和《武备志》、《登坛必究》等书，故价值稍逊。《火龙经》又有续编的二集和三集，此书将一些散见的火药、火器资料汇辑成书，对于传播古代军事技术也发挥了作用。

此外，专述海防、江防、边防方面的专书有明代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十三卷、《江南经略》八卷，魏焕的《明九边考》四卷，清代徐家干的《洋防说略》二卷。阐述城防的兵书有明代吕坤的《救命书》（不分卷），李盘等人的《金汤借箸十二筹》十二卷，钱栴的《城守筹略》五卷，清代朱璐的《防守集成》十六卷。论述乡兵团练的兵书有清代王鑫的《练勇刍言》五卷，李柬的《乡兵管见》三卷。有关军事后勤的兵书有清代官修的《军需则例》十五卷。有关历代名将传记的有明代何乔新的《续百将传》四卷，黄以周的《广名将传》二十卷等。明清两代还形成了注释、汇解《武经七书》的热潮，流传至今的这类著作仍有百余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明代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清代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丁洪章的《武经七书策题全解》等。

明清兵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有些兵书开始研究、介绍外国的情况，特别是注意研究入侵中国的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同时也介绍了一些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如明代兵书《筹海图编》就针对倭寇的入侵，在书中考述了日本的历史、地理、行政区划、战船兵器、作战特点等。

清代魏源作《海国图志》，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气候物产、宗教历法和战舰火器的生产。其中所记英吉利的情况更为详细，共用四卷的篇幅。在西方军事技术介绍方面，《筹海图编》、《火龙经三集》等书都对西洋火器进行了记载，如佛郎机、鸟铳、火炮等。明末焦勳向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学习火器制造术，写成《火攻挈要》三卷，是当时介绍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代表作。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也用十一卷的篇幅介绍西洋船、炮、枪、水雷、望远镜等的制造和用法。此外，清代还有李善兰的《火器真诀》、王韬的《火器略说》专门介绍洋枪、洋炮的制作。徐建寅的《兵学新书》则记载了散兵线与纵队相结合的拿破仑战术等。总的来说，明清兵书在体裁、编撰方法及军事学术思想方面有较大的发展和提高，为我国古代传统兵书模式向新的军事典籍过渡作好了准备。

中国古代的兵书是一座军事文献的宝库。由中国军事科学院编撰的《中国兵书知见录》^①，就著录了历代兵书三千三百八十部，二万三千五百零三卷。根据许保林著《中国兵书通览》^②中的“现存兵书简目”记载，今存兵书仍有一千二百多种。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古代兵书，不仅在军事史中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哲学史、文学史、科学技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其中以阐述战略战术为主的兵法典籍，影响更大，声誉更高。它们不仅指导了中国历史上千百次有声有色的战争，培养了众多优秀将帅，而且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流传到国外，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流传，成为国外许多著名军事人物极力推崇的著作。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兵家典籍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笔珍贵遗产，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① 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② 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七节 科学传统与科技典籍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中,科学技术典籍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典籍的产生、发展和丰富,是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密切相联系的。

中国古代科技事业的进程,大致可分为春秋战国以前的产生期,秦汉至南北朝的发展期,隋唐至元末的延伸期以及明清有西学东渐特点的变革期等四个阶段。产生于各个发展阶段的科技典籍,既是当时科学成果的反映,又影响和推动了当时和后世科技事业的进步。

一、古代科技的产生与科技典籍的出现

从远古时代起,我国各民族先民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从科技史的角度考察,在距今一百七十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和十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所处的旧石器时代,远古先人就已掌握了石器和骨器的打制、火的利用、弓箭的发明等三项技术。在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则已出现了陶器以及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我国的夏、商、周三代,由于青铜冶铸技术的发明和提高,青铜工具的使用,促进了农业、畜牧业的不断发展,手工业也出现了冶炼、纺织、陶瓷、皮革、酿酒、缝纫和土木营造等技术和行业。在长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夏、商、周三代已产生了农学、医学、天文学和数学等早期自然科学,形成了阴阳五行说和八卦说等自然观,为我国科技发展第一个高峰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在春秋战国,古代科技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高峰。首先,铸铁的出现比西方早约二千年。其次,农业方面对土壤、农作物及其关系有了

一定的科学知识。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天文学有了很大发展,通过对天体的系统观测,确立了四分历系统的历法,其中如十九年七闰法、七十六年法等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此外,数学、物理学、医学、地理学等都有一定造诣。我国古代的第一批科技典籍,正是在这种实践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

西周、春秋时期手工业分工的细密及手工技术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反映在春秋末年齐国人的著作《考工记》中,它是当时手工业技术规范总汇,是记录整理春秋以前及当时手工技术经验的科学著作。《考工记》前有概述,后分“教人”、“舆人”等三十项,记录了运输和生产工具、兵器、乐器、容器、玉器、皮革、染色、建筑等三十种生产部门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在记载制造工艺的同时,对一些科学理论作了直观的描述,如在讲到车子、车轮的制造时,记载了惯性现象和摩擦理论;其中关于青铜冶炼“金有六齐”的说法,是世界上最早对于合金成份分析研究的记载;书中还涉及到分数、角度和标准量器容积的计算等数学知识。《考工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科技典籍,汉代学者将它并入《周礼》中,清代学者对它研究很多,较著名的有戴震的《考工记图》、程瑶田的《考工创物小记》。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医药学得到迅速的发展,因而涌现了一批医学典籍,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导引图》等,就是此期关于经脉、医方和医疗体育的专门著作。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战国时出现的医学理论著作《黄帝内经》。该书原名《内经》,全书十八卷,一百六十二篇,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内容以论述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诊断等基础理论为重点,兼述针灸、经络、卫生、保健等多方面。该书运用阴阳五行学说阐明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辨证施治的医疗原理;它系统总结了具有中华民族独创性的脏腑经络学说;详细记载了全身十二正经、奇经八脉和全身脉络、腧穴,以及它们的分布循行与针

疗、刺法、刺禁等具体内容；此外，还在病因、诊断、治疗等方面总结了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和方法，如临床病症方面叙述了四十四类，共三百一十一种病候；诊断方面有运用切脉结合望诊的总结，治疗方面有“治未病”、以防病为主的医疗思想。两千多年来的医疗实践证明，《黄帝内经》是一部科学价值极高的中医学经典名著，一直为国际医学界和科学史家所重视，它的部分内容已译成日、英、德、法等国文字在世界流传。

由于春秋战国时疆土扩大，各民族间的往来日益频繁，人们对地理知识了解的要求空前提高，《山海经》、《禹贡》等地学著作正是在此基础上顺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山海经》十八卷，由“山经”、“海经”和“大荒经”组成。其中“山经”部分内容首次对超过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进行了自然环境方面的概述。它按方位将地域区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部分，各部分以山为纲，分二十六列，叙述了四百四十七座山脉的位置、水文、动植物、矿物特产以及神话传说等。“海经”和“荒经”的内容因传闻和神话较多，其科学价值则不如“山经”重要。

《禹贡》大约成书于春秋时期，后被收录在最早的文献汇编《尚书》中。《禹贡》依据自然条件中的河流、山脉和大海的自然分界，把所描述的地区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比《山海经·山经》缺乏彼此有机联系、简单分为五区的分区原则前进了一步，更富有地理意义。它描述了九州在贡品、田赋和运输路线方面的地区差异，记载了各区的自然条件，说明了不同地区的地理特色。《禹贡》是一部原始的经济地理学著作，它于土壤学与水利工程学方面也有所记载。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不仅是科技发展的一个动因，也是此期科技研究的显著特点。因此，在《墨子》、《管子》、《庄子》等一些诸子著作也有不少科技知识和内容的记载，它们对于后世科学思想的

发展同样有深刻的影响。

二、古代科技发展期的科技典籍

秦汉到三国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科技事业持续进步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其发展特征是,我国古代各学科体系在秦汉时期相继形成,一些奠基性的科技典籍接续出现,为后世的科技发展奠定了方向。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战乱频仍,但由于两汉以来的文化专制大大削弱,各种思想比较活跃,所以私人著述较前增多,高水平的科技典籍不断涌现,反而出现了科技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科技典籍,反映出此期科技事业蓬勃向上的兴旺景象。

在农学方面,反映汉代农业科技成就的著作主要有西汉氾胜之的《氾胜之书》和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氾胜之书》成书于汉成帝(前32—前7年)时期,全书十八篇,总结了我国北方特别是关中地区的耕种技术,对农业耕作原理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如“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等;所述种子处理的“溲种法”和集中使用水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区种法”,至今仍值得重视和研究。《四民月令》则是最早的一部农家历,它以月令的形式,列举一个年度内普通农家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其中大部分内容与农业生产有关。两书流传到宋元之际就已失传,但各有部分内容保存在《齐民要术》之中。

南北朝时期,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农书,它系统地总结了六世纪以前我国的农学成就,也为后来农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齐民要术》除“序”和卷首的“杂说”外,共分十卷,九十二篇,全书约十一万字。卷一、二记农作物耕种,涉及谷物、纤维作物、油料作物;卷三记蔬菜;卷四记果树等木本植物栽种法;卷

五记林木和染料作物；卷六记畜牧、渔业；卷七至卷九记酿造、食品加工保存、烹调方法等农家手工业；卷十仅一篇，记域外农作物。书中采用歌谣和民谚三十多条，引用它书达一百五十多种。其内容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是一部空前完善而宏伟的百科式农书。此外，晋朝嵇含的《南方草木状》，戴凯之的《竹谱》等植物志，也是此期的重要农学著作。

两汉魏晋南北朝的一些史书、地理书中也总结了自战国以来我国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成就，如《华阳国志》记载了战国时期大型水利灌溉设施都江堰工程，《史记·河渠书》记载了郑国渠工程，《汉书·沟洫志》记载了汉代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灌溉河渠的开凿，《后汉书·王景传》记述了东汉时王景对黄河的治理。

在天文学方面，汉代著名历法有西汉司马迁等人的《太初历》、刘歆的《三统历》、东汉贾逵等人的《四分历》、刘洪的《乾象历》等。西汉历法已确定独立的体系，具备了后世历法有关于气、朔、闰、五星、交食、晷漏等主要内容。魏晋南北朝时，刘宋祖冲之编制的《大明历》，则在岁差、回归年长度值和朔望月长度值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除了历法外，东汉时创制浑天仪和地动仪的张衡还著有《浑天仪图注》和《灵宪》两部天文学专著。前者阐述了有关天体的浑天说及浑天仪的原理构造，但已失传；后者则总结了有关宇宙生成与演化的思想，记录了二千五百颗恒星，画出了我国第一张完备的星图。《灵宪》比西方著名天文学家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著作早了一千多年，它在我国天文学发展史上意义重大。

在春秋战国数学发展的基础上，秦汉时期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数学专著，《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是流传至今最古老的算书。这两部古算书虽成书于西汉，但皆不是一时一人之作，而是经过多人修改和补充而最后完备起来的，其中不少内容反映了先秦的数学成就。《周髀算经》二卷，上卷的第一部分记录的是周公与商高的对话，涉及

勾股定理与表、圆和方的使用,以及高与远的测量。第二部分是陈子和荣方的对话,主要讨论日影;下卷记载了与太阳的周年运动有关的计算,讨论了恒星的中天、二十八宿、十九年闰周等天文学问题。《周髀算经》至今仍有宋刻本流传于世(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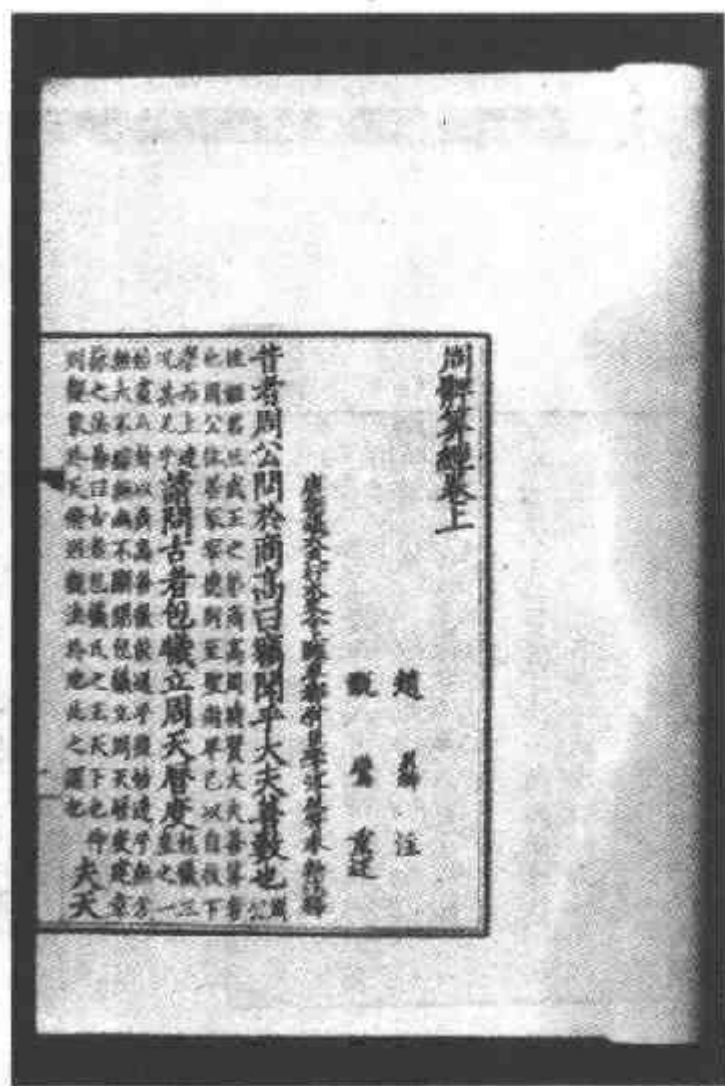


图6 《周髀算经》

今本《九章算术》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刘徽注本,共九卷,每卷一章,分列二百四十六个问题进行解答,类如一部习题集。书中记载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数四则运算和比例算法,解决各种面积和体积的算法,以及利用勾股定理进行测量的手段。其较高的成就还

在于代数方面,如记载了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求解一般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还有联立一次方程的解法,这些都比欧洲的同类算法早出一千五百多年。书中所提出的负数概念以及正负数的加减法运算法则,也是世界数学史上处于第一位的。《九章算术》对后世的影响大大超过了《周髀算经》,它在宋以前一直是人们学习数学的教科书,它的著述体例,也常为后世许多数学著作所仿效(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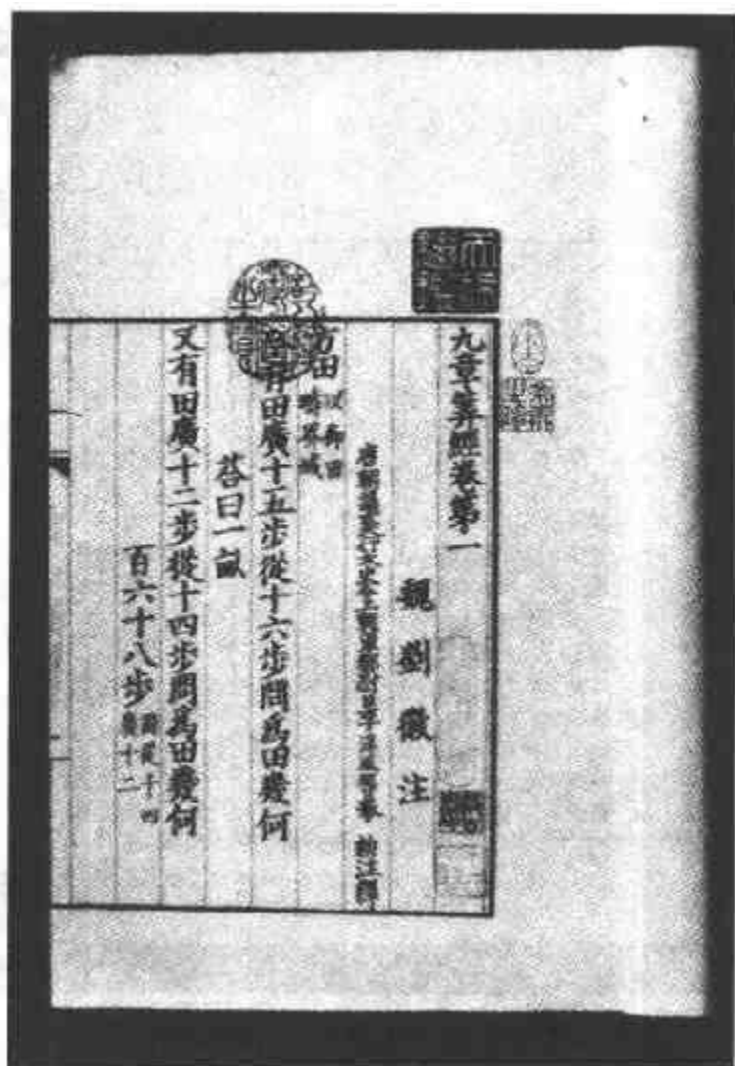


图7 《九章算术》

魏晋南北朝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古代数学体系的内容,唐代编纂的《算经十书》中,就收入魏晋南北朝的数学典籍七部,其中包括魏晋时刘徽的《海岛算经》,今存《永乐大典》辑本;魏晋时成书的《孙子

算经》，此书佚名，今存；南北朝时夏侯阳的《夏侯阳算经》，此书今佚，仅存六百余字；南北朝时张邱建的《张邱建算经》，此书今存；南北朝时祖冲之的《缀术》，此书今佚，在此书中，祖冲之将 π 值由刘徽的“3.141024”进一步推算为“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最精密的圆周率，这一计算结果今保存在《隋书·律历志》中；此外，还有北周时期甄鸾的《五曹算经》与《五经算术》，此两书流传至今。

在中医学方面，秦汉魏晋南北朝之间出现了张仲景、华佗、王叔和等一批中医名家，他们把中医医药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整理国家所藏医书时，就已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在此基础上，西汉中医学又产生了一批重要的中医典籍，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专著，它概括了战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和药理学基本理论，收载植物药二百五十二种、动物药六十七种、矿物药四十六种，共三百六十五种。它对各种药物的主治、产地等都有详细记载，并根据其性能和使用目的分为上、中、下三等。它提出了医方中主药与辅助药之间的“君、臣、佐、使”配伍原则，以及药物的“四气五味”学说，这些理论反映当时的药理学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

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则创造性地继承了《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是一部基础理论与实际治疗密切结合的临床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原著已佚，今本是由晋代王叔和整理成的《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两部分，前者十卷，计三百九十七条，载方一百一十三首，专论伤寒一类急性传染病；后者六卷，二十五篇，载方二百六十二首，以论述内科、外科、妇科等杂病为主要内容。《伤寒杂病论》从辨证到立法，从立法到拟方，从拟方到用药，环环紧扣，形成了一整套辨证论治的原则，为我国的中医治疗学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传统的医药学进入一个广泛总结整理的阶段。晋代名医王叔和除整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外,还对历史上的脉学著作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撰成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脉经》十卷,书中列举了二十四种脉象,对每一种脉象都作了简明扼要的概述,中医学中独特的针灸治疗技术,亦由晋代的皇甫谧总结为《针灸甲乙经》十二卷,全书分一百一十八篇,记述单穴四十九个、双穴三百个,共三百四十九个经穴,并具体指明了针刺深度、留针时间和艾灸时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经典著作。另外,此期还出现了西晋葛洪的《肘后方》,南齐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刘宋雷敫的《炮炙论》等著名医著,前两者流传至今,后者仅有辑佚本传世。

秦汉以来,我国的地理学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1973年,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三幅汉初的地图,它们分别是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表明当时的地图测绘技术已比较发达,班固《汉书·地理志》的编撰,也说明了当时地理知识的丰富。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地理书的编撰形成高潮,按各种书目记载,此期有关地理的典籍有三百种之多,其中著名的如挚虞的《畿服经》、陆澄的《地理书》、任昉的《地记》、譙周的《三巴记》、常璩的《华阳国志》、桑钦的《水经》和酈道元的《水经注》。但是,当时的大部分地理学著作都未能流传下来,保存至今的仅有《水经注》和《华阳国志》等少量著作。

此外,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晋代葛洪的《抱朴子》最早记载了古代的炼丹术,是我国早期重要的化学典籍。

三、古代科技延伸期的科技典籍

隋唐至宋元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成熟和完备,对科学技术的不良影响则越来越明显,我国的科技事业在此期进入了缓慢发展的阶

段。但是,各科技部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在缓慢发展的总趋势下,有的领域仍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就在宋代出现和传播。另外,有些为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工艺技术,也迅速提高,其中尤以陶瓷、丝织和建筑更为突出。从各个学科来看,数学与中医学在宋元则仍有重大的发展。隋唐至宋元时期,科技发展的总体水平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此期产生的大量科技典籍充实了我国的科技理论宝库。

在天文测量上,隋唐两代的成就表现在土圭测影技术和理论的改进、计时漏刻的改造、对地球子午线长度的首次测量、浑天仪的制造及对周天星度的普遍观测等。宋元时期,对隋唐的浑仪、浑象、计时漏壶和圭表都有所改造和创新,并利用这些仪器作过多次大规模的天文测量,保留至今的苏州石刻天文图刻星一千四百三十多颗,所刻便是北宋元丰年间天文观测的结果。遗憾的是以上天文学成就未能形成专著,只是记录在有关史书的“天文志”或“律历志”中。隋唐之际出现了大批历法,隋有三部,唐有八部,其中又以隋代刘焯的《皇极历》和唐代僧一行的《大衍历》成就较大。宋元之际,历法频更,宋代十八朝天子,历法也有十八种,其更换频繁的原因主要是历法不能与天象符合,所以宋代历法除杨忠辅的《统天历》外,大多在科学上无甚创新。到了元代,郭守敬、王恂等人吸取了前代各历的精华,加上自己的创新,终于编制出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历书《授时历》。这部历法所采用的一些重要数据在当时是世界上最精确、最先进的,它把我国古代的历法体系推向了高峰。

隋唐时,国家的统一安定及政府的提倡和重视,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却未出现成就重大的农学典籍。今传唐代较重要的农书有陆羽撰写的《茶经》;有陆龟蒙所撰、专门记载农具的《耒耜经》;有李石所撰的兽医典籍《司牧安骥集》;有韩鄂所撰的农家月令《四时纂要》。农学典籍的编撰在宋元时出现了高潮,其中成就显著、对后世

影响甚大的有南宋陈旉的《农书》，该书的特点是突破旧农书以作物品类分篇的体例，而以农事特点分篇。成书于元代至元年间的《农桑辑要》，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官修农书。由元代著名农学家王祯所撰的《王祯农书》，不仅总结了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而且以二百八十一幅插图全面地介绍了当时农业器械性能和构造。此外，如北宋秦观的《蚕书》、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蔡襄的《荔枝谱》、陈景沂的《全芳备祖》；南宋王灼的《糖霜谱》、刘蒙的《菊谱》、韩彦直의《桔录》；元代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等，也都是各有特点的农学典籍。

隋唐宋元时期，水利建设工程在南北方都得到大力推广和发展。隋代有南北大运河的开凿，唐代兴修的水利工程有二百余处，在敦煌发现的唐代《水部式》残卷，反映了唐代对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视和管理。据统计，在整个十一世纪，北宋进行的水利工程有一万多处，南宋续有兴修，元代则有郭守敬对通惠河、京杭大运河、黄河的治理。大量的水利建设成就和经验除记载在王祯的《农书》之外，也由一些水利文献总结出来。此期保存下来的水利专著有宋代官修的《农田水利约束》，单锷的《吴中水利书》，魏峴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等。

在数学方面，隋唐时较著名的数学专著有唐代王孝通的《缉古算经》。隋唐两代很重视数学教育，隋代国子寺设有算学博士，唐代国子监设有算学馆，唐高宗时还令李淳风等人将汉唐以来十部重要数学典籍编为《算经十书》，并进行注释，在“国学行用”。唐代中晚期，随着商业发展的需要，一些普及性的实用算书也出现了，如龙受益的《算法》、江本的《一位算法》、陈从运的《得一算经》等，但这些典籍都未能流传下来。

入宋以后，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推动了宋元计算学的不断进步，以算筹为主的计算工具逐步为快速简捷的珠算所代替；在数学教育和研究方面，除了官学外，社会上的一些知识分子也私立算学，设帐授徒。数学教学和研究的推广，使此期的数学成就辉煌。其中如高次

方程的数值解法、多元高次方程组解法、一次同余式解法、高次有限差分法都比西方要早出四百至八百年。这些重大成就的代表作如：南宋秦九韶的《数书九章》，发明以“大衍求一术”求解高次方程的数值；元代李冶的《测圆海镜》、《益古演段》发明“天元术”，以建立数字高次方程；南宋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杨辉算法》记载了“增乘开方法”和“开方作法本源”；元代朱世杰的《四元玉鉴》，讲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解法和高阶等差级数等问题。

在中医学方面，隋唐时期出现的重要中医典籍有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焘的《外台秘要》，以及唐代公私修撰的一系列本草著作。另外，还完成了几部整理、注解《黄帝内经》的典籍，如隋代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唐代王冰的《黄帝内经素问释义》。所有这些著作，都对后世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宋元时期中医学取得更为显著的成就，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这个时期的医药学典籍具有种类多、数量大、质量高的特点。方书方面有官修的《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私修的有《苏沈良方》、《史载之方》等一百余种。疾病诊断方面，有崔嘉彦的《脉诀》、朱震亨的《脉诀指掌病式图》等。妇科方面，有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等。儿科方面，有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陈文中的《小儿病源方论》、《小儿痘疹方论》等。法医学方面，有宋慈的《洗冤集录》。针灸方面，有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许希的《神应针经要诀》。研究伤寒病的，有庞安时的《伤寒病总论》、朱肱的《伤寒百问》等等。随着中医学的发展，不仅内部的分科更为细密，同时也出现了代表不同理论特色的医学学派，金元时期的四大家便各有多种著作，阐述各家的医学理论。如“寒凉派”的刘完素著有《素问玄机病式》等，“攻下派”的张从正著有《儒门事亲》等，“温补派”的李杲著有《脾胃论》等，“养阴派”的朱震亨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他

们的著述都从不同的侧面为丰富祖国医学作出了贡献。

在地学方面,隋唐是图经发展的重要时期,隋代纂成的《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记》、《诸州图经集》等都属卷帙浩大的地理图记。唐承隋制,图经的纂修制度更臻于完善。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充分反映唐代图经的编纂水平。此书四十卷,根据唐制记述了各府州县的户口、贡赋和山川、道里等情况,具有重要地理意义。宋以后,志中所附地图亡佚,仅留下文字部分,故改称《元和郡县志》,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全国总地志。另外,在唐德宗时,贾耽绘制的《海内华夷图》,则是古代第一部世界地图。宋元时期,地理典籍中的方志书进入了定型和繁荣阶段,在方志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元时的方志数量极多,仅宋代便有近六百种,其内容除地理记载外,还增加了人物、风俗、艺文等具体人文资料。宋元之际,古代地理图经完成了向方志的过渡,地方志书的体例基本被确定下来。此期较重要的全国性志书、地方性志书有《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大元一统志》、《吴郡志》、《新安志》、《咸淳临安志》、《剡录》、《四明志》、《南海志》等。

宋代还有两部重要的科技著作值得重视,一是著名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该书正编、补编、续编共二十九卷,这部以笔记形式写成的著作,有二百多条内容涉及各个方面的自然科学领域,其中包括对指南针、活字印刷术和发现石油等成就的记载,这是我国科技史上第一部十分重要的典籍。另一部科技典籍是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全书三十六卷,分“总例释例”、“制度”、“功限”、“料例”、“图样”五大部分,详细记载了当时各种建筑结构、构件、工料及施工工艺的规定,它是保存至今最古老的一部建筑学专著。

四、西学东渐与科技典籍的变化

明清之际,中国科技已在世界上逐渐处于劣势。明代晚期之后,

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活动,以及国内有识之士的学习和引进,西方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渐渐传入我国。在西学东渐和我国传统科技体系发生碰撞的情况下,我国科技典籍的总体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传统的科技继续发展,产生了一批具有重大价值的科技典籍;另一方面,吸收西方科学知识而形成的科技典籍,或直接将西方科学专著翻译过来的译著大量出现,丰富了我国科技典籍的宝库。

明代出现了四部极为重要的科技著作,一是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六十卷,该书集我国古代农学之大成,转录有关典籍达二百二十七种,系统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和明代在农业科学方面的成就。书中也有一些作者个人经过实验、考察而得出的结果,如“荒政”门中有关除蝗的方法,“水利”门中对汲水工具的介绍,以及对于木棉、蕃落等种植方法的记述,都有较高科学水平。二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五十二卷,这部伟大的药物学著作共收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附方一万一千零九十六则,插图一千一百六十幅,对药物的分类系统分明,体系先进。书中对每种药物一般都记载其名称、产地、形态、采集方法、性味和功用、炮制过程等,并配图描绘其形状,有些还指出过去本草书中的错误。它是一部既带有总结性又富于创造性的著作。三是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十卷,该书不仅记载了我国大部分省区,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地形地貌,还涉及了沿途所见的动植物、矿产、民俗、交通等等。它对地学的贡献主要在地貌和水文两大方面。为了对岩溶地貌进行研究,徐霞客曾考察过一百多个洞穴,并对溶洞、石笋、石钟乳的成因作出符合科学的解释;还考察过许多河流,书中对流水浸蚀、河道发育和水系演变都有生动而科学的论述,并正确地指出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从而纠正了古书中“岷山导江”的错误。四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三卷,这部著作是继《梦溪笔谈》后的又一部重要的综合性科技典籍。书中记载了当时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如杂交培养桑蚕良种、蜡模铸造法、刀剑包钢法、火井煮盐、火法炼锌、提花织机等等。

同时也部分记载了国外的先进生产技术。此外,书中还附有大量工艺流程的二百多幅插图(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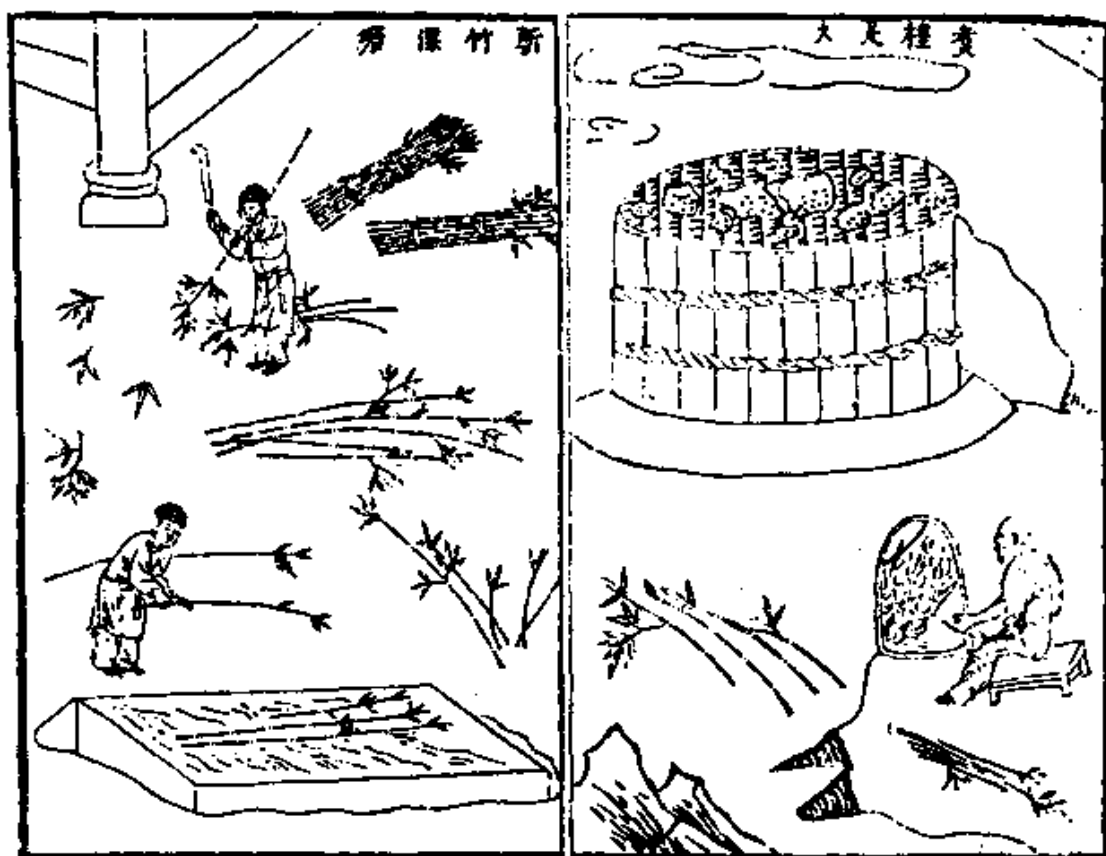


图8 明崇祯刻本《天工开物》中的造纸图

清代前期传统科技的力作有王锡阐的《晓庵新法》六卷,作者在书中批评了西方历法的缺点,对中国传统历法的不足也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他吸收了中西已有历法的长处,并有所创造,如提出计算日月食时初亏、复圆的方位角,发明了计算金星、水星凌日的方法和计算月掩行星及五星凌犯的初、终时刻的办法,这些方面都比过去的中西历法大有进步。比王锡阐稍后的梅文鼎,被称为当时“算学第一”,他的《梅氏历算全书》包括其重要的数学著作十三种,其内容涉及初等数学的各个分支,包括算术、代数、几何、平面三角学和球面三角学等,他的数学著作和研究成果,对清代数学的发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另外,清代还出现了一部专记天文学家、数学家事迹的《畴人

传》，该书由阮元等人前后撰辑，共分四编，七十一卷，收录中外天文、数学家八百八十余人。它为天文学史和数学史研究提供了系统的宝贵资料。

明清两代还有不少传统的科技典籍值得重视。传统医学方面，如明代朱棣等人编的《普济方》和清代吴谦等人编的《医宗金鉴》，都是洋洋大观式的医学典籍。又如徐春甫的《古今医统》、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楼英的《医学纲目》、孙一奎的《赤水玄珠》、张璐的《医通》等，也是规模较大的医著。明清医家还纂集了不少医学丛书，较重要的有明代王肯堂的《医统正脉全书》、清代周学海的《周氏医学丛书》等。医案是此期医学典籍的一大特色，如《薛己医案》、《汪万山医案》、《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及大型的《名医类案》正续编等，都有一定影响。地理学方面，明清两代是地方志书发展的鼎盛时期，方志的数量和质量大大提高。明代曾有两次大规模的全国修志活动，清代则于康熙、乾隆、嘉庆三次修一统志，每次都责令各地修省志、府志、州志和县志。我国现存方志有八千多种，其中明代近一千种，清代五千五百多种，明清方志的数量接近总数的百分之九十。除了方志的编写，介绍外国和边疆地理的著作在清代则比较发达。如魏源的《海国图志》、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都非常重要。明清两代在地图的绘制上也颇有成绩，其突出者如明代郑和绘制的《航海图》，清代康熙年间由政府组织测绘的大型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在农学方面，除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清代官修的《授时通考》也是一部重要的综合性农书。专类性农书大量出现，是明清农学典籍的一个特点，地区类农书如《宝坻劝农书》、《知本提纲》、《马首农言》等；救荒类农书如《救荒本草》、《野藻谱》等；治蝗类农书如《捕蝗考》、《捕蝗汇编》等。农田水利方面的农书，更比以前显著增加，其中专述某一流域范围的，如明代姚文灏的《浙西水利书》，清代王凤生的《浙西水利备考》、黄士杰的《云南省城六河图说》、沈梦兰的《五省沟洫图说》、吴邦庆的

《畿辅河道水利丛书》等；专述某一灌区或某一工程的，如清代王庭芝的《通济堰志》、程鹤翥的《三江闸务全书》，记载水利发展史的，如明代归有光的《三吴水利录》，清代王太岳的《泾渠志》，康基田的《河渠纪闻》等。明清农书以品种多、数量大而著称，据统计，两代所撰农书有三百多种，占现有农书百分之五十以上。明清的建筑技术普遍提高，北京宏伟的故宫建筑以及城郊规模壮观的皇家苑囿、南方精巧的私家园林、西藏的布达拉宫以及各兄弟民族的宗教寺庙建筑，都是此期建筑技术辉煌成就的代表。遗憾的是，详细记载这些建筑成就的专著并不多。此期较突出的建筑学专著有明末计成的《园冶》一书，专谈园林理论；清代雷发达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主要记载清代官修建筑的工艺和技术规范。

西方科技著述的翻译，是明清科技典籍变化发展最明显的特征。早期的科技译著有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还有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笔算著作《同文异指》、王徵与瑞士人邓玉函合译的力学机械著作《远西奇器图说》。明末官方编译的《崇祯历书》，清代康熙时官方编译的数学综合著作《数理精蕴》，是两部规模较大的历算典籍。

鸦片战争以后，对西方科技书籍的翻译工作大规模地开展起来。1862年，清政府在京师成立同文馆，此后，上海江南制造局成立译书馆，广州等地也设立“广方言馆”之类的编译馆，这些机构出版了不少科技译著。清代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在编译西方科技名著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与当时英人在上海经营的“墨海书馆”合作，译出了古希腊数学名著《几何原本》的后九卷、英国天文学家赫歇尔的著作《谈天》十八卷，以及《代数学》、《重学》、《植物学》等数学、力学、植物学著作。此外，其他学者也在各个学科编译了许多名著典籍，如华蘅芳将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赖尔的著作译为《地学浅释》，徐寿综合西方化学知识编译了《化学鉴原》，严复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

理学》译述为《天演论》。在生物学和医学方面,自英国医生合信编译的《全体新论》开始,各地译书馆翻译了《西医举隅》、《西药大成》、《英国医药方》等数十种西医著作。据近人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略》一书分析,自清咸丰三年(1853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的近六十年间,共有四百六十八种西方科技典籍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包括总论及杂著四十四部,天文气象十二部,数学一百六十四部,理化九十八部,博物九十二部,地理五十八部。这些书籍的译刊,不仅加强了各种科技知识的传播,而且经过这些译著确定了不少科技名词,其中有很多仍沿用至今,有的还传入日本。我国古代科技典籍内容广、数量大,据有关学科统计,仅数学典籍就有一千多种,中医典籍则达八千余种,这在世界科技上是罕见的。伴随我国几千年社会进步而发展起来的科技典籍,是勤劳勇敢、富于创造性的人民世世代代同大自然进行斗争的丰硕成果,是我国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在一个方面的重要结晶。

第八节 小学传统与文字、音韵、训诂典籍

我国对于语言文字的研究,远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现在所知最早的语言文字研究典籍,便有《尔雅》和《史籀》等书。此外在《论语》、《左传》等早期典籍中,也已有讨论语言文字的记载。到了汉代,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则将有关文字研究方面的著作归类于“小学”。“小学”本指小学校,“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汉书·艺文志》)。由于入小学先学文字,于是汉代就将“小学”作为研究文字方面的学术专名。隋唐以后,“小学”的范围逐渐扩大,《隋书·经籍志》开始把小学分为训诂、音韵、体势等类,“体势”即指文字。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则在“小学”

类下,分为训诂之属、字书之属、韵书之属。由此可知,古代小学的学术范围,包括了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等学科领域。数千年的小学学术研究传统,产生、积累了大量的文字、音韵、训诂学典籍,这些著述,反映出我国传统语言学在创立、发展、鼎盛等不同历史阶段的学术成绩。

一、小学创立时期的传统语言学典籍

我国历史上的周秦至西汉时期是传统语言学的创立阶段。春秋战国时代,虽然传统语言学还未产生,但是先秦诸子著作和史书中借解释字义来阐明政治主张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比如,《论语·颜渊》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里的“政者,正也”,就是后世同音为训的例子。又如《孟子·滕文公上》在训释夏、商、周三代学校名称时曰:“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这便是后代所谓迭音为训的形式。此外,在《左传》中则有解释字形的内容,如宣公十二年的“止戈为武”,宣公十五年的“反正为乏”,昭公元年的“皿虫为蛊”等,都是以形说义的形训。据张新式的《先秦文献正文中词义训诂辑录》统计,当时散见于《周易》、《左传》等三十一部典籍正文中的训诂内容,共有一千五百六十二条,就其所用的训诂方法来说,则已具备了形训、声训和义训等方式。春秋战国时训诂学的萌芽及其逐步发展,终于产生了第一部通释字义、词义的训诂学专著《尔雅》。

《尔雅》旧说为周公所撰,实际上它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一部由先秦至西汉的训诂资料汇编,是汉初学者缀辑旧文、递相增益而成的。《汉书·艺文志》著录“《尔雅》三卷二十篇”。今本只有十九篇,即: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官、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等。对于字词意义的训解

大致分为两大类,前三篇为一类,解释非名物字词,释义的方式是将同义、近义的词归并为各条,每条用一个通用词作解,如:

怀、惟、虑、愿、念、怒,思也。(《释诂》)

还、复,返也。(《释言》)

穆穆、肃肃,敬也。(《释训》)

后十六篇为一类,解释的是名物字词,即专有名词,释义的方式如:

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谨。(《释天》)

金谓之铍,木谓之刻。(《释器》)

以上两类合计共二千零九十一条,释字词四千三百多个。这部书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被誉为“七经之检度,学问之阶路”^①。后世经学家常用它来研究训诂,撰写注疏,唐宋时甚至把它列入“十二经”或“十三经”,推崇到了极点。《尔雅》列为儒学正经虽有勉强之处,但它在训诂学史和我国传统的语言学史上却是功绩显著的。在此之前的训诂,不过是在著述中对某些词语作简单的解说,有的也只是随文释义的注释。到了《尔雅》,才把古今异言、方俗殊语及各种名物加以全面研究、整理,汇成通释语义、粗具条理的专著,为我国训诂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尔雅》的价值还在于它保存了很多故训,因此它成为后人学习古代典籍的重要工具,没有这部书,先秦作品就很难理解,而且古汉语语义发展演变的历史也不易探索。《尔雅》一问世,就有很多训诂家对它进行研究作注,据《隋书·经籍志》和《经典释文·序录》记载,仅汉代的注释者就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孙炎等五家。

继《尔雅》之后,汉代的训诂专著,还有扬雄的《方言》十三卷,刘熙《释名》八卷,服虔《通俗文》一卷,佚名《小尔雅》一卷。《方言》不仅是训诂学的重要典籍,而且是我国方言学的先驱。《释名》因声求义,推求事物名称的由来,为我国语源学开创先河。《通俗文》专释不登大

^① 曹魏·张揖:《上广雅表》。

雅之堂的俚言俗语,可惜其书已佚,清人虽然辑录了一些,但仍残缺不全。《小尔雅》在《汉书·艺文志》中记为《小雅》,其书也久已亡佚,后人取《孔丛子》第十一篇来代替。《孔丛子》旧题汉孔鲋著,实出伪托,但毕竟是汉人的著作,而且这一篇所解释的词义,确实可补《尔雅》之阙,故讨论汉代的训诂学,也不应埋没它。

西汉训诂学的成就除有一批通释词义的专著外,还反映在大量经书的注疏中,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之后,这些经学博士为了讲经,都要研究章句,作出注释,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训诂的发展。特别是后起的古文经学,对于古代语词、名物的训释,更是做出了大量严谨、认真的工作。西汉对于《诗》、《书》、《易》、《礼》、《春秋》、《论语》、《孝经》、《周礼》、《礼记》、《孟子》等儒家经典的大量注释,创造了训诂学中随文注释的重要形式,并为后代传统语言学典籍的编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周秦至两汉这一传统语言学创立阶段,早期的童蒙识字书可以说是文字学的萌芽。远在春秋战国之间,童蒙识字书就有《史籀篇》出现,这是秦国人教习学童的课本,现已亡佚。到了秦代,则有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汉代则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扬雄的《训纂篇》、贾鲂的《滂喜篇》等著作。李斯、赵高、胡毋敬的书在汉代合称《仓颉篇》,后人又称为“秦三仓”,共收三千三百字。扬雄收集当时小学学者所记文字,编成《训纂篇》以续“秦三仓”,合计为五千三百四十字。后人又以李斯、赵高、胡毋敬的《仓颉篇》为上篇,《训纂篇》为中篇,《滂喜篇》为下篇,合称为“汉三仓”。这些识字书除《急就篇》留传下来,《仓颉篇》还有残简之外,其余都已亡佚。

现存的《急就篇》也称《急就章》,旧分三十二章,共收二千零一十六字,皆为当时的日常用字,全书用三言、四言和七言韵语连缀。开篇曰:“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

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以此五句说明编书的宗旨。正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以三字句列举一百三十二个姓名；第二部分以六十个七言句记各类事物名称；第三部分用五十五个七言句记述百官官职、律令及相关事情。末尾亦为四字句，歌颂汉朝“太平盛世”，全书以“长乐无极老复丁”结束(图9)。从《急就篇》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识字书的一般状况，大抵这类书只提供了各个阶段汉字的字形，至于字音、字义及各字音、形、义的演变，则要靠启蒙教师传授。启蒙识字书作为我国古代文字学的萌芽，虽然内容和形式都比较简单、粗糙，但它们毕竟为我国第一部字书——《说文解字》的产生提供了资料，准备了条件，因此意义也是重大的。



图9 汉代砖刻史游《急就篇》(拓片)

东汉时，由于去古已远，古文、奇字成为人们读书的障碍，古音、

古义已不为一般人所了解,再加上一些经师任意说解文字,造成文字的混乱现象。这些问题仅靠《仓颉》、《急就》一类识字书是无济于事的。因此社会迫切需要有一部阐释汉字形、音、义及三者之间关系的字书。在此情况下,博通经学的许慎,以“秦三仓”、“汉三仓”等识字书为基础,总结西汉经学家和《尔雅》等著作对于文字训释的成就,从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开始,历时二十一年,编写出《说文解字》这部光辉的文字学专著。《说文解字》十四卷,连同“叙目”一卷,共十五卷,全书分五百四十部,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又有异体字一千一百六十三字,共一万零五百一十六字。《说文解字》的体例是用小篆写一个字,先讲字义,其次讲字形与字义、字音之间的关系。例如:

炳,明也。从火,丙声。

这是最常见的样式。

《说文解字》(图10)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传统文字学的建立,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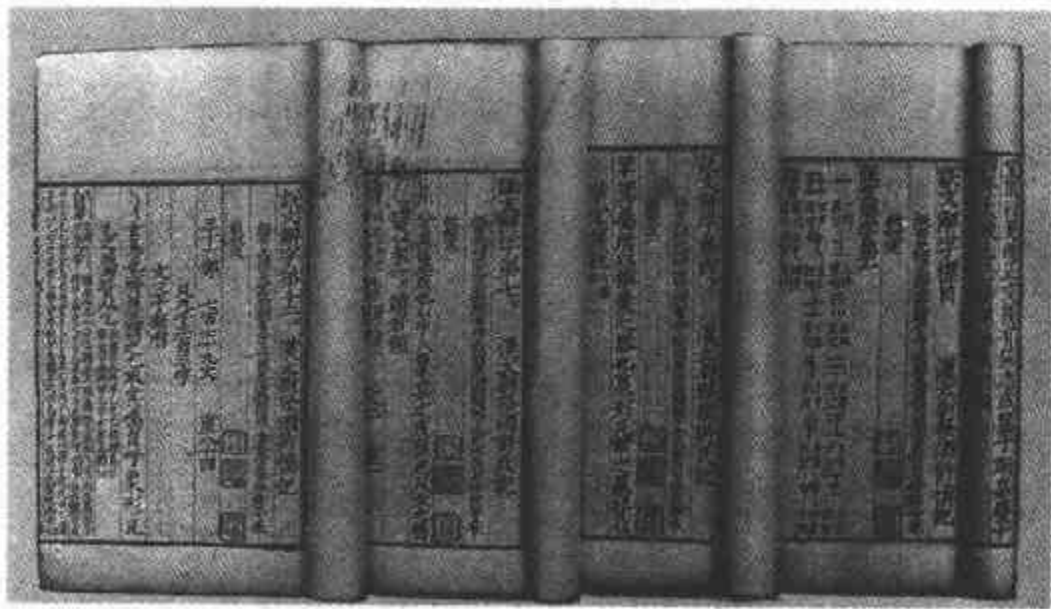


图10 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平津馆丛书本)

的重要价值在于总结和发展了战国以来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条例归纳汉字造字、用字方法的“六书”理论,并用此理论

来解说文字。它研究并吸取了《史籀篇》等识字书的成果,创造了符合汉字特点的部首编纂法,这种以部首编排汉字的方法一直为后代的字词典所沿用。它分析并完善了小篆的标准形体,不仅保存了大量小篆,同时以标举异体字的形式,保存了一批古文、籀文字形,成为后人辨识研究先秦古文字的依据和纽带。它集中保存了汉代及以前的训诂资料,抓住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特点,创造了结合字义和字音分析汉字字形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至今仍然为各种字典、词典所继承。由于《说文解字》的内容极其丰富,后世形成了专门研究它的“说文学”,并成为传统文字学中的重要领域。

在我国传统语言学的创立时期,训诂学最先建立、发展起来,这是由于汉字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由于汉字是以形体表意的文字而不是拼音文字,所以阐释字词意义的训诂学首先产生,研究字形为主的文字学随之建立,研究语音的音韵学的形成则要相对晚一些。《说文解字》这部字书的出现,是此期传统语言学成就的高峰。

二、小学发展时期的传统语言学典籍

魏晋至明代,是我国传统语言学的发展时期。传统的音韵学通过先秦两汉韵文创作对字音分析的积累,通过汉代《说文解字》、《释名》等专著对字音的标注和利用,逐步提高了对汉语语音的研究能力,并在东汉末期创造了“反切”这种注音方法。“反切”的产生为韵书的出现和音韵学的创立准备了必要条件。韵书是前人分析和研究古代汉语语音的音韵学著作,是按汉语的“韵”来分类排比汉字的字音总集,其作用在于标注和分析汉字读音,并为人们选择韵脚、写作韵文所用。

最早的韵书是曹魏李登撰写的《声类》,此书早已亡佚,唐代封演在《闻见记》中说:“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二

十字,以五声命字。”所谓“五声”,指的是以“宫商角徵羽”代表的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封演的记载说明《声类》开创了以声调对字音进行分类的方法,这一方法为后代的韵书所遵循。《声类》和其他韵书一样,使用反切注音,清人任大椿的《小学钩沉》中辑有《声类》的佚文二百一十条,其中有不少反切的材料与后代《切韵》、《广韵》诸书所用者相差不多,甚至相同,可见此书对后代韵书的编纂有相当重要的影响。继《声类》之后,两晋南北朝之际韵书大量出现,如晋代吕静之的《韵集》,刘宋时李概的《音谱》、《声谱》,北齐阳休之的《韵略》,北齐杜弼的《韵略》,梁朝夏侯咏的《韵略》,梁朝沈约的《四声谱》等等,可惜这些韵书均已亡佚,无法窥其真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的盛行,是促使大量音韵学典籍产生的重要原因。到南北朝末期,韵书的编撰进入了“音韵锋出”^①的繁荣阶段。但是由于南北朝诸家韵书的分部和注音各自依据于当时、当地的方音,以致不免有相乖互。于是隋初陆法言荟萃南北朝诸韵书的精华,写成《切韵》这部重要的音韵学典籍。据现存陆法言《切韵序》介绍,此书的编撰综合了隋初著名音韵学家刘臻、颜之推、魏渊、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等人的意见,最后由陆氏执笔写成的。《切韵》原书今已不存,从现存的敦煌残卷及有关文献的记载,可以了解到,《切韵》的编纂体例是将同音的字合在一起,用反切注明读音,以平、上、去、入四声分卷,其中平声两卷,全书共五卷,收一万一千一百五十八字,分隶一百九十三韵部。《切韵》是音韵学建立之后第一部集大成的音韵典籍,是魏晋南北朝韵书的总汇,因此自它问世后,以前的韵书几乎归于废弃。《切韵》的成就,在于它以“酌古沿今”的态度精确地审音辨音,对各种音类进行详细区分,既保留了古音特色,又兼具了方音的特点。由于《切韵》不是以单一的音系为依据,因而使

^① 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

后人研究、利用它增加了不少困难,但它“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作法,却使后人可窥见魏晋至隋代某些主要方音的音类分合异同的情况,并为探讨古音音类分合提供一些线索。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研究汉语语音发展承前启后的一个转轴。

《切韵》行世后,唐人纷纷在它的基础上加以增补刊削,有的补充若干材料,分立一些韵部;有的增加字数,丰富注解,成为新的韵书。其最著名的有王仁昫的《刊谬补缺切韵》,孙愐的《唐韵》及李舟的《切韵》。王书流传至今有三种版本,但皆不够完整,或有后人掺补的内容,该书是在《切韵》基础上进行删补的,故可据此窥见《切韵》的原貌。孙书在唐代相当流行,李书成于唐末,则在宋代受到广泛的重视,宋人编修《广韵》,也曾参考李舟的《切韵》,但孙、李两书皆未能流传至今。

宋代最著名的韵书则是陈彭年、丘雍等人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编成的《广韵》。《广韵》在中国音韵学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因为以前的韵书大都亡佚,或只有残卷,现今完存的韵书应以此书最古。《广韵》问世后,古代韵书的形式基本固定下来,后世许多韵书都仿照这种形式进行编撰,因而通过《广韵》可以看到古代韵书的基本结构。《广韵》五卷,共分二百零六韵部,全书收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韵部是韵书中统率汉字的体系,每一韵部下,各字读音音节中韵母的韵腹及韵尾都是相同的,第一韵部用一字作代表,称为“韵目”,如《广韵》中的“东”、“江”、“支”、“鱼”等;韵部不仅按韵区分,而且按声调区分。如“东”为平声,与它同韵的还有上声“董”,去声“送”,入声“屋”,它们也都各自立部。不少韵书还把同声、同韵、同调的同音字归在一起,称为“小韵”。各小韵之前用一小圈标示,如《广韵》“脂”韵中的“尸”小韵:

○尸主也,陈也…… 雉……尸……誓……式之切。四。

“尸”为小韵首字,“式之切”是这个韵中各字的读音,“四”表示此小

韵中共收入四字,另外,各字后皆注明字义。《广韵》的注解内容极为丰富,征引各类典籍达二百七十七种,不仅有语言学价值,同时也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广韵》之后,依照它的系统又出现一批或改订、或增删的韵书。如宋仁宗时敕撰的《集韵》十卷,比《广韵》多收二万七千多字,注解也更为详细。《切韵》、《广韵》都是以“审声辨韵”为要旨的,因此韵部区分细密,应试科举的士人依此作诗文甚感不便,于是自唐代开始,一些韵书便在韵部下注有“同用”、“独用”的标记,同用的韵,科举作诗文时可以通押,这就大大方便了科场对韵书的利用。但是即使如此,应试士人仍觉不足,于是宋代又出现了几种《礼部韵略》,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作为《广韵》的略本,有的减少了收字,有的合并了韵部,很受士人欢迎。至于金人韩道昭的《五音集韵》一百六十韵,金人王文郁的《平水韵略》一百零六韵,元人黄公绍的《古今韵会举要》一百零七韵,则更大大合并了《广韵》的韵部,为一般文人作诗采韵提供更多的便利。其中王文郁《平水韵略》所确定的一百零六部“平水韵”,在后代最为流行,一直通行至清代。

自《切韵》到《广韵》,大量的韵书始终贯彻着综合审辨古今南北语言的宗旨,包含多种语言系统,到宋代以后,与当时人们的实际口语完全脱节。入元之后,韵书的编撰有了重大的变革,倾向于反映当时语音的实际状况。这种变革源于元朝的统一。由于民族融合大大加强,为了对共同语言的识字、正音,使韵书不能脱离当时的实际口语;同时也由于北曲盛行,戏剧语言必须口语化方能为观众接受的特点,要求服务于戏剧创作的韵书也必须反映当时的实际语音。元代较早的韵书是《蒙古字韵》,它所记载的基本上是实际口语的语音,但由于用八思巴字来标明读音,所以后世流传不广。最能体现韵书变革的著作是周德清在泰定元年(1324年)编成的《中原音韵》,此书除在记载当代语音方面与《切韵》、《广韵》不同外,其编纂体例也与此前的韵

书大不相同：一是根据实际语音的情况将韵部浓缩为十九部；二是不用反切注音，而是把同音字聚在一起，用小圆圈隔开，并以易识字居首以供认读，各字之下也不注字义。《中原音韵》的撰作目的，据作者说，一是为了“正音”，一是为了“作词”。它的价值在于记载了元代中原地区较为通行的共同语语音，为现代学者研究元代汉语的语音状况、研究古代汉语发展到元代的变化提供了依据。另外，由于它的语音系统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密切相关，所以在汉语史的研究上尤其值得重视。

《中原音韵》之后，仿照它的系统而编撰的韵书有元人单从之的《中州乐府音韵类编》，明代则有朱权的《琼林雅韵》、陈铎的《菘斐轩词林要韵》、王文璧的《中州音韵》、范善溱的《中州全韵》等。

明初官修的《洪武正韵》，则是一部反映明初中原共同语读音系统的大型韵书，在明代影响较大。全书分七十六韵部，它“一以中原雅音为定”，在音系上与《中原音韵》基本一致，但在以声调分部、用反切注音等方面，则又恢复了古韵书的一些体例。

由于训诂学和文字学在我国小学的创立时期就得到长足的发展，进入魏晋以后，音韵学一反前期沉寂的状况，得以建立并迅速成长，大批韵书的出现成为突出的现象，所以当代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将魏晋至明代这一阶段称之为“韵书为主的时期”^①。其实，这一阶段我国训诂学典籍和文字学典籍的编撰成就也是非常显著的。训诂学方面，魏晋至明代最有影响的训诂学典籍有在《尔雅》基础上增广补充而成的释字释词新著，如曹魏时张揖的《广雅》三卷，孙吴时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唐代梅彪的《石药尔雅》二卷，宋代陆佃的《埤雅》二十卷，罗愿的《尔雅翼》三十二卷。有专门解释常用字、异字的专著，如晋代殷仲堪的《常用字训》一卷，梁代朱育的《异字》一卷

^① 《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等,以上诸书惜皆已亡佚。又有明代朱谋玮专为解释联绵词所撰的《骈雅》七卷。有元代卢以纬专为解释虚词所撰的《语助》一卷。音义并释方面的专著,有唐代陆德明所撰的训诂名著《经典释文》三十卷。训释佛经音义的名著有唐代玄应的《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慧琳的《慧琳音义》一百卷,慧苑的《华严音义》四卷等。

除了专著之外,训诂学在随文注释方面也有大量成果,如在魏晋之后,训诂的对象逐渐由经书扩大到史、子、集等各部;训诂出现了兼释注文的义疏和汇集众注的集解等新的形式;入宋以后,训诂又出现了疑古风尚和结合金石学等新的气象。

文字学方面,在魏晋南北朝形成了一个编撰字书的高潮,据《隋书·经籍志》等目录书所载,魏晋至隋代的字书约一百二十三种,如曹魏时张揖的《杂字》、《错误字》;西晋时吕忱的《字林》,束皙的《发蒙记》,王羲之的《小学篇》、《文字要记》,李彤的《字指》、《单行字》,葛洪的《要用字苑》等;南朝有刘宋时王僧虔的《古今文字志》、谢康乐的《要字苑》,南齐王劭的《俗字难字》,梁朝顾野王的《玉篇》、阮孝绪的《文字集略》、周兴嗣的《千字文》、冯平的《括字苑》等;北朝有北魏阳承庄的《字统》、江式的《古今文字》等。遗憾的是这些典籍大多亡佚,流传下来只有极少数。以上字书最重要的是《字林》六卷,收字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在南北朝时开始盛行,至宋元亡佚;顾野王的《玉篇》三十卷,收字二万二千五百六十一字,流传至今,它是我国现有最早的一部楷书字典。唐代的字书有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八卷,张参的《五经文字》三卷,唐玄度的《新加九经字样》一卷。而最重要的是颜元孙所撰,专为区分楷书笔画写法俗、通、正三体的《干禄字书》一卷。宋元时期字书的内容较为多样,有的以辨别文字形体为主,如郭忠恕的《佩觿》三卷,张有的《复古编》三卷,李从周的《字通》一卷;有的以解释文字音义为主,如宋代司马光的《类篇》十五卷,辽代释行均的《龙龕手鑑》四卷;有的专门考释汉隶,如洪适的《隶释》、《隶续》共四十八卷,

娄机的《汉隶字源》六卷。明代的字书编撰,在确立部首、各部内文字按笔画数目排序和附录难检字等方面都直接影响到后来字典的编撰,其最主要的是梅膺祚的《字汇》十四卷和张自烈的《正字通》十二卷。

此期文字学研究中还有两个值得重视的领域:一是对《说文解字》的整理和研究,有关著作如五代时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南宋李焘的《说文解字五音韵谱》三十卷等;另一领域是对古文字的研究,这一领域随着宋代金石学的兴盛而取得较多成果,主要的古文字研究典籍如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厚之的《钟鼎款识》,吕大临的《考古图释文》,王楚的《钟鼎篆韵》,薛尚功的《广钟鼎篆韵》等。

三、小学鼎盛时期的传统语言学典籍

清代是我国传统小学发展的顶峰时期,随着朴学考据的兴盛和深入,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等专学得到空前发展,其超越前代的成就反映在各类传统语言学典籍之中。

文字学方面的成就,以对《说文解字》的研究最为突出。此期研究《说文》而有成就者多至数十家,据近人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中《引用诸书姓氏录》统计,从清初到清末章炳麟的《小学答问》,有关著作达二百二十余种。这些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校勘和考证工作,如钮树玉的《说文解字校录》、严可均的《说文校议》、田吴炤的《说文二徐笺异》、承培元的《说文引经证例》、沈涛的《说文古本考》等;第二类是对《说文》有所匡正,如陈衍的《说文解字辨证》、俞樾的《儿笈录》、孔广居的《说文疑疑》;第三类是对《说文》作全面研究,并多所阐发的,如惠栋的《读说文记》及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等四大家的著作;第四类是《说文》新附字的考证,如钱大昭的《说文新补

新附考证》、毛际盛的《说文新附通谊》、郑珍的《新附考》和《说文逸字》等；第五类是补充订正前辈或同代人研究《说文》的著作的，如徐承庆的《说文解字注匡谬》、王绍兰的《说文段注订补》、冯桂芬的《说文解字段注考证》、严章福的《说文校议议》等。清代研究《说文》的著作以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四家最为重要，其中尤以段书、朱书更为突出。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是研究《说文》的力作，它受到当时及后世学术界的极力推崇。段书对《说文》的贡献：一是校订《说文》的传本；二是《说文》只讲本义，段注则阐发了字的引申义和假借义；三是注意了辨析同义词；四是对原书的解义作了补充说明。段氏一书并不仅仅为《说文》作注，而是利用和阐发了《说文》产生以后积累的文字学成果，故而段氏一书能超越《说文》，取得创造性的成就。与段玉裁同时治《说文》的桂馥，著有《说文解字义证》，所谓“义证”，一是举例证明字的本义，一是举例证明许慎的解说。桂书的最大优点是材料丰富，大量的材料不仅详细说明了字义、词义，而且从不同时代的材料中还可反映出字义词义的时代性。稍后的朱骏声撰写了《说文通训定声》，此书既是一部研究《说文》的重要著作，又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文字词汇学专著，它用丰富的资料，在字词的别义、引申义、假借义和声训方面补充了《说文》的不足。王筠与朱骏声同时，他的《说文释例》专为阐明许书的体例，他的《文字蒙求》和《说文解字句读》则在普及文字学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

总之，清代大量《说文》学专著虽然名为研究《说文》，实际上则总结、阐发了《说文》之后千余年间文字学的成果，订正补充了《说文》，推动了文字学的大踏步前进。

除了《说文》学之外，清代还出现了像张玉书的《康熙字典》，顾藹吉的《隶辨》等重要的字书。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清代原以研究金文、籀文为主，如汪立名的《钟鼎字源》、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吴荣光的《筠清馆金文》、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孙诒让的《名原》和《古籀拾遗》等。清末甲骨文发现以后,随即掀起了研究甲骨文的热潮,出现的著作如罗振玉的《殷虚贞卜文字考》和《殷虚书契考释》、王国维的《戩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孙诒让的《契文举例》等,古文字的研究,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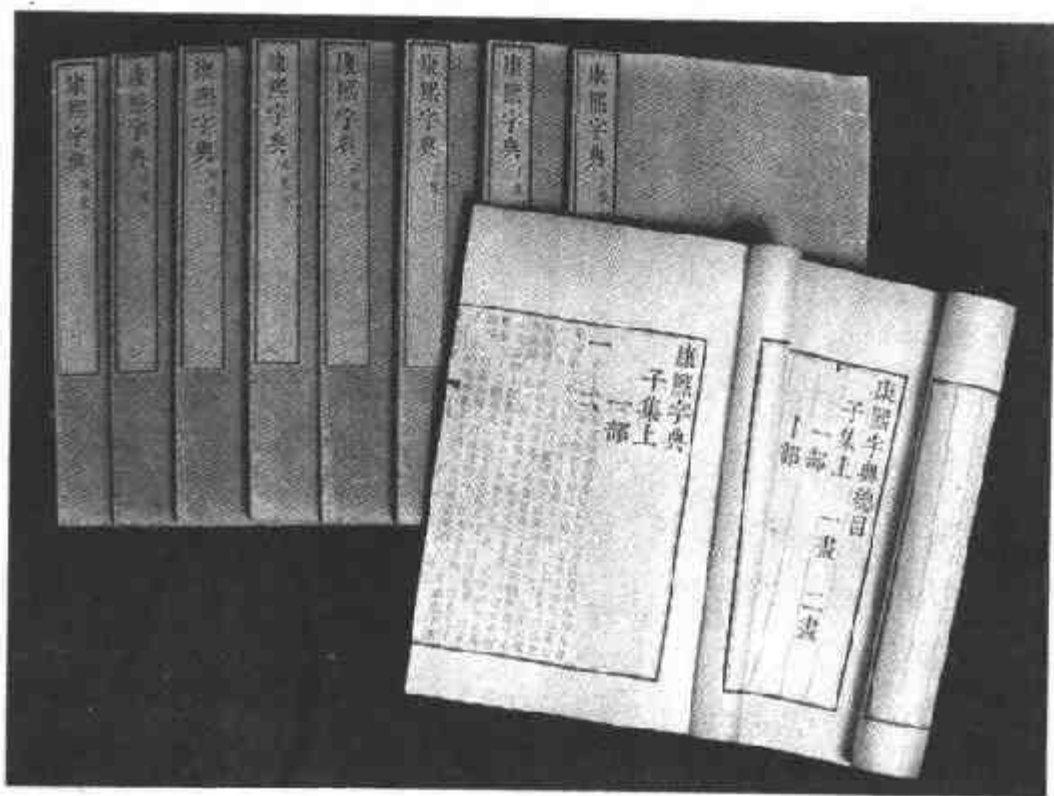


图 11 清代官修《康熙字典》，康熙五十五年武英殿本

清代音韵学同文字学一样,也有突破性的进展。樊腾凤的《五方元音》、李光地的《音韵阐微》等韵书记录了十七、十八世纪北方的语音系统;陈澧的《切韵考》、《切韵考外篇》研究了中古音系。除此之外,此期音韵学最重要的成就则是对古音的研究。

古音学的建立,首先应归功于明代的陈第,他的《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读诗拙言》等书,为古音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清代古音学研究中,最受推崇的名家及其著作是:顾炎武所撰的《音学五书》,即《音论》三卷、《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韵正》二十卷、

《古音表》二卷。有清一代古音学研究发端于顾氏，从他提出古韵十部之说后，继加探索者接踵而起，精益求精，后遂加密，故有创始之功。江永的《音学辨微》一卷、《四声切韵表》一卷、《古韵标准》四卷堪称佳作。如果说顾氏详于考古，而江氏则精于审音，其前两部著述，在审音方面尤为精要。戴震的《声韵考》四卷、《声类表》十卷成就突出。戴氏为江氏弟子，于考古、审音二者并重，《声韵考》以辨源流，《声类表》以明声变。钱大昕有《声类》四卷。钱氏学问渊博，于古声类卓有发明。他采辑群经传训及子史旧注中凡以双声立解的文字，分类纂录为《声类》，贡献甚大。江有诰则撰《诗经韵读》、《群经韵读》、《楚辞韵读》、《先秦韵读》、《唐韵四声正》、《谐声表》、《入声表》、《等韵丛说》等等。他的古音研究有集大成的特点，他全面深入地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用大量的材料说明先秦古音的韵例，证明了他的古音二十一部体系。清代学者对古音的深入研究，澄清了历代对古音分析的种种问题，确切地再现了古音系统，建立了一套科学研究语音的方法。同时他们又利用古音学的成就，由古音而求古义，为后人扫除了研读古籍的许多障碍。

清代的训诂学是我国古代训诂学由复兴走向鼎盛的阶段，此期训诂学的重要特点是确定了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由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著名学者所确定的这一方法带来了一代学风的转变，从而把训诂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清代训诂学还具有较为明确的历史发展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保证了多数训诂成果的可靠性和正确性。由于清代训诂学的迅速发展，从而使传统的文字训诂推广到语源、语法和词义系统的研究等广泛领域，为近代语言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清代训诂学家不仅注释了大批典籍，而且撰写了大量专著，这些专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超越前代的，而且体式也比较完备。在这类典籍中，有注释前代训诂专著寓作于述的，如邵晋涵

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戴震的《方言疏证》、魏茂林的《骈雅训纂》等；有依照《尔雅》的体制进行编撰的新著，如吴玉搢的《别雅》、洪亮吉的《比雅》、夏味堂的《拾雅》、史梦兰的《迭雅》、朱骏声的《说雅》、程先甲的《选雅》等；有考订群书而独成一家之言的，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俞樾的《群经平议》和《诸子平议》；又有撰集古训汇成一编的，如阮元的《经籍纂诂》；有收辑已佚的前代训诂专著以便后学的，如任大椿的《小学钩沉》、顾震福的《小学钩沉续编》、王国维的《重辑仓颉篇》等。

在以上研究训诂学传统领域的专著中，以高邮王氏父子的著作，即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的成就最大。清代乾嘉之间，考据深入，小学大明，以惠栋、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派一面大量考证汉唐旧注，注重考据；一面提倡文字训诂的转注、假借理论，蔚成风气。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著作精审渊博，超过了惠、戴两人的成就。《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都是以对诸经的考释为内容反映其训诂成果，两书训释古籍的创获皆可归功于“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两大法则。“诸说并列，则求其是”，是用旁征博引、比例互证的办法来解释语言规律，求其合乎事实的结论；“字有假借，则改其读”，则是从声训的角度以古音求古义的方法，攻破古籍中通假用字的奥秘，从而使以往古书诂屈难解之处涣然冰释。《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对于当时训诂方法的总结与升华，具有划时代的学术意义。

清代的训诂学还产生了不少开拓新领域的典籍。在语源研究方面，有戴震的《转语》、程瑶田的《果裸转语记》、章炳麟的《文始》等；在语法研究方面，有袁仁林的《虚词说》、刘湛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张文炳的《虚字注释》、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等。章炳麟的《文始》将汉字的演变分为“变易”和“孳乳”两种情况，推求汉字演

变的线索和规律,为汉语语源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利用西洋语法,对古汉语的实词、虚词和句读展开全面研究,虽然有生搬硬套西洋语法之嫌,但对于中国语法学仍有筚路蓝缕之功。章、马两书都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第九节 类书传统与类书典籍

类书是采摭群书中的各种资料,将它们排比编次、以类相从,为人们提供检阅方便的一种工具书。由于类书博采各种资料以备检查之需,所以,我国古代类书的作用相当于现代百科性的工具书。当然,它与现代意义的百科全书在性质上是不同的,现代百科全书分类立条,在每一词目下编写成文;古代类书却不是撰作,而是将有关的原材料辑录一处,它只是一种分类的“资料汇编”,并非任何个人专著。

类书又与丛书不同。它不是若干著作的完整汇编,类书的编者往往打乱原著作的体例结构,仅就所选取的资料进行分类排比,而不是对原书的完整辑录。但是有些大型的类书由于大量选辑原著的内容,所以后人仍可利用类书“汇编”的性质,从中辑出亡佚的古书。

类书又与字典、词书相异。虽然它在形式上与字典、词书有相同之处,但是类书并不单以解字释词、训诂音韵为目的,它所辑录的各类知识和事物要比字书广博得多。类书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已形成独立的文献,具有特殊的价值。

一、类书典籍的起源

类书的出现,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结果。随着各类知识的丰富,社会积累起来的书籍卷帙浩繁,人们苦于搜寻和翻检的困难,迫

切需要一种汇聚各类知识、开卷即可利用的典籍。正如宋代章如愚在《山堂考索》的自序中所说：“文词浩翰，汗牛充栋，或家藏人秘，月牖雪牕之下，一时欲得全书而遍览之亦艰巨哉！有能旁搜博采，类萃成帙，如聚药物于一笼，集材用于一场，任医师匠氏之采择，则不费搜求而得效奢矣，其功顾不伟哉？”应该说，社会对于分类知识的需求，及其利用效率的提高，是类书典籍产生的根本原因。

早在类书产生以前，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分类编次内容的典籍，因此类书的远源可以追溯到我国第一部训诂词典《尔雅》。这部书的编撰很早，后经多人增补，最终完成于汉初经学家之手。全书按所释字词分十九类，其中如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虫、释鱼、释鸟、释兽等等，虽然它并非类书，而是训诂语词的词典，但它分门别类的体例，却为后来类书典籍所仿效。

东汉至三国曹魏时期，文风嬗变，骈俪之词、排偶之文兴盛，文人撰述，崇尚驰骋华辞，讲究用典使事。于是抄集典故，排列偶句，以补记诵之不足，供临文时寻检，成为一般文士的普遍需要。这种注重辞藻、典故的时代风气，直接促成了类书的产生。据《三国志·魏书》和裴注的记载，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喜好文学，除了自己常有撰述外，又使儒臣王象等人搜集经传资料，随类相从，编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类书——《皇览》。《三国志·魏书·杨俊传》裴注曰：“《皇览》合四十部，部有数十篇，合八百余万字。”《皇览》卷帙庞大，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依靠传抄，要保存全书是很困难的，因此它流传到宋代时各种抄本、节录本皆已亡佚。今所存者，有清人孙冯翼从各书引文中辑出的《皇览》佚文一卷，收入《问经堂丛书》。清人黄奭也辑有一卷，收在《汉学堂丛书》之中。两种辑本的内容大同小异。

《皇览》虽然流传的时间不久，但它对类书的创造意义却是重大的，仅从《水经注》、《汉书》颜师古注、《太平御览》等书对《皇览》的引文，也可看到《皇览》辑录众书、类属材料的特点。因此后来学者皆推

它为类书之祖。如宋代学者王应麟曰：“类事之书，始于《皇览》。”（《玉海》卷五四）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提要》也认为“类书始于《皇览》”。^①

《皇览》以后，古代类书逐渐丰富起来，形成了一批体例特殊的典籍群体，反映在目录书中也由归属它类到独立门类。第一部类书《皇览》出现后，西晋《中经新簿》把它列入收录史书的丙部。到《隋书·经籍志》因类书兼采群籍，既非经史，也非子集，只好归入以庞杂而称的子部杂家类。《旧唐书·经籍志》编撰时，类书数量已渐增，因此将类书从杂家中独立出来，另立“类事”一项。北宋《崇文总目》又将“类事”改为“类书”。从此，类事之书称为“类书”，则为人们所习用；而目录书由子部统辖“类书”的传统也沿袭下来。

二、类书典籍的发展

类书的出现，适应了社会文化的需要，因此自《皇览》以后，得到不断地发展。综观类书的发展轨迹，大抵唐以前类书偏重经传，间采子集，取材范围较窄，编排方法也较简单；唐宋两代，类书的内容范围拓宽，作用多样化，编排体例也各有特点，类书典籍的发展具备了一定规模；明清之际，类书的数量猛增，几部具有代表性的类书，无论在规模、体例和功能等方面，都超越前代，达到高峰。

（一）六朝类书的纂集

继《皇览》之后，南北朝时又出现了一批类书。早期类书的编辑，多以便于皇帝读书览古、施政借鉴为目的，故称之为“皇览”、“御览”。南北朝时编成的几部类书，也多与皇帝有关。一部是南朝梁武帝即位之初诏修的《寿光书苑》，《隋书·经籍志》载：“《寿光书苑》二百卷，梁尚书左丞刘杳撰。”“寿光”以梁朝文阁寿光殿而得名。梁朝初，还出现

^① 《四库提要》卷一三五，吴淑《事类赋》提要。

了一部私编类书《类苑》，共一百二十卷，由注释《世说新语》而闻名的刘孝标编纂。这两部类书流传不广，故后人利用不多，但从一些文献记载上可知《类苑》的水平要比《寿光书苑》高。唐人杜宝《大业杂记》说：“梁主以隐士刘孝标撰《类苑》一百二十卷，自言天下之事，毕尽此书，无一物遗漏。梁武心不伏，即敕华林园学士七百余人，人撰一卷，其事类倍多于《类苑》。”这里所说的“华林园学士所撰”，即《华林遍略》，其编纂原委即因梁武帝欲以官修类书超越私修而成。《华林遍略》共七百卷，由徐勉领修，成书后不仅在南方流行，北方贵族士人也纷纷抄录购求。《华林遍略》对后来类书的修纂影响很大，北齐、隋所编类书，以至唐初的《艺文类聚》，大多以其为蓝本，或利用、吸收了它的内容。

南北朝时另一部重要类书是北齐后主高纬时期官修的《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由祖珽等人编修。初名《玄洲苑御览》，又改称《圣寿堂御览》，最后才定为《修文殿御览》。该书体例严谨，一直流传到北宋编纂《太平御览》时，许多类目仍参照了《修文殿御览》。这部类书与《华林遍略》今皆已不存。清末在敦煌发现的古书中，清理出一部古类书的残卷，近人罗振玉认为它是《修文殿御览》，但也有人认为应是《华林遍略》。总之，隋以前的古类书都已亡佚，现存虽有少量佚文，也较难看出原书的具体情况。

隋代虽然享国不过三十余年，但却有《长洲玉镜》二百三十八卷，《编珠》四卷，《玄门宝海》一百二十卷，《北堂书钞》一百七十三卷等类书问世。《长洲玉镜》、《玄门宝海》今已亡佚。《编珠》现存一、二两卷，虽已是残本，但仍不失为现有最早的古类书。该书为杜公瞻奉敕撰进，书前写于大业七年（611年）的自序称因隋炀帝“好为杂咏及新体诗”，故命编录。《编珠》的作用既是为作诗提供素材，因此它与以前“徵事”的类书不同，不是在类目下汇辑典故材料，而是将搜集到的典故浓缩为对句，为引用者提供方便，其体例是先列对句，下注出处和

引文。如卷一“山川部”：

暴练河，紫带海。

刘荟《劭山记》曰：“黄河在劭山一百余里，望之如暴练。”

《罗浮山记》曰：“浮山东岭杳冥，东南望海，有如紫带。”

《编珠》原分类十四部，现存一、二卷有五部，卷一为“天地部”、“山川部”，卷二为“居处部”、“仪卫部”、“音乐部”。

《北堂书钞》为隋末唐初人虞世南所编，全书分八十部，部下分类，共八百零一类。原书经历代流传，已有不少残缺，清末孔广陶得旧本校刻，名为《影宋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但内容仅存十九部。从今本内容可以看出《北堂书钞》仍属“徵事”、“叙事”形类书，其体例是在每一类目下将各书有关材料汇集起来，每一事摘出字句，句子字数多少不同，以大字标列，然后再用双行小字注出书名或列出原文。《北堂书钞》虽已散失不少内容，但仍有重要价值，据孔广陶统计，其引用隋以前古籍约八百多种，材料相当丰富，清代学者许多辑佚、考据工作，都利用了此书。

（二）唐宋类书的编纂

唐宋两代，是我国类书发展的重要时期，产生了一批至今还为人们所利用的重要类书。据现存类书和文献记载，唐代纂集的类书主要有唐高祖时命欧阳询等人编纂的《艺文类聚》一百卷，太宗时命高士廉等人编的《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高宗时命许敬宗等人编的《三教珠英》（又名《海内珠英》）一千三百卷，玄宗时命徐坚等人编的《初学记》三十卷。此外，还有白居易编的《白氏六帖》三十卷，杜嗣先编的《兔园册府》三十卷，于立政编的《类林》十卷，陆贽的《备举文言》二十卷，温庭筠的《学海》三十卷，皮日休的《皮氏鹿门家钞》九十卷，刘蕡的《稽瑞》一卷等。唐代类书已大部分亡佚，今存者仅《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和《稽瑞》四部，其中又以《艺文类聚》和《初学记》比较有名。《艺文类聚》全书分四十七部，每部又分类目，共七百四十

余类,其贡献在于扩大了类书辑录内容的范围,改变了唐以前类书偏重类事,不重采文、随意摘句的缺点,辑录材料事文并举。其体例是按类目编次,故事在前,诗文在后。所录故事,皆注书名;所录诗文,都注时代、作者和题目,并按不同文体用“诗”、“赋”、“赞”、“箴”、“启”等字标明。如卷二十一“人部”五“交友”一段,先引《周易》、《大戴礼》、《论语》等书对友谊的论说,再引《孔丛子》、谢承《后汉书》、《竹林七贤传》等书所记交友的故事,最后辑录有关交友的诗文。这种援引谨严,典故、诗文并列的体例,为后来许多类书所继承,成为编集类书的一种重要形式。《艺文类聚》征引广博,引用各类书籍达一千四百三十一一种,它所保存的大批汉隋间词章名篇,为后世编辑历代诗文总集所利用;其引用的大批史书、小说多数亡佚,故成为后人考史和小说研究的重要资料。

唐开元年间成书的《初学记》虽不如《艺文类聚》规模大、资料广博,而全书材料的剪裁、组织,却比《艺文类聚》更为精细巧妙。《初学记》全书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类。所辑录的内容与《艺文类聚》一样,事文并举,每一类目内均分“叙事”、“事对”、“诗文”三部分,正文单行大字,注用双行小字。如卷四“岁时部”下,“寒食”第五:

〔叙事〕《荆楚岁时记》曰: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

〔事对〕魏武令,周举书。(魏武帝《明罚令》曰……范曄《后汉书》曰:周举迁并州刺史……)

〔诗〕李崇嗣《寒食诗》(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不知何处火,来就客心燃。……)

这一段的“叙事”,罗列有关寒食节起源及民俗材料;“事对”先概括出对偶,再集录所概括的有关史事;最后附有关寒食的诗文。括号内文字即类书中的小字注文。它的“叙事”不同于其他只是资料汇辑的类书,而是将有关材料进行编排,使之前后连贯如一篇文章,所以《四库

提要》说它“叙事虽杂取群书，而次第相连属”。另外它的“事对”吸收了以前类书的特点，概括出偶句，以便读者作文时所利用。

宋代类书编纂取材广泛，内容渊博，数量与种类均超过唐代，至今所存仍有三四十种。其较著名者如官修《太平御览》一千卷，《册府元龟》一千卷，吴淑《事类赋》三十卷，王应麟《玉海》二百卷、《小学紺珠》十卷，祝穆《事文类聚》一百七十卷，章如愚《山堂考索》二百一十二卷，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三百六十六卷，林昉《源流至论》四十卷，高承《事物纪原》十卷，孔传《后六帖》（又名《孔氏六帖》）三十卷，刘应李《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五卷，刘达可《璧水群英待问会元选要》八十二卷，无名氏《锦绣万花谷》前集、后集、续集共一百二十卷。

《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和《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并称宋初“四大书”。由于《太平广记》专收小说，《文苑英华》属诗文总集，故不以类书看待。《太平御览》初名《太平总类》，由李昉等十四人奉敕修撰，辑《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类书及其他典籍而成，分五十五门，四千五百五十八个子目。该书最大的特点以征引广博而见称，因此后人多据此校勘典籍、辑佚古书、考证名物。例如古代科学家张衡创造浑天仪和地动仪的材料，原书早已失传，但却保存于本书卷二“天部·浑仪目”内。本书卷首有“经史图书纲目”，记载书中征引书目一千六百九十多种，还不包括所引杂书和诗赋等，但这个纲目编得比较粗疏，有一些错误和重复。《太平御览》的内容也是典故事实与诗文并录，其体例是在类目下按时代先后排列材料，不再区分“叙事”或“诗文”等形式，也不作摘句或概括偶句。在辑录材料时注意保存古书的本来面目，如《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引用它书时正文与注相连，不加分别，而《太平御览》则正文作大字，注文作小字。

由王钦若等人编纂的《册府元龟》是奉宋真宗之命完成的，它与唐宋其他类书的内容和体例都不相同，其内容是专辑上古至五代的君臣事迹，按事类和人物分门编次；所取材料以“正史”为主，兼采经

书、子书,不取小说和野史杂书。书中内容不仅是辑录它书的材料,编者也有撰述,全书分三十一部,一千一百多门,每部之前编者撰有“总序”,每门之前又有“小序”,用以概括议论本部本门的内容。《册府元龟》的卷数虽与《太平御览》相同,但篇幅却超过它的一倍,书中几乎概括了“二十四史”中的前十七史,此外还保存了不少实录、诏书、奏议等史料。前人以为《册府元龟》的内容多见于正史,故不太重视,其实,正史在流传中已出现不少阙误,利用《册府元龟》的内容正可以用来补正今存史书。清人刘文淇等即曾以此书校勘《旧唐书》而颇有成效,今人陈垣利用此书卷五百六十七的内容,补《魏书·乐志》整整一页。这些都说明该书在校勘、辑佚上的作用。但是,此书引文不注出处,则给读者增加了不少困难,这是在使用时必须注意的。

宋人私编的类书也不少,其中如王应麟的《玉海》,是专为科举考试所作的,所以它的标门分类和辑录内容具有这方面的特点,多采有关典章制度和祥瑞等材料。全书分二十一部,二百四十条类,书中既录纪事,也兼采诗文辞藻,除辑录其他典籍,也收其他类书的内容,凡采自其他类书的材料则只记题目,不抄原文,以免数量增多繁琐。

(三) 明清类书的编纂

明清两代,由于印刷业的不断发展,知识积淀越来越厚,典籍流传日益增多,查检事类掌故更为繁难,所以编纂类书更为实际所需要。官修类书以规模宏大见称,私修类书则以形式和用途多样见长,类书典籍的发展,达到最为繁荣的阶段。

《永乐大典》是明代类书编纂最突出的成就。《永乐大典》的编修由翰林学士解缙主持,始于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次年十二月完成初稿,名为《文献大成》。但明成祖并不满意,又加派姚广孝等人参加扩大重修工作,永乐六年(1408年)十二月,重修告成,全书正文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与目录六十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共计三亿七千万字左右。其收编范围由于贯彻明成祖“毋厌浩

繁”的方针,所以内容极为广博,曾采集古今典籍七八千种。其体例模仿元代阴幼遇《韵府群玉》的形式,分韵隶事。但《永乐大典》是依明初《洪武正韵》的七十六韵部来排列单字的,在每一单字下,先注《洪武正韵》对该字的音义解释,次录各韵书、字书的反切和解说,又仿唐代颜真卿《韵海镜源》的做法,并列单字的楷篆各体,单字注解中的书名和作者名用红字写出,非常醒目。单字注解后再将书名、篇名或首字涉及该字的材料引出。这种“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方法,使该书更接近于百科全书的形式。《永乐大典》(图 12)辑录材料,常常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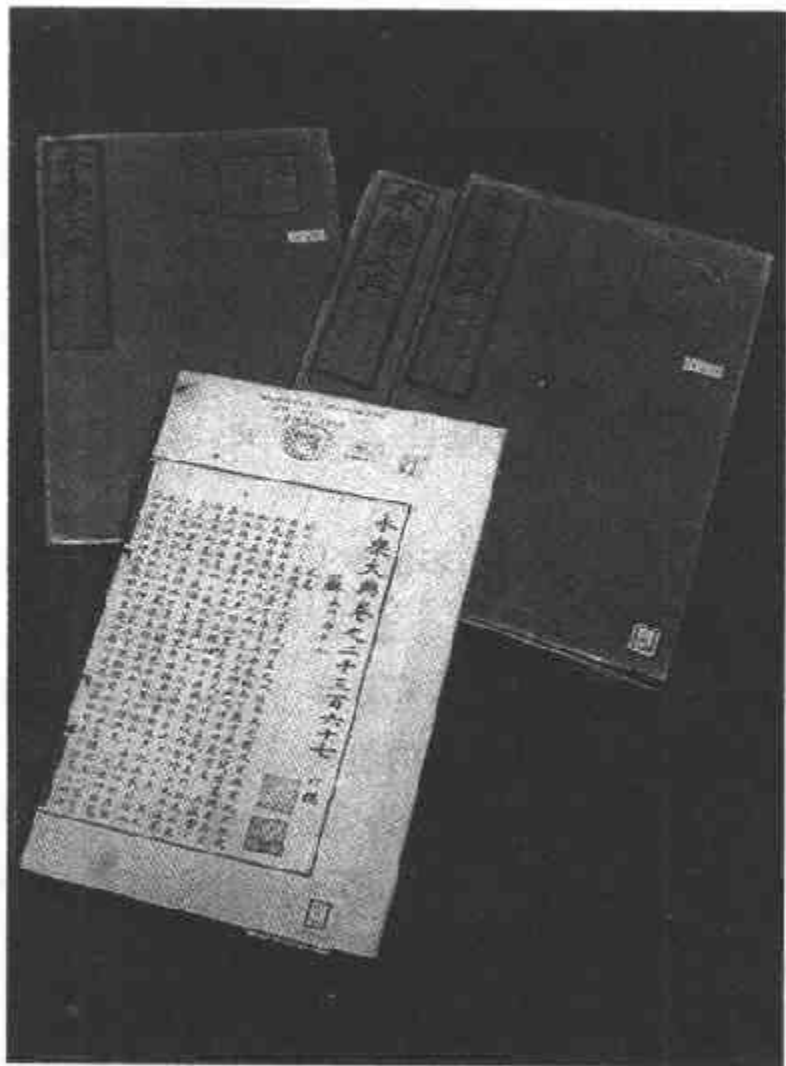


图 12 明代大型类书《永乐大典》

将原书整部、整篇或大段的抄录,所以对保存古书发挥了巨大作用。清代纂修《四库全书》,就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五百多种,由此可见这部大类书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永乐大典》由于部帙庞大,所以未能刻印刊行,明嘉靖、隆庆间曾摹写了一部副本。副本至清乾隆年间已阙二千四百多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该书遭焚毁、劫掠损失殆尽。现国内收集残本七百三十卷,已由中华书局于1960年影印出版,仅存的这些残本中,也仍有许多材料可以利用。

明代私修类书种类繁多,用途各异。举其要者,如俞安期的《唐类函》二百卷,将唐人类书删除重复,汇为一编,是利用唐代类书的方便之作。邹道元的《汇书详注》三十六卷,采择唐宋类书,列三十七部,下附细目,排列材料,加以注释。唐顺之的《稗编》仿宋代类书《山堂考索》而成,共一百二十卷,五十二类,按类辑录前人文章。徐元太的《喻林》一百二十卷,专收古人的譬喻词句,分十门,五百八十多类目。王志庆的《古俚府》十二卷,专采六朝唐宋骈体文中的辞藻。章潢的《图书编》一百二十七卷,专辑各书之图,附文加以说明。王圻的《三才图会》一百零六卷,也是一部附图类书。此外如陈耀文《天中记》六十卷,凌稚隆《五车韵瑞》一百六十卷,彭大翼《山堂肆考》二百四十卷,俞安期《诗隽类函》一百五十卷,冯琦《经济类编》一百卷,袁黄《群书备考》二十卷等等,皆各具内容特色。

清代官修类书数量较多,其中以《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成就最为突出。该书本由康熙皇帝敕撰,最初由诚亲王胤祉命陈梦雷编纂,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完成,名《汇编》。雍正皇帝即位,又命蒋廷锡等人重新编校,删去胤祉、陈梦雷等人姓名,改称《古今图书集成》,于雍正四年(1726年)用铜活字排印六十四部。全书分为历象、方輿、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编,编下分三十二典,典下属六千一百一十九部。内容极其广博,包罗了封建社会的大部分学问。其体例是每部

之下先有“汇考”，以纪大事；次列“总论”，辑录经、史、子、集的有关议论；后有“图表”，或插图，或列表，以达到形象表达的效果；有“列传”，叙述有关人物的生平事迹；有“艺文”，以采择诗文；有“选句”，多摘俚句、对偶；有“纪事”，集录不见于“汇考”的琐细事迹；有“杂录”，收不宜入“总论”、“艺文”的材料；有“外编”，多载奇异荒诞的内容。以上各项并不是每部都具备，据材料的有无而定。《古今图书集成》吸收了历代类书的优长，在古代类书的编纂体例上达到最为完备的程度。它以编、典、部三层列目，使得分类层次分明、条理清晰；每部又以“汇考”等九项进行编排，则能包罗相关的各种材料，使之巨细无遗。其征引材料一一注明出处，便于校核原书；每部下的“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等项目，还在内容前标明该项材料编排的目次，如“汇考”标时代，“列传”标人名，“艺文”标篇目、作者等等，有利于检索。《古今图书集成》完整地保存了许多古代文献资料，它在现存类书中规模最大，用处最广，体例最完善，充分反映了我国类书典籍的编纂水平和成就。

清代官修类书除《古今图书集成》外，还有康熙时张英奉敕编纂的《渊鉴类函》四百五十卷。这部书是以明代《唐类函》为基础增补而成的，分四十三部，二千五百三十六小类。书中凡《唐类函》原有内容标“原”字，又补采《太平御览》等宋以后类书十七部及其他一些典籍的材料作为续增，凡续增内容则标“增”字。该书卷数虽不及《太平御览》的一半，篇幅却超过一倍。检查唐宋至明嘉靖时的古事典故、诗文辞藻，此书可资利用。清代官修类书中还有一些采录辞藻、诗文的专用类书，如何焯奉敕所撰的《分类字锦》六十四卷，辑录各种典籍的字词，分四十门，六百一十八类。吴士玉奉敕撰的《子史精华》一百零六卷，专采子书、史书中的名言隽语，分三十部，二百八十类。较为流行的是康熙时编成的《佩文韵府》正集四百四十四卷、拾遗一百二十卷，雍正时编成的《骈字类编》二百四十卷。两书专供写诗作文的人采撷

词藻、对句和诗文,但又各有特点,如《佩文韵府》按词的尾字归韵查检,《骈字类编》按首字分类查检;前者征引诗文往往只标作者,不标篇名题目,后者则大都标出;前者在单字下注明音义,后者则无;前者兼收三字、四字构成的词语,后者则只收“骈字”,即两字合成的词语。因此《四库提要》说两书可“互为经纬,相辅而行”。

清代私修类书也很多,如陈元龙《格致镜原》一百卷,分三十门,汇编有关身体、冠服、宫室及日用器具、五谷菜蔬、草木虫鱼等材料,博物溯源,类如宋代的《事物纪原》。魏崧《壹是纪始》二十二卷,补遗一卷,分二十二类,也属考证事物起源的类书。此外,还有《宋稗类钞》、《清稗类钞》等类书,多从小说、笔记、诗话中取资,汇集人物掌故的材料,有助于对某个朝代人物事迹、社会生活的研究。

明清两代类书,无论从数量到种类,从规模到体例,都远胜于前代,特别到了《古今图书集成》的出现,中国类书的编纂形式可以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清乾嘉以后,由于朴学之风日盛,学者考据喜用原书,而视类书为鄙陋,故类书的纂辑渐稀。清末以后,西方的近代科学在中国逐渐流传,随着知识体系的转换和近代百科全书编撰方法的传入,中国类书典籍的纂辑至此而告终结。

三、类书的种类和利用

我国的类书典籍起自三国曹魏,此后历代迭有编纂,数量累增,据古今一些目录书记载,总量约七百余种^①。1935年燕京大学图书馆曾将其馆藏类书编入《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著录三百一十六种,该目虽然所收范围偏宽,但所反映的毕竟仅为一馆之藏,因此,现存类书总数应不少于三百种。

^① 参见张涤华:《类书流别》,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我国类书从内容到形式,多种多样,异彩纷呈。类书种类,就其最主要的区别,可从纂辑内容和编录形式来进行划分。从纂辑内容上看,类书可分为类事、采文、综合等三大类型。早期类书,如《皇览》、《修文殿御览》、《华林遍略》,直到隋末虞世南的《北堂书钞》皆属于“类事型”类书,它们的内容主要是分类以征事、汇集典故,以方便作文时据事用典、援古证今,或从中采撷有用的辞句。

“采文类”指那些专采诗文偶句、骈俪辞藻,以供赋诗时直接利用的类书。现存最早的类书《编珠》,应属这种类型,它的内容编排是先隶事为对,下边再注出处。仍以其卷一“山川部”为例,如:“桥势如星,沙形如月。”这是从引文中为读者概括出来的偶句。下边列出偶句的出处:“《华阳国志》曰:蜀郡城西南有七桥,云李冰所造,上应七星。《太康地记》曰:西海居延县流沙,形如月初生五、六日也。”此后如唐代《白氏六帖》、宋代《事类赋》、明代《骈语雕龙》、清代《佩文韵府》等等,皆如此类。

“综合类”兼具前两种类书的特点,既有叙事,又采诗文,从而扩大了类书内容的范围。这种类书始于唐代《艺文类聚》和《初学记》,如《艺文类聚》各卷以故事居前,诗文在后;而《初学记》每类则分“叙事”、“事对”、“诗文”三项。这种并列古事典故、诗文辞藻的综合形式,后来为多数类书所采用,到了清代《古今图书集成》,以“汇考”、“艺文”等九项囊括各种材料,使中国类书内容的丰富,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从编录形式来区分我国类书的种类,大致有“分类编排”和“按韵编排”两大类型。分类编排是类书的主要编辑形式,自《皇览》以下,大多数类书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编录的。分类编排的特点和长处在于枝干清楚,层次分明,能突出各种材料的上下从属和相关的联系。分类编排形式在各类目下对材料又有不同的排列方法,有的是按时间顺序排列材料而不加己见,如《太平御览》;有的是在材料前有摘句或

概括出偶句,如《编珠》、《北堂书钞》;有的是在类目下又用一些项目统辖材料,如《初学记》、《古今图书集成》;有的是在各部类之前撰写大序、小序来交代评述本部类的内容,如《册府元龟》;有的是在类目下以数字为纲来聚集材料,如南宋王应麟的《小学紺珠》就很典型。该书分“天道”、“地理”、“人伦”等十类,“天道类”下以“两仪”(天、地)、“三才”(天、地、人)等数词排列,汇聚相关材料,这种方法直观、有趣,适合于作启蒙之用。

我国按韵编排的类书也有一定数量,这种方式开始于唐代颜真卿的《韵海镜源》,后来如《韵府群玉》、《永乐大典》、《佩文韵府》等都采用此法。按韵编排较分类更便于寻检到所需的主题材料,如《佩文韵府》,全书按“平水韵”一百零六韵编排,以“霜叶”一词为例,要查寻该词有关的诗文偶句及其出处,应先判断该词尾字“叶”属何声何韵,知“叶”属入声十六叶韵后,即可在叶韵部“韵藻”项找到“霜叶”一词,查得“杜牧诗:霜叶红于二月花”等诗句和出处。按韵编排有简便之处,但也存在割裂主题材料类聚关系的缺点。按韵编排的类书大多在每个单字之后注音释义,有的还列出该字的楷篆各体,使类书也发挥了字书的功能。在单字下对于材料如何安排,各书也不尽一致,有的是直接将材料作先后排列;有的则又按事目分类或分项,如《佩文韵府》则在单字下分为“韵藻”、“对话”、“摘句”三项,以排比相关的辞藻、诗句、对话和文句。

古代类书典籍的编纂,除了一些是标榜供皇帝阅览的以外,还有各自不同的用途。有的可作一般查检和综合利用,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及至《古今图书集成》等;有的是供诗文取材的,如《白氏六帖》、《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有的以资料场考试所用,如《群书会元截江网》、《玉海》等;有的可作为启蒙教材,如《兔园策府》、《小学紺珠》、《初学记》等;还有的可备家常日用,如《万用正宗不求人》、《文林聚宝百卷星罗》等。

无论古代类书的编纂目的和当时的用途如何,这些典籍都起着保存古代典籍文献、保存古代文化知识的积极作用,至今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利用现存类书,不仅可以按类求索有关的资料,作为探讨古代历史事实、典制沿革、学术文化以及社会习俗的依据,而且可以利用古代类书的引文,校勘、考证现存古籍的内容。有些大型类书由于整部、整篇地抄录原著,因此还可以从中辑出亡佚古籍的全书或者部分佚文。

中国类书虽然不是学术撰著,所录材料也有某些失真之处,但它们仍以“区分缕列,靡所不载”的形式保存了大量古代文化遗产,而久为中外学术界所重视。类书典籍的长期流传和独有的功能,在我国典籍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十节 丛书传统与丛书典籍

丛书在中国典籍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保存典籍、传播文化起过积极的作用,是中国典籍的重要方面。丛书与类书不同,类书是在搜集大量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再重新分门别类整理成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丛书则是将原来单本流行的典籍汇编成一部大书,用一个总名概括起来刻印出版,以成套保存典籍,方便人们检阅。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许多文化典籍,由于历史漫长,加之战乱水火等灾难,屡遭散佚,这对于学者的阅读、典籍的保存与流通是非常不利的。丛书的编印却能起到较好地保存古籍、方便流通阅读的作用。因此,清代学者张之洞在《书目答问》卷五中劝告人们说:“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读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这里要考察的,主要是古籍丛书的传统和古籍丛书的发展。

一、丛书的起源及其种类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丛书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的概念出发,即任意汇集两种或两种以上单书而别题一名便可称作丛书,如专收史籍的《二十四史》和汇集四部典籍的《百川学海》皆为丛书。从狭义的概念出发,丛书必须是内容上部类不同的两种或两种以上单书的汇集。在这个意义上讲,《二十四史》虽然汇集二十四部典籍,但同为史书,则不能称作丛书,而只有包括经、史、子、集等不同部类典籍的《百川学海》才是丛书。

然而,在我国丛书发展的实际过程中,所谓广义也好,狭义也好,在多数情况下,它们是并行不悖的。广义的概念,包括将某一部类典籍汇刊的专类丛书,以及汇刊两个或两个以上部类典籍的综合丛书。狭义的概念即单指综合丛书。

我国的丛书源远流长,汉灵帝在熹平四年(175年)命人写刻的《熹平石经》就包括了《周易》、《诗经》、《尚书》、《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六部经典。此后,按《隋书·经籍志》的著录,南齐陆澄汇集《山海经》以下一百六十家地理典籍,编成《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后来梁代任昉又增加四十八家,编成《地记》二百五十二卷,这是最早的地理丛书。此外,还有五代国子监刻的“九经”,北宋的《七经正义》、《武经七书》,南宋井度的《眉山七史》、岳浚的《相台九经》等都是丛书,但这些都属于汇刊同部类典籍的专类丛书,确切地说应称为丛编。

综合丛书的产生较晚,最早的综合丛书是俞鼎孙、俞经兄弟所辑的《儒学警悟》,刊行于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收汪应辰《石林燕语辨》,程大昌《演繁露》、《考古编》,马永卿《懒真子录》,陈善《扞虱新话》,俞成《萤雪丛说》等宋人典籍六种,四十一卷,内容多为宋代制

度掌故、人物琐事,统编为七集,四十卷。由于《儒学警悟》的南宋刻本久不传世,元明清几代又未翻刻,直到1922年才由陶湘再次刊行。因此,前人考证丛书源流时,常以后出的南宋左圭《百川学海》、元代陶宗仪《说郛》为祖。《儒学警悟》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丛书编辑工作的全面展开。虽然此前已有一些专类丛书的编辑,但范围较窄,丛书的作用未能充分显示出来,自《儒学警悟》、《百川学海》、《说郛》等几部早期综合丛书出现以后,学者们才真正认识和重视丛书的特殊功用,从而逐步兴起汇编丛书的热潮,使丛书典籍迅速地丰富发展起来。

自南宋以后,随着丛书典籍的不断出现,丛书的种类也逐步增加,这就提出了为丛书合理分类的问题。丛书在传统目录书中立类及其本身种类的区分,开始于明万历年间祁承燾的《澹生堂书目》。在这部书目中,祁氏为丛书独立门类,并且将丛书区分为“国朝史”、“经史子杂”、“子汇”、“说汇”、“杂汇”、“汇集”六种。此后,不断有学者对丛书的分类提出见解和方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对丛书进行比较系统和科学分类的,应属上海图书馆编纂的《中国丛书综录》,以及由顾廷龙主编的《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

丛书典籍的种类,首先可以分为“综合丛书”与“专类丛书”两大类。“专类丛书”的细分自然可按其汇集的专科而定,各自归于经、史、子、集四部。这类丛书的进一步分类和归属比较容易理解,比如,《十三经注疏》属经部丛书,《二十四史》属史部丛书,《百子大全》属子部丛书,《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属集部丛书。门类较窄的丛书,如《音学五书》、《琴学丛书》、《痘疹大全》等,则归入各部中的小类。

“综合丛书”的种类和归属则比较复杂,需要稍作阐释。“综合丛书”大致又有“汇编类”、“地方类”、“氏族类”、“独撰类”等四种类型。

汇编类丛书是指汇集经、史、子、集四部中两部类以上的单书而编成的丛书。这类丛书是综合丛书的典型代表,由于收书部类多、范围广,所以丛书的功用得到充分发挥,影响最大,通常被视为丛书的

“正统”。自南宋《儒学警悟》、《百川学海》出现以后,元明清等各代均有大量产生,特别是清代,这类丛书的汇刻达到了高潮。汇编类丛书又是形式多样的,一般有几种区分的方式。一是按所收单书的撰写时代分为通代和断代两类。如明代毛晋《津逮秘书》、陈继儒《宝颜堂秘籍》等,所收单书为各代所撰典籍,故应属通代类汇编丛书。又如明代王文禄《百陵学山》,所收皆明代著述;清代张潮《昭代丛书》,所收皆清代著述,这样的丛书则应属断代类汇编丛书。二是可按丛书的编辑汇刊时代区分,如:《百川学海》、《说郛》属宋元丛书,《今献汇言》、《夷门广牍》属明代丛书,《学海类编》、《四库全书》、《正谊堂丛书》属清代丛书。三是可按编者的汇编目的进行区分,如:《士礼居丛书》、《玉海堂景宋元本丛书》、《滂喜斋丛书》等是以保存善本书版本为宗旨的;《萧山王氏十万卷楼辑佚七种》、《二酉堂丛书》、《玉函山房辑佚书》等是以辑佚古籍为宗旨的;《抱经堂丛书》、《经训堂丛书》、《雅雨堂丛书》、《平津馆丛书》等是以校勘典籍、正定古书为宗旨的。此外,如《知不足斋丛书》、《粤雅堂丛书》、《广雅书局丛书》等,则以广搜博采、“为古书续命”、方便典籍流传为目的的。

地方类丛书是指汇集某一地区各类著作编成的丛书。现存最早的地方类丛书是明代万历年间由樊维城编辑的《盐邑志林》六十五卷,该书辑收范围以古海盐辖境为准,将三国至明代海盐人的著述及流寓本地的外籍人著述汇成是编,“用张兹邑著记之盛”,共收经史杂说四十一种,这部丛书对于开创地方类丛书的汇刻功劳甚巨。应该说,汇编这类丛书的人,多为当地士人或宦宦,因而对乡邦典籍著述了解详细,搜采无遗,许多他人不易知悉的著作往往藉此保存、流传下来。地方类丛书在清代逐渐发展起来,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此类丛书的刊刻也较多,如浙江一省就有《武林往哲遗著》、《武林掌故丛刊》、《绍兴先正遗书》、《金华丛书》、《萧山丛书》等近三十种。地方类丛书有按省专辑的,如《畿辅丛书》、《湖北丛书》、《湖南丛书》、

《安徽丛书》、《山右丛书初编》、《关中丛书》等。也有按郡邑编集的,如《金陵丛书》、《扬州丛刻》、《豫章丛书》、《台州丛书》等等。

氏族类丛书指汇集某地某姓氏各类著作的丛书。此类丛书以南宋朱熹所辑《河南程氏全书》为最早,这部丛书收北宋程颢、程颐两人的六部著作合为一书。南宋黄汝嘉也辑有《晁氏三先生集》。清代后期,这类丛书逐渐丰富增多,许多有家学渊源的撰著藉此形式汇集起来,如《锡山尤氏丛刊甲集》、《桐城方氏七代遗书》、《如皋冒氏丛书》、《高邮王氏遗书》等等,方便了学者的研究。氏族类丛书容易和集部中同一姓氏作者的诗文总集相混,区分两者的重要标准是家集类诗文总集所收著述同属集部,而氏族类丛书同属综合丛书,因此所收著述是跨部类的,如朱熹所编《河南程氏全书》,其中既有属于集部的《河南程氏文集》,又有属于经部的《周易程氏传》和《河南程氏经说》。

独撰类丛书,也称自著丛书,是指汇集某一作者各类著作的丛书,也即作者全集,有些目录书将这种个人全集收于集部“别集类”。明清以后,独撰类丛书的编刻大量出现,有的是汇集前代的,如《欧阳文忠公全集》、《元遗山先生全集》等。更多的是汇集当代著作的丛书,特别是清代,学者辈出,著作宏富,据大略统计,清人独撰类丛书的辑印就有五百多种,其中如顾炎武撰《亭林全书》、黄宗羲撰《梨洲遗著汇刊》、王夫之撰《船山遗书》、钱大昕撰《潜研堂全书》、姚鼐撰《惜抱轩全集》、段玉裁撰《经韵楼丛书》、章学诚撰《章氏遗书》、崔述撰《崔东壁遗书》、洪颐煊撰《传经堂丛书》、焦循撰《焦氏遗书》等等,皆为学术界所重视和经常利用。

二、丛书典籍的发展

我国丛书典籍的发展繁荣,是从综合性丛书出现以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虽曾汇集过一些专类性丛书,但一方面数量较少,另一方

面部类单一,收书范围窄,未能实现丛书不拘部类概括群籍的全部意义。只有在《儒学警悟》等一批综合性汇编类丛书问世以后,两大类型丛书的体例才完全具备。在综合性汇编类这种典型丛书的带动下,我国丛书典籍的编刻才迅速兴盛起来。因此,丛书典籍的发展,可从宋元开始,分四个阶段记述。

(一) 宋元时期的丛书典籍

宋代丛书除了首创体例的《儒学警悟》之外,当以左圭的《百川学海》影响最大。左圭字禹锡,号古鄱山人。此书编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书前有左氏自序,书名《百川学海》取自于西汉扬雄“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一语。书中汇集唐宋人著作为多,间及两晋南北朝人著述,共计一百种,一百七十四卷,以天干为序,编为十集,每集包括十种著作。许多唐宋人的杂著,特别是一些农学典籍,如唐代陆羽《茶经》,宋代蔡襄《茶录》、《荔枝谱》,释赞宁《笋谱》,范成大《梅谱》、《菊谱》等藉此以流传。这部丛书虽成于《儒学警悟》之后,但《儒学警悟》收书仅六种,且都是宋人著述,而《百川学海》则搜集丰富,跨越数代,所收书包罗经、史、子、集四部,奠定了综合性丛书庞杂、总聚的规模。此外,《百川学海》成书后,不仅曾在宋代刊刻,明代又两度重刻,流传较广,其对后世丛书刊刻的影响,超过了《儒学警悟》。因此,民国时陶湘在影刊《百川学海》的序中说:“若求其搜采渊宏,体例完备,于学术得融贯之益,于原书无割裂之嫌,合四部以成编,如百川之归海,名实相副,巨细无遗,开从来汇刻之风,为后世丛书之祖者,惟左氏《百川学海》,庶几足以当之。”可见《百川学海》在丛书发展史上的地位并不次于《儒学警悟》。该书现有宋刻本一种,明刻本两种,民国影刊本两种。各种版本的卷数和每集所收种数不同,编排次序也有差异。

元代所辑综合丛书,今所见者仅《说郭》一部,为元末陶宗仪所编。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浙江黄岩人,除编《说郭》以外,还有著名笔记《辍耕录》及其他一些著作传世。《说郭》之名,据明人杨维桢所

序,取自扬雄“天地万物郭也,五经众说郭也”一语,书名所取,可以略见陶宗仪编书的立意。《说郭》原编现已不得而见,所传杨维桢序称:“天台陶君九成,取经史传记,下迨百氏杂说之书千余种,纂成一百卷,凡数万条。”由此可窥知原编的一些情况。现传的《说郭》有两个版本,但差别甚大。一是由明人陶珽校订、清顺治间由宛委山堂刊行的一百二十卷本,收书一千二百五十多种;一是近人张宗祥据明抄本校订、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的一百卷本,收书仅六百一十五种。从流传的两种本子看,《说郭》所收典籍,时代由汉迄元,收书的内容范围与种数也大大超过了《百川学海》,反映了丛书规模的不断扩大。但是,所收各书多经删节,许多书只录一卷,未能做到整书收编,这是最大的不足。造成这种情况有几方面的原因,除了有些书原本只有一卷外,一是编者的删节,一是当时有的书本已亡佚,陶宗仪从类书中辑录成书,略存大概而已。《说郭》收书虽有不少经过删节,但仍保存了一些古书孤本或稀见本,如张宗祥在《说郭序》中所指出的,《事始》、《续事始》、《老学庵续笔记》等书,或世无传本,或有目无书,皆赖《说郭》以传;《云谷杂记》、《意林》两书则比其他传本内容为多。

元代还编辑了一些专类丛书,其中较重要的是杜思敬所编《济生拔粹方》二十卷,收金元人遗书十九种,这是最早出现的一部医学丛书。

(二) 明代的丛书典籍

明代丛书的編集,比宋元时期有极大的发展。仍以汇编类丛书成就最大,其中有两部丛书是以《百川学海》续编的形式出现的。一部是吴永的《续百川学海》,以天干分十集,汇集《百川学海》未收的汉魏、六朝、唐宋及元人笔记杂著共一百零四种,宋人著作为多;另一部是冯可宾的《广百川学海》,也以天干分十集,汇集前两者未收的南朝、唐宋、元明杂著,共一百三十二种,以明人著作为主。明嘉靖年间,我国第一部名实相副的丛书《汉魏丛书》由何鏜编成,原目收书百种,分

经、史、子、集四部,万历年间程荣刊刻时,仅选经部十一种,史部四种,子部二十三种,共三十八种。不久,何允中又补刻至七十六种,使四部完整,称为《广汉魏丛书》。后来又有钟人杰、张遂辰编的《唐宋丛书》以接续《汉魏丛书》,《唐宋丛书》虽称之为“唐宋”,实际所收为六朝至唐宋著述。明代所编较大型的综合性杂纂类丛书,还有如王文禄的《百陵学山》、胡文焕的《格致丛书》、陈继儒的《宝颜堂秘籍》、叶绍泰的《增定汉魏六朝别解》、毛晋的《津逮秘书》等等。

明代综合丛书的編集,有些是颇能反映时代风气和社会特色的。比如,明继宋之后,藏书活动日益兴盛,为了适应藏书家搜求秘本善本的需求,出现了一些汇集珍善本的丛书,如范钦根据范氏天一阁藏书所编的《范氏奇书》,以及《宝颜堂秘籍》和《津逮秘书》等。特别是明末常熟大藏书家、刻书家毛晋所辑的《津逮秘书》,规模甚大,分帙十五集,收书一百四十一一种,每书首尾完整,力纠时人割裂之弊,常为后世所利用。

明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兴起,为了适应城市生活的需要,通俗文学和戏曲得到了发展,丛书也不例外,一批嗜奇、消遣、生活性丛书先后问世。除了小说、戏曲等专类丛书的編集外,综合性丛书中有《古今说海》、《古今逸史》、《历代小史》、《稗海》、《稗乘》等,所收典籍多以野史、笔记、小说、类抄、杂著为主。如陆楫的《古今说海》一百四十二卷,收书一百三十五种,卷首唐锦序称:“凡古今野史外纪,丛论胜语,艺书怪录,虞初稗官之流,靡不品鹭抉择。”全书分说选、说渊、说略、说纂四部,收入小录、编纪、别传、杂记、逸事、散录、杂纂等类典籍。文化娱乐、杂艺消遣和日常生活类丛书如同履靖的《夷门广牍》,沈津辑、茅一相续辑的《重订欣赏编》,华淑的《闲情小品》,佚名的《居家必备》等等。其中《夷门广牍》内容更为广博,分为艺苑、博雅、尊生、书法、画藪、食品、娱志、杂品、禽兽、草木、招隐、闲适、觞咏等十三部,收书百余种。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部妇女丛书,即秦

淮寓客编的《绿窗女史》，收罗由汉至明一百多部有关妇女的著作，其中包括封建道德的女范，有关妇女事迹、神话传说的记载，以及一些妇女著作。

其他类型的综合丛书也有所编集，但数量不多。地方类丛书如樊维城所辑《盐邑志林》。氏族类丛书如王永熙所辑《震泽先生别集》，收震泽王姓著述四种。独撰类丛书则有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胡应麟《少室山房四集》、高拱《高文襄公集》、王廷相《王浚川所著》等四五十种。

专类性丛书在明代后期得到较大的发展，如专收史部典籍的《纪录汇编》，由沈节甫编辑，共二百一十六卷，收明代嘉靖以前君臣言论杂记一百二十三种，内容非常丰富。其卷一至卷九，为明太祖至世宗御制诗文；卷十至卷十五，各书记君臣问对及恩遇；卷十六至卷二十三，各书记英宗北狩、景帝监国；卷二十四、二十五，记世宗南巡；卷二十六至卷三十，各书记成祖平定四方；卷三十五至卷五十六，各书记边疆问题；卷五十七至卷六十六，各书记外藩见闻；卷六十七至卷九十六，各书记明代各朝政治；卷九十七至一百二十三，为各种人物传记；卷一百二十四以下，为各种杂记杂录。

由周子义等编的《子汇》三十四卷，是子书汇集，收唐以前子书二十四种，按类编辑，计有儒七种，道九种，名三种，法一种，纵横一种，墨一种，杂家一种。科技类丛书，以王肯堂辑、吴勉学刊《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最为突出，全书二百零四卷，收汉至明历代中医典籍四十四种。许多著名医家，如汉代张机，唐代王冰，金代成无己、刘完素、张从正、李杲，元代王好古、朱震亨、齐德之、滑寿，明代戴元礼、陶节安等人的著述皆收入丛书之中。

文学类丛书的编集成就显著，戏曲方面的有臧懋循《元曲选》，收元杂剧一百种；沈泰《盛明杂剧》，收明杂剧六十种；毛晋《六十种曲》，收明代传奇剧本六十种；赵琦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收元明杂

剧二百四十二种。小说方面的有汤显祖所编《虞初志》八卷,收晋唐间小说三十一一种;顾元庆《顾氏文房小说》,收汉代至宋代小说四十种;此外,顾元庆又编有《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和《广四十家》,前者专收明代小说,后者是对前两部丛书的补充。

历来学者认为,明人刻书有不守其旧、妄改其书的问题,明丛书的编刻同样有这种弊病,有的妄改书名、卷第,有的随意删削,这是明代丛书比较严重的缺陷。清末学者张之洞在《輶轩语》中评论明代丛书说:“明刻丛书极为荒率,脱误固然,其专辄删改,最为大害,然不闻陶渊明语云‘慰情聊胜无’耶?”这是比较中肯的分析。

(三) 清代的丛书典籍

古代丛书的编刻,到清代进入全盛时期,其数量和质量皆远胜前代。

由于丛书的功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于是清代出现了官修丛书,清官修丛书自康熙年间开始,规模巨大,卷帙多达千万卷。如康熙时编刻的《御纂七经》、《律历渊源》等,皆为丛书的兴盛生色。而乾隆时所编修的《四库全书》更是煌煌巨编,极大地推动了清代丛书编集工作的进展。《四库全书》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十年而成。同时并编纂《四库全书荟要》和抄录八部《全书》、二部《荟要》,全部工作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告竣。每部《全书》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分装三万六千余册;《荟要》每部收书四百七十三种,一万七千九百三十卷,分装一万二千余册。这部巨型综合性丛书的编纂,不仅对我国十八世纪以前许多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起到流传和保存的作用,而且在长达十五年的编纂过程中培养了一批学者,使版本、目录、校勘、考证等专学得到发展。由于这部丛书内容的全面和系统,后世学者多藉此进窥古代学术之堂奥。此外,乾隆中还编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收书一百三十四种,同样以经、史、子、集四部为编。由于用武英殿特制的木活字印行,故称

为“武英殿聚珍版”。这部丛书校刊精审,被视为善本,因此清代各省先后据殿本翻刻刊行,但各省印本收书总数有所增删。除以上几部重要的综合性丛书外,乾隆时还刊行了一些专类丛书,如编印正史丛书《二十四史》,从此才有“二十四史”之名。另外,又诏刻《十三经注疏》等。总的来说,康乾时期官修丛书规模大、质量高,又因国家编修,号召力强,影响较广,对于清代丛书的迅速发展,确实是强有力的推动。(图 13)。



图 13 清代大型丛书《四库全书》

清代私编丛书,在《四库全书》以前已有相当数量的积累。综合性丛书如张伯行的《正谊堂全书》、曹溶的《学海类编》、张潮的《昭代丛书》、王晫的《檀几丛书》、汪士汉的《秘书廿一种》、曹寅的《楝亭藏书十二种》。专类丛书如纳兰性德的《通志堂经解》、顾炎武的《音学五书》、陈瑚逸士的《荆驼逸史》等。以上丛书中有不少规模较大,特别是曹溶的《学海类编》更为突出。是书原收唐宋至清初人著述二百二十

二种,后经陶越增至四百余种,分经翼、史参、子类、集余四部,集余之下又分行诣、事功、文词、记述、考据、艺能、保摄、游览八目,收罗宏富,规模庞大,为私刊丛书之最,对后来丛书的刊刻有较大的影响。

《四库全书》完成之后,进一步刺激了当时学者编纂丛书的热情,私刊丛书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繁荣景象。汇编类丛书充分反映了当时学者考据、校勘、辑佚的丰硕成果。其中以仿宋元旧刻为主的丛书有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孙星衍的《岱南阁丛书》、《平津馆丛书》,李锡龄的《惜阴轩丛书》等。“士礼居”主人黄丕烈是乾嘉时有名的藏书家、校勘学家、版本目录学家,他爱好宋版,精于鉴定校勘。其藏书以既富且精而著称,他曾辟“百宋一廛”专室贮宋版书百余种。由他细心校勘、好写精雕而刊行的《士礼居丛书》收书十九种,凡一百九十四卷,当时被学者看作是标准善本,誉为“清朝宋版”。其中如宋本郑氏《周礼》、《仪礼》,宋天圣明道本《国语》以及剡川姚氏本《国策》均属珍稀古籍。“岱南阁”主人孙星衍,乾隆进士,任官山东时所刊《岱南阁丛书》一百七十三卷,收书二十三种,其中除孙氏著述、校补著作外,影刻了一些宋元版古籍,如《宋提刑洗冤集录》、《古文苑》等。他的《平津馆丛书》内容也大致如此,但份量较大,收书四十三种,共二百五十余卷。

以精校本典籍汇成的丛书有卢文弨的《抱经堂丛书》,吴騫的《拜经楼丛书》、胡珪的《琳琅秘室丛书》、卢见曾的《雅雨堂丛书》、毕沅的《经训堂丛书》、钱熙祚的《宋山阁丛书》等等。卢文弨,字绍弓,号抱经,乾隆进士,官至侍读学士,辞官归里后校书二十余年,从不间断,每校一书,必搜罗诸本,参稽考核。所刊《抱经堂丛书》二百六十三卷,收书十七种,包括经他详细校订的汉唐人著述十一种,卢氏自著五种,冯景著述一种。其所校汉唐人典籍,各书附有序跋和校记,极为精审。所著《群书校补》,是乾嘉时学者校勘成果的代表作,荟萃了卢氏一生校订群籍的精华。吴騫的《拜经楼丛书》原名《愚谷丛书》,并无总

目,随刊随集,内容最多的版本为民国影印本,收书三十种。吴騫是大藏书家,收藏多宋元刊本,该丛书所集有不少为稀见古本和吴騫、江声等人据宋元刻本校订的典籍。

以网罗群籍、汇刻古今著述为目的丛书有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张海鹏的《学津讨原》、《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钞》,伍崇曜的《粤雅堂丛书》,陆烜的《奇晋斋丛书》,马俊良的《龙威秘书》,吴省兰的《艺海珠尘丛书》,陈瓊的《泽古斋丛钞》,李调元的《函海》,钱熙祚的《指海》等等。这些丛书,多数以卷帙浩瀚闻名于世,一般收书都在百种以上。《知不足斋丛书》凡三十集,七百八十一卷,收书二百零七种,原书由鲍廷博在生前辑成二十七集,卒后又由其子鲍士恭续至三十集。鲍廷博为乾隆时大藏书家,《四库全书》开馆征集天下遗书,他命其子士恭进呈家藏精本六百余种。《知不足斋丛书》的编辑正是以鲍氏丰富的藏书为基础,汇集当时一些藏书家所收藏的钞本和稀见本刊刻而成的,所收典籍有经史考订、算书、金石、地理、书画、诗文集、书目等,不仅保存了一批将被湮没的古代典籍,而且全书校勘精良,选用多为善本,无伪书、俗书杂厕其间。在其影响下,其后又有续编问世,一为高承勋辑的《续知不足斋丛书》,收书十七种;一为鲍廷爵辑的《后知不足斋丛书》,收书四十七种。张海鹏所辑的三套丛书也影响较大。其所编《学津讨原》是在明代毛晋《津逮秘书》的基础上增减而成的,如毛氏所收《子贡诗语》、《申培诗说》、《焚椒录》等,张氏认为是伪妄之书,剔除不收;毛氏书中旧刻诗话、题跋两集因不成系统也被删掉;毛氏书仅收至元人著述,张书补充明人著述;毛氏书底本不善者,张书换以善本;其所收典籍取原书无一删节,亡佚残籍则以辑本为存。全书一千零四十八卷,收书一百九十二种,其所收书虽均见于《四库全书》,但版本不同,取舍极为审慎,体现了编者的眼光。嘉庆年间,张氏又辑《墨海金壶》七百二十七卷,收书一百一十五种,此书残版后为钱熙祚修补为《宋山阁丛书》,分四部,一百一十二种。张

氏所辑第三部丛书为《借月山房汇钞》，收书一百三十五种，二百八十三卷，此书与前两部丛书多收古书的宗旨不同，专选明清两朝撰著，包括经学、诸子、小说、杂史、奏议、传记、地理、科技、艺术等，范围较广。此书原版后由陈瓚改编为《泽古斋丛钞》一百零九种；不久又由钱熙祚增编为《指海》一百三十七种。

辑佚学在清代得到长足的发展，反映这方面成果的丛书有黄奭的《汉学堂丛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张澍的《二酉堂丛书》、王谟的《汉魏遗书钞》、洪颐煊的《经典集林》、王仁俊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等。其中又以黄奭、马国翰所辑两书影响最大。黄奭《汉学堂丛书》，又名《黄氏逸书考》，分四类，一曰“汉学堂经解”，收书一百一十二种；二曰“通纬”，收书七十二种；三曰“子史钩沉”，收书八十四种；四曰“通德堂经解”，收书十七种，共二百八十五种，皆汉魏南北朝间的古书辑本。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分三类，一曰“经编”，收书四百四十四种；二曰“史编”，收书八种；三曰“子编”，收书一百七十八种，共六百三十种，七百六十八卷。以上两部辑佚丛书皆侧重于经部旧籍，以数量言，马胜于黄；以精审言，则黄胜于马。

清代晚期，即鸦片战争以后到辛亥革命以前，丛书的编刻又有新的特点：一方面，私刻丛书仍然沿袭乾嘉学者的传统，继续以汇刻校勘古籍为重，其数量也非常可观。尤为重要者，如潘祖荫的《滂喜斋丛书》，陆心源的《十万卷楼丛书》，姚觐之的《咫进斋丛书》，赵之谦的《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章寿康的《式训堂丛书》，黎庶昌的《古逸丛书》，蒋凤藻的《铁华馆丛书》，袁昶的《浙西村舍丛刊》，江标的《灵鹫阁丛书》等等。另外，清末各地出现了一些官督绅佐的书局，既有官办又有私营的性质，这些书局也刊刻了不少丛书，如广雅书局的《广雅书局丛书》、《史学丛书》，崇文书局的《百子全书》、《崇文书局汇刻书》、《正觉楼丛刻》，浙江书局的《二十二子》等。

清代所编刻的氏族类丛书、独撰类丛书、地方类丛书及专门性丛

书数量也极多,其名目繁富,不胜例举。清代丛书典籍的繁荣,是清代学术文化兴盛的反映。要言之,清代图书出版技术的发达,为丛书的大量问世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封建文化的成熟,至清代进入了总结性阶段,因而丛书这种汇编群籍的特殊编纂形式,不仅引起知识阶层,也引起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朴学考据、博览群书的风气,对丛书的编纂提出了更多的需求;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学风,又促使丛书在内容上不断达到新的标准。这些,都是清代丛书发展至全盛阶段的原因。

(四) 近代以来的丛书典籍

近代以来的丛书发展,主要指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的编辑刊行。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对西方先进印刷工艺的吸收,使得古籍丛书的石印本、影印本、铅印本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木版雕刻,大大促进了古籍丛书的出版和传播。近代综合性古籍丛书中,地方丛书和独撰丛书成就十分显著。如《辽海丛书》、《黔南丛书》、《云南丛书》、《四明丛书》等地方丛书,陈垣《励耘书屋丛刻》、章炳麟《章氏丛书》、王国维《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缪荃孙《艺风堂读书志》、叶德辉《观古堂所著书》等独撰丛书皆比较突出。近代以来学科细密,专科研究的深入,推动了专门性丛书的迅速发展和大量刊行,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开明书局的《二十五史》及《补编》、上海文明书局的《清代笔记丛刊》、进步书局的《笔记小说大观》、涵芬楼的《孤本元明杂剧》等,是这类丛书的典型代表。

大量综合性汇编丛书仍在近代古籍丛中占显要地位,著名的有:刘承干的《嘉业堂丛书》、张钧衡的《适园丛书》、董康的《诵芬室丛刊》、陶湘的《托跋廬丛刻》、缪荃孙的《云自在龕丛书》、邓实的《古学汇刊》、《风雨楼丛书》、郑振铎的《玄览堂丛书》、赵诒琛的《峭帆楼丛书》、《又满楼丛书》、郑国勋的《龙溪精舍丛书》及罗振玉在宣统至民国间为保存敦煌文献所刊刻的《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佚书》等。

影响最为深远、至今仍为学术界普遍重视的,应属《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三大古籍丛书。

《四部丛刊》1919年由商务印书馆开始筹划,1922年影印一批古籍珍本出版初编。其底本以涵芬楼藏书为基础,遍访国内收藏有关宋、元、明刻善本,缩印为大小统一的版本,并在每书首页记载原书尺寸大小,以存旧书面目,初编收经、史、子、集古籍三百二十三种,八千五百七十三卷,分装二千一百一十二册。1934年印行续编,收书七十七种,一千四百三十八卷,分装五百册。1936年印行三编,收书七十一一种,一千九百一十卷。《四部丛刊》突出的特点是注重版本价值,其初、续编收有宋版书七十二种,金版书二种,元版书三十四种;其他诸书也多属明清善本,文献价值很高。

《四部备要》由中华书局于1924年开始编纂,至1931年止,共出五集,收书三百三十六种,一万一千三百零五卷,以聚珍仿宋版铅字排印,初为线装本,后又重印了平装本和精装本。此书突出阅读古籍的实用性,在“备要”上下功夫。如经部汇集《十三经古注》、《十三经注疏》、《清十三经注疏》,形成完整系统;史部收《二十四史》及主要编年史;子部收《周秦诸子》及儒、农、释、道诸家代表作;集部注意《文选》等文学总集的收录。在读书治学方面为一般学者提供了一批常用、必需的典籍。

《丛书集成初编》由商务印书馆在1935年至1937年间陆续出版。该书吸收前两部丛书的特点,以“罕见”、“实用”为收书宗旨,以扩大覆盖面作为实现这一宗旨的途径,选定自南宋《儒学警悟》到清末为止的一百部重要丛书,集合刊印。所收汇编丛书有宋代二部,明代二十一部,清代五十七部;地方丛书有四部;专门性丛书有十二部。剔其重复,收典籍四千一百零七种。多数以铅字排印,加以断句,少数不宜排版的采用影印。后因抗战爆发的影响,实际出书为三千四百六十七种,这部大型丛书打破传统的四部分类法,采用近代图书分类。其

收编的笔记、丛钞、杂说等典籍，可补以上两部丛书之不足，以满足学者们博览纵观的需要。

我国丛书典籍门类繁多，数量极其丰富，记载丛书典籍最完备的目录当属上海图书馆在1959年编印的《中国丛书综录》三大册。该目收录我国古籍丛书二千七百九十七种，为了解丛书、利用丛书提供了极大方便。1982年，由施廷镛主编、南京大学图书馆和历史系资料室编印的《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汇编》出版，该目可视为前目的续编，收《中国丛书综录》未收古籍丛书九百七十七种。以两目统计，我国现有丛书典籍至少有三千七百余种，其中还不包括容纳近现代科学知识的“新学”丛书及佛藏等宗教类丛书，由此足见我国丛书典籍数量之丰。一部丛书少者辑书数种，多者可达数千种以上，它以网罗群籍的优势在我国典籍志中占有光辉的篇章。

第四章 典籍的生产材料与生产方法

第一节 典籍的生产材料

典籍实质上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它的意识形态,一种是它的物质形态。而当着意识形态要用文字加以表现时,这些文字就有个附着材料的问题。而文字的附着材料,或者说是文字的载体,从广义上说,就是典籍的生产材料,或典籍的制作材料。

典籍不是一开始就用纸张来书写或印制的。纸书的出现,在典籍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以,当以纸书的出现划一界限,分两段讲述典籍的生产材料。

一、纸书出现前的典籍生产材料

如前所述,典籍有其特定的概念和构成要素,不是所有的文字记录都可称为典籍。但典籍是从最初的文字记录经过人的总结、规范、系统和逻辑加工逐渐演变而来的。所以典籍的生产材料,也需要从最

初的文字记录说起。

纸书出现以前,典籍的生产材料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如此,世界上一些文明较早的民族也是如此。我国最初的文字记录,是从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早期石刻文字算起的,所以初期书籍的制作材料就是龟甲、兽骨、青铜器、玉、石质等材料。随着文字记载或阐述内容的不断增加,甲骨、青铜器或玉、石材料就难以承受或容纳了,于是又出现了竹木简书;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中的缣帛也用来作为典籍制作的材料。墨翟是春秋战国之交的人,由后人整理墨家学派言论、著作而成的《墨子》书中,多处涉及中国早期典籍的制作材料问题,使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

《墨子·贵义》篇中说,古圣贤王为了将他们的治世之道传遗后世子孙,以便使后世子孙有所遵循,有所效法,就将他们的治世之道“书之竹帛,镂之金石”。这里的所谓“书之竹帛”,就指的是书写在竹简或缣帛上;所谓“镂之金石”,指的就是记载先王之道的文字雕刻在金属的器皿上或石质材料上。

《墨子·尚贤》篇中说:“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之竹帛,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于先王之书、吕刑之书然。”这是说古者圣王既懂得礼贤下士的道理,就把记载这种道理的先王之书、吕刑之书书写在竹简、缣帛上,或者雕琢在盘盂上,以便传给后世子孙遵法借鉴。

《墨子·天志》篇中说:“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不止此而已,镂之金石,琢之盘盂。……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罪者也。不止此而已,又书其事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这是说古人将“爱人利人”的优秀品德及“憎人贼人”的恶劣品质,都要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以供后世子孙弃恶扬善的典范。

《墨子·非命》篇中说:“先圣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书之竹

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

《墨子·明鬼》篇中说：“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图 14)，镂之金石以重之。”(图 15，见 210 页)这是说古圣贤王是很敬信鬼神的，对鬼神的侍奉祭祀是很丰厚的。恐怕后世子孙不懂这些道理，所以要将这种事情书写在竹筒、缣帛上，以便传给后世子孙。而书写在竹筒、缣帛上，又担心这种材料容易腐朽或被虫蛀而灭绝，后世子孙无从知晓，于是又将这些事镌刻在金属器具或石质材料上，或是雕琢在盘盂器皿上，以便传之久远，后世子孙可以借此而知晓。可见古人将什么事情书写在竹帛上，什么事情雕刻在金、石、盘盂上，是轻重有别的。



图 14 西周史墙盘铭文

《墨子·兼爱》篇中说：“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这是墨翟谈自己的感受，现身说

法,申明自己并未与先圣六王生在当时,更未亲聆其声、亲见其颜,但我怎么会知道他们的贤德懿行呢?没有别的,就是靠阅读他们那时书写在竹简缣帛、雕刻在金石盘盂上的文字记载所知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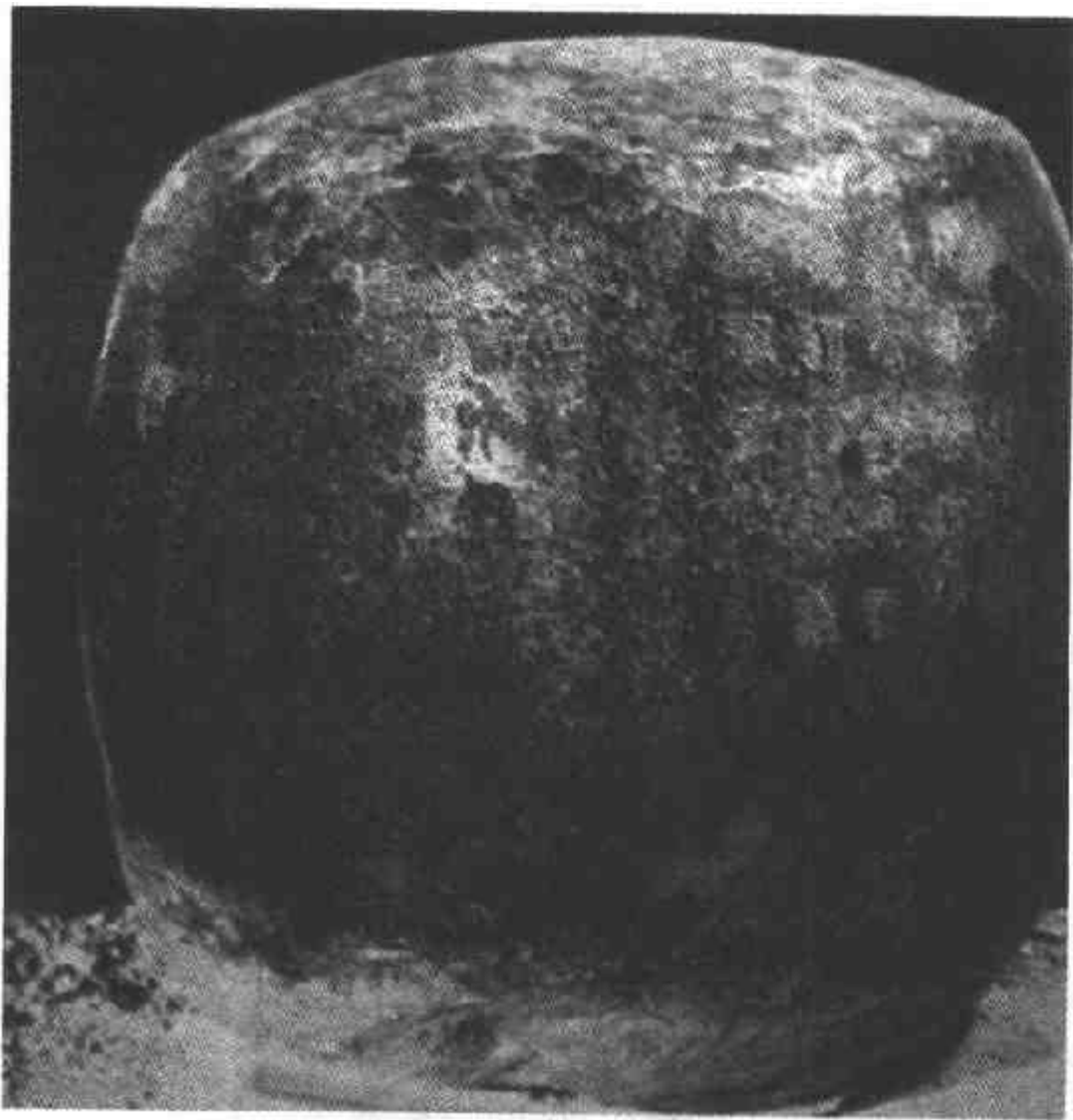


图 15 秦刻石鼓文

上述《墨子》书中的这些说法,虽然是墨翟站在他所生活的时代,追述以前,描绘当世,但他这种深刻的总结,亦未尝不是对纸书出现以前典籍制作材料的高度概括。的确,在墨翟生活的春秋战国之际以前,中国文字的载体,中国典籍的制作材料,曾经有过金、石、竹、帛并行的时期。而随着典籍的产生和发展,竹、帛逐渐成了典籍生产的主

要材料,并流行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王充《论衡·量知》篇中说:“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还说:“断木为槩,楛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这是说要把竹子截为一段一段的圆筒,再劈成若干竹片,才能制成可以写字的竹筒。木料也要截成段,开成板,才能制成可以写字的版牍。并且新竹带有青皮,不易着墨。同时还含有水分,容易生虫朽蠹,需要经过加工处理才能使用。西汉后期刘向曾在他所作的《别录》中说:“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筒者,皆于火上炙干之……。以火炙筒,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曰汗筒。”(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可见古人在以竹木作为典籍制作材料时,不但懂得整治刮削,便利使用,而且懂得如何防虫避蠹,以利于典籍的保护。

现在“筒牍”已成为一个专名词,竹、木简也常相提并论。但在实际上,竹简之用于文字载体要早于木牍。或者说在竹简行用的启发下,没有竹子或不便于用竹简的情况下,木牍便以竹简替代物的身分充当典籍的制作材料,并与竹简同时流行。这种情况,我们不但从上述的文献中已经得到证明,从历来出土的实物也可以得到验证。

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有人在汲郡(今河南省北部)盗发魏襄王墓,发现了大批竹简典籍,共计16种。内容涉及史地、占卜、故事等。今传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就是这次盗发出来的竹简整理而成,并流传了下来。可惜这次出土的竹简典籍,其实物没能保存下来,但却足以证明竹简确曾是中国典籍的制作材料。

南朝刘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年),在今湖北襄阳附近的楚墓中也曾经出土过一批竹简典籍,文字是蝌蚪文,大约是公元前505—前278年之间的典籍遗存。可惜这批竹简典籍也没能流传下来。而现存的古简,都是近年发掘出土的。

1952年,五里牌出土竹简三十七件。1953年,仰天湖出土公元前

四世纪竹简四十三件。1954年,长沙杨家湾出土公元前三世纪竹简七十三件。1972至1973年,长沙马王堆两座西汉墓先后出土竹简近千件。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秦昭王元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前306—前217年)的竹简一千一百多件。1977年,安徽阜阳县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夏侯灶墓中出土了《仓颉篇》、《诗经》、《周易》以及《年表》、《大事记》、《作务员程》等十多种竹简典籍。1978年,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竹简二百四十多枚。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湾汉墓出土西汉初期竹简一千一百多枚,是西汉文帝至武帝时期遗籍。所有上述这些出土的竹简,都雄辩地证明竹简确曾是典籍普遍使用过的制作材料。

木牍的出土除中原外,以西北地区为最多。1901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第一次来中亚考察,在和田境内的尼雅古址发现一批东汉时期的木牍,大约四十枚。1906—1908年,斯坦因又先后两次来中亚考察,在敦煌附近废墟及稍东的酒泉,又得简牍千余件,约为公元前98年至公元153年之间的遗籍,内容涉及文学、数学、历书、占卜及天文等资料。1930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进行发掘,得到大批的汉代简牍。先后来这一地区进行考察的还有帝俄时期地理学会的科兹洛夫及英国的斯坦因等,在破城子处发现木牍五千二百余枚,在红城子等处发现木牍三千五百余枚,约为公元前102年至公元30年之间的遗籍。1959年,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郊区东汉墓中掘得385件简牍,其中大多数是云杉木牍。1972年,武威旱滩坡东汉墓中又发现医药简牍九十二件,多是松木和杨木。1972至1976年,甘肃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地区,又先后发现王莽新政时期的简牍近两件,其中绝大多数是木牍。1978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西汉晚期墓中出土简牍四百余枚,大多数也是云杉木。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简牍一千二百一十七枚,是公元前65年至王莽新政时期的遗籍。此外,在楼兰地区也先后出土过不少简牍。所有上

述这些，又说明在竹简用来制作典籍盛行的同时，木牍也先后盛行，而且主要是偏行在我国的西北部地区。这是因为西北地区少竹而多木的缘故。而且多是松、杨、桤柳。这类木材生长在本地，色白质松，易于吸墨，所以为中原及西北地区普遍采用为典籍的制作材料（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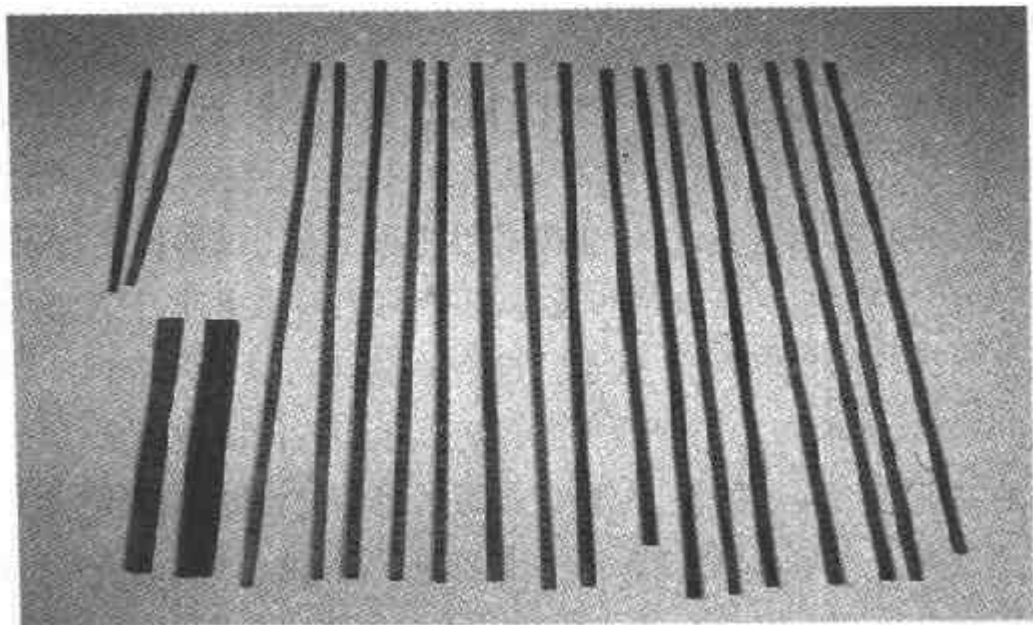


图16 汉代竹木简

关于竹木简典籍的尺寸规制，过去的说法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甚至是完全不相符。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几种说法。

经书：用简长为二尺四寸。

法律书：用简长为三尺，或者二尺四寸。因周代一尺，相当于汉尺八寸，故古有“三尺法”之谓。

诸子书：用简长一尺，有“诸子尺书”之说。

其实这些说法都有些以偏概全，以汉代典籍的用简规制为先汉典籍的通制。实际并不完全如此，甚至是完全不如此。例如，晋代汲冢出土的《穆天子传》，简长约合汉尺二尺；南齐时襄阳出土的《周礼·考工记》，简长约合汉尺的二尺四寸；定西西汉中期墓出土的《论

语》，筒长则不足汉尺的一尺；阜阳双古堆西汉早期汝阴侯墓出土的《诗经》，其筒长只有汉尺的九寸五分；《仓颉篇》，筒长则是汉尺的一尺一寸。这些都是后世所说的经部书，其筒长并不都是二尺四寸，而是参差不一，看不出一定的规制。近年出土的诸子书，筒长有二尺的，有一尺二寸、一尺一寸，甚至还有五寸的，也不合“诸子尺书”之制。而银雀山西汉中期墓出土的《历谱》，筒长竟达汉尺的三尺。大通上孙家寨西汉中晚期墓出土的军规、军法简，长度只有汉尺的一尺一寸。云梦出土的《秦律十八种》简，长度也只有二十几厘米，约合汉尺不过一尺。张家山出土汉简中的汉律简，长度也只是一尺左右。这些情况表明，无论周制、秦制还是汉制，法律书用简都没有三尺的长度，都不符合“三尺法”的古制。所有这些现象，表明古人写书用简，长度没有绝对的定制，只是约定俗成。既是约定俗成，就有很大的灵活性。特别是民间写书，用筒长短的弹性更大。所以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冒说哪一类的书一定用多长的筒。大概古人写书用筒的长度，也跟财力和崇尚有关。财力充裕，又尊崇某家某书，写时用筒就长，写来字大行疏，阅读历历在目；财力羞涩，又非所崇之人和所崇之书，只是写来实用，则用筒就短。雕板印书出现以后，其开本版式、行格字数，也只是约定俗成，没有定式。宋代国子监官刻儒家经典，多取八行十六字的款识，这已经是相当考究了。而南宋吴革刻朱熹《易传》，则每半版取五行款式。这就是因为崇尚朱熹，财力又充裕。

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中的缣帛也用来作为制作典籍的材料，这在《墨子》中已不止一次提到。《论语·卫灵公》也说“子张书诸绅”。这里的“绅”就是丝织品，也就是子张将孔子的一些话书写在丝织品的大带上。《风俗通义》说“汉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竹书，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这里的“素”指的也是丝织品。就是说刘向校定中秘典籍，去其重复，校定异同，撮其要旨之后，先都要抄写在竹简上，待进一步改易刊定之后才誊写在缣帛上以

进呈。《后汉书》记载东汉末年董卓作乱，国家图籍横遭破坏，士兵将帛书拿来作帐篷、提囊。《隋书·经籍志》记载晋荀勖整理《中经簿》时谈到当时的典籍，仍说是“盛以缥囊，书用细素”。所有这些记载，都说明从春秋到东晋上千年的时间里，缣帛和竹木简一样，是典籍普遍采用的制作材料。这是文献方面的记载，历年出土的实物也验证了这种事实。

1908年，英人斯坦因在中国敦煌发现两件帛书，一件9厘米见方，一件长15厘米，宽6.5厘米，内容是内地与边疆的通信，大约是公元15—56年之间的遗籍。1942年，长沙战国时代楚墓出土过帛画。1949年，长沙另一座楚墓再度出土帛画。1973年，在1942年发掘的楚墓遗址中，再度出土人物帛画。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彩色帛画。1976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长幅帛画。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二十多种帛书，约十余万字，其中许多书的内容文字与现今通行本不同，如《老子》，出土了两种帛写本，均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图17，见216页），甲本卷后与乙本卷前，均有四篇近三万字今本没有的佚文；《战国策》有一万二千多字，大部分内容为今本所没有；《易经》比今本多出四千多字；《战国纵横家书》二十八篇，一万一千多字，是久已失传的遗籍。这批帛书的出土，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帛书形象，并进一步证明缣帛的确曾是中国典籍的制作材料之一。

帛书的形象仍然是模仿竹木简书。用来制作典籍的缣帛，一般都要在上面画出或织出行格，称为“界行”或“栏线”。黑色的叫作“乌丝栏”，红色的叫作“朱丝栏”。而两道栏线之间形成的条状行格，则完全是条条竹木简形象的模仿和再现。《后汉书·襄楷传》记载汉顺帝时，琅邪宫崇曾经到宫门呈献一部他师傅干吉在曲阳泉上得到的道家作品《太平清领书》，共一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描绘的就是在洁白的缣帛上写着乌黑的文字，在行行文字之间画着

朱红的界行,卷首接着青色的绫子,绫子上再用红笔写上划分段落的小标题。但帛书出现之后并没能取代竹木简书,而是和竹木简一道,同时作为典籍的制作材料一并流行,最后同为纸书所取代。而纸书的出现,不仅是典籍制作材料的重大变革,也使人类文明开始了新纪元。



图 17 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

二、纸书的出现和流行

关于纸的概念,一般是指将植物纤维捣碎,作成纸浆而后抄造的纸。用造纸技术的专门术语讲,就是经过帚化过程的纸,才是现代科学概念的纸。历年出土的实物证明,早在蔡伦改进造纸技术以前中国已有了这种植物纤维经帚化而造的纸。

1957年,西安霸桥砖瓦厂工地出土了西汉武帝时(前144—前88年)的文物,其中有古纸碎片。其质地粗糙,未写文字。出土时发现是当时用来包裹随葬的铜镜的。最初有人认为是经质纸,后来有人用现代方法化验,测定是用麻类纤维所造的纸。近年又有人化验,分析纸质纤维的化学分子结构,认为不是纸,而是麻织物经多年压平而形成的薄片。后又进一步用现代科学手段再度进行化验,结果仍证明是纸,而绝非麻织物。

1978年,又发现了西汉宣帝(前73—前49年)时期的古纸。纸质粗糙,未写文字,也是麻类纤维所造。

1933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罗布淖尔发现过一片残纸,长10厘米,宽4厘米,呈白色,质地粗糙。经用现代手段化验,认定也是麻类纤维所造,纸面尚存有未捣碎的麻筋。同墓出土的还有西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年)的木简,因而被确定为公元前49年左右的遗物。

1942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河附近发现了写有文字的纸团,经化验测定,也是植物纤维所造的纸。根据同时出土的东汉和帝永元年间的若干木简判断,当是公元93—98年左右的纸。

1973年,在甘肃旱滩坡工地又发现了东汉时代的古纸,纸上写有隶体字。经化验证明,也是麻类纤维所造的纸。纸的质地较霸桥纸要精细得多,表明造纸技术在不断进步。

上述实物证明,中华民族早就造出了纸,但最初造纸目的是否为解决典籍的新型制作材料,没有充分的证据加以肯定还是加以否定。但经过两百多年的实践,到东汉蔡伦,他却从典籍制作材料的角度,敏锐地发现了纸张的新用途及其广阔的前景,因而在造纸原料及造纸技术上刻意加以改进,于是造出了好纸,并逐渐推广,直到在全世界开花,为人类带来进步。

《后汉书·蔡伦传》谓:“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这是迄今为止完整记述蔡伦造纸的最早记载。蔡伦所处的东汉时代,即公元一世纪的后半叶至二世纪的上半叶,正是竹木简书与缣帛书并行的时代,同时,麻类纤维纸张也已产生了几百年,用纸来写字也有了实践和先例。这就给蔡伦改进造纸技术,从而逐渐替代笨重的竹木简和贵重的缣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蔡伦明确指出自古典籍多用竹木缣帛制作的弊端,因而才创意用树皮、麻头、破布(那时的布是麻织品)及旧鱼网(当时鱼网也用麻绳编织)等原料造纸,以便取代竹简缣帛。这里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蔡伦除了沿用麻类纤维造纸,还开辟了用树皮造纸的新原料和新技术,这就是我国后世大量行用的皮纸。所以蔡伦造纸技术于元兴元年(105年)奏上之后,深得皇帝赞赏,天下莫不从用,故咸称“蔡侯纸”。

到东汉末年,左伯再度改良造纸技术和工艺,使纸的功用更前进了一步。左伯是东莱人,东莱一带成了造好纸的地方。徐陵《玉台新咏序》称:“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

当然,从纸张出现,到最后完全取代竹木简及缣帛而成为典籍主要或唯一的制作材料,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公元二世纪应劭写的《风俗通义》,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公元25年把首都从长安迁往洛阳。在迁都运物过程中,搬运典籍的车,据说是“载素、简、纸经凡二千

辆”。这里的素书，指的帛书；简书指的是竹木简书；纸书便是指用纸来书写制作的典籍了。古人曾把缣帛谓之纸，但这里已把素、简、纸加以区分，可见这里的纸绝不再指缣帛，而是地地道道的纸了。

东汉立朝就在公元 25 年，因此这些运往洛阳的书都应该是在这一年以前产生的典籍。而这一年以前就是王莽新政时期，就是西汉时期。可见西汉或西汉后期，已经用纸来书写典籍了，而且成为政府的正式藏书。

与应劭同时代还有个叫刘珍的，在他写的《东观汉纪·贾逵传》中曾记载汉章帝刘炟在公元 76 年命博士贾逵（29—101 年）给学生讲授《春秋左氏传》。为了使贾逵所用的教本有参照，特赐给他“简、纸经传各一通”。汉章帝是东汉立朝之后的第三位皇帝，在位十二年（76—87 年），他赐给贾逵的《春秋经传》显然有简本和纸本制作材料的区别。可见东汉初期也用纸来书写典籍。

晋人袁宏所撰《后汉纪·和帝纪》，说邓贵妃于公元 102 年即皇后位，下令禁止万国进贡珍丽之物，只要求“岁时但贡纸墨而已”。可见当时对纸张的渴求已胜过珍丽之物。

待到蔡伦改进造纸技术，特别是山东东莱左伯改进造纸工艺以后，用纸来书写典籍就更日渐频繁了。《北堂书钞》卷一〇四引崔瑗写给葛元甫的信说，送给你《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崔瑗是贾逵的学生，基本生活在同一时代。贾逵接受过皇帝赐给的纸写《春秋经传》，他的学生送给葛元甫《许子》，因家贫用不起缣帛，只好用纸来书写。可见东汉时用纸来制作典籍已显出了它在价格上的优势。

《后汉书·延笃传》注引《先贤行状》说，延笃打算自己抄写一部《春秋左氏传》，因为没有纸，他的师傅唐溪典就送给他一些废笺纸，让他用这种纸的背面抄写。结果是这种纸的背面无法写字，延笃只得向别人借一部来读。

汉末赵岐的《三辅决录》引证韦诞(179—253年)奏言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尽径丈之势，方寸千言。”韦诞是东汉末至三国中期的人，他已将左伯纸、张芝笔和他自己造的墨相提并论，成为早期的文房三宝。当时的纸墨究竟好到什么程度，五世纪时的萧子良在答王僧虔的信中曾说：“子邑(左伯)之纸，研妙辉光；仲将(韦诞)之墨，一点如漆；伯英(张芝)之笔，穷神尽意。”这里的所谓“研妙辉光”，无非是形容“左伯纸”造得洁白、精细、光滑，宜于书写。可证造纸经左伯改进之后，其质地已能笔走龙蛇，穷神尽意了。

《后汉书·蔡琰传》曾记载曹操欲使十吏就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写书，文姬“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曹操、蔡邕以及其女蔡文姬都是左伯的同时人，曹操令十吏就蔡文姬写书之纸，说不定也是这种“研妙辉光”的左伯纸。

进入三国两晋，造纸的原料进一步扩大，造纸的地域进一步扩展，造纸的设备进一步改进，造纸的工艺进一步提高，纸张的生产量也大幅度增加。晋代造的纸，有的帚化程度达到70%，几乎接近后世的机制纸了。由于纸质精美，所以纸张也成了诗人骚客吟诗作赋的歌咏题材。如晋代傅咸就作有《纸赋》，称颂纸张“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己新。揽之则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这段文字的前半部分，显然是对当时纸张质量的一种描绘，后半部分是说纸张可屈可伸，能抒能卷，具有缣帛同样的优点。南朝梁人萧绎专门写有《咏纸》诗，形容当时的纸张“皎白如霜雪，方正若布棋，宣情且记事，宁同鱼网时”！这显然是与蔡伦用麻头、鱼网等造纸比较而言的。“宁同鱼网时”，是说此时造的纸，其质量比蔡伦时所造的纸高多了。三国时魏文帝曹丕曾经用缣帛书写他自己的文学理论著作《典论》和诗赋，送给东吴的孙权；又用纸张同样抄写一部送给大臣张昭。可见那时纸张已普遍用来

书写典籍,并且显然要比缣帛便宜。进入晋代,纸已逐渐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书写材料,简牍、缣帛已处在被取代的前夜。《太平御览》卷六〇五引证《语林》中记载王羲之曾为会稽谢安请赐笺纸,库中只剩下九万张,结果都送给了他,《初学记》卷二一引述晋人虞预《请秘府纸表》,说秘府中有纸三万多张,请求四百张给著作史,用来撰写起居注。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纸的生产量已相当可观,而用纸的数量也十分可观。从当时政府藏书数量上也可以看出这种趋势。三国时曹魏官府藏书只有四千五百六十二卷;西晋初年官府藏书就达到了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到东晋孝武帝时,官府藏书就多至三万六千卷。与此同时,私人藏书也逐渐多了起来,还出现了职业的抄书人员和抄书机构。日常公私文件也经常用纸来书写。到东晋末年,豪族桓玄(369—404年)掌握朝政大权。据《初学记》卷十一所引《桓公伪事》记载,桓玄在辞世的那一年(404年)曾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道法令的意思是说,古时候没有纸,所以文件典籍都用竹木简书写,并不是对什么古圣先贤表示敬重。现在纸张盛行,过去凡用竹木简所写的文件,今后全都要以黄色纸张代替。这是政府第一次明令规定停止用简而代之以纸的记载。表明从公元404年起,行用一两千年的竹木简宣告退出典籍制作材料的历史舞台,而纸张在几百年渐用的过程中正式成为主要的或者说是唯一的典籍制作材料了。本世纪初,从甘肃敦煌千佛洞莫高窟发现大批纸质遗书,也以实物证明了这一点。敦煌遗书中年代最早的是《陀罗尼神咒经》,写于公元278年,即西晋咸宁四年。而南北朝至唐五代时期的遗籍为最多。而这一段时间,即公元三世纪至十世纪,正是我国手写纸书的鼎盛时期。进入北宋以后,雕板印制的典籍大兴起来,纸张更成了制作典籍的唯一材料了。

当然,纸张的品类、名目也很多,但就纸的质料讲,无非是麻纸、皮纸和竹纸等几大类。潘吉星先生在其所著《中国造纸技术史稿》中,

对其检验过的二十三件敦煌石室写经造了一张明细表。这张表表明其检验取样起于北凉神玺三年(399年)写的《贤劫千佛品经》第十,迄于五代写的《佛说无量寿经》,时代跨度也有五百年左右。这二十三件释道两家的经卷中,麻纸写造者为18件,占78.26%;皮纸5件,占21.73%。可见这一时期典籍的制作材料主要是麻纸,其次是皮纸。宋代实行重文轻武政策,科学文化进一步发展,书籍创作以及典籍整理也空前繁荣。加之此期雕板印书大兴,故书籍的社会生产量也空前增加。书籍生产量的加大,对纸的需求量也就空前增多。还像过去那样仍采用麻纸来制作典籍,显然是无法满足这种社会书籍出版需求的。因为麻类植物纤维毕竟是有限的。因此,进入宋代以后,我国典籍的用纸主要是皮纸。特别是南方,桑树皮、楮树皮、青檀皮、藤皮等许多种树皮,都能用来造纸,故南方的典籍多数都采用皮纸印造。而北方可用来造纸的树种韧皮较少,相对来说麻类植物较多,造纸仍以麻纸为盛,故北方的典籍仍多以麻纸印造。进入南宋以后,南方,特别是闽北武夷山区盛产竹纸,故自南宋中叶直至元明,闽建地区的典籍又多采用竹纸印造。明清两代,造纸业更为发达,纸的品类名目也更为繁多。但纵观这两代遗存的典籍,其用纸是麻纸绝少,皮纸、竹纸各占其半。可见典籍制作材料采用纸张以后,各时代各地区所用的纸料也还是有所不同的。

第二节 典籍的生产方法

典籍的生产方法,同典籍的制作材料一样,经历过若干不同的阶段,方式方法也有过很大的不同。典籍的制作方法,不是一开始就用雕板印刷或是活字排版印刷的。印书术的出现,在典籍制作史上具有伟大的划时代的意义,所以当以印制典籍的出现划一界限,分两段讲

述典籍的生产方法。

一、印制书籍出现前的典籍生产方法

我国印制书籍大约起于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旁及辽、金、西夏,沿袭于元、明、清。但在唐以前,我国典籍的制作方法大抵是依典籍制作材料的不同,先后有过刀刻、铸造、笔写等不同的方法。

初期书籍之一的甲骨文书,从现存的甲骨文片看,其上面文字都是用刀刻的,这是因为甲骨有一定的硬度。一片龟甲或一块兽骨,没有多大的平面,除掉占卜时形成的卜兆裂纹,能承载文字的地方所剩无几。刀刻的字迹既能保持久远,又能笔道匀整,又适应甲骨的有限平面和一定硬度。有的甲骨字迹刻得十分纤细,如陕西周原地区出土的西周甲骨,其字迹要用五倍的放大镜才能看清,可见那时的微雕技术已经相当精湛了。

初期书籍之二的青铜器铭文,以及后世的铜铁器物文字,据现在所知道的,其上面的文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凸出来的阳纹文字,一种是凹进去的阴纹文字。凹进去的阴纹文字比较好理解,那就是在事先设计制作好的青铜器上,如果什么时候想在上面镌刻文件或事件,都可随时请人操刀镌刻就是了。这种用刀在青铜器上直接镌刻阴纹文字,比在青铜器上铸造阳纹文字要方便、自由得多。在青铜器上铸字,事先就要有周密的计划。有的在设计时大概就不想当作器具用,而是想铸造文件,以显示文字为主要目的而铸造的。例如郑国、晋国铸造的刑鼎,就是为了公布法律,晓谕全国。这类青铜器物上面的文字,在制作浇铸模子时就要考虑周详,一份文件,一个事件,一共有多少字,如何布局,乃至每个字的镏钹,都要精心设计,精心制作。而且模子内壁的阴纹字迹必须是凹进去的反字,浇铸出来的才是凸起的阳纹正字。有人认为,模子内壁上的阴纹反字是用正写反贴双勾再钹

钁的方法制作的。考古学界有人根据青铜器铭文中常用虚字的酷似，推测青铜器铸模内壁的阴文反字可能是一个一个事先做好的阳纹正字挤压出来的。假如这种推想能够成立，那就表明我们的祖先早就会制造活字。当然这种活字绝不是为了排版印刷，而是为了铸造青铜器铭文。

初期书籍之三是石质文书。我国自周秦以来，以玉片、石片、石鼓、摩崖、碑、碣、套帖等形式刻、写的石质文书，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归纳起来，往石质材料上着附文字，就现在所知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书写，一种是刀刻。书写者最集中的见于侯马盟书（图 18，见 225 页）。1965 年在山西省侯马春秋晚期晋国遗址出土的盟书，都是以朱色或墨色书写在玉片或石片上的。其中最大的长 32 厘米，宽 3.8 厘米，上尖下方，形态规整，显然是经过有意炮制的。这种盟书为什么要用笔写而不用刀刻？也许因为侯马盟书是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大凡需要发誓定盟，总是事有急需，发于义愤。并且盟书要一式两份，一份留作证据，藏于盟府，以备查验；一份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以示永不背盟。事急，又需要两份，刀刻可能不适应，故采用手写。不过这只是一种推测。除侯马盟书以外，传世的所有石质文书，包括摩崖刻石、碑、碣、历代儒家石经、释家石经、道家石经等，全都是用刀刻的。这些刀刻的石质文书要立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本来就是依山刻石，需经风吹日晒。如用笔写而不是用刀刻，时间一长，或经雨水冲刷，字迹就会模糊不清，甚至是字迹全无。所以古代的石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成的。

随着典籍的不断发展，以前的甲骨、青铜器、石料等都不再适应需要，于是竹木简便广泛地被采用为典籍的制作材料。这种材料不同于甲骨、青铜器和石头，究竟采取什么办法将文字着附在竹木简上，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重大课题。历来出土的大量竹木简，证明了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事实上刀、笔、墨、砚要预备齐全，才能书字

图 18 晋侯马盟书

于竹木简上。笔、墨、砚的功能不言而喻。唯有刀的用途，过去说法不一。一种说法，刀就是笔，用刀笔在竹木简上刻字。此说早已被大量出土的用笔写的竹木简书所推翻，因从未见过用刀刻的竹木简书而不能成立。还有一种说法，是用来刮削书写竹木简时错字的，当在竹木简上写了错字时，就及时用刀子刮去，然后再写上正确的文字。过

去人将“刀笔”连读,释为“刀子笔”,进而说竹木简书也是用刀子刻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

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中的缣帛仍是典籍的制作材料之一。用这种材料制作典籍,就无法像甲骨、青铜器、玉、石那样,其文字可以刀刻或铸造,而只能用笔书写。

纸张取代竹木简、缣帛而成为典籍的普遍制作材料之后,不但改变了竹木简的笨重及缣帛的贵重,而且由于纸张比竹木简、缣帛更易于着墨和吸墨,所以自东汉至五代近千年的时间里,纸书都是用笔抄写而成。又由于纸张柔软和具有特殊的吸墨能力,不但宜于书写,也适于印刷,所以又承担起自唐代开始的印制典籍的任务。中国采用雕板印刷的办法制作典籍,自唐代开始,中经五代的缓慢发展,至两宋而极盛,标志着典籍的生产方法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人类文明也跨进了新的历史时期。

二、印制典籍的出现与发展

我国用雕板印刷的办法来印制典籍,大概在唐朝已经开始,这无论从文献记载或实物留存都能得到证实。但印书之始,绝不意味着雕板印刷的技术到唐代才发明。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法则和科学技术进展的普遍规律,到了能够印制整部的典籍,应该说雕板印刷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唐代用雕板印刷技术印制典籍的史实,足以证明这种雕板印刷的技术早在唐朝以前就已出现。

明朝有位史学家叫邵经邦(1491—1565年),他写了一部通史性的史学著作叫《弘简录》。在《弘简录》卷四六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年仅36岁就夭亡,唐太宗很是悲痛。当宫女们将皇后生前所编纂的《女则》十篇呈献给皇帝时,唐太宗抚物生情,览而嘉叹,令予雕印。“太宗后长孙氏,洛阳人。……遂崩,年三十六,上为之恸。及

官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采古妇人善事，……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这段文字是张秀民先生据清人郑机《师竹斋读书随笔汇编》的提示引证的，意在证明雕板印书在唐初即出现了。张先生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中说：“唐太宗认为她（指皇后）的作品对维持封建道德有好处，并为纪念他们夫妇俩的爱情，所以就把这部遗著‘梓行’。‘梓行’两字，即是雕板印行，意义是很清楚的。长孙后卒于贞观十年（636年），可见此书的印行就在这年或稍后。这可说是最早的内府刻本，而第一部印本书是妇女的作品。”张先生的这个发现，并由此得出雕板印刷术唐初发明说的结论，影响是很广泛的，也是很深远的。张先生的说法如果是正确的，则说明在七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已经用雕板印刷的办法来生产典籍了，而且生产的第一部典籍就是妇女著作。自此之后，印制典籍日渐发展，记载亦多。

冯贽的《云仙散录》（又称《云仙杂记》）记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唐玄奘到印度取经出发的那一年是贞观三年（629年），贞观十九年（645年）取经回国，前后经过十七年。再过十九年，即麟德元年（664年），唐玄奘涅槃圆寂。所以他用回锋纸印普贤菩萨像施于四众，当在贞观十九年他取经回国之后，麟德元年他涅槃圆寂之前。这件事情的发生，距梓行长孙皇后的《女则》仅十多年的时间，说明七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不仅已雕印典籍，而且已印制佛画了。当然这里也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个是玄奘印普贤像，其法究竟是捺印还是刷印；一个是回锋纸究竟是什么纸。“捺印”就跟手戳或图章一样，将印模蘸好印色之后用手按捺于纸。这种方法古印度时已有，玄奘蜚声天竺十七年，深谙印度佛学及与此有关的技术。取经回国之时将此法也带回中国，捺印普贤像，也是很有可能的。然而，如前所述，就在唐玄奘徜徉于南北天竺之时，中国已雕板印制《女则》。他取经回国之后，为了宣传教义，再现菩萨庄严，采用新的雕印之法也是极有可能的。雕板印刷与捺印的区别是，雕板印刷是“刷

印”，刷印是将墨色涂在雕刻好文字或图像的木板上，然后将纸覆盖上去，再用软毛刷刷按纸张，使敷墨的文字或图像着附显现在纸上。捺、刷之间虽然就是这么点儿区别，但这点区别却是最本质的，捺印永远不能算是印刷术的范畴。

回锋纸到底是什么纸，无以稽考。中国古时有所谓“还魂纸”，其实就是废旧纸回池再泡打成纸浆抄造成的纸。唐玄奘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其数量在当时已相当可观。而当时政府、军队、民间用纸量都很大，生产供不应求，因而废纸也还要回池再造。回锋纸是不是就是这种还魂纸，也很有可能。总之，玄奘印普贤像，在典籍制作方法上，在版画研究上，在佛画雕印史上，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件事，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此后，关于唐代雕印历书、字书、韵书、文集、道书、阴阳杂记等书的记载，层出不穷，屡见不鲜。流传于世的实物也不只一件两件。如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王玠为父母双亲祈福而雕造普施的《金刚经》，西川成都府樊赏家雕印的历书，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的梵文《陀罗尼经咒本》等，就都是唐代雕印的至今还留存于世的印刷品。特别是那件被斯坦因携走、现在仍陈列在大英博物馆的《金刚经》（图19，见229页），可以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而又相当成熟的印刷品。它用七张纸粘连而成，全长16尺，完整无损。卷首有释迦牟尼佛在祇树给孤独园坐莲花座上对长老须菩提等僧众说法的图像。释迦牟尼妙相庄严，栩栩传神；经文字体端庄凝重，刀法稳健；印纸精良，墨色精纯，古朴大方，赏心悦目。说明九世纪中叶，我国的雕板印刷技术已经进入相当成熟的时期，印制的典籍也已经相当精美。

进入五代后，雕板印制典籍的方法已被政府正式采纳，并用来印制儒家经典。从后唐长兴三年（932年）起，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年）止，中原地区四个不同朝代唐、晋、汉、周，在二十二年的时间里，由国子监连续不断地完成了“九经”的校勘和雕印工作。这是儒家经典第



图 19 唐咸通九年(868年)四月十五日印《金刚经》卷首扉画

一次用雕板印刷的办法生产出来,或者说是儒家经典的第一代版本,监本之称也就肇始于此。与此同时,《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以及解释儒家经典的《经典释文》,也先后被雕板印制出来。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县)人和凝,不顾别人指责,自己出资自己主持雕板印制了自己的文集,开创了版本学史上“自刻本”的先河。后蜀宰相毋昭裔,不但倡导主持雕刻了“蜀石经”,还主持雕板印制了“九经”,还让自己的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主持雕板印制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地方政府以及民间雕印的佛经、佛画更多。道家的某些作品也被雕板印制出来。整个典籍的生产方法,已处在全面革新的前夜。

进入宋代以后,典籍的生产方法便以雕板印刷为主流了。南北两宋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流通之宽、版印之精,都堪称前所未有、后世楷模。上自中央各殿、院、廊、司、局、监,下至地方各府、州、

军、县,各路茶盐司、安抚司、提刑司、转运司、公使库,各府学、州学、军学、郡斋、郡庠、学官、黉宫、学舍、县学、县斋,各地书院,私宅、家塾、书棚、书坊、书肆、书籍铺,各地寺院、道观、祠堂等等,都竞相刻书,形成了广泛的典籍出版网络,使典籍生产出现了空前未有的高潮。两宋以后,迭经元、明、清,旁及辽、金、西夏,典籍的生产多是采用雕板印刷,为今天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遗产。

三、活字排版印制典籍的出现与发展

雕板印制典籍比起用手抄写,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只要雕刻一套板,想印多少,都可以随心所欲。但这种技术必须是每一种书雕一套板,每套板只能印一种书。它只能在部数上增加,不能在种数上生新。若要生新,就只能另雕一套板。这显然是工本极大,劳师费时。这种自身固有的弱点,在两宋雕板印制典籍充分发展的同时,也就充分暴露了出来。能否克服这种弱点,使之既省工本,又能随意生新?这是摆在当时典籍生产者面前的新课题。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平民毕昇用自己的天才和实践圆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一) 泥活字印书法的发明与发展

关于毕昇发明泥活字印书法,北宋沈括在他所著《梦溪笔谈》卷一八中有翔实的记载(图20,见231页)。沈括谓:“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炆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



图 20 发明泥活字的毕昇(塑像)

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保藏。”

这段记载,将毕昇泥活印书的制字、排版、常用字的储备、生僻字的临时制作、不用时的收藏方法,以及不用木料制字的原因等,都讲得清清楚楚。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书法,在今天看来除了稍显原始古朴外,其余关乎现代排版印刷的基本原理,那时几乎都已具备了(图21)。这是典籍生产方法上的又一次重大革新。毕昇发明的泥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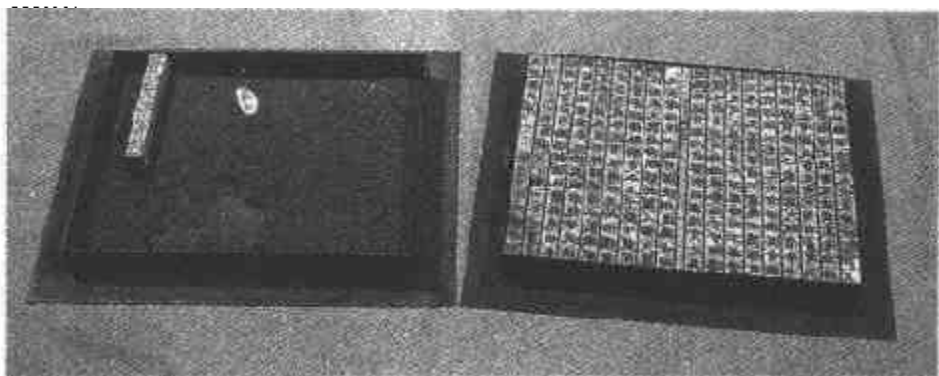


图 21 印书用的泥活字范(模型)

字印书法,比德国人谷腾堡用活字排印书籍要早四百年。可惜的是,这种泥活字排印过什么书,不见记载,更无实物流传。但按照毕昇泥活字排版印书的方法,仿制泥活字,并用来印书,却是代有其人。南宋周必大在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于潭州(今湖南长沙)仿毕昇之法,制造胶泥活字铜版,排印了自著的《玉堂杂记》。此事在《益国周文忠公全集》卷一九八周必大给朋友程元诚的信中有记载:“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泥活字印本书,可惜也没能流传下来。但这一记载表明:确有后人根据沈括记载而实践毕昇泥活字印书技术的史实。

元灭金，绝宋世。蒙古骑兵在进军南宋过程中，其统治者曾聘用汉族知识分子姚枢为谋臣，且做了一任下级小官。后因不忍与蒙古族贪赃枉法同僚同流合污，于海迷失后称制二年（1250年）弃官携家到河南辉县隐居。其侄姚燧《牧庵集》卷一五有一篇《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记有姚枢在河南辉县这一段时间里的事迹。碑文谓：“遂携家来辉，垦荒苏门，粪田数百亩。修二水轮，诛茅为堂……。又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自版《小学》书、《语孟或问》、《家礼》；俾杨中书版《四书》；田和卿版《尚书》、《声诗折衷》、《易程传》、《书蔡传》、《春秋胡传》，皆脱于燕。又以《小学》书流布不广，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活版，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论说》诸书散之四方。”这里的“为沈氏活版”，指的就是沈括《梦溪笔谈》所记载的毕昇发明的泥活字排版。说明元定鼎之前姚枢曾教他的弟子杨古依毕昇制造活字之法，也制造了泥活字，用来排版印制《小学》这类书，散之四方，化民成俗。只可惜姚枢主持用泥活字印制的书一种也没能流传下来。但这件事表明，北宋布衣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书法，后人是不不断践用的，且都能获得成功。姚枢主持制造泥活字印书，发生在公元1250年以后，上距周必大在潭州制造泥活字印书不过五六十年。地域则一居江南，一为河北。说明毕昇的活字印书事业后继有人。直到六百年后的清朝，仍有人仿照此法制字印书。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苏州人李瑶在杭州用胶泥活字排印了《校补金石例四种》。其自序称：“济南潘氏《金石例》十卷，当元之世版已三椘，曷来操觚家之奉为矜式也，审矣。明初，王氏推广其意，别著《墓铭举例》四卷，发明表里，以津逮后学。世仅传抄，名几湮阙。此也是翁《敏求记》中之所以弗详也。迨后四百年始有金匱王秉诚者为之雠校，并合姚江黄氏《要例》一卷刻之，遂名之为《金石三例》也。聿自《三列》出，而金石之道尊。金石之道尊，而具见吾人立言传信之非易为也。……此书原刻精当，而微嫌夹注丛列，坊本则鱼豕之病杂陈

矣。余迺慨然思广其传，即以自治胶泥版，统作平字捍之。且以近见吴江郭氏祥伯之《金石例补》补之……，因别署其编曰《校补金石例四种》，都十七卷。庶使操觚家之有志于古者，如获指南车焉。”今传世的李氏泥活字印《校补金石例四种》，其内封面镌有“七宝转轮藏定本，仿宋泥版印法”长方牌记两行。表明李瑶的泥活字，仍然是仿照宋代毕昇泥活字的方法制造出来的。北京图书馆藏有此本，看去纸白墨莹，布字排版都很精心。说明自北宋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技术之后，李瑶使这种技术又有所发展。

李瑶制造的这套泥活字，不但排印了《校补金石例四种》，而且还排印了《南疆绎史》。北京图书馆亦藏有此本。将两书勘比，其印纸字迹、行款版式等如出一辙，堪称是李瑶泥活字刷印的姊妹书。这两部书的印制技术，不但是宋代泥活字技术的实践和继承，也为后世留下了实物，因而显得尤为珍贵。

较李瑶用泥活字晚十二年，即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安徽泾县的翟金生及其子侄发增、一新、一杰、一棠等，以三十年的心力刻意寻研毕昇遗法，仿制泥活字十万余个，用它排版印刷了《泥版试印初编》、《水东翟氏宗谱》、《仙屏书屋初集》等书。

皖南泾县翟氏历来多奇巧之人，例如宣纸的创制就是翟氏的祖上人。翟金生字西园，是安徽泾县西南八十里水东村的一个秀才，以教书为生，能诗善画，颇有艺术才能。他不顾“家徒壁立室悬磬”的艰难困苦，发动子侄，根据沈括的记载刻意仿制毕昇的泥活字，且分大、中、小、次小、最小五个型号，凡十万有奇。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翟金生的这套泥活字试制成功，他命孙子翟家祥、内侄查夏生等检字，学生左宽等校字，外孙查光鼎等归字；他本人亲自动手，采用连史纸，首先排印了自己的诗词集，名为《泥版试印初编》。此书纸墨精良，字画均匀，是又一部泥活字成功印刷品。北京图书馆珍藏一帙，书中有五言绝句诗四首，可见其制字刷印典籍的良苦用心。现录于下：

自 刊

一生筹活版，半世作雕虫；珠玉千箱积，经营世载功。

自 检

不待文成就，先将字备齐；正如兵养足，用武一时提。

自 著

旧吟多散佚，新作少敲推；为试澄泥版，重寻故纸堆。

自 编

明知终伏瓮，此日且编成；自笑无他技，区区过一生。

这四首诗，论艺术，没有什么动人的生花之笔；但就其内容而言，则确是翟金生潜心于泥活字印刷技术的写照。翟金生制造的泥活字，还用来排印过其友黄爵滋的诗集《仙屏书屋初集》及《水东翟氏宗谱》。这又是一次毕昇泥活字印书的成功实践。

早在雍正末或乾隆初年，即十八世纪的前半叶，中国还出现过用活字泥版印制典籍。这在中国印书术中是个很别致的方法，它有点类乎现代印刷中排版之后打成纸型、用纸型浇铸铅字版再印刷的工艺。创制活字泥版的是清前期一位未第的举人，名叫吕抚，字安民，号逸亭，浙江新昌人，生于康熙十年（1671年），博通经史百家却屡试不第，遂以邑庠隐居。所著有《四大图》、《心图》、《三才一惯图》、《格言教家箴》、《修正乐天图》、《文武经伦》及《纲鉴通俗演义》等。其中十阅寒暑才成书的《纲鉴通俗演义》凡二百四十二卷，六百八十五回。吕虽早有将此书印制行世的打算，奈雕板工价太贵，乃搁置三十余年。后将此书删为二十六卷四十四回，用自制活字泥版刷印行世。

其制作方法大致是这样的：先找一套已雕好阳纹反字的书板，用

作制字的依据。再将加工妥帖的胶泥均匀地摊抹压挤在每块书板上，背干后取下，便成一块一块阴纹正字的泥版。再将泥版依横竖行间锯开，则成为一个一个的阴纹正字的单字，或者称为活字。排版时就用这些阴文正字依书稿检排，排成一块一块的活字板。然后再将事先加工好的胶泥均匀地摊抹压挤在这些阴纹正字的活版上，背干后取下，阳纹反字的泥版就制成了。其边栏、字迹再经过一番修整，就可敷墨铺纸印刷。吕抚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印制了他的《纲鉴通俗演义》。此书今藏天津人民图书馆，是中国典籍生产方法中极特别的印制技术，很值得重视。后世打纸型、浇铅版的工艺就是由此发其端，可以说开后世西洋印刷方法之先河，在中国印书术上独树一帜。

（二）木活字印书法的发明与发展

木活字印书法发明在我国历史上的什么时期，过去一般都说是元朝，发明人是王祜。其实王祜未必是木活字的发明者，他应该是木活字印书术的改进者，或者说是木活字印书术的实验成功者。沈括《梦溪笔谈》描述毕昇制造泥活字时曾谓：“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这段话说明在北宋毕昇制造泥活字之前，或者是在制造泥活字的同时，确曾制造过木活字，而且用它来做过排版和刷印实验，否则是指不出木活字固有弱点的。可见北宋毕昇就曾制造过木活字，并经过实验，因有缺点，故放弃了。

事隔二百五十余年，即元朝元贞元年至大德四年（1295—1300年），由王祜试制木活字印书成功。王祜原籍山东东平，是个农学家，早在旌德做官时就开始撰写《农书》。因字数过多，难于用木板雕印，于是他便独出心裁，创制了三万多个木活字，准备印制自己的《农书》。但未及排印，他便调任江西永丰，所以只好将这套木活字印书工具带去江西，准备在那里排印自己的《农书》。不料他到了江西以后，那里已经用传统的雕板印书法将《农书》印制了出来，所以带去的那套木活字只好贮存起来。幸好，他在旌德创制这套木活字的过程中，

用来试印过一百部《旌德县志》，并且总结了这次试印的经验，写成《造活字印书法》专文，附录在他的《农书》卷二十二后面。可惜用这套木活字印制的唯一的《旌德县志》，到明万历时就已全部失传，所以唯一能了解这套木活字印刷技术的，只有靠那篇《造活字印书法》。其《造活字印书法》谓：

“后世有人别生巧技，以铁为印盃，界行内用稀沥青浇满，冷定、取平，火上再行煨化，以烧熟瓦字排于行内，作活字印板。为其不便，又有人以泥为盃，界行内用薄泥，将熟瓦字排之，再入窑内烧为一段，亦可为活字板印之……。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木做印盃，削竹片为行，雕板木为字，用小细锯镗开，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盃字既满，用木屑屑之，使坚牢，字皆不动，然后用墨刷印之。”这是王祜改进制字材料、排版办法、试制成功木活字印书法的忠实记录，也是王祜对木活字印书法的简约概括。其具体分为六个步骤：一是写韵刻字法；二是镗字修字法；三是作盃嵌字法；四是造轮法；五是取字法；六是作盃安字刷印法。每道工序王祜都有详细通俗的说明，可知活版印刷已趋成熟。特别是其中的转轮检字法，更较先进。其造轮法谓：“用轻木造为大轮，其轮盘径可七尺，轮轴高可三尺许，用大木砧凿窍，上作横架，中贯轮轴，下有钻臼，立转轮盘，以圆竹篾铺之，上置活字。板面各依号数，上下相次铺摆。凡置轮两面：一轮置监韵板面，一轮置杂字板面。一人中坐，左右俱可推转摘字。盖以人寻字则难，以字就人则易，此转轮之法不劳力而坐致字数，取迄，又可铺还韵内，两得便也。”王祜这套转轮拣字的方法，是在“分韵贮字”基础上对拣字方法和工艺的突破性改进。可见十三世纪的后半叶，中国不但有了木活字印书法，而且创制了极为简便的拣字工艺，标志着中国典籍的生产方法又迈出了新的步伐。

元代木活字印刷的技术，不但在汉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以汉字

形式行用,而且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开始使用,敦煌千佛洞就曾经出现过回鹘文木活字(图 22)。回鹘文是拼音文字,其单字是由字母匹配而成,长短不一,不同于汉字可以方整划一。这种活字的排版技术,要比汉字排版难度大得多。可见中国少数民族富有聪明才智,并为印书术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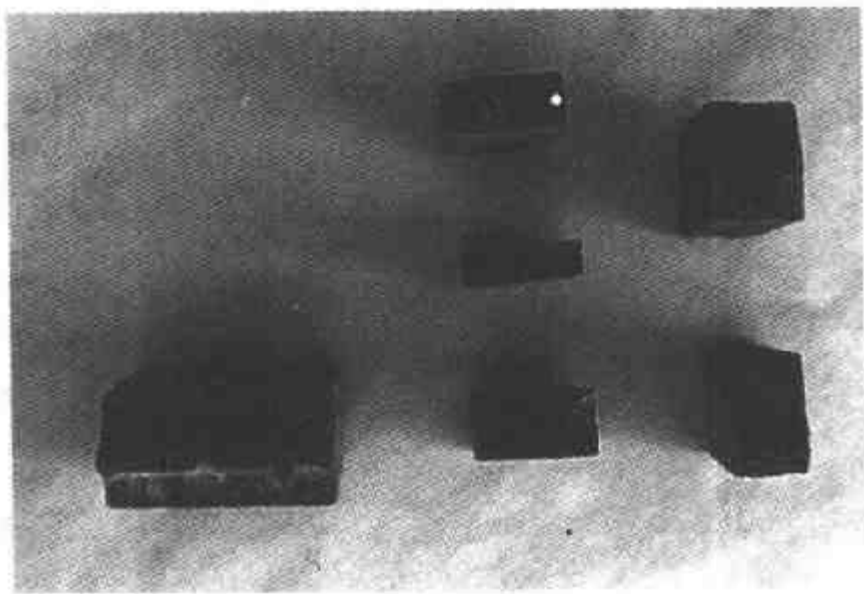


图 22 回鹘文木活字(公元十四世纪前期)

进入明、清两代,木活字印刷技术已经行用得很普遍。江南各省的祠堂就常用木活字排印家谱、宗谱。崇祯十一年(1638年)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不论官署、私家、坊肆,都采用木活字印书。像雍正三年(1725年)木活字排印的《后山居士集》六卷、《正集目录》一卷,《后山先生逸诗》五卷、《逸诗目录》一卷、《诗余》一卷,字用软体,排版整齐匀平,没有行斜字扭的现象。同年,归安汪亮采南陔草堂也用木活字排印了《眉山诗集》十卷,其文字书写、木字鍪修、单字拣排,乃至边栏界行,也都十分精致。表明此期木活字印制典籍的技术已经相当精熟。到雍正十年(1731年),内府已经采用木活字排印朱批谕旨。其间文用墨印,批用朱印,纸质莹洁,朱墨灿然,赏心悦目。

清代内府大规模采用木活字大批量地印制典籍是在乾隆年间。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下诏广征天下遗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复择其所罕见而又足资考镜之书,打算先予雕板印行,嘉惠士林。是年四月,先将《易纬八种》十二卷、《汉官旧仪》二卷《补遗》一卷、《魏郑公谏续录》二卷、《帝范》四卷交武英殿雕板印行。当时管理武英殿刻书事务的是四库馆副总裁金简。他考虑到这种书刻印既多,消费必大,且耽延时日,故由他设计并建议改用木活字排印。他的建议被皇帝认为既不浪费梨枣,又不久淹岁月,用力少而程功速,故速即准敕施行。在金简主持下,仿照王祜之法,制造了二十五万余个木活字。从乾隆三十八年十月起,改用木活字排印。乾隆皇帝认为称活字不雅,特赐名“聚珍”;又由于由武英殿董其事,印的书版式行款又完全相同,故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金简辞世,前后共用这套木活字排印了一百三十四种书,可谓我国典籍出版史上最大的木活字印刷工程。此后,各地书院、私宅、坊肆,用木活字印书屡见不鲜。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婺源书院用木活字排印的《婺源山水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伟元萃文书屋用木活字排印的《红楼梦》,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再版排印的《红楼梦》等等,就都是有名的木活字印本书。表明木活字印刷的技术越来越普遍,越来越精熟。

(三) 铜活字印书法的发明与发展

关于铜活字排版印制典籍究竟始于何时,虽有人做过探讨,但极难说得清楚。有人认为始于宋代,一般都认为始于明代弘治、正德年间,即公元十五至十六世纪之交。明代陆深《金台纪闻》中说:“……近时毗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间布置,讹谬尤易。夫印已不如录,犹有一定之义,移易分合,又何取焉?兹虽小故,可以观变矣。”陆氏《金台纪闻》写于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至正德三年(1508年)之间,因此其文中所谓“近时”,亦当是指弘治、正德间。陆

氏这段文字是为了抒发感慨：在他看来，雕板印书已不如手自抄录，但犹有一定的规制和意义。而近时又有人以铜、铅等材料制造活字，排版印书，其间“移易分合”、“布置间布置”，又有什么优点可取呢？故叹称：“兹虽小故”，却可以看出世道人心的变化。陆深的这种观点固然迂腐，但他却明确指出了明代弘、正间江苏苏州、常州、无锡一带有人制造了铜活字，用来排版印书。而其中最有名的要算是无锡的华、安两家。

华、安两家都是无锡的巨富，从财力上讲，具备制造铜活字印书的条件。华氏用铜活字印书盖起于华燧。华燧字文辉，少于经史便多所涉猎，中岁则喜校阅异同，辄为详证，手录成帙，遇老儒即持以质询，有时又广坐通衢，高诵琅琅，旁若无人，既而乃“范铜板锡字”，凡奇书难得者，订正摆印以行，并曰：“我能会而通之。”故颜其室曰“会通馆”。迄今仍传于世的华氏会通馆铜活字排印的书还有不少，如弘治五年（1492年）排印的《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1495年）排印的《容斋随笔》和《文苑英华辩证纂要》，弘治十一年（1498年）排印的《会通馆集九经韵览》，弘治间排印的《会通馆印证宋诸臣奏议》、《记纂渊海》、《会通馆印正缉补古今合璧事类》等，就都很有名。

还有一位叫华理。据《无锡县志》记载，华理字汝德，做过小官，善于鉴别古奇器及法书名画，又多聚书，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现在传世的，有弘治十五年（1502年）华理主持用铜活字排印的《渭南文集》，字体、刷印都非常精良。稍晚，到正德间又有华坚以“兰雪堂”名义用铜活字排印过一些书。如正德八年（1513年）排印的《元氏长庆集》六十卷，正德十年（1515年）排印的《艺文类聚》二百卷，正德十一年（1516年）排印的《春秋繁露》十七卷，《蔡中郎集》十卷等，都是华坚兰雪堂用铜活字排印的著名典籍。

到了嘉靖年间，华氏一族的铜活字印书开始被无锡的另一家所

取代,这就是安国一家。据《常州府志》载:“安国字民泰,无锡人。居积诸货,人去我取。贍宗党,惠乡里,乃至平海岛,浚白茅河,皆有力焉。父丧,会葬者五千人。尝以活字铜板印《吴中水利通志》。”可见安国是个很有钱而又热心公益、深得百姓拥戴的人物。《无锡县志》亦谓:“安国字民泰,富几敌国。居胶山,因山治圃,植丛桂于后岗,延袤二里余,因自号桂坡。好古书彝鼎,购异书……”既有经济基础,又好购异书,这都是安氏能以铜活字印书的条件。据知,安氏以“桂坡馆”名义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有《吴中水利通志》、《古今合璧事类备要》、《颜鲁公文集》、《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数种。其中《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版心镌有“印人太”、“印人王”,及排字工人陆佃、张嵩、李太、永宁等姓名,足证确是活字印本。

此外,还有一家“金兰馆”,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也用铜活字排印过宋范成大的《石湖居士集》三十四卷,版心镌有“弘治癸亥金兰馆刻”一行。弘治十六年(1503年)金兰馆又排印了《西庵集》,字体秀丽,笔画挺拔,版式疏朗,印制精良,与华、安两家印的书,字体风格迥然不同。金兰馆究属谁家的室名斋号,不甚清楚,《中国版刻图录》疑此馆为崑山顾恂家的斋号。

除了上述几家之外,还知常熟杨仪尝以“五川精舍”名义用铜活字排印过《王岐公宫词》;南京张氏用铜活字排印过《开元天宝遗事》;正德十二年(1517年)浙江庆元学教谕琼台韩袭芳用铜活字排印过《诸葛孔明心书》;闽建芝城(即建宁)嘉靖三十年(1551年)用铜活字排印了《通书类聚剋择大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又用铜活字排印了《墨子》十五卷;万历元年(1573年)建阳游榕用铜活字排印了徐师曾的《文体明辨》,翌年,又排印了一千卷的《太平御览》。

关于无锡华、安两家,是用铜活字印书,还是锡活字印书,有不同说法。据华氏“范铜板锡字”、安氏“以活字铜板印《吴中水利通志》”的提法,应是“范铜为板,铸锡为字”之义。如此,则华、安两家便不是用

铜活字印书,而是用锡活字印书。但明代有铜活字印书,却是毋庸置疑的。

清代用铜活字排印的书种数不多,但规模较大。传本中有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吹藜阁用铜活字排印的《文苑英华律赋选》;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用铜活字排印的陈梦雷的《松鹤山房诗集》;道光间用铜活字排印的顾炎武《音学五书》中的《音论》上中下三卷,《诗本音》十卷。当然,最大的铜活字印书工程还是排印《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是陈梦雷以个人之力、花费二十多年时间编辑而成的大类书。陈梦雷字省斋,福建闽县人,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靖南王耿精忠叛乱时,他正在原籍老家休假,耿精忠胁迫他受官,他却托病稽延,但耿精忠事败,他也被诬下狱,谪戍辽宁开原的尚阳堡。陈梦雷本来博学多闻,在戍所十余年,关外的达官子弟多从他受业,声誉日隆。康熙十八年(1679年)圣祖玄烨东巡盛京,他的献诗得到了皇帝的赞许,因而被召还北京,派在西苑教授皇三子诚亲王胤祉读书。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便着手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到康熙四十年(1701年)初稿完成。四十五年(1706年),清本缮写完毕,交由诚亲王奏进御览。此书初名《汇编》,后得圣祖同意,改名为《古今图书集成》。原拟交武英殿雕板印行,但因事迁延,至圣祖玄烨辞世也未能付梓。

康熙皇帝死后,继承大统的雍正皇帝胤禛首先对曾和他争夺储位的兄弟们下手,以剪除后患。与此同时,他弟兄们原来的幕客也挂嫌受到处置。陈梦雷因做过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的老师,便以“招摇无忌”的罪名再次谪戍塞外。原来已经编成并且准备付梓印行的《古今图书集成》,虽然未因编纂人的罪名而被废弃,但却派蒋廷锡为总纂,带领一帮人对《古今图书集成》大加删改。经过三年时间的加工,最后厘为一万卷,分为六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九部。每部中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外编。可以肯定地讲,现在的《古今图书集成》,

绝非陈梦雷原书旧观。雍正三年(1725年),《古今图书集成》重编工竣,由蒋廷锡上表进呈。雍正皇帝还为此写了御制序文,竟连陈梦雷只字未提。《古今图书集成》于雍正三年进呈后,用陈梦雷原来策划铸成的铜活字排版刷印,分装为五百二十三函;另目录二十册,分装二函,总计是五百二十五函,五千零二十册。

该书用铜活字排版之后,选用洁白如玉的开化纸和微黄似箔的太史连纸印造。楮墨精良,装潢富丽。自雍正四年(1726年)开始排印,至雍正六年藏事,凡三年,共印六十四部。是铜活字印刷史上最大的工程,也是金属活字印刷史上最大的工程,也是活字印刷史上最大的工程,标志着我国活字排印典籍的技术在十八世纪前半叶已经达到了巅峰。

四、套版印制典籍的出现与发展

套版印制典籍,是典籍和印制技术发展的产物。应用于典籍印制的套色印刷技术,与丝漏彩印花布等技术密切相关。在殷墟甲骨文字的契刻中,已发现有朱红颜色的文字记录,也有尚未镌刻的朱色字迹。山西侯马春秋晚期晋国遗址出土的“侯马盟书”,除墨书之外,绝大部分也是朱书。采用缣帛和纸张制作典籍之后,朱墨套写屡见不鲜。《隋书·经籍志》卷一著录有汉代贾逵所撰的《春秋左氏经传朱墨例》,大概是朱墨套写典籍的最早记载。汉建初元年(76年),汉章帝曾命贾逵讲授《左传》,并“与简、纸经传各一通”。盖是讲授过程中贾逵为使经、传分明,又能读一书而经、传俱见,才用朱色写经、墨色写传的。如果此种推测可信,则此书当是我们现在所知最早的经文、单注两色合抄本。六世纪初,有人将《神农本草经》与陶宏景的《本草经集注》合抄为一书,也是朱色录写《本草经》原文,墨色抄录陶氏注文。七世纪初,陆德明撰《经典释文》,经文墨书,音注朱书。该书“叙录”对

这种经注分色写录的原由作了说明,谓:“先儒旧音,多不音注。然注既释经,经由注显。若读注不晓,则经义难明;混而音之,寻讨未易。今以墨书经本,朱字辨注,用于分别,使较然可求。”可见《经典释文》的最初写本,是经注分明,朱墨判然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唐写本《道德真经疏》,也是朱书经文、墨书疏语的。宋代周辉《清波杂志》记载,“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翰林学士张伯献重修《太祖记》一卷,以朱墨杂书。凡躬承圣问及史官采摭事,即以朱别之”。所有这些记载,表明中国古书自手写本时代,就有套色合抄的传统。

到典籍的制作方法发生变革,即印书术出现以后,朱墨套写向套印转变成为必然趋势。唐末、五代时期雕板印刷的版画及现存的佛画,已有墨印彩绘。北宋初年,四川民间流通的交子,即纸币,就是“制楮为券,表里印记,隐密题号,朱墨间错”。这种纸币似已是套版印制,但详情无以稽考。山西应县木塔出现的辽代彩印的《南无释迦牟尼像》,释迦牟尼扶膝端坐于莲台,披红色衣;头部光圈内红外蓝。肉髻之下微见白毫相;顶部华盖饰宝花,帛幔下垂;华盖两旁饰以天草,其外印“南无释迦牟尼佛”七字,字左反而右正。其印制方法属于丝漏印刷,当是两套版印制,先漏印红色,后漏印蓝色,字地上的黄色则是用笔刷染的。这和民间镂空印染花布的方法基本相同。由于漏印方法不容易印出精细的线条,因此以笔勾画眉、眼、口、鼻、手、足和服饰,而身形穿着显得不甚清晰,这件作品可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套版印刷品,但属丝漏印法。1973年8月,陕西省文管会修整石台孝经,在碑身背面与中心石柱连接处发现了女真文书残叶及“东方朔盗桃”版画。据考证,该画系宋金时物,属坊间印卖的年画,浓墨、淡墨、浅绿色套印,类似山西平水系风格,很像是单版敷彩印刷的作品。上述这些事例,说明我国雕板印书术兴起之后,人们并不满足单调的一色墨印,而是在不断摸索套印技术,以期印出色彩斑斓的印刷品。

到了元代,雕板印书越发普及和兴盛,套印技术终于施于印制

典籍，印出了如同以前手写图籍时朱墨灿然、经注分明的典籍。其代表作，也是举世孤罕、海内外知名的作品，便是元至元六年（1340年）中兴路资福寺（在今湖北江陵）刻印的无闻和尚注解的《金刚经》。这部《金刚经》于1947年为南京中央图书馆购藏，后携往台湾。原式为经折装，经文大字印以朱丹，注文双行小字印以墨色，圈发、句读符号亦多印以朱色；卷首释迦牟尼说法图，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及韦驮像也都印以朱色；后有至元六年刘觉广跋文，称：“师在奉甲站资福寺丈室注经，庚辰四月间，忽生灵芝，茎黄色，紫艳云盖。次年正月初一日夜，刘觉广梦感龙天聚会于刊经所赞云。”今观《无闻和尚注经图》，确是地生四茎灵芝，信刘氏跋语为不诬。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现存最早的利用印书的普通版片套色印出来的典籍。它的问世虽然大大晚于辽代用丝漏方法套色印制的《南无释迦牟尼像》，但在技术上它却跳出了墨印彩绘及移用民间印染花布的窠臼，使雕板套色印刷获得了成功。不过这件印刷品尚不是多版分色套印，而是一版先印墨色，后印朱色。说明我国早期套版印刷，实际只是一版而分色套印。

距资福寺无闻和尚《金刚经》被套印出来之后二百六十五年，即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安徽歙县程大约“滋兰堂”雕板印成了精致绝伦的《墨苑》，把中国的套印技术推向了高峰。传世的程氏《墨苑》，墨印本并不稀见，其彩印本却世所罕传。北京图书馆藏有《墨苑》彩印本，其中的《天姥对庭图》、《巨川舟楫图》等，以红色、黄色套印凤凰，用绿色套印竹子，色彩绚丽，情趣盎然；用五种颜色分饰不同器物、花、鸟的多至数十幅，皆以色彩而显其意趣。仅比程氏滋兰堂彩印《墨苑》晚一年，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新安黄一明雕印了《风流绝唱图》，除墨印本外，也有彩印本行世。其中彩印的人物衣履、房饰、窗帟乃至肤色、目光，都印得十分精彩。北京图书馆还藏有彩印《花史》残册，各种花卉都以彩色套印。这些彩印本，比起元

代套色印刷的《金刚经》在技术上要复杂得多。元时套色印书，经朱注墨，行款分明，经文字大如钱，注文字清画朗，分起色来比较容易。而明代这几种彩印本，都印的是画，无论是山水人物、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房屋器具，都比文字版面复杂。构图精细的画面，操刀镌刻已属不易，再分色套印就更显其难。当然，元明前后的这种彩色套印技术，尽管有复杂程度之别，但就性质而言，却仍属同一范畴。即都是同一块雕好的版片上，根据不同的需要，分别涂刷不同的色彩，然后敷纸印刷。这种技术仍是套色印刷，即敷彩印刷。真正分版分色的套版印刷，则是在改进敷彩印刷的基础上才出现的。首创套版分色印刷的，是明万历年间的闵齐伋和凌濛初。

闵、凌两家都是吴兴的富户，家蓄资产。闵齐伋首创套版分色印刷技法，始印的大概就是《春秋左传》十五卷，其卷尾镌题：“万历丙辰（1616年）夏吴兴闵齐华、闵齐伋、闵象泰分次经传。”翌年，又刻成三色印本《孟子》。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闵氏又套版印出了九十一卷二十四册的《史记钞》。此本墨印原文，朱印评点，纸质莹洁，朱墨斑斓，十分精美。所以陈继儒评序此书，称雕板、活版及闵氏朱评，为印刷史上的“三变”。

凌家从凌迪知起便在朝为官，后从常州同知的任上罢归，著书林下达三十四年之久。同时日校群书，雕板印行。凌迪知的弟弟凌稚隆，虽生华胄，却独好典籍，丹黄刊槧未尝一日去手。到凌稚隆的儿子凌濛初，非但富有文学才华，而且占有家传刻书技艺，主持镌板印制了不少典籍。

凌、闵两家刻印过很多典籍，经史子集四部俱备。套版印制的典籍，以朱墨两色套印为多。有一些书竟是朱、墨、黛、紫、黄的五色套印，以一种颜色即一家的批注或评点。其版式一般多印四周边框，而无竖直界格。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在行字旁套印不同颜色的评点批注。每叶虽经数版套印，但不同颜色之间却很少参差，表明此

期套版印制典籍的技术已经相当娴熟。加之印纸洁白如玉,色彩斑斓,展卷生辉,令人欣喜。凌、闵两家还合作刻板套印了一些典籍,如朱墨两色套印本的《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三色套印本的《古诗归》、《唐诗归》等。凌汝亨刻印过朱墨本《管子》;凌启康刻印过带有精美插图的戏曲小说,如《西厢记》、《琵琶记》、《红拂记》、《虬髯客传》、《玉茗堂摘评王弼州先生艳异编》等。总计凌、闵两家所刻墨印本、套印本各书,大约有一百三十多种。

凌、闵两家的套印技术,不仅是在印刷工艺上精彩,其价值还在于它使中国早已产生的套色印刷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使单版分色套印演进到了多版分色套印,并由此又启发了短版、拱花印刷技术的相继产生。明末休宁胡正言,吸收这种分版套印的技法,再加以大胆地创新,便创出了“短版拱花”的印刷方法。

胡正言字曰从,休宁文昌坊人,后寓居南京鸡笼山侧。其人聪颖,精研六书,长于篆籀,所摹历代篆文、法帖、印存、画谱不下数百卷。生性爱竹,故于院中种竹十余竿,因颜其室曰“十竹斋”。胡正言一生刻印过很多典籍,但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他用短版和拱花的技术套印的《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两书。《十竹斋画谱》全用短版印成(图 23,见 248 页)。所谓短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再将每种颜色刻成一块小木印板,然后依次逐色套印或迭印,形成完整的彩色画面。因为这一块块镌雕的小木印板形似短钉,故称“短版”。用这种方法印出的画面,其色彩的浓淡深浅、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形神俱在,艺术效果令人叹为观止。现今北京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就是这一技法的继承和发展。《十竹斋笺谱》的印制,则短版、拱花两种技法兼而用之。所谓“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印出来的画面突出纸面,使天际的行云、江上的流水、禽类的翎毛、虫类的须腿、花朵的轮廓、器物的边线等,都一一突现在纸上,极有立体效果,大有呼之欲出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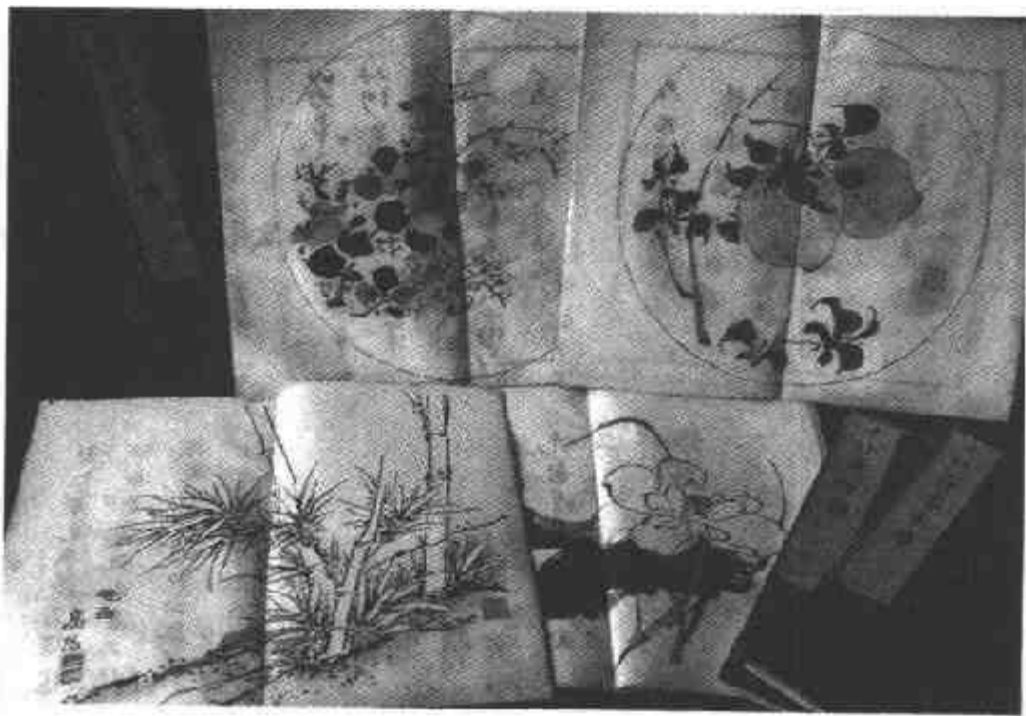


图 23 明崇祯年间(1628—1644 年)刻印彩色套印本《十竹斋画谱》

几与胡正言同时或稍早一点,还有江宁吴发祥在金陵用短版拱花的技法印制过《萝轩变古笺》。清代的套版印刷,在明末的基础上有长足发展,但再无质的飞跃。至此,雕板印制典籍的技术已登峰造极。

第五章 典籍的装帧艺术

古今书籍的装帧,都是一门独到的艺术。其内容大体包括书籍的版式设计、封面和插图设计及装订形式等。这些设计与实践的完美统一,便构成为书籍的装帧艺术。

第一节 典籍的版面设计

典籍的版面设计,是指对典籍版面文字、款式等所作的布局。典籍的版面设计,与典籍制作材料及制作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

初期书籍的甲骨文书,当然难以谈出它们的造型美和装帧艺术。青铜器本身就是很古朴的艺术品,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随之而有美的感染力。秦国的石鼓文,是用石头制造的典籍,除了增加载字面积外,也有美的含蕴在里边。竹、木简的书,由于都要削制成窄条形,平面有限,自然难以装饰。但它编连成册之后形成的编连状态和狭长的简面,却为后来手写帛书、纸书,乃至印制的典籍所模仿和继承。

手写帛书,绝大多数都织、画有边栏界行,初意当是对竹木简书模仿。边栏,指的是每面(幅)文字四周圈画或圈织的栏线,也称

边框。界行,指的是文字行与行之间织或画的界线,也称为栏线或界格。古人在缣帛上织画边栏、界行,固然与写出文字容易整齐、端庄有关,但溯本求源,还是对编连竹木简的模仿。一卷制好的帛书或纸书,其上下两端平行的栏线,犹如竹木简策上下两端编绳形成的线条;而文字行与行之间的界线,仿佛竹木简条与条之间的间隙。直到印版书籍出现以后形成的版框与界行,仍带有竹木简及手写帛、纸书边栏界行的余韵。但前者是自然形成的状态,后者则是模仿创造的艺术。

关于帛书的边栏、界行,史料多有记载。《后汉书·襄楷传》讲,汉顺帝时琅邪宫崇曾诣阙进献其师干吉于曲阳泉上所得的《太平清领书》一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界青首朱目”,想必装帧美观,朱墨烂然,赏心悦目。《国史补》记载“宋毫间有织成界道绢素,谓之乌丝栏、朱丝栏”。《书史》亦称“黄素《黄庭经》是六朝人书,上下是乌丝织成栏,其间以朱、墨界行”。《广川书跋》和《宝真斋法书赞》均称“唐许浑用乌丝栏书其诗为集”。足见帛书行用时期,对卷面的装饰美化已颇注重。这种装饰,既考虑实用意义,又兼顾艺术效果,是美与用的结合。

纸书盛行之后,仍画有边栏界行。唐五代以前的手卷纸书,其边栏界行的颜色几乎都是灰黑色,习惯仍称为“乌丝栏”,明显借用帛书时的称呼。从现存的大量敦煌遗书看,这些手卷纸书的边栏界行有相当数量是用淡墨画的,这从它的颜色和曲直匀称程度,直观就能看出来,但也有不少边栏界行的匀直和颜色,绝不像是墨笔画的,其颜色近于黑灰,笔道硬直而匀称,很像现代铅笔的颜色和笔道。

金属铅和铅粉是能够写字画道的,因为铅本身既具有黑灰的颜色,又质地松软。中国人很早就懂得利用矿物质铅。贾谊《吊屈原赋》谓“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用以形容利钝颠倒,是非混淆,良莠不分,可知西汉前已有金属铅。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卷三说:“扬子云

好事，常怀铅提槧，从诸计吏，访殊方绝域四方之语，以为裨补；辘轩所载，亦洪意也。”扬雄也是西汉人，是《辘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的作者。《方言》一书是扬雄做了很多调查才写成的。“怀铅提槧，从诸计吏，访殊方绝域四方之语”，正反映了作者调查的艰难。这里的要点是“怀铅提槧”四个字。“槧”是方木板，是当时常用的书写载体，可以看成是扬雄用来记录各地方言的笔记本；至于“铅”，从文意上看，显然是用来书写方言记录的笔。

《东观汉记》卷十八称：“曹褒，字叔通。笃学有大度。常慕叔孙通为汉礼仪，昼夜沉思，寝则怀铅笔，行则诵文书。”曹褒是东汉山东薛邑人，与叔孙通是同乡。叔孙通是西汉高帝时人，对制定汉朝礼仪有贡献，深得刘邦赏识，因被曹褒尊为同乡先贤而倾慕。而曹褒亦笃学有大度，很想照叔孙通那样有所作为，故“昼夜沉思”，乃至“寝则怀铅笔，行则诵文书”，寝怀铅笔显然是为了思考成熟，心有所得，便随时记录下来。这里明白无误地说明曹褒使用的是铅笔。

《大唐书仪》称，当时记载典籍制度是“写以黄纸，界用铅栏”，即以黄纸书写，而其边栏界行则用铅来描画。由此可见，唐以前，至少是唐代的手写纸书，其边栏界行有的是用铅笔描画的。1986年，曾从敦煌遗书中取样检测和化验，证明这些类似铅笔描画的边栏界行，绝非金属铅所画。据此推测，描画边栏界行的材料极可能是石墨。石墨产于我国北方，很早中国人就懂得利用它。因其画出痕迹的颜色类乎金属铅，故被古时人们通称为铅。

版印书籍出现以后，特别是宋代以后，由于书籍生产方式的变化，典籍的版面设计与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手写纸书、帛书乃至竹木简书，随意性都很大，即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随意剪裁。印版书籍则必须受版面大小的限制，其边栏界行等版面设计，也就只能在一定面积的版片上运用匠心。


版印书籍的边栏界行，对于手卷纸书和帛书来讲，也带有继承的

含义和模仿的意味。雕印典籍不设边栏界行也可以做到行直字正、端庄整齐,后世印版书也有不带边栏界行的。但从宋到清,版印的典籍,除一部分没有边栏界行外,绝大多数都铸有边栏界行。这些边栏界行大致可分为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几种样式。四周单边,是指版面文字的上下左右四周被一条粗黑的墨线所圈围;左右双边,是指在左右粗黑的边栏内再各铸印一条细墨线,形成一版文字首行右边的界行线和末行左边的界行线都是双线;四周双边,是指在粗黑的边栏之内侧再环版面文字的四周铸印一条细墨线,形成四周都是双线。几种不同形式,反映着典籍刻印的精粗不同的水准,也构成了中国古代版印典籍版面的基本形式。这些形式,端庄大方,整肃古朴,给人一种端庄美。

到了明代,特别是明代后期书铺子刻印的戏曲、小说,为了形式与内容的更加协调,以赢得读者的青睐,达到易售和牟利的目的,不但根据书中内容雕印多寡不同、形式多样的插图版画,还在边栏和版面上尽量精心设计,又出现了花栏和点板等形式。所谓“花栏”,指的是四周边栏不再是一条简单粗黑的墨线,而是两道平行的细线,然后在这两道细线中间雕饰各种花纹,于是成了带有花纹的边栏。花栏中的纹饰也各种各样,有花草纹、竹节纹、云龙纹、博古纹等;有墨色单印的,也有蓝色单印的。看去耳目一新,别具特色。所谓“点板”,指的是雕板时随文刻上名人评点或句读,印出来的版面,在文字旁边带有若干圈点,用意是提醒读者注意和帮助读者断句,但也有一定的艺术效果;套版套色印刷技术出现以后,则在文字的版面上同时出现两色、三色乃至四色五色的不同符饰,具有强烈的工艺美术效果。

版印书籍的版面设计,除边栏界行外,还有“书口”及“象鼻”、“鱼尾”、“书耳”等。书口,也称为“版口”、“版心”,是指一版的中缝,为折叶时取做标准。书口有白口、黑口之分。“黑口”,即书口上下端铸印

有黑线；“白口”，则书口上下端不镌印黑线。黑口又有粗黑口、细黑口之分。粗黑口又称为“大黑口”，细黑口又称为“线黑口”。宋代刻书多是白口，南宋出现了线黑口。元代将细黑口夸张，成为粗大黑口。明代正德以前，刻书仍仿元制，仍是大黑口。嘉靖以后，伴随文学上的复古运动，刻书也复宋之古，又多为白口。清代刻书，黑口、白口兼而有之，但仍以白口为多。白口是刻书精细的表现。宋本书，很多在白口处有“鱼尾”、“象鼻”装饰性标志。

鱼尾，即书口中鱼尾形标志。其样式有单鱼尾、双鱼尾之分，还有黑鱼尾、白鱼尾之异，更有顺鱼尾、对鱼尾之别。其形象为 。鱼尾的作用是标识中缝线，折叶时容易取准。将其设计成鱼尾形象，既美观又实用。上下鱼尾之间常常镌印简化书名、卷第、叶码。因此，有人又把这种刻有文字的书口，称为“花口”。“象鼻”，指上鱼尾至上端栏线部分，于中缝处又镌印一道细墨线。象鼻旁边常常镌刻本版大小字数。下鱼尾下方部分常常镌刻刊工姓名。这是为了分清责任，计件论价，偿给工钱。变成粗黑口以后，大小字数及刊工姓名无处刻记，这层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书耳，是指书版左边栏上角外侧与左边栏上下平行的约一厘米宽、三四厘米长的空格，犹如书版之耳朵，所以称为“书耳”。书耳中常常镌印简单的题记，如《春秋左氏传》，则标记“僖公”、“隐公”、“哀公”；《诗经》则标记“关雎”、“豳风”、“鹿鸣”等，使人易于检索，所以又称“耳题”、“耳记”。

此外，书口上还有一些别出心裁的设计，如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有两种明版书，其书口有彩绘的画，系书籍装订之后，将书口撑成平面绘画上去的，平整放置时看不出有画，撑开则画面跃然，这虽不属于镌刊版面时的设计，但也是一种美化书口的装饰。至于后世藏书家在版印典籍上钤盖的闲章雅印，则更增添其审美情趣。

第二节 中国古代典籍的插图版画

中国的版画,起自典籍的插图,至今人们仍把“图”与“书”并称,大概就是由于自古以来中国的典籍就有图。清人徐康在其《前尘梦影录》中说:“古人以图、书并称,凡有书必有图。《汉书·艺文志》论语家有《孔子徒人图法》二卷,盖孔子弟子的画像。武梁祠石刻七十二弟子像,大抵皆其遗法。而兵书略所载各家兵法,均附有图。《隋书·经籍志》礼类,有《周礼图》十四卷……。是古书无不绘图。”

逮雕板印书盛行以后,这种有书有图的风气被继承了下来,这就是古代典籍中的插图版画。典籍的插图,是对文字的形象说明,它能给读者以清晰的形象的概念,从而加深人们对文字内容的理解。因此,插图版画随着雕板印制典籍的发生与发展,也就逐渐兴盛了起来。

采用雕板印刷术雕印插图版画,大约始自唐朝。王国维先生在五代开运四年(947年)雕印的独幅佛画《大圣毗沙门天王像》题记中说:“古人供养佛菩萨像,作功德,于造像、画像外,兼有制版,盖自唐时已然。”鲁迅先生在《木刻纪程小引》中亦说:“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又在《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专辑序》中说:“木刻的佛画,原是中国早先就有的东西。唐末的佛像、纸牌,以至后来的小说绣像、启蒙小图,我们至今还能看见实物。”这说明当雕板印书术刚刚兴起的时候,雕印的佛画随之就产生了,这可以说是我国木刻版画的滥觞。

关于唐代雕印佛教版画的文献记载和实物留存均不乏其见。唐冯贽《云仙散录》(也称《云仙杂记》)中记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唐玄奘受命去印度取经,始于唐太宗

贞观三年(629年),至贞观十九年(645年)携带着大批经夹从印度回到长安。以回锋纸印普贤像,当是他回国以后的事。可见七世纪中叶中国已懂得雕印独幅佛像画。其具体的绘画造诣、雕刻技巧、印制精粗等,因无实物流传,难以言状。但从流传于世的唐五代时期雕印的不同类型的佛画来看,可以证明这个时期雕印佛画是比较普遍的,其构图设计、人物绘画、雕刻刀法、印刷水平等,都有了相当的造诣。

1944年,成都东门外望江楼附近的唐墓中,出土了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雕印的《陀罗尼经咒本》,约有一尺见方。中间镌佛像一尊,四周刻古梵文咒语,周围又刻小佛像数尊,是一幅构图完整、图文并茂的木刻版画。按成都原称蜀郡,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升蜀郡为成都府。此咒本右首行印有“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一行,说明八世纪中叶以后佛教独幅版画的雕印已在西南地区流行。

到九世纪中叶以后,即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王玠为二亲祈福而印造普施的《金刚经》开了经文卷首配镌扉画的先河。这幅插图版画描绘的是释迦牟尼佛坐在祇树给孤独园经筵上说法的故事。长老须菩提,正是经文中所说之褊袒右肩,单膝着地,合拾恭敬而向佛言的形象;佛的左右,挺然屹立着两员护法天神,周围环立着许多贵人施主和僧众;经筵的前面,卧着两头勇猛的狮子,用来表现佛法无边;连猛兽也足以度化降伏;图的上部,在微风吹拂的幡幢上,两位仙女驾着祥云飘然而来。整个构图,中心突出,错落有致。释迦牟尼佛妙相庄严,胸藏万法;长老须菩提虔诚聆听,神态怡然;天神尚武,护法坚贞;众僧垂目,凝神恭听;雄狮欲出,但又囿于佛法,无可奈何。各种形象都有自己的特点,但都栩栩如生,生动传神,呼之欲出。不但在绘画技法上表现了中国画传神的特点,在雕刻刀法上、线条描摹上,也与绘画相辅相成,融为一体。这幅作品,不但表明在九世纪中叶,即唐代晚期,我国的木刻版画已进入一个相当成熟的时期,而且在典籍

插图版面的形式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佛经,无论单经大藏,其插图版面多取卷首扉画的形式,盖缘此而通行。此经原出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二十世纪初被斯坦因携往英国,今藏大英博物馆,是现存最早而又相当成熟的印刷品。

进入五代之后,不但政府组织力量校刻儒家经典,西北边陲的地方节度使也主持刻印佛经、佛画。五代后晋开运四年(947年),西北瓜沙、敦煌地区的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就请人雕印过《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等。《大圣毗沙门天王像》描绘的主人公毗沙门天王在佛教中是护法天神,即所谓四大金刚中神通广大的北门天。传说在唐代天宝元年(742年)不空三藏作法,请毗沙门天王显圣,因此平息了外患,所以在唐代毗沙门天王被奉为军神。画中一个健壮的地神从地下露出半个身子,用双手擎住毗沙门双足;毗沙门右手执附旗长戟,左手托着供奉释迦牟尼的宝塔,头戴宝冠,旁附羽翼,双肩喷射火焰;腰间紧窄,横佩长剑,肩披长甲,铠片鳞鳞,目光炯炯,胡须上翘,表现毗沙门天王的尚武精神、强悍性格和无穷威力。画上,辩才天女手捧花果侍立于左,童子与罗刹侍立于右,面目狰狞的罗刹右手高举着一个婴儿,表现毗沙门天王能随时变化婴儿、普度众生。整个构图中心突出,结构严谨。刻划线条刚劲而不呆板,人物神态各具特色。图案下面分界刻印题记十行。上图下文,图文并茂,开典籍插图上图下文形式之先河。

《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是与《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同时刻印的。两幅佛画刻于同年同月同日,又都是上图下文的形式。这些珍贵的印刷品,现藏大英博物馆和英国图书馆东方手稿部。

与此同一时期的,还有吴越国王钱俶于北宋开宝八年(975年)雕印的《一切如来心秘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也称为《雷峰塔经》,这是吴越国王为宠妃黄氏祈福而镌雕藏献杭州雷峰塔的佛经。这部佛经从五代后周时开雕,一直延续到向北宋投降纳土之后。这部

经卷现藏北京图书馆,也是卷首镌印扉画,内容是描绘吴越国王宠妃黄氏礼佛的故事,镌刻线条简练,构图布局紧凑。此后,宋代雕印的《开宝藏》、辽代雕印的《契丹藏》、金代雕印的《赵城藏》等,也都是卷首镌印扉画的形式。这与当时的藏经都是卷轴装有关,这种装帧形式的典籍,插图设置在卷首,不但显要、省目,也最方便。在尔后雕印的佛经版画中插图形式又有许多创新,出现了在经卷中间插图或连续插图的新式样,有的上图下文,有的左图右文,有的内图外文,有的不规则插入,形式多样,但目的都是为了形象通俗地解释经中故事,如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江苏地区刻印的《陀罗尼经》就是这种形式,一幅图版,分数段描写故事内容,这种卷中插图的形式,又开了以后典籍插图形式的先河。如皇祐元年(1049年)刊印的高克明绘画的历史故事《三朝训鉴图》十卷,嘉祐八年(1063年)刊印的相传为顾恺之补图的《列女传》八卷,崇宁二年(1103年)刊印的将作少监李诫撰绘的《营造法式》三十四卷,大观二年(1108年)刊印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乾道间刊印的《六经图》,以及《群书类要》、《博古图》、《梅花喜神谱》、《忘忧清乐集》等等,都是书中带有连续插图或多幅插图的实例。

与宋同时的辽、金地区,刻印的典籍中也多有精美的插图版画。山西应县木塔出土的辽刻佛经,有七件也带有卷首扉画,大约都刻在当时的析津府(——今北京)。金代的山西平水,也称为平阳(今临汾),是金代的刻书中心之一。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由书轩陈氏刻印的《铜人腧血针灸图经》五卷,明昌三年(1193年)刻印的《新刊图解校正地理新书》十五卷,泰和四年(1204年)平水晦明轩张氏刻印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三十卷,贞祐二年(1214年)嵩州福昌孙夏氏书籍铺刻印的《经史证类大本草》三十一卷等,都带有精美的插图版画。西夏虽偏居西北,但雕刻的佛经插图版画也十分精细。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当年沙俄地理学会组织以科兹洛夫大佐为首的探险队

到中国西北进行所谓探险,从黑水城西夏旧都遗址发掘并携走许多西夏典籍。其中有一幅我国现存最早的招贴画,名《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也称为《四美图》(图 24,见 259 页),是金代山西平水地区刻印的作品。其内容是描绘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四位美人:一位是汉成帝皇后,能歌善舞的赵飞燕;一位是怀抱琵琶出塞和亲的王昭君;一位是才华出众、继班固完成《汉书》写作的班姬;一位是晋代石崇的爱妾绿珠。构图画面富于变化,人物形象生动自然。赵飞燕、绿珠居前,王昭君、班姬在后。绿珠面左朝正,其余三人均面右朝正。但衣裙都向左飘斜,仿佛都在微风中款步徐行。画面显得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人物的背后又布置有玉阶、雕栏、假山、牡丹,并细饰花边、鸾凤,因此使画面又显示出贵夫人深居宫苑的庄重,却又有兴致萧然的气氛。线刻精致入微,敷墨协调自然,是我国木刻版画中带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

十二世纪初叶,金代山西崔法珍断臂募刻的《赵城藏》,每卷前也都镌印卷首扉画,描绘如来佛偏袒正坐,头肩圆光,妙相肃然,与佛弟子说法;左右侍立弟子十人,一人仰首合拾,聆听佛法,其余亦各具神态;两角分别侍立一戎装金刚,以示护卫。构图严整,线描有力,代表了北方雄浑豪放的风格。

元代的刻书事业有独特的发展。插图版画也有不少杰作,可惜流传下来的并不多。现存的如插图最丰富的《事林广记》、上图下文的《虞氏平话》五种、卷帙较大的《全相成斋孝经直解》、铺陈考究的《博古图》、精巧别致的《绘像搜神前后集》及《竹谱详录》等,绘画与雕印均极精湛,堪称元朝版画的代表作,足资珍视。

《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是元朝上图下文插图本之一。前有“至大改元(1308年)孟春既望宣武将军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小云石海涯北庭成斋自序”。“小云石海涯”为“贯酸斋”之别名,说明是书系该斋刻印。《孝经直解》根据其十五篇的内容构图印版十五幅,始于



图 24 金山西平水刻四美图

“仲子居，曾子侍”，终于“卜其宅兆，而安措之”。整个插图刀法浑厚有力，人物形象比例适度，位置布列颇具匠心，环境配景也极为协调，插图中连环的风格也相当成熟。

建安《虞氏全相平话五种》，是元代小说带有插图的代表作。每一对页一图，每图各有小标题。在绘画技巧上，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富于变化；环境布置主次得体，构图连续有序；雕刻的刀法圆润爽朗，韧而有力，婉丽中又显出浑朴；印制精细，敷墨有度，黑白分明。这一上图下文连续形式的插图版画，继承了唐五代及两宋优秀的传统经卷插图版画的风格，自身又独创新意，别开生面，把经卷插图形式和技法又加以发扬，完成了这一划时代版画发展的历史使命，也奠定了明代版画的根基。

建安椿桂书院刻印的《事林广记》四十二卷，开本宏朗，书品考究，插图繁伙。《故宫周刊》合订本第十六册曾刊印过两幅《事林广记》的插图：一为两位贵官对坐，做双陆之戏；床后侍立二人，一捧仗，一捧盃；旁陈一几，上列酒茗杯箸；人物背后以屏风为衬景，屏风上绘牡丹、孔雀，一只黑色的猎狗正由屏风后面转出。另一幅亦是两位贵官，分左右而坐；侍者跪地献酒果；床后侧是乐队，正在拨弦吹奏；床左右各立一只黑白猎狗。刀法浑厚古朴，黑白对照鲜明；人物的面形神态、衣着陈设布置得都很合理，且都有猎狗出现，既反映了蒙古族游牧生活的习惯，也表现了蒙古贵族的作风，反映了当时蒙古族上层社会的生活。

明初久经丧乱之余，社会经济、文化生活都曾一度困难，这在雕板印书和插图版画上也都反映了出来。如明洪武初年民间雕印的《天竺灵签》，经折装，以厚黄纸双面印刷，构图较粗，人物也仅具形象。这显然是兵戈初定、物力艰难的表现。

到永乐元年（1403年），明王朝已经经过三十多年的恢复，社会经济、文化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此期由三宝太监郑和刊印、姚广孝

为之作跋的《佛说摩利支天经》扉画,则已富丽精工,堪称永乐时版画的代表作。永乐十八年(1420年),又刊印了道家的《天妃经》,扉画以天妃像为主,侍从诸人,冠履显赫,气象森严,刻印极为工整。其他如《观音经普门品》、《鬼子母揭钵图》、《佛说阿弥陀经》、《礼三十五佛忏悔法》等,亦都是明永乐时版画或插图版画的佳作。与此同时,其他典籍的雕印与版画插图,也出现了不少好的作品,如《考古图》、《全相二十四孝诗选》、《道学源流》、《濂溪集》、《老子道德经》、《广信先贤事实录》、《阙里志》、《吴江志》、《石湖志》、《安骥集》、《武经总要》、《云庄集》、《欣赏编》等,都带有多寡不同的版画。这些典籍的插图版画,其人物须眉、衣服皱折等线条刻划,还有极为明显的以刀代笔的痕迹;特别是阴刻的线条,刻工信手刻划的迹象更为明显。正是这些特点,使明初版画在发挥线描、强调阴刻及版面的黑白对比上都有大胆的创新,使版画艺术迈出了新的步伐。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特别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城镇居民急剧增加、手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作为文化活动的刻书事业也进一步商业化,适应城镇居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小说、戏曲作品层出不穷。为了使这些戏曲、小说更加富于形象化,根据小说或戏曲中人物、场景和情节的描写,绘制镌刻相应的插图也越来越丰富多采。弘治十一年(1498年)金台岳家书籍铺刊印的《奇妙全相西厢记》,卷尾镌印了一幅广告性的推销说明:“本坊谨依经书重写绘图,参订编次大字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这一广告说明书商为了推销自己的出版物,很会摄取各类人物的心理;另一方面也说明那时的闲游坐客,来往客商,已形成明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也正需要有这类典籍来满足精神文化的需求。因此,明代中叶,特别是嘉靖以后,带有丰富插图版画的戏曲、小说,不但数量多,质量和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如《西厢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琵琶

琵琶记》、《牡丹亭》、《玉玦记》、《汉宫秋》、《拜月亭》、《荆钗记》、《白兔记》、《金瓶梅》、《西游记》、《燕子笺》、《一捧雪》、《邯郸梦》、《四声猿》、《七十二朝人物演义》、《仙媛记事》等等，无不带有精美的插图。仅以《西厢记》为例，就有弘治金台岳家刊本《西厢记》，李卓吾评本《西厢记》，万历起凤馆刊本《西厢记》，闵振声本《西厢记》，徐天池评本《西厢记》，崇祯汇锦堂刊本《西厢记》，金陵萧腾鸿刊本《西厢记》等等，插图版画描绘的张生待月西厢，翘首企望，景物浴月，花木扶疏，偶然花影摆动，便疑即莺莺的急切神态与心情表现得维妙维肖，这无疑是张生与莺莺爱情故事的形象说明，比光读文字更会吸引读者。戏曲的插图更多，仅郑振铎、赵万里等编汇的三集《古本戏曲丛刊》，所收明代插图版画就有三千八百余幅，足见明代中叶以后版画之盛。这些插图不仅在构图布局、插图形式、镌刻刀法等方面充分发挥了中国绘画和雕板印刷的特点，并且进行大胆革新，使版画的艺术造诣更臻完美。

明万历以后，版画艺术进一步发展。在北京、金陵、徽州、杭州、建阳等地刻书和插图版画的镌印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同时，同一地区的刻书和版画风格又逐渐趋于一致，于是又出现了以地域划分的不同流派，如徽州派、金陵派、建阳派等。尤其是徽州虬村黄氏一家出现，徽派形成，则一改往时大刀阔斧的刀法和结构粗犷的构图，形成了婉丽细致的风格。徽州刻工主要集中在歙县和休宁两地，著名的出版家和刻手主要是黄、汪两家。其余如程氏、方氏、陆氏、吴氏等，也都很有名，并分别创造出很多不朽的作品。如万历十年（1582年）黄挺刊印的《新编目连救母行孝劝善戏文》插图，笔致章法尚属豪放有力。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黄玉林刊印的《仙媛记事》插图，便变得清秀婉丽，是徽派插图版画由豪放向婉丽转变的划时代作品。到万历三十至四十四年（1602—1616年），黄应光刊印、陈继儒选编之《乐府先春》，徐文长评本《西厢记》，李卓吾评本《玉合记》，以及《琵琶记》、《小瀛洲社会图》、《昆仑奴》、《元曲选》等插图，均已工致异常。这些插图

版画,以独具匠心的构图方式,栩栩传神的人物形象,巧妙协调的场面和布景,隽秀流流畅的刀法,墨色匀净、对比鲜明而又阴暗自然的印工,把插图版画的艺术推向了高峰,把中国典籍的印制工艺也推向了新的水平。

清初,无论是官刻典籍的插图版画,还是民间坊刻典籍的插图版画,在吸收明末版画艺术技法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和发展,也创造出不少杰作。如钦天监五官正焦秉贞手绘、鸿胪寺属班朱圭付刻的《耕织图诗》,王翬、宋骏业、冷枚、王原祁等创作的《万寿盛典图》,乾隆时两江总督、总理河防大臣高晋集辑的《南巡盛典图》,以及《圆明园诗图》、《避暑山庄诗图》、《八旬万寿盛典图》、《皇朝礼器图式》、《皇清职贡图》、《棉花图》,以及西洋郎世宁等绘制的乾隆《十六战功图》等等,都是此期官刻典籍带有插图版画的名著。这些版画虽然在取材和构图等方面都受到统治者的钳制,但从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来看,却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清初一些供奉内廷的画家,深受西洋画法的影响,在写实、构图等方面,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画法相结合,创造出许多形象逼真、透视科学、布局清晰的好作品。这些都是清初官刻版画不同于传统版画的特征。

清初除了官刻版画大有发展外,民间版画更有长足的进步。如顺治二年(1645年)大画家萧云从刊绘的《离骚图》,五年(1648年)刊绘的《太平山水图画》,在人物表现方面继承了前代优秀的传统技法,在置陈布势中又创出了新的风范,显示了独特的风格。

在清初官私版画大力发展的同时,插图版画在戏曲小说中更有别具风范的发展。如长洲四雪堂主人褚人获重编的《隋唐演义》中,就有古吴赵澄绘,王祥宇、郑子文手刻的插图百幅。其他如《封神演义》、《东西汉演义》、《东西两晋志传》、《西游真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水浒后传》、《玉娇梨》、《平妖传》、《遗香三国志》、《三国志演义》、《忠义水浒传》、《秦楼月》、《桃花扇》、《长生殿》,以及附有大幅对

版插图的《天马媒》等,都有艺术水平很高的插图版画。

第三节 中国古代典籍的装帧形制

中国古代典籍装帧形制的演变,与典籍的制作材料、制作方法、便于检阅、利于保护等方面的发展变化紧密相关。例如,甲骨文书的装订,据考古学家们考证,采用的是中间钻孔用绳串连的办法,这是由甲骨这种材料的特质所决定的。正规的典籍产生之后,其制作材料先后有过竹木简、缣帛和纸张的变化;其制作方法先后有过刀刻、手写和印刷的不同。受这两大因素的制约,中国典籍的装帧形制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就迄今的研究所知,中国古代典籍的具体装订形式,先后流行过简策、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毛装等十种形式。而其中某种装帧形制的形成、流行与演变,又几乎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或文化背景。

一、简 策

简策,最简明的诠释就是编简成策。策是册的假借字。古代有些词有音无字,行文时只好依声托事,借用同音的字加以表示。这种现象,文字学上称为同音假借,也称为古音通假。“册”是象形字,像是绳穿、绳编的竹木简。《说文解字》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礼记·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意思是说古人写东西超过一百字者,方板上写不下,就要写在编连好的竹木简策上;如果不足一百字,就可以写在方木板上。对于“百名以上书于策”,有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作了解释,东汉的郑玄说:“策,简也。”唐代的孔颖达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郑玄的意思,“策”就

是竹木简；孔颖达的意思，“策”是编连在一起的竹木简。两个人的解释都对，但角度不同。把这两个人的解释综合起来，就是一根一根写了字的竹木片就称为“简”，将若干根简依文字内容的顺序编连起来就成了“策”（册）。可见简策的确切含义的确是编简成策的意思。

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竹木简上端钻孔而后单绳串连；一种是视竹木简的长短，用两道绳或三道绳编连（图 25）。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栝也，编之如栝齿相比。”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连，其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栝齿相比。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木简。编绳需要几道，取决于典籍所用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长简也有用三道、四道编绳的。甘肃出土的《永元器物簿》就是两道编绳。先写后编，先编后写，两种情况都有。

图 25 简 策

为保护正文不致磨损，古人编简时常在正文简前边再加编一根不写文字的空简，叫作“赘简”。今天书籍的封面，就仍然带有这种赘简的遗意。赘简的背面上端常常书写典籍中的篇名，下端书写典籍的书名。这是因为古人著文于简，不能无阶段地写下去，那样编简太大，不易检阅和收藏，所以写到一定长度就得结为一篇。而用书的人也常常要先查找篇名，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所要检索的内容。古代典籍也往

往是一书包括很多篇,例如《论语》就有二十二篇,《孟子》也有七篇。如果所要查找的内容不知道在哪一篇,那就无从着手,所以古人很重视篇名,把篇名写在赘简上端,以示醒目;而把书名写在赘简的下端,以示篇名的归属。这种格局虽然是仅适应简策典籍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典籍形式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直到雕板印书盛行的宋代,特别是北宋时代,卷端题名还常常小题在上,大题在下,显然是简策典籍格局的流风余韵。

简策书籍的卷收方式,也因其特定的质材而有特定的形式。一篇文章的简编完,或一编编好的简写完,便以最后一根简为轴,像卷竹帘子一样从尾向前卷起。《永元器物簿》出土时,就保持着原来卷起的形态。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出土时有的也保持着卷起的原型。武威出土的《仪礼》简,篇题和篇次并写在第一、二简的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外面,这也证明其原型是从尾向前卷起的。卷起的简需要捆好,而后放入布袋和筐篋。居延出土的简中就有“书篋一”的记载。《汉书·贾谊传》中也有“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篋”的说法。这些盛装简策的布袋、筐篋相当于“帙”,而一帙通常包函十卷。简策书籍这种编连卷收的做法,是适应竹木简的特质而形成的特定形式,其对后世典籍的装帧形式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出现及长期流行,完全可以说是对简策卷起收藏形式的模仿。

二、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竹木简书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式上彼此却有许多相同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较强,表现在装帧形式上便既有折叠,也有卷子。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之后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

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一条 2.3 厘米宽的竹片粘于帛书的末尾,然后以此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卷轴装的雏形。

清代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这两段话都说明篇、章是竹木简典籍的计量单位和名称,卷则是缣帛典籍的计量单位和名称。周秦时盛行竹木简书,故多以篇章称之。入汉以后,缣帛为书普遍流行,卷便成了广泛使用的计量名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凡是整理完毕正式誊录进呈的书,都是用缣帛书写的。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于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上素”,就是誊写在缣帛上,因而卷也就成了主要计量单位。由此可证,章学诚所说的“入汉始有卷也”的说法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这也证明帛书的装帧形式主要还是卷子装。

三、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制作典籍,至晚东汉已发其端。纸具备有缣帛的轻软,但较之缣帛则更易成形,所以纸书出现以后,其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而慢慢发展成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晋代傅咸的《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方正洁白、便于书写之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两句话既是对纸的性能的夸赞,也是对卷轴装典籍特点的描绘。纸张有一定的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可是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

卷轴装典籍固有的现象,也是这种装帧形式的弊病之一。可见,晋时的纸质典籍已是卷轴装了。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文帝时有一位沙门叫明穆彦宗,他曾经利用梵文经本校对佛经。说昔日“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三十成部”。说明早在隋朝以前纸写的佛教《大集经》已装潢成了卷轴。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朝另一位沙门法泰,他自己精勤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带到成都去进行装潢。可是中途过河掉入水中,以后又失而复得,所以“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可证隋朝时的典籍不但已是卷轴装,而且所用的轴材有的已是檀香木了。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当他翻译完毕并装帧完好之后,曾经上书皇帝,请求御制一道序文,谓:“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可见唐玄奘翻译过来的佛经,其装帧形式也都卷轴装。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他一个人就“写经三千余轴”。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唐及唐以前关于纸书采用卷轴装的记载,而唐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则更是史不绝书。北宋欧阳修《归田录》说:“唐人藏书,皆做卷轴。”元朝吾衍《闲居录》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听雨记闻》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天禄识馀》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所有这些说法,也证明自纸书出现,直到隋唐五代,大约近千年的时间里,典籍盛行的装帧形式,的确是卷轴装。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现了大批遗书,其中主要是写本佛经,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国,其中主要分藏在英国、法国、中国、俄国、日本、印度等国,总计大约四万 multiple 件。这些敦煌遗籍产生的时代,大约

上起南北朝,下迄五代,即公元420—960年这五百多年的历史跨度内。此时正是手写纸书的高峰期。这些遗籍,有的就是简单的一卷,有的木轴犹存,证明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的纸书装帧形式的确普遍流行卷轴装(图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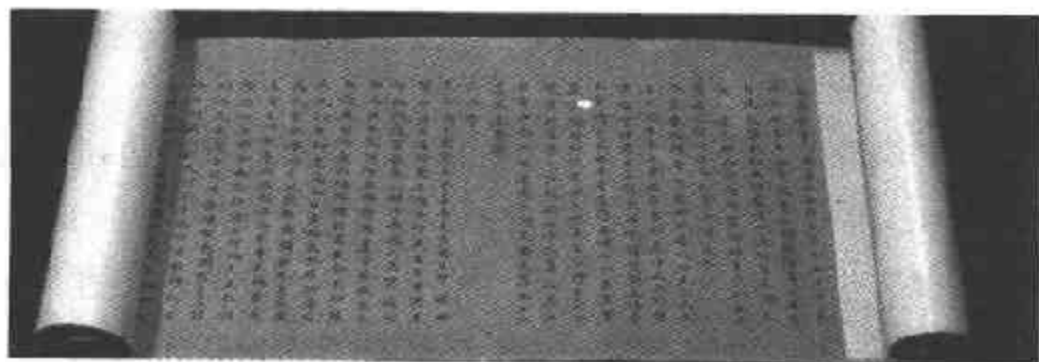


图26 卷轴装

古时历代纸张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晋代纸高大约23—24厘米,长26—27厘米;唐代纸高25—26或26—27厘米,长40—43厘米或44—51厘米;五代时纸张的规格大小不等。内容多的书,一张纸容纳不下,只好写完一张再接写一张、两张、三张……,直到写完为止,可能是几张、十几张、几十张,乃至数百张。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典籍,按顺序粘接成一幅长条。长条可以先写后粘接,也可以先粘接好后写。写完的长条典籍,即可从尾向首卷起。为使纸卷不致于折皱或损坏,在长条纸书最后一纸的末尾粘上一根圆木棒,然后以木棒为轴心从左向右搓卷,所以称作卷轴。轴的长度比纸的高度略长,纸书卷好后上下两端都有轴头露出,以利典籍的保护。

典籍的卷轴装似乎也有精装、简装之分。简装,只用一根普通圆木棒为轴,甚至连轴都没有,只是从尾向前卷起,也是卷轴装。精装则有不同的讲究,据记载,王羲之、王献之在缣帛上写的字,要以珊瑚装饰轴头;在纸张上写的字,要以金属装饰轴头;最次的也要以玳瑁、旃

檀装饰轴头。可见晋代的卷轴装,有的已经相当精致。

据《隋书·经籍志》载:隋炀帝即位之后,秘阁所藏之书,上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琉璃轴;下品用漆轴。表明隋朝政府的藏书,其卷轴装潢已分出不同等级。《大唐六典》记载唐政府的藏书,经库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可见唐代政府的藏书不但裱轴十分考究,而且已经用颜色来类分图书了。

为保护典籍内容不受污损,卷轴装在正文第一纸前边还要粘接一张空白纸,讲究的粘接绫、绢等丝织品。粘接的这张空白纸或绫、绢,叫作“褙”,也叫作“包头”、“包首”或“玉池”。褙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带。带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别子,叫作“签”。卷子卷好,褙在最外层,用带绕捆,以签别住。

卷轴存放的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轴的一端向外,系上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书签。签上标写书名、卷次,以便于取阅。取阅图籍时,依签上所标示的书名卷次抽出卷轴,用毕原位插入,所以称为插架。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邨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描绘的便是一座插架宏富、装帧考究、满目琳琅的私人藏书宝库。邨侯指的唐京兆人李泌,德宗时封为邨侯,家富藏书。韩愈和李泌是同时代人,见过他家的藏书,故有上述的诗句。

四、经折装

经折装也称“折子装”,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如前所述,到唐代为止,最盛行的典籍装帧形式仍然是卷轴装。唐代,佛学在中国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僧尼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轴装的佛经典籍使用之不便

可想而知。因为任何一种卷轴,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如果不及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朝中间卷起,影响阅读。因此,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发生。这就是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使之成为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这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此后凡仿此装帧形式者,不论其内容是否为佛经,便都以经折装呼之。元朝的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代的高士奇在《天禄识馀》中又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可见,经折装的确是由改造卷轴装而来。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披露了一幅唐写本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共二百一十一叶,原出自中国敦煌石室,其装帧形式就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图27),这是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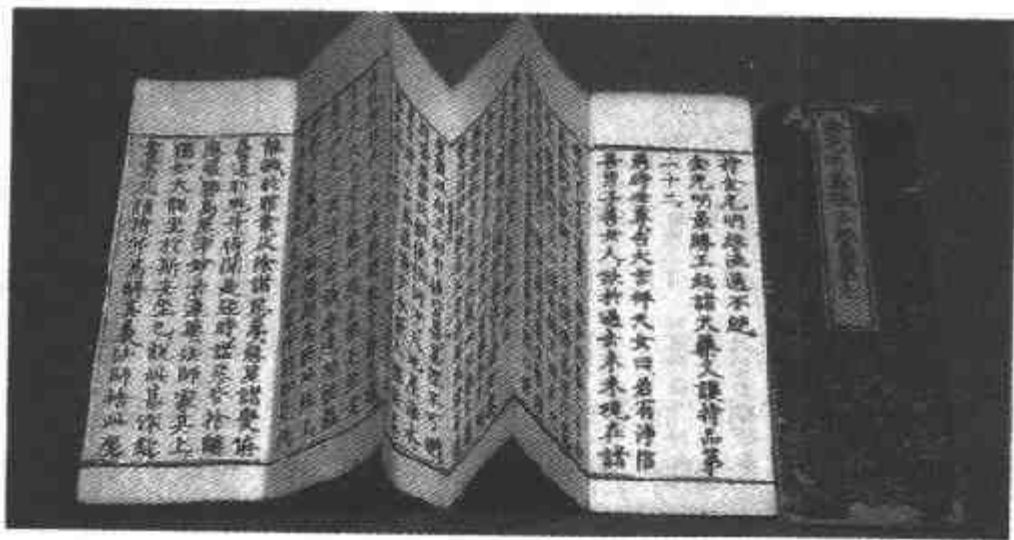


图 27 经折装

英人斯坦因在他的《敦煌取书录》中,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949年也。”斯坦因看到并描绘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而成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是经折装了。五代以后,雕印的佛、道两家的单经、大藏,采用经折装的比比皆是。可见在中国古代典籍的装帧形制中,经折装流行的时间是很长的。在这种装帧形式的影响下,连大臣奏书也取这种折子本形式,故称奏折,至少清代这种奏折是很流行的。旧中国童蒙入学私塾,练习小楷就写在白色狭长的折本上,故也称写白折子,显然这种“白折子”也来自经折装式。

五、梵夹装

在古代典籍的装帧形制中,还有一种被称之为“梵夹装”的。有些书史论著将其混为经折装,说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或者梵夹装就是经折装,经折装就是梵夹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梵夹装原本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形制,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称呼。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历史时期都是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所以又称为“贝叶经”。

书籍的装帧形式,只能视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而采取相应方式。古印度佛经既是采用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书写,其装帧形式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梵夹装的方式。所谓梵夹装,就是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佛教经典而采用夹板式以绳穿订的装式。

隋朝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

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箠”(图 28)。由杜宝的这一记载可见,“梵夹装”是隋朝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形象化称呼。其具体的装订方式,是将写好的贝叶经视段落和贝叶多少依顺序排好,用两块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经叶上下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在中间)或两个(居两端靠里)洞,穿绳绕捆,梵夹装式即装帧完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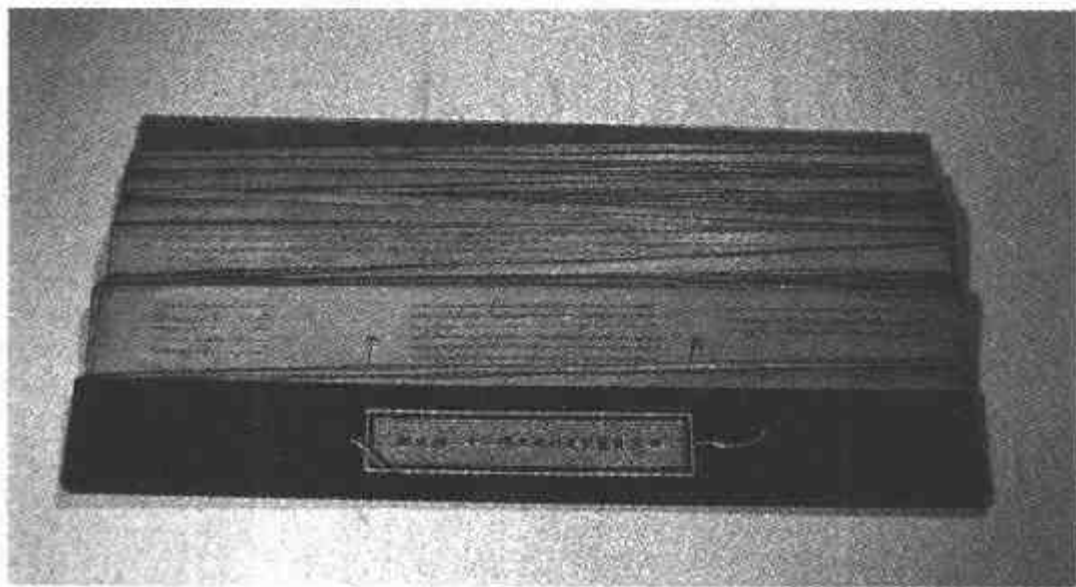


图 28 贝叶经梵夹装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是古印度如此,近世中国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印证了梵夹装形式的特点。

中国以纸张来制作典籍,至隋唐而极盛。书籍的制作材料与贝叶不同,装帧方式也就不同。纸制典籍中,包括写本和印本,也有裁成长条而模仿贝叶而采用梵夹装式的。出自中国敦煌石室、今藏于大英图

书馆东方部的《禅门经》，是唐代晚期或五代初期粗厚麻纸写本，双面书字，共十九叶三十八面。书叶为长条状，每叶第三行的界行线上，距上边栏三分之一距离处、距下边栏三分之一距离处各有一个圆孔，这两个圆孔就是当年穿绳连书、绕捆书叶用的。这显然是中国纸写佛经模仿梵夹装的实物留存。

大英图书馆东方部还收藏一件《佛经疏释》，亦是麻纸书写，其书写时间亦不会晚于五代。每面六行，每行字数不等，书叶上也有两个圆孔，圆孔边缘还有绳磨的痕迹。这显然也是中国纸写佛经仿制梵夹装的遗存。该馆还收藏一件《唯释三十论要释》，亦是中國纸写典籍仿制梵夹装的遗籍。

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麻纸书写，长条形似仿贝多树叶。其装帧是典型的梵夹装(图 29)，现尚有一块夹板、一段穿绳留存。夹板与书叶上都有一圆孔；穿绳一端露在夹板外面，挽有较粗大的疙瘩，另一端仍串连着夹板和书叶。这是迄今所见到的中国纸书梵夹装最典型的实物。



图 29 纸书梵夹装

后世纸书梵夹装有所变化，如北京图书馆所藏五代时用回鹘文

书写的《玄奘传》，虽无穿绳的圆孔，但书页两端各画有一个红圈，这显然是钻孔的位置。无论是未来得及钻，还是示意性象征，都是一种变了态的梵夹装。北京图书馆还藏有蒙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以及清朝宫里用泥金书写的佛经。这些佛经都是长条纸叶，上下都有厚重木板相夹，但决无钻孔，而是用黄绫相裹或宽带绕捆。这显然也是变了态的梵夹装。这些事实证明，不管是古印度的梵夹装，还是中国纸质典籍仿制的典型的梵夹装，或变了态的梵夹装，都跟经折装毫无相同之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经折装的另一种独特的典籍装帧形制。

六、旋风装

“旋风装”是纸质典籍另一种装帧形制。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外学者对中国古代典籍的旋风装并不清楚，长期把经折装粘加一张整纸便说成是旋风装，或径把旋风装说成是经折装的别称。事实上，旋风装跟经折装没有任何联系，它与经折装产生的历史背景也完全不同。“旋风装”与“经折装”是同在卷轴装的基础上，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而产生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典籍装帧形式。

“旋风装”的出现，与唐代诗歌的发展，特别是近体律诗的发展密切相关。近体律诗的创作，一方面要求有严格的韵律，一方面遣词造句、运用掌故又要求典雅有据，这就促使备查检掌故使用的类书空前发展，供起韵赋诗、检查格律用的韵书一再被修正、增补、传抄而流布社会。唐朝的韵书类乎现在的字典，带有工具书的性质，是备随时查检使用的。因此，这类书籍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都要以方便随时翻检为原则而作相应的改变，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既未完全突破卷轴装的装帧形制，又达到方便翻检目的的装帧形式，这就是旋风装。

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是现存中国古代典籍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全书共五卷二十四叶，除首叶是单面书字外，其余二十三叶均为双面书字，所以共是四十七面。其装帧方式，是以一比书叶略宽的长条厚纸作底，然后将书叶粘在底纸上。其粘法是，除首叶因只单面书字而全幅粘裱于底纸右端之外，其余二十三叶因均是双面书字，故每叶都只能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从书叶左端看去，错落相积，状似龙鳞。收藏时，从右向左卷起，捆牢，外表仍是卷轴装式。但打开来翻阅，除首叶因全裱于底纸上而不能翻动外，其余均能跟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叶翻转阅读两面的文字。这种装帧形式，既保留了卷轴装的形制，又解决了翻检必须方便的矛盾，可谓独具风格，古人把这种装帧形式称作“旋风装”或“龙鳞装”(图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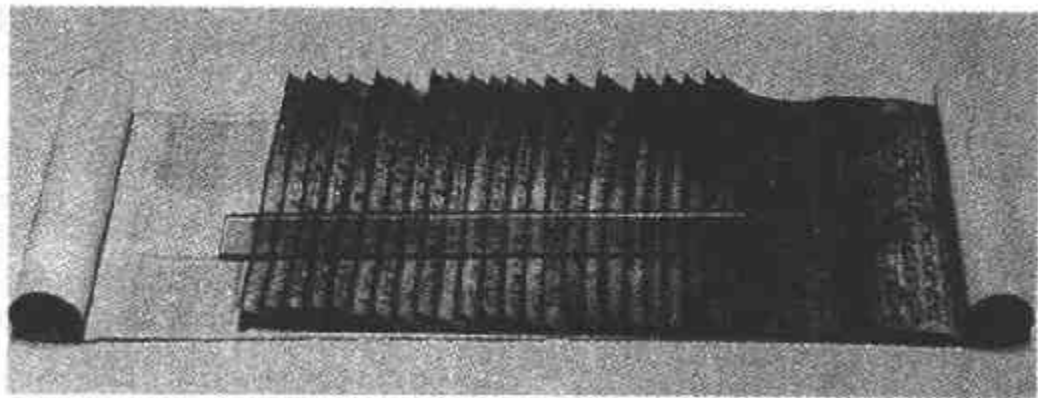


图 30 旋风装

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郢《彩选》之类是也。”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相传就是吴彩鸾书写的，欧阳修所见的大概就是这类的东西。他说出了这种装帧形式产生的原因，也描绘了这种装帧像策子的特点，但未说出其当时的名称究竟是什么。

到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则在自著《墨庄漫录》卷三中说:“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名字,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十六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可见南宋张邦基也见过这类的东西,他则把这种装帧形式称为“旋风叶”。

元朝王恽在他的《玉堂嘉话》卷二中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称谪仙也。一夕书《唐韵》一部,即鬻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所可及也。时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其册共五(疑五为二误)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可见元朝王恽也见过“鳞次相积,皆留纸缝”的装帧样式,而且见到的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收藏并写有上述题识的那件东西。王恽记载它是二十四叶,是“龙鳞楷韵”、“鳞次相积”,与故宫所藏相传吴彩鸾书写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之装帧形态完全一样。

清朝初年著名的藏书家钱曾,也见过旋风装的吴彩鸾所书《唐韵》。《涵芬楼烬余书录》引证他的话说:“吴彩鸾所书《唐韵》,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正作旋风叶卷子,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可见钱曾所见到的,跟故宫所藏相传为吴彩鸾所写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也是完全一样的。他把它称之为“旋风叶卷子”。

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外表虽仍是卷轴装式,但内中书页错落相积,朝一个方向卷收,很像空气分若干层朝一个方向旋转旋风。这种形式,显然不是经折装,也不是经折装粘连一张整纸的旋风装,而是独具形态的中国古代典籍的旋风装。旋风装有自己的独立形态,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卷轴装的制约。它是对卷轴的一种改进,是卷轴装向册叶装转化过程中的过渡形态。旋风装比经折装出现得要早,旋风装大约出现在八世纪,经折装大约出现于九世纪。

七、蝴蝶装

我国唐代已有了雕板印书技术,五代已由政府主持雕印了《九经》。宋代统一以后,雕板印书事业更加得到空前的发展。这种典籍生产方式上的巨大变化,必然引起典籍装帧形式的相应变化。清初著名藏书家钱曾在《读书敏求记》中曾慨叹“自北宋刊本书籍行世,而装潢之技绝矣”,正反映出典籍生产方式的变革对典籍装帧形态变化的深刻影响。

北宋以后的典籍生产,主要是采用雕板印制。雕板印制书籍与手写书籍不同,手写书籍可以随意自裁;雕板印书必须将一书分成若干版,一版一版地雕刻印刷,印出来的书实际上是以版为单位的若干单叶。所以,雕板印刷的典籍必须经过装订。继续采用已有的卷轴装式、经折装式、旋风装式,不但浪费不必要的粘连、折叠手续,也不适应更加发展了的社会文化需求。于是一种既适应雕板印刷,又方便阅读的“蝴蝶装”出现了。

蝴蝶装也称“蝶装”。这种装帧的具体做法是,将每张印好的书叶以版心为中缝线以印字的一面字对字地折齐,集数叶为一叠,以折边居右整齐成为书脊,在书脊处用浆糊或其他粘连剂逐叶彼此粘连;再用一张硬厚整纸,中间折出与书册厚度相同的折痕,粘在抹好浆糊的书脊上,作为前后封面,也叫书衣;最后再把上下左三边余幅剪齐,一册蝴蝶装的书就装帧完成了。这种装帧样式,从外表看很像现在的平装书,打开时版心好像蝴蝶身躯居中,书叶恰似蝴蝶的两翼向两边张开,看去仿佛蝴蝶展翅飞翔,所以称为蝴蝶装。

蝴蝶装适应了印制书籍一版一叶的特点,并且文字朝里,版心集于书脊,有利于保护版框以内的文字。上下左三边朝外,则均是框外余幅,磨损了也不致于伤害框内文字,且也好修理。同时没有穿线针

眼和纸捻订孔,散了重装也不致于损坏。正因它有这些优点,所以这种装帧形式在宋元两代也流行了将近四百年。《明史·艺文志序》说,明朝秘阁所藏的典籍,都是宋元两代的遗籍,无不精美。它们“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这里所谓的“装用倒折,四周外向”,指的就是蝴蝶装。而且是“宋元所遗”,可见宋元时期,蝴蝶装确曾是盛行一时的典籍装帧形式(图 31)。



图 31 宋刻本蝴蝶装

八、包背装

蝴蝶装的优点已如上述,但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在充分显示其优点的同时,往往也就暴露了自身的弱点。蝴蝶装的书叶是反折的,两个半叶的文字均相向朝里,这对保护框内文字无疑是有好处的。但这种装帧造成所有的书叶都是单叶,不但每看一版使人首先看到的都是无字的反面,而且很容易造成两个半叶有文字的正面彼此相吸连,翻阅不便。并且,蝶装书脊用浆糊粘连,作为藏书可以,若是经常翻阅,则容易脱落和散乱。针对蝴蝶装的这些弱点,又出现了一种既便于翻阅而又更加牢固的新的装帧形式,这就是包背装。

包背装的特点,是一反蝴蝶装倒折书页的方法,而将印好的书页正折,使两个半叶的文字相背朝外,版心所在的折边朝左向外。书页齐向右边而集成书脊;折好的数十叶书页依顺序排好,而后以朝左的折边为准捋齐;然后在右边框外余幅上打眼,用纸捻穿订、压平;裁齐右边余幅的边沿,形成平齐书脊。再用一张硬厚整纸比试书脊的厚度,双痕对折,作为封皮,用浆糊粘包书背(脊),再裁齐天头地脚及封面的左边,一册包背装的典籍就装帧完毕了。这种装帧,由于主要是包裹书背,所以称为包背装。

包背装大约出现在南宋,经元历明,一直到清朝末年,也流行了几百年。特别是明、清时期,政府的官书几乎都是包背装(图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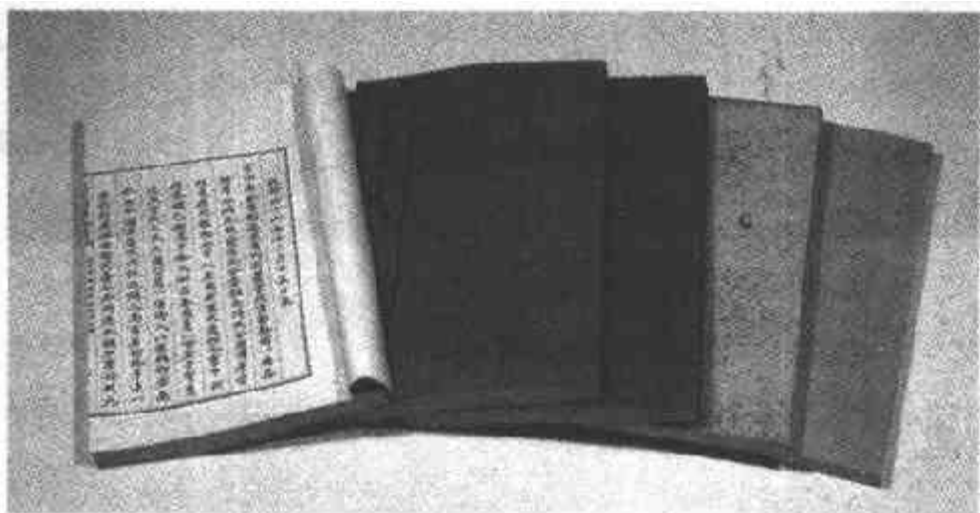


图 32 古书包背装

其实古书的包背装,很像现代的平、精装书。所不同的是,古书包背装的书叶是单面印刷,合叶装订;现在的平精装书是双面印刷,折配装订。包背装是在书脊内侧竖订纸捻以固定书页;平精装书则是书脊上横向索线以固定书页。但从外表看,两者没有多大区别。包背装解决了蝴蝶装开卷就是无字反面及装订不牢的弊病。但因这种装帧仍是以纸捻装订,包裹书背,因此也还只是便于收藏,仍经不起反复翻阅。若是经常翻阅,仍然很容易脱叶散乱。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一种新的装订办法又在慢慢出现并逐渐兴盛起来,这就是线装。

九、线 装

用线装订典籍始于何时,似难详考。过去通常的说法是,线装书籍的装帧形式出现在明朝中叶以后,这是很不确切的。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有几件是唐末五代时的遗籍,也有少数北宋初年的遗籍。这些遗籍的装订办法,有的在书脊上端用线横索书背;有的在书脊内侧上下端各打一透眼,然后用线绳横索书背后,再连穿下端透眼横索书背,最后系扣打结;有的在书脊内侧上中下打三个透眼,然后逐一横索书脊,竖向连穿,最后在中间打结系扣。有的订线宛在,装式完整;有的订线虽佚,但穿孔犹存。例 S5534 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粗厚麻纸,双面书字。最后落款为“时天复五年岁乙丑三月一日写竟信心受持老人八十有三”。“天复”本是唐昭宗李晔所用的年号,本无五年。依次推算,并以乙丑印证,则天复五年为唐哀帝李祝天祐二年(905年)。大概是中央已帝祚禅让,改元更号,边陲百姓不知,故仍用旧年号所致。这件遗存的右边缝缀的线绳已经佚去,但当年穿线的一排三孔犹存,证明唐末已出现了线装。又例 S5531 号,是《佛说地藏菩萨经》、《佛说续命经》、《摩利支天经》,粗厚麻纸,双面书字。右边沿书脊打有四孔,用丝线绳在书内骑马式竖穿,在书外书脊处横向索线。这是一件线装典籍的实物留存,其卷尾有“庚辰年十二月廿七日”年款。按“庚辰”,唐大中十四年(860年),五代后梁贞明六年(920年),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都是庚辰。其中最大的可能是后梁贞明六年的庚辰。若确,则可证唐末五代中国典籍出现了线装。又例 S5536 号,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粗厚麻纸书写,五代时作品。其

装帧是在书脊内侧上下端各打一透眼，在眼处用线横索书脊，在书的外表竖穿，在下端眼处横索书脊后打蝴蝶结系实。此件装帧完好无损，装线犹存，不啻为五代时期典籍线装的实物证据。又例 S5646 号，亦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北宋初年写本，卷尾有“于时大宋乾德七年己巳岁四月十五日”年款可证。凡五十二叶，一百零四面，粗麻纸书写。其装帧是在书脊内侧打三个透眼，用两股拧成的丝线绳横索书脊，并沿书脊竖穿，最后在中间透眼处打蝴蝶结系实。此为北宋初年典籍仍用线装的明证。

至于唐末五代就已出现线装，以后又断绝而未能延续下来的问题，南宋初年张邦基在《墨庄漫录》卷四中有过解说：“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绩，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绩之弊也。’”这段话是南宋初年张邦基借用北宋王洙的意见来品评书册采用粘连与缝绩优劣的。王洙字原叔，应天宋城（今属河南）人，是北宋嘉祐以前的人物，进士出身，官侍读学士兼侍学士。曾于北宋仁宗时参加撰集《集韵》的工作，又曾撰《地理新书》。虽一生为官，但多与书打交道。他生活的时代，离北宋开国仅有半个世纪左右。他以切身的经验体会，道出了典册缝绩的弊端及典册粘连的优越。足见他生活的时代，典册确曾流行过线装办法。可是经他们这类人物的品评褒贬之后，线装逐渐消失，而被蝶装取而代之。

到明朝中叶以后，社会文化更加发展。特别是伴随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日益提高，书籍的流通翻阅也更加频繁，因此，典籍的装帧形式也必然要适应这种需要而作相应的改变。蝴蝶装不牢与不便之弊早已暴露，包背装同样承受不起经常的翻阅。所以，线装典册便又重行兴盛了起来。

线装与包背装的折叶没有任何区别。只是装订时，线装不先用纸

捻固定书叶,也不用整纸包裹书背而作封面,而是将封皮纸裁成与书叶大小相一致的两张,前一张后一张,与书叶同时整齐,再将天头地脚及右边剪齐,用重物压稳固定,最后打眼穿线装订。明代中叶以后又流行起来的线装典册,其装帧形式不是唐末五代时线装形式的简单重复,而且在折叶、打眼、配封皮、装订等方面又有大胆的革新、发展和变化。现在仍能见到的大量的古籍线装书,都是四眼装订的形式(图 33)。这种形式便是在明、清两代定型的。这种装帧形式,在我国典籍传统装帧技术史上是集大成的。它既便于翻阅,又不易破散;既有美观庄重的外形,又坚固耐用,所以它流行的时间也有几百年。直到今天,用毛边纸、宣纸影印古籍,其装帧还常常采用这种形式,显其庄重大方,古朴典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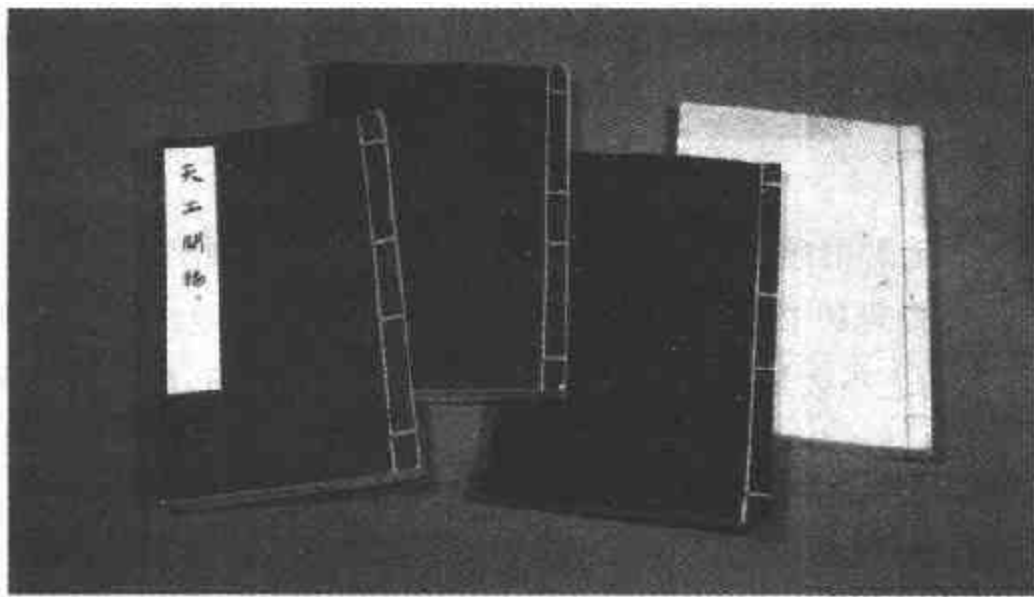


图 33 古书线装

十、毛 装

在流通的古籍中,毛装不能算是一种独立的装帧形式。既考不清其悄悄出现的具体时代,也说不清其慢慢消逝的时间,但在实际中又

确实存在着毛装这种形式(图 34)。毛装形式的特点,在折叶和装订方法上与包背装没有任何区别,即仍然以版心为轴线,合叶折叠,集数叶为一叠,整齐书口,然后在书脊内侧打两眼或打四眼,用纸捻穿订,砸平。区别在于天头地脚及书脊,毛装书的天头地脚及书脊毛茬自任,不用剪齐,也不用加封皮。这种毛茬参差而又纸捻粗装不要封皮的装帧形式称“毛装”,也称作“草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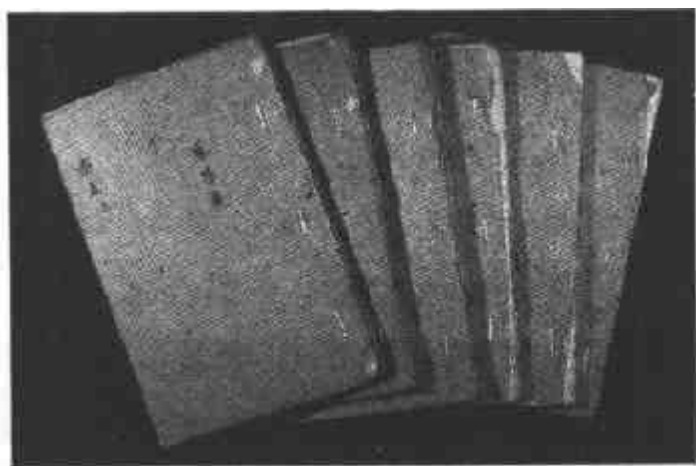


图 34 古书毛装

现知毛装书通常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种是官刻书,特别是清代内府武英殿刻的书,通常都要赠送给满族人的发祥地沈阳故宫及各王府、有功之臣或封疆大吏。因不知受书者怎么装潢,配什么质地的封面,所以就毛装发送。辽宁省图书馆现珍藏不少原沈阳故宫所得馈送之殿版书,其中不少就是当初清朝内府武英殿的毛装。宁波范氏天一阁,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因进书有功,乾隆皇帝为嘉奖天一阁范氏的献书赤诚,下令将雍正时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赠送给天一阁。天一阁得此书后,专门做了几个大书橱,将此书度藏在天一阁宝书楼上。直到今天,还能看到这部卷帙浩繁的大类书,它就是二百六十多年前清朝内府的毛装。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手稿,特别是草稿,作者写完一章一节,为不使其页码章节错乱,也常常自己把它装订起来。有用线订,也有用纸

捻订。毛毛糙糙,边缘参差,所以也称为毛装。这种情况,在清代乃至民国以后,在文人学士中还常常出现,如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鲁迅、陈垣等人的稿本,也还采用这种毛装的形式。

第六章 历代典籍的收藏

第一节 历代典籍的公家收藏

一、典籍公家收藏的起源

典籍收藏是人类社会管理、国家统治、物质生产和文化建设的一种需要。典籍的产生为古代藏书制度的出现提供了首要的、基本的物质条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官吏制度的分工也为典籍的收藏提供了基本条件,并为典籍的整理、保存、利用提供了可能。我国古代典籍的收藏有四大体系,即公家收藏体系,寺观收藏体系,书院收藏体系及私家收藏体系。最早出现的是公家收藏体系。

我国典籍的产生最早源于商代国家的卜辞。占卜在商代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决定了典籍的重要地位,使典籍最初阶段只能为官府所垄断。商王室拥有各类型的典籍,尤以甲骨卜辞为要。在商代,大至国家祭祀大典、王权承续,小至王室打猎、出游,以至风雨年成等都要占卜,以定吉凶,以决行止。占卜的结果,灵验的征候著之于甲骨,为了日后查考,就需将其妥为保存。这就是我国典籍公家收藏的

滥觞。商代的典籍都收藏在宗庙中，“凡卜皆在庙，故藏龟亦于庙”。^①

商代不仅已有藏书意识，而且所藏典籍还有简单分类。考古学家对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研究表明，刻辞的甲和骨分开放置于不同窖穴，各代典籍也分开储藏。甲骨文献则分册按干支顺序排放，成册甲骨还可能编写册次^②。刻辞中的“册入”即是成册入库的标记。可见，商代甲骨卜辞要束缚成册方可入库。甲骨文献既如此典藏，其他载体的文献也当不例外。

商代的官制比较简单，掌册记事的史官既作册，同时也负责掌管商王室的典籍。这时的典籍也主要是由他们利用，因此，作册掌管典籍不是专职，只是为方便利用。这并不是商王朝不重视典籍，而是社会发展水平及典籍的数量还不足以设专人管理，更谈不上设专门机构。

商代最初的典籍中所记载的史实被商王用作实施一切统治措施的“理论”依据，因此，商代的典籍得到充分的利用。商王及有关官吏经常到宗庙省视卜辞，完毕，还在骨白处刻上省视者、日期及省视数量，以作标识，作册也要签名，然后再行储存。

周代承殷商之制，也将王室典籍藏于宗庙。“典籍，受之天子，藏诸宗庙”（《孟子正义·告子章句下》）。宗庙中的天府是周王室的藏物之所，当时的典籍大多藏于此处。《周礼·天府》说：“天府，掌祖庙之守藏”，天府的职责是“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这其中便有“大训”、“河图”等重要典籍。另外，《周礼》中还记载：“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由史贰之”（《地官·司徒》）；“凡邦之在盟约，莅其盟书，而登于天府”（《秋官·大司寇》）。可见，除“河图”等国家重要典籍外还有盟约、“贤能之书”、及考察官吏政绩的治职文书等也都

① 《论语·公冶长注》。

② 刘渝生：《商代藏书——我国最早的图书馆》，载《图书馆学研究》1986年第4期。

藏在宗庙的天府里。

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典籍的增加,西周的政府藏书处除宗庙之外,还藏于太史、内史、司会及“六官”等十多个官署,“大史之官职掌书籍,必有藏书之处,考今之秘阁也”,“就其所司之处观其书也”(孔颖达:《周礼注疏》)。大史主藏“典”、“法”、“则”等周王朝治国之大法,此外还藏有盟约副本,“凡邦之大盟约,莅其盟书,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周礼·秋官》)。其他各官署按其司之职,收藏有关的典籍。

周王朝掌管典籍的官员仍为史官,其中地位较低的府、史、胥、徒等负责具体的工作。“府,掌官契以活藏”,即掌管贮藏文书;“史,掌官书以赞治”,即负责文书的起草,“胥,掌官叙以治叙”,“徒,掌官令以征令”(《周礼·天官冢宰》)。

西周后期,各诸侯国也开始收藏典籍,它们的收藏机构、收藏地点及管理官员基本与周王室相对应。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提高其政治地位,也为了强化国内的统治,更加注意藏典设史。“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一同王者”(《史通·史官建置》),从而促使诸侯国的典籍收藏迅速发展,进而打破了此前由中央朝廷一统天下的单一官府藏书形式,初步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多形式的公家典籍收藏体系。这种藏书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必然改变西周公藏典籍仅限于少数上层统治阶层利用的局面,将某些典籍输送到民间,“法者,编著之图筹划,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诗》、《书》与则民学问”(《商君书·外内》);“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墨子·非命上》)。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著述繁荣的学术局面则与此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从而孔子才得以“求众家之史记,而得百二十国书”(《史通·古今正史》)而笔削《春秋》;墨子才能够“征以先王之书”(《墨子·非命中》),得见“百国春秋史”(《墨子佚文》)。

二、历代公藏典籍的收集

典籍收集是建立政府典籍收藏体系的基础,我国有意识的公藏典籍收集始于秦,“秦常以岁八月,遣辂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藏书秘室”(《风俗通义·序》)。而真正大规模的公藏典籍的收集则始于汉代,此后各朝各代都循汉制,不断收集访求典籍。

汉初,刘邦即非常注意对典籍的搜集、保护,汉丞相萧何更是身先士卒。高帝元年(前206年)刘邦率汉军入咸阳时,萧何不似其他将领急抢金帛财物,而是率先收取秦朝典籍、文书,“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俱得秦书也”(《史记·萧相国世家》)。正因为萧何及时搜集、保护了秦政府的部分藏书,才免遭项羽入咸阳焚宫室时被毁的厄运,并为汉代官府的典籍收藏打下了基础。

但西汉继承的秦朝典籍毕竟经历过秦朝焚书之暴,随后又遭项羽之炬,“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汉书·刘歆传》)。为了更好地建立官府藏书体系,西汉政权建立后,“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惠帝更“除挟书之律”,武帝则“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隋书·经籍志》),开始大规模求书于民间的活动。不久,便“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为逃避秦火而匿藏于民间的珍稀典籍纷纷被献于朝廷。河间献王刘德,即献出《雅乐》及《乐记》、《古礼》五十六篇,《毛诗训诂》及《礼》一百三十一篇;孔安国则献出《古文尚书》,而鲁国三老则献《古文孝经》。从武帝命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到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的一百年间,书积如山,上至先秦六艺,“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使西汉的公藏典籍大大增加。

河平三年(前 26 年),成帝一面“遣谒者陈农继续求遗书于天下”(《汉书·成帝纪》),一面诏光禄大夫刘向等人对所收集到的典籍进行整理。通过这几次大规模搜集、整理,西汉政府所藏典籍很快达数万卷之多,并且建立起了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完整的国家藏书体系。

两汉之交,经历了王莽之乱和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之后,西汉政府所藏典籍散失不少,但以汉宗室刘秀为首的东汉王朝统治集团的文化素养都较高,眼光较远,比较注意收集和保护典籍。更始元年(23 年),刘秀被派入洛阳,整修官府。他借机将政府藏书疏散到三辅地方政权中,由地方政权代为保管,刘秀起事攻破邯郸,诛杀王郎后,便立即入宫,收取典籍、文书。因此当“光武车驾徙都洛阳”时,就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风俗通义》),最大限度地收集到西汉政府遗留的典籍。此后的东汉政权都仿西汉藏书故事,采取各种方式访求遗书,“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钜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隋书·经籍志》)。明帝更是“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魏书·释志志》)。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遣使出国访求佛经,以充公藏。

两汉以后,中国历史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分裂,公藏典籍时聚时散。公元 581 年,隋文帝杨坚发动宫廷政变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使国家再次统一。隋朝的建立没有经历重大战争,因此直接完整地继承了北周的公藏典籍,但是由于多年战乱,典籍损失严重,“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580 年)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隋书·经籍志》)。可知隋朝继承北周的藏书总共一万五千卷左右。虽然如此,这部分典籍仍为隋朝的国家藏书打下了基础。

随后,隋朝又三次大规模收集典籍,使隋朝的公藏典籍达到我国封建社会中期的顶峰,达三十七万卷之多。

隋朝第一次大规模搜集典籍,是在秘书监牛弘上书隋文帝《请开献书之路表》后展开的。牛弘认为“方当大弘文教,纳俗升平,而天下图书尚有遗逸,非所以仰协圣情,流训无穷者也”(《隋书·牛弘传》)。他深知典籍在维护统治中的巨大作用,强调“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并认为隋朝已具备了搜集图书的优越条件:“自华夏分离,彝伦攸致期间,虽霸王递起,而世难未夷,欲崇儒业,时或未可,今土宇迈于三王,民黎盛于两汉,有人有时,正在今日。”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然士民殷杂,求访难知,纵有知者,多怀吝惜,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臻,观阁斯积,重道之风,超于前世”(《隋书·牛弘传》)。隋文帝很快采纳了牛弘的建议,下诏天下,征求遗书,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由政府出面督助推进,即牛弘所说“勒之以天威”,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了解情况,进行仔细的调查访求,重点在“搜访异本”;奖励献书,“献书一卷,赏缣一匹”(《隋书·牛弘传》),杜绝强迫,提高人们献书的积极性;暂借,“校写即定,本即归主”(《隋书·经籍志》);严惩假伪。当时殿内将军刘炫,“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使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结赦免死,坐除名,归于家”。这些措施的施行,致使“民间异书,往往间出”(《隋书·经籍志》),“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隋书·牛弘传》)。同时,也保证了所收典籍的质量,为以后典籍整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后,隋朝又有两次较大的典籍搜集活动。一次是开皇九年(589年),隋朝渡江灭陈,行军元帅晋王杨广一入建康,就让高颖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在他们的精心搜集下,“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余卷”,“及平陈以后,经籍渐备”,极大地充实了隋朝的官府所藏。战争之后,牛弘又利用南北统一的有利条件,

再次奏请搜访遗逸,典籍收集活动又在江南展开,民间异书纷纷献出,成效显著。另一次是隋炀帝继位后开展的搜集活动。由于隋炀帝“喜聚逸书”,这次搜集范围比前两次大有扩充,除统治阶级视为经典的经、史以外,还涉及到书法、绘画,道经和佛典等。由于炀帝爱好佛道,因之,佛经征集的数量尤多。但是隋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对谶纬之书大加禁毁。从隋文帝晚期到隋炀帝,所搜典籍中有一部分是专为禁毁而收的。

唐代政府承汉隋之制,从立国之始即非常重视典籍的搜集,隋嘉则殿书虽达三十七万卷,但经隋末战乱的破坏,至武德初,只剩八万卷,并且重复相糅(《新唐书·艺文志》)。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李渊在克平王世充后,便将隋东都洛阳的图书全部收为唐朝所有。可惜这些典籍在用船送至快到京师时,船翻、书毁,多数被淹没,“其所有存者,十不一二”(《隋书·经籍志》)。李渊进入隋都后,又接受了藏于此地的藏书,这些前代遗书成为唐朝公藏典籍的基础。

唐朝毕竟不同以前各代,它是我国封建文化发展的鼎盛期。此时雕板印刷已开始出现,民间私人也可以写书、抄书出售。当代私人或集体著作非常之多,因此,唐朝的求书便有其自己的特色。其一,唐朝向民间的典籍搜求,虽然也同以前各朝一样有比较集中的几次,但他们很注意平时的典籍搜求,而且,唐朝很多皇帝大臣好文,尤其是太宗李世民,成了各皇帝仰慕学习的榜样,因此,对图书的收集不遗余力,经常不惜千金购书一卷。其二是借抄典籍。虽然从汉代开始已有借抄之说,但不及唐朝重视,也不及唐朝经常、普遍。借抄古籍是唐代收集典籍扩充公藏的一个重要方式。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政府不仅提供了较为雄厚的人力物力,还规定了严格的条件,缮写人员必须是“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并且由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新唐书·艺文志》),作为典籍抄录之用。其三是注意收集当代

的私人或集体著作。古代人有较严重的厚古薄今思想,搜求典籍时主要注意古籍,对当代的著作不太在意。而唐代雕板印刷的运用,经济文化的繁荣,使私人 and 集体著作很多。在开元年间一次所著录的书有“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人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新唐书·艺文志》),因此唐朝当代的著作是官府藏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代政府的收寻访求,唐代公藏典籍到开元年间达到了顶峰,秘书省“四部御书十二库,共七万余卷”(《旧唐书·经籍志》)。

宋太祖黄袍加身,夺取政权是一个“和平禅让”的过程,因此完整地接收了后周经五代之乱仅剩的一万三千余卷典籍。夺取政权后,太祖、太宗在削平诸国的军事征战中也十分注意保护、搜集各国遗留的图籍。“王师平金陵,得书十万卷”,“乾德元年(963年)平荆南,诏有司尽报高氏图籍,以实三馆。”乾德三年(965年)九月平定后蜀后,“命右拾遗孙逢吉往西川取伪蜀法物图籍印篆赴阙,得书万三千卷送三馆”(《宋朝事实类苑》)。开宝九年(976年)平南唐,又令太子洗马吕龟禅至南唐京城金陵,收其图书二万余卷。吴越钱俶来朝,又收吴越图籍。至此,全国基本统一,宋朝继承唐代的藏书也有相当规模,为宋朝公藏典籍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朝政府为了获得丰富的典籍,十分重视典籍的民间访求。北宋一朝,历代皇帝多次下诏,搜寻典籍,求访之勤空前绝后。宋朝还特选文学博雅之士作访求典籍的使者,为访求真书、好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宋代向民间求书,最有特色、最有创意的是在以前各代不惜钱财重赏献书人之外,还加上了封官之举,大大激发献书人的积极性。乾德四年(966年),访求遗书的诏书规定,凡来献书者,视其书籍价值,封以官爵,如为馆阁所无,则将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俱以名闻。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三人献书一千二百二十八卷,被赐以科名。太平兴国九年(984年)又下诏天下,征访阙书。“宜

令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于侍漏院出榜告示中外。“若臣寮之家，有三馆阙者，许诣官进纳。及三百卷以上，其进书人送学士院引验人材，书札试问公理。如堪任职官者，与一子出身。亲儒墨者，即与量才安排。如不及三百卷者，据卷帙多少，优给金帛。如不愿纳官者，借本缮写毕，却以付之”。这些优惠政策，使藏书之人踊跃献书，“数年之间，献图书于阙下者，不可胜计……图书之盛，近代无比”（《麟台故事·书籍》）。咸平四年（1001年），以公藏典籍“验开元之旧目，亡逸尚多”，于是“庶坠简以毕臻，更悬金而示赏，或广献书之路。且开兴进之门，应中外臣庶家有收得三馆所少书籍，每纳到一卷给千钱，仰制馆看详，委是所少之书，及卷帙，别无违碍，方得收纳。其所进书如及三百卷以上，量材试问与出身酬奖。如或不亲儒墨，即与班行内安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又诏令郡县访求遗书：“令郡县谕旨访求，许士民以家藏书所在自陈，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举秘书省以闻，听旨递进，可备收录，当优与支赐。或有所秘未见之书，有足观采，即命以官，议加崇奖，其书录竟给还”，甚至对“率先奉行，访书最多州县，亦具名闻”（《文献通考·经籍考》）。诏令下达，第二年便有张颐、李东各献书二百二十三卷、一百六十二卷，皆为阙书，二人均得赏赐，张颐赐进士出身，李东补功郎。经百余年的搜集，北宋公藏典籍增长迅速，至宋仁宗时已达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至宋徽宗时更达七万三千八百七十七卷。

北宋末年公藏典籍罹靖康之难，丰富的秘阁藏书荡然靡遗。“高宗移蹕临安”，又“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并下诏“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如绍兴元年，进士何克忠上《太祖皇帝实录》、《名臣列传》等书，已故金吾上将军张焄之妻王氏也以家藏《六朝实录》等书上献朝廷。使“馆阁编辑，日益以富矣”（《宋史·艺文志》）。南宋的求书方法除循北宋旧制外，还着力求诸著名藏书

家、以故执政家等。如赵明诚、陆实均投献过藏书，绍兴二年，著名藏书家贺铸家献书五千卷，曾攸家献书二千一百余卷。绍兴五年，大理评事诸葛行仁献《册府元龟》等一万一千五百一十五卷。绍兴十三年，“首命绍兴府录会稽陆宰家所藏书来上，凡万三千卷有奇”（《嘉泰会稽志》）。绍兴二年，故相余深、赵挺之等以家藏国史、实录善本奉命献纳。绍兴三年，故执政林摅家奉命送上道君皇帝御书七轴并实录、会要、国史及各种古文书籍二千一百二十卷。北宋规定，秘省图籍不准传录，而事实上许多典籍流传于外。因此，绍兴三年七月秘书省建议向本省前任官员征集文献，办法是借本缮与。另外，南宋政府还注意搜索旧藏书机关的遗留文献和向受战争破坏轻、图书文化事业发达的地区如四川、福建等地及寺庙访求典籍。同时积极编写缺书目录镂板分布，下发各地，使边远之地也知政府缺藏之书，从而前来献书或由官方照单搜访。另外，宋代的刻书业已较发达，不仅中央设有刻书机构，地方上也开始自己刻印。对此宋政府规定：“凡州县印本书籍，咸解赴册府，以补四库之缺”^①。这一规定使政府获得许多新印之书。这些措施和方法大大丰富了两宋的公藏典籍，到淳熙四年（1177年），由秘书省监陈騊等编制的《中兴馆阁书目》已收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比《崇文总目》多出一万三千八百余卷。至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张攀所编《续中兴馆阁书目时》，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

元代在立国之前即开始进行典籍的收集。元太宗五年（1233年）蒙古人灭金时，即在平阳建立经籍所，收藏夺自金代的典籍。元世祖至元十年（1275年）蒙古人进入中原后，又收取了宋皇室留下的典籍；九月，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括江南诸郡书及临安秘书省所藏《乾坤宝典》等典籍。元朝立国后，又多方搜求典籍。元初，即命湖南卢挚

^① 《论中国宜建藏书楼》，载《国粹学报》第二年丙午第七号。

收江南各地的四库中的精本善本,运至大都,藏于新建的兴文署。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世祖准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许衡之奏,遣使至杭州等地收罗在官书籍的刻板至京师。经过多次收集,宋末被破坏了的公藏典籍基本得以恢复,至惠宗至正二年(1342年)进行典籍清理时,元朝公藏典籍已达二千四百九十部,二万五千八百三十二册。

明代,自朱元璋始到明中期正统之前的各皇帝都很重视收集典籍。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六月,朱元璋还在战争之中就令有司访求古今典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洪武元年(1368年)大将军徐达率军破元大都时,接受了元皇室全部藏书,并“命大将军收秘书监图书”(《国史经籍志·序》)。明成祖曾说:“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阙乎?”“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明史·艺文志》)。正因如此,明代求书赏格达到了极限,不再限于以前的支绢、给钱、补官等旧法,而是“惟其所欲与之”,使秘府所藏“充栋汗牛,莫可纪极”,藏书多达一万四千零二十九部,二十一万八千零二十九卷,为辽金元时期的四倍多。明代对民间所献之书并不是一味接纳赏赐,只有对进献“有补政治”的典籍的人才“赐金币,进尚书”,如邱浚;而对无补于世道人心的道家炼丹之类的典籍,则却而不纳;对那些妖言惑众、期冀富贵持献所谓“天书”的妄人,甚至杀头问斩。

清代典籍的收集,乾隆年间达到高潮,尤其是乾隆中期,为编修《四库全书》而下诏求书,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高宗颁发征求图书谕旨,规定了征书范围和办法。但文字狱的残酷给世人留下的印象太深,藏书之家不敢献书,地方官吏也怕危及自己,于是皆敷衍了事。半年之后,由于所聚甚少,乾隆下旨诘问,对求书不力的官员痛加斥责。此后,安徽学政朱筠率先行动,于安庆、徽州、宁国、太平、凤阳、颍州、六安、卢州等

地访得遗书多种,交纳朝廷,而后各省相继行动。至此,征求遗书的活动才全面展开,但仍是表面上热热闹闹,实效甚微。针对这种恐惧心理,乾隆反复强调:“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反于书中寻摘疵瑕罪及藏书之人乎?”“即有忌讳字面……与藏书之人并无关涉,必不肯因此加罪。至督抚等经手汇送,更无关碍,又何所用其畏疑乎?”针对书出不还的问题,又向藏书之家保证:“所有各家进到之书,俟校办完竣日,仍行给还原献之家。”“如有交发不明,惟该督抚是问。”下令在书籍献到之日即在书之首页加盖清政府和翰林院图章,并注明进书日期、进书官员、书属何家,并另造一册逐一登记,待发还之日,按册与所进图书面页上各项核对。

乾隆帝投其所好地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促使藏书家们献出更多更好的典籍。凡进五百种以上的,奖励《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如浙江的鲍士慕、范懋柱、汪启淑和两淮之马裕四家,在乾隆三十九年五月被各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百种以上的,奖《佩文韵府》一部。对进书中特别名贵的典籍,则由皇帝御笔提诗发还。此外,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的上谕中还规定:“著通查各省进到之书,其一人而收藏百种以上者,可称为藏书之家,即应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末,其在百种以下者,亦应将由某省督抚某人采访所得附载于后。”这些措施对于那些虽嗜书如命但希望显亲扬名、荣宗耀祖的官僚及藏书家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使进书十分活跃,有的地方多次甚至十几次进呈,仅浙江一省即采进呈献的书籍即达四千五百二十二种之多。至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即距下诏二年时间,各地进书已达万种以上。这两年是进书的高潮期,其后的几年仍有不少进书。下诏十来年中,所采进典籍在二万部以上(据《四库采进书目》统计)。这些进呈的书,经过层层审查,其中除部分被禁毁外,其它大多收入《四库全书》,有的还当即刊刻行世,从而大大扩充了公藏典籍的数量。

三、历代公家藏书处所及管理机构

先秦时期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公家藏书处所不少,但一直没有专门的藏书机构,也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均由一些史官代管。西汉成为我国官家藏书机构从无到有的过渡阶段。到东汉,我国真正、系统、影响深远的秘书监制产生了,随后又有了馆阁制,并贯穿于东汉以后各朝代,成为管理公藏典籍的主要行政体系。

西汉,“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隋书·经籍志》)。太常是九卿之首,主掌宗庙、礼仪;太史是太常的下属官吏,掌天文历法;博士之主要职责是教授太学弟子,作帝王安邦治国的参谋。而宫内的藏书则由御史中丞等掌管。因此,虽然西汉已有禁中的兰台、延阁、广内、秘室、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外府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等众多的藏书机构,但仍无专职官员管理这些官家藏书,还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典籍收藏制度。

到了东汉,藏书机构有很大发展,藏书官员也屡有增加,并逐渐专职化,前后设置了七所典籍收藏处:辟雍,建于西周,原为周王所设之大学,到刘秀重建于洛阳城北时,它已成为皇帝行礼之地,多藏礼仪典籍;宣明殿,是洛阳城中北宫之一大殿,专藏秘籍,供皇帝阅览,是宫中藏书地之一;兰台,西汉已有,但当时为御史中丞兼管,东汉时的兰台仍是宫中藏书处之一,储藏国家的重要典籍和部分档案;宗庙石室,建于刘邦庙内,所藏谶纬书籍和一些自然界和灾异现象记录,因此不能随便查阅;鸿都,是以一宫门命名的一所备官学校,其内藏有文学、艺术典籍,由学禄勋直接掌管;仁寿阁,东汉政府于宫中与东观同时开辟的一所新的典籍收藏之地,建于明帝时期,所藏均为东汉建立后搜集到的典籍,同时也是著作之地,马严曾奉诏留仁寿阁,与校书郎杜扶、班固等著《建武注记》。

东汉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典籍收藏处所——东观。它建于明帝朝，也收藏东汉建立后搜集到的典籍，其规模宏大，藏书繁富，官员众多，管理完善，相当于东汉的中央图书馆，是我国最早专门收藏典籍的处所，是帝王、士大夫们读书的乐园，也有许多著名学者得聚集于此，从事典籍校勘、著述活动，于是“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后汉书·窦章传》）。

东汉政府对典籍收藏的管理分散于各藏书处。在著名的兰台设有接近于专职的兰台令史管理兰台所藏典籍，担任这一职务的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如班固、傅毅等，他们不仅掌管典籍的收藏，而且还从事典籍的校理、著述。

在东观则设有东观郎和校书郎。“永元十三年，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后汉书·和帝纪》）。充任东观的管理官员，都是多才多艺之士。但东观的官员编制并不固定，多以他官充任，其中备员郎官居多，因此随时在调换升迁，班固即由校书郎升迁为兰台令史。东观郎、校书郎皆为太常属官。李胜、窦章即曾为东观校书郎。

东观集国家藏书中心、校书中心和编修著作中心于一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其地位却十分低下，隶属于政治地位已降低的御史，这种状况已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无法更好地推动封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东汉时期所藏典籍无论数量还是内容范围都远超西汉，并且设立了众多藏书处所，急需有一个专门机构集中管理。因此，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创置了我国封建社会中央政府中第一个专门管理典籍事业的机构——秘书监。

秘书监的设立，结束了临时选派官员到各藏书处兼职管理典籍收藏的局面，完善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公家典籍收藏机构，使典籍收藏得到了统一领导，各处藏书得以随时调整和补充，从而使这个始建于东汉后期、确立于魏晋之际、终结于明初的秘书监制成为我国历史上

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公藏典籍管理制度。

秘书监设立之初,既是机构名,也是职官名。至梁武帝将秘书监更名为秘书之前,“秘书监”仅为官名。最初秘书监的职责是“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东观汉纪》),隶属太常,设秘书监一人,下设校书郎中、校书郎。此时所设的校书郎中、校书郎不同于以前临时性的非正式官员,是作为公藏典籍管理官员而正式设置的官职。

但是,秘书监正式设置后,其职能和作用一直没有很好地确定下来。经过魏晋两代的发展,秘书监之制才得以完善。魏武帝时设置了秘书令,定其职责为“典尚书奏事”,实际上类似中书令的工作,而对典籍只是兼管。魏文帝即位后,设置了中书令,改秘书令为秘书监,并且将秘书丞增设为左、右二丞,成为具体负责典籍管理的官吏。此外,秘书监中还有秘书郎,或称秘书郎中、秘书校书郎、秘书著作郎等职。至此,我国历史上的秘书监制才最后成型,而后各朝代,秘书监的名称和权限虽屡有变更,但万变不离专司艺文典籍之事。晋武帝时,曾一度把秘书监并入中书省,但“其秘书、著作之局不变”(《晋书·职官志》)。至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年),重新设置了秘书监一职,并“统著作局,掌三阁图书,自是秘书之府始属于外”(《通志·职官志》)。从此,秘书监就不再是单纯管理禁中秘籍的内府机构,而是统辖内外独立的公藏典籍管理机构。

在公藏典籍的管理上,隋承汉魏旧制,设置了秘书省。隋初有“监丞各一人,郎四人,校书郎十二人,正字四人,录事二人,领著作、太史二曹。著作曹置郎二人,佐郎八人,校书郎、正字各二人。太史曹置令、丞各二人,司历二人,监候四人”(《隋书·百官志》)。炀帝即位后,于大业三年(607年)改革官制,秘书省与殿内省、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并列为五省。增设了秘书少监一人,将校书郎减为十人。其后又改秘书监、少监为秘书令、秘书少令,置秘书佐郎四人,辅助秘书郎的工作,又增设儒林郎十人、文林郎二十人、楷书郎二十人,“专掌抄写

御书”。校书郎又由过去的十人增加到四十名,因此,秘书省的编制由原来的三十八人增加到一百二十人。秘书省官吏的官阶也普遍提高,秘书监由正三品改为从二品,秘书省监为从四品,秘书郎由正七品改为从五品,著作郎由从五品改为正五品。

隋朝十分重视典籍的收藏,不仅将典籍严格分为上中下三品分藏各处,上品红玻璃轴,中品绀玻璃轴,下品漆轴,而且藏书处所也富丽堂皇。东都洛阳的观文殿即是一例,观文殿前的十四间书室,藏有精选的正御书。这些书室“窗户、床褥、厨幔,咸极珍丽。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有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厨扉皆自启,帝出,则复闭如故”(《文献通考·经籍考总叙》),观文殿如此宏丽的藏书建筑和一系列的自启装置是前所未有的。虽然有些过分奢丽,但由于构架高大,通风良好,又防尘土,因此对收藏其中的典籍精品起到了极好的保护作用。不仅如此,为收藏魏以来的古迹名画,观文殿后还设立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隋书·经籍志》),是前所未有的官府专藏。

隋朝另一处官府专藏是东都内道场设立的佛、道典籍专藏。隋初,佛道之书是与其它典籍一同藏在秘阁的,到隋炀帝时,由于佛经增多,遂在内道场设立了佛道专藏。并且还令沙门智果等人先后于内道场撰诸经目,分别条贯,对其藏品不断整理。

隋朝的另一著名藏书地是西京长安的嘉则殿。隋炀帝对嘉则殿的藏书也十分重视,其藏书达三十七万卷,这是历史上公藏典籍的最高纪录。嘉则殿是隋朝官府重要的藏书地和校勘地。

唐代的图书事业在发达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得到了很大发展。其官府藏书机构除沿袭隋朝的秘书省外,还有称之为“三馆”的弘文馆、史馆、集贤院,及崇文馆、司经局和翰林院等众多的收藏机构。

唐代的秘书监制虽沿袭隋朝,但又有不少变化和发展,唐高祖定

官制时,将秘书省定为六省之一,但并非平列,而是隶属于中书省。到高宗龙朔二年(662年),秘书省曾改为兰台,秘书监也相应改为太史,少监为侍郎,丞为大夫,著作郎为司文郎,太史令为秘阁郎中。武后光宅二年(684年),又改为麟台,秘书监改为麟台监,秘书省监改为麟台侍郎,到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才恢复了原名。

唐代秘书省官职的设置已相当完备和具体,共设监一人,从三品,为秘书省之长;少监二人,从四品上,是秘书监之副,协助秘书监掌管全局工作;秘书丞一人,从五品上,主管秘书省日常工作;秘书郎四人,从六品上,掌管四库之图籍,校书郎八人,正九品上。此八人为常设官职,在大规模校写典籍时,会临时增加其他人员。如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相继组织秘书省搜书、校书、写书时,就“别置讎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旧唐书·崔行功传》);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讎校典籍,刊正文章;主事一人,从九品上,并有令史、书令史、亭长、掌固若干人,办理文牍杂务;典书八人,掌四库书典藏、出纳。楷书手则视校书情况而定,或十人,或百人;此外,还有熟纸匠、装潢匠、笔匠等各种技术人员若干人。可见,唐代秘书省较隋朝增设了不少官职。

唐代的秘书省还领两局。一是著作局,即隋朝的著作曹。其职责为编撰史籍、撰写文章,但自唐太宗因编修南北朝史书于禁中另设史馆后,著作局便只管修撰碑志、祝文、祭文。著作局设有著作郎、佐郎、校书郎、正字等职官;二是太史局,即隋朝的太史曹,专掌天文、历书、计时。在高宗、武后时,太史局名称多次更改,曾有秘阁局、浑仪局、司天监等名称。这二局都有较强的独立性,且址所均不在秘书省内,实际上只是附属关系。

实行秘书监制的各朝代均较重视秘书监的人选,唐初尤甚。担任秘书监、少监的人必须是学问渊博、德高望重的巨儒名臣,如魏征、虞世南、颜师古、令狐德棻等。其下的官员虽官阶不很高,但是美差,如从六品上的秘书郎,自魏晋以来,为清望之官,校书郎虽仅为正九品

上,但因有读秘阁书的条件和接近皇帝的机会,容易被发现、重用,如张说、张九龄等许多宰相、侍郎都是由校书郎升任的。

秘书监在唐中叶之前,对我国古代典籍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典籍收集、整理、校勘等方面取得的每一重大成就和发展,都与秘书监制密切相关。北魏秘书丞孙惠蔚、隋朝秘书监牛弘,唐代的魏征、虞世南、颜师古、令狐德棻等人组织的各次求书、聚书活动,对建立公藏典籍体系、保存文化遗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魏秘书郎郑默编纂的《中经》、东晋著作郎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南朝梁秘书监任昉主持编纂的《文德殿目录》、唐秘书监魏征主编的《隋书·经籍志》等等,为我国古代目录学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但到了唐中叶以后,秘书监制渐趋衰弱,秘书监、秘书丞、秘书郎、著作郎等官职逐渐演变为虚衔,只体现居官者的品位和荣誉,很少再从事典籍的收集、整理、校勘及著述。这固然与武则天以后秘书监、少监的人选渐趋于杂乱有关,张易之、张昌宗、武承嗣等嬖臣都曾担任过此职,但主要还是社会发展之必然。

封建统治者为了鸠聚文士,从魏晋南北朝起开始设立文馆。唐代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使文馆越来越趋于完备,初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极大影响典籍收藏管理的馆阁制度。

“三馆”之一的弘文馆是设立较早、影响较大的一个文馆。武德四年(621年),在门下省设置了修文馆。武德九年(627年)改名弘文馆,其间因避太子弘讳,曾一度改为昭文馆,于开元七年复名弘文馆。该馆在西京长安、东都洛阳都设有分机构。弘文馆设置的最初目的是网罗文士以为皇帝的顾问,后来又兼有教育之责。但更为重要的职责即是收藏、校勘图书。其学士“掌详正图籍”、“馆中有四部书及图籍”(《旧唐书·职官志》)。唐太宗初即位,即大阐文教,在弘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并在弘文殿旁建立了弘文馆。因此,弘文馆是集顾问机关、学校、图书馆于一身的机构,这是与秘书省最大的区别所在。

弘文馆设置大学士四人,学士八人,官阶均在五品以上,直学士十二人,为六品以下官员。检校馆务的馆主由宰相兼任,另设详正学士若干人,校书郎、典书、亭长、掌固各若干人,楷书手、笔匠、装潢匠等若干人。

“三馆”之二的集贤院,是在唐玄宗“开元盛世”时期设置的,是当时最大的公家典籍收藏机构。唐玄宗即位后,大校群书,开元五年(717年)令褚无量等人在乾元殿东厢下校写四部书。为了更好地进行此项工作,唐玄宗正式设立了乾元殿书院,简称乾元院,由褚无量任乾元院使,下设刊正官四人、知书官八人,分掌四库书的校写工作。另外还设有四院中使、刺院等官。第二年,乾元院更名丽正殿修书院,置使及检校官,改修书官为直学士。开元八年,又增置修撰、校理、刊正等官。开元十三年,改为集贤殿书院,简称集贤院。

集贤院隶属中书省,其机构庞大,这不仅因为集贤院也像弘文馆、史馆、翰林院等一样,在唐西京、东都等处均有分机构,而且集贤院有一整套系统、庞大的职官。开元十年正式更名集贤院时,设学士四人,为五品以上官阶,以张说、徐坚、贺知章、陆坚等人为学士,由宰相兼学士的张说任知院事,总管全局。学士之责是“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旧唐书·职官志》)。设直学士十人,为六品以下官员,当时有韦述、毋巽等学者为任。侍讲四人,主要辅导皇帝读书,讲论文史。当时专为皇帝起草诏书的侍诏若干人也设在集贤院,直至翰林院成立。此外,集贤院还有大量校书、藏书官员;校理、修撰若干人,承旨撰集文章和刊正典籍。其他还有:专知御书典四人,知书官八人掌分四库书;书直、写御官一百人抄写书籍,画直八人掌图画的典藏校写;拓书六人掌摹写旧书、拓石碑帖;造笔直四人典造笔供写书之用者;装书直十四人掌书籍装帧。

集贤院成立之初,唐玄宗即令人抄写四库图集,所写皆御本。从

开元六年八月开始,政府又向各藏书机构借书抄写充实集贤院藏书,这项工作一直进行到天宝年间。经过多年努力,集贤院的藏书远远超过唐官府的其他所有机构,即使秘书省也“不能处其半”。到开元十九年(731年)集贤院四库书已达八万九千卷,其中经库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二卷,史库二万六千八百二十卷,子库二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库一万七千九百六十卷,可见其增长速度之快,数量之丰。

集贤院藏书的载体质量很高,写书用的各种材料都是由全国最著名的产地提供,如蜀郡的麻纸,上谷的墨,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作笔材的兔毛等,所写的书分为正副二本,分藏东西二都。经库书采用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库书轴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这种区别四部的办法,较隋代的三品区分法更进步了,这是我国写本书极盛时代的产物。

“三馆”之三的史馆是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为修撰五史而设立的。此前各代虽有设馆修史之举,但并无有职官、有组织的定型机构。“历代史官,隶秘书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修国史。武德因隋旧制,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旧唐书·职官志》)。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既要修史,则不免需要大量藏书,且藏书之重点在史籍。唐代史馆所藏仅《国史》、《实录》、《起居注》等史籍即达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史馆的职官主要有:由宰相兼任的监修国史、由他官兼领史职的史馆修撰和初入史馆的直馆,史馆修撰中以官阶高的一人判馆事,其下设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四人,亭长二人,掌固六人,装潢匠一人,熟纸匠六人。

“三馆”之外,还有崇文馆、司经局和翰林院等比较主要的唐代典籍收藏机构。崇文馆原名崇贤馆,因避太子李贤讳而更名,它与司经局均为太子的藏书所,隶属东宫。崇文馆也有一套掌管藏书、校书、抄书的职官系统,有校书、典书、令史、榻书手、楷书手等。司经局“掌经

籍,出入侍从,图书上东宫者,皆受而藏之”(《新唐书·百官志》)。同为太子专藏,司经局的藏书不同于崇文馆的藏书,前者是东宫藏书之总荟,专为太子服务,后者则主要为学士、生徒服务。司经局设洗马掌四库图籍缮写刊辑之事;文学以“掌分知经籍,侍奉文章,总辑经籍缮写,装染之功;笔札给用之数,皆料度之”(《唐六典》)。同崇文院一样也设有校书郎、正字、楷书手、典书、装潢匠等职,只是人数有别。

开元初,皇帝的机密诏书是由集贤院内的翰林待诏起草。开元二十六年,唐玄宗改翰林待诏为翰林学士,单独设置一个学士院,这即是一直沿存到清代的翰林院。翰林院既是专为皇帝起草诏书和备顾问的机关,也就必须具有一定数量的藏书,“翰林院南厅五间,中架为藏书南库。出北门,横屋六间当北厅,通廊东西二间为藏书北库。其中库书各有录,约八千卷,小使主之。西三间,书官居之,号曰等制”^①。这些书有专人典守,每库有收藏目录。翰林院的藏书虽不算多,但它不失为唐代的又一官府藏书机构。

宋代的图书事业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其馆阁藏书也较唐代更兴旺,三馆加上后建的秘阁,被正式称为“馆阁”,并由此形成了一套在我国古代公藏典籍管理中继秘书监制之后产生过极大影响的又一典籍管理制度——馆阁制。尽管秘书监制仍然存在,但它的作用远非昔比。馆阁加上皇家的众多楼阁藏书构成了宋代公家典籍收藏机构的主体。

宋沿唐制所建的三馆中,唐时的弘文馆因避宣祖庙讳改为昭文馆。宋太祖即位时,看到原三馆“三秋隘卑痹,仅蔽风雨,周庐微道,出于其旁。卫士驺卒,朝夕喧杂。每受诏撰述,皆移他所”(《文献通考·经籍考》),因此下令重建三馆。不到一年,三馆建成,并于次年(太平兴国三年)二月正式赐名崇文院,将原三馆藏书迁入,东廊为昭文书

^① 李肇,《翰林志》。

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为分经史子集四库的史馆书库。宋史馆藏书最多,与唐朝正好相反,这主要是由于修史而典籍渐集于史馆所至。三馆典籍共八万卷,皆用雕木架藏之。馆内已编定的典籍一律用黄纸写成大字本册,以防盗或借书不还。端拱元年(988年),朝廷又在崇文院中堂建秘阁,选三馆善本、书画真迹及天文方术之书藏于其间。初时有善本书籍万余卷,书画一百四十轴,天文方术典籍三千零一十二卷。自此,我国古代著名的藏书地——崇文院便有了完整的体系。崇文院置检讨,掌修国史,以京官充任;校勘,掌校勘典籍,以京朝官、幕职官选任;以内侍二人为勾当官,通掌三馆图籍;孔目官,掌收贮图书,勾稽簿籍等事。

宋代的三馆秘阁虽然统于崇文院,但藏书仍分别置放,各隶属于不同官府,各有不同职守,也各有一套职官。尽管如此,三馆秘阁所在的崇文院仍不失为政府重要的典籍收藏处所,它在典籍收藏、撰述、整理、出版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宋朝的许多官修巨典主要利用崇文院所藏典籍完成;宋代主要的官藏典籍目录,如:《崇文总目》、《秘阁书目》、《秘书总目》、《馆阁书目》等都在崇文院完成。

元丰改制之前,崇文院和秘书省互不统属,元丰改制后,地位曾一度被削弱的秘书监重新恢复其职能,并一跃而统辖崇文院。三馆馆职由秘书省统一领导,设秘书监、少监作为秘书省正副长官,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等事,其属官仍如唐代。

虽然宋代在元丰改制之后重新恢复秘书省的职能,但由于各收藏典籍的馆中仍设置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典籍管理职官,其中的职官不仅不属于秘书省,而且还高于秘书省,管理典籍的实际工作也多由各馆阁的官员去做。因此秘书省形同虚设,名义上掌管文艺图籍,其实,唐以后其职能已由馆阁所代替,秘书监以下的官职,仅备其名而已。

宋代还有不少殿阁是官府收藏典籍的重要处所,如:太清楼、龙

图阁、天章阁等,这些殿阁藏书很多,专供皇帝使用。各阁设立大学士,下设直学士、待制等官,具体掌文字整理、典籍保管之事。有些具有纪念性质,即收集保存前朝遗物和遗作。如龙图阁即为纪念宋太宗而设,真宗时修建,藏书质量很高。真宗咸平二年(999年)三月曾“诏三馆写四部书二本,一置禁中之龙图阁,一置后苑太清楼”。龙图阁的典籍分上下两层收藏,阁上藏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共五千一百一十五卷(轴、册),阁下按类分六阁藏御用图书等:经典阁藏经部典籍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卷,史传阁藏史部典籍七千二百五十八卷,子书阁藏子部典籍八千四百八十九卷,文集阁藏集部典籍七千一百零八卷,天文阁藏天文典籍二千五百六十一卷及图画七百零三卷(轴、册)。宋真宗十分重视龙图阁的藏书搜集和整理,编有《龙图阁书目》等目录。

宋代藏书机构的职官多沿袭旧制,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宋代将馆阁职务分为“馆职”和“帖职”,凡“直馆、直院,则谓之馆职,以他官兼者谓之帖职”(《宋史·职官》)。宋代馆阁官员的品级比唐朝高,龙图、宝文等阁的学士为正三品,直学士为从三品,待制为从四品,秘阁修撰为从六品,秘书郎、直秘阁为正八品,校书郎、正字为从八品,并且高于其他官署的同级官员。领馆阁的人都是经考试后才上任的,是优秀文学之士,他们在宋代典籍的搜集、整理、编撰、校讎、刊正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使宋代典籍的公家收藏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元代早在太宗时期就有了公藏典籍管理机构,1236年在平阳建立的经籍所就负责收藏典籍。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经籍所迁入大都,改为宏文院,成为正式的公藏典籍收藏机构。元朝入主中原后,又先后建立了秘书监、艺文监、奎章阁等典籍收藏处所。此外,翰林院、国子监、国史院、集贤院等处也都是元朝重要的典籍收藏处。秘书监的秘书库藏有元政府的主要典籍,库中所藏虽“俱系金、宋流传及四方购纳”的珍贵典籍,但因其不重视管理,一直处于紊乱状态,至使所藏典籍“库无定所”(《元秘书监志》),库中的典籍只简单的分为

“四库”和书画及“看册”三类进行收藏。至惠宗至正二年(1342年),才在秘书丞王道关的建议下对其进行了简单的清点登录。除秘书库外,艺文监的艺林库和广成局也是元代重要的公藏典籍收藏处,其主要收藏以蒙古语翻译的汉文儒家著作。秘书监是元朝政府管理公藏典籍的最高机构,其管理人员有秘书监、卿、太监、少监、典簿、典书等,这些官员大多由两人担任,“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南人、汉人贰焉”。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在广收典籍的基础上加紧典籍收藏殿堂的修建。洪武元年(1368年)开始修建大本堂等藏书处。洪武三年置秘书监,掌内府书籍,建立了宫廷典籍收藏体系。

明代的公家典籍收藏以内府为主,主要机构有:文渊阁、大本堂、武英殿、东阁、皇史宬、古今通集库等等。其外各部、署、郎、曹也有一些机构收藏典籍,如翰林院、国子监、行人司、经厂、刑部等。明代官府的典籍收藏机构虽然很多,但大体有一定分工。文渊阁、东阁等殿阁是综合性典籍收藏机构,经史子集四部皆备;皇史宬则专藏累朝实录和宝训的正本;古今通集库主要收藏古今君臣画像、符传、典籍等;国子监则以收藏书板为主,并收藏供诸生阅读之用的典籍;各部、署、郎、曹则收藏与本部门职能有关的典籍、档案。

文渊阁作为明代大型的综合性典籍收藏机构曾显赫一时。明文渊阁有北京、南京两处,南京的文渊阁建于太祖定都南京之后,明初所收元代的典籍大多度藏于此。永乐年间编纂的著名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即于此开局编纂,并主要利用文渊阁的藏书,书成之后又藏于此。因此,南京文渊阁藏书非常丰富,可惜毁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大火中。

北京的文渊阁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建于皇宫午门内,先以阁东五间贮藏书籍,其后又为藏书专辟一小楼。北京文渊阁的藏书较南京更为丰富,基本汇集了宋金元三代的精品。北京文渊阁刚落成,成

祖便命从南京文渊阁所贮典籍中装运一百柜至北京,先贮于左顺门北廊,二十年后,即正统六年(1441年)才将这批典籍移贮于文渊阁内。后经杨士奇等人清理编成《文渊阁书目》,收录典籍四万三千二百余册,多系“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明史·艺文志》)。文渊阁号称藏书万余部,近百万卷,其后又经数次访求遗书,使其成为我国有史以来藏书最丰富的机构。文渊阁藏书是按千字文排序,自“天”字至“往”字,共二十字号,五十橱。其收藏方式为历代仅有。

明代另一独具特色的典籍专藏机构是皇史宬。皇史宬是明代后期才建立起来的几个典籍收藏机构之一。实录、宝训被历代王室尊为正史,其收藏历来特受重视。为了能永保朱家王朝,朱元璋制定了许多非常严厉的训条,使实录、宝训在明代显得尤为尊贵。这些文献实为档案,不宜与图书一起收藏,因此有必要设立专藏。明孝宗时期积累了数量颇丰的实录、宝训,均收藏在内阁,而且都是单本,一旦有灾,不堪设想。到嘉靖十三年(1534年),世宗下诏修建神御阁以专藏这类文献。同时任命监录、总视经理同经理官、管录官、誊录官等负责监督校录、誊写、收掌等方面的工作。建造过程中,神宗改神御阁为皇史宬。

皇史宬建筑宏伟壮丽,龙阁崔巍,其内上奉历帝御容,下藏累朝训录,以铜匣度藏。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世宗命将孤本《永乐大典》摹写一副本,隆庆元年(1567年)誊录完毕后,将正本藏于文渊阁,副本藏于皇史宬。

皇史宬的藏品既为皇室之宝,当然受到皇室的重视。明朝政府对其它典籍的管理混乱无序,而皇史宬所藏则严格管理,不但有专人看守,晾晒也有专人负责,完全按规定办理。

明代公藏宏富,处所众多,但由于管理不善,自孝宗朝始,公藏即散乱、亡佚严重,“正德十年冬,大学士梁储等请检内阁藏书残缺者,

令原管主事李继先等次第修补”(《明史·艺文志》)，“繇是其书继先等所盗，亡失愈多矣”，“腐败者十二，盗窃者十五。杨文贞正统间所编《文渊阁书目》，徒存其名耳”^①。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中书舍人张萱等编撰《内阁藏书目录》时，“视前所录，十无二、三。所增益者仅近代地志文集。其他唐宋遗编，悉归子虚乌有耳”；内阁所藏，由于“典司者半系贲郎，于四部之旨懵如，且秩卑品下”，“馆阁之臣借阅者，往往不归原秩，值世庙而后，诸主多不知文，不复留意查核”，使“内阁之储，遂缺佚过半”(《明史·艺文志》)，行人司所藏典籍到万历时已半数不存。虽有识之士多次上疏请求整理官府藏书，但均成一纸空文。

公藏典籍之所以损失严重，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洪武十三年(1380年)因丞相胡惟庸谋反，明太祖乘机实行专权，废丞相制度，撤销中书省，由六部尚书分任国务。另设置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等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但这些大学士远不如唐宋时期的地位，多以品位较低的编修检讨、讲读之官充任。明初承袭元代设置的秘书省也被取消，其所辖转为翰林院管辖。曾一度为图书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秘书监制终于寿终正寝。替代秘书省的翰林院，自唐设置以来，一直是内廷官署，至明代始正式成为外廷官署，掌政府各机构的典籍收藏事宜，兼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将前代秘书监、史馆、著作局、起居郎、舍人等的职能统入翰林院。实际上，这些职官并没有能力对公藏典籍进行管理。洪武十八年设学士、侍读学士等为正官，侍读、侍讲、五经博士、典籍等为属官，修撰、编修、检讨等为史官。翰林院学士为翰林院主官，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以详正图籍、考议制度，备皇帝顾问。其他职官大都为侍奉皇帝的官员，只有典籍才是主要从事典籍收藏具体事务的官员，但仅设两人，官属从八品，另配二名正九品的侍书协助，其任务也只是向朝廷官员提供典籍服务。另外，明代统治者

^① 《万历野获编》卷一。

历来只重视典籍收藏,不重视典籍的管理,收藏处所虽多,但条件很差,著名的文渊阁也是“既居邃密,又制度卑隘,窗牖昏暗,虽白昼亦须列炬”^①,潮湿虫蛀非常严重,其他收藏机构可想而知。典籍整理更是无人负责,终明一世,政府从未对公藏典籍作过认真整理,也就未能编纂一部完整系统的公藏典籍目录。对公藏典籍的借阅也没有严格的制度进行管理,尤以秘阁为甚。各处的管理人员监守自盗,多有盗取以市利者,且其所盗多为所藏之精本。

清沿明制,也没设专门的国家藏书机构,典籍都分散收藏,除国子监、翰林院等藏有部分典籍外,其他典籍主要藏于内府各部门,如武英殿、养心殿、昭仁殿、内阁大库等,各处所藏各有特色,内阁以收藏明代文献、档案、历朝实录和本朝各种公文为主;皇史宬藏本朝实录、玉牒和有关国家典籍制度的大清会典、方略等;昭仁殿里的“天禄琳琅”专门收藏宋、金、元、明版善本图书,坤宁宫后面的摘藻堂、圆明园的味腴书屋则专门收藏《四库全书荟要》的抄本各一部;内庭的宛委别藏则收藏四库全书所未收的典籍;武英殿设有刻书处,所刻典籍多收藏于此,实际上是国家殿本书库;翰林院在清代已失去了原有的职能,其所藏只是修四库全书时留下的底本;朝廷最高学府国子监,所藏主要是可供师生查阅的典籍。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九年,为了贮藏《四库全书》,清廷先后建成了著名的七大藏书阁,即内庭的文渊、文源、文溯、文津四阁,江南的文宗、文汇、文澜三阁,至此,清代的公藏体系基本形成,尤其是宫廷收藏体系更达到了空前的盛况,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类别分明的体系。

“天禄琳琅”是一处保存版本价值较高、刻印精良的宋、元、明三代善本的著名藏书处,创始于乾隆九年(1744年)。当时,乾隆令内府将明以来收藏的宋、元、明善本进呈阅览,览毕便庋藏于乾清宫的昭

^① 《万历野获编》卷一。

仁殿,后来乾隆根据汉代藏书地天禄琳琅阁之意为此处亲笔题额“天禄琳琅”。此处所藏典籍在编撰《四库全书》时又得到从民间所收集的善本的补充,至乾隆四十年编《钦定天禄琳琅书目》时,其藏书已达四百二十四部九千四百三十三册,可惜在嘉庆二年(1797年)毁于火灾。同年,已退为太上皇的乾隆又重建“天禄琳琅”藏书,很快使其所藏达到六百六十一部一万一千九百二十二册,比火灾前的藏书更加丰富,其后在此基础上编成了《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天禄琳琅”的藏书很讲究,每种版本均用同质同色的材料做成统一的函套以示区别,宋刻本及影宋抄本以锦制函套装,元刻本以蓝色绢制函套装,明刻本以褐色绢制函套装,在盖藏书印玺方面也有严格的规定,每册必盖六方印,其中包括两方标记“天禄琳琅”的小玺,四方乾隆的玉玺,而且各印均盖在固定的位置。

南北七阁是清代著名的典籍收藏处,是为收藏《四库全书》而建。位于紫禁城中的文渊阁(图35)最先建成。为了防火、防潮、防蠹,能



图 35 文渊阁

长期保存《四库全书》，在动工修建之前，乾隆曾派专人赴宁波了解范氏天一阁的建筑情况。文渊阁始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月，两年后建成。文渊阁的结构形式全仿天一阁，外分上下两层，各三间。为了防火，也仿天一阁例，在阁前凿一方池，池上架石桥，池中引入金水河水；内部为三层，把旧式楼阁上层地板之下通常不用的空间利用起来。《四库全书》还未编成时，乾隆即颁旨将《古今图书集成》贮于其中。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编成后，便藏于文渊阁。其藏书的布局以儒家经典列为四部之首；经书共二十架，置于下层左右三间；史部三十三架，置于阁中层；子部二十二架，放在阁上层的中部；集部二十八架，放在上层的两边。书分藏于楠木盒中，然后置于书架上。阁下层中间的三间两边放置《四库全书总目考证》和《古今图书集成》。阁上下两层的中央，都用书架隔为大厅，设御榻、御座、御案等，以便皇上阅读。

乾隆四十年，圆明园内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开始修建，乾隆四十七年沈阳故宫内的文溯阁建成。此三阁的建制也都仿天一阁。文溯阁建成的同年十月，第二部《四库全书》缮写完毕，便先入藏于此。第二年，第三部竣工，被贮于文源阁。次年十一月，第四部《四库全书》抄竣，于第二年春入藏文津阁。自此，北方四阁的藏书体系全部形成。

与此同时，乾隆又“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藪，……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因此下令在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在镇江口金山寺建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建文澜阁（图36、37，见315页），并分别在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建成，同时乾隆“着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份，安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八谕》）。藏于文汇阁的《四库全书》始抄于乾隆四十七年，历时八年才完全藏毕。在此过程中，乾隆又对四库全书多次进行增删调整，使七阁所藏四库全书不完全一致。



图 36 文淵閣



图 37 文淵閣御題碑

文汇阁所藏的《四库全书》共三千四百七十一种，七万九千二百一十八卷。文汇阁藏书布局颇有特色：其下层中间置《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五千零二十册，两边橱中藏四库经部，中层藏史部，最上层左边放子部，右边度集部。所有典籍均用考究的函盒贮之，如只有一、二本，也用楠木板夹藏。书皮的颜色经史二部与文渊阁一致，分别用绿色、红色标识，子部、集部则分别用玉色和藕荷色标识。

当然，江南三阁的藏书毕竟不同于北方四阁的御藏，不论是其抄写质量还是校对精细程度都不及北四阁，书型也比北四阁稍小。

清代七阁中文渊、文津、文溯、文澜四阁的藏书比较幸运，被基本保存下来，而其他三阁所藏则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清代没有专门的国家藏书管理机构，众多的藏书处所各由其相关的部门管理。雍正、乾隆两朝为了管理七阁藏书，仿宋代之制设文渊阁职，以文渊阁领阁事为长官，满汉各一人，以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兼任，总掌宫廷图籍；设提举阁事一人，以内务府大臣兼任，为事务长官，是内阁藏书的实际负责人；设直阁事，满汉共六人，以内阁学士、詹事、侍读、侍讲学士等官兼任，“掌典守厘辑之事，以时与校理轮番入值，凡春秋曝书，则董率而经理之”；还有校理十六人，“分掌注册点验之事”，以翰林院侍读、侍讲、编修、检讨及詹事府所属洗马、中允赞善及科甲出身的内阁侍读兼任；检阅八人，掌排次清厘之事，以科甲出身的内阁中书兼任；内务府另派兼管司员四人，笔帖式二人，供奉三人，“掌一切收发启闭扫除及稽查宿直之事”^①。虽然在形式上文渊阁职的管理机构很健全，各级官员的职责都很明确，但由于这些官职全都是兼任，并非专职，且七阁地处分散，根本无法统一管理，所以实际上这些职官形同虚设，充其量只是掌管文渊阁的典籍收藏，甚至连文渊阁的藏书也未能管理周全，至清末多

^① 《东华录》乾隆八十三。

有阙失。

内务府负责管理皇家园苑,设于这些地方的各藏书处都没有设专职官员进行管理,如圆明园设管理大臣,而其中的文源阁就没有专门管理人员。其他如翰林院、国子监等藏书较多的处所,也只设典籍进行管理。

江南三阁远离京城,更没有专职的管理人员,也不为地方官员所辖,而是由两淮盐运使兼管,设典书一人,每年再派十几个有识之士负责日常典籍的收藏、借阅、曝晒等事宜,也是临时性的管理。文澜阁后来由司事、训导等官员兼管,直至同治、光绪年间,丁申、丁丙等任书阁董事,才有比较专门的人员负责,但仍是兼职。

四、公藏典籍的利用

我国古代的公藏典籍流通范围很窄,能够利用的只是统治集团中的少数上层人物。同时在典籍出现的初期,由于典籍稀少,被视为宝物,也导致公藏典籍不能被广泛利用。虽然唐宋以来由于图书事业的进步,出版事业的发达,使公藏典籍的利用率大幅度提高,但仍只能有益于少数人,而不能泽被普通百姓。

汉代的公藏典籍控制得很严,皇室藏书不准随便利用。东汉阳嘉二年(133年),李固向汉顺帝建议“开石室,陈图书,招会群儒,引向失得”(《后汉书·李固传》),但未能被采纳。后来,典籍藏而不用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兰台甚至发生过贿改经书文字的事件。为了扩大“六经”的影响,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政府在洛阳城南太学立了四十六块石碑,上刻著名学者、书法家蔡邕书写的“六经”,这即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后汉书·蔡邕传》)。熹平石经的竖立,一方面开放部分公藏典籍,使大部分学人得以窥其全貌,同时也不致损坏典籍,而且还可

以使儒家学说广为传播。

汉代的公藏典籍未经皇帝许可,不得私借和录制副本,否则严厉制裁。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太常苏昌私借兰台典籍给大司马霍山抄写,结果,苏昌被免官,霍家欲“献城西第,入马千匹,以赎山罪”(《汉书·霍光传》)。不过,汉代的公藏典籍除皇帝查阅外,并不是所有人都不能利用,如太常、太史、博士等直接负责典籍管理的官员就可以阅读,因工作和研究需要的人员经皇帝特许也可以利用,如刘向等校整典籍的人员,伏无忌、黄景等奉旨撰述的人员。

汉代政府经常组织学者置身书库,利用公藏典籍编撰大量史书,如班固、刘珍、伏无忌、边韶、延笃、蔡邕等都先后在东观利用藏书撰写《东观汉纪》、《汉书》等国史;班固还与学者陈宗、尹敏、孟异利用兰台藏书共撰《世祖本记》;刘珍等人还利用政府所藏典籍撰成《建武以来名臣传》。班固是汉明帝时的兰台令史,在兰台典校图书的同时,编著《汉书》,其资料主要源于公藏中的史记。

汉代的博学之士,有志于著书立说者,也都通过各种渠道利用政府所藏典籍,或纪旧闻,或抒己见,如司马迁的《史记》、应劭的《风俗通义》、王充的《论衡》等。司马迁于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除太史令,得以博览金匱石室中丰富的档案秘籍。后又拜中书令,又得以博览兰台、延阁、广内三大藏书处的一切图书资料,因此,司马迁可以“先据《左传》、《国语》、《系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而后贯穿经传,驰骋古今”(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序》),而成《史记》。《后汉书》卷十八记载:“(黄香)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肃宗如香诣东观,读所未尝见书。”黄香在当时称为至孝,肃宗特以“观书东观”作为嘉奖。从此以后,借阅公藏典籍成为政府或皇帝表示加恩于某些官员的方式。

唐代是我国写本书时代公藏典籍发展的顶峰。由于典籍数量的增加,政府对典籍的珍视程度已不及汉魏时期,而且由于学术文化的

发展,典籍的使用已成为一种社会需要,因而作为典籍收藏的主体——公藏典籍的利用也较前代更为普遍。但御府藏书仍只有集贤院、秘书省、弘文馆等机构的官员有机会阅读,其他各处所藏也只有皇亲国戚有权利利用。唐中书令李敬玄在为官之前曾“博览群籍,尤善于《礼》”,他为了能有机会观阅内府所藏,经马周推荐,被“召入崇贤馆侍读”,于是才得以“借中秘读之”(《新唐书·李敬玄传》);阳城“家贫不能得书,乃求为集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昼夜不出房,经六年,乃无所不通”(《旧唐书·隐逸传》);唐代著名学者和文人中有许多都是因任于秘府,故得以广览公藏而成其伟业。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他父亲就是秘书省的秘书郎,经管秘阁典籍,他自己也曾为监察御史、国子博士等职;柳宗元则在26岁被授集贤殿正字,直接掌管集贤殿所藏典籍;白居易、李商隐等诗人都曾得任秘书省的校书郎。

唐代还经常利用所藏典籍为皇帝作政事参考及编纂史书、类书、注释校订“五经”等。唐太宗“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无量、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肃德言等,并以本官兼学士”(《旧唐书·太宗纪》)。太宗常到此处与群臣讲文论道,商讨国事;而这些学者则通过利用秘阁藏书回答皇帝的询问。唐代的史馆既是重要的典籍收藏处所,也是学术研究机关。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令由魏徵总监、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棻等根据史馆所藏魏晋以来历朝的史料分别修撰《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于贞观十年正月完成。紧接着又诏修《五代史志》,十五年以后方成,后合入《隋书》。此后,房玄龄等人又先后撰成《晋书》、《南史》、《北史》。我国现存最早的官修类书《艺文类聚》,也是通过对丰富的公藏典籍进行筛选、以类为编修撰而成。贞观四年,太宗令中书侍郎颜师古、孔颖达考定《五经》,颜、孔在充分利用政府藏书中南北朝诸儒著作的基础上编成《五经正义》,如《尚书正义》、《毛诗正义》来源于刘焯、刘玄的著作,《春秋正义》及《礼记正义》则脱胎于杜预、皇侃等人

的著作。在随后回答诸儒的非议时，颜师古还引秘府所藏“晋、宋已来古本，随方晓答，援据详明”，使“诸儒莫不叹服”。^①

宋代公藏典籍的利用较唐代更进一步，能够利用馆阁及其他公藏典籍的，除了皇帝及其近臣外，还有各藏书机构的管理人员、政府高级官僚。每年参加殿试的考生也可以利用公藏典籍，每遇殿试，三馆都要提典籍入殿（《宋会要·职官》）。秘阁所藏仍专供皇帝御阅，一般不提供给其他人利用，但在进行典籍整理时，秘阁藏书往往作为参校本而获得利用。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典籍不但在整理时可以互相参校，而且能公开借阅，甚至还能抄录，著名藏书家苏颂的许多藏书都是从秘阁抄录而来。各馆还专设有外借书库，“熙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监三馆秘阁言，欲将借本书库原书籍添入经史子集，书数足备，更准备阅览”（《宋会要·职官》）。外借书库以外的书则不能借阅。宋代负责借阅工作的人称为“库子”，借书要填写“单子”，并且经“监门”检查后才能将书借出。由于借阅典籍的人多，使政府所藏典籍散失严重。咸平年间，宋真宗曾说：“近闻图书之府甚不整齐，假借之余，散失尤多。”朝臣朱昂等也上奏说，四部书为朝臣所借未还的达四百六十卷。于是真宗令有关官员“严行约束，杜绝因循”，并督促借书人员还书入库。当时馆阁藏书佚亡现象十分严重，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有“官书多为人盗窃，士大夫家往往得之”的记载。到了北宋后期，外借典籍的损失更为严重，程俱在《麟台故事》中记载：“三馆秘阁自崇宁四年（1105年）借出书籍未还者四千三百二十八册卷，久不拘收。”因此，政府规定只有集贤书院所藏典籍可以外借，其余公藏典籍不得借出，如有违反，私自借出则以法论处，借书的人也要受罚。

国子监、地方州学等机构的公藏典籍也可借阅，《天禄琳琅后编》所载宋版《大易粹言》卷末纸背有这样的印记：“国子监崇文院官书，

^① 《贞观政要》卷七。

借读必须爱护。损坏缺损，典掌者不许收受。”

宋代的公藏典籍除一般借阅外，还专为公私著述提供资料。历史学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写到八卷后得到英宗的支持和重视，允许他在崇文院设馆撰写这部巨著。司马光利用这一机会参考和查阅了崇文院大量的典籍，尤其是史馆所藏典籍。太宗、真宗两朝编纂的著名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巨著，也是利用政府公藏典籍所完成的。自此以后，宋代历朝政府都充分利用公藏典籍编纂各种书籍，如各朝的《实录》、《宝训》、《日历》、《时政记》、《御制文集》等万卷，《开宝通礼》、《太常因革礼》等礼仪著作三千三百多卷，各代会要约一千九百卷，及其他各方面的典籍。

宋代以后，由于雕板印刷和活字印刷的出现，为了进一步扩大公藏典籍的利用，历代政府都以馆阁藏书正本用于出版。馆阁藏书整理校勘精细，错误较少，故而凡官方出版典籍，大都以馆阁校勘的定本作为底本刻印。

明清以后，由于历史的进步，在典籍的利用上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清高宗弘历一方面实行严酷的文字狱，压制世人的反清情绪，另一方面，为了扩大封建正统思想在学子中的影响，放弃了汉魏以来锁闭公藏典籍的作法，提倡世人利用经过政府严格选择的部分公藏典籍。乾隆时期的江南三阁即专为便于一般江浙士子借阅公藏典籍而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六月曾下诏说：“《四库全书》荟萃古今载籍，富有美备。不特内府珍藏，藉资乙览，亦欲以流传广播，……所有江浙两省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应贮全书，现在陆续颁发藏皮，……从前曾经降旨，准其赴阁检视抄录，俾资搜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他还怕地方官吏对公藏典籍管理过严，一般人无从借阅，故明令准许士子到阁抄录，但不得带回家。国子监及一些府州县地方学校的公藏典籍也提供给生员阅览，供借阅的书后多印有“(××)学官书，许生员观看，不许带出学门”的字样(《书林清

话》)。而且由于明清时期公藏典籍管理混乱,出现一些不具备阅览公藏典籍的人有机会利用官府藏书、不允许阅览的典籍被利用的情况。加之官吏盗卖公藏典籍严重,致使很多政府所藏典籍流入民间,从而使更多的人得以阅读利用。

第二节 典籍的书院和寺观收藏

一、典籍的书院收藏

我国典籍的书院收藏是伴随着书院的产生而出现的,并且随着书院的发展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半公藏性质的典籍收藏体系。

唐开元年间,唐玄宗从马怀素、诸无量等人之请,在东都洛阳的乾元殿进行了一次唐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典籍整理活动。在此过程中,玄宗对唐政府的典籍收藏机构和管理机构进行了调整,“开元五年(717年),乾元殿写四部书,置乾元院使,……六年,乾元院更为丽正修书院,置使及检校官,……八年,加文学直,又加修撰、校理、刊正、校勘官。十一年,……光顺门外亦置书院,十二年,东都明福门外亦置丽正书院。十三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新唐书·百官志》)。由此可见,我国的书院是在典籍整理过程中产生的,从而使典籍的收藏成为书院活动的重要内容,并且使书院藏书具有了官方性质。

由于其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在书院初期,其主要活动就是典籍的收藏和管理,实际上唐代官立的丽正、集贤书院是国家的典籍收藏中心,在开元十九年时,集贤书院藏书达八万九千余卷。由于集贤书院收罗了大批文人学士,从事典籍整理和修撰,使其成为全国典籍整理的权威机构。它的这种中心地位,为后世书院典籍收藏和整理奠定

了优秀的文化传统。

唐代的书院藏书除官办集贤、丽正书院外,还有一些民办的书院也收藏典籍,“乐村书院在德安县,唐义门陈袞建,聚书千卷,以资学者”^①。唐代著名藏书家李泌之子李繁所建的明道书院,也有藏书三万卷。由于唐代的书院发轫于典籍的收藏和整理,因此,唐代见于《全唐诗》的11所书院,和见于地方志的17所书院大都藏有数量可观的典籍。

唐代的书院藏书是我国书院收藏典籍的滥觞,还未能形成一种体系。到宋代,书院发展成为一种较完善的教育制度,由于政府的扶持和倡导,北南两宋的书院达到397所。虽然此时书院的职能已有了进一步发展,已不仅仅是典籍收藏整理中心,而且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和学术中心,然典籍收藏仍是书院的重要活动之一。丰富的藏书为书院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雄厚的知识基础。宋代的书院绝大部分都藏有典籍,其中最著名的有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河南应天书院、嵩阳书院。宋代书院的藏书数量颇为可观,应天书院即聚书一万五千余卷;由蒋友松建于浙江东州县的南国书院,“聚书三万卷,宾硕儒以教其族党子弟”^②。而藏书最多的是鹤山书院。鹤山书院是南宋著名学者魏了翁所建,他在其《鹤山书院始末记》中记载:“堂之后为阁,家故有藏书,又得秘书之副而传录焉,与访录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由此可知,鹤山书院的藏书甚至超过了当时国家馆阁所藏。由于藏书数量巨大,有些书院建有专门的处所以贮典籍,如杜洲书院就建有专门的书库,建于河南归德府的范文正书院则建有藏书楼。

两宋的书院多以官助形式建成,政府为了控制书院的教学和学

^① 《光绪江西通志》卷八二。

^② 《光绪浙江通志》卷二八。

术研究,不断向各书院颁赐官书。北宋咸丰四年(1001年),“诏郡县学校聚徒讲诵之所,各赐《九经》一部”(《渊鉴类函》)。“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三月庚寅,知江州周述言庐山白鹿洞学徒数千人,请赐《九经》肄业。诏从其请,乃驿送之”。至道二年(996年)七月,政府向嵩阳书院“赐院额及印本《九经》书疏”,又于祥符三年(1010年)四月赐给《九经》。岳鹿书院在咸平二年(999年)曾奏请朝廷赐以国子监诸经释文义疏及《史记》、《玉篇》、《唐韵》等典籍。祥符八年(1015年),朝廷“又以中秘所藏典籍以赐”(《玉海》卷一六〇)。民办书院除了接受朝廷赐书以外,大多以创办人家藏典籍作为基础建立书院藏书,如,“东阳东郭君钦正作书院于石洞之下,徙家之藏书以实之”^①;鹤山书院的十万卷藏书,也是以魏了翁原有的家藏典籍为基础的。

由于雕板印刷的普及,宋代的书院有很多都从事典籍刻印活动。著名的如:婺州书院于南宋绍定年间印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二卷及吕祖谦的《新唐书略》三十五卷;泳泽书院在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刻印了大字本朱熹的《四书集注》十九卷;环溪书院在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刻印过杨士瀛的《新刊仁斋直指方论》二十六卷,《小儿方论》五卷及《伤寒类书活人总括》七卷,《医脉真经》一卷等;建安书院在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刻印了朱熹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目录》二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白鹭州书院则在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刻印过颜注《汉书》一百卷、李贤注《后汉书》九十卷,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志注补》三十卷,等等。由于书院所藏典籍版本都较精,而且多由书院的山长组织学者精审详校,再加上不以盈利为目的,刻印精美,所以宋代的书院刻书不但为书院的典籍收藏开辟了新的途径,而且其书版不储官,易于印行。

宋代书院藏书的管理,特别是借阅方面的管理已颇有章法。白鹿

^① 叶适:《水心集·石洞书院记》。

书院详细拟定了典籍禁止借阅的范围,并且规定了典籍借阅的手续及方法,“在洞生徒借读者,写票于管干处,领出以便稽考。缴书销票,不许耽搁延捱,致误后来借阅。损失者勒限赔补”。并且拟定统一的典籍借读票式:“某于月日借洞中藏书,某样一部,计几本看阅。缴书销票,损失赔还,不致久淹时日,此照。”对于典籍收藏的管理,白鹿书院也有较详细的规定:“原有书籍若干,其洞志书目若干,应补若干,查明造具收管。除现在四柱清册交洞中管干收管,其书有缺失,当事及四方绅衿愿送收藏者,仍入册注日月,收于新收项下。”^①

宋代以后,书院的发展经历了几度沉浮,书院藏书的发展虽有起有跌,但进入清代已形成一种比较完备的藏书体系。由于政府的提倡,书院的数量大大增加,仅雍正朝批准官办的省级书院即有22所,甚至在边远的地区也建有书院。各书院中的生徒越来越多,对典籍的要求越来越大。另外,由于清廷文字狱的迫害,汉族学子大都埋首于故纸堆中,促使汉学的复兴,考据之风盛行,而书院已成为全社会学术文化发展的基地,如汉学中两个著名的学派——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就分别以紫阳书院和金华书院为阵地引导学术研究的发展,故而大量学者集中于书院,不但提高了对书院典籍的需求,而且刊行了许多学术著作。

清代书院的藏书来源广泛。清廷沿袭前朝的作法,把赐书作为控制书院的手段,使赐书成为书院所藏典籍的重要来源,康熙十二年(1684年),清廷赐给岳麓书院“《日讲》、《解义》诸书及经史十六种”^②,其中包括:《明史》、《乐善堂文集》、《日知答说》、《春秋传说汇纂》、《性理精义》、《日讲四书》等;康熙二十五年(1716年),赐给福建鳌峰书院“经书八部,御书经法帖一本,御书《渊鉴斋法帖》十本,《淳

① 《白鹿书院志》卷一一。

② 《光绪湖南通志》卷六八。

化阁法帖》十本”^①。同年又赐给浙江敷文书院《渊鉴类函》、《周易折中》、《朱子全书》等。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宗下旨,赐给会城书院、钟山书院、紫阳书院、敷文书院等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一史》各一部。^②

但是,由于清代典籍出版印刷业发达,从别的途径获得典籍相对容易,所以清代书院所藏典籍的来源,除了朝廷赐与以外,比较主要的途径有二:一为官吏乡绅捐赠。这是清代书院所藏的主要来源。他们或资助书院,扶持学术研究,或为搏取佳名而捐赠典籍,或出资捐产以置典籍。著名的白鹿书院就先后接受了多人捐赠的典籍,少司空张伯行先后赠送64种,太守周灿赠14种,提学冀霖和星子令毛德琦各赠送3种^③。康熙五十六年(1791年),江西学使王思训捐俸给豫章书院,并且购买“十三经”、《二十一史》、唐宋八大家文集及先儒语录等典籍送给书院^④。乾隆十一年(1746年),黄锦以“雷郡地边海缴,书籍未备”,特“捐俸购《二十一史》、‘十三经’及子集各书五千余卷”于广东雷州府雷阳书院的“博文馆”。^⑤

乾隆十九年(1754年),上犹县钟峨建永清书院,并捐田六百亩,书籍数千卷^⑥,其中安庆府的敬敷书院受捐最多。光绪元年(1875年),布政司孙依言带头捐赠书籍,他共捐典籍四百七十四部,丛书五十四种,其中有许多精品,如《十三经注疏》、《十三经古注》、《御纂周易折中》、《大学衍义》等^⑦。而同治年间,湖南各乡的绅士一次就向岳麓书院捐赠典籍一万四千一百三十卷。由于接受捐赠非常频繁,岳麓

① 《同治福建通志》卷六二。

② 《皇朝文献通志》卷七一。

③ 《同治南康府志》卷一〇。

④⑥ 《光绪江西通志》卷八一。

⑤ 《道光广东通志》卷一七二。

⑦ 《光绪安徽通志》卷二九。

书院还专门制定了《捐书详议条款》，规定：“如坊肆刻本及官绅士民家藏已刻未刻各本，应请通行札饬各属劝募捐置。仰蒙各宪现议，陆续捐购，其现任湖南地方文武各宪及通省各属士民，如有家藏书籍愿捐入书院，或自愿量力捐资，以备购买书籍之用者，应请悉听其便。官捐者，官为购买，随时饬交监院收贮；民捐者，民为购买，亦随时呈请监院收贮。”^①此外，书院自行购买，也是书院典籍收藏的主要来源之一，特别是官办书院，更是用公银购置。

乾隆元年(1736年)，清廷诏令“各督抚于省会书院，应将‘十三经’、《二十一史》诸书，购买颁发，令士子熟习讲贯。其动用存公银两，仍报部查核”^②。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河南省封丘县知县黄庭芝用公款共购置各类典籍一千二百二十四册，三千七百三十八卷存储正义书院，其中有经部典籍三百八十七册，九百九十四卷；史部典籍二百九十八册，九百零五卷；子部典籍四十一册，三百一十八卷；集部典籍九十三册，一百一十七卷，其他为舆图，杂著等典籍^③。而其他未能获公银购书的官办书院及民办书院，多以书院的田产所得购买典籍。处于边远地区的书院不惜到内地各省购求典籍，昆明正经书院由于处之边陲，得书不易，于是特“购书于沪、于粤、于楚、于金陵，先后凡数十万卷，栉度之楼，纵人往观”^④。有些书院为了能及时购买典籍，还发动在外的同乡代为购买寄达。安徽仙源书院即具条规定：“各省多设书局，所刻书籍，大率皆精要必备之书。而邑人在各省游宦者……宜各就所便，集资商购书籍，寄至书院。”^⑤

① 杨希生等：《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② 光绪《安徽通志》卷九二。

③ 《民国封丘县续志·掌故》。

④ 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第67页。

⑤ 同上书，第78页。

清代的书院藏书已构成完整的体系,形成了一整套不同于其他典籍收藏体系的管理方法。

清代的书院非常重视典籍收集的管理,有很多书院都制定了具体的管理措施和方法。对于捐赠典籍的管理,安徽江中书院的《募捐书籍并藏书规条》中规定:“各处官绅诸公捐送书籍到院,即于书目注明送书人姓名,……一俟书目积成卷帙,随时刊布。”“各省大宪批准巡道禀并札行颁各书局所刻经籍,由巡道出具领纸,派员弁往领归,分库庋藏。收书簿上即登明书共几部。”“远近官绅颁发捐送书籍,随到随登簿。……暂不分四部目次,只论送到先后,……一俟积满四部十得六七,缥緜盈库,油素分门,然后再按六略、七录分类重编,以示诸生分门讲习。”对于购买典籍,大梁书院特拟《购书略例》以管理:“……近刻种类日繁,备购匪易,先择其最有用者购之。若此间书肆及津局暂时阙如,只得异日续购。所购各书,大半官局新印,纸质坚韧,可以经久。其远年旧刊者,则纸多朽败,择购数种,聊补新印之阙。各书偶有重出,或为单行本,或为丛刻本,或购自他处,艰于更易,故并存之。医卜星相及一切技艺之书,均未购置。”为了节约经费,大梁书院所购典籍多为单本。

对典籍的入藏,各书院也都制定有专门的条例进行管理。《岳麓书院捐书详论条款》中规定:“各项书籍藏贮既多,一收一发,登记宜清,应请监院设立册档,按年登载。新收者或系颁发,或系征取,俱于各书名下注明几卷、几本、几套,系某年、月、日收藏样。……每书壳面上俱钤岳麓书院图记一颗……”很多书院都建有专门处所来收藏典籍。江中书院于“甲午(1894年)之冬,乃出官私泉布,属主簿俞君立诚相地于讲院之东偏,划括榛燕,夷治瓦砾,建高阁其上”,成专门的藏书阁一尊经阁,“阁之上,仿仪征阮公焦山书藏,灵隐寺书藏例,上为书库,募官私刻集以实之”。河南的伊川书院有稽古阁藏书万卷;湖北的问津书院在乾隆八年(1743年)建起藏书馆;河北莲池书院有万

卷楼；广东广雅书院有冠冕楼等等。大部分书院不但有专处收藏典籍而且有专人管理。江中书院尊经阁的藏书和仙源书院的藏书都“公举四人总理。另举在院肄业生，或在院教读者一人，专管借书”；大梁书院的藏书，“均存院长院内西偏精舍，用司书史一人，经管用；司阁役一名，典守锁钥”。兴化文正书院的典籍则“立斋长以专责成。所藏书籍，整齐卷页，谨守管钥，统归经理，无事不得擅离，有事回家须禀明山长，择人庖代”，管理之严，于此可见。

书院藏书自宋代开始即主要为书院教学和研究服务，是以用为主。至清代，这种目的更加明确，因而书院的藏书绝大部分都提供流通和借阅，流通范围和方式都大大优于同时代的公私所藏。为了更好地管理典籍的利用，各书院都制定了具体完善的规则。江中书院尊经阁在“楼下置有桌椅，欲观书或抄书者，只准在此阅抄，限至迟十日必缴。一概不许携带出院，违者议罚”。为了保证典籍的完整和整洁，“诸生借阅，掌书者先将书页当面数清，如有脱页，即于书头上盖戳记。收还亦须当面数过，倘有缺损，须借书补钞。……若妄加圈点批评，亦须面斥，以后不准借书”。“借书但准平时，若课期前，即未逾十日限期，亦须送缴”。“史汉三国及各种类书，只准偶尔翻查，不准借出。……至于孤本、钞本，尤不准借”。这种管理方法已十分接近现代各典籍收藏机构的典籍借阅管理办法。大梁书院则详细规定了典籍借阅手续：“书院置一阅书簿，交司书吏收执。凡肄业生欲阅书者，必邀同斋长一人告司书吏检取，于簿内记明某月某日取某书几卷几本，某生阅。斋长某人，各于名下书押。每次取书，每人只许一种，不得过五卷。至迟十日交还，不得逾期。交还后再取”；“取出书交还后，司书吏即于阅书簿内注明某日交还。并查明原书有无损坏，无则归架，有则询明呈监官核办”。兴化文正书院也规定了较详细的借阅方法：“在院肄业诸生欲观书者，须亲笔书条为凭，至斋长处登簿取给”。一般来说，书院所藏典籍只能当室阅览，不得携出书院外，但文正书院“因念

寒士以馆为家，不克入院肄业。倘深藏不出，事近向隅，破格从权，故有出院之议。但观书不能作辍，须俟肄业诸生阅读后方准出院”，这是典籍流通上的一大进步。为了保证出院典籍能安全归还，书院规定：“借书出院，须有保结呈县，由县付条至斋长处取书，还书时，凭斋长给条至县销结。”

清代各书院不但注重典籍的利用，而且十分注意典籍的保护。江中书院每年都要晒书，并“酌请精细人陆续收晒”，“每月，专管须开书橱晾风一二次”。大梁书院“所存各书，每至伏日，酌量抖晾一次。由司书吏呈明监院官遣派数人，细心经理，勿使凌乱”。对因年代久远而函线损断的典籍，“司书吏呈明监院官，酌易重装。每届一年，监院官将所存各书抽查一次，损失则着赔。”^①

二、典籍的寺观收藏

自从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土、道教在中原产生后，历代统治者都利用其教义和思想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进而大兴土木，大肆营造佛寺道观，作为佛道的宗教活动场所。佛寺道观为从事教义的宣传而进行的典籍收藏，形成了我国古代独特的典籍收藏体系。

汉明帝永平七年（64年），“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资治通鉴》）。十年，蔡愔等人在大月氏遇迦叶摩腾、竺法兰，得梵本佛经。十一年，明帝命在洛阳城西雍门外建白马寺，使摩腾得以翻译所带佛经，如《四十二章经》等（《佛祖统记》第三五）。白马寺是佛教传入我国后建立的第一座寺庙，它的建立是为了方便佛典的翻译，也是为了更好地收藏所译佛典。

^① 李希泌、张叔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第70—79页。

最早收藏典籍的道观,是南朝宋明帝于太始三年(467年)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北郊所建的崇虚馆。明帝建此观的用意在于广延道士、盛集道典,所以,不但在馆内设道藏阁来收藏道教典籍,所藏典籍达一千余卷,而且令陆静修于其中整理所藏道籍。

六朝至隋唐时期,由于历代政府的支持和提倡,佛道两教发展很快,并且渗入国家政治领域,形成影响我国历史发展各个方面的佛、道、儒三足鼎立之势。佛道两教的典籍也越来越丰富,历代政府和各寺观为了更好地收藏和传播都对佛道典籍进行集中造写,逐渐形成“大藏经”和“道藏经”两大典籍体系,并且成为这一时期寺观典籍收藏的重点。南朝齐梁时期的著名僧人僧祐在著名文学家刘勰的帮助下在定林寺“造立经藏,搜校卷轴”^①,至梁武帝时已初步形成经藏,建立起了定林寺的佛典收藏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编成著名的《出三藏记集》。道观除崇虚馆外,长安的玄都观也收藏有大量典籍,北周天和五年(570年),玄都观道士对该观所藏典籍进行整理,成《玄都经目》,据其记载,玄都观所藏道经、传记、符、图、论等共二千零四十卷。后周武帝又下令扩建玄都观,并广搜典籍,令道士王延等对其所藏进行整理,成《三洞珠囊》七卷,著录该观所藏典籍八千零三十卷。唐代由于政府组织抄写,加之玄奘等人西行取经,使佛经的数量大量增加,“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十百倍”(《资治通鉴》卷一七五)。唐高宗时,西明寺所藏典籍达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余卷,后来道宣受高宗诏入寺写经数年,使其所藏达到五千余卷,初步形成了大藏体系。而庐山东林寺的藏书更达万卷。为了保存寺藏佛经,这一时期不少寺院将所藏佛经刻于石上,如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最著名的为房山石经,由隋末静云寺僧静琬始刻,历时千余年,共刻静云寺所藏佛经千余部,三千五百卷。唐朝天子姓李,故而对奉李耳为祖的道

^① 《出三藏记集》卷二。

教也非常重视,使道观的典籍收藏发展很快,不但收藏典籍的道观众多,各道观所藏典籍的数量也增多。昊天观是高宗在显庆元年(656年)为太宗追福而建,所藏道籍丰富,观主尹文操所撰《玉纬经目》即收该观所藏道经七千三百卷。西京的太清宫历安史之乱至晚唐时仍藏有典籍五千三百卷。东都太微宫(原名大福唐观)也藏有丰富的典籍,史崇玄奉诏纂修《一切道经音义》时,即以此观所藏典籍作为重要的依据之一,此外,亳州的太清宫、茅山的紫极宫、天台桐柏的崇道观也是唐代收藏典籍丰富的道观。

宋代以后,佛教典籍进一步增加,佛藏的编辑更普遍,有条件的寺院大都编撰刻印佛藏入藏,著名的有福州东祥寺住持冲真及善明等人根据本寺所藏编印成大藏经《崇宁万寿藏》,共收该寺所藏佛典一千四百五十部,六千四百三十四卷,并于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雕印入藏,成为当时佛寺收藏典籍的标准。南宋初年,湖州圆觉寺僧根据寺藏佛典编成大藏,收录该寺所藏佛典一千四百二十九部,五千七百四十卷。此外,福州开元寺、平江延圣禅院等也都编印有大藏,成为全国各地寺院收藏的基础。两宋的历代君主都十分推崇道教,宋真宗甚至伪造“天书”,尊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宋徽宗更是让道教渗入政治,使道教的发展登峰造极,政府先后在唐时已有的雏形基础上编纂了《大宋天宫宝藏》和《万寿道藏》,各地道观的典籍收藏也达到一个高峰,全国的著名道观都收藏有政府刻印的道藏,东京的太乙宫、建隆观,西京崇福宫等宫观都藏有官本道藏。

明清以后,一方面政府加强了对佛道两教的控制和对寺观的管理,另一方面,佛藏和道藏都已基本成型,这一时期虽然寺观的数量增多,收藏典籍的寺观的数量较唐宋时期有所发展,但各寺所藏多为官修经藏,内容趋于统一,故而各寺观所注意的是所藏典籍的管理。

由于佛道两教一兴起即被统治者所控制,因而政府颁赐成为寺观所藏典籍的重要来源。政府通过向寺观颁赐典籍,一方面可以扩大

寺观的典籍收藏,促进两教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控制佛道的发展,引导其传播方向。南朝宋明帝建崇虚馆时,即允陆静修之请,赐与此观“道家经并符图一千二百卷”,崇虚馆特以“龙篋贮之”^①。隋唐以后,由于佛藏和道藏的初步形成,政府不但通过颁赐官修大藏给寺观,而且还以各种方式帮助寺观建立典籍收藏体系。隋朝建立后,文帝即下令“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隋书·经籍志》)。炀帝则把政府所收集到的佛教典籍移入著名寺院,以利其整编、利用。唐朝有多次赐颁佛道典籍的活动,贞观五年(637年),唐太宗诏令玄琬在德业寺以皇后的名义抄写佛经,并且在延兴寺大造经藏,所写造的典籍皆藏于两寺中,并委托玄琬负责监护。十一年,皇太子又在延兴寺抄写经藏,藏于该寺。十三年,为了劝导僧尼遵守佛祖遗教,特写《遗教经》颁行天下寺院。高宗时,曾向栖霞寺颁赐新旧翻译的《一切经》一藏;为了为其母求福于佛,高宗特建大慈恩寺,并将政府所藏佛经的一部分藏于该寺,还组织人员翻译了许多佛经藏于其中。唐玄宗于天宝七年(748年),发使四处搜访道经,详校后编为道藏,并抄写多部,分赐给天下诸道观。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为了让患病的女儿早日康复,代宗将其送到大兴善寺求福,同时赐给该寺《一切经》一藏,共五千零五十卷。

南北两宋政府先后编纂了六部佛藏和两部道藏,这些经藏完成以后,大都由政府颁赐给全国各地的寺观收藏,构成了全国上下较完整的经藏收藏体系。太宗时,徐铉等校整完成《大宋天宫宝藏》后即赐给各观收藏。真宗时,由张君房修改重编后的《大宋天宫宝藏》又被颁赐天下宫观,随后宋徽宗、南宋孝宗也先后刻印道藏赐与道观收藏,使许多著名的道观都由此而建立了基本典籍收藏体系。东京的中太一宫即受赐收藏有王钦若校定的《宝文统录》和张君房校编的《大宋

^① 清《庐山志》卷四。

天宫宝藏》；亳州明道宫则藏有《大宋天宫道藏》。其他，如茅山万宁宫、天台山桐柏宫、东京延福宫、西京崇福宫等也都受赐藏有道藏。绍兴万寿宫在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受赐道藏经四千五百五十一卷。

明代政府曾刻印了多部佛道经藏，除了收藏于秘阁外，先后颁赐给各大寺观收藏，使这些寺观的典籍收藏得以恢复和充实。明太祖曾向天下寺院颁赐《心经》、《金刚经》、《楞伽经》，而明成祖则将《北藏》六百三十七函颁赐给云南的华严寺。明玄宗正统十二年（1447年）和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先后将《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赐给当时的著名道观，如北京白云观、山西太原玄通观、恒山九天宫等都受赐而藏。

佛道典籍的译著是寺观收藏典籍的又一重要来源。佛教是从印度传入的，因此在佛教初入中土时，所有的典籍都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而且这一时期的佛典翻译大都在各寺院进行，这些翻译成汉文的佛典都藏在译地，成为佛寺藏经的主要部分。汉明帝时，迦叶摩腾等西域僧人被迎入洛阳白马寺后，即在寺内译出《四十二章经》、《佛本行经》、《十地断结经》等多种佛经；汉朝末年，大月氏人支谦为避兵乱入建业，在建初寺译出《阿弥陀经》、《须赖经》等二十九部。魏晋南北朝是佛经翻译的大发展时期，很多著名寺院都辟有专门的译场组织佛经的翻译，大量译经极大地丰富了各寺院的典籍收藏。曹魏时，无叉罗和竺叔兰在陈留的水南寺译出了由中土西行求法第一人朱士行从西域送回的《放光般若经》九十章六十多万字；东晋时著名的佛学家道安在长安的王重寺组织昙摩难提、鸠摩罗跋提等翻译了《中阿含经》、《三法度论》、《阿毗昙八键度论》等多部佛经，东晋另一著名佛学家法显在西域求法15年，带回经律多部，回国后在建康道场寺会同佛驮跋陀罗等人翻译他带回国来的《摩诃僧祇众律》、《十诵律》等佛经；北魏时期，印度著名僧人善提留支来到洛阳，在永宁寺内与勒那等合作，翻译了大量他自己携带的佛经，特别是瑜伽学系的重要著述

《究竟一乘室性论》、《法华经论》、《十地经论》等；梁武帝时，印度僧人真谛应中国政府之邀带梵本经论 240 夹经海南进入中国，先后在豫章宝田寺、栖霞寺，晋安佛力寺，新吴美业寺等寺院翻译佛经共三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进入隋唐以后，佛经的翻译逐渐由政府出面统一组织，在著名寺院建立大型译场，集中翻译佛教经籍。隋开皇五年（585 年），建大兴善寺，并设译场，命彦琮等数十人在此翻译、解释佛经；唐时曾在东西京的崇福寺、西明寺、白马寺、资圣寺等著名寺院开设译场，连远在凉州的卫大云寺也有造经房一所，从事佛典翻译。唐代著名僧人玄奘从西天取经回国后，唐太宗特在长安弘福寺建立了组织完备的译场，供玄奘翻译取自西天的佛经。政府召集了各地的著名僧人二十多名，在场内分担证议、缀文、正字、证梵等职。在他们的帮助下，玄奘历十九年共译出所求的七十五部佛经，达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其中包括《瑜伽师地论》这样的百万巨著，不但丰富了弘福寺的典籍收藏，而且使唐代的佛教典籍拥有量达到一个新的顶点。随着佛教在中土的传播，中国僧人不但翻译介绍印度梵文佛经，也开始撰述佛教典籍，这些撰述大都为对佛经的解释、论疏，如唐澄观所撰《华严经疏钞》八十卷、《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六十卷，唐善导撰《观无量寿佛经疏》四卷等；也有其他一些与佛教教义和活动有关的著述，如晋代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明报应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唐善导的《法事赞》、《观念法门》等，这些著述也构成了寺院典籍收藏的重要来源。另外，信男善女的捐助也是寺观所藏典籍的来源之一。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 年），信士邓从贵捐出全家族的资产五十万，募工为北京西山清水院（即大觉寺）请印大藏经五百七十九帙，创内外藏而彙措于此院。大安五年（1089 年），燕京析津府安次县信徒刘惟极等人捐资在祠堂里寺内建大藏一所。隋唐以后，很多文人学士都与佛寺交往甚密，他们往往将自己的著作赠给寺院作为寺院所藏，白居易就曾将自己的文集赠与东林寺、香山寺等处。

随着所藏典籍的增加,很多寺观都设立了专门的处所收藏典籍。早在晋代的浙江雪窦寺就建有藏经阁,其后南北朝时期山东的定林寺有校经楼;建于隋开皇十八年(598年)的浙江国清寺有藏经阁;五代梁开平二年(908年)建于浙江的涌泉寺建有藏经殿,不但藏有普通的佛典七千余册,还藏有各地苦行僧刺血书写的经书六百余册;建于辽代的山西华严寺有藏经房三十八间,至清时藏经达一万八千余册。许多道观也都建有专门的藏书处,北宋东京的祥源观就建有经楼;延福宫则建有藏殿;西京的崇福宫建有轮藏殿;南宋吴兴的报德观也筑有经阁。

在寺观收藏典籍的初期,由于所藏典籍数量不太大,其管理还处于一种原始状态,至隋唐时期已发展得相当完备了。唐代的东林寺对所藏典籍已有专人严格管理。龙兴寺是敦煌的著名寺院,它的典籍管理制度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寺观典籍管理的代表。龙兴寺管理藏经的机构叫“经司”,其管事人员有“僧政”、“法律”,“所由”等。其经藏分上下两藏,既有属于本寺的经典,又有公用的官家经藏。官经由“所由”负责管理,僧人们如因传经、抄经所需,可从官经借阅,通过“所由”办理借经手续。“所由”则定时催促借经人及时归还所借经本,以利于他人使用。“所由”定期点勘藏经,如发现损缺,则及时配补。“所由”之职由有关人员轮流担任,前后任“所由”交接时将佛藏点勘清楚,办理好交割手续,若有损失,概由前任负责赔补。^①

到了清代,寺观典籍的管理更是制度化。杭州灵隐寺“于大悲佛阁后造木橱”度藏佛典,并“以唐人‘鹫岭郁岧峣’诗字编为号。选云林寺玉峰、偶然二僧簿录管钥之”,并且“刻一铜章,遍印其书”。对于有关典籍的管理事宜,灵隐寺制定了详细的条例:“送书入藏者,寺僧转给一收到字票;书不分部,惟以次第分号,收满‘鹫’字号橱,再收‘岭’

^① 方广锜:《佛教大藏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3页。

字号橱；印铃书面暨书首页，每本皆然；每书或写书脑，或挂绵纸签，以便查验；守藏僧二人……；书既入藏，不许复出，纵有翻阅之人，但在阁中，毋出阁门。寺僧有鬻借霉乱者，外人有携窃涂损者，皆究之；印内及簿内部字之上，分经、史、子、集填注之，疑者阙之；……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举明静谨细，知文字之僧补充之”^①。其条例之细，超过当时公私所藏的管理条例。

第三节 典籍的私家收藏

一、典籍私家收藏的起源

我国典籍的私家收藏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平王东迁以后，周室衰微，诸侯势起，旧的社会秩序和宗法制度被打破，被王室和诸侯国政府所垄断的学术文化由于“士”阶层的产生也开始下延，这就构成了典籍私家收藏的政治背景；而私学的兴起，文化知识在民间的普及使私人有了收藏典籍的需要；“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使诸子学派蜂起，各学派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皆“人自为书，家自为说”（《文史通义》），从而为典籍的私人收藏提供了文化环境；而文字趋简及缣帛的使用使典籍的生产相对便利，从而增加了典籍的数量，使私人可以获得典籍，为典籍私家收藏的产生提供了物质保证。

孔子是我国第一个典籍收藏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兴私学，收门徒，并且删订“六艺”作为教材。在删订“六艺”的过程中，他广

^① 阮元：《灵隐寺藏书记》。见李希泌、张淑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第70—79页。

泛利用政府藏书,同时还收集了不少的文献资料,成为他的私人藏书。孔子死后,“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其藏书有一定数量。

自孔子以后,私家的典籍收藏越来越普及。《韩非子·五蠹》称:“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有之。”墨家学派的代表墨子拥有较多的私藏典籍,并且在游历时随身携带,“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弘唐子见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今天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庄子·贵义》)。名家的代表惠施也有很多典籍,“惠施多方,有书五车”(《庄子·天下》),并且为后人留下了“学富五车”的典故。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则有书数十匣。他们的典籍收藏实践,成为我国典籍私家收藏的滥觞。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时曾颁令禁止民间私人收藏典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根据李斯的建议下令烧毁民间部分私人所藏典籍。由此可知,战国时期私人的典籍收藏在全社会已普及到了一定的程度。

二、私人收藏典籍的原因

自孔子开创了我国私人收藏典籍的优良传统以后,二千多年来,经无数藏书家的继承和发展,私人藏书形成了我国典籍收藏史上最重要的典籍收藏体系之一。纵观整个私人典籍收藏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形成我国典籍私家收藏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 政治需要

我国的典籍自产生之日起就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政治需要直接影响我国典籍的私家收藏。

西汉初年,刘邦在剿灭异姓王的同时,为永保刘氏政权,又大封同姓诸侯王。刘邦死后,这些诸侯势力膨胀,不少人自立为国,做起了土皇帝。有些实际上脱离了中央政权,如淮南王刘长自恃为刘邦少

子,在其封国内“不用汉法,出入警蹕,称制,自作法令”(《汉书·淮南王传》),随后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汉朝廷在以武力削平诸侯叛乱的同时,以怀柔政策瓦解诸侯王与中央争权夺利的斗志,从而开了颁赐典籍的先例。西汉政府将秘阁所藏典籍的副本颁赐给各诸侯王,鼓励他们收藏典籍。很多诸侯王为了保住王侯地位和封国,也顺从朝廷的意思,潜心于典籍的收藏和整理。因而,在西汉形成了一批出于政治原因而收藏典籍的藏书家,如河间献王刘德、淮南王刘安等。此后,历代政府都仿照西汉的作法,引导王公贵族埋首于典籍故纸,以泯灭他们的政治野心,从而在私人典籍收藏体系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阵营。这一部分藏书家由于有朝廷作靠山,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并且可以获得朝廷所颁赐的典籍,因而很容易建立起藏书体系,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典籍的私家收藏。东汉章帝建初七年(82年),东平王刘苍上朝求书,帝赐以秘书列仙图和道书、秘方典籍(《渊鉴类函》卷一九四),使东平王的私藏典籍达到一定数量。东晋太元三年(378年),孝武帝一次就赐给会稽王秘阁所藏典籍八千卷,使他一下子成为颇有影响的藏书家。唐宋以后,历代的藏书家中有不少皇亲国戚。唐高祖的第十一子韩王李元嘉“聚书至万卷,又采碑文、古迹,多得异本”(《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宋英宗之弟荣王宗焯,所藏典籍更达七万卷之多。特别是明代,文帝朱棣以燕王谋反夺取皇位后,害怕诸藩再行故事,于是大力削藩,各藩人人自危,许多人为避免引起朝廷猜疑而钻故纸堆,因而明初的藏书家以藩王为主。诸藩中以周定王朱橚和晋庄王钟铉所藏典籍最为丰富,其次有宁献王朱权等。他们的藏书为子孙所继承,有很多发展成为明代著名的藏书家,如周定王六世孙朱睦㮮所藏典籍为北方之最,而宁献王七世孙谋玮的藏书甚至可与天府相比。

(二) 学术研究

典籍所记载的是人类的文化精华和学术研究的成就。自古以来,

所有的学术研究无不以掌握典籍为先,而在古代,能够利用公藏典籍的学人微乎其微,故而,所有学者无不进行典籍的收藏和整理。可以说,我国典籍私家收藏的出现,主要是适应学术研究发展的需要。孔子、惠施、墨子等我国最早的私人藏书家的典籍收藏实践完全是为了更好的著述立说,传播他们的学术和思想。自此以后,历代的许多学者为了学术研究的需要都潜心于典籍的收集,极大的促进了我国典籍私家收藏的发展。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使儒学典籍受到极大破坏,从而导致汉代儒学研究的今古文之争。汉代各学派的学者、政府的博士官及其他官吏为了进行经学研究和在学术争论中取胜,都尽力搜寻典籍,建立自己的藏书,使汉代典籍的私家收藏得以迅速发展。刘向在整理公藏典籍时曾充分利用私人藏书,如他在《别录》中多次提到,校对某书曾据“文中大夫臣圭书”,校对某书曾据“臣向书”等。蔡邕是汉代著名的学者、文学家、书法家,精通经史、音律、天文。他的学术研究促使他进行典籍收藏,灵帝重其才,特赐与典籍四千余车,使其建立起自己的典籍收藏体系,成为汉代著名的藏书家,藏书达万卷之多。时人王充的哲学巨著《论衡》完成后,学界少有流传,但蔡邕却能获其抄本。三国曹魏时的哲学家王弼是魏晋玄学的开创者,著有《老子注》、《周易注》等著作,同时其以万卷藏书成为当时最著名的藏书家。精于典章制度,博学多识,以《博物志》传世的西晋文学家张华藏书宏富,“尝徙居,载书三十车”,“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华所”(《晋书·张华传》)。唐代史学家,以《武后实录》、《贞观政要》著称于世的吴兢“聚书颇多,尝目录其卷第,号《吴氏西斋书目》”(《旧唐书·吴兢传》)。宋代的著名藏书家多是当时著名学者,如自嘲居室为“书巢”的诗人陆游、史学家司马光等。清代汉学的复兴和考据学风的盛行,使学人更埋首于故纸堆,更多的收藏典籍,学术大家无不广收宋元精槧,如经学家钱大昕、汉学家戴震、思想家顾炎武等。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黄

宗羲为了“穷经究史，旁求之百家九流”而极力收藏典籍，“于书无所不窥，得先世遗书，并抄之同里世学楼纽氏、澹生堂祁氏，以及江苏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成为名著一时的藏书家。他们的典籍收藏实践极大的推动了典籍私家收藏的发展，使清代私藏典籍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三）典籍整理和研究

典籍自产生以后，就开始有人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而收藏是典籍整理和研究的第一步。典籍的私家收藏出现以后，有更多的藏书家为了研究整理典籍而竭力搜访典籍，进而建立起自己的典籍收藏体系。

三国时蜀人向朗，“自去长史，优游无事垂二十年，乃更潜心于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累篇卷，于时最多”，并且“开门接宾，诱纳后进，但讲古义，不干时事，以是见称”（《三国志·蜀书·向朗传》）。齐梁三大藏书家之一的任昉，一生致力于典籍的收集和研究，聚书万卷以上，并且第一次将所藏典籍编成目录，开创了我国私藏目录的先河。唐宋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印刷技术的提高，研究整理典籍的藏书家越来越多，韦述“蓄书二万卷，皆手自校定，黄墨精谨，内秘书不逮也”（《新唐书·韦述传》）；柳公绰“家有书万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贮库，其副常所阅，下者幼学焉”（《新唐书·柳公绰传》）；而著名藏书家李泌则将所藏典籍进行精心整理，分别用不同颜色的牙签区分所藏三万卷典籍。两宋的著名藏书家江正、王钦臣、叶梦得、晁公武、陈振孙、尤袤等则以整理研究典籍为己任，潜心收集，所藏皆达数万卷之多。他们倾毕生精力对所藏典籍进行研究整理，编纂出永垂青史的私藏典籍目录。明清两代为整理研究而进行典籍收藏的藏书家更是比比皆是，如明代的朱权、叶盛、祁承燾、赵琦美等。著名藏书家高儒一生勤访穷搜，“锐意访求，或传之士大夫，或易之市肆，数年之间”（《百川书志·序》），聚书万卷，并花六年时间

整理考索所藏,三易其稿成不朽之《百川书志》。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出版家毛晋为整理刊刻典籍,毕生收罗宋元名刻,多方购求钞录,以汲古阁收藏典籍八万四千多卷,为其时之最。清代,如钱谦益、钱曾、徐学乾、朱彝尊、黄丕烈等。著名藏书家黄虞稷为研究明代所著典籍,在其世藏的基础上使所藏典籍达到八万余卷,其中大多为明人著作,经整理所藏,编出著名的《千顷堂书目》,成为清代编纂《明史·艺文志》的基础。

(四) 嗜书

典籍产生初期,由于技术的落后,典籍的数量非常有限,故而全社会都十分珍视。这种珍视使许多藏书家嗜书如命,一生孜孜以求,穷搜苦寻,甚至倾家荡产。这种精神构成了一种贯穿于我国整个私家典籍收藏史的优良传统,极大地促进了典籍的私家收藏。南北朝历宋、齐两朝的藏书家刘善明独嗜典籍,一生苦聚,到南齐建元二年(480年)死时,“家无遗储,唯有书八千卷”(《南齐书·刘善明传》)。南齐另一著名藏书家沈麟士其家藏书数千卷,然一场大火使所度化为灰烬,时沈年已逾八旬,但却毅然重新抄写,“复成二千卷,满数十箱”(《南史·沈麟士传》)。后魏元顺,以全部家财收藏典籍,死后,其“家徒四壁,无物敛尸,止有书数千卷而已”(《魏书·元顺传》),嗜书如命一至于斯。唐宋以后,这种嗜书成为一种风尚,使许多人千方百计地收集典籍,或抄录,或购求,或寻访,建立起自己的典籍收藏体系。宋代著名诗人、藏书家陆游在《示儿诗》中有“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书癖不可医”之句,言明自己“要与万卷归林芦”(《雨后极凉料简篋中旧书有感》诗)。他一生苦搜典籍,使其室内“或栖于椽,或陈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其“饮食起居,疾病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故而 he 戏称自己的居室为“书巢”。元代藏书家沈景春“平生寡嗜欲,惟酷好收书。有别业在闾门,……人有挟书求售,至必劳来之,饮食之,酬之善价,

于是奇书多归沈氏”^①，如此嗜求典籍，使其所藏为名著一时。更有段直在泽州为官时，甚至割良田千亩以购典籍，从而使其藏书达到万卷以上（《元史·段直传》）。明代沈节甫“无他嗜好，独甚爱书。每遇货书者，惟恐其不余售，且去惟恐其不复来也”。但其囊中羞涩，力不从心，无法多购善本，只能“往往取其直之廉者而已，即有残阙，必手自订补，以成完帙”^②。明代另一著名藏书家胡应麟，“性嗜古籍，少从其父宪使君京师。……元瑞以嗜书故，有所购访，时时乞月俸不给，则脱妇簪珥以酬之。又不给则解衣以继之。元瑞之豪无所不倾，而独其载书，陆则惠子，水则米生，盖十余岁，而毁其家以为书，录其余资，以治屋而藏焉”。其勤收苦藏，在十余年内所藏典籍即达四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③。而祁承燝为了获得典籍，不惜把夫人的嫁妆拿去换取。他一生手录古今四部，卷以千计，由于抄录太过辛苦，使十指为裂。至清代，藏书之家更是嗜书如命，视典籍为一切。清代藏书家叶奕，“笃好奇书古帙，搜访不遗余力。每见案头一帙，必假归躬自缮写，篝灯命笔，夜分不休”。曾为了影摹一本北宋时期的残本不惜费时费力，逾年方成^④。吴焯为了抄全一部《咸淳临安志》，甚至花费了十年的功夫。著名思想家黄宗羲一生“穷年搜讨，……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⑤。他与当时的著名学者吕留良为故交，但为了购买祁氏澹生堂遗书之事而与其绝交，足见其嗜书之深。而朱彝尊为抄录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不惜使出非常手段。“康熙二十四年，彝尊典试江左，与遵王（钱曾）会于白下，求一见之（《读书敏求记》），终不肯出，乃置

① 李青莲：《丽宋楼藏书志》卷四。

② 沈节甫：《玩易楼藏书目·序》。

③ 王世贞：《少室山房笔丛》卷二。

④ 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一。

⑤ 全祖望：《鮑塘亭文集》前编卷一一。

酒，召诸名士高燕，遵王与焉。私以黄金及青鼠裘予其侍史，启篋得之。雇藩署廊吏数人，于密室中半宵写毕，并录得绝好词一卷”^①。清代另一藏书家马寒中求书不遗余力，“尝过龙山查氏，见案头有宋槧陆状元《通鉴》，百计购之，不可。后查氏谋葬所亲，所卜吉坏，则马氏田也。寒中觐知之，大喜曰：‘书可得。’即诣查氏，愿效纺田之易，凡十亩，书券尽付焉。抱书疾归，惟恐其中悔也”^②，嗜书之态，于此可见。明清以后，由于战争的破坏，宋元精槧已是凤毛麟角，十分珍贵，因此，许多藏书家都潜心于宋槧元刻的收集。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平生喜好藏书，尤重宋槧，自号“佞宋主人”，专门在苏州设铺收集，并特设“百宋一廬”度藏其千方百计购求的一百多种宋版精品。海宁吴騫则在自己的拜经楼中专设一室“千元十架”来收藏他购自马氏道古楼及查氏得树楼的元代精刻。浙江藏书家陆心源也嗜好收藏宋代精品典籍，他倾毕生精力收集到二百余种宋代名刻，于是将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为“皕宋楼”。正是他们的酷嗜和收集，使存世的宋元精槧大多得以流传下来，为我国的典籍文化保存了珍贵的遗产。

三、历代著名的典籍收藏家

我国典籍私家收藏产生以后，虽先后遭受秦孝公挟书令的压制和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摧残，但到两汉之际，由于汉惠帝解除挟书令，使其获得了很大发展。收藏典籍的人大量增加，其主要藏书家有伏生、刘德、刘安、孔安国、刘向、郑玄、王充、蔡邕等，其中最著名的有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和东汉学者蔡邕。

刘德(?—前130年)，汉武帝之弟，受封为河间王，卒谥“献王”。

① 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二。

②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通鉴》。

他好学多艺,喜藏典籍。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千方百计收集典籍,成为西汉具有代表性的私人藏书家。他所藏典籍主要得自于民间,由于他每“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于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且“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纪,七十子之徒所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

东汉蔡邕(133—192年),字伯喈,陈留人,博学多才,曾校书东观,并且参与整理和书写“六经”成熹平石经。喜藏典籍,是我国私人藏书史上第一个有明确文献记载的藏书达到万卷的藏书家。蔡邕所藏典籍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府赐书。曹操曾就蔡邕藏书事问其女蔡文姬:“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回答说:“昔己父赐书四千卷许,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上百余篇耳。”(《后汉书·烈女传》)其二是收集。据《后汉书·王充传》裴松之注记载,“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助谈”,连没有流传的典籍蔡邕都能收集到,可见他收集典籍的范围之广。蔡邕的藏书后来全部赠送给了当时只有十四岁、后来成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覆迎之。粲至,……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蔡邕是第一个将自己的藏书赠送给他人的藏书家,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此后历代都有藏书家赠书的佳话,他们无不以蔡邕自比,从而形成了我国私人藏书史上一个优良的传统。蔡邕赠给王粲的典籍不但促成王粲登“建安七子”之首,成一代文豪,而且惠及其族人和亲友。

两汉以后,由于纸的发明和使用及私人著述的发展,个人获得典籍相对于汉前较易,从而使典籍的私家收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南北

朝时期是第一个高峰,特别是梁代。由于“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江右文献,于斯为极盛”(《隋书·经籍志》)。这一时期收藏典籍达数千卷至万卷的藏书家多达数十人,著名的有任昉、沈约、孔休源、沈麟士、崔慰祖等。这一时期由于收藏量的增加,已经开始出现专门的藏书楼,如北魏藏书家平恒“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魏书·平恒传》)。隋唐时期是宋前典籍私家收藏的又一个兴盛期。隋朝有许善心、牛弘、柳晋等著名藏书家。至唐,由于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度的促进、六朝藏书传统的推动,藏书之家在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形成了两大中心,并进而遍布全国,魏征、颜师古、韦述、吴兢、李泌、苏弁、柳公绰等都是名噪其时的著名藏书家。是时不但藏书家的数量大为增加,所藏典籍的数量也远超汉魏,如苏弁“聚书二万卷,手自雠定,当时称与秘府埒”(《新唐书·苏弁传》),张弘靖“家聚书画,侔秘府”(《新唐书·张弘靖传》)。而且开始出现独立的典籍收藏馆舍,如田弘正曾“起楼聚书万余卷”(《新唐书·田弘正传》)。这时私藏典籍的管理已相当完备,不但分类编目成为风气,而且典籍收藏也颇有章法。柳公绰将所藏万卷典籍各备三本,“色彩华丽者,镇库;又一本,次者,长行披览;又一本,又次者,后生子弟为业”,对这三部分典籍都各自分藏,“不相参错”。^①

李泌(722—789年),字长源,京兆人。博学多才,一生喜聚典籍,积至三万余卷。他将所藏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列架,仿秘府典籍收藏方法,用不同颜色的牙签分别标记所藏典籍的种类,以红牙签标示经部典籍,以绿牙签标示史部典籍,以青牙签标示子部典籍,集部典籍则以白牙签标示。韩愈一首《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盛赞其典籍收藏之盛和典藏整理之佳:“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

^① 钱希白:《南部新书》卷丁,见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引。

宋元之际,由于雕板印刷的出现,典籍的生产量和社会拥有量大大增加,私人得书更易。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即言道:“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于此。”^①且五代之乱,使许多公藏典籍流落民间,故而使宋元时期典籍的私家收藏成为一种全国性的风尚。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藏书家,北宋如江正、宋敏求、王若钦、司马光,南宋如叶梦得、晁公武、陈振孙、尤袤,元代如庄肃、段直、孙道明、元好问等。

叶梦得(1077—1148年),字少蕴,号石林,江苏吴县人,跨南北两宋的著名藏书家。一生辛勤劳作,广收典籍,手抄,购买,终于建立起了自己的藏书体系。至北宋末年,他已收集到三万多卷典籍。靖康之乱,国破家亡,他的藏书损失了将近一半,所余仅两万余卷。但他毫不气馁,南渡后继续全力收寻存世典籍,使所藏达到十万卷之巨,成为当时最著名的藏书家。晚年他在自己定居的吴兴弁山建书楼,尽贮所收之书。他不但酷嗜藏书,而且颇喜读书,他在《过庭录》中说,他对“六经不可一日去手”。每年夏天从五月到八月十五,即使天气炎热也要每天读一卷“六经”。这种“夏课”他一直坚持了二十多年。到了晚年,他因体弱多病,视力不佳而不能亲自读书,就让他的两个学生在身边轮流读他喜欢的书直至日暮。家藏的“六经”及其他各类的三千多卷好书,他都读过多遍,其余藏书也至少读过一遍,辛勤地利用家藏使他成为名噪一时的文学家。他著作颇丰,流传至今的还有《石林建康集》、《石林诗话》、《避暑录话》等多部。他还利用家藏对典籍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通过对当时杭州、四川、南京、福建四个著名的刻书中心所刻版本的研究,得出杭州刊刻本质量最好、福建次

^① 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第21页。

之、四川最差、南京刻本虽质量可比杭刻本但用纸较次的结论。叶梦得是我国藏书史上集收藏和研究于一身的重要藏书家。虽然他苦苦搜寻几十年的十万卷藏书在1147年毁于一场大火,但他的藏书实践和研究成果成为后世藏书家的宝贵财富。

尤袤(1127—1194年),字延之,号遂初居士,常州无锡(今江苏无锡)人,自幼聪颖,非常喜欢读书,从而才富八斗,是南宋著名诗人,同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一起被称为“南宋四家”。尤袤一生对典籍嗜好既笃,故而广为收集,网罗备至。尤袤典籍的获得主要是抄写。他曾长期担任国史院编修、侍读等职,有机会借阅三馆秘阁所藏,并抄录收藏,太史李焘说他“于书靡不观,观书靡不记。每公退则闭户谢客,日记手钞若干古书,其子弟及诸女亦钞书”。他曾对李太史说“吾所钞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衣,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①从而共收集典籍五千多种,数万卷,成为南宋最著名的藏书家,真是“异书名刻堆满屋,欠伸欲起遭书围”(陆游:《遂初堂诗》)。他在无锡九龙山下建楼贮之,取孙绰《遂初赋》之名为堂号曰“遂初堂”,堂匾由宋光宗御笔亲书。他所藏范围极广,经史子集无所不包;稗官小说,释道典籍无所不有。其藏书多抄本,多善本,多史书,多法书,质量之高为当世之冠。他所藏的典籍大都经他仔细校勘,所校过的书大多被后人用作校雠和刻印的底本,如《战国策》、《山海经》等。由于受“秘藏”风气的影响,尤氏藏书从不外借于人,故而所藏典籍保护完好,皆“新若手未触”。在晚年,他将自己所藏汇编成《遂初堂书目》,并且首创著录版本,是我国最早的版本目录。可惜的是,在他死后三十年,他一生苦聚的典籍被毁于一炬,但他的《遂初堂书目》却流传至今,后人得以略窥遂初堂藏书的盛况和尤氏学术成果之一斑。

^①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第55页。

陈振孙(1183—?),字伯玉,号直斋,是南宋又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和目录学家。他小时候由于家贫,无书可读,虽二史亦从人借,曾经从班固的《汉书》中录出有关绍兴的志传便于阅读。他30岁左右任江西南城县令,从此开始了他典籍收集的历程。他对典籍的收求,无时无刻不留心。一日“往宰南城,出谒,有持故纸鬻于道者,乃古京本,五代开运丙午(946年)所刻也,遂为家藏书籍中之最古者”。由于他潜心访求典籍,南城名士吴炎曾从自己的家藏中录出《庞氏家藏秘室方》、《龙髓经》等二十多部相赠。宝庆三年(1227年)他调任福建兴化军通判,在这一段时间,他尽自己所能全力搜访典籍。当时兴化地区有很多藏书家,如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是著名的四大家,他从这些藏书颇富的藏书家中借抄了大量典籍,成为藏书的基础。他在宁波府学访问同官薛师雍时,见其几案有书一编,颇有价值,且己所无,于是借而录之。在宁波期间还录得《琴谱》等书。他还抄录了许多流传极少且很难见到的典籍。南宋文学家周必大的《周益公集》在刊刻时,由于某些篇章如《奉诏集》、《龙飞录》等内容触犯时忌被焚,故世间少流传,陈振孙为了获得这几卷,广求勤访,终于借到一部私刻本,遂抄录补齐了家藏本。有一次,他闻有出售《三朝训鉴图》一书,“亟求观之,则已为好事者所得,盖当时御府本也。卷为一册,凡十事,事为一图,饰以青赤,亟命工传录,凡字大小,行广狭,设色规模,一切从其旧”。嘉熙二年(1238年),他任国子监司业,有机会阅读和传抄许多官家秘藏。经多年的搜求,他的藏书达到五万一千多卷,其数超过了南宋初年秘书省的收藏量(据《中兴馆阁书目》记载为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他对所收藏的典籍都进行了精心的雠校整理,并且在任国子监司业时开始将其全部藏书编成一部著名的解题目录《直斋书录解題》,直至晚年方成,成为我国典籍发展史上一部极为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庄肃,字恭叔,号蓼塘,松江县人,元代著名藏书家,宋时为秘书

省小吏，宋亡以后弃官不仕。一生喜聚典籍，经多方搜求，所藏达八万余卷，是元代私人典籍收藏家的代表。其藏书多为抄本，且涉及面极广，“手抄经史子集，下至稗官小说，靡所不具。书目以甲乙分十门”（《松江府志》）。其所藏多为珍贵版本，甚至连秘府所无的典籍他都有藏。元末至正年间，政府修撰宋、辽、金史时，特从其家中购得罕见典籍五百余卷。据《五茸志逸》记载，元文宗有一次“语及唐聂夷中诗，询其有文集否？诸学士以未闻对，或言庄氏富藏书，特旨访其家，果有《聂集》”。^①

明清两代是我国典籍私家收藏最发达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学术的进步、社会的繁荣，使收藏典籍的人从宋元时的士大夫阶层扩展到一般学子，进而发展到全社会，使藏书家的数量及所藏典籍的数量、质量等较此前都有重大的发展。据统计，宋代知名的藏书家不到百人，而明清两代著名的藏书家均达四五百家。明代著名之家有：周王朱橚，宁王朱权，镇国公朱睦㮮，宁波范钦，昆山叶盛，乌程沈吉甫，常熟毛晋、赵用贤，山阴祁承燾，会稽钮石溪等。清代知名之人则清初有黄虞稷、钱氏叔侄、黄宗羲等诸家，乾嘉之际有黄丕烈、周锡瓚、顾之逵、袁廷桢四大家及孙星衍、吴騫、顾广圻等，清末则有杨、陆、丁、瞿四大家。

宋代以后，我国的经济中心南移至江浙一带，而南宋以杭州为都，更使这一带的文化传统得以发扬光大。浓郁的学术气氛、坚实的经济基础促使这里典籍刻印业高度发达，这里的藏书之家能相对容易地获得典籍。因此，明清以后，江浙一带成为私家典籍收藏的主要区域，全国最著名的藏书家藏书楼都集中在这里。如明代范氏的“天一阁”、祁氏的“澹生堂”、钮氏的“世学楼”，清末四大藏书楼中除杨氏“海源阁”以外，其他三家都在此处。

^①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第81页。

清代无论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学术文化的进步都达到我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因而其典籍的私家收藏也最为发达,而清初清廷残酷的文字狱和文化迫害政策使大多数汉族学子埋首于故纸堆中,从而促使汉学的复兴,进而更推动了私人收藏典籍的社会风气。这一时期,不但藏书家众多,而且由于其收藏背景不同,收藏范围各异,形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藏书家。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洪亮吉在他的《江北诗话》中曾把清代藏书之家归纳为五类:一类是“得一书必推求原本,是正缺失”的考订家;一类是对典籍“辨其板片,注其错伪”的校讎家;一类是“搜采异本,上则刻石室金匱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的收藏家;一类是“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的赏鉴家;还有一类是“眼别真贋,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能欺,宋槧元槧,见而能识”的掠贩家。

朱睦㮮(1517—1586年)^①,字灌甫,号西亭,又号东陂居士,系朱元璋七世孙周定王的后裔,15岁受封镇国中尉,是明代北方著名的藏书家。在明代私人藏书家中,宗藩藏书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朱睦㮮是宗藩藏书的代表。他一生爱书、藏书,以毕生精力搜集典籍,藏书达四千三百一十一部,四万二千七百五十卷,成为国内著名、北方独秀的著名藏书家。他的藏书主要来自于购买和访求。他倾其所有购买了当时国内著名的藏书家江都葛氏、章丘李氏的所有藏书共一万二千五百六十卷^②。为了收集家藏所缺,朱公四处奔走,足迹遍及江浙、山东、河南等地。他在《万卷堂家藏艺文自记》中叙述其搜访之艰难时说:“大梁又自金、元以来,屡经兵燹,藏书之家甚少,即有,亦皆近代之刻,求唐以前则希矣。间或假之中吴、两浙、东郡、澶州、应山诸处,或写录或补缀,盖亦有年。”他在其它西建有广五楹的藏书处,贮藏他

① 王兴亚:《朱睦㮮藏书及著述》,载《河南图书馆学刊》1989年2期。

② 《祥符县志》卷一六。

一生所积累的典籍。为了提高所藏典籍的价值,他不但对家藏进行分类,并在隆庆四年(1570年)编成《万卷堂书目》,还依唐人方法,以各色牙签进行标识,而且对典籍进行精细校讎,丹铅圈点,撰写题评。他所校过的著名典籍有唐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宋张洽的《春秋集注》、明李梦阳的《空同先生集》等。通过对典籍的收藏、整理和利用,朱睦㮮不但成为著名的藏书家,而且成为著名的学者,一生著述闳富,有《五经稽疑》、《中州人物志》、《大明帝系》等多种著作行世。

“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永弗失。”这是明代著名藏书家祁承燾的藏书铭。祁承燾(1562—1628年),字尔光,号夷度,浙江山阴人,官至江西右参政,一生别无他好,爱书成癖。他父亲去世时给他留下五、七架的藏书。儿时,他就时常出入其间,广泛涉猎各类典籍,甚至不惜典买妻子的手饰用以购书。即使应考杭州,也四出寻访典籍,穿街走巷求购。每得异书,即使鼠噬蠹蛀,也珍重购归,亲自补缀入藏。有一年,杭州的一家书铺刻印一部多达六百卷的通史,印数很少,求购的人很多,祁承燾听说后,立即乘船渡江,专程前往杭州抢购了一部。入仕途后,其俸禄所得,多数用于购求典籍。由于他的苦心求访,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他的藏书已初具规模,达到一万多卷。但这年冬天,藏书尽葬于火,片纸无存,半世心血,毁于一旦。但祁氏爱书之情并不因此而减。他利用自己在山东、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地为官的机会,重新搜寻典籍,他说自己:“奇书未获,虽千里必以求,异本方来,即片笺之必宝。近而渔唱,远及鸡林(朝鲜),往往聚海外之编摩,几不减域中之著作。”^①经十多年的努力,他又建立起了自己的藏书,数量竟大大超过旧藏,达十万卷。其所藏除传统的经史子集各类典籍外,更有元明传奇八百余部,为明代藏书家之最。为了保

^① 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引。

存藏书,他在自己的庄园中建藏书楼曰“澹生堂”,并且附建“东书堂”以作读书之用。他的藏书楼按他的要求建成“迥然与住房、书室不连接,自为一境”,“下一层离基地二尺许,用阁栅地板,湿气或不能上”,“前面用透地风窗,以便受日色之晒”^①,这样建设的藏书楼自然十分利于典籍的保存。他对所藏典籍都精心整理、仔细校核。即使在盛夏炎暑时节,也经常关起门来冒着酷暑整理典籍。每至夏季,他都要将典籍置于太阳下以晒其卷。祁承燧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对其典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作《庚申整书小记》以记之,并根据其经验,作《庚申整书略例四则》,从理论上对典籍整理进行了阐述。在精细整理的基础上,他将自己的所有藏书编目成《澹生堂书目》,成为一份重要的目录学遗产。

为了保证他所开创的典籍收藏事业得以子子孙孙继续下去,祁承燧特手撰《澹生堂藏书约》,与子孙约定:“及吾之身,则月益之;及尔辈之身,则岁益之。子孙能读者,则以一人尽居之;不能读者,则以众人递守之。入架者不复出;蠹啮者必速补;子孙取读者,就堂检阅,阅竟即入架,不得入私室;亲友借观者,有副本则以应,无副本则以辞;正本不得出家园外。书目视所益多寡,大较近以五年,远以十年一编次。勿分析,勿覆瓿,勿归商贾手。”但祁承燧死后不久,清兵入关,天下大乱,祁氏一生所聚均散佚,其中部分为赵氏小山堂藏书楼和黄宗羲所购,其余皆散落民间。

祁承燧不但是一位典籍收藏的实践者,还是一位理论研究家,他在典籍收藏的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精辟的论述,在典籍的购置上他认为不但要“眼界欲宽,精神欲注,心思欲巧”,而且要“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别品类”;在分类编目上他提出了“因”、“益”、“通”、“互”的理论。这些论述对后世典籍的收藏具有十分重要

^① 高学安:《澹生堂祁氏藏书理论试析》引,载《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4年第1期。

的指导意义。

“人间度阁足千古，天下藏书只一家”。这是清人姚元之所写的一幅赞颂四明范氏天一阁的对联。天一阁（图 38）现位于浙江宁波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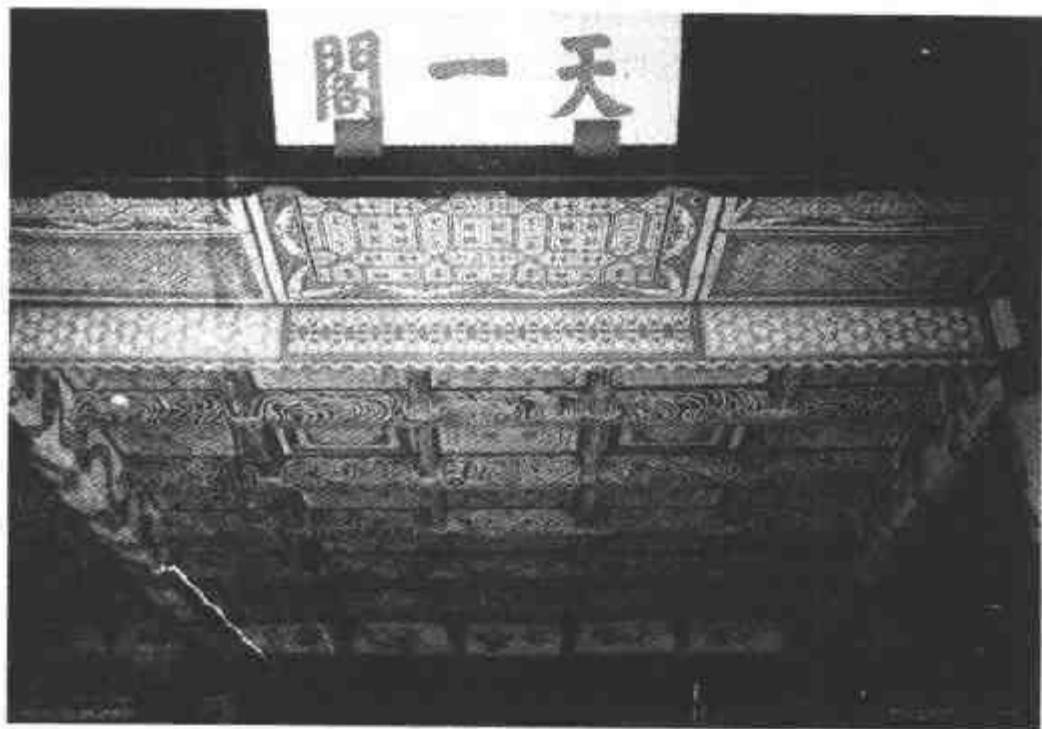


图 38 天一阁藏书楼

月湖之西的天一街，是全国保存最古的私人藏书楼，被誉为“江南书城”，其创始人即是明代著名藏书家范钦。

范钦（图 39，见 355 页）（1506—1585 年），字尧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今宁波市）人，官至兵部右侍郎。他一生性喜收藏典籍，尤善收集说经诸书及先辈诗文集未传世者。他曾在湖北、江西、广西、福建、云南、陕西、河南等地为官二十多年，每到一地，都尽力搜访当地的稀有古籍，对各地独有的乡试录、地方志、诗文集等或抄录、或购买入藏。

鄞县丰氏的万卷楼是著名的藏书楼，收藏有许多宋元两代珍贵的刻本、抄本及碑帖。范钦经常借读丰氏万卷楼的藏书，并且从中抄录了大量自己没有的珍本、善本。后来万卷楼由于管理不善，又遭到

图 39 范钦像

回禄之祸,典籍散失严重,范钦出资将丰氏万卷楼所剩典籍全部购入。后来,范钦又购入了袁忠彻静思斋的部分藏书。为了更多地获得典籍,他还与当时另一著名藏书家王世贞相约,各出书目,互抄典籍,以补其阙失,从而从王世贞那儿抄得许多珍贵典籍。经其一生艰辛收集,范氏所藏典籍达七万余卷之多。其中主要为宋元以来的刊本、稿本、抄本,以明刻本为主,并且有不少海内孤本,如宋代建阳刻本《十

七史百将传》、元代建安书堂活字本《元诗前后集》、明弘治八年铜活字本会通馆印辑补《古今合璧事类》、明刻李凤纂修《正德云南志》等都是国内罕见的孤本。就内容而言,范氏所藏典籍中不但经史子集俱备,而且收有许多明代方志、登科录、政书、诗文集等。

据骆兆平《天一阁明代地方志考录》统计,范氏所藏省、府、州、县方志有四百三十五种之多,超过《明史·艺文志》的著录。其所藏地方志,多纂修刻印于嘉靖、正德、弘治年间,刻印精湛,装订精美。其中有一百七十二种是最初的刻本,举世罕见。

为了收藏他所收集的这些精品,范钦于嘉靖末年(1561—1566年之间)建了一座宏伟的藏书楼天一阁来取代原来的藏书室东明草堂。据清代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称:在建阁之初,曾凿一池于其下,后搜集碑刻,得吴道士龙虎山天一池石刻,为元揭文安公所书,并有记于其阴,范钦大喜,以为适与是阁凿池之意相合,即将其藏书楼命名为天一阁。

天一阁的格局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坐北向南,左右轩甍为垣,前后檐上下俱设窗门。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间,西偏一间安设楼梯,东偏一间以近墙壁恐受湿气,并不贮书。惟居中三间排列大橱十口,内六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取其透风;后列中橱二口,小橱二口;又西一间,排列中橱十二口,橱下各置英石一块,以收潮湿。阁前凿池。”^①如此上一下六,隐含“天一”、“地六”,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以水制火”之意,是希望祝融氏永不光顾藏书楼。

范氏天一阁如此设计不但使其历四百余年而不毁,成为我国现存最古的藏书楼,而且在清乾隆时期还被作为典籍收藏之所的典范。乾隆为了收藏《四库全书》,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特令军机大臣传谕杭州织造寅著亲自前往察勘天一阁之建制。为了使精心所聚永

^① 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卷七九。

不散失,范钦不但在藏书楼的建设上费心竭力,而且对典籍的管理也颇为严格。他所入藏的典籍轻易不借人,连亲族也不例外,他的侄子范大澈曾跟随他游历京城,颇有才智,然多次借书均被拒绝。他立下“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训,保证其典籍能集中收藏。他的次子范大冲承其父志以后,更规定阁门和橱门的钥匙分房管制,并制定了严格的藏书禁则:“凡阁厨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① 每年梅雨季节以后至中伏期间,范钦都要带领子孙入阁翻晒典籍,以防其受潮霉变;而且在阁中放置芸草以防蠹。由于得力的保护措施,范钦天一阁的藏书至明末的七十多年里一直保存完好。后来虽遭战乱、被盗等多有散佚,然其中的部分藏书仍保存了四百多年,这在我国私人典籍收藏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天一阁藏书的散佚始于明末战乱,至清康熙之初,全部藏书已有五分之一左右佚失,其中珍贵的明实录已失其半;至乾隆修《四库全书》又有大批书被调入官府;1840年鸦片战争中英军攻陷宁波,闯进天一阁,劫走珍贵典籍八十种;1861年太平天国起义军进驻宁波,当地盗贼乘乱破墙入阁,盗去了许多典籍。其后又几经失盗,至解放初期,天一阁中范钦艰辛所聚的七万多卷典籍只有一万三千余卷尚留阁中。范钦不但以藏书著称于世,并且刻印了不少所藏典籍,如《范氏奇书》二十一种,包括仅存于世的纬书郑注《乾坤凿度》二卷、《穆天子传》六卷、《论语笔解》二卷等名著。

毛晋(1599—1659年),原名凤苞,字子九,晚年改名毛晋,改字子晋,江苏常熟人,明季清初著名的藏书家和出版家。毛晋并非出身

^① 阮元:《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载李希泌等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第40页。

于书香门第,却从小喜欢读书抄书。他父亲去世时给他留下大笔田产,使他收集、刻印典籍有了可靠的经济保证。

为了搜集珍贵典籍,毛晋不惜金钱。他曾在家门口张榜告示:“有以宋本至者,门内主人计页酬钱,每页出二百;有以旧钞本至者,每页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于是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矣。邑中为之谚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①。这种盛况使他收集到许多珍贵的宋元善本。除了购买,他还殚精搜索,“凡人有未见书,百方购访,如缙海凿山以求宝藏。得即手自钞写,纠讹谬,补遗亡,即蛛丝鼠坏,风雨润湿之所糜败者,一一整顿之。”^②他雇用了许多人为他抄书,以至“入门僮仆尽抄书”。并且发明了一种“影抄”的方法,凡是世所罕见而藏诸他处不能获得的宋本精刻,他都“选善手以佳纸墨影钞之,与刊本无异,名曰‘影宋钞’,一时好事家皆争仿效”。这种方法不但使他获得大量珍贵的宋元精槧,而且“宋槧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③。经过几十年的勤访苦求,他所收的典籍达到八万四千多册,于是建汲古阁和目耕楼以藏之。其阁“上下三楹,始子讷亥,方十二架。中藏四库书及释道两藏,皆南北宋内府所遗”^④;其“阁后有楼十一间,藏书板者。楼下及厢廊俱刻所”^⑤。其藏书排列有序如此,可见其对所聚典籍进行过充分的整理。

毛晋对典籍的校勘也十分精细,他对所聚之书几乎都进行校讎,平时也经常藏书阁中手翻诸部典籍,仇其伪谬。他还在汲古阁的四周建有“缘君”、“二如”等亭,专门招延天下名士校书于其中。精细的校整使毛氏所藏典籍皆为精品。毛晋对所藏典籍虽然珍视,但并不受

①④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

②⑤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第311页。

③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第309页。

“秘而不宣”的私藏风气的影响,而是将自己的藏书通过刻印而在社会流传,以嘉惠学人。他的刻书坊就在汲古阁内,经常雇有二三十人为他刻书。他每获得一种善本,便立即开坊刻印,以及早流传于世。崇祯十五、十六年(1642—1643年)间,他偶然得到《宋遗民忠义二录》、《西台恸哭记》及月泉吟社、河汾、谷音诸家诗集,便立即刻印行世。他所刻印的多是他所藏的宋代善本书,由于校勘精当,制作精美,使所刻典籍质量上乘,故而其刻本多为时人所重,流传甚广。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曾在《严儒人墓志铭》中说,毛晋“力搜秘册,经史而外,百家九流,下至传奇小说,广为镂版,由是毛氏钁本走天下”,甚至远在云南边疆的学人也不远万里遣币求购。毛晋在四十多年的时间内刻印典籍六百余种,其中最著名的有《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文选李善注》、《六十种典》等。毛氏的刻书对明清之际典籍的发展有很好的推动作用。遗憾的是,毛晋去世后,其苦心所聚尽数散佚,刻坊的十多万块书版也损失殆尽。

杨以增(1787—1856年),字益之,号致堂,又号东樵,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明清以来,我国的私家藏书一直以江浙为中心,北方藏书家寥若晨星,而杨以增却以其海源阁形成了一个北方藏书中心,成为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杨以增海源阁的藏书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是购得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百宋一廬”的精本。钱谦益是清初著名藏书家,在明末战乱之际得祁氏澹生堂所藏精品,后受回禄之祸,所藏俱散,其中所遗,尽赠钱曾。后钱曾之书及徐氏传是楼所藏半数由黄丕烈所收。黄氏晚年其书又被汪氏艺芸书舍所购,另外汪氏又收藏了当时号称“藏书四友”的其他三人周锡瓚、袁又恺、顾之逵的藏书。至道光年间,汪氏藏书又陆续出售,尽为杨以增所购,载船以归聊城,奠定了海源阁藏书的基础。其二,杨以增曾在贵州、陕西、河南、湖北等地为官,利用这种条件,他又寻访收购了不少珍贵典籍,特别是在他任江南河道总督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所带来的江南动荡,江浙

一带著名藏书家的所藏纷纷散出,杨氏乘机收购了许多精品,如鲍氏知不足斋、钱氏红豆山房、秦氏石研斋、海宁陈鳢、阳湖孙星衍等人的旧藏多为杨氏所得。经广泛购集,杨氏藏书达数十万卷,宋元精槧亦达数百部。杨以增获得这些典籍后即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建海源阁以藏之。据梅曾亮《海源阁记》及杨氏《海源阁匾额跋语》的记载,杨以增之所以将藏书楼起名为“海源阁”,是因为杨氏认为,书籍是知识的海洋,“学者而不观于海焉,陋矣”,而“观于海,久处其中,茫洋浩瀚不知所归,亦为学者之戒。学者应该涉海而探源,知源之所出”,故以“海源阁”名其藏书楼。海源阁楼上楼下为三楹,楼上书室十二间,收宋元精本,楼下藏明清刻本、殿本、手抄各校本,并且在后院建书室五间,贮以历代帖片、字画等。后因宋版典籍的收藏日多,杨氏又别辟书室曰“宋存”贮天水朝旧籍,而以元本、校本附焉。他曾购买到极珍贵的宋版《诗经》、郑玄所注《三礼》及《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为了妥善保存这几种典籍,并且以示珍重,特建“四经四史之斋”进行专藏。除了“海源阁”以外,杨以增还在华駙庄建“陶南山馆”贮藏典籍。杨以增对所藏典籍十分珍视,尽力呵护,每二年或三年就要在清明至立夏之间晒书一次。晒书之时,全家出动,并且请数名亲友帮忙,将每册书按次序散列案上,在阳光下晒一至二小时,然后移回室内,再按原来的次序排列原架上,并用白丝棉纸将樟脑丸包成许多小包,随书装在函内,但不放入书内,以防虫蛀。对外有木匣、内有锦函的宋元珍本藏书处,则在清明后每日从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开启全部门窗,以使日暖风和之气深深进入,并且以五至七天为期,然后即将全部门窗重新关闭,同时加封条,严密封锁^①。这种做法成为一种遗规,杨氏子孙代代相传,使海源阁的藏书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存完好。杨以增死后,他的儿子杨绍和又购进了汇集众家所藏之精品的清宗室端华“乐

^① 聊城师范学院图书馆编:《海源阁研究资料》,第159页。

善堂”藏书,使海源阁尽得当时南北私家所藏的精华,成为我国私人藏书史上的又一中心。然而,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兵燹之灾开始,海源阁历经匪患,所藏典籍大部散失。

瞿镛,字子雍,清代常熟著名藏书家,所建“铁琴铜剑楼”是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与杨氏海源阁同著于海内。“铁琴铜剑楼”藏书实始于镛父瞿绍基。绍基不喜仕途,一生喜欢聚书,广购善本,旁搜金石,朝夕穷览。他乘当时著名藏书家陈揆稽瑞楼、张氏爱日精庐、黄氏士礼居、汪氏艺芸精舍等的藏书日渐散出之机,选购了其中近半数的宋、元精槧。经十年努力,聚书达十万卷之巨,其中多有抄本,如宋程大昌《考古编》、宋孙应时纂《宝祐重修琴川志》等,并建“恬裕斋”(光绪年间因避讳,改为“敦裕斋”)以贮之。这部分典籍是铁琴铜剑楼藏书的基础。绍基死后,瞿镛承其父志,一生广为收集典籍,从远近的许多著名藏书家中选购精品,书贾奔走其门无虚日。由于瞿镛的悉心收集,插架典籍日盛,恬裕斋不足存贮,于是镛重建一楼藏之。镛在收书之余,亦旁及金石、书画,因家中藏有珍贵无比的铁琴一张、铜剑一把,故将其新建藏书楼命名为“铁琴铜剑楼”。瞿镛不但广聚典籍,而且悉心校雠所藏,经其所校的名槧有《周益公文集》等多种,并且将其藏书中的宋、金、元旧槧及稀见抄本编成《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二十四卷,共著录典籍一千二百四十二种,其中经部八十二种,史部二百六十五种,子部三百七十种,集部五百二十五种,计有宋版典籍一百六十一一种、金版三种、元版一百零五种,其藏书之精足以与黄氏“百宋一廛”媲美。瞿镛虽一再告诫子孙珍视典籍,不让典籍轻易出楼,并引唐代藏书家杜暹的卷后题词囑子孙长守勿鬻,但却并不秘其所藏,而是尽量提供给人阅读,他在藏书楼辟有专屋供读书之用,并且为读书人提供茶水膳食。瞿镛编成书目之后,还没来得及刻印即去世了。他的次子秉渊、五子秉清、七子秉冲继承了他的遗志,继续典籍收集,并且延聘名家,校刻了瞿镛著成的书目。在咸丰年间的战乱中,瞿氏兄

弟几经周折,呕心沥血地加以呵护,使瞿镛一生所聚终于免于兵燹之灾,不少精槧被保存下来,一至延续至今,这在我国私人藏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陆心源(1834—1894年),字刚父,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市)人,清代著名藏书家,其“皕宋楼”为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陆心源青年时代就潜心于聚书,“偶见异书,倾囊必购”(李宗莲:《皕宋楼藏书志序》)。陆心源在广东、福建等地为官时,正值战乱,江南故家藏书纷纷散出,他趁机大力收购,并且购入了著名的宜稼堂的大部分藏书。宜稼堂是上海著名藏书家郁万枝(松年)的藏书楼,几乎聚集了当时最著名的藏书家的精槧,如艺芸书舍、水月楼、小读书堆、五研楼等,陆心源购得其中的四万八千七百九十一册,其中有许多珍稀典籍,如蜀大字本《左传》、宋耿秉本《史记》、宋一经堂本《后汉书》、淳祐湖州大字本《通鉴纪事本末》、宋大字本《诸臣奏议》、元至元庆元路本《玉海》与《东京梦华录》、元西湖初印本《国朝文类》等,及其他宋元刻名人手校手抄本,这部分珍贵典籍构成了陆心源“皕宋楼”的藏书基础。此后,他又先后购得同县严氏芳椒堂、刘氏眠琴山馆,福州陈氏带经堂,吴县黄莞圃等藏书家的遗籍。经十余年悉心购求,使其插架总数达十五万卷之众,所藏之巨为江南之最。辞官归里以后,陆心源以其旧居为藏书处,初名“守先阁”,后改称“皕宋楼”,隐然有凌驾“百宋一廛”之意,言其所藏宋版精品之多。后来,陆氏又将“皕宋楼”一分为二,另一部分别称“十万卷楼”。“皕宋楼”用以收藏宋元旧槧,“十万卷楼”专藏明以后的刻本及精抄本、精校本及近儒著述如《明文海》、旧题元刻《说苑》等,并且在其庄园“潜园”中另建楼,沿用“守先阁”之名,用以收藏普通刻本和抄本,其中实不乏精品,如宜稼堂旧藏中的稿本,并且以《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方法部次类别,分类排架。陆氏所藏由于俱为精品,其质量为当世最高,李宗莲在《皕宋楼藏书志序》中认为其有五方面超过著名的“天一阁”:其一,

“天一书目卷只五万，皕宋则两倍之”；其二，“天一宋刊不过十余种，元刊仅百余种”，而皕宋楼则“宋刊至二百余种，元刊四百余种”；其三，天一阁所藏不经之书甚多，而“皕宋则非圣之书不敢滥藏”；其四，“范氏封扃甚严”，“皕宋则守先别储，读者不禁”；其五，“天一阁所藏，承平之时得之，甚易”，皕宋则掇拾于兵火幸存，搜罗于蟫断良析，得之不易。陆心源是清代较开明的藏书家，清光绪八年（1882年），陆心源稟请归安太守将其守先阁所藏悉归公有，以提供给学人阅读。此举彻底破除了私人藏书家秘守所藏的风气。而且由于皕宋楼藏书终于不保，此举又保存了珍贵的文化典籍。陆心源不但是著名的藏书家，而且凭借自己丰富的藏书，专心研读，潜心校勘，成为著名的学者和目录学家，著作甚富，共九百四十余卷，合称为《潜园总集》，主要有考证古书源流及研究金石之学的《仪顾堂文集》二十卷、《仪顾堂题跋》十六卷、《金石萃编续》二百卷等；目录学著作《皕宋楼藏书志》一百二十卷、《皕宋楼藏书志续》四卷等。陆心源还将其所藏的部分典籍刊刻行世，所刻《湖州丛书》、《十万卷楼丛书》质量颇佳，在清代私刻中有一定影响。陆心源于1894年去世，十三年后（即1907年），由于家道中落，其长子陆树藩未能长守其所聚，将“皕宋楼”的全部藏书共五万余册以十万元的代价全部卖给了日本静嘉堂文库，致使陆心源一世心血毁于一旦，也是我国珍贵文化典籍的重大损失。皕宋楼典籍舶载而东，国内学人为之失惊，汾阳王仪通以诗言痛：“三岛于今有西山，海涛东去待西还；愁闻白发谈天宝，望赎文姬返汉关。”

清代著名的四大私家藏书楼有一半在浙江，一为陆心源的“皕宋楼”，一为杭州丁丙的“八千卷楼”。丁丙（1832—1899年），字嘉鱼，别字松生，晚号松存，浙江钱塘人。他与其兄丁申同为清代著名藏书家，被时人称为“双丁”。丁氏宗族祖传几代都有藏书之名。从其祖父丁掌六就已在杭州建楼藏书，为纪念其先祖丁颙在北宋曾聚书八千卷，于是以“八千卷楼”名其藏书处。其父丁英（字洛耆）更承祖志，广聚典

籍,南北寻访,晨购露抄,聚书数万,但皆毁于战乱,仅有一部《周易本义》幸存。丁氏兄弟继承先辈的传统,一生致力于聚集典籍,苦心经营,“节衣缩食,朝著夕求,远自京师,近逾吴越,外及海国,或购或钞,随得随校,积二十年,聚书八万卷”(胡凤丹:《嘉惠堂藏书目序》)。他们致力于聚书之时,正是江南战乱之日,江浙一带许多著名藏书家的珍藏都先后散出,廉价售于市肆,丁氏兄弟从而得以购得几代珍秘典籍。他们曾一次按斤论价从书商沈雨溥手中购得线装书八百捆。为了收藏所聚典籍,丁丙特筑“嘉惠堂”作为藏书楼。嘉惠堂总共五楹,堂屋的楼层即为著名的八千卷楼,是为纪念其祖父的藏书处而命名,收藏其藏书中《四库全书总目》已著录的三千五百部典籍,按总目的分类体系分类排架,并收有《古今图书集成》、《钦定全唐文》等大部头典籍。另有一千五百余种附见于《四库全书总目》的典籍则分藏于该楼的东西两厢。八千卷楼之上是后八千卷楼,主要收藏《四库全书》未采录的典籍八千多种,以甲乙丙丁标目排架,其中包含有制艺、释藏、道典以至传奇、小说等类典籍。后八千卷楼两侧又辟一室为小八千卷楼,也叫善本书室,楼凡三楹,为丁氏兄弟藏书的精华,收藏宋元刊本约二百余种,并且“择明刊之精者,旧钞之传者,及著述稿本,校讎秘册,合计二千余种,附储左右”,“计前后二楼书橱凡一百六十,分类藏储,以后历年所得之书,皆因类而编入矣”(丁丙:《八千卷楼自记》)。丁氏兄弟的八千卷楼,能跻身于清四大藏书楼之列实非幸至。从收藏范围来说,八千卷楼一改当时藏书家只重宋元槧、明以后的典籍不受重视的风气,收有许多明人著述;其次,八千卷楼收有很多浙江籍前辈著作,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第三,丁氏藏书中有许多日本、朝鲜的刊本,这在清代藏书家中是很少见的。从版本上看,丁氏兄弟不但收有宋元刻本二百多种,还收入了许多明代及清代的精刻本,并且有旧抄本一万多卷,这在当时也是绝无仅有的。他们还藏有许多名人校讎本,如卢文弨、黄丕烈、孙星衍、段玉裁、阮元等名家的校本。另外,八

千卷楼藏书中有许多曾被明清几代藏书家收藏过,可以从中找到许多著名藏书家的旧藏,少者三、五部,多者达数百部,如范氏天一阁、项氏万卷堂、祁氏澹生堂、黄氏千顷堂、钱氏述古堂、赵氏小山堂、鲍氏知不足斋、黄氏士礼居、吴氏拜经楼、汪氏艺芸书舍、瞿氏恬裕堂、郁氏宜稼堂等等,几乎荟萃了我国明清两代著名藏书家的精品,真可谓我国明清私家藏书的一个缩影。丁氏兄弟的八千卷楼藏书有两部书日记之,一部是《八千卷楼书目》二十卷,为丁氏藏书总目;一是《善本书室藏书志》四十卷。虽然丁丙在《八千卷楼自记》中告诫子孙要永保其毕生所聚,然在他去世后八年(1907年),丁氏后人因经商失败,亏空巨万。这一年六月,陆氏亩宋楼藏书刚刚被日本人购走,八千卷楼藏书也在日本人的覬覦之中。当时正值端方任两江总督,于是即派江苏著名藏书家缪荃孙到杭州与丁氏后人洽谈,最终以七万五千元代价成交,八千卷楼全部藏书遂移入端方所建立的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江南图书馆。丁氏兄弟毕生心血终幸虽失不散。

丁氏兄弟的藏书事业除了八千卷楼的藏书以外,另一嘉惠艺林的更大功绩是保护、修复文澜阁《四库全书》。太平天国时期,江南战乱,公私所藏大受损失。藏于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或被烧,或被盗,或落于灰烬瓦砾之中。丁氏兄弟为避战乱逃出杭州城,路经留下镇时,偶然发现用来包装食物的纸全是《四库全书》的册页。他们大为吃惊,于是利用为父修墓之机,在半夜冒着危险潜身到文澜阁,把残留于此的一万多卷《四库全书》捆成八百多捆,用马车偷运出城,辗转运到上海,加以保护。当时,画家陆菊珊作《书库抱残图》、浙江巡抚左宗棠亲笔题词以表彰丁氏兄弟的可贵行动。次年,战乱结束,丁氏兄弟又将书从上海运回杭州,并继续着力搜寻遗册,共得八千六百八十九册,藏之杭州府学尊经阁。此后十余年间,丁氏兄弟又出资求购散落的《四库全书》得三百余册,并总领重筑文澜阁,阁成,将所收集的《四库全书》送回文澜阁,并献出家藏的《全唐文》以实之。由于《四库

全书》散失太多,求购无门,丁氏兄弟又发起补抄所佚的《四库全书》,并于光绪八年(1882年)以家藏珍本组织人员在杭州东城讲舍补抄,并求借省内外著名藏书家的藏本抄录。经七载努力,共补残八百九十一一种,全抄二百一十七种,使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大体归复原貌。丁氏兄弟的努力实为我国典籍史上一大功德。清政府曾谕旨予以褒奖,言其所为“洵足嘉惠艺林”。

第七章 历代典籍的整理、 编目和分类

第一节 历代典籍的整理

中国历史上的典籍整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分类、编目等整理；一是内容整理，包括辨伪、校勘、补遗、注疏等。这两种传统经久不衰，近而尤盛。

典籍整理最早始于殷商。在已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中，有些表面刻有“册六”、“编六”、“三册”等字样，这些都是史官在甲骨编联成册后，为便于利用时索取迅捷、准确所作的标签。^①郭沫若在断龟版附有骨白刻辞一事时说：“此等刻辞自为一例，与其他贞卜之辞不同，余曩曾加以考察，谓‘其性质实如后人之署书头或标牙签。盖骨既卜必集若干骨为一组，裹而藏之……’”。^②

殷墟甲骨的埋藏，有的集多朝甲骨文献于一穴，有的则储一朝甲

① 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

② 《殷契粹编·考释》，第203页。

骨文献为一窖，“集中了一个朝代的，说明是对历代王室的甲骨进行整理的了；集中了几个朝代的，更说明是历代流传，不断加以收集和整理的了”。^①

殷商典籍除甲骨载体外，还有玉片和竹木简，考古挖掘出的甲骨文献、玉片文献和竹木简文献是分开贮藏的，一般情况下，甲、骨也分开贮存，不相混杂。

殷商的群籍收藏整理，就是我国早期的典籍整理。约公元前1066年（武王四年），武王伐纣，灭商立周，分封诸侯，严密宗法，建奴隶制新秩序，使其文化经济的发展较殷商更盛。周代典籍以简册为主，内容广，类别众，数量大，其典籍整理也成为典籍收藏的日常业务。周循商制，由史官掌管典籍。周之史官种类多，各史官所掌典籍各有其类，“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书王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执国法及国令之贰……”（《周礼》），此种别类盖源于典籍整理。周王朝收藏典籍的处所有很多，各处所收典籍各有其类。供天子专用的国家重要文献藏于王室宗庙的图室；“盟誓要辞藏在府库”（贾公彦：《礼记注疏·大史》）；“……国之典也，藏在盟府”（《左传·襄公十一年》），此亦为典籍整理之例。

周时，随着典籍的兴盛，不但有群籍整序，单典的校定也随之而起。典籍初出时，由于学在官府，典籍的流传范围极小，故而错乱谬误也较少；至周时，社会的发展使学入士层，典籍的流传范围大大扩展。由于载体的限制，在流传、传抄过程中，典籍不断出现错乱杂混，漏句错字，故宣王时，始有宋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国语·鲁语》），正考父以周太史所藏为基础校定《商颂》，为单典整理之始。

^① 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逮平王东迁洛邑，周室式微，诸侯蜂起，使“纪纲散乱，国异政，家殊俗”（《隋书·经籍志》），“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汉书·艺文志》），私人著述勃兴，典籍倍出，经史纷杂，子集无序。至“孔丘以大圣之才，当倾颓之运，叹凤鸟之不至，将坠于斯文，乃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隋书·经籍志》）。孔子生于鲁国，一生兴私学，授六艺，传礼义，因“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书序》）而整三代之旧籍，成传世之六经。孔子广集鲁、宋诸国与周王室典籍，曾“使子夏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史通·内篇六家》），并“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从而“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上断于尧，下讫于秦，……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汉书·艺文志》）；于三千余篇上古歌诗中，“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成三百五篇（《史记·孔子世家》）；深研《易》经，致使“韦编三绝”，终“为之传”（《汉书·儒林传》），并作十翼；而且定礼乐，并“因史记作《春秋》，上自隐公，下迄哀公”（《史记·孔子世家》），终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六艺。孔子整理古籍“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且“精细详慎”^①，足以为后人表率。

到了汉代，因历史“去圣久远，经籍散逸”，而“简札错乱，传说纰缪”（《隋书·经籍志》），故河平三年（前26年），成帝命刘向主持群书整理，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政府群籍整理活动。

这次大规模的典籍整理以刘向为主，分门别类，由学有专长的专门家负责典籍的整理，“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经近二十年的努力，在即将完成伟业时，刘向逝世，哀帝命刘向之子及其主要助手刘

^① 蒋元卿：《校讎学史》，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17页。

歆继承父业，“歆遂总括群籍，撮其指要，著为《七略》”（《隋书·经籍志》）。

刘向父子整理典籍，首先收集每种典籍的各种抄本，此为典籍整理的基础。是时，宫廷及国家所藏典籍种类繁多，由于流别之异，同一著作会有多种不同传本。“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汉书·艺文志》），如“《书》分为二，《诗》分为三，《论语》有齐鲁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隋书·经籍志》），甚至同一种书会有各种不同的书名，如《战国策》就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其次是比勘校对各种传本。此项工作是以内容较完整、字句较准确的传本为底本，以此勘校其他各本，比勘异同，订正差误，剔除重复，增补脱漏，如《晏子书录》中，刘向称，“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章，除重复二十二篇六百八十三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有些书中的篇章彼此不一，杂乱无序，则重新整序之。如《说苑》一书，或“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别次序”，经其整理，才“皆可观”；又如，《礼记》二十三篇，以《乐本》为第一篇，以《宴公》为最后一篇；《孙卿》三十二篇，定《劝学》为首，《赋篇》为末。每种著作校定编排完毕，即重新抄写誉清。同时，据各种典籍内容、宗旨、作者情况、编校经过等写成一篇篇题解性书录。向卒后，歆集此书录而成我国最早的群籍目录——《别录》，并“集六艺群书”（《汉书·艺文志》），据《别录》的介绍，撮其指要，以是时的分类方法，将其分为六类，成为我国第一部群籍分类目录——《七略》，从而最终完成此次大规模的典籍整理。

刘向父子所进行的这次群籍整理，是我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典籍整理，开创政府整理典籍的先河，为以后历代政府的群籍整理提供了典范。这次整理，对三代至秦汉的所有典籍遗产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搜检和清点，使大部分典籍得以流传保存；对典籍的科学分类，方便了对典籍的使用，扩大了典籍的影响，推动了典籍的

发展。这次典籍整理所确定的分类体系,是对汉以前学术发展的一次科学分类,极大地影响了汉以后学术文化发展的方向。

西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确定了儒家在学术上的统治地位,从此以后,历朝的典籍整理都以儒家经典为先。但东汉初期,由于光武帝刘秀偏爱图讖之学,一时神秘之学风行全国,学术界对图讖典籍的重视胜过儒家经典,公家所藏中,这类典籍占有很大比重。故而,光武一朝的典籍整理,以图讖典籍为先。刘秀即位不久,即命尹敏、薛汉整理图讖典籍。尹敏不信图讖之说,而薛汉则对此颇有研究,由于二人观点相左,这次整理历时三十年,至中元元年(50年)才将整理完毕的图讖典籍公之于天下。但图讖之说,毕竟是虚无缥缈的事,故而其影响仅及光武一朝。至明帝时,经多方收集,国家藏书日增。永平五年(62年),政府组织开始了又一次全面的群籍整理。这次典籍整理由班固、贾逵、傅毅三人总领其事,参加的学者和官员还有孔僖、杨终、丁鸿、杜抚等人。这次整理历时十多年,至汉章帝建初年间(76年前后)始告成。这次整理的成果史无专门反映,但班固却利用这一机会,“并依《七略》而为书部”(《隋书·经籍志》)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的创制。

至汉安帝时,著名学者刘珍受诏领导了两次典籍整理。永初四年(110年),邓太后夜览书林,见典籍十分混乱,“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于是令“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东汉会要》卷十二)“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后汉书·刘珍传》)。元初四年(117年),汉安帝患“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于是又诏令刘珍领博士良史等在东观“校讎汉家法”,并令蔡伦监典其事(《后汉书·蔡伦传》)。这两次整理集中了大量的五经博士及像刘珍这样的“通儒”,其可考姓名者有刘騊、马融、李尤、许慎等。

顺帝永和元年(136年),“诏伏无忌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

子百家、艺术(李贤注:“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筮”)(《东汉会要》卷一二)。灵帝建宁三年(170年),蔡邕拜郎中,受诏领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碑、议郎张驯、韩说等人共同整理东观所藏典籍,“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书》”(《东汉会要》卷一二)。他们这次整理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雕立“熹平石经”以为读经范本。

两汉之际,经济发达,社会繁荣,文化建设颇受此益。终东、西汉两朝,不但有政府组织的群籍整理,私家进行的单典整理也卓有成就。

武帝确定儒家学术的独尊地位后,深研儒家学术、整理校注儒家经典的学人蜂起,仅《汉书·艺文志》著录整《易》者即有十三家,然唯有郑玄成就最高。玄少为乡啬夫,不喜为吏,遂造太学受业,先后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张恭祖、马融等大儒。及党事起,被禁锢,更隐而专修经业(《后汉书·郑玄传》),至建安五年(200年)卒时,遗文凡百万余言。他一生精通十经,并“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繁裁芜,刊改漏失”,使今古文经合而为一。他引古用今,整理注校了《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尚书中候》、《乾象历》等儒家主要经典,使“学者略知所归”(《后汉书·郑玄传》)。郑玄校经皆广罗异本,择善而从,补脱订讹,审音定字,叙次篇目。郑氏校经之业,功“莫大乎条理礼书旧文,使之部秩井然”^①“‘三礼’一词,虽始于马融、卢植,但通贯三书成为‘三礼之学’,则是从郑玄开始”。^②

有汉两代,由于儒家经典的政治学术地位,世间学者多以讲习经术、整理儒家经典为入仕之道,整理其他类典籍的没有几人,诸子百

^① 张舜徽:《郑学丛著》,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50—71页。

^② 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页。

家之书既有脱误,又受小儒私改,使之“浸衰浸微,驯至不可解读”^①。至汉末,始有高诱投身于此。诱“少从卢植学”,“鉴于当时学术堕落”,患诸子百家典籍之乱,于是“参以经传道家之言,注《淮南子》二十一卷。既为注解,又举言读”,建安十七年(212年)“更复补足,始定成本。又以《吕氏春秋》一书,既有脱误,小儒又以私意改定”,“故复依先儒旧训,辄为之解”^②。高诱还有《战国策注》等书。在儒术一统天下之际,高诱倾心于整理注校诸子百家典籍,实为难能可贵。

两汉时期的单典整理还有一种方式,即章句。所谓章句就是对典籍内容分篇章、断句读、述内容。这种方式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至西汉成为典籍整理的重要方法。西汉时,《易》之章句有施、孟、梁三家;《书》之章句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春秋》之章句有公羊、穀梁两家。章句“其初辞意简要”,“其后踵事增繁,以芜累为世诟病”^③,特别是今文经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后汉书·郑玄传》),西汉末年即为许多学者所不喜。西汉的章句仅限于儒家典籍,至东汉,其他典籍也有人之为之章句,如王逸的《楚辞章句》。

是时,“辨伪”的单典整理方式也已出现。典籍初出,尚无真伪,然至春秋战国时期,“诸家学派为了创造于己有利的竞争‘资本’,莫不‘案往旧造说’,编撰伪造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神农》、《力牧》、《文子》、《大禹》及《苏子》等书,都莫不在这种情形下出现”^④。故而至此已有辨伪之术,然至西汉中期才运用于单典整理之中。汉惠帝为建立公家藏书体系而“广开献书之路”,至使春秋战国以来的伪籍充斥朝廷。至汉成帝向歆父子整理群籍时,除正讹文、补脱漏以外,便是辨真伪。

①② 蒋元卿:《校讎学史》,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38页。

③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④ 郑树良:《古籍辨伪学》,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64页。

根据后代文献中引用的《别录》、《七略》的记载,刘向对很多典籍的真伪都提出了质疑,如《神农》,他说“疑李悝及商君所说”,对《礼记》中的《王度记》,他说“似齐宣时淳于髡等所说也”。由于是时文献不充分,刘向的判断有时只凭自己遍阅群籍所获得的印象,但大部分结论都正确无误,为后世所遵从。以刘向为先的典籍辨伪术开创了后世单典整理的新领域。至东汉,马融、郑玄对典籍的辨伪已不单凭印象,发展到以引文、佚文、内容等来辨其真伪,如“马融在考订《尚书·泰誓》时,曾引《春秋》、《国语》及《孟子》等书,以证《泰誓》之为伪作”^①。而郑玄则通过比勘核对,来判断典籍的真伪,如对《礼记·月令篇》的判断。

三国时期虽有过一段时间的安定,但局部战事不断,世无一日宁,文化事业发展缓慢。虽然如此,由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各国也都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典籍整理。三国中,以魏国文化较为发达。由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故而接收了汉室的部分典籍,当时的尚书卫觊患于典籍的散乱,对已有典籍进行了整理。魏文帝曹丕雅好文学,立国不久就令人对秘书中外三阁所藏典籍进行整理,并且在此基础上“使诸侯撰集经传,随类相从,九千余篇”(《三国志·文帝纪》),成我国古代第一部类书《皇览》;魏明帝时,秘书郎郑默负责官府典籍的收藏与整理,他通过“考核旧文,删省浮秽”,使魏之典籍“而今而后,朱紫别矣”(《晋书·郑默传》),并编成了自《汉书·艺文志》以来的又一部公藏群籍目录《中经》,它的分类体系导致影响我国典籍整理几千年的四部分类法的诞生。

西晋获得的魏蜀吴三国典籍数量既众,又不同类,各异属,因而必先合其流,整其序,归其类,故而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秘书监荀勖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晋书·荀勖传》)。这

^① 郑树良:《古籍辨伪学》,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69页。

次整理规模很大,先后查对整序的典籍有十多万卷。荀勖本来还兼有其他职,为集中精力于典籍整理,他上表辞去兼职(见《北堂书钞》卷一〇一引勖《让乐事表》)。在典籍整序过程中,荀勖以郑默的《中经》为基础编制了一部晋时国家典籍收藏目录《晋中经簿》,著录典籍“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隋书·经籍志》)。这次典籍整理确立了典籍的四部分类体系,是东汉以来至西晋时期典籍发展的一次大总结。

晋武帝司马炎死后,西晋政府又发生动荡,“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隋书·经籍志》),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东晋后,即令著作郎李充整理所遗典籍。李充把这些劫后余存的混乱典籍收集起来进行重新整编,他“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从而使其“甚有条贯”,并且编成了一部《晋元帝四部目录》。在这部目录中,李充最终确定了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的排序,从此“秘阁以为永制”(《晋书·李充传》),历代典籍整理“自尔因循,无所变革”(《隋书·经籍志》)。李充的这次整理,使经战火劫余的“中朝遗书”得以集中和保存,使东晋的典籍收藏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至孝武帝时,所藏典籍已达三千六百余卷。

南北朝时期,在典籍整理上成就最大的是北魏。匈奴建立的北魏为保住其统治地位,实行一系列汉化政策,学术上承汉制,以儒为首。在立国之初的天兴四年(401年)十二月,太祖道武帝就“集博士儒生”对儒家经籍进行了初步整理(《魏书·太祖武帝纪》)。魏文帝时,秘书丞卢昶又对国家典籍进行整理,并且编出了北魏唯一的国家书目《甲乙新录》。献文帝时,秘书郎高谧目睹“坟籍残缺”,上书奏请整理典籍,帝从之,使“代京图籍莫不审正”(《魏书·高湖传》)。孝文帝时,政府又派员对当时所收集的典籍进行了认真地校整,编成《魏阙书目录》,并以此为据,遣人求书于南齐。世宗宣武帝时期,秘书丞孙惠蔚考察当时东观所藏典籍,发现旧籍“先无定目,新故杂糅,首尾不

全,有者累帙数十,无者旷年不写,或篇第褻落,始末沦残;或文坏字误,谬烂相属,篇目虽多,全定者少”,于是上奏请“依前丞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欲裨残补阙,损并有无,校练句读,以为定本,次第均写,永为常式,其省先无本者,广加推写,搜求令足”。宣武帝采其建议,令其率“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事校考,参定字义”(《魏书·孙惠蔚传》),对东观典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西汉以来至魏晋南北朝,佛道典籍纷出。至是时,汉译佛典共一千九百一十三部,四千五百七十五卷,道教典籍至北周已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佛道典籍的增加,使两教典籍的整理势成必然。三国时,魏颍川人朱士行即整理汉以来所有汉译佛经而成译经书目《汉录》,此书专录诸家译人情况及译地、译出时间等。至西晋,又有竺法护、聂道真整理自译佛经,各成《众经目》及《众经录目》。晋成帝时,豫章山沙门支敏度利用已有佛录总校群经,并成《经论都录》。至东晋中期,释道安对佛教典籍的全面整理奠定了我国佛典发展的基础。道安一生致力于佛学发展。其时佛经的翻译十分混乱,不依原旨,甚或擅编伪作,“旧来正典,并由翻出,一经数本,增减亦异,致使凡人得容妄造,或私采要事,更立别名;或辄构余辞,仍取真号;或论作经称,疏为论目。大小交杂,是非共混,流滥不归,因循未定”(《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引《综理众经目录序》)。于是道安精校深审诸家译经,注其奥僻,正其讹误,定其真伪,译其新旧,归其类属,共校整汉魏以来佛典五百多部。南北朝时期,佛典也多次得到整理,如释王宗、释道慧等。王俭在创《七志》时,也对所见佛典进行条理归属,于《七志》之后立佛经录。其最著名者当数释僧祐。由于他在齐梁之际地位甚隆,门徒甚众,故能广搜经卷,建立佛藏于定林寺。他着力整序、分类、正讹其佛藏,共整理佛经二千一百六十二部,五千三百一十卷。

最早整理道教典籍者则为晋时葛洪。葛洪师郑隐,藏有丰富道籍,他对这些道籍进行整理、校讎、类分,并录入其所著《抱朴子·遐

览篇》中。南朝宋时,道士陆静修见存世道典“经文纷互,是非相乱”,“真伪混行”,“辞趣烦猥,义味浅鄙,颠倒舛错,事无次序”(《云笈七签》卷四),于是广集道经,骤而整校,去伪存真,区分类别,条其篇目,对所见道典进行了一次系统整理,并于泰始七年(471年)成《三洞经书目录》。其后有王俭编《七志》时对道经的整理。至北周,武帝尚道法,并诏王延领云台观道士八人共校所集道经凡八千零三十卷,延并作经目《三洞珠囊》七卷。政府组织道教典籍整理当自此始。

魏晋南北朝之际,争战频发,社会不安,政府无心于稽古右文之事,群籍整理且不过例行故事,更不说单典校注,有功于此者,唯寥寥数人耳。晋人杜预,潜心于经典,“以当时言《左氏春秋》者,大体转相祖述,错综经文,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更肤引《公羊》、《穀梁》以自乱。故杜氏便自立一体,‘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其异端,……又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成《经传集解》三十卷。更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①。杜氏对《左传》的整理研究,使是书自此独立成学。杜氏的《经传集解》开单典整理的新途径,同时人多有以此法整理典籍者,如梁崖灵恩之《毛诗集注》,宋裴駰之《史记集解》。

晋人郭璞为是时单典整理大家。他虽仕于晋,但不附经籍整校之风,而以宏扬学术文化为己任。他所注解的古书有多种,如《山海经》、《穆天子传》、《尔雅》、《方言》、《楚辞》、司马相如赋等。郭氏的注解以语言解释为主,“以今释古”的方法备受称赞,特别是对《尔雅》、《方言》的注解为后世学林所推崇。

隋朝立国以后,由于政府所获得的前代遗籍来源不一,类例纷杂,无以利用,有些典籍为“太建时所写,纸墨不精,书亦拙劣”(《隋

^① 蒋元卿:《校讎学史》,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52页。

书·经籍志》)。于是在立国之初,杨坚就曾陆续诏刘焯、萧该、何妥等人校书。及开皇九年(589年)平陈后,又派人“总集编次,存为古本,诏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霁、南阳杜颉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隋书·经籍志》)。开皇十七年(597年),许善心为秘书丞,见是时的秘府藏书虽经整理,尚多混乱,于是上奏请求整理,帝许之,诏其领李文博、陆从典等学者十多人“正定经史错谬”,在此基础上“善心仿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类例焉”(《隋书·许善心传》)。

隋长安嘉则殿所藏典籍多达三十七万卷,但多重重复,于是炀帝杨广令秘书监柳晋对其进行整理。柳晋从这些“重复猥杂”,纷乱无序的典籍中整理出一套达三万七千余卷的正御本(《玉海》卷五二),并把它们运往东都洛阳藏于修文殿。隋炀帝还对收集到的魏晋以来的古迹名画进行整理,设立专藏。

“隋代二主,佞佛尤虔”^①,设佛道专藏,极大地促进了佛道典籍的发展,并由政府组织对佛道典籍进行大规模整理。杨坚在开皇五年(585年)曾诏“沙门明穆、彦琮,重对梵本,再审查勘,整理文义”(释道宣:《大唐内典录》),并成《大隋众经录目》七卷。文帝还召精通佛理的译经学士费长房入京,依前代各经录校对多方搜讨来的佛典,进行整理,尤其是齐、周、陈三代佛典,既无目录,又经焚毁,费氏的整理使其存佚俱知,条理立见。炀帝时,又令沙门智果于内道场撰诸经目,分别条贯,对佛道专藏进行整理,成《众经目录》。

隋代典籍整理是梁武帝以来规模和范围最大的整理,上可比汉成帝之绩,下不逊唐宋各代之业,实为承前启后的善举,对以后历代政府的典籍收藏与整理都有影响。

^①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

唐初由于战争的破坏,政府所收典籍皆纷杂散乱,“重复相糅”(《新唐书·艺文志》)。武德五年(622年),给事中欧阳询、秘书丞令狐德棻、侍中陈叔达、太子詹事裴矩等人为撰类书《艺文类聚》,对秘府典籍中有关社会风情、自然科学、人事文物等方面的典籍进行了整理。贞观二年(628年),魏征为秘书监,他“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旧唐书·魏征传》)。太宗李世民采纳他的建议,诏魏征领雠校20人、书工百员,写校整理秘府典籍。五年后,魏征迁他职,帝又命虞世南、颜师古等续领其事,直至高宗初期还“其功未毕”(《旧唐书·崔行功传》)。经过几年努力,使“秘府图籍,灿然毕备”(《旧唐书·魏征传》)。这次整理主要是抄写、著书序和文字校勘、考定儒家经典。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发现四部群籍传写讹谬,缺误脱漏颇多,“乃诏东台侍郎赵仁本、兼兰台侍郎李怀俨、兼东台舍人张文瓘等,集儒学之士,刊正然后缮写”(《唐会要·经籍》),继续完成了魏征开始的秘府典籍整理。这次整理虽然没有编成书目,但为许多典籍写有书序,使开元时的《群书四部录》“首尾三年,便令终竟”(《古今书录·序》)。

高宗以后近百年间,政局动荡。至开元时,侍读马怀素检视所藏典籍,只见“秘书省典籍散落,条流无叙”,内府典籍也“文籍盈漫,皆怠朽蟬断,签藤纷舛”(《旧唐书·马怀素传》)。开元三年(715年),唐玄宗对褚无量和马怀素说:“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所有残缺,未遑补辑,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并令褚无量“于东都乾元殿东厢部汇整比”,无量领闻喜尉卢僎、江夏尉陆云泰、左监门率府参军王择从、武陟尉徐楚璧“施架排次”、“分部雠定”(《旧唐书·褚无量传》),并“于秘书省、昭文馆、礼部、国子监,太常及诸司官借写及整比”(《唐会要·经籍》)。“六年八月十四日,整比四部书成,令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书,无不叹骇”(《玉海》卷五二)。同时,“秘书省典籍散落,修疏无叙”,马怀素奏言,“南齐已前坟籍,旧编王俭《七志》,已后著述,其他盈多。

《隋志》所书，亦未详悉，或古书近出，前志阙而未编；或近人相传，浮词鄙而犹记。若无编录，难辨淄澠，望检括近书篇目，并前志所遗者，续王俭《七志》，藏之秘府”（《旧唐书·马怀素传》）。上允之，并拜马怀素为秘书监，诏其“句校秘书”。怀素集国子博士尹知章、秘书丞殷承业等二十多位“宿学巨儒”，广借民间异本，是正文字，分部撰次（《新唐书·马怀素传》）。对秘书省典籍进行整理刊正。马氏于开元六年七月去世，整书之事，由大理卿元行冲主理，行冲考察秘书省典籍，改马怀素“续王俭《七志》”的计划，“乃令昉、述、钦总辑部分，践猷、愜治经，述、钦治史，昉、颜直治子，湾、仲丘治集”（《新唐书·马怀素传》），三年乃成，并于开元九年十一月，修成唐代第一部国家书目《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开元七年九月，玄宗见丽正殿书院“书籍缺亡，及多错乱，……簿历不明，纲维失错，或须搜阅，难于校寻”，于是“令丽正写四库书，各于本库每部为目录，其有与四库目不类者，依刘歆《七略》排为七志。其经史子集及人文集，以时代为先后，以品秩为次第”（《唐会要·经籍》）。丽正院典籍的整理先由马怀素主持，马逝世后，元行冲受诏“知丽正院”，并领绍伯、利征、颜直等“入校丽正院”（《旧唐书·元行冲传》）。开元十三年四月，丽正殿书院改为集贤殿书院，中书令张说代行冲知院事，至开元十九年冬，最终完成整理。这次整理共整序典籍八万九千卷，“其中杂有梁、陈、齐、周、隋代古书，贞观、永徽、麟德、乾封、总章、咸亨奉诏缮写”的典籍（《唐会要·经籍》）。

开元大规模整理典籍以后，朝廷对典籍的整理一直没有停止。天宝十一载（752年），玄宗又诏令“秘书省检复四库书，与集贤院计会填写”，并“敕秘书监李成裕排比四库书”（《唐会要》），要求他们把秘书省和集贤院所藏典籍进行互相比对，补充缺漏，整比顺序。安史之乱后，朝廷又竭力收集和整理典籍，但随着国力的衰退，收集和整理典籍的规模远不如盛唐。大历十年（775年），代宗因五经文字多讹误，不可卒读，特诏委国子儒官勘校经本，送尚书省。德宗贞元二年

(786年)七月,上据秘书监刘太真请,诏群儒于秘书省内详校《九经》。文宗大和三年(829年),郑覃“以经籍道丧”(《旧唐书·经籍志》),上奏希望“校定六经”(《旧唐书·郑覃传》),上从之。随即“诏令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校整刊正,至开成初年,共校整完成四部书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并分十二库藏之(《旧唐书·经籍志》)。

唐代国势兴隆,历代政府又都信佛崇道,不但兴寺起观,译佛典著道籍,而且还组织力量对佛道典籍进行整理。贞观元年(627年),朝廷令造普光寺,并召释玄奘居之,玄奘检视寺中所藏典籍,多有混乱,故利用在德业寺为皇后写经、在延兴寺监督建立经藏的机会,对所见佛经进行“讎校正则”,对“词旨不通者,并谘而取决”,使其“纲领贞明”(释道宣:《唐高僧传》),并于贞观九年编成《众经目录》五卷。麟德元年(664年),唐代名僧释道宣根据在百泉寺、西明寺等地写经、整经、校经的机会,检视群经,发现五千余卷的佛经“迁贸更袭,浇薄互陈,卷部单重,疑伪凡圣,至使集录奔竞,三十余家,举统各有宪章,征核不无繁杂”,于是“上集群目,取讯僧传等文,勘阅详定,更参祐房等录”(《大唐内典录》),撰成《大唐内典录》十卷。同时,高宗令释静泰与“履味沙门十人,惠概、明玉、神察、道英、县邃等”对敬爱道场所藏佛典“参复量校”,并“敕使韩康、李亮、卢行讷、郑祖均等精加检核”,共整理“旧经论七百四十一部,二千七百三十一卷”,“大唐三藏法师新译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和“有目而无本者合三百八十二部七百二十五卷”,并于次年撰成《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五卷(本目序)。武则天时期,女皇命东都佛授记寺沙门释明佺等对高宗以来的“新译论经”及“虽是前代旧释而未经入目,并虽已入目而错注疑伪”的一千四百七十部二千四百零六卷佛典“审共定校”,成《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十五卷及《大周刊定伪经目录》一卷(本录序)^①。及开

^① 以上转引自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宗教目录编》。

元,虽历代佛典整理成绩斐然,已成佛录六七家,但所存佛典并未完全整序,仍颇多混乱。开元十八年(730年),西京崇福寺释智昇考前代佛典整理之得失,比各佛典目录之异同,在长期搜集整理的基础上成《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全面总结汉唐以来之佛典成就。

唐王朝除信佛以外,也崇道,使道家典籍亦盛。到玄宗时,道家典籍约二千卷,虽经安史之乱,但至代宗时,道家典籍仍增至七千余卷。道典数量虽然增加,但由于“运数绵旷,年代迁易,时有夷险,经有隐见,或劫初即下,劫末还升;或无道之君,投以煨烬;或好尚之士,秘之以岩穴,因而残缺,紊其部位”,先天年间,玄宗敕太清观主史崇玄为大使领昭文馆、崇文院沈佺期、徐坚、诸无量等学者,并集太清观、玄都观、东明观等诸多大德法师对历代所传的道家经典进行全面整理,“集见在道经,稽其本末”,对那些散失了的经典“佇别搜求,继冀修缮”,进行补充,并对全部道经“撰其音义”,终成《一切道经音义》一百一十三卷,唐玄宗亲为之序(史崇玄:《妙门起序》,见《全唐文》卷九二三)。此次道经整理由诸多著名学者进行,质量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实为道教产生以来最大规模、最彻底的一次道经整理。时隔不久,开元年间,唐玄宗在校整集贤院典籍的同时,派人四出搜访道教典籍,对所收之书进行点校整理,并亲自组织编纂目录,由张仙庭成《三洞琼纲》三卷,著录道经三千七百四十四卷。这次对道经的搜访整理奠定了我国以后历朝道藏发展的基础。

唐承旧制,儒学仍为官方哲学,并且以经义取士,故唐时的单典校注仍重在儒学典籍。魏晋以来,国家分裂,南北对峙,在汉朝一度合而为一的今古文经学又分而为二,北崇古,南尚今,而使儒学经籍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唐立国后,以经籍为各级学校教本,因而必须有统一的定本,便于天下传习。于是唐太宗在贞观四年(630年)诏中书侍郎颜师古考证、勘校《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五经文字。师古为一代巨儒,自幼承家学,博古通今,三年即成,政府于贞观

七年颁布新定五经以正天下经籍。同时，太宗又令国子祭酒孔颖达领颜师古、马嘉运、贾公彦、杨士勋等二十多位大儒撰立经义疏，以此统一五经的注解。义疏之学起于魏晋清淡之风，定于佛教经典的讲解，首创于东晋释道安，《隋书·经籍志》中即有多种，不但经部有义疏，子部诸著也有。义疏是单典整理的又一新途径，它选一旧注作底本，进而阐发疏者之论、之得，不仅释词义，而且讲句意、发章旨、述篇意，源于汉儒经注而详于汉儒经注。孔颖达等人考汉以来历代经注，较南北朝时今古文经学家注解之异同，历十年乃成《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又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再行考定，就加增损，正其谬冗之文。次年，又令长孙无忌详加勘正，并于永徽四年颁行天下，以为定式。

唐朝政府组织的单典整理，除此之外还有几次，代宗大历十年（775年），上观太宗整后百年的五经文字多错讹，乃诏委国子儒官校勘经本。司业张参集诸儒“分经钩考”、“辨齐鲁之音，考鱼鲁之失”^①，并以陆德明《经典释文》正之。考定后刻于论堂东厢之壁，是为“壁经”。半个世纪后，朝廷再一次组织对儒家典籍进行整理。文宗太和元年（827年），宰相兼祭酒郑覃因经籍讹谬颇众，博士难正而请雠校经籍，循汉时故事，刻经立石，以正天下。上允之，诏覃等刊正雠校经籍，并于开成二年（837年）镂刻校正无误的“九经”于国子监讲堂两廊，是为“开成石经”。

唐朝以个人之力行单典整理者甚众，如陆德明历梁、陈、隋、唐四代，一生潜心于儒家经籍。他广集众本，博采众说，考历代经籍注解，以方言之音注经，以“仓雅”之说解经，而成《经典释文》三十卷，释解了《易》、《书》、《孝经》、《论语》等十四部经典著作。除陆德明外，整理典籍较著名的还有贾公彦（疏《周礼》、《仪礼》）、杨士勋（疏《穀梁

^① 蒋元卿：《校雠学史》，第61页。

传》)、徐彦(疏《公羊传》)等。

是时,儒家经典以外的典籍也陆续有人予以整理,如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其代表者为李善等人注《文选》等。李善的《文选注》六十卷完成于高宗显庆三年(658年)。李善注引证典籍以证词义,全书共引典籍一千六百八十九种。

宋代的多数天子都崇儒尚文,使“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麟台故事·书籍》),故而都加强典籍整理,使宋朝的典籍整理在规模和成就上都超越前代,并且为元明所不及。

唐代整理的公藏典籍经五代战乱,便“编帙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宋史·艺文志》),因而宋初藏书极少,仅万余卷,且十分混乱。太平兴国九年(984年)正月,宋太宗诏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以唐《开元四部书目》对照清点现有典籍,凡“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于待漏院出榜告示中外”(《麟台故事·书籍》)。这次整理是对先代所遗典籍的一次大清点,为访求阙书、建立公藏典籍体系奠定了基础。咸平二年(999年)3月,宋真宗睹秘阁典籍经久不治,“四部书散失颇多”,于是诏朱昂、杜镐及刘承珪整理、查对秘阁典籍,并且编著目录,于次年成《咸平馆阁书目》。咸平四年十月,宋真宗阅太清楼书目时仍见其亡逸甚多,于是下诏求购遗书,并且令史馆清查现有典籍,抄出所缺书籍名目,以便各地按目访书,“且令杜镐、陈彭年因其时编整签帐,区别真伪,仍令宋绶、晏殊参之,又命三司使丁谓及李宗谔搜补遗阙”(《麟台故事·书籍》)。景德二年(1005年),宋真宗观馆阁所藏典籍中,天文、地理、阴阳、术数之书错乱纷杂,难以卒读,乃命司天少监史序等同加编次,提取精要,依类分之,并成《乾坤宝典》四百一十七卷,真宗亲为之序,这是历代政府第一次对此类典籍进行专题整理。景祐元年(1034年)闰六月,宋仁宗观三馆及秘阁所藏典籍或有谬滥不全,仍“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造李淑、宋郊编排三馆秘阁书籍”,定其存废,去其讹谬,补其差漏,并“命判馆阁盛度、章得象、石

中立、李仲容复观之”，在整理编排的基础上，诏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仿《开元四部录》之体例而成《崇文总目》六十六卷。嘉祐四年（1059年），由于“馆阁书库，借出书籍，亡失已多，又简篇脱落，书吏补写不精”，“上乃命置馆阁编定书籍官以秘阁校理蔡抗、陈襄，集贤校理苏颂，馆阁校勘陈绎等四人，分昭文、史馆、集贤、秘阁书而编定之，……其后，又置编校官四人，以《崇文总目》收聚遗逸、刊正讹谬而补写之”（以上所引均见《麟台故事·书籍》）。这是北宋后期最大的一次典籍整理，基本理顺了景祐以来由于典籍出借所出现的佚亡和混乱。此后至靖康之乱，宋代还有过两次典籍整理。熙宁十年至元丰五年（1077—1082年）间，因“三馆秘阁藏书虽博，类多讹舛”，于是宋敏求等依《崇文总目》请检崇文院所藏典籍，览崇文新增诸种图籍，除前志所载，删其重复讹谬，成《两朝国史艺文志》，著录前志未收典籍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政和七年（1117年），校书郎孙覿、著作郎倪涛等以《崇文总目》清点四库已有典籍，是时四库所有典籍已比《崇文总目》多出数百家，几万卷。也有一些总目中所载典籍已佚亡，上乃允其请，令其撰次增入总目，合为一卷，因崇文院已归秘书省，故目录改名为《秘书总目》。

靖康之乱后，高宗被迫南迁，但仍能承前朝遗风，竭力收集整理典籍。高宗建秘书省时，所藏典籍已达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然所收典籍来源不一，纷乱混杂，多数未加整校。于是，自高宗起即设专人从事典籍整校。绍兴元年（1131年），高宗允秘书少监王昂之请，诏秘书省对所收典籍“分官日校”，并规定“日校二十一版”，每一典校毕，都“于卷尾亲书臣某校讫字”，对那些“内有损坏、脱落、大段错谬，不堪批凿”者，则用别本参照校考，重新补写，全部典籍编校完毕，则“分经史子集四库”，“拔归秘阁”（《南宋馆阁录·储藏》）。淳熙四年（1177年），秘书少监陈癸编整四库藏书而成《中兴馆阁书目》七十一卷。嘉定十三年（1220年），秘书监张攀据《中兴馆阁书目》核对已有典籍，

见淳熙五年(1178年)后的许多典籍没能入目,乃录此新收、新著的典籍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成《中兴馆阁续书目》三十卷。南宋的典籍整理虽然规模不大,但却作为典籍管理的必要手段持续了几乎整个南宋。嘉泰四年(1204年),政府还令秘书省官员每月点视所藏典籍,使“册府崇严,典籍森备”(《南宋馆阁续录》)。

北宋虽一统中原,但国势不盛,“北方辽、西夏、金的侵扰,严重威胁着赵宋王朝的安全。为了乞助于道教神灵以解除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安定民心,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北宋历代帝王对道教皆相当崇奉,真宗、徽宗尤以崇道著称”,并且“通过行政命令强制推行神霄道教”^①,故而北宋对道教典籍的整理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唐时所整校成序的道教典籍至此已散无统纪,篇章杂糅。宋初时,太宗就多方访求道书,并得劫后余存的道籍七千余卷,并命散骑常侍徐铉、知制诰王禹偁对其进行讎校整理,去其重复,共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大中祥符初年(1008年以后),宋真宗检点秘阁所藏道教典籍、太清宝蕴,并将其全部运至余杭,诏知郡枢密直学士戚纶、漕运使陈尧佐等选冲素大师、朱盖谦、冯德之等道士进行整理讎校,并令司徒王钦若总领其事。王钦若等用旧经目录进行核查校整,增录三洞四部经典共四千三百五十九卷,成目上进,真宗亲为之序,并赐名《宝文统录》。由于王钦若等并不长于典籍整理和道学研究,故而这次整校后,道籍仍然“纲条患慢,部分参差,与《琼纲》、《玉纬》之目,舛谬不同。岁月坐迁,科务未究”。于是,王钦若、戚纶等上奏,“共荐海宁谪官张君房主其事,……五年冬,张君房除著作郎,俾专其事。君房于时尽得所降道书,并续取到苏州旧道藏经本千余卷,越州台州旧道藏本亦各千余卷,及朝廷续到福建等州道书……,与道士依三洞纲条,四部录略,品详科格,商较异同,以铨次之,始能成藏。都四千五百六十五卷。……”

^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2页。

至天禧三年(1019年)春,写录成七藏以进之”,是为《云笈七签》(陈国符:《道藏源流考》)。

赵宋不但承唐旧制以儒学为国学,以经义取士,而且把史籍,特别是三史(《史记》、“两汉书”)列于科举,故终宋两代,政府和学界无不勤校经籍,重注史典。立国之初,太子就于端拱元年(988年)令司业孔维等校正孔颖达之《五经正义》。为保证所校无讹,每部经籍都要经校、详校、三校,参校者十多人,大都为博古通今之士,所校各经皆文义上乘,一扫五代离乱所造成的讹误,成一代范本。虽如此,因多人所校,难免仍有讹舛,淳化五年(994年),判监李至等请复校之,上允之,又令杜镐、刘可名等校之,至咸平二年(999年)始成。咸平四年九月,上允李至之请,诏“翰林侍读学士、国子祭酒邢昺、直秘阁杜镐,……校定《周礼》、《仪礼》、《公羊》、《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义,凡一百六十五卷”,所校七经各取定本,如“二礼”取唐之贾彦公疏,《论语》取梁之皇侃疏,然后广集旧本参而校之。“至景德二年(1005年)九月,又命侍读学士邢昺、两制详定《尚书》、《论语》、《孝经》、《尔雅》、错误文字,以杜镐、孙奭被诏详校,疏其错误故也”(《麟台故事·校讎》)。

与此同时,政府也组织史籍校讎、整理。“淳化五年(994年)七月,诏选官分校《史记》、前后《汉书》。虞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兼秘阁校理杜镐、屯田员外郎、秘阁校理舒雅,……修校《史记》,度支郎中、直秘阁朱昂再校。又命太常博士、直昭文馆陈充,国子博士、史馆检讨阮思道,……校前后《汉书》”。“咸平中,真宗谓宰相曰:‘太宗崇尚文史,而三史版本如闻当时校勘官未能精详,尚有谬误,当再加刊正。’”(《麟台故事·校讎》)于是命陈尧佐、周起等校《史记》,刁衍、晁迥、与丁逊覆校前后《汉书》版本,衍等搜历代名贤所注,考其是非,参其得失,次年乃成,共修改三百四十九签,正三千余字。天圣二年(1024年),又诏直史馆张观、集贤院校理王质等校勘《南北史》、《隋史》。景

祐元年,再诏翰林学士张观、秘书丞余靖等尽取三馆诸版本,及先代诸儒注解,参照重校《汉书》。六年,复命秘书丞陈绎又校《汉书》,并命欧阳修参看详。同年,上以南北朝各代史书“舛谬亡缺,复命馆职讎校。曾巩等以秘阁所藏多误,不足凭以是正,请诏天下藏书之家,悉上异本”,集崇文院而校定,上从之,仍命巩校《南齐》、《梁》、《陈》各史,刘恕等校《后魏书》,王安国校《周书》,历四十余载始成。^①

经史以外,朝廷也组织校整其他典籍,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校《庄子》、《道德经》,四年校《文苑英华》、《文选李善注》。校整最多的当数医学典籍。天圣四年(1026年),仁宗命集贤校理晁宗慤、王举正等校整《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素问》等医学典籍,校正后于次年刻印颁行。嘉祐二年(1035年),朝廷在编修院专设校正医书局,专门整理医学典籍,先后入局者有林亿、张洞、孙奇等人,《本草》、《千金翼方》、《金匱要略》等古代医学典籍皆经此局校整后印布天下。宋代政府的单典整理以巨儒、学士为坚,一校再校,精而又精,改诸籍传印之讹,为后世典籍整校留下定本,故而宋代所印典籍,历代皆视为珍品。

除政府组织以外,终南北宋,以个人之力致力于单典整理的人也很多。宋初,即有徐氏兄弟(徐铉、徐锴)校整《说文》。《说文》自汉代出于许氏,历代皆有注解、校勘,然精者少,多粗疏,甚而窜改。徐氏兄弟广备旧本,集而整之,成大、小徐本《说文》。嘉祐五年(1060年),欧阳修、宋祁等成《新唐书》,然其着意于文章而忽略考证。吴缜据史籍以考,正其舛驳脱误,订其真伪,成《新唐书纠谬》二十卷。他还考订《五代史》而成《五代史记纂误》三卷,为宋时整理史籍之大家。其他如洪兴祖注《楚辞》成《楚辞补注》,彭叔夏校《文苑英华》而成《文苑英华辨正》十卷等不胜枚举。其集大成者为朱熹。朱氏一代巨儒、理学代

^① 蒋元卿:《校讎学史》,第69页。

表,极重典籍整校。他的整理涉经史而及子集,整而成著者有《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朱氏一改是时鄙弃旧注之风,广集旧注以为新释,如注《诗》多采毛传郑笺,集注《楚辞》多用王逸旧说,注解《论语》多据何晏《论语集解》。他同注重同代学人之说,考其得失而为己用,取其优正而摒其劣误,《论语集注》中即颇多引用二程、周敦颐诸大儒之高见。朱氏典籍整理正一代学风,功及后世。

前代典籍历多次战乱、天灾、人祸,至宋已多有亡佚,后人多有按录而求不得者,故是时之单典整理出现辑佚方法,即辑各种同代及后世典籍之引文而成所佚典籍的概貌或全貌,使书名亡实不亡,其最早以此法整理典籍者为黄伯思。他从《意林》、《文选注》、《舞鹤赋》等书中辑出已佚的《相鹤经》。其后有名儒王应麟,评考前代群经注文,辑成《周易郑康成注》、《郑氏尚书注》,使这两种亡佚典籍得以流传后世,其功实不下于原著。

尚武轻文的元朝政府无心也无力于典籍整理,而民间致力于单典整理者也不乏其人,如胡三省之整注《资治通鉴》。三省生于宋元之际,宋亡不仕,隐而治学。他仕于宋时已考订整理《资治通鉴》而成《资治通鉴广注》九十七卷,惜亡于战乱,后专心发愤再整,重校勘、释注、考证是书,释其所涉地名之异同,考其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并对已佚旧著作了辨误而成《资治通鉴音注》。《通鉴》为历朝政府之鉴,为历代学人之宝,皆得益于胡氏注整。元人单典整序之成就最高者为吴师道。《战国策》自定于刘向,后有高诱所注,及宋,高注本已残缺不全,后有曾巩补注,姚宏校注及鲍彪重定次序的新注,这些整理虽多纠高注讹漏,然仍然未善。吴氏鉴于此,取姚注本,参校以鲍氏本,并采群书以正,而成《战国策校注》十卷。吴氏“其篇第注文,一仍鲍氏之旧,每条之下,……增其所阙……,纠其所失……,名以补曰、正曰别之,复取刘向、曾巩所授三十三篇,四百八十六首旧策,为

彪所窜改者，别存于首”。他之所以如此，皆因“盖既用彪注为稿本，如更其次第则端绪益莽，节目皆不相应；如泯其变化之迹，置之不论，又恐古本遂亡，故附录原次以存其旧”，因而“古来注是书者，固当以师道为最善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吴氏整理典籍的学风反其时乱删妄改之道，独立于宋、元学界，为后人所重。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由于罢秘书监，使典籍管理严重不善。有此先例，终明一代，历代王朝都只重收藏而无视整理，虽搜集不少典籍，但都未能很好整理。至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即立国近百年后，才有杨士奇等对从南京移入北京文渊阁的典籍进行逐一清点整序，且将典籍按千字文自“天”字至“经”字进行排序，这是明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典籍整理。唐宋以来的有序典籍经元只藏不整及明初的管理不严，已相当混乱，杨士奇等能初步整理排次实属不易。

唐宋以来，学界整理典籍时刮起一股擅改古书的邪风。此风始于唐明皇改《书·洪范》“无偏无颇”为“无偏无陂”，上行下效，邪风愈烈，其后有范谔昌改《易·渐卦》之“鸿渐于陆”为“鸿渐于逵”等不胜枚举。此风之初，在改书时“犹曰旧为某，今改为某，则其本文犹在也”，但宋代以后，“侵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轻改，不复言其旧为某”^①，使古籍讹舛剧增，面目全非，虽为是名，而非是文，虽存犹亡。“宋儒之为学，大都黜文辞而尚节气，舍训诂而言理性，故对于古来经典，怀疑殊甚，……而风气所被，一般士子无不荒经蔑古”，使“凿臆空断，妄改经文”^②之风愈演愈烈，先后有朱熹之辈以穷理而疑古籍，以疑古籍而删改其文字以合己说，故有《孝经刊误》之误，后有王柏之流“动辄以脱简为辞，臆为移补”，而有《书疑》九卷，有删一两节者，有删一两句者，“如并《舜典》于《尧典》，删除姚方兴所撰二十八

① 顾炎武：《答李子德书》。

② 蒋元卿：《校讎学史》，第105—106页。

字,合《益稷》于《皋陶谟》,以《大禹谟》、《皋陶谟》为《夏书》,以《论语》‘咨尔舜’十二字补‘舜让于德弗嗣’之下,以《孟子》‘劳之来之’二十二字补‘教敷五教在宽’之下”^①,多随己意而改。至元、明,擅改之风有增无减,而以万历间为甚,“万历间人,多好窜改古书,……且如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氏檄》,本出自《旧唐书》。其曰‘伪朝武氏’者,……近刻古文,改为‘伪周武氏’……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谬种流传,至今未已。山东人刻《金石录》,于李易安《后序》‘绍兴二年玄默岁壮月朔’不知壮月之出于《尔雅》‘八月为壮’,而改为‘牡丹’”^②。源于南宋的辑佚法是一种整理典籍,保存、流传古籍的有效方法,然时至明际,则被用作窜改古人经籍的手段。是时之学士集已佚古籍的佚文于群书,另外或加上自己所撰,或采自不相干的内容而成册,仍著原撰人及规模,既不说明其辑佚体例,亦不注明材料出处,皮虽不假,而瓢已大异,使后人真假难辨,以假为真。至宋已亡佚而突出于明的典籍,多为是故。终明一代,脱此邪风而整理典籍者,寥寥数人而已,刘绩校《管子》、《淮南子》,推求意义而成二子补注;胡应麟考索旧籍,参校疑义而成《四部正伪》;梅鹗精密审辨,考《尚书》之讹伪而成《尚书考异》为其代表。

清廷入关后,由于其屡兴文字狱,加之汉族知识层的抵制,很长时间没有建立起公家典籍收藏体系,因而谈不上大规模的典籍整理,直到立国百多年后的乾隆年间才开始整理所藏典籍。乾隆九年(1744年),高宗命于敏中等清点检阅内府所藏典籍,并择出其中宋、金、辽、元、明各朝的善本,藏于昭仁殿,供皇上披阅,被赐名“天禄琳琅”。及修四库全书,于氏等又受命重新整理各种新收善本,并成《天禄琳琅书目》十卷。此后,嘉庆二年(1797年),彭瑞等受命对后来又收集到

① 蒋元卿:《校讎学史》,第107页。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

的宋元以来善本进行整理,续编《天禄琳琅书目》二十卷。为修《四库全书》而进行的大规模典籍整理,是清代乃至封建社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典籍整理。乾隆三十七年(1722年),通过各种渠道向全国征集典籍,至三十九年,征集到的典籍已逾万种。为整理这些典籍,清廷专门在翰林院设四库全书馆,并命大学士于敏中、尚书福隆安等为正总裁,纪昀为总裁,及以下官员三百六十人,其他人员三千四百六十六人,对其清点、整理、校对、抄写。清廷对这些典籍先叙列目录,注明著者、书中要旨,并依汉以来各朝整校典籍的先例,“诏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以《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大旨,叙于本书卷首”,并“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并在此基础上编成《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参加此次典籍整理者,多为是时的著名学者,如负责经部的戴震、史部的邵晋涵、子部的周永年俱为当时奇才,故此次整理规模之大、水平之高实为前所未有。此次整理过的典籍仅载于《四库全书总目》的收书者和存目者即有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卷之多。随着四库全书的编成,朝廷在各处所收藏的典籍都被整理、分类、收藏,从而真正建立起清廷较有序、较完整的公藏典籍体系。是次典籍整理虽以其规模之大、考据之精、分类之细、著录之富为前所未有,然其删改之横、焚毁之巨、破坏之烈也是古之所不及,是故名为整理,实为摧残,是为中国典籍发展之大劫难。

清廷入主中原后,一方面为压制汉人反抗情绪大兴文字狱,屠戮无辜学人,使其无勇于今论,不得已而遣其聪明才智于章句训诂之中;另一方面朝廷为收买人心,除汉人反清之志,又以科举为诱饵,使部分学子埋首于古籍,追求及第。而汉族学人也不甘为清廷鹰犬而仕于朝廷,于是多涵于故纸而不视现实。故而终清一代,学术界考据学风盛行,学人皆好古、崇古、整古,这种风气使清代的单典整理取得较大的成就。自汉魏、唐宋以来所兴起和发展的单典整理的

三种方法,校注、辑佚、辨伪至清代都发展到一个至高境界。清距汉魏已远,三代、汉唐典籍经数千载传刻伪托,简错字讹,谬误纷呈,虽有汉魏之整,唐宋之理,然经元不校,明乱改,许多典籍几不可读,清的整理正字去讹,改错去误,使多数古籍反本归真。其精密的校注方法亦超前惠后:其一法,“用两本对照,或根据前人所征引,记其异同,择善而从”;其二法,“根据本书或他书之旁证反证,校正文句原始之讹误”;其三法,“根据发见著书人原定之体例,刊正全部通用之讹误”;其四法,“根据别的材料,校正原著者之错误或遗漏”^①;其五法,以小学校经,以音韵训古。清初,学子厌于明人以胸臆断古意、擅改古籍的恶习而矫枉过正,陷“泥古”之境,此以惠栋的“吴派”为代表。这一派的弊端在于盲从,“凡古皆真,凡古皆好”(梁任公语),然其典籍校注亦有开启后学之功。惠栋学承家传,一生倾心于单典整理,其搜采旧文,详勘古训古注,互相参证,取汉儒之说以核今典,见异于今者,不论是非皆从之。其所解注凡《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等九经而成《九经古义》,更有《左传补注》六卷。另校《后汉书》成《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惠栋之学虽“以深信汉人太过”,使“其说常迂拘不可通”^②,然其一改宋明以来任疑古人之风,其功不可没。此后学与惠氏近者有王鸣盛、钱大昕两人。王氏前半生居官,后半生退居,隐而致力于单典整理,曾问经义于惠栋,从而亦以汉儒之说为宗,郑许之学为守。其“购借善本”,且“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暨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并借“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十七史商榷·序》),以考经籍而成《尚书后案》,承康成之学,扬其宏旨,纠此前各家校注之谬,整理历代史籍而成百卷巨著《十七史商榷》,共注整

① 蒋元卿:《校讎学史》,第113—114页。

② 蒋元卿:《校讎学史》,第136页。

《史记》以下前后“汉书”，魏晋南北朝各代及隋唐五代诸史籍，其校雠文本，补脱正讹，考其典制事迹之虚实，注其职官名物之难读，使经宋明被擅改的史籍正本清源，还其原貌。钱大昕与王鸣盛同时代，两人颇有渊源，钱氏单典整理方法虽近于“吴派”，重视汉儒之说，然不主张墨守成规，他整理典籍重在校雠与考订，其《二十二史考异》考天下古今沿革分合，订千年未正之伪，整考《史记》以下至《金史》、《元史》二十二部史籍，考订之精前所未有，其价值超过王氏之《十七史商榷》。清人校整典籍有惠氏“吴派”这种以古为真者，也有与其恰恰相反者，不泥于古说，勇于纠正古籍中的讹谬，改正文字，但其所改与明士所审大相径庭，其所改虽一二字，然能统贯上下文，并搜罗旁证，考之以据，通之以理。这种整理典籍的学风以戴震统领的“皖派”为代表。戴氏一生所整理的典籍量虽不多，然成就卓著。其所校《算经十书》皆为精品，其《仪礼集释》、《仪礼释官》、《仪礼识误》、《大戴礼》皆经学典籍校注的典范，其整校《方言》、《尔雅》而成《方言疏证》、《尔雅文字考》也有大成。然戴氏单典整理最为人称道者为《水经注》。是书自汉魏以来，向少有人整理，加之唐宋学士移书，“非惟字句之讹，层出叠见，其中脱简数十字至四百余字者”^①，更经混于注，注插于经，无以辨证。戴氏倾注毕生之力，“据古本，搜群籍，审地望，寻文理，一字之夺必补之，一字之羨必删之，一字之误必更之”（段玉裁：《与梁耀北书论戴赵二家〈水经注〉》），更博考唐以前撰著，若《通典》、《初学记》诸书所引，钩稽校勘，参互考证，凡补其阙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十五字。神明焕然，顿还旧观。”^②更为重要的是，戴氏以三证分其经注之别，“一曰独举复举之不同。经文甚简，首举水名，下不再出，注文繁，一水内必详其注入之

①② 蒋元卿：《校雠学史》，第142—143页。

小水以间厕其间,是以主水之名屡举不厌……。一曰过径之不同也。经必曰过某,注则必曰径某,所以别于经。一曰某县及某县故城之不同也。注所谓某县故城者,即经之某县也,经时之县,注时多为故城,经无言故城者也”(段玉裁:《与梁耀书论戴赵二家〈水经注〉》)。这一发明,使几百年来解读此篇的疑窦顿开,此后学人研解此书无不以戴氏的创论为基础。戴氏单典整理精神的继承者首推段玉裁。段玉裁聆戴氏之海,贯古形、古音、古义的研究于典籍整理之中,校正订误了唐以前的许多古籍,其整理典籍的成就主要有《尚书古文撰异》三十二卷、《重订毛诗故训传》三十卷、《周礼汉读考》六卷、《仪礼汉读考》六卷等,其贡献最大、成就最高的是《说文解字注》。《说文解字》自许慎撰成,历代多有人整理,然多不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至清已无善本,段氏投四十年之精力,探明了《说文》的体例,改正了《说文》中的讹误,以形音义各种方法勘正古注之谬,以新注训古义,察之精剖之密前无古人。与段氏同时受教于戴门而整校典籍成绩卓著的还有王念孙。王氏从戴震学以音韵训诂,“深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据以校勘古籍,四通八达,绝无凝滞”^①,王氏校注古籍多种,列于《读书杂志》者即有十八种,这些典籍经其整理,大都讹正字明,“凡古儒所误者,无不旁征曲喻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②其最有成就的著作为《广雅疏正》,以校雠兼训释,触类旁通,考核古释,训以今言,其疏正之价值超迈原著。有清一代,倾注于单典整校而成大就者,除吴门皖门诸学人之外,还有多人,如卢文弨整校诸子及《蔡中郎集》,毕沅精校《山海经》、《老子》,孙星衍整理《晏子春秋》,孙诒让校《墨子》等。

单典整理的辑佚法自南宋出现,经明人误用,至清始成一重要

^①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40页。

^② 阮元:《经义述闻·序》。

方法。有清一代,以这种方法整理典籍成效颇巨,清廷修《四库全书》时组织学人辑佚典于《永乐大典》是古往今来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辑佚整理。《永乐大典》编于明永乐年间,其收明时典籍七八千种,每种古籍都分散内容以从大典之类,清时许多已佚的典籍其中都有保存,故而,乾隆允朱均之请,组织四库大臣从中辑出古籍三百八十五种,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其中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一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所辑的典籍多有价值,如《东观汉纪》、《旧五代史》、《春秋释例》等。嘉庆时,又从大典中辑出卷帙浩繁的《宋会要》一百卷。除清廷组织辑佚以外,清代以个人之力投于辑佚的学者也很多,如姚之骝辑《后汉书补遗》、汪文台辑《七家后汉书》等,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七百六十卷。是书辑唐前诸儒撰述的、见之于史志私目而迄清已佚的典籍六百三十二种,七百六十卷。清人辑佚所参考的典籍上及汉儒子史及经注,下及唐宋各代类书及史书注解、经籍义疏,广搜博引,力求完备。所辑典籍既涉经史亦及子集,既辑一人之亡典,也钩一代之沉籍,上至三代之典,下迄宋明之籍,“莫不穷搜博考,旁征远绍,擎五厄之散亡,扬万古之文明,传先儒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诸儒之功,诚千古之传迹”。^①

典籍的辨伪整理历代均为学人所重视,至清代则其成就远超古人。清人辨伪均细密慎重,不以胸臆断真伪,对突现于明代的已佚典籍不盲从,不轻否,多细考慎校,皆能辨其伪而存其真,清人辨别古籍真伪或考以著录源流,或考以文体文句,或考以思想渊源,或考以所载典章制度,经清儒辨别整理被定为伪书或疑为伪书的典籍六十余种。清儒辨伪最初者姚际恒,姚承前人辨伪之学风,广研所见之典籍,成《古今伪书考》,其分经、史、子三类,定九十余种典籍为伪书,虽其

^① 蒋元卿:《校讎学史》,第189页。

定伪证据多有不足,然其将居统治地位的经籍及其传注与其他各类伪书同列是前所未有的。清人辨伪最著名的当推以毕生精力、罗百余证据、定流传千年的《古文尚书》为伪书的阎若璩。阎氏有《尚书古文疏证》,引前人之证,旁征博引,从两汉目录所著录的今古文篇数,从所见的此书佚文,其取材、用材、其篇章分合,从其所述的史事、典制、历法诸方面证明其为伪书,成千古定案。终清一代,以辨伪整理典籍的除姚闾二儒外还有多人,如孙志祖整理《孔子家语》而成《家语疏证》,定《家语》为魏之王肃所伪托,刘逢禄整《春秋》、《左传》成《春秋左传考证》,定《左传》为后人所托。清代的辨伪整理考定了历代的伪书,平息了历代的辩争,为后世典籍整理开辟了一个大体清洁无伪的佳境。

第二节 历代典籍的目录编制

典籍目录可分为两种,一曰单典目录,一曰群籍目录。单典目录类乎现在一书之目次,无须赘言。群籍目录为群籍整序之最终成果。

汉武帝时,典籍骤增,又值对匈奴用兵,急用军事典籍,故而军政杨仆受命整理兵书,并于元光六年(前129年)前后编成《兵录》上奏。此目虽仅“摭摭遗逸”,且“犹未能备”(《汉书·艺文志》),然它是我国第一部群籍目录。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光禄大夫刘向受诏主持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群籍整序。此次整理,“每一书已,向则条其篇目,撮其旨意”(《汉书·艺文志》),“论其旨归,辨其讹谬”,撰为一录,“时又别集众录”(阮孝绪:《七录·序》)而成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群籍提要目录《别录》。“刘向校书之功,终身未毕,虽有分工合作之界域,而分类编目之

书,殆未及为”^①,其书录并未分类整理,实际上是各书叙录的汇集。及向卒,其子歆承父业,并略《别录》,经分类编整而成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群籍分类目录《七略》。

刘歆的《七略》为我国第一部官修的国家所藏典籍目录,据《汉书·艺文志》所删录及此后各家所征引,可知其在编辑体例和方法上都是创举。全目共著录典籍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汉书·艺文志》),依学术性质分类而成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每略下有若干种,每种下有若干家,家后再列书目,而以“辑略”统领全书,叙述先秦至汉代的学术渊源,考辨典籍发展的轨迹。每略之后又有总叙,或述经传之流变、诸家传注之优劣(六艺略),或辨各学派之源流、学术思想之长短(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或叙辞赋之发展过程(诗赋略)。每种之后有小叙,记各家源流,评各家学术之长短(唯诗赋一略,“虽已分为五种,而实同为抒情之作。但有雅俗之不齐,实无是非之可辨”^②),故而其每种之下无小叙)。条目之下摘《别录》之叙录以为小注。《七略》的著录格式多以书名为标目,次列卷数,再著著者。此种格式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学的精神。也“有先著撰人而后系书名篇数者”,还有“或因未详何人,或因多人累积”,而“仅著书名篇数而不著撰人者”,及“加文体于撰人后即以为书名而系以篇数者”^③。目录所收的典籍以分类为序,“同类之书约略依时代之先后为次”,“书少不能成一类者,附入性质相近之类”,“学术性质相同者,再依思想之派别,或体裁之歧异”排序,“一书可入二类者,互见于二类”,“一书中有一篇可入他类者得裁篇别出”。^④

《别录》、《七略》总结秦汉以前学术发展之成就,考是时学术思想

①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46页。

②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页。

③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第162页。

④ 同上书,第52—53页。

之渊源、得失,导是时及后来学术发展之方向;《别录》、《七略》著录保存了三代、秦汉以来的万卷典籍,全面揭示了西汉一代所藏典籍的全貌,为后世考证典籍的真伪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证据。《别录》的叙录使所佚典籍虽不为后人所见,但也可据此传其旨趣,奠定目录学的基础,开创目录编制的理论,其对著书人所作的评价为后人评议准绳。《七略》所创的目录编制体例及格式开后世书目编制之先河,成后世遵循之范例,实不愧为“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①

东汉明、章二帝时由班固主持的典籍整理,促成了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的形成。班固居兰台令史二十余年,一直参与整校国家典籍,熟知前汉旧籍及后汉新典,以《七略》校检,并删其要而成我国现存最早的群籍目录《汉书·艺文志》(图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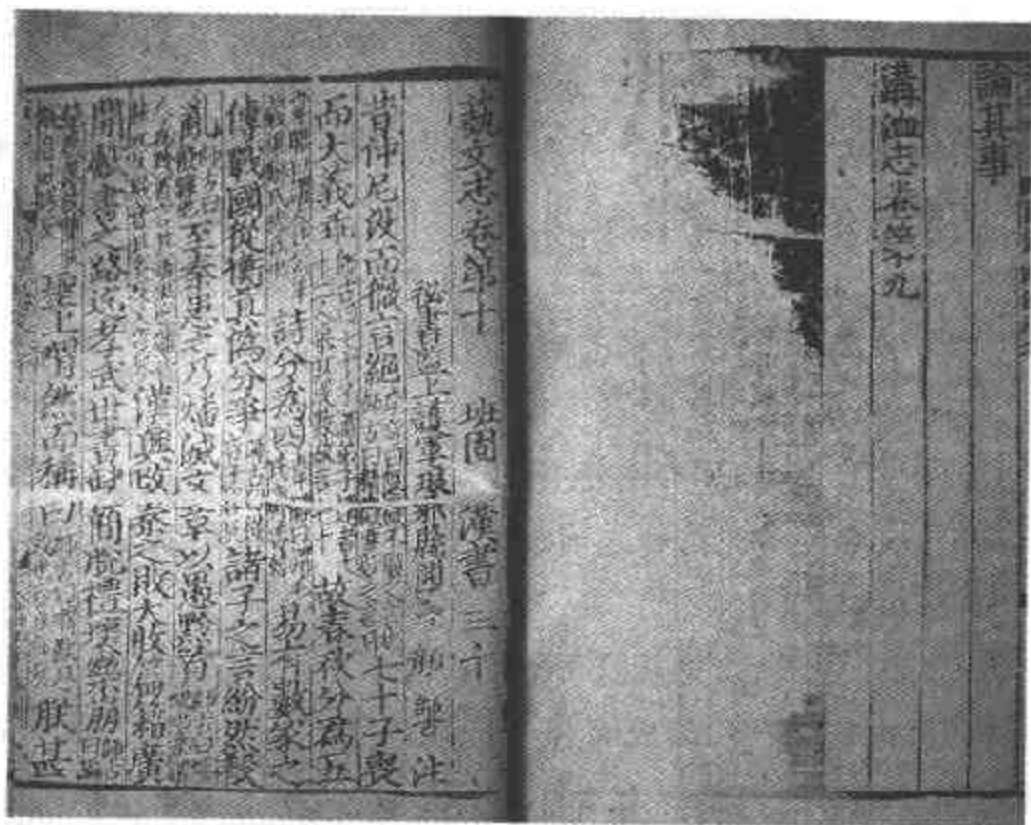


图40 《汉书·艺文志》书影(宋刻元修本)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3页。

班固《汉书》创新代史新例，专记西汉一代之史事，故而其“艺文志”专记西汉所遗之典籍。班固的《汉志》保留了《七略》的总叙、小叙、分类体例、著录方法、格式，然亦有创新。其改刘略之“辑略”为“叙论”；对刘略所著各典亦略有调整、改属，并将所改之处标以“入”，“出入”，“省”等，此既不掠人之美，也不掩己之绩，史家美德也。所谓“入”，即增刘略未录而固以为该录之典，《汉志》共“入”刘向、扬雄、杜林三家共五十篇于“六艺略”之“书”下、“小学”下，“诸子略”之“儒家”下，“诗赋略”之“赋”下；所谓“出入”者，即改刘略有而固以为不妥典籍的归属，如“兵书略”之“兵权谋”下注：“出《司马法》入礼也”；所谓“省”，即刘略著录固以为多余者，以注明其曾录于刘略，“大之于省‘略’，如去掉《辑略》，小之于‘省’家，省‘篇’”^①，如“兵书略”之“兵权谋”下即注“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曷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九家，盖此诸家已见于“诸子略”。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开我国史志目录之先河，创史志目录之体例，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传统。史志目录因史而传，得以长存，后学据此可考见前代著述之盛和藏书之盛。班志保存了《七略》的分类体例、著录方式、格式、大小叙，故《七略》虽佚，亦使后世学人据此考见三代至汉之学术源流、文化概貌。

东汉以后，史历三国，魏秘书监郑默受诏整理秘书、中、外三阁所藏典籍而成《中经》，此为魏之国家藏书目录。此书虽已久佚，然其草创之四部分类体系由荀勖完善、李充定秩而影响深远。

西晋统一中国后，秘书监荀勖主持整理群籍三次，并于咸宁五年（279年）据郑氏《中经》编成综合性官修目录《中经新簿》。是书共著录其所参与整理的典籍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零九百三十五卷，其中魏存而晋亡者一千一百一十九部，晋存者七百六十六部。其所著典

^①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7页。

籍收录了郑默《中经》所著之书，且以其分类体系为基础，整理改进为甲乙丙丁四部，但记经子史集各类典籍并附以佛经典籍。其所著典籍“但录题及言，……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隋书·经籍志》）。是书虽不辨作者旨意，不及刘略之叙录可辨学术源流，然其解每书之题亦开典籍著录的新体例，其所修定的四部分类为历代书目所沿用，其附佛经于四部之后开综合性目录著录佛道典籍之一途。

东晋中书侍郎李充编整典籍，并著录所整理的典籍而成《晋元帝四部书目》。李目著录典籍三百零五帙，三千零一十四卷。“遂总设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隋书·经籍志》），只定甲乙四部次秩，不拟各类属名，只于部下列书名。甲部著六艺经典，乙部录史籍，丙部类诸子百家之书，丁部列诗赋文集。李目虽仍以甲乙丙丁四部类所录典籍，然已改勘之秩，而成经史子集之序，奠定此后千余年四部分类的基础。

刘宋承东晋之制，在典籍校整时编制了三部载于史籍的群书目录，然三目俱佚。《晋义熙已来新集目录》三卷，《隋志》著录无撰人，《旧唐书》之“经籍志”、《新唐书》之“艺文志”皆著为丘渊之撰，此目虽名晋，实撰于刘宋，所著各典当取晋安帝晋义时代至宋文帝之间所撰著的典籍。《四部大目》四十卷，秘书郎殷淳撰。殷淳于元嘉年间参与秘书监谢灵运所主持的典籍整理。此目似为正式编目前的草目^①；《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即《四部目录》，为刘宋乃至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群籍目录。《隋志》虽言“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选四部目录”，但并不确切，此目实为殷淳所撰。此目录收录典籍“一千五百六十四帙，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五十五帙，四百三十八卷，佛经”（《广弘明集》卷三引阮孝绪：《古今书最》）。此目虽亡，但其以四部为体，另附佛经，沿袭了《中经新簿》的体例。

^①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9页。

梁代典籍整理规模较大,共编目录三部,其中最著名的是《文德殿四部目录》,此目由刘孝标撰,是刘与学士贺蹤“典校秘阁”(《南史·刘峻传》)群书的结果。全目著录“正御”典籍二千九百六十八帙,二万三千一百零六卷(《古今书最》)。仍以四部为体,以“术数”典籍为附,此类典籍由数学家祖暅之编整著录。此目不录所藏全部典籍,只著单本精品,实为首创。以“术数”为附,也前无古人。两年以后,天监六年(507年),秘书丞殷钧又撰《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四卷。还有《梁东宫四部目录》四卷,刘遵撰,“似为太子藏书所编之目”。^①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私家目录,专科目录也很发达,两者都有大的建树。

私家目录可分为两种,其一曰私藏目录,其一曰私撰目录。私藏目录限于一家所藏的典籍,在著录方法和体例上只考虑这些典籍的范围而不及其余;私撰目录是以一人之力著录所见到的典籍,而不限于一家所藏,这类目录所用方法和体例均较完备。

据《梁书·任昉传》载,任“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高祖使学士贺蹤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这段记载虽未言明任昉所编为何目,体例如何,但任昉编有私藏目录则无疑。此为私藏目录,也是私家目录之始。

我国私撰目录之创始者是王俭的《七志》。王俭在二十二岁时以秘书丞主持刘宋元徽年间的典籍整理,并编成国家藏书目录《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但他不满于魏晋以来因因相袭的四部分类体例,于是根据他了解的官私藏书,利用整理国家藏书的机会,着手编纂《七志》。

王俭的《七志》亡于唐宋之际。然考阮孝绪《七录序》及《隋书·经籍志》,尚可得知一二。盖全目共四十卷,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典籍目录

^①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26页。

巨著。是目扬弃是时已趋成熟而一统天下的四分法,重新采用刘向、刘歆的七分法。是对当时典籍编目千录一体局面的冲击,有利于目录学的进步和学术的发展。俭志虽名为七分实为“九条”。且承荀勖《晋中经簿》之遗规,附佛经于目后,又开附道经之先河,此后的综合性书目中同时附录佛道两经的做法,实起源于此。

王俭开私撰目录之先,阮孝绪便踵之于后。三十多年后,梁处士阮孝绪便编成我国第二部颇有影响的私撰目录《七录》。

阮孝绪为一介平民,不屑于功名利禄,专心于目录之学。阮孝绪既不像向歆父子及班固等有主持国家典籍整理的条件,也不像王俭身居高位有部属帮助,他仅以个人之力,尽访典籍,“凡自宋齐已来,王公搢绅之馆,苟能蓄集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并以官私目录校其“凡在所遇,若见若闻”的典籍。在其好友、著名学者、目录学家刘杳的帮助下,于梁武帝普通四年(523年)“总集众家”,“斟酌王(志)刘(略)”而成《七录》十二卷。阮氏研考了王志刘略的七分法分类体系和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四分法分类体系,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创造了一种新的七分体系,“其方内经史,至于术技,合为五录,谓之内篇;方外佛道,各为一录,谓之外篇。凡为录有七,故名《七录》”。是目共著录典籍五十五部类,六千二百八十八种,八千五百四十七帙,四万四千五百二十六卷,比当时的国家书目《天监四年四部书目》所收典籍几多一位,自此“天下遗书秘记,遮几穷于是矣”。阮录不仅吸收了刘略、王志七分体系的精华,而且继承了其以叙录明学术源流的优良传统,对所录各书“皆讨论研核,标判宗旨”(《七录·序》),一反汉魏以来五百年间典籍目录不著叙录的风气,实为目录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阮氏还在其《七录》后面附了一个引用书目,详细记录了自目录产生以来几百年间历代所编纂的十一部重要典籍目录的收书数量、存亡情况等,这不但是目录编制中的独创,而且是各类典籍撰述中前所未有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专科学目录成就最高者当推佛典目录。佛教自西汉后期传入中土后即出现了大量传译的佛教典籍。汉魏以来的官私目录除阮孝绪的《七录》以外,对佛典的著录都不甚重视,有的仅作为附录列于目后,不能全面反映佛教典籍发展的概貌。晋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和宋梁之际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是此期有代表性的佛典专科学目录。

早期的佛典目录只是为了记录佛典翻译的情况,便于佛家了解译者与译地,基本上只记经名、译者、译地,而且当时佛教传入时间不长,译出的佛典有限,时人难以译解佛教的经论体系,无法进行分类整理,只能记录一人、一时或一地的译经,然后按时代顺序简单编排成录。道安于晋武帝宁康二年(374年)编成的《综理众经目录》则一改早期经录的这种简单记录形式。虽然著录的各典仍以年代为序,但已不仅记经名、译者,而且写有简明提要,重在考订译经时间,记录译经始末,品评译者水平、译笔优劣,辨别经书的真伪。是录对所著录的佛典进行了初步分类整理,将其分为六类:一曰经论本录,按译者年代顺序著录自汉魏以来译文完整而优秀的十七家二百四十七部经书;二曰失译经录,著录不知译者姓名的译经一百三十四部;三曰异经录,收录不同地区的佛经译本;四曰古异经录,收录古代翻译的佛经九十二部;五曰疑经录,收录难定真伪的译经二十六部,三十六卷;六曰注经杂经录,著录道安自己所写的对佛经的注释,共十八部,二十七卷。这个体系虽不很科学,但却是第一次对佛典进行分类,为以科学分类为体系的佛典目录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惜是目久佚,但其主要部分被载于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中。

《出三藏记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佛典目录,由梁高僧僧祐撰。“安录”完成后,“妙典同出”,加之“安录”所收不全,故而祐“总集众经,遍阅群录”,以“安录”为基础,“响附前规,率其管见”,“缀其所闻”而成“新录”(《出三藏记集·序》)。《出三藏记集》十五卷,收录东

汉至梁译出的经、律、论、著、序记和译经人的传记,共著录佛经二千一百六十二部五千三百一十卷。全书共分四部分:“一撰缘记,二铨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第一部分以五“记”叙述佛经的起源、编纂、传授渊源及汉译佛经的发展,比勘汉译佛经与原经在文字、意义、义理上的异同,是为总序,恰如《七略》之“辑略”,以明佛学源流;第二部分以“安录”为基础,记录历代所译的佛典目录,这是祐录的核心部分,共分为十二类,一曰“新集撰出经论录”,二曰“新集条解异出经录”,三曰“新集表序四部律录”,四曰“新集安公古异经录”,五曰“新集安公失译经录”,六曰“新集安公凉土异经录”,七曰“新集安公关中异经录”,八曰“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九曰“新集抄经录”,十曰“新集安公疑经录”,十一曰“新集疑经伪撰杂录”,十二曰“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所收佛典以时代及撰者为秩列排,每类前都有小序,记叙此类经传源流及汉译情况,其分类体系虽未跳出“安录”之囿,但却增立“经论”类和“律”类,使佛典目录的分类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已经具备了按教义分类的雏形,为佛典目录的科学分类作好了准备;第三部分辑录众经序、跋共一百二十篇,其中包括僧祐自撰的若干篇,这些序跋起到了解题的作用,与《别录》之叙录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一部分为汉至南齐中外译经者的传记,共录三十二位译经僧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僧传。

《出三藏记集》是一部用目录形式写成的汉魏时代的佛学史,它开创了佛典目录的一个新时代,创造了佛典著录的新体制。

隋代官私目录都没有什么大的成就;然其佛典目录却有较大发展。隋代两朝政府都推崇佛教,故而十分注意佛典的整理著录,在短短的三十余年里,奉诏所撰成的经录即有法经的《大隋众经录目》、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彦琮的《隋仁寿年内典录》、智果的《众经目录》。其中,《大隋众经录目》通录古今,共著录佛典二千二百五十七部,五千三百一十卷。它不以译经的特征编排,而按佛经内容分类,先

按教义分为大乘、小乘,再按文体分为经、律、论,最后再根据佛典的流传、译介情况分为一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伪妄六类。对那些三藏以外的杂著,则先按文体分为抄录、传记、著述,然后再以中外(西域)地域区分之。此目总结此前各经录,其虽有未著译人详细的年月、未见原书、只以经录为据、且不分存佚、不著出处之憾,然其第一次创造出按教义分类的科学体系,此后各佛录的分类皆不出此例。而成书于开皇十七年的费长房之《历代三宝记》则合名录、经序、列传为一体,总结古今佛典译本,尤详考各经的翻译时代,并以组织严密的分类体系总领全目。其共收一百九十七人所译之佛典二千一百四十六部,六千二百三十五卷,是迄是时所收佛典最全最多的一部经录。是录为唐代佛教的兴盛和佛典翻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朝典籍目录的编制经历几起几伏。贞观时始有《隋书·经籍志》,开元盛世始有《群书四部录》。

贞观之初,秘书监魏征受诏整理遗籍。其后,他又利用主持纂修《隋书》的机会,著录、记载所整理的典籍而成著名的《隋书·经籍志》(图41,见407页)。魏征不但以隋代国家典籍目录,特别是《大业正御书目录》为基础,以“今考现存”的方法著录了隋代的国家藏书,而且“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考察了历代官私书目,删去其中“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补入“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共著录典籍四千一百九十一部,四万九千四百六十七卷,其中实有典籍三千七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零八卷,亡佚典籍一千零六十四部,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九卷,是刘略、班志后又一部划时代的、通录古今的综合性典籍目录。

《隋志》是我国现存的第二部官修群籍目录。史志目录的传统始于《汉书》,然至唐几百年来无一朝能承,《后汉书·艺文志》虽见于《七录》序,但已早佚,其例不可知。唯《隋志》承《汉志》之遗规,而又大为弘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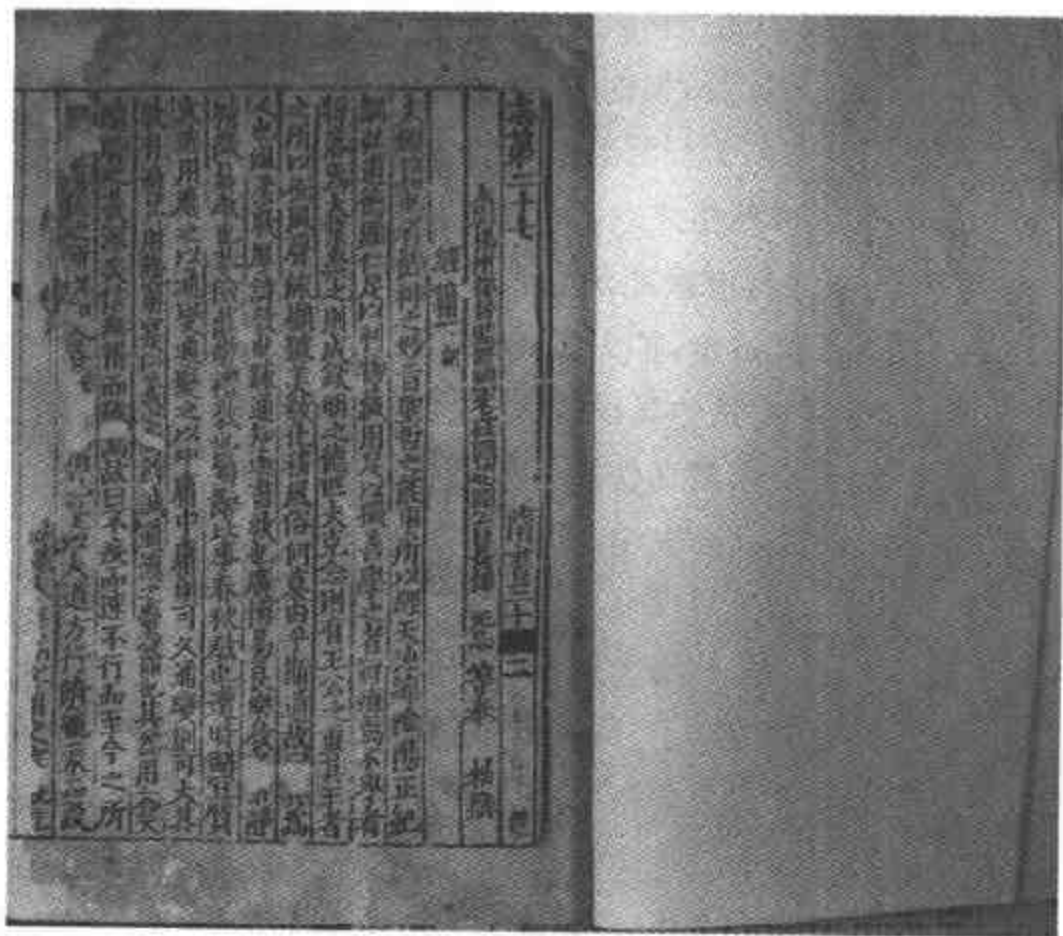


图 41 《隋书·经籍志》书影(宋刻本)

《隋志》的分类虽循四分法,但却第一次以经、史、子、集之名来类分所录典籍,把李充以来的四分概念具体为经史子集之名。

在体例上,《隋志》继承了《汉志》的传统,志前总序,记述唐以前典籍的聚散情况、整理情况,以此为线索,条别千百年来的学术渊源和流变;部前大序,论述各部典籍的发展脉络、各部立类的依据及历史演变情况;类下小序,叙述此类典籍的变迁及此门学科的学术发展状况,并且考证典籍类型的变化情况。“佛道序”详叙两类典籍的演变过程及历代政府崇毁道佛的史实及对佛道典籍发展的影响。

《隋志》总结、吸收了此前典籍目录的优良传统和经验,形成了一套极其完整、严密的典籍著录格式和体例。《隋志》所收典籍以著者的卒年为限,凡卒于隋义宁二年(618年)之前者入录,而卒于唐初者一

律不录。收典断限如此严格者,中国古代唯此一志。是时以前的典籍目录虽多以书名为标目,但时有变化,没有形成统一的定式,《隋志》第一次确定了以书名为标目,次著卷数,后录著者姓名,再附以简注的著录格式,并且以此格式通贯全志,体例十分一致。

《隋志》的小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它突破了此前目录小注的内容局限,增大了其容量,扩大了其叙述范围。《隋志》还记载了大部分亡佚典籍及版本亡佚的具体时间,这一严密的考证和创举,为后世了解典籍聚散、辨别典籍真伪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唐朝经济发达,社会安定,文化进步,私人藏书之盛前所未有,私家目录成绩卓著,见于后世书目者即有吴兢的《西斋书目》一卷、蒋彧的《新集书目》一卷等,其集大成者即为毋煨的《古今书录》。

开元之初,昭文馆学士、侍读马怀素等人在对典籍进行整理的基础上,编成一部通录古今典籍的群籍目录——《群书四部录》。是目二百卷,共著录四部四十二类典籍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是清《四库全书总目》以前规模最大的群籍目录。

毋煨是这个目录的三个总编辑之一,并且还负责子部典籍的著录工作。他自始至终参加了《群书四部录》的编纂,对是目编辑过程中的草率从事深为不满,然其位卑言轻,无以扬其所长。于是在《群书四部录》完成后,他根据自己参加编纂是目所积累的经验 and 素材,针对是目“事有未周”、“理有未弘”、“体有未通”、“例有所亏”、“事实未安”五方面的缺陷,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积思潜心,审正旧疑”,以一人之力成《古今书录》四十卷,共著录他所见的公私所藏典籍四部四十五类,三千零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是目是在《群书四部录》的基础上编成的,因而在体例和内容上改正了《群书四部录》的不足之处共“三百余条”,对《群书四部录》中没有收录的“永徽新集,神龙近书”,都“释而附也”;对“未详名氏,不知部伍”者,“则论而补也”;对“空张之目,则检获便增”;对“未允之序,则详宜别作”(《古今书

录·序》见《旧唐书·经籍志·序》);并且删削其类序而成己之类序,压缩其解题而成己之解题,使《古今书录》虽著录典籍多于《群书四部录》,而篇幅却更简约,更便于利用。

《古今书录》是唐朝唯一的一部私撰目录,它的价值超过了官修的《群书四部录》,故而五代时刘昫在编纂《旧唐书·经籍志》时,弃《群书四部录》而选《古今书录》为蓝本。

佛教典籍的编目兴盛奠基于魏晋南北朝,至隋时,其佛典目录已有成形体例。至唐,据统计,佛录共有十七种之多^①,然六朝成例在先,多数佛录但循旧体而已,唯有《大唐内典录》及《开元释教录》颇多创例,代表唐佛录的成就。

《大唐内典录》由高僧道宣于龙朔四年(664年)“上集群目”,“更参祐、房等录”编纂而成。全录共分十部分,第一部分“历代众经传译从录”,循历代各录体例,按时代顺序著录后汉以来220位译者所翻译的佛典二千四百八十七部。这一部分基本全录了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所著录的佛典,但并非照录,而是进行了认真地审考,对被先后几次译出的经书,皆分别注明“初出”、“第二出”、“第三出”等,对被收入前录的唐前译经也都注明最初被收入的佛录,这样“既以见著述渊源,亦使旧录虽佚而后世得循此以求其面目”(梁启超:《饮冰室专集》第四册);第二部分“历代翻本单重人代存亡录”,按大小乘、经、律、论的分类体系记录各佛经重译、异译、失译情况,并且记录译者的生活时代;第三部分“历代众经总撮入藏录”,按大、小乘著录现存佛典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以千字文为秩著录,并注明各经在藏经处的位置,便于索取;第四部分“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为历代佛典要目,以简明的文字介绍其大义,阅此目可以短时而知佛典要略,此录“于异译别行诸经,各择其最善一本,以为代表”(《饮冰室专集》第四

^①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89页。

册),这种著录方式已是后世推荐目录之雏形,实颇益于读者;第五部分“历代众经有目阙本录”,是道宣考比各经录后记载的历代佚经目录,可作藏经补缺之依据;第六部分“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著录注经典籍;第七部分“历代诸经支流陈化录”,著录大、小乘别生诸经;第八部分“历代所出疑伪经论录”,收录内容有疑问、或伪作的佛典;第九部分“历代众经录目终始序”,记录是时以前所编的诸家经录,以示其源流;第十部分“历代众经感兴敬录”,记录佛教事迹,虽非目录范围,却可与前录诸经相映照。《大唐内典录》虽循已有的分类体系类分群经,然其在著录方式、著录内容上都有所创新,是唐代主要的典籍目录之一。

《大唐内典录》成书七十年后,唐另一名高僧智昇比较参考是时所存的六、七种经录的著录方式和体例,在佛典整理的基础上编成了《开元释教录》二十卷,著录东汉至唐 176 人所译出的大小二乘三藏典籍及佚经二千二百七十八部,七千零四十六卷。是录分为总录和别录两部分。总录十卷,在体例上仿《出三藏记集》、《历代三宝记》等目录,不依三藏之次,而以朝代为先后总括群经,著录内容有帝王年号、译人、部卷、见存数、亡佚数及出经过程等。别录共分七部分,第一是有译有本,按大、小乘分体系著录存经,是录改变旧录编比无次的著录方法,“大小乘经,皆以部类编为次第;小乘诸律,据本末而为伦次;大乘诸论,以释经者为先,集解义者列之于后,……”从而“使科条各别”(《开元释教录》卷一注);第二是有译无本,即佚经录;第三是支派别行,著录从大部经典中析出单行的经籍;第四是删略繁重,著录删大部经书而另成一典的佛经,这些经书与被删的经书虽同本而不同名,此前的各家佛录皆未及于此,智昇独创此类;第五是补阙拾遗,著录此前的佛录没有著录的及新译出的佛典;第六是疑惑再详,著录真伪不定的经籍;第七是伪妄乱真,著录历代的伪经,分别记录此前各佛录中所列伪经。是目最后有大、小乘入藏录二卷,著录入藏佛典一

千零七十六部,五千四百一十八卷,皆著录经名,标明纸数。《开元释教录》是唐代最重要的佛典目录,它充分吸收了此前各录的成就,它的分类体系虽不出旧制,但却体现了佛教教义的真谛,显示了佛典传译流传的脉络。它准确的著录格式和丰富的著录内容,以及各典的编排定位方式都成为后世佛典目录的永制。其藏经录所录入的经书及其次序成为后世汉文佛典大藏的基础。

宋代的官修典籍目录在数量上远超此前各代,两宋共修成各种公藏典籍目录十五种,主要的有北宋于宋太祖乾德六年(968年)编成的《乾德史馆新定书目》四卷,著录史馆所藏典籍一万四千四百零九卷;成于太平兴国九年(984年)的《太平兴国搜访书目》、《龙图阁书目》七卷;庆历元年(1041年)由欧阳修、王尧臣主编的《崇文总目》六十六卷;成于淳熙四年(1177年)的《中兴馆阁书目》七十卷等。宋代的典籍编目不同于以往,从整体上看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在典籍整理的基础上编制阙书目录,阙书目录是一种用于访求典籍的实用目录,它可以提高政府收集典籍的针对性,最早见于史籍的是著于《隋书·经籍志》的北魏《阙书目录》。宋时编有多种阙书目录,这些目录对两宋典籍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二是禁书目录的编制,宋代的官修典籍目录突破了以往兼收并蓄的著录惯例,在著录之前对所藏典籍进行审查,按一定的标准剔出不宜著录于官目的典籍,并把其中一些录入禁书目录,开创了编制禁书目录的先例。

两宋的官修典籍目录虽在数量上超迈前代,然其编目体例、著录格式和内容等多循旧制,少有创新,其最著名者为《崇文总目》。是目由王尧臣、欧阳修等于庆历元年仿《开元四部录》并综合三朝国史艺文志撰成,共著录三馆和秘阁所藏典籍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共分四部四十五类,各类有小序,各书有提要,可惜南宋以后,其类序和提要都被删去,后人仅能从《欧阳文忠公全集》中窥其大略。史志目录的纂修在两宋也达到一个新高度。宋代,特别是北宋历朝政府都十分热衷

于编修本朝历史,即“国史”。国史内容之一的“艺文志”则构成了一种新的史志目录,并影响了明朝焦竑《国史·经籍志》的修纂。据史载,两宋共编有七种国史经籍志,至今可见的有四种,即:《三朝(太祖、太宗、真宗)国史艺文志》(吕夷简等撰,著录北宋开国至1016年间的政府公藏典籍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八千一百四十二卷);《两朝(仁宗、英宗)国史艺文志》(王珪等撰,著录1016年后崇文院所新收集的典籍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四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国史艺文志》(李焘等撰,著录四朝所新收典籍一千九百零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中兴国史艺文志》。这些“艺文志”大都仿效《崇文总目》,每类有类序,每书有解题。各朝艺文志仅录当朝所新收集或新撰述的典籍,“三朝所录,两朝则不复登载,而录其所未有者。四朝于两朝亦然”(《宋史·艺文志》)。这种记录方式能及时准确地反映有宋两代典籍撰述和收藏的发展脉络,为后世了解宋代藏书状况提供了依据。元时所编《宋史·艺文志》即以此为据。

欧阳修主撰的《新唐书·艺文志》是继承《汉志》、《隋志》传统的史志目录。它以唐朝所编典籍目录特别是《古今书录》为依据,并且增加了开元以后唐人撰述的不见于《旧唐志》的典籍二万七千一百二十七卷,共著录典籍三千二百七十七部,五万二千零九十四卷。《新唐志》在体例上基本循《旧唐志》,连其删《古今书录》类序的缺点都照做不误,只是在著录内容上有所不同。《新唐志》对每类的典籍都分别注明“著录”或“不著录”,标明“著录”的为《古今书录》所录典籍,标明“不著录”的是《古今书录》中所不录、《旧唐志》也未收的典籍,这一部分典籍是欧阳修考证唐开元以后的典籍目录和宋代藏书后确定的,这种著录方式不但标示了典籍的存亡发展,而且具有补著的性质。另外,《新唐志》的小注不但详叙作者邑里行止,而且记载唐代官修典籍的撰人和审正者,并录有关的重大事件。这一内容是欧阳修首创,大大提高了小注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

宋代典籍编目最有成就的当数私家目录,宋代留给后世的私藏目录不下三十种,主要有江正的《江氏书目》、吴良嗣的《篋金堂书目》、田稿的《田氏书目》、李淑的《邯郸图志》、董道《广川藏书志》等,最著名者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

《郡斋读书志》是南宋著名藏书家晁公武所撰,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私藏目录,也是现存最早的书名、类序和提要俱全的目录。这种目录体例创自刘氏父子的《七略》。《七略》以后的典籍目录或只有类序而无解题,或仅记书名、著者、篇卷,唯有唐之《群书四部录》和宋之《崇文总目》承《七略》之志,三者皆备。然唐录早佚,宋目也残,唯晁志使后来者得以窥此体例的大概。晁氏世代藏书,在任四川转运使并度的幕僚后又得井氏积二十多年收集的五十多篋图书,使家藏典籍达到二万四千五百卷,他对这些典籍“雠校舛误,每终篇,辄撮其大旨”。在 50 岁时终于撰成一部家藏目录《郡斋读书志》(图 42),因其号昭



图 42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书影(明抄本)

德先生,是志又被称为《昭德先生群斋读书志》。晁志分四部,四部前有部序,述历代典籍编目情况,每部下有大序,叙列各部所属类别,并述各部学术渊源流变、派别,评论其得失。各类下有小序,包含在各类的第一部书的解题中。其最有价值者为各书的提要,这些提要或介绍著者,考其时代、生平事迹、学术师承及成就,只撰论其人事,不断其是非、判其善恶;或述典籍内容,评其价值,释其书名,明其著述缘由,列其篇目,述其学术源流及影响;或记版本变迁、文字异同、印装特点和存佚状况;或辨其真伪。其论述精博,直追刘氏父子。此志体例完备,著录详实,功能齐备,是我国最重要的典籍目录之一,功及后世。

晁公武之后,南宋的另一位著名藏书家陈振孙撰成了另一部可与晁志相媲美的私藏提要目录《直斋书录解题》(图43)。是目原有五十六卷,分四部五十三类,共著录典籍三千零九十六种,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是我国收录典籍最多的私藏目录,远超同时代的私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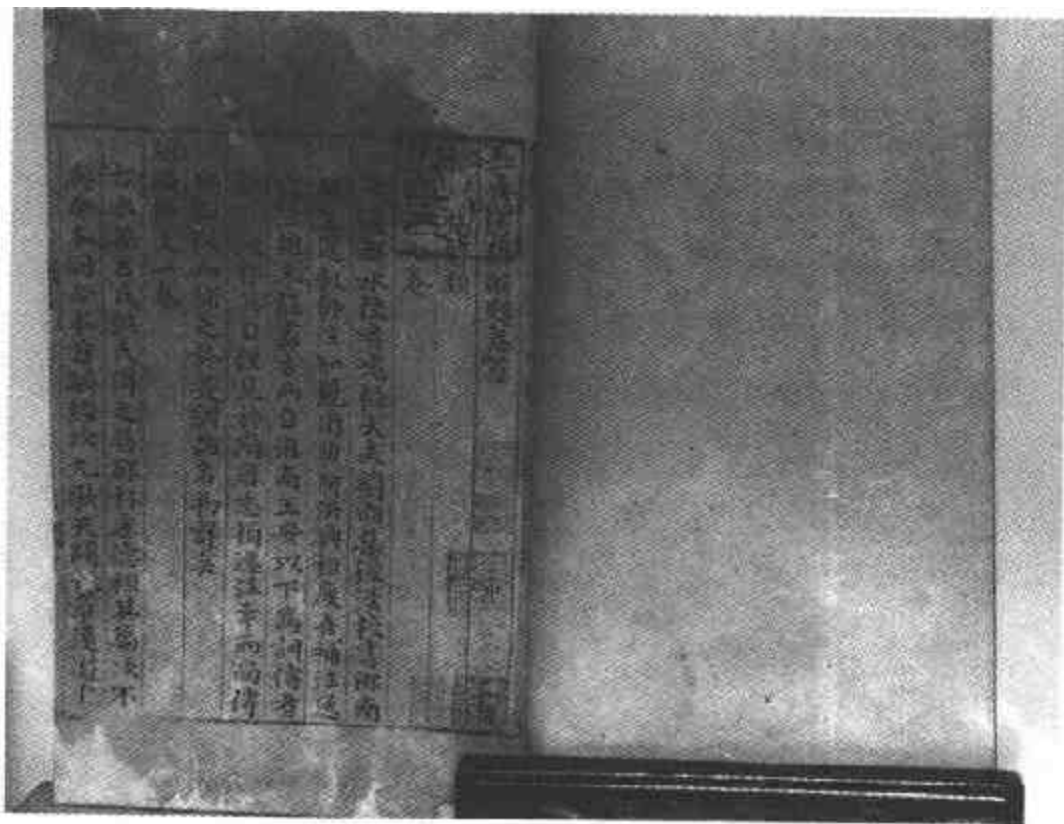


图43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抄本)

目录所收典籍，“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陈氏此目著录体例循晁志旧例，每部有小序，但其小序不是每类都有，而是根据需要而立，只有语孟类、起居注类、小学类、农家类、阴阳家类、时令类、音乐类、诗集类、章奏类九类有注序。这些类或为新设类目，需叙述立类缘由，或归类范围与前人有所不同，需说明变动情况。在收书范围上，所收典籍为陈氏实藏之书，且着重记录宋代著述情况，以收“今书”为主，并突破了以往目录的结构，加大史部和子部的典籍分量，这一著录体例对后世官私目录的编制有很大的影响。陈氏“解题”每书之下都有解题，此例虽也遵晁志，然其解题数量远大于晁志，内容更丰富，价值更高。解题之例虽不创于陈氏，然以“解题”为书名，以陈氏为先。陈氏解题或揭示典籍内容、辨析学术源流，或品评典籍价值、断其优劣，或介绍作者，或记载典籍的撰述时间、经过及选材，有些解题中还详细叙述陈氏获得此书的经过，别有情趣。其解题中最有价值的是对典籍版本的记述。以解题或小注述版本情况古已有之，然叙述多简略，仅记一、二种不同版本，难见版本源流及优劣，而陈氏解题则详记其版本款式，版刻时间、地点、刻工、装潢情况，墨色及各版本的优劣；对于抄录的典籍则详述其内容特点，抄自何处、何本；对拓本则说明其“作者、序跋者、刻石经过、授述源流、摹拓本末及其收藏情况”^①。陈氏“解题叙述诸书源流，州分部居，议论明切，为藏书家著录之准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

宋代的私家典籍目录中除了像《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这样综合性的私藏目录以外，还有一些颇有成绩的专题性目录。

^① 丁瑜：《试论〈直斋书录解题〉在目录学上的影响》，载《宁夏图书馆通讯》1980年第1期。

尤袤的《遂初堂书目》是一部有名的典籍版本目录。此前典籍目录记版本者虽已有之,但专记版本的典籍目录似以此为始。尤目共著录典籍三千二百三十二种,不标经史子集而直接分为四十四类,虽无四部之名,但循四部之序。其所收典籍抄本多、善本多、史书多、法书多。是目著录独具特色,大多数典籍都只记书名,不记卷数,记书名时或照录书名,或书名前加注著者,或同时加注作者时代或著作方式。其对典籍版本分别著录为旧监本、旧本、旧杭本、杭本、京本、越州本、严州本、江西本、吉州本、池州本、杭州本、湖北本、川本、大字本、小字本,还有秘阁本、监本、家刻本及重修本、新修本、朱墨本、金银字本之分。《遂初堂书目》开创版本目录之先例,对研究我国典籍史、印刷史、文化史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王应麟《玉海》所附“艺文”二十八卷是一部专记书目资料的专题目录,并且开创了类书中辑录书目资料的先例。“艺文”不列四部之名,只以四部之序分为四十四大类,每类之下以图书目录为主,附入了一些与书目有关的文献资料。一般典籍目录都以书名、著者、版本为项进行著录,而“艺文”根据类书的需要,以一个或几个主题词作为著录单元,在“书目藏书”类即以一部或几部典籍目录为一个单元。这种著录方法颇具主题目录的雏形,可谓后世主题目录的先行者。

我国的典籍编目实践至宋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书目体例、著录格式等已趋成熟。然千多年来却无人能对典籍编目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前人的编目思想大都体现在具体的编目实践中,间或以书目之总叙或大序阐发所得。宋郑樵总结刘氏父子以来典籍编目的成就,深入研究前人典籍编目的理论,以《通志·校雠略》系统地提出了完整的典籍编目思想和目录学理论。《通志·校雠略》共二十一论,六十九篇,阐述了典籍目录分类体系的重要价值及典籍分类的基本原则,第一次系统总结了典籍编目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其一,典籍目录要通记古今,不遗佚典,全录存籍;其二,典籍著录应详略有致,“汉晋之书

最为稀阔,故稍略,隋唐之书今为近,差详,崇文四库及民间之藏乃近代之书,当一一载也”(《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而对提要则以需要为准,不应“泛释”,典籍“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之论”;其三,典籍目录的著录应严整有序,“《隋志》每于一书而有数种学者,虽不标别,然亦有次第,如春秋三传,虽不分为三家,而有先后之别:先左氏,次公羊,次穀梁,次国语,可以次求类”,这种有序的著录,“可以见先后之次,可以见因革之宜,而无所紊滥”(《校雠略·编次有序论》);其四,典籍著录要“以人类书”,而不“以书类人”,即以书名为标目;其五,图谱典籍应与其他典籍有同等地位,典籍编目应录图谱,“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人不闻其语”(《图谱略·索像》),这一理论确立了图谱在典籍目录中的地位,扩大了典籍著录的内容,使大量图谱典籍得以保存;其六,典籍编目应“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即使合众人之力而成,则必须各用所长”,“随其学术所长者而授之,不能夺人之所不能,而强人之所不及”,并且应“久其任”(《校雠略·编书不明分类论》),最后由一人总其成,才能有大成就。郑樵是我国对典籍编目进行系统理论研究的第一人,开辟了目录学研究的新领域,构建了典籍编目的理论系统,直接影响了后世目录学理论的发展。

元代基本无官修典籍目录,至正二年(1265年)由王士点、商企翁所撰的《秘书监志》中所含的二卷书目实为秘书监所藏典籍的一份清单,严格地说算不上正规的目录。我国最后一部记一代藏书之盛的史志目录,由脱脱主持编纂的《宋史·艺文志》也只是依宋代四部《国史艺文志》“删其重复,合为一志”(《宋史·艺文志》),虽略记宋代所藏典籍情况,但因编辑草率,重复颠倒遗漏之处甚多,价值不高。元代的私家目录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七十六卷一枝独秀。《文献通考·经籍考》是郑樵《通志·艺文略》之后又一部通史史志书目,它以私家目录的“双璧”《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为基础,并广

泛收集和考辨所见官私目录所著录的典籍,分别辑录而成,“所录,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于近世而不考者,则采诸家书目所评,并旁搜史传、文集、杂记、诗话,凡议论所及,可以记其著作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则具载焉”(《文献通考·自序》)。是目跳出传统典籍目录叙录、传录两种体例,承僧祐“总经序”的方法,创辑录体解题书目体例,开辟了典籍编目的新领域。他把前代有成就的官私目录,如《汉志》、《隋志》等中的总序辑录在一起列入其总序,将其中的部序和类叙及各书解题辑入《经籍考》相应部类之下的典籍,此外还辑录大量文献中对所收典籍的评论,对所采众说加按语进行排比辑存。这种体例使“览之者如入郡玉之府而阅天木之藏,不特有其书者稍加开穷,即可以洞究旨趣,虽无其书者,味滋品题,亦可粗窥端倪,盖殚见洽闻之一也”(《文献通考·自序》)。

明代的官修典籍目录虽有杨士奇等所编的《文渊阁书目》、张萱的《新定内阁藏书目录》、焦竑的《国史经籍志》等,然多例行旧制,草率从事,无所建树,唯焦竑《国史经籍志》于分类体例上有所革新。私藏目录在明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其数量还是成就都远超此前各代,与是时官修目录的停滞不前形成鲜明对照。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的记载,明代私藏目录有五十种左右,其中有不少留传至今。这些私藏目录在分类体例上不少突破了传统四分法的框架,建立新的分类体系,如晁璠所撰《宝文堂书目》即以“御制”首领,其后共分三十三类,并且独创乐府、举业、艺语等类;陈第的《世善堂藏书目》的分类体系也颇具特色,全目分六部六十三类,其类目之详当为古代典籍目录之最,并且新立了不少类目,如“明朝记载”、“帝王文集”、“宋元诸名贤集”等。其他循四部分类体系的私藏目录在类目设置上也多有创新。这一时期的私藏目录在典籍范围上也有突破,大量著录是时官修目录中少涉及的小说、曲艺类典籍,如高儒的《百川书志》就在史部下的野史、外史、小史类中收录了其所藏的小说、戏曲、演义、

传奇类典籍多种；晁氏《宝文堂书目》的“子杂类”和“乐府类”中也收有很多小说、元明话本、杂剧等类典籍。它们所收录的这些文艺典籍补充了官修目录的不足，扩大了典籍目录的收录范围，保存了是时珍贵的文学资料，对研究元、明时期的文艺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著录格式上，明代的私藏目录也多有创新，如徐勃之《红雨楼书目》在有些类用表格著录典籍各项目，这种形式很便于检索查找。祁承燾之《澹生堂藏书目》则全目采用表格形式，每表分上下两栏，上栏著录书名，下栏分行著录卷数、册数、版本、注解等项；对书名相同而卷数、册数、版本不同的书都单独进行著录，以书名前加“又”进行区别，对于一书的上下编或正续编都分别予以著录，并且在很多地方使用了分析著录和互见著录，以进一步揭示其所藏典籍。祁氏不但其藏书目录成就颇高，而且其《澹生堂藏书记》还阐述了他独到的编目理论和原则。

清代是学术文化发展的集大成时期，经过元明两代的积累和准备，作为学术研究门径的目录学迅速发展，一时成为“显学”，而体现目录学思想和成就的典籍编目实践也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所编目录无论其体例、收书数量，还是著录格式、著录内容都远超元明及以前各代的成就，其官修目录虽然不多，却在各方面都代表了古代典籍编目的最高成就。陈梦雷所编《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清初国家所藏典籍目录，在其“经籍总部汇考”中汇录历朝所编正史、专史艺文志、经籍志，其中全文录入的有汉、隋、唐、宋史志目录，及清初黄虞稷所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和焦竑《国史经籍志》。对《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考》和朱彝尊《经义考》则录入其目录部分。不但基本记录了清朝以前典籍发展的全貌，而且可使读者了解我国主要史志的基本结构和收书状况。“经籍典”还在“总部”之下将以上各目录所收典籍按六十五类重新组合编排，以书目和图书性质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类，极便考索和利用。它虽未标明所录各书

在清时的存佚状况,然其编制方法和结构在典籍编目史上都有重要意义。而乾隆时期所编的《天禄琳琅书目》前后编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版本目录,其共收录天禄琳琅先后所藏的宋、辽、金、元、明五朝刊刻的善本典籍一千零八十五部,每书先著书名,再列函数、册数,其下再录解题。其解题除叙著者姓名、身世外,主要记录典籍刊刻时代、版本情况及授受源流,对同书不同版本、同书同版而传世甚稀或刻印甚精者一并录入。是目基本收齐了宋以后所刻典籍中的精品,对研究这五代典籍的版本及其流传、皮藏情况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清代官修目录中最重要的也是我国十八世纪以前典籍目录的集大成者是《四库全书总目》(图 44)。



图 44 《四库全书总目》(书影)

《四库全书总目》虽是编修《四库全书》的连带产品,然它的起步却早于《四库全书》。乾隆在三十七年(1772年)的求书谕旨中即已决定了此目的体例结构和基本编纂原则。次年,四库全书馆开馆编修《四库全书》时,《总目》的编纂也同时实施。全部编纂工作由著名学者纪昀总领,由经学家戴震负责著录经部典籍,史学大师邵晋涵负责著录史部典籍,周永年负责著录子部典籍,参加编纂的其他学者和专家共三百多人。他们对各地征求的

典籍和辑于《永乐大典》的已佚典籍进行详细考辨,并分别撰写提要,最后由纪昀对所记录的典籍进行取舍,对所撰提要进行加工润色,按四部分类体例初步排列成编,并把所收典籍分成应刻、应钞、存目三

类,于乾隆三十九年进呈。此后,根据乾隆禁书谕令,《四库全书》所收典籍有了变化,《总目》的著录也随之进行增减、删改,其体例也有所变动。乾隆四十八年,纂修人员又对《总目》的存目部分进行复阅,又抽掉了乾隆认为“妄诞不经”的典籍。在此基础上纪昀等又对《总目》进行了全面的复核、勘检,对其分类体例、著录内容进行了最后的审定,终于在乾隆五十年(1789年)随《四库全书》的修竣而最后定稿,并于乾隆五十八年由武英殿刊印行世。《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著录收入《四库全书》的典籍三千四百六十一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加上存目所录典籍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共著录典籍凡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卷^①,基本记录了乾隆以前的各类主要典籍,是典籍编目史上规模最大、体例最完备的国家藏书目录。全目按四部分为四十四大类,某些内容庞杂的类下还分有属,“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四类之首,并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例》)。其总序勾勒我国四部典籍的发展脉络及其学术流变,其小序提纲挈领地叙述了各学科的渊源、历史、成就及误区,其案语或叙典籍收录原则和范围,或评前代各目录体系的得失及版本。

《四库全书总目》在编纂过程中和编成之后都有一些与之相关的目录问世,其主要者有成于乾隆三十九年的《总目》的简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未收书提要》等,这些目录可补《总目》之不足,也颇有文献价值。

史志目录的编纂在清代也有突破性的发展,不但编成首创记一代著述之盛的《明史·艺文志》,而且补足了前代无艺文志的各断代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65年版。

史志目录,这一成就对我国典籍编目的发展具有莫大的功绩。

《明史·艺文志》最初出自著名学者黄虞稷之手,他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应邀入“明史馆”负责编修“艺文志”,他考察了历代所编史志,发现如果遵循《汉志》以来所有史志记一代藏书之盛的传统,所编书目将有许多记载与各种史志重复,而且其庞大的篇幅也将与全史的体例不协调,故而 he 大胆打破旧史志的传统,独创记一代著述之盛的《明史·艺文志》。他以自己的私藏目录《千顷堂书目》为基础,参考明代的官修书目,历十载而成《明史·艺文志》初稿。同时,在编纂过程中,他考虑到《宋史·艺文志》所收不全,不足以反映有宋一代的著述盛况,辽、金、元各史又无艺文志,此三代典籍无以为录,故而仿《隋志》记五朝之体例,在《明史·艺文志》初稿中把南宋咸淳以后至元各代的著作按类附入。《明史·艺文志》初稿上奏后,因“明史馆”人事屡变,此稿经王鸿绪、张廷玉等人一改再改,成为现行的《明史·艺文志》,其中不但删去了宋至元各代的典籍,而且还以“无卷帙氏里可考”和“书不甚著”为由删去了一些明人著述,使其所著典籍仅剩明人著作四千六百六十二种,十万零五千七百九十四卷。因是目经多人之手,除首创记一代著述的体例外,黄氏初稿的目录学价值已所剩无几,故而后世考明代著述多取黄氏《千顷堂书目》而少用是志。

黄氏所附于《明史·艺文志》初稿的宋人著述六百七十八家一万二千七百四十二卷,及辽、金、元三朝人的著述一千七百一十家一万二千二百二十卷被删去后,使这一段典籍的概貌无以详知。故而著名学者卢文弨于乾隆四十年左右将这一部分内容集中成《宋史艺文志补》和《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行世。黄氏的补录之举激发有清一代补撰前代各史志的学风。继黄氏之后,金门诏、厉鹗、杭世骏重钩辽金元三代之史籍,分别成《补三史艺文志》、《补辽史经籍志》、《金史艺文志补》。其后还有钱大昕之《元史艺文志》、吴騫之《四朝经籍志补》及

朱文藻之《宋史·艺文志》。是时的补作,受黄氏影响基本囿于此四代,几十年间基本完成了四朝所藏的补录。受此成就的激发,一些学者把这种集各种史料之记载、记录一代典籍盛况的方法推及凡没有艺文志的各代正史,补《后汉艺文志》者有厉鹗、钱大昭、洪飴孙、姚振宗等,其中姚氏补著最为完备;补《三国艺文志》者有侯康、陶宪曾、姚振宗等;补《晋书艺文志》者有丁国钧、文廷式、吴士鉴等;补《隋书经籍志》者有张鹏一;补《五代史志》者有顾怀三、宋祖骏。经此清代诸学人的补撰,我国历代正史的艺术、经籍志基本齐全,使班固所创之正史典籍目录蔚然成一通上贯下的完整体系。

历史发展到清代,典籍印刷技术已相当成熟,私人得书极易,私人藏书家极多,拥有万卷之藏者比比皆是,而记录所藏,便于补阙、治学、考辨成一时之风,故是时之私藏目录数不胜数,其中刻印传世者也不下百种。这些私藏目录有许多出自著名学者,不论在收书数量、编纂体例结构上,还是在分类体系、著录格式上都有开创之作,在中国典籍编目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最著名者有钱曾的《也是园藏书目》、孙星衍的《孙氏祠堂书目》、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徐乾学之《传是楼书目》、姚际恒的《好古堂藏书目》等。这些目录立足于前人的成就,受惠于清代学风,成为我国私藏目录的集大成者。

明清以后,社会典籍拥有量甚巨,因而个人编辑像《七录》、《七志》这样的综合性典籍目录已无可能,故私撰目录仅能及一专门领域,这一形势也使私撰目录的编辑者得以集中注意力于一点,取得突破,因而这一时期出现的专题性私撰目录多属上乘之作。其中考辨版本的目录有钱曾《读书敏求记》、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等;记录经学典籍的目录有朱彝尊之《经义考》、沈廷芳之《续经义考》等;还有小学典籍目录、金石典籍目录等。清代私撰目录中成就最高,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善本书目。著名的有徐乾学之《传世楼宋元版书目》、孙星衍的

《平津馆藏书记》等,这些书目记录了历经天灾人祸幸存至清的宋元刻精本,保存了这些稀世珍版的记录和资料,为后世研究这些善本的保存和流传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清代的私家目录是我国古代典籍编目史中的最后一批目录。清代以后,由于官藏典籍向社会开放的程度越来越大,私家藏书的价值逐渐减小,基本没有了私家目录,清代私家目录把古代私家目录的发展推向高峰,继而为我国私家目录体系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清代典籍编目实践的高度发展推动了典籍编目理论的发展。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是继郑樵以后又一位对典籍编目进行理论探讨和总结的目录学家。章氏以其在史学方面的高深造诣,系统总结了前人在典籍编目上的实践和理论概括,考察了自刘氏父子以来的官家、私家和史志三大目录体系的各种目录,对典籍目录的作用、编制体例和方法等进行理念升华,在其《校雠通义》、《文史通义》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典籍编目理论。首先,他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典籍目录的作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故而应把典籍编目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过程,而“不徒为甲乙纪数”。各种典籍目录都应有“推论其(所录典籍)要旨,以见古人之所言有物而行有恒者,则一切无实之华言,牵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几辨章学术之一端”的提要,和“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的类序,这样才能“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人究学”,这实在是典籍目录的最高目标。其次,他认为典籍目录的价值在于为学术研究服务。虽然典籍目录在历史上确实服务于学术文化的发展,但这种服务是被动的、客观的。而章氏第一次提出要使典籍目录为学术研究“聚粮”和“转饷”,因而他认为应以专科目录和索引来进一步揭示典籍,使其真正为学术研究所用。这种认识是目录学史上的一大突破,这种突破对后世目录学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再次,章氏在典籍编目的方式、方法上也以总结前人所得为先导,提出了“互著”、“别裁”的著录方法。所谓“互著”,即对“书之易淆者”进行“重复互著”,以“免后学之抵牾”;对“书之相资者”,用“互著”“以究古人之源委”;至于“别裁”,就是“裁”一书中的局部“篇章”,“补其部次,别出六类,以辨著述源流”。这两种方法虽自刘氏父子即开始使用,但章学诚却第一次给予了理论的升华,对后世典籍编目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章学诚的目录学理论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几千年典籍编目的规律,以他的系统论述较完整地构架了目录学的理论体系,第一次把典籍编目实践纳入了学术研究过程之中,对我国目录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以《史籍考》来实行他的典籍编目原则和思想,是考虽佚,但存于《章氏遗书》中的《论修史籍考要略》等三篇文章足以使后人明其概貌。

第三节 典籍分类的发展与演变

典籍分类是人类进行典籍收藏和使用的一种手段,是典籍数量发展和类型增加的一种必然趋势。典籍分类的基础是学术分类,因而典籍分类体系的演变和发展是学术文化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一种标志。

我国的典籍分类出现很早,在典籍出现的殷商时代即已有了典籍分类。但这一时期因“人事简单,书契繁难”,“典册无多”^①,故而只能或根据典籍的载体,即外部形态,或据其使用形式,或据其产生的时代进行初步区别,以利使用,而无法以类相别。这时的典籍分类实

^①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

实际上是人类事物分类本能的一种具体体现。“周代典籍渐多,政事亦繁,且以简册繁重,收藏不易,故乃设官分守”,如太史所掌之“典”,小史所掌之“志”,太卜所掌之“易”,大宰所掌之“治”、“教”、“礼”、“刑”、“事”六典等。这种“分官摯掌,各守其书”^①的管理方式即是典籍分类的明显表现。

春秋战国时期活跃的思想环境,促使大批私人著述产生。王官统治的学术文化在“士”阶层得以充分发展,中国古代的各门学科都基本上在是时产生。根据庄子、荀子、淮南子等人对此时学术思想的归纳和总结,这时的学术体系被分为墨家、法家、名家、道家、儒家、小说家、纵横家等,这些学术体系成为了后世各学科的滥觞。各家所著典籍代表了他们各自的学术思想,这些典籍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各自的类别。儒家的始祖孔丘为了教学的需要,根据已有的典籍,按当时的学科体系删定了《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著作,当时称为“六艺”。“六艺”的区分实际上代表了当时较成熟的六种学术类别,构成了后世典籍分类体系中“经”类体系的基本框架,为西汉刘氏父子《七略》分类体系确立了基本思想,故而孔子可以说是我国科学典籍分类的始祖。

典籍分类到西汉进入了系统化时期,也就是科学和典籍分类体系的初创期。刘向刘歆父子在这方面做了伟大的实践。刘氏父子校定群书后形成的《七略》共分为七部分,除“辑略”作为总领全目的大纲以外,其他六略及其下位类构成了我国典籍分类的基本体系。

六艺略——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诸子略——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诗赋略——赋一、赋二、赋三、杂赋、歌诗

^① 蒋元卿:《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台湾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17页。

兵书略——权谋、形势、阴阳、技巧

数术略——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刘氏父子的这一划时代的典籍分类体系表面上看是由典籍整理过程中的分工协作所自然形成的,但实际上这是刘氏父子总结了此前典籍分类的成就和战国以后学术体系发展状况后所形成的一种科学的分类体系,这一体系有着严密的结构和完整的逻辑含义。

所谓“六艺”是指古代的六门学问,范围非常广泛,基本包罗了上古的天地、人文、学术、政教等各个方面。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立说,学术纷呈,然各家学说大都出于“六艺”,《汉书·儒林传》称:“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加之《易》、《诗》、《书》、《礼》、《乐》、《春秋》是由孔子删定的,因而代表政府意志的刘氏父子在官修的典籍目录中把“六艺”列于首位。“六艺略”中的“论语”虽不是“六经”,但因其所记是“圣人”孔子的说教,可以发挥“六艺”的精蕴,故也跻身于首类;《孝经》是由于“孔子以六艺名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而作来“总汇”“六艺”的典籍(郑玄:《六艺论》),故附于“六艺”之后;“小学”则是作为诵习“六艺”的工具而附于其后的。

诸子学说皆源于“六经”,是“六经”的支流和延伸,是先秦固有的学术流派,故设诸子类。儒家学说被尊为官方哲学,故而“儒家”居于“诸子略”之首。“诸子略”所列各家之学术体系代表了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哲学、法律诸学,实是我国人文科学的范畴体系。纵横家虽无哲理及政治,然其“为儒家之一支流”^①,其学说也可看作是一种治国之道,故也列于“诸子略”;杂家虽杂,然其“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汉书·艺文志》),“治国之体,当有此杂家之说”(颜师古:《汉书注》),故杂家归于九流也为合理;农家虽主张

^① 蒋元卿:《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台湾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页。

“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汉书·艺文志》），然并非研讨农事技艺之学，实以此作治国之论，因而，刘氏没有把它列入“方技略”而归诸于诸子；小说家虽由于其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而不入九流，但因其“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其说非止于“街谈巷语”（《汉书·艺文志》），而多有哲理阐述，故也附于诸子之末。

按刘氏以史附“春秋”之后的体例，“诗赋”作为《诗经》的支流当附于“诗”后，然刘氏没有这样处理，而是为“诗赋”单立一略，其原因在于自“大儒孙卿、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之后，“宋玉、唐勒，……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为侈丽闳衍之辞”，“自孝武之世，立乐府、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汉书·艺文志》），诗赋典籍大量出现，至刘氏父子时已有一〇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远逾“诗”类的六家四百一十六卷之数，故而无法附于“诗”后。并且由于政府的重视和帝王的附庸，诗赋典籍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刘氏父子以为诗赋“可以观风俗，知薄厚”（《汉书·艺文志》），故“诗赋略”仅次于“六艺”、“诸子”二略，而居于第三。

“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因所录各典籍所记载的都是实用、技巧性的技术，虽与治理国家不无联系，但却不像诸子学说可直接服务于治国平天下，因而刘氏父子的分类体系中把它们列在最后。

刘氏分类体系的六大类先后顺序基本以学术发展的隐显为原则。我国早期的学术发展其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统治者的好恶和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到各门学科发展的隐显，而反映学术发展状况的典籍分类体系也明显留下了这种痕迹。但刘氏分类体系在二级类目的处理上却基本避开了政治的影响，使科学和归类方法以不同标准进行组织和构架，“有聚传习一部古典之书为一类者”，如“六艺略”中除小学以外的各小类；“有聚学派相同之书为一类者”，如“诸子略”各小类；“有聚研究一种专门学术之书为一类者”，如“小学、兵权谋……天文、历谱……杂占、形法……”各类；“有聚文章体裁相同之书为一类

者”^①，如“诗赋略”各类。这些归类、立类标准为后世各家分类体系所沿用。

《七略》的分类体系是我国第一部能反映学术发展状况的科学的典籍分类体系。作为初创，它虽存在不少欠完美之处，然它却以其严谨的体系结构、恰当的类目、等级分明的层次，为后世的典籍分类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西汉以后出现了各种形式和内容都不同的典籍分类体系，但探其渊源莫不出于此，即使像影响我国典籍分类达千余年的四部分类法也是以刘氏体系为基础修改补充而成的。

刘氏分类体系出现以后，基本统一了当时的典籍分类，西汉后期至魏前期的所有典籍分类全部以此为标准。班固《汉书·艺文志》则完全采用了刘氏的《七略》，完整地保留了《七略》的分类体系。当然，班固也对某些典籍的分类按照他自己的理解作了部分调整，如将在《七略》中被分入“法家”类的《管子》改属道家类；将被分入“兵权谋”类的《军礼司马法》改入“礼家”等，这是班固根据当时学术发展的状况对刘氏分类体系的修改。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后，《易》、《书》、《诗》、《礼》、《春秋》已上升到“经”的位置。而春秋战国十分兴盛的诸子学说除儒家学说被立为国学、法家学说渐入政府管理实践而外，其余各家皆渐趋衰微，而史学是这一时期发展最快的学科，新的体裁新的记载方式与上升为经典的《春秋》已完全分道扬镳，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刘氏的分类体系已无法适应学术文化的这种发展。

基于这种变化，魏秘书郎郑默经过对国家公藏典籍的整理，在他的《魏中经簿》中初步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典籍分类体系——四分法。《中经》早佚，无以知其详。至西晋，秘书丞荀勖“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

^①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第68页。

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隋书·经籍志》）。这一分类体系有不少创新，但大体可以看出其与《七略》体系的继承关系，其甲部即《七略》体系的“六艺略”，其乙部则合刘氏体系的“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而成，其丙部是析刘氏体系中“春秋”类下的史籍而成，丁部则依刘氏之“诗赋略”而成。至此，四分体系的基本框架大体立了起来。到东晋，著作郎李充又以勘旧簿校东晋所集典籍，并“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隋书·经籍志》）。李充在其《晋元帝四部书目》中沿用了四部分类体系，但却“换其乙丙之书”（《七录·序》），使影响此后一千多年中国文化的四部分类法最终形成。这一改变，不仅体现了史学发达、诸子之学没落的学术发展趋势，而且使四分体系的类与类之间形成了一种学术联系。

初期的四部分类法只是大体设计了一个框架结构，并没有十分科学的体系，并且每一部没有精炼概括的名称，只能以“甲乙丙丁”为序，这是初创时期的一种必然。

创立一种新的典籍分类体系，需要有相当的文化积累和典籍整理实践。刘氏父子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下，专事典籍整理研究且历二十余载、经两代人的努力始创《七略》分类体系。郑默所仕之魏并无大的典籍整理活动，他本人亦无整理典籍的特长，他提出四部分类法是基于当时典籍数量的变化，故而只能划分出大的类别范围，还无法给每类综合出既足以概括各类典籍内容又反映学术发展状况的类名。荀勖与郑氏基本同时代，只是他整理典籍时已入晋，虽所整典籍逾十万卷，但也无力完成四分体系，只能因郑法而已。李充所整理的典籍仅三千零一十四卷，没有完善分类体系的物质条件，他能确定四分法的部序已是了不起的创举。

古人的典籍分类是实用性分类，不同于我们今天的理论性分类，其基本原则是“因书设类”，他们首先追求的是使已有典籍都有类可

归,其次才考虑其体系的科学性和对学术文化发展的涵盖性。因而在荀勖的体系中,丁部不但有“诗赋”,还有“汲冢书”。今天看来,“汲冢书”包括的范围很广,其书应散入各类。然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书,而不是一组书,因其内容庞杂,故入丁类,相当于后世的类书,因其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并不代表一种典籍发展的类别,故而终不能像类书一样能在分类体系中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四部分类体系比刘氏分类体系具有更大的涵盖面,它基本概括了我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门类,是对我国文化发展的一次全面总结。所以四部分类体系出现后,立即取代刘氏分类体系而成为官私藏书目录分类方法的主流。

至《隋书·经籍志》,四部分类法基本定型。《隋书·经籍志》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又细分为四十大类,其后另附道佛二部十五大类。

经部十类: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小学;

史部十三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官、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子部十四类: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

集部三类:楚辞、别集、总集;

道经四类:经戒、服饵、房中、符录;

佛经十一类:大乘经、小乘经、杂经、杂疑经、大乘律、小乘律、杂律、大乘论、小乘论、杂论、记。

《隋书·经籍志》的分类体系与荀、李的体系相比有很大的发展,其二级类目不但数量增加近一倍,且其类名和位置也更科学。“经部”除了六艺及小学等以外,又增加了“纬书”一类。图纬之书是汉代以神学附会儒学经义的典籍,它以“纬”之名与当时已立为“经”的“六艺”及《论语》等典籍相对,是一种对经义的诠释,在两汉时期曾对国

家政治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它虽有迷信色彩,却不同于方术之书。它的思想虽与经学背道而驰,但从学术上考虑,附于经类较为合理。“史部”是《隋书·经籍志》变动最大的类目,它把荀、李体系的四个二级类目增加到十三个,不但由此勾划出一个较完整的史学体系,而且包容了有典籍以来所有的史籍。一曰正史,类分以《史记》为代表、以纪传表志为体裁、由政府组织编辑的历代史籍;二曰古史,类分以编年记事形式写成的史籍;三曰杂史,类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体制不经”,且内容“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的史籍(《隋书·经籍志》);四曰霸史,类分正统王朝以外的伪朝国史;五曰起居注,类分记录人君言行动止的史籍;六曰旧事,类分记录朝廷政令的史籍;七曰职官,类分记录历朝班叙品秩的史籍;八曰仪注,类分记录历朝风土人情、礼仪的著作;九曰刑法,类分记录律令格式的著作;十曰杂传,类分记录历代公卿诸侯、百官史臣善恶行迹的史籍;十一曰地理,类分记录各代山川郡国、疆域国土的著作;十二曰谱系,类分各类家谱和记录氏族变迁的史籍;十三曰簿录,类分《七略》以往的各种典籍目录。“子部”类目因其学科发展缓慢,典籍增加无多,《隋书·经籍志》的立类大体循荀、李体系旧制。“集部”类目的数量虽无变化,然其内容却已大异,《隋书·经籍志》除保留“诗赋”的内容以外,将“图赞”和“汲冢书”两类根据所含典籍的内容分散到各类,如“汲冢书”中的《穆天子传》被归入“史部”“起居注”下,而另增加“别集”和“总集”两类,以类分个人文集和多人文集。“别集”和“总集”是起源于两汉的两种文学著作形式,荀、李时代,这两类典籍虽行于世,然其量有限,其影响面窄,归于“诗赋”之下,比较勉强,然经六朝发展,至隋唐已蔚然成两大类文学典籍,《隋书·经籍志》所录二类典籍共计五百四十四部六千五百九十四卷,非单独立类不足以包含其学科内容。

《隋书·经籍志》的分类体系虽循荀、李四分体系,但有较大的创

新,奠定了此后四部分类的基本格局。

《隋书·经籍志》虽比较完整的体现了四部分类法的体系结构,但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四分体系,从严格意义上说,还不是完全的四分法,它还未能为佛、道典籍在分类体系中安排一个合理的位置,只能作为附录载于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迭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其典籍对典籍分类体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于是在魏晋南北朝及以后所产生的各种分类体系中都或多或少地对它们进行了反映。或以附录形式出现(如《七志》),或作为大类出现(《七录》),这样的处理都未能恰当反映这两类典籍的地位,而与《隋书·经籍志》同时代的《古今书录》及其后的《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皆强行将其划入“子部·道家”类下,这是削足适履,实为不当。只有宋时的《崇文总目》才较好地 在典籍分类体系中为其找到了一席之地,以“道书”、“释书”两类立于“子部”之下,这种立类为后世所效仿。

《隋书·经籍志》以后,四部分类法体系经唐、宋、元、明几百年的发展和演变,至清代达到空前的成熟阶段,而这种成熟又集中体现在《四库全书总目》中。

《四库全书总目》所使用的分类体系虽在大的结构上仍循发端于荀、李,发展于《隋书·经籍志》的四分法的成例,然其丰富的类目结构,合理的三级体系却充分反映了清代集大成的学术发展成就和种类众多,数量庞大的典籍发展状况,充分体现了我国成熟的封建时代的典籍分类思想。

《四库全书总目》共分四部四十四类,对于流别繁碎者,又各析出若干子目,共计六十七个子目。

经部十类:易、书、诗、礼(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训诂、字书、韵书);

史部十五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诏令、奏议)、传记(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史钞、载记、时令、地理

(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职官(官制、官箴)、政书(适制、兴礼、邦计、军政、法令、营建)、目录(经籍、金石)、史评;

子部十四类: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推步、算书)、术数(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阴阳、五行)、艺术(书画、琴谱、篆刻、杂技)、谱录(器用、食谱、草木鱼虫、杂物)、杂家(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类书、小说家(杂事、异闻、琐语)、释家、道家;

集部五类: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词集、词选、词话、南北曲)。

《四库全书总目》的这一分类体系比之《隋书·经籍志》确有了巨大的发展,不但其类目的损益更趋合理、确切,而其三级类目体系使其具有了更大的涵盖面和更高的专指度,能最大限度地概括我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到清代的成就,条晰其历史脉络。

《隋书·经籍志》以后,四部分类体系被绝大部分官私典籍目录所使用,它们各自根据学术发展的程度和各种典籍的多寡,都或多或少地对《隋书·经籍志》的分类体系进行调整和修改,类目设置也不完全相同,《四库全书总目》充分总结了这一时期各种典籍分类体系的成就,根据乾隆时期学术发展和唐宋以来典籍类别的变化,通过增删、合并、类目位置的调整及增加三级类目,使类目划分和排序更加科学合理,类目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它们之间的界定更加清晰,从而形成了一个合理、成熟的典籍分类体系。

在经部,《四库全书总目》去掉“图纬”类,设置“五经总义”类,以“四书”类替掉“论语”类。

“图纬”之书起于西汉,至隋唐,其影响犹存,此后虽不乏研究者,然旧籍多佚,新著少出,影响日减,故不单独立类。而兼治数经者,自汉代即有,“宣帝时,始有《石渠五经杂义》十八篇,《汉志》无类可逮,

遂杂置之‘孝经’中；《隋志》录许慎《五经异义》以下诸家，亦附‘论语’之条”，其后各家虽始立专类，然多有不切，“《旧唐书志》始别名‘经解’……然不见兼括诸经之义”，朱彝尊《经义考》中立为“群经”，“又不见为训诂之文”（《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五经总义》），故《总目》以“五经总义”一类，类分此类典籍，比较确切。《七略》体系中，孔门的“论语”地位与六经等同，其后《孟子》也上升到“经”的位置。自朱熹作《四书集注》以后，四书影响日盛，且著述层出，形成体系，故《总目》特设“四书”类。

在史部，《总目》依《新唐书·艺文志》例，将“古史”类改为“编年”，是以史体类史籍，消除了“古史”的时代限制；纪事本末类史籍起源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既有是体以后，微独编后相因，纪传相同，即纪传本末即相因”，当时由于此体史籍甚少，不能单独立类，而明以后，纪事本末体的史籍大增，成为史书编修中的一种重要体裁，有鉴于此，《总目》“遂于二体之外别立一家，今亦以类区分，使自为门目”（《史部·纪事本末叙》）；自史部成类以后，在历代分类体系中，皆有“正史”、“杂史”类，然如“《东都事略》之属不可入正史而亦不可入杂史者”皆免而类之，《总目》特以《宋史》例，立“别史”一门，“以处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者”；记录帝王命令的“诏令”和记录大臣奏章的“奏议”虽出现已久，由于其内容为“政事之机枢”，而形式为华丽的文章词藻，故学术界对其界定看法不一，历来各家分类体系归类不一，《总目》因其“论事之文当归史部”，于是，取《新唐书·艺文志》与《汉书·艺文志》之善，“亦并改隶”，合而为“诏令奏议”类；改编、删削原有史籍，钞撮举要，博取约成而成新的典籍，自古有之，然，元以前各分类体系皆散入各类，《总目》特循《宋志》例，立“史钞”一类；四分法中史部典籍的分类体系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自《隋书·经籍志》后的所有分类体系中皆以正史、伪史等区别对中央政权和割据政权的记录，“正史”类分官方钦定的记录占统治

地位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史实的纪传体史籍,及各家对这类典籍进行校注和阐释的著作,而记录割据政权或各诸侯国史实的史籍或以“霸史”名之,或以“伪史”立类,《总目》以为这类典籍多为“僭撰”,“久已无存,存于今者,大抵后人追记而已,曰霸,曰伪皆非其实也”(《总目·史部·载记类叙》),于是创“载记”类,著录《吴越春秋》以下,记各代僭乱遗迹的史籍;宋代以前,时令之书皆入子部农家类下,而实际上此类典籍“上自国家典礼,下至里间风俗悉载之,不专农事也”(《直斋书录解题·时令类叙》),《总目》因“其本天道之宜,以立人事之节”(《总目·史部·时令类叙》),而“民事即王政”,故而立“时令”于史部之下,类分天文气候之书;“志艺文者,有故事一类,其间祖宗创法,奕叶慎守,是为一朝之故事;后鉴前师,与时损益者,是为前代之故事。史家著录,大抵前代事也”。此前各体系所设之“故事”,“旧事”类皆“循名误列,义例殊乖”,于是《总目》“总核遗文,惟以国朝章六朝所职者,入于斯类”,而设立“政书”一类,“综括古今之意”,并且将此前被分别立类的仪注、刑法诸类统括于此类之下;史评作为史籍体裁的一种以刘知幾的《史通》为始,此前虽有史评文,但还不足以成体,故而《总目》以前的诸家分类体系均无专类,然《史通》出后,“品鹭旧闻,抨弹往迹”的史评体典籍“动至汗牛”,鉴于此,《总目》特设立“史评”类,专记此类典籍。

在子部,《总目》依《崇文总目》例,设“艺术”一类,类分此前各体系中的“杂艺”类典籍;图谱及“诸杂书之无类可属”的典籍,在此前各家分类体系中都没有统一的类分点,除《遂初堂书目》外,多无专类,往往强入其他类,《文献通考》将“香谱”入“农家”,“明知其不安而限于无类可归”(《总目·子部·谱录类叙》),故《总目》特立“谱录”一类,类分草木鱼虫鸟兽之类的典籍;类书这种“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的典籍虽起源很早,但在荀、李体系和《隋书·经籍志》体系中都没有合适的类可归,有附于史者,有附于子者,也有附于集

者,《总目》特依前例,立“类书”一类。

在集部,《总目》把《隋书·经籍志》时的三类增加到五类,除保留“楚辞”、“别集”、“总集”以外,另加“诗文评”和“词曲”两类。“诗文评”类分评论诗词文赋的典籍,此类典籍发端于诗文昌盛的齐梁,在隋唐以前被附于“总集”类。《新唐书·艺文志》以后虽有专类,然名之以“文史类”,名实不符,且有淆意,《总目》以“诗文评”最终完成了此类典籍的立类;词曲类典籍源于古诗、汉乐府,真正发展是在宋元之际,故而在明清以前的分类体系中都未能以专类类分之,至《总目》时代,此类典籍数量剧增,且其地位已由雕虫小技上升为与词文相抗衡的文体,故《总目》以专类反映其变化。

《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体系在类目的排序上也作了较大的调整,以增加分类体系类目之间的有机联系。这种调整已突破了自《七略》以来各分类体系“因书立类”、实用为主的分类原则,已转而寻求实用前提下的科学性。经部的“乐类”,因《乐》为孔子删定的“六艺”之一,故《七略》以来的分类体系皆循此而俱位于经部“春秋”之前、“礼”之后,然事实上因《乐经》于秦之际已失传,其后“乐律无器可凭也”,故而“愈久愈失,终后不得及前”(《总目·经部·乐类后叙》),至清,这类典籍已越来越少,并且内容已少涉经义,多偏于乐理,故《总目》根据其在经学中的地位,将此类列于“四书类”之后,由居第五位调为居第九位;在四部典籍中,最庞杂、难于调理各类秩序的是子部,《总目》根据各类典籍的多寡、各学科的发展状况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新设置了一个与其他各家体系完全不同的子部类目体系。“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之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之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之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之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

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观也。诗取多识，易称制器，博闻有取，利用攸资，故次以谱录；群言歧出，不名一类，总为荟萃，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分类，亦杂言也，旧附于子部，今以其例，故次以类书；稗官所述，其事未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弈，故次以小说家。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二氏，外学也，故次以释、道家终焉。”（《总目·子部序》）

我国各门传统学科在春秋战国起源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学术的演变，在一千多年的岁月中或显或隐，至清代已呈现出与其创立初期大不相同的格局，《四库全书总目》根据这种学术发展趋势，在其分类体系中将曾经有过很大发展，但在是时已逐渐失去影响的学科或合并，或以三级类目出现，如，经部“训诂”类调入“小学”类，作为三级类目；史部“起居注”并入“编年类”；“仪注”、“刑法”并入“政书”类，作为三级类目；子部，作为诸子学说的“道家”类与作为宗教的“道家”合并；“名家”、“墨家”、“纵横家”并入“杂家”；“天文”、“历算”合二为一；“五行”、“占卜”入“数术”类作为三级类目等，从而以典籍分类体系充分体现乾隆时期学术见地。

四部分类体系出现后，虽然很快成为我国典籍分类的主要体系，并历经一千多年且延续至今，但在其出现、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先后出现过各种分类体系，虽然它们都未能取代四部分类体系，但对分类体系的演化和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

李充确立四部分类体系的顺序后不久，跨宋、齐两朝的王俭在其所编的《七志》中，依刘氏父子《七略》中的分类体系提出了他的七分法：“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王俭的这一分类体系实质上是对刘氏体系的一种变通，只是改换了

类名,其内涵和各类的界定基本没有变化:

《七略》	《七志》
六艺略	经典志
诸子略	诸子志
诗赋略	文翰志
兵书略	军书志
数术略	阴阳志
方技略	术艺志
	图谱志
	附:道
	佛

“六艺”改为“经典”,是因为六艺之书两汉以后已被尊为“经”,王俭这种改变是恰当的,且对四部分类中“经部”的类名设立不无影响;“诗赋”改“文翰”是因为汉以来文体增多,已不仅限于诗赋二类,“文翰”之名加大了其涵盖面;“兵书”改为“军书”是因为王俭以为军字的内涵和外延都较兵字为广;“数术”改为“阴阳”可以避免类名繁杂,提高专指性;“方技”改为“术艺”是因为技之名事无典据;“图谱”一志为王俭所创,用于集中类分原散于各类的图谱类典籍。这种分类虽是七分,但却为此后完善四分法打下了基础。

梁之阮孝绪在“斟酌王刘”的基础上,以一己之力在其所著的《七录》中创立了一个不同于王刘的七分体系,这一体系共分为内、外两篇七录五十五类:

经典录九类: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纪传录十二类: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

子兵录十一类: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家、小说、兵家;

文集录四类：楚辞、别集、总集、杂文；

术技录十类：天文、讖纬、历算、五行、卜筮、杂卜、刑法、医经、经方、杂艺；

佛法录五类：戒律、禅定、智慧、疑似、论记；

仙道录四类：经戒、服饵、房中、符图。

这一分类体系虽分为七类，但实际上更多地吸收了荀、李体系的合理之处，从它的二级类目的设置看，“经典录”、“子兵录”和“术技录”取法于《七略》，而“纪传录”和“文集录”则效仿于四分法，是一种集两种体系优点而成的分类体系。他的七个大类都是经过比较鉴别而设置的，“王以六艺之称不足标榜经目，改为经典，今则从之；……刘王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籍甚寡，附见于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故而“分出众史”别为一录；“……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则武事之总名也”，故将被王俭改为“军书”的“兵部类”名再改从兵，且由于兵部典籍量少，故与子部合为一录；“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改王俭“文翰”一类为“文集”；王俭《七志》改刘氏体系之“数术”为“阴阳”，“方技”为“术艺”，但“阴阳偏有所系，不如数术之该通，术艺则滥六艺与术数，不逮方技之显要，故还依刘氏，各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医经、经方不足别创，故合术数之称，以名一录”；“释氏之教，实被中土，讲说讽味，方轨孔籍，王氏虽载于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事，未是所安”，而“仙道之书，由来尚矣”，故立佛法、仙道二录。王俭的附录中是“先道而后佛，今则先佛而后道，盖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浅深矣”（《七录·序》）。

王《志》阮《录》虽同为七分法，但阮氏分类体系却不泥古，多有创新。它根据史学发展的现状，吸收了四分法的成就，将史籍单独立类，其在大类下又进一步列出细目，初步形成了分类体系结构，特别是纪传录下的细目基本勾勒出了史学发展的大致轮廓，奠定了后世四部

分类体系中史部体系的基本框架。四分法发展期的《隋书·经籍志》体系史部细目基本以此为依据。

南宋郑樵是唐宋以后推动我国典籍分类体系发展的重要代表，他总结前人千百年来的典籍分类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完整的典籍分类理论，并以此理论为指导，通过考察分析《七略》以下各家分类体系的优劣，在《通志·艺文略》中建立了他完整、有机、全新的典籍分类体系。他的分类体系分为十二大类，一百五十五小类，小类之下更细分为二百八十四目：

经类第一，九类：易、书、诗、春秋、春秋外传、国语、孝经、论语、尔雅、经解；

礼类第二，七类：周官、仪礼、丧服、礼记、月令、会礼、仪注；

乐类第三，直接分为乐书、歌辞、题解等十一小类；

小学类第四，直接分为小学、文字、音韵等八小类；

史类第五，十三类：正史、编年、霸史、杂史、起居注、故事、职官、刑法、传记、地理、谱系、食货、目录；

诸子类第六，十一类：儒术、道家、释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兵家；

天文类第七，三类：天文、历数、算术；

五行类第八，直接分为易占、轨革、筮占等三十小类；

艺术类第九，直接分为射、骑、画录等十六小类；

医方类第十，直接分为明堂、本草等二十七小类；

类书第十一；

文史类第十二，直接分为楚辞、别集、总集等二十二小类；

郑氏的这一体系虽取法于前代各家的分类体系，然不但突破了传统四分法的桎梏，而且也改变了五分法、六分法、七分法、九分法诸体系的成例，成为一种全新的分类体系。把原来隶属于经部的礼、乐、小学三类各立一类，与经学同级，突破了传统经学的界限，为这三门

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新的界定,提供了新的空间,而将原来隶于子部的天文、五行、类书、艺术单独立类,充分反映了这几个学科的发展现实,体现了其以分类体系勾勒学术体系发展面貌的原则,其细目虽不免有繁琐细碎之嫌,且使类分的典籍多寡不一,但却成为一种层次分明、井然有序的展开体系,众多的细目使其专指度大为提高。他的这一体系极大地影响了《四库全书总目》体系的产生,其中很多细目成为《总目》体系设置类目的依据,甚至直接袭用,成为我国典籍分类体系发展过程中最有影响的私创典籍分类体系。

第八章 典籍的流散

第一节 典籍的政治劫难

我国典籍的生聚与流散,与政治动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政策开明,文化发达,典籍就生就聚;相反,政治动荡,经济萧条,政策偏狭,文化萎顿,典籍就流散就消亡。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因政治原因而遭禁毁的典籍不胜枚举。几次大的政治性毁灭图书,已够触目惊心。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焚“削”典籍是我国典籍的第一次政治劫难。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期,统治中国近四个世纪的周王朝随着平王东迁而逐渐衰落,而各诸侯国则权势大增,原来由周王室控制的经三代努力而积累下来的典籍纷纷流入各诸侯王室。随着是时活跃的学术局面的形成,学术文化已从王室的奴婢走入“士”层,典籍的影响面也扩展到民间,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和史实有许多不利于诸侯各国的统治和不臣的权势。另外,诸侯的立国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虽是势所必然,但毕竟是“叛道”之举,他们害怕世人利用这些典籍中的思想来反对自己的统治,动摇他们的地位,因而他们或全部焚去有碍的典籍,或削去其中有可能“害己”的内容,以适应他们

的政治需要。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初，斐豹隶也，著于丹书。栾氏之力臣曰督戎，国人惧之。斐豹谓宣子曰：‘苟焚丹书，我杀督戎。’”斐豹是晋国颇有权势的大臣，因为丹书中记载有他过去的犯罪经过，为了抹去这一污迹，不惜以主动杀督戎作为焚去此书的条件。而齐国大将崔杼为了不让自己“弑其君”的逆行著之于史，竟杀掉记事的大史及其兄弟两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公元前359年，秦国的商鞅为了在政治改革中确立以其为首的法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竟动员秦孝公烧毁反映与之相对立的儒家思想的《诗》、《书》、《礼》、《乐》以“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篇》）。这种对典籍的肆意焚削，使商周两代历尽艰辛保存下来的我国早期的珍贵典籍大部分或化为灰烬，或面目全非，名存实亡。早在孔子整理典籍时，只见“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典章沦废”（《隋书·经籍志》），“载籍残缺”（《汉书·艺文志》），本来有三百多篇的《礼经》因“多被焚削”，孔子只能从残简败帛中整理出十七篇。可见典籍被毁之烈。这一次巨大的浩劫，使先秦的学术发展和历史脉络出现了一个断层，后人只能从幸存的少数典籍的片言只语中去推测考证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目。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我国典籍发展的又一次政治劫难。秦始皇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政府以后，为了维护这种统治，他统一了文字，统一了货币，统一了道路，同样，他也需要统一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活跃的思想曾造就了诸侯蜂起的政治局面，秦统一天下后，这些思想又被那些怀念分裂局面的六国遗老和乱道之儒用作蛊惑人心的工具，而这些思想都记载在典籍之中，并且托典籍而传播。秦始皇为了阻灭这些思想，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焚毁典籍。“自载籍以来，诗书所称，桀有暴德而天下归殷，纣有暴德而天下归周……始皇既已习闻其说矣。今虽倭曰：德兼三皇，功过五帝，而其所

行则袞、纁、幽、历之迹耳。夫岂不自知之，而儒者记纂，明以语人曰：如是而兴，如是而亡，不啻烛照数计龟卜而示后来以规范”（《文献通考·经籍考》）。因而秦皇不能让天下人借典籍的记载以古论今，以古非今，动摇他的统治；秦的立国得益于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因而始皇帝建国后仍以法家思想作为治理天下的主导思想，但战国时期，由于孔子及其门人的努力，与法家相对的儒家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在“士”阶层中拥有广泛的影响，为了保证政令通行，他必须要消除儒家思想在民众中的这种影响，而焚毁民间的儒家典籍是最佳选择；周秦以来，法家的治国之道多急趋功利，奖励耕战，功以善战为上，利以疾农为本，不希望百姓因事学而碍于耕战，“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而不偷。民不贱农则安不殆”，只要百姓不沉于学问之争，就会专心于农耕（《商君书·垦令篇》）。基于这种思想，始皇帝也以焚灭典籍，无以使“学”入百家，而达到愚民的目的。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 213 年），秦丞相李斯向秦始皇建议：“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始皇本纪》）。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史记·李斯传》），于是自典籍产生以来最大的一场政治浩劫开始了。

秦始皇的这种暴行使先代遗留下来的大量宝贵典籍被摧毁，其中大部分就此沉于灰烬，前代之遗制皆失，“三代之书，经秦燔烧殆尽”（《唐书经籍艺文合志》），春秋战国时期所留存下来的诸侯各国记载自己的政治活动和社会变迁的史记皆被毁，使后人无法确切了解这一重要时期的历史文化和学术的发展状况。大量儒家经籍被焚，导致了汉初经学研究上的今古文之争，并且使汉以后伪书大量出现。秦始皇的焚书为后世历代统治者摧残典籍文化开了一个恶例。

“六朝焚纬”使谶纬典籍遭到毁灭性破坏。谶纬之书是起源于西

汉的一种附会六经经义的宗教迷信,它对自然界某些偶然现象进行神秘化的解释,视其为社会安危、天下兴亡的决定原因。“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讖,以遗来世”(《隋书·经籍志》)。在两汉之际,讖之书在学术界有同经史相等的影响,郑玄、宋均等学术大家均通讖纬之学,并且为之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讖纬之术也具有重要地位,王莽以“符命”而篡汉室政权,而刘秀则以讖纬复刘家天下,讖纬之书得到迅速发展。刘秀立国后曾专门命尹敏、薛汉整校讖纬典籍,并于三十年后“宣布图讖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但讖纬之学毕竟是子虚乌有的附会之说,一开始就受到一些学人的反对,东汉时张衡即主张禁纬,他认为讖纬之书非圣人所为,“宜收藏图讖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后汉书·张衡传》)。至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繁,君临天下的“天子”都怕臣民步王莽、刘秀后尘,以图讖之说扰乱天下,危及其统治,于是“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讖”,开始了对讖纬典籍的禁毁,“梁天监以后,又重复其制”。南北朝诸代的禁纬只是局部的破坏,“及高祖受禅,禁之愈切”。隋炀帝弑父篡位后,更怕世人以图讖之说来诽谤他,于是更加疯狂地焚毁纬书,“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讖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隋书·经籍志》)。图纬之书虽多为附会、迷信的内容,但却包含了不少古代的神话、传说和科学技术成就,“浑盖宣夜之学往往存于纬书”(《隋书·经籍志》),而且它虽附会于六经经义,但却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经学的一些晦义,况且其并非全出于妄人之手,虽包含有诸多谬误,但著书之人去圣未远,得以亲览后人未见之典籍,其中的内容对经学研究不无参考价值。但历经六朝几百年的禁焚,讖纬之书基本绝迹,在两汉显赫一时的《河图》、《洛书》及“七纬”,流传下来的只有《易纬·乾凿度》一种,且是宋人从类书中辑出的。其损失之烈不亚于秦之焚书。秦始皇焚书只去民间所藏,政府所藏典籍则未焚,而六朝禁纬则不分

官私，皆焚之。诗书经秦火而犹存，讖纬历六朝而绝传。“然后人盛非秦之焚书而不及隋炀之焚纬者，则以诗书百家语，均圣贤哲人之遗；而讖纬云云，以为无足轻重耳”^①，但对典籍来说，却是两次同样无以为补的重大灾难。

“三武”灭佛焚经，是我国佛教典籍发展过程中所遭受的最重大的政治灾难。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立即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青睐而迅速发展，佛教典籍也很快发展成一种重要的典籍体系，至南北朝大有与中国传统的儒学和土生土长的道教三分天下之势，其影响渐渐深入到统治阶层，它的僧侣教徒形成了一股独特的力量，再加上它的经济实力的加强，成了统治者一个不易把握的因素。于是在隋至唐朝的几百年间，“三武”灭佛焚经，使佛教势力大受挫折，使佛教典籍遭受了重大破坏。

北魏太武帝在执政之初本崇佛法，曾聘请北凉善禅观高僧玄高为太子晃的老师。后来，道士寇谦之和司徒崔浩向武帝力呈佛教之害，他们认为佛教是胡教，而北魏的政策是汉化，应该坚决禁佛，同时向世人证明拓拔氏也是炎黄的后代，君临天下乃合天意，正在这时，武帝在平定卢水胡盖吴起义时，发现寺庙与义军有联系，于是终于在公元446年下诏灭佛，命令将天下所有的佛陀形像击破，将所有的佛经焚毁，僧众不论老少一律活埋。这次残酷的禁佛焚经，使两汉以来积累起来的佛经遭受重大创损。^②

太武帝灭佛一百一十余年后，北周武帝也步其后尘，大灭佛法，大毁佛教典籍。周武帝开始也崇信佛教，并先后七次亲自主持儒、道、佛三教的辩论，明三教之优劣，以定废存。但后来从讖纬之书得知，穿黑衣者将为王，于是开始对佛教及教众产生疑虑。随后听从道士张

^① 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45页。

^② 黄忏华：《中国佛教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51页。

宾的建议,于建德三年(574年)以佛教费财伤民、悖逆不孝为名下诏禁佛,在全国范围内破毁寺塔,焚烧佛教典籍和形像,使北周所藏之佛典被焚毁殆尽。后来武帝灭了北齐,又下诏毁灭北齐境内的佛寺,烧其经籍,并令三百多万僧民还俗。这次禁佛使刚刚从北魏太武帝铁蹄下恢复的北地佛教一时绝其声迹,佛典荡然无存。^①

到了唐代,由于历代君主皆信佛法,故而佛教在初唐和中唐得到充分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佛教势力的急剧膨胀,扩大了僧侣阶层与世俗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矛盾,使社会上的反佛意识又一次抬头。唐武宗李炎在作太子时即不信佛,即位以后,师事道士赵归真崇信道教,在诸道士和宰相李德裕的煽动下,为了“易简齐政,成一俗之功,将使六合黔黎,同归皇化”,下诏禁佛,会昌三年(843年)开始焚毁大内所藏佛教典籍。同年,太子詹事韦宗卿撰成《涅槃经三德》二十卷、《大圆伊字镜略》二十卷进上,被武帝斥为“溺于邪说,是扇妖风,既开炫惑之端,全戾典坟之旨”,韦宗卿因此被左迁为成都府尹,所进典籍尽被投之于火,并派中书门下至其家中,追索草稿,也予以烧毁,不许流传,措施如此之严,前所未有的。这一事件成为“会昌禁佛”的导火索。四年(844年),武宗下诏拆毁天下的山房、佛堂、小寺等建筑,并把经籍搬入大堂。此时虽未焚烧佛经,但却把它们集中在一起,这样焚烧时会更集中、更彻底。会昌五年,废佛之举达到高潮,其间共拆毁大寺庙4600所,还俗僧尼二十多万人,并且将已集中起来的佛教典籍全部焚毁。武宗一声令下,全国上下顿时烈焰冲天,经过几次劫难而幸存下来的佛经,加上唐朝新求新译的典籍一齐化为尘土。武宗禁佛毁经是历代最惨烈最彻底的,不但政府所藏和各寺庙所收的佛典尽皆被焚,连民间所藏也在劫难逃。当时有一个日本僧人圆仁来华求法,在去长安之前,曾将一些典籍文书寄在楚州翻译刘

^① 黄忏华:《中国佛教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59—60页。

慎言处,待其被迫还俗,返回楚州时,刘慎言家中所藏佛典已全部被烧毁。武宗的会昌禁佛,佛教典籍焚毁惨烈,殆无遗余,到宣宗复兴佛教时,全国上下已无典可藏,无经可念,只好向北方求经。^①

在我国古代,典籍发展之盛莫过于清,而政府对典籍的损毁之烈也莫过于清。清朝历代政府对典籍的践踏,先是残酷的文字狱,其后是借编修《四库全书》而大肆焚毁、抽毁。

“清以异族入主中国,深恐明季遗臣之有反动心理,故努力于禁绝明季史料,违之者,即得罪,此其一也;其次,清以东胡蛮族人入主中国,虽欲自炫其文化,势亦有所不能,因而深恐汉人或议其后,于是凡涉‘胡’、‘狄’字样,即疑其贱视清人。猜疑之兴,大狱以成,此其二也”^②。这种狭隘的民族意识,导致清朝的文网之密远过前代,典籍著述之人稍有违禁即书毁人亡。清朝的文字狱延续几百年,最残酷的是康、雍、乾三代。

曾在明朝为相国的乌程朱国桢曾著有《明史》一书,其中大部已刊行于世。清兵入关后,朱氏家道中落,于是以其稿本以千金鬻于庄廷铨。庄家故富,因而召集江浙一带的名士硕儒根据庄氏的授意对已刊行于世及未刊的稿本进行增删修改,并且增加了明崇祯一朝的史实,其后募集工匠,以庄氏的名义刻印行世,名之《明书》。因所叙为明代历史,故书中对明时居于关外的清先人皆直以其名列于书中,并且对明未亡时之清太祖天命元年(1616年)至清兵入关明亡之间的时间不用清帝年号,而沿用旧著,续用明帝年号,而且详细叙述崇祯以后残明皇室隆武、永历二帝的经历。后归安县令吴之荣告讦,而冤狱发。“时廷铨已死,诛弟廷铤。旧礼部侍郎李令皙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被嫁祸为作序者的南浔富户朱佑明亦被杀,五子亦被牵

^① 方广辑:《佛教大藏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225页。

^② 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第68—69页。

连遭诛。当时受庄氏之请为之作序的江楚诸名士皆被处死，“刻工及鬻书者同及刑”，连曾经购书的官员和卖书的商人也一并被处死，“浒墅关榷货主事李尚白，闻阖门书坊有是书，遣役购之，……以购逆书立斩，书贾及役斩于坑”^①。这一残酷的文字狱，不但导致是书完全被毁，书板被烧，而且使二百二十一人死于非命。清廷之所以连此书的刻工、印刷工人都一并杀死，是想以杀一儆百手段强行压制哪怕星点的反清意识。

《明史》案不久，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又出现戴名世案。

桐城方孝标曾根据自己在云南的经历著《滇黔纪事》。其书只记滇黔风景，兼及桂王时事，书中亦有永历等年号。后戴名世见其书，非常喜欢，于是摘其中内容入其所著《南山集》。后被告发，戴名世被处死，其弟戴平世斩决，其祖父父子兄弟异姓伯叔兄弟之子，俱解部立斩。方孝标因已死，被剜骨，财产入官，其三子被杀，族人被役为奴。出资为其刊行的尤云镠、方正玉，为之作序的诸名士，甚至为之寄存书板的方苞等人也或死或被罢官流放。《南山集》的书板被全部烧毁，清廷并行文全国各省查抄方、戴两人的其他著作一并烧焚。

由于文及明朝而犯忌被杀者还有很多，“顺治、康熙之间，凡明季遗老及当时文人著述，凡有涉明季三藩之事及年号者，均有干历禁”^②，这种强盗政策使清代的学士对明朝史实讳莫如深，而保存有明代历史著述及实录类典籍的藏书人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很多人将疑犯忌之书皆付之于炬，以免杀身之祸，使是时之明史典籍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散亡殆尽，致使清政府想修明史时已无史料可据，虽屡征于民，终不得齐全。

到了雍乾时代，清廷的文字狱更加疯狂，不但有关明史的著作被

^① 《清代野史》第3辑，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42—43页。

^② 同上书，第92页。

查禁焚毁,甚至宋代人涉及辽、金史实,元、明人记载元朝之史的著作,只要政府认为议论偏谬,可能影射清廷者也一并禁毁。至于“明隆庆以后,诸将相献巨所著奏议文录,若高拱(《边略》)、张居正(《太岳集》)、申时令(《纶扉简牍》)、叶向高(《四夷考》……《苍霞尺牍》)、高攀龙(《高子遗书》)……诸家,丝帙寸札靡不然燕,虽茅元仪《武备志》,不免于火”。“厥在晚明,当弘光、隆武,则袁继咸(《六柳堂集》)、黄道周(《广百将传注》)、金声(《金太史集》);当永历及鲁王监国……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孙氏则《夏峰集》,顾氏则《亭林集》、《日知录》,黄氏则《行朝录》、《南雷文定》及诸文士侯、魏、丘、彭所撰述,皆以诋触见烬”^①,使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受到重损,靡有孑遗。

这一时期的文字狱甚至以片言只字而降罪,从而屠学士、焚典籍。查嗣庭即以在江西主考之试题“维民所止”而被认为其“维止”二字是取“雍正”二字去其头而获罪,继而所著日记被焚,人伏诛;吕留良以其诗文中有论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语,则获罪被杀,祸及子徒,其所著诗文、日记及其他著作被尽行焚毁。如此恶行不胜枚举。据统计,康、雍、乾三代兴起的文字狱共有一百多桩,成千上万的文人学士遭迫害,被焚毁的典籍不计其数。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淫威之下,民间典籍收藏者生怕所藏之书有犯忌内容而连累自己,皆私下焚毁其所珍藏,其数又难以想象。庄氏明史案发后,嗜古成癖的朱彝尊将自己在藏书楼被火焚后好不容易收集起来的五箱书中有关明代史实的著作挑出焚毁。嗜书如命的大藏书家尚且如此,何言普通典籍收藏者?

清代康、雍、乾三代的文字狱虽然残酷野蛮,给我国的学术进步和典籍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其所焚所禁仅限于一个领域、一个方面或一个人的著作,而清高宗乾隆以修四库全书之名在全国

^① 章太炎:《哀焚书》,见徐雁、王燕均主编:《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9—70页。

上下所掀起的禁书毁书运动则是对我国典籍文化的一次全面摧残。

乾隆好大喜功,为了证明他的雄才大略超过历朝历代的皇帝,决定编一部庞大的《四库全书》,并且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向全国发出征书旨。他征书打的旗号是“稽古右文”、“弘扬文治”、“彰千古同文之盛”,而实际上,是寓“禁”于“征”,想借此机会对全国的典籍进行一次彻底地大清洗,完全销毁那些不利于清廷统治的典籍,借以遏止当时未完全泯灭的反清意识,消灭关于清初污秽德行的记载。乾隆在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的诏书中明白无误地展露了他的这种用心:“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①其后,在督办征书的圣旨中,乾隆一而再、再而三地指明销毁和窜改“有碍”典籍的范围。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谕称:“对所征典籍中有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例。节经各督抚呈进,并饬馆臣详晰检阅,朕复于进到时亲加披览,觉有不可不为区别甄核者,如钱谦益……屈大均……妄肆狂猜,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即使“汇选名家诗文,内有钱谦益、屈大均所作,自当削去”;“或明人所刻类书,其边塞、兵防等门,所有触碍字样,固不可存”,或“削去数卷,或削去数篇,或改定字句”;“他如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改”。甚至对明臣的奏折,其中可以借用的则将其“触背字面,量为改易选录,余乃分别撤毁”(《四库全书总目·卷首》)。

为了完全销毁“有碍”典籍,乾隆一再严辞降旨于四库馆臣和各地方大臣,要求他们尽心尽力,严加查办,并且根据大臣查禁“违碍”典籍是否得力来提升或贬谪,江西巡抚海成因其前后共呈缴禁书八千余部,于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受到嘉奖,而一年以后,又由于其查

^① 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北平图书馆排印本,1934年。

缴王锡侯《字贯》一书不力被革职。对于收藏“逆”书隐而不交者，清廷则予以严惩。乾隆于三十九年八月谕中明确告戒百姓：“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道，承办督抚等，亦难辞咎！”广东屈昭泗家于乾隆三十九年被查出藏有应缴而未缴的“逆书”，被判斩决。其摧残典籍之狠绝，可见一斑。

在乾隆的这种旨意和高压之下，自四库馆臣至地方各官吏无不奋力禁书，为修四库全书的征书完全变成了禁书、毁书、焚书。本应埋首于整理遗文坠简的四库馆臣，实忙于清查销毁典籍，并且制订出了详细的查办违禁书籍条款：“自万历以前，各书偶有涉及辽东及女直女真诸卫，……若语有违碍者仍行销毁”；“明代各书内，有涉及西北边外部落者，……若有语涉偏谬者，仍行销毁”；“钱谦益、吕留良自著之书，俱应毁除外，若各书有采用其议论诗词者，各条签明抽毁”；“凡类书及纪事之书，应将其违碍之某门某类抽出销毁”；“凡宋人之如辽金、明人之于元，其书记载事实，有用敌国之词，语句乖戾者，俱应酌量改正，如有议论偏激过甚者，仍行签出拟销”。^①

为了彻底禁毁“违书”，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系统的查办机构，专事查禁“违书”。中央在内阁分了三个地方来办理，一是红本处，专门查毁内阁已有藏书中的犯忌典籍；一是办理四库全书处，对各省采送进库的遗书进行梳理校考，抽出违禁典籍；还有一处是军机处，专门处理各省督抚奏缴进呈的违碍书籍，并予以复核。在地方各省、府、州，直至县衙内都设有收书局，负责各地区违碍书的搜查，凡查出的违禁书籍，都由收书局送交布政使司转呈各省督抚仔细查考，初步认定，其后分别列为“应毁书”、“抽毁书”等，并详细开单汇折进呈，送军机处转到办理四库全书处复加核查，四库馆臣复核后提出具体的易、毁意见，并将各书内的违碍内容逊条写成黄签，贴在书眉上，再详细

^①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四十三年四库馆查办有碍书籍条款。

开单汇折,经四库馆总纂纪昀、陆锡熊等最后审定再进呈给清帝弘历,由其最后决定是否毁弃。经弘历帝审批之后,再转告原办督抚,令其将奏准的书目发往各省,由各地查办人员照单收缴、销毁。各省还根据廷寄查办禁书目录单和各省奏准咨禁书目录单,以及各省奏准销毁书目单刊刻成《违碍书目》,交由各级收书局,供有关人员按图索骥,并且在社会上广泛散布,借助社会力量,共同查禁^①。同时,中央的三大机构也专门奏请将其各自查出的应毁书籍编成目录,散发给各省督抚,令其按目查缴,然后送到京城销毁。四库馆臣从各省进呈的书籍中查出应该销毁的典籍一百四十四部,有部分内容要抽毁的一百八十一部编列成《奏准销毁抽毁书目》,军机处也将其复核过的应全毁、抽毁之书共七百八十九种编成《军机处奏准全毁抽毁书目》,红本处则将从内府藏书中查出的应毁明人著述七十六种编成《红本处查办销毁书籍书目》。这些书目都经清帝审核后下发给各省,从而自上而下具体指导各级查办人员收缴。

清廷这一次对典籍的践踏,自乾隆三十五年始,历时近二十载,由于其组织严密、手段狠毒、涉及面广泛、动员的力量强,使我国积累了两千余年的典籍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浩劫,散失几殆尽。据有记载的各种违禁书目及《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的统计,仅列于销毁之列者即有三千余种,十万部以上,销毁版片六万余片,未见于记载者其数无计。仅浙江一省,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的八年间就二十四次焚毁典籍共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而由于害怕罪及自己而被藏书之家私下毁弃的典籍更无计其数。即使有幸留存下来的典籍也多被窜改、删节,面目全非。清廷的禁书使我国许多典籍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很多本来可以流传下来的典籍,如边塞诗文、兵书、明末之史书、清初的小说和戏曲等就此失传。部分未经刊刻,只以传抄

^① 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序》,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孤本流传于世的典籍,经清廷的销毁而散亡,如黄宗羲所辑《明文案》。至于其他缴送到四库馆却未能刊刻而导致湮灭的,就不知有多少了。有些典籍虽有幸未被投之于火,然清廷对收藏违碍书籍者严加治罪,因而无人敢公开收藏,更没有人敢将其刊刻行世,使其自然而然的消亡。而且由于弘历的专制淫威,当时的学人视被禁毁典籍为禁地,无人敢涉足,使其所代表的学术思想就此湮没,无以为继。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自清中叶以后迅速没落,以至被动挨打,虽事出多因,而清帝对我国典籍的摧残,对学术思想的禁锢应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二节 典籍的战争劫难

战争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极端形式,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有正义非正义之分,但无论正义与非正义,战争对于物质的破坏,结果都是可惜的。我国典籍的流散、亡佚,战争是最大的劫难之一。

在楚汉战争中,项羽火烧秦宫是我国典籍发展史上所经历的第一次重大的战争劫难。

公元前 206 年,项羽曾与军中约定,谁先攻下秦国的都城咸阳,谁就可以做关中王。汉王刘邦率先破秦都,项羽为争王位,率大军四十万,再一次攻进咸阳,杀秦降王子婴,并放火烧毁秦王室的所有宫室,大火三月不灭,使收藏在这些宫室中的秦朝公藏典籍及博士官所藏图籍尽皆化为灰烬。项羽虽身为贵族,却是一介武夫。《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学,学万人敌’”。因而,他入咸阳后,没有像萧何那样收取秦的典籍和律令,只是“收其宝货妇女而东”

(《史记·项羽本纪》),而将经先秦三代所积累下来的宝贵的典籍付之一炬,使我国的典籍遭受远过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劫难。秦始皇焚书所烧皆民间所藏,并且有所选择,非犯忌者皆得以幸存,而项羽所焚却恰恰是幸存的这大部分典籍。项王一炬,“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乃始荡为灰烬”^①,导致汉初典籍奇缺,学术文化的发展受到极大影响,政府虽一再刻意求书,所得也寥寥无几,到孝武时代,仍然“书缺简脱,礼坏乐崩”(《汉书·艺文志》)。“其后孔壁、汲冢虽稍稍发见,然窜乱散佚,辗转口授、非复本来面目”。^②

秦火之后,虽然西汉东汉历朝政府不断访求收集典籍,并且建立了较完备的典籍收藏体系,但两汉之季的战乱却使典籍再一次流散。

公元6年,汉室外戚王莽利用平帝年幼及王氏家族在皇室多年积蓄的权威篡夺了皇位,以“居摄”形式君临天下,9年正式建立新朝。王莽立国不久,即爆发绿林赤眉农民起义。此后十年,全国一直处于战乱之中。新朝覆灭之时,作为都城的长安不但有攻入的绿林军,还有政府军中的反莽武装,周围的地主武装也趁机进城,一时间,长安城陷于一片战火之中。其后赤眉军再入长安,又烧其宫室市里,使长安城再度成为废墟,西汉二百余年所收集整理典籍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汉室中秘之藏,始告荡然”(《汉书》卷四一),刘向父子历二十余载整理的一万多卷典籍被焚烧无遗,“台阁废顿,文书佚散”(《论衡·佚文篇》)。“礼乐分崩,典文残范”(《后汉书》卷一〇九)。

东汉末年,由于黄巾农民起义的打击,东汉政权的统治秩序被摧毁。公元189年,汉灵帝崩,少帝立,宦官的势力急剧膨胀,大将军何进打算召掌有重兵的董卓入京对付宦官,但事有未成,何进又为宦官所害,由此而导致了东都洛阳的大混乱。不久,董卓入京,废少帝,立

① 刘大櫛:《焚书辨》。

② 钱振东:《书厄述要》,见《坦途》1927年第4期。

献帝,并逼献帝迁都长安。“董卓迁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籍文章,兢其剖散,其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则制为膝囊”,到王允收拾所幸存的典籍西运时,自光武帝以来东汉百余年所积累的达六千余辆的典籍只剩下七十余辆了,其精华基本亡失。而且在运送过程中由于路途遥远,道路艰难,其中的大部分又在途中被弃,运达长安的已微乎其微(《后汉书·儒林传》)。兴平二年(195年),李傕、郭汜大战,又使幸存的“符策典籍,略无所遗”(《后汉书·董卓传》)。

两汉以后,中国经历了近四百年的分裂战乱时代,风起云涌的农民战争,此起彼伏的民族冲突,争权夺利的宫廷内乱,给典籍发展带来深重的灾难。“怀惠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侯景之乱,梁代典籍“咸自焚之”(《隋书·经籍志》),至后魏收集旧籍时,所遗典籍皆“新旧杂糅,首尾不全”,“或篇第褫落,始末沦残;或文坏字误,谬烂相属”(《魏书·孙惠蔚传》)。

晋初,武帝大封同姓王二十七人。至惠、怀,外戚专权,政局动荡,所封各王相互残杀,争权夺利,战乱连年,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西晋的统治机能从此瘫痪,农民起义蜂起,内迁的少数民族也纷纷称王。匈奴贵族刘渊及其子刘聪于公元311年攻占洛阳,316年攻占长安,匈奴兵在两都大肆烧杀,杀晋王公、百官、平民三万余人,毁宫室、庙宇无数,魏晋以来所聚集的“朝章国典从而失坠”(《隋书·牛弘传》),所建立起来的文化绿洲皆为砾土。官私典籍尽皆散失。“自永嘉之后,运钟丧乱,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惟观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皆尽”(《魏书·儒林传·叙》)。魏秘书监荀勖整理公藏典籍时,政府秘书中外三阁典籍共二万九千九百五十四卷,但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后,东晋“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隋书·经籍志》),仅及乱前十分之一,典籍亡遗之惨,由此可见。典籍的流散给此后南北朝的学术文

化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汉魏以来发展迅速的经学典籍多亡于是时,《尚书》不但欧阳经、大小夏侯之学尽失,而且出自孔壁的古文十六篇亦不传。故而“自丧乱以来,儒学尤寡,今处学则缺朝廷之秀,仕朝则废儒学之俊”(《晋书·荀崧传》)。为经学者无典籍以为据,皆陷入清谈。

永嘉之乱以后,南方历宋、齐、梁、陈,国频易立,篡乱相寻,干戈相挠,使典籍所遭受的损失日胜一日。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却两燃兵火,使典籍遭受大厄。齐和帝永元三年(501年),梁武帝起兵襄阳,攻入建康,兵火延烧,秘阁典籍尽皆遗散。太清元年(547年),东魏大将侯景利用投降梁朝的机会大败梁军,并趁机南下,于次年攻进梁都建康,在建康及周围地区大肆烧杀,“岁时城中积尸,不暇埋瘞,或已死而未敛,或将死而未绝,景悉聚而焚之”(《梁书·侯景传》)。梁所收典籍大受其害,秘书省所藏尽皆没于火海。“初,侯景来,既据东宫,伎女尚有数百人,景乃分给军士,夜于宫中置酒奏乐。忽闻火起,众遂惊散。东宫图籍数十厨,焚之皆尽”(《太平御览》卷六一九)。公元552年,孝元帝派陈霸先进攻并收复建康,将文德殿的幸存典籍及公私所藏万余卷悉送江陵。公元555年,西魏宇文泰与萧督合兵南下,攻破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行殿,命宫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梁之所聚尽毁于斯,西魏兵收其残卷败页,只有十之一、二。至陈朝时,政府已无书可藏,虽力加访求,还是“遗阙尚多”,再也无法建立起系统的公藏典籍体制了。隋朝建立以后,政府所遗存的典籍只有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书目,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隋书·牛弘传》),兵燹对典籍的摧残,竟至于斯。

至唐朝,由于其前期百余年的和平安宁,被六朝战乱和隋末兵火所破坏的国家典籍得以恢复和发展,但开元盛世后,唐玄宗日益昏庸,此后历朝天子皆腐败无能,沉于声色犬马之中,重用奸臣、宦官当

道,政局动荡,导致国力虚弱,战事频起,几次重大的战乱又使那些刚刚聚集起来的宝贵典籍散于兵火之中。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不识字”、颇受玄宗依重的胡将安禄山借口讨伐宰相杨国忠于范阳发兵十五万向南进发,并很快渡过黄河,攻下东都洛阳,次年破潼关直扑唐都长安。安禄山哀于失子之痛,每占一地即疯狂烧杀,城池皆为废墟,两都毁甚。“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旧唐书·经籍志》)。唐前期所聚之典籍“尺简不藏”(《新唐书·艺文志》),藏于长安兴庆宫史馆中的《国史》一百零六卷、《开元实录》一百二十卷、《起居注》及其他史籍三千六百八十二卷皆被焚毁。战后,政府为了恢复史馆藏书,不得不“令府县收访”,并以“得一部起授官,一卷赏绢十尺”的条件“委加购赏”(《唐会要·修国史》),然所得终有限。

安禄山的叛乱刚刚被平息,原与唐朝和好的吐蕃趁唐朝内乱,兵力不济,发兵攻唐,并于公元763年攻陷长安,在城中大肆烧杀抢掠,长安城又一次变为砾土。历安史之乱而幸存的典籍再遭兵火。其后,代宗不惜以千金购书一卷的代价求书于民间,然“数日之内,唯得一两卷”,可见损毁之惨。

百年之后,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唐末农民起义的黄巢部攻入长安。战乱之中,唐宗室和官吏在逃离京城之前,趁火打劫,在长安烧杀掳掠,军队以藏书之地为营,典籍尽皆残损。“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及行在朝诸儒,购辑所传无几”(《旧唐书·经籍志》)。

这三次战乱,使唐朝的国家藏书散失严重。“唐季流离,中原多故,儒雅之风,几将坠地,故百王之书,荡然散失,兰台延阁,空存名号”(程俱:《麟台故事·沿革》)。开元盛世时,安史之乱前,唐朝国家所藏典籍达七万余卷,经三次战火,典籍尽亡,至昭宗时,虽多方访求,所集也只有二万余卷,“至迁都洛阳,又丧其半”(《旧唐书·经籍

志》)。后经五代离乱,至宋初,所存典籍仅万余卷,且编帙散佚,唐以前之历代旧籍,所剩无几。经北宋初期百余年的访求,至宋仁宗庆历初年(1041年)编《崇文总目》时也不过有典籍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还不及开元所藏之半。可见唐季战争和五代兵火对典籍摧残之烈。

北宋立国以后,不断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辽、金军队时时意欲南下,边关战争不断。宋真宗以后历代皇帝皆软弱无能,对辽、金南下一意求和妥协,更助长其野心,虽有“澶渊之盟”,却未避“靖康之乱”。

公元1126年,利用宋兵灭辽的金人反过来挥师南下,分两路攻宋,虽西路被阻于太原,但东路很快占领了燕京,渡过黄河,直逼宋都东京。次年,城破,徽、钦二帝被掳北去。此战至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高宗杀岳飞议和方止,长至十六载,中原大地饱受兵祸,金兵所过之处,无不烧杀抢夺,城池被踏为平地,国家宝藏、私家秘籍或被掠走,或为灰烬。

“迨夫靖康之乱,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宋史·艺文志》),秘阁图书,狼藉泥中,分别藏于龙图阁和太清楼经仁宗朝整理的典籍精华尽失。金兵攻陷汴京以后,以徽、钦二帝为挟,逼宋室选秘阁三馆书籍、印本监版、宋人文集及阴阳医卜之书送上。宋室不敢有违,1127年2月,只得派鸿胪卿康执权、少卿元可当、寺丞邓肃等押佛道经版,校书郎刘才、邵溥宿、国子监主簿叶将、博士熊彦诗、上官悟等五人押监书印版,并馆中书籍送纳^①,使大批珍贵典籍辗转亡佚,王室藏书和州县典籍皆为一空。嘉祐年间由曾巩等名家校定的宋、齐、梁、陈、魏、北齐、北周七代史籍几亡于此乱。高宗南渡以后,收拾整理幸存典籍,则已十不得其四、五。

公藏典籍毁坏如斯,私人所藏也未能幸免,许多藏书家几世所

^① 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第199页。

积,荡于兵火,片纸无存,给我国私人藏书事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陆游在其《跋京本家语》中所云:“本朝藏书之家,独称李邯郸公、宋常山公,所蓄不减三万卷。……李氏书属靖康之变,金人犯阙,散亡皆尽,收书之富独称江浙,继而胡骑南骛,外县悉遭焚劫,异时藏书之家,百不一存,纵有存者,又皆覆落不全”^①。他如,叶梦得家藏典籍十万卷,曾于宣和五年(1123年)将旧藏三万余卷置于弁山之石林谷。金兵铁蹄践踏过,典籍半数不存;七世藏书的晁公武,家藏丰富,然“兵戈之后,尺素不存也”,以至“无书可读”(《郡斋读书志·序》)。更有著名词人李清照,虽极力逃避,然其艰辛所藏也未能幸免,“至建康丙午岁,侯守淄州,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篋,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及南逃时,“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杂物用屋十余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其后,词人将所余典籍两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存于洪州妹婿处,“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绍兴壬子(1132年),将家中所有寄剡,官军收叛卒取去……所谓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矣”。所余又遭窃,所存不过“一二残零,不成部帙”(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建康兵火,藏家呵护之苦,典籍损毁之惨,于此可见。

到了明代,则又有倭寇入侵,甲申之变,明代二百余年所聚之公私典籍大多毁于一旦。

倭寇之患始于明初,烈于嘉靖年间。由日本内战中失势的武士组成的倭寇自十四世纪起不断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以后的若干年间,倭寇趁明朝政府疏于海防,勾结当地的

^① 《渭南集》卷二八。

土豪,明目张胆地走私劫掠,甚至攻占城池,杀人放火,江、浙、闽等受害最烈的地区共有数十万人丧生。而这一带正是我国私人典籍收藏最丰富最集中的地区。倭寇骚扰使沿海很多藏书家都典籍无存。顾炎武家世代为儒,至其曾祖,累历代而藏共有七千余卷,虽家道中落而典籍犹存,“而倭阑入江东郡邑,所藏之书,与其室庐俱焚无孑遗焉”(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松江华亭人何良俊,少好读书,宁愿典衣受饥而收藏善本典籍,其筑于东海上的清森阁藏书几达四万卷,名画百签,法帖鼎彝数十种。倭寇祸起,兵火所至,皆为废墟,片纸无存^①,其他没于倭祸的私藏之家繁不可举,明代私藏典籍的精华几尽毁于斯。

倭祸虽然惨烈,其破坏仅限于东南沿海,没于战火者多为私家藏书,而甲申之变,战火燃遍全国,明代国家所藏典籍皆毁于其中。

公元1644年,以李自成为首的明末农民起义军经过十多年的战争,终于进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而同时,关外的清兵在吴三桂的引导下直扑中原,攻占北京,这一连串战争使中国历史发生了变化,也使明代所聚积的典籍遭到严重破坏。战事所及之处,所藏典籍无不被焚,北京大火、“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使珍贵的文化典籍皆化为灰尘,成为古今典籍的一大劫。

明代“以二祖之圣学,仁宗之右文,访求遗书,申命史馆,岁代积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如焚如,……内阁之书尽矣,……煨尽之余,继以狼藉,举凡珠囊玉籍,丹书绿字,绋几之横陈,乙夜之进御者,用以汗牛马,制骆驼,蹈泥沙,藉粪土,求其化为飞尘,荡为烈焰而不可得”^②。文渊阁是明朝政府藏书最丰富的地方,其所藏“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明史·艺文志》),甲申兵火之后,荡然无存,康熙年

① 施金炎:《中国书文化要览》,第258页。

② 钱谦益:《黄氏千顷斋藏书记》,见《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第35页。

间修《大清一统志》时，打算参考阁中所藏典籍，却已寥寥无几，无以为资了。宋、辽、金、元诸代所刻典籍甚巨，仅严嵩家藏即有宋版典籍六千八百五十三部，明文渊阁所藏二万余部，经甲申之乱，尽皆亡佚，以至于清朝历一百多年的搜寻后，天禄琳琅所藏，加上明版典籍也不过千部左右，“才有二千二百五十八册”而已，黄丕烈、陆心源穷力所积也不过一二百部，皆视为珍品，可见其时宋元版典籍之稀。《永乐大典》是明朝永乐年间政府动员三千多人而修成的一部百科全书，共辑入古今典籍八千种左右，成书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然甲申之变，藏于北京文楼的正本被毁，导致这部巨著最终散佚，如此损失，世所罕见。战火之乱，无以复加。

甲申之变受损者非仅官家所藏典籍，私人所积珍品也尽皆散亡。

在明朝，“海内藏书之富，莫先于诸藩”，“周藩之竹居，宁藩之郁仪，家藏与天府埒”，明末战火过后，“今皆无尺蹠片纸矣”^①。诸藩所藏尚且如此，一般嗜藏之家自为难免。

江右陈士业一生苦聚，藏书颇丰，“乙酉（1645年）入山，犖载所藏书，不下数百卷，铁骑一来，屯扎于敝居石河，一夕一粒一丝一缕俱尽，而所藏书悉被割剥破裂，作纸甲数千。煤痕离离驮驷之背，余以支枕藉地，数万缥緗，沦于一旦”^②。全祖望祖辈累世收藏典籍，战乱时，其藏书所被营将所据，他们打开库房，原以为有财物可掠，当发现全为古书时，则付之一炬，使全家从此片纸无存（《鮚埼亭集》外编卷一七）；更有中丞潘曾绂，战火烧至，其毕生所集被大兵投于溪中叠桥为渡，以搬物过河，兵燹摧残典籍惨烈如斯，实可泣可叹！

清朝后期，内外矛盾日剧，多次战乱，给我国的公私所藏带来了

^① 钱谦益：《黄氏千顷斋藏书记》，见《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第35页。

^② 陈士业：《酉阳山房藏书记》。

重大的破坏。

太平天国革命历时十五载，战火波及江南十六省，江浙一带的公藏典籍和丰富的私家藏书深受祸害。《四库全书》编成后，清廷藏于江南文澜、文汇、文宗三阁的抄本，无一幸免。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所藏四库全书皆与阁俱焚，百不存一，以至清廷后来派人想恢复二阁藏书，然终因缺损过甚而未能如愿。杭州文澜阁所藏亦或被焚或被人乘乱所盗，幸有丁氏兄弟竭力呵护迁藏，才保其部分周全，后经多方搜寻补缀，遂成完璧。战后，江南各地“书各散佚”，“江苏松、常、镇、扬诸府，向称人文极盛之地，学校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摹刻经史诸书板片，亦均毁失”，致使“江南文明大省，士子竟无书可读”；不但公藏典籍俱毁，“民间藏书之家”，“卷帙悉成灰烬”^①。著名的范氏天一阁所藏兵火后，大部散佚，位于鄞县南边的奉化有一还魂纸厂，战火所及，天一阁书被趁乱盗走，论斤论两卖于此厂。战后清点，存者不及旧日十之四。而杭州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室、赵氏小山堂等著名藏书楼皆毁于战乱。

与太平天国同时的咸丰七年（1860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焚烧圆明园，园中文源阁所藏《四库全书》全部化为灰烬。藏于翰林院的千古巨著《永乐大典》或被掠或被盗，丧失其半。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又一次进行烧杀抢掠，兵火所至，“四库藏书，散佚过半”，“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之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等物。武进刘保真太史拾数册，阅之则《永乐大典》”^②。幸存的《永乐大典》经此种浩劫，百去九七，成千古遗憾。可见战争给典籍带来的劫难，实在触目惊心。

① 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第246—247页引。

② 雷震：《新燕语》（上），见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207页引。

第三节 典籍的自然灾难

大自然毫无代价地赋予人类生存的条件,但有时又毫无情面地给人类带来很多灾难。在灾难中,不单是人类自身,人类所创造的财富,其中包括精神财富,如文化典籍等也会毁于一旦。而典籍的载体除了早期的甲骨、金石以外,无论是竹木简、缣帛,还是纸张,都易于被火焚,遭水渍,受虫蚀,因而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典籍曾经历过无数次的自然劫难。

火灾,是典籍遭受的最残酷的、破坏性最大的自然灾难。我国无数典籍都因回禄之祸而沉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我国典籍遭火灾焚毁最早见于文献的是《左传·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书,……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礼书,……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桓僖二宫藏有许多鲁国的重要典籍,虽然抢救出了一些,但不少丧于火中。鲁国是春秋时期诸侯国中收藏典籍最多的国家,经此次火灾,所藏典籍大都散佚。

我国的公藏典籍在两宋以前都没有遭受自然之火的重创,而两宋以后,火灾不断降于王宫皇室,使国家藏书遭到重大破坏。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夏,荣王元俨宫发生火灾,大火延烧崇文院、秘阁,使宋代好不容易收集起来藏于崇文院、秘阁的典籍都化为灰烬,所剩无几。大火过后,国家无书可藏,只得重金再次向民间访求典籍,并招笔工二百人借太清楼典籍重新抄写,即使如此,所得也只是一万八千余卷,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初建崇文院时的八万余卷相比相差甚远。

此次火灾以后,宋代政府加强了对国家藏书的防火管理。南宋高

宗绍兴十四年(1144年)秘书省规定:“本省自来火禁,并依皇城法,遇有合用火烛去处,守门亲事官一名专掌押火洒熄。除官员直舍并厨司、翰林司、监门职级房存留火烛,遇官员上马主管火烛亲事官监视洒熄,其余去处并不得留存”(《南宋馆阁录》),即使如此,也未能避免回禄之祸。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禁中失火,馆阁所藏典籍均被延烧,百余年的累积毁于一旦,刚刚整理过的六万余卷典籍大部散亡。

明代的国家藏书则三度受灾,使其藏书体系受到极大破坏。南京文渊阁是明代永乐以前的重要藏书处,永乐辛丑北京大内建成后,文渊阁内所藏典籍一部分北运,但仍有大部分留存南京,这些可说是明朝前期藏书的精华。但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一场大火使文渊阁所藏尽皆化为灰烬,明代前期所积累下来的典籍精华荡然无存。

百年之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北京皇宫三殿发生火灾,大火迁烧文楼,当时《永乐大典》的正本藏于此,世宗闻讯,连下三四道圣旨,命宫人急速抢救,使这部巨著幸免于难,但其他藏于此处的典籍却大部葬于火海。

明神宗万历年间,阁臣陈于陞上奏请求纂修正史获准,于是开馆分局尽力收集明立国以来的各代实录,采朝野之见闻,进行编修,在即将成稿时火灾突至,所收史料及成稿皆化为灰烬,不但使修史无成,而且使明代的史料损失惨重,传世无几。^①

清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发生火灾,此宫内的五经萃室失火,藏于其中的珍贵的相台五经被焚。相台五经是元代岳浚于荆谿家塾所刻,校勘精审,刻印精良,乾隆帝非常喜爱,特独立于天禄琳琅而辟五经萃室藏之,并撰《五经萃室记》叙其经过。

嘉庆十年(1805年),江宁县学宫之尊经阁不幸遭火灾,存放于

^①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三。

此的南监本二十一史书版、《玉海》及《江南通志》等典籍的书版同珍贵的三段碑和落星石俱为灰烬。南监本二十一史书版明代藏于南京国子监，“其中固有宋板者七，元板者十，唯辽金两史，翻刻元板，宋元两史，为明板。延及清初，各史又有顺（治）康（熙）补刊之板，故南监二十一史实合江南、四川、广东、北平各地板本，亘宋、元、明、清四朝搜集雕刻，翻修校订，緜缠不绝者七百年，其性质与今所谓《百衲本二十四史》相等，而人事之勤，历年之远远过之。北监翻刻汲古家刻，清之殿本局刻，皆无此悠远之历史也”^①。如此历史久远、珍稀无比的书版遭祝融一炬，从此永无以为继，这种损失实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大劫难。

火灾所焚毁的不仅仅是公家所弃，历代私家所藏也屡受回禄之祸，虽然藏书之家极力保护，严密防范，然祝融氏一到，几世所藏皆为青烟。

东晋著名学者葛洪藏书宏富，但后来遭受火灾，所有藏书皆被扫荡，只有自著的《西京杂记》二卷放在随身携带的巾箱中，才得以幸免。

两宋之际的靖康之乱使宋代私人所藏典籍尽皆毁弃，而万幸逃过此劫者又有不少遭回禄之害而只字无存。吴县人叶梦得是当时最著名的藏书家之一，其所藏典籍十万卷，除三万卷旧籍有半数散失于兵乱以外，大部分得以幸存。他在弁山的石林谷建了一座喂书阁专藏所存典籍，而绍兴十七年（1147年）的一场大火将其苦心存积的典籍无情吞噬。

宋敏求几代收藏典籍，以选择之精、校勘之详而闻名，共有典籍三万多卷，先后两遭火灾，所藏片纸无存。

到了明代，私人藏书家已特别注意典籍的防火。如著名的天一阁

^① 柳诒徵：《监本史谈》，载《国学图书馆》（江苏）1929年刊。

即规定读者不得在夜间入阁读书,凡阅书之人应不嗜烟草。但防范虽严,祝融氏仍有隙可乘。明户部尚书历城人边贡癖于求书,金石古文无所不收,所积甚富,然终未免于回禄之祸,火起之时,他面对大火仰天大哭,曰:“嗟乎,甚于丧我也!”毕生心血毁于一旦竟使他伤心成疾而卒。火灾之害对典籍的摧残至于此。

私人所藏毁于火灾最可惜的是清代钱谦益的绛云楼。钱氏是明清两代的著名藏书家,一生致力于典籍收藏,且所藏皆宋元精本,雠校精细,质与量皆称江南第一。然顺治七年(1650年)冬日,“其幼女中夜与乳媪嬉楼上,剪烛炷,误落纸堆中,遂燃。宗伯楼下惊起,焰已弥天,不及救仓皇走出,俄顷,楼与书俱尽”^①,宋元精刻皆成劫灰,只有放在楼外的数百本明臣志传得以幸免。典籍俱失,钱氏晚年沮丧,已无心于典籍收藏,灾后余存,全部送给了钱曾。

水火无情。损毁典籍的最大自然灾害除火灾外还有水患。典籍受水患而散佚的情况有两种,一是在典籍水运搬迁途中,船沉舟覆导致典籍没于水中而失;再是洪水突至,房倾楼塌,典籍来不及转移而漂没。

东汉末年,董卓作乱,逼汉献帝迁都长安,东观、兰台所藏典籍随之以船载而西。途中遇盗贼打劫,般只大部沉溺河中,只有数船幸免于难,经东汉末年战火而幸存的部分典籍又大多葬身鱼腹,此难使汉室典籍彻底散佚(《旧唐书·经籍志》)。

唐朝武德五年(622年),李世民在洛阳打败了篡隋而为郑的王世充,将经隋末战乱遗存的隋代典籍收为唐有,并且命司农少卿宋遵费用船装载沿黄河向西逆流而上运往长安,快要到达唐都时,经过三门峡附近的砥柱,船触柱而沉,所载典籍全部落入水中,大部分就此

^① 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辞》,《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第32—33页。

漂没,所存者十不过一、二,其目录也被水浸濡而残缺。这是我国典籍遭水厄损失最重大的一次(《隋书·经籍志》)。

南宋普州人刘仪凤仕于都下,长年累月将自己的俸薪大部用来收集典籍,藏书至万卷,因迷书成癖,终至罢官,归蜀时携所收典籍分装三船运回。船行至秭归新滩时,有一只船触礁沉没,其中所载典籍尽失。

北宋仁宗天圣二年,洛阳大水,曾任镇海节度使的富弼几世藏书,大水一到,其所藏典籍尽皆漂没流失。市人得而鬻之,书中“镇海节度”的藏书印章还清晰可见。

黄宗羲是清初著名的藏书家、学者,他穷年搜付,一生聚书,收罗于大江以南所有藏书之家,曾从祁氏澹生堂、徐氏传是楼、范氏天一阁等诸名家藏书中抄录很多珍本,所藏达六七千卷。然还未来得及编目,所藏典籍即遭水灾,漂没过半;更不幸的是,他死后不久又遭回禄之祸,所余典籍又去其大半,他所藏的名刻精品大多散佚,最著名的是其所藏的抄本薛居正之《旧五代史》,因水灾而佚。

我国的典籍自殷商产生之日起,历经几千年的发展,虽越来越兴旺,但由于无数次人为的、自然的灾难,使其中的绝大部分沉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其流传至今者十不存一。“试一检《汉书·艺文志》六略所载,复之《隋书·经籍志》四部所录,殆已少十之四以上,《宋史·艺文志》较《隋志》又少十之三;《明志》视《宋志》又少焉”。盛唐开元十九年(731年),集贤院所藏子部典籍有二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卷,而到天宝三年(744年)仅历十余年,子部典籍只剩一万六千二百八十七卷,已有三分之一亡佚,至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整理国家藏书时,子部典籍仅存七千卷^①,典籍散亡之惨于此可见,尽管如此,我国

^① 祝文白:《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载《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第76—77页。

的典籍仍然动态地展示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概貌,支撑起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大厦,使我国的学术文化繁衍生息,发展成今天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体系。它们所蕴含的精神是炎黄子孙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参 考 文 献

- 兰州大学中文系《论语》译注小组：《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 兰州大学中文系《孟子》译注小组：《孟子译注》，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 《墨子》，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二子》本
- 《韩非子》，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二子》本
- 《史记》，中华书局校点本。
- 《汉书》，中华书局校点本。
- 《后汉书》，中华书局校点本。
- 《三国志》，中华书局校点本。
- 《隋书》，中华书局校点本。
- 《明史》，中华书局校点本。
- 汉·应劭撰、吴树平校注：《风俗通义》，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 梁·释慧皎：《高僧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版。
- 唐·释道宣：《续高僧传》，明万历刻《径山藏》本。
- 汉·王充：《论衡》，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 1985 年版。
- 隋·杜宝：《大业杂记》，清道光刻《指海》三集本。
- 五代·冯贲：《云仙散录》，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 1985 年版。
- 宋·王溥：《五代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 宋·沈括：《梦溪笔谈》，明刻本。
- 宋·欧阳修撰、李伟国点校：《归田录》，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 宋·李攸：《宋朝事实》，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 1985 年版。
-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 1985 年版。
- 元·王恽：《玉堂嘉话》，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 1985 年版。
- 元·吾衍：《闲居录》，四库全书本。
- 明·邵经邦：《弘简录》，清康熙刻本。

- 清·高士奇:《天禄识馀》,清道光刻说铃丛书本。
- 清·钱曾撰、章钰校证:《读书敏求记校证》,中华书局1990年版。
- 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
- 清·徐康:《前尘梦影录》,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版。
- 杜预等注:《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华书局1988年版。
- 李时编著:《国学问题五百》,天津市古籍书店1986年版。
- 顾苓臣:《经史子集概要》,中国书店1990年版。
-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柴德赓:《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
- 杨布生、彭定国编著:《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 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 李万健:《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传略》,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 郑伟章、李万健:《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 张林川等编:《中国古籍书名考释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
- 王彬:《禁书·文字狱》,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
- 张舜徽:《文献学论著辑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章学诚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文史通义》,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
-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
- 王西梅:《中国图书馆发展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 刘少泉:《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 钱存训:《中国古代书史》,香港中文大学1975年版。
- 陈彬龢、查猛济:《中国书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 王伯敏:《中国版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年版。
- 郑如斯、萧东发:《中国书史》,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 郑如斯、萧东发:《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 张秀民:《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
- 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话》,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 谢灼华等:《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 来新夏等:《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 蒋伯潜、朱剑艺:《经学纂要·经学提要》,岳麓书社 1990 年版。
- 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 魏承思:《中国佛教文化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陈国符:《道教源流考》,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 朱越利:《道经总论》,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 陈秉才、王锦贵:《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4 年版。
- 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
- 杜石烈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编》,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北京出版社 1986 年版。
- 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 刘尚恒:《古籍丛书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